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说不尽的毛泽东  
(下)

 **eBOOK**  
内部资料 非卖品

说不尽的毛泽东  
张素华 边彦军 吴晓梅

## 访逢先知——关于毛泽东研究的几个问题

### 逢先知

逢先知，1929年生，山东胶县人。1950年到毛泽东身边工作，前后16年。

“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1978年后，到中国科学院政策研究室工作，1980年调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历任毛泽东研究组副组长、室委员会委员、副主任、主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期从事毛泽东生平、思想的研究和编辑作。主编或参与主编《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泽东书信选集》、《毛泽东著作选读》新编本、《毛东选集》（第二版）、《毛泽东年谱》、《邓小平文选》等。发表的主要著作有《毛泽东的读书生活》、《泽东和他的秘书田家英》等。

这篇谈话虽然长一些，但并不难读，因为都是毛泽东研究中的重大问题，相信读者会喜欢的。这又是我们采访的最后一篇，整理完最后一个字，不由地长长舒了一口气——一件事情终于做完了。在此，我们对100位专家学者和帮助过的人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 如何评价中国20世纪的两场革命

访问人：江泽民同志1993年11月出访美洲国家时，多次向各国领导人讲到这样一个观点：我们为下一个世纪做些什么。关于世纪问题，将是今后一个时期人们谈论的热点，看待这个问题固然要展望未来，但历史的进程是连续的，也就是说，新世纪总是从前一个世纪而来，正是前人的不屈不挠的奋斗，给开辟未来打下了基础。中国的20世纪，至少有两件大事是和毛泽东联系在一起，一个是创建新中国，一个是在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建立起了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您如何评价在毛泽东领导下完成的这两件大事？

逢先知：创建新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这两件大事，分别是两种不同性质革命的结果：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由于这两种革命紧密相连，相隔时间很短，我们也可以把它们看作是一次革命，江泽民同志在十四大的报告，实际上就是这样说的。这次革命的意义，我把它概括为三个结束，一个奠定。这就是：结束了一百多年来中国人受屈辱、受压迫、受剥削的历史，结束了旧中国四分五裂、贫困落后、民不聊生的黑暗历史，如果更长远地看，则是结束了几千年的剥削制度，开辟了中国的新纪元。一个奠定，就是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为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现代化国家奠定了基础。

占世界人口五分之一的中国人站起来了，是一件影响世界历史进程的大事，使世界力量对比起了很大变化。

访问人：那么，中国的第二次革命是指的什么？

逢先知：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开始的以改革开放为鲜明特点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就是第二次革命。关于两次革命，十四大报告是这样说的：“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领导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经过长期奋斗，夺取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进而建立起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把一百多年来受尽外国侵略欺凌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变成了独立的人民当家做主的社会主义新中国。”“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领导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开始的又一次伟大革命，是要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经过长期奋斗，把中国由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国家变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使社会主义优越性在中国充分体现出来。”

两次革命代表了不同的时代，完成不同时代的任务。第一次革命，使中

国变成一个独立、自由、统一的社会主义新中国，并对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进行过艰苦的探索。这个探索取得了一些成果，也发生过失误甚至严重错误。不论是积极的成果，还是严重的错误，都为第二次革命作了准备。邓小平在这个基础上继续探索。他根据新时期的新情况，结合新的国际条件，成功地实现了第二次飞跃，指导第二次革命。毛泽东的探索虽然没有成功，原因也是多方面的，但在探索中提出的许多有价值的、富有远见的思想以及这种探索精神的自身，随着时间的推移，会越来越显得可贵。为什么一批社会主义国家包括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变质了、解体了、演变了，而社会主义中国却屹立于世界东方，岿然不动？就是因为我们党不论是第一次革命还是第二次革命，都是独立自主地走自己的路，没有亦步亦趋地跟着苏联走，并且有自己正确的理论作指导，这是我们成功的重要条件和保证。

访问人：这两次革命，是不是有一个贯通在一起的东西呢？

逢先知：这就是我们党一贯坚持的把马列主义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两次革命的成功都充分证明了，不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必须坚持以马列主义原理作指导，结合中国的具体情况，制定自己的方针和政策，并形成新的理论。就是说，它是马列主义的，又是中国特色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改造也是中国特色的，今天的改革开放更是具有中国特色。如果说有贯通的东西，我认为就在这里。

#### 成功的秘诀

访问人：毛泽东的一生，无疑是伟大的，既有辉煌的成功，也有他晚年遗憾的失误。在您看来，他成功的秘诀是什么？他失误的原因又出在哪里？

逢先知：这个问题很大，也很重要。先谈他的成功，如果一般他讲，可以举出很多条，但最主要的是什么？就不能泛泛地罗列了。我认为有这么几条：

第一，是他能坚持一切从中国的实际出发。这是比较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等人的领导而显出的最突出的特点。应当说，这几位早期领导人都曾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分子。陈独秀在新文化运动中就出了名，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领导人之一，瞿秋白、李立三也是优秀的。他们为什么不能领导中国革命取得成功？除了其他原因，主要是他们不能从中国的实际出发，不是囿于一般经验，就是从本本出发。王明更是如此。你们知道党的历史，在党的二大上就确定了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政策，还提出了革命分两步走。但确定了革命目标，并不等于就找到了革命道路。提出并解决中国革命道路问题是毛泽东完成的。他从青年时代起，就注意了解和研究中国社会，他思考问题的角度总是立足于中国，特别是当他获得了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之后，更使他的这种个性特质发生了一个飞跃，这就是扎根中国实际，靠调查研究，了解中国社会，了解中国国情。

访问人：对毛泽东来说，他作调查研究比他接受马列主义还要早。

逢先知：如果论读马列著作，好多人都比他读得早、读得多，李大剑、陈独秀是最早的一批，瞿秋白、恽代英、邓中夏读马列的书、翻译马列的书也比较早、比较多。但论对中国社会、中国国情的了解，毛泽东是优于他们的。早在长沙求学时期他就利用暑期出去游学，通过和各阶层的人民交谈，了解中国的社会，这一条他比谁都早。可以说，是他开了中国共产党调查研究事业之先河，开创了中国共产党调查研究的一代新风。我记得60年代初有一位外国共产党领导人来访，当时《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刚刚出版，他问《毛

选》第四卷有些什么内容，毛泽东回答：就是一条，根据不同情况制定不同的政策。这就是从实际出发。这是毛泽东提出和倡导的一条正确的思想路线。王明、博古也有一条思想路线，是一条完全相反的思想路线。博古在七大发言作自我批评时曾说，他们遇到革命中的实际问题，不是先考虑实际情况如何，而是先考虑马恩列斯在什么地方怎么说的，或者在欧洲在俄国革命史上有过什么类似的情况，用过什么样的口号和策略，并且把它们原封不动地搬到中国来，博古的这个自我解剖是很有代表性的。从两条思想路线的比较中，可以看出毛泽东的高明之处。小平同志说：我“就是一条，相信毛主席讲的实事求是。过去我们打仗靠这个，现在搞建设，搞改革也靠这个。”这个概括是非常深刻的。

第二，善于听取党内外各种意见，择善而从之，也就是毛泽东的民主作风。在毛泽东身上的确充分体现了民主作风，或者说大部分时间是民主的。最显著的表现是在解放战争时期。为什么只用了3年多一点的时间就打败了比我们的兵力强大得多的蒋介石，除了人心的向背等因素而外，毛泽东的正确领导是关键。而他的正确领导同他的民主作风是分不开的。毛泽东善于吸收正确的意见，更善于根据不同的意见作出正确的决断。他的很多正确决策，包括一些重大决策，是吸收了下面指挥员的意见。比如，1946年解放战争刚刚打响，那时粟裕带领的部队在苏中地区，毛泽东从保存我军的有生力量出发，指示他们打到外线，打到淮北去。接到这个指示，陈毅主张坚决执行，粟裕对于留在苏中内线作战和打到淮北外线作战的利弊得失，作了比较，主张继续留在苏中作战，来来回回的电报反映出不同意见的讨论。最后，毛泽东吸收了粟裕的意见，改变了他原来的主张，于是有了苏中战场的七战七捷。1948年初，为了调动中原敌军回防江南，便于我军各个歼灭江北之敌，毛泽东决定由粟裕率三个纵队渡江南下，打到京沪杭地区。粟裕提出不同意见，毛泽东和中央吸收了他的意见，仍留在中原作战。然后，华东野战军在中原野战军的配合下，打了豫东战役，后来又打了济南战役，为淮海战役的大决战创造了条件，打淮海战役，毛泽东也是吸收了刘伯承、邓小平、粟裕等人一些意见，由小到大，取得了基本消灭蒋军主力于江北的大胜利。这方面的例子是很多的。我们可以看到毛泽东在解放战争期间写的一些电报中，经常询问下面的情况，在作出重大决策之前，往往要征询下面的意见。

访问人：军事民主就是他概括和提出来的，这恐怕也是反映一个高明的军事统帅的基本素质，就像楚汉相争时的刘邦，他不仅能吸收下面人士的各种意见，而且能判断哪种意见对。那么，对错误的意见和主意，毛泽东是如何对待呢？

逢先知：对错误的意见，毛泽东主张也要听。你们都读过《党委会的工作方法》，那里面有一段话是这样说的：“下面干部的话，有正确的，也有不正确的，听了以后要加以分析。对正确的意见，必须听，并且照它做。……对下面来的错误意见也要听，根本不听是不对的；不过听了而不照它做，并且要给以批评。”还有一点，值得特提一下，就是毛泽东还善于从群众的不满言论中吸取合理的内容，著名的例子，就是延安时期有雷击打死人的故事。当时一个农民发怨言，说“雷公为什么不打死毛泽东”。毛泽东没有怪罪这个农民，反而从这里发现问题——农民的公粮负担过重，于是发动机关、部队搞生产，叫做“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减轻了农民的负担。小平同志非常称赞毛主席这一点，几十年后还用这个例子教育干部。

访问人：最近我们学习《邓选》第三卷，特别注意到小平同志的这段话，他是这样说的“对群众的议论，毛泽东同志是非常注意的。同志们总记得，在延安的时候，生产运动是怎么搞起来的。为什么提倡生产运动呢？原因之一就是当时征粮征多了，群众有怨言。我们好多共产党员听了心里非常不舒服。毛泽东同志看法不同，他说，讲得有道理，群众的呼声嘛！毛泽东同志就是伟大，就是同我们不同，他善于从群众这些议论当中发现问题，提出解决问题的方针和政策。”

逢先知：讲得多好！成功的领袖必须有这一条，有这个气度，没有这一条就不会成为成功的领袖。

第三，是他善于团结人，包括团结那些反对他而反对错了的人。中国共产党长期处在分散的农村游击战争的环境，形成了许多山头。要把各个山头的人都团结起来，形成一个坚如钢铁，团结一致的党，是很不容易的。毛泽东做到了，做得非常出色。之所以能够如此，除了靠他的正确的思想，理论、政策作为统一全党思想的基础而外，在处理党内关系方面，他提出并实行了一整套正确的原则和方法，如团结——批评——团结，对犯错误的同志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等。经过延安整风，到党的七大，全党都紧密地团结在毛泽东的周围，真是像第一个历史决议所说的那样，“团结全党同志如同一个和睦的家庭一样，如同一块坚固的钢铁一样”。毛泽东不但善于团结党内的同志，也善于团结党外人士，作为共产党的领袖，善于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阶级、阶层和个人，而把最主要的敌人最大限度地孤立起来。毛泽东具有宽阔的胸怀和宏大的气度，这是他善于团结人，能够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的重要的个人气质。

第四，是他具有科学远见。“预则立，不预则废”。毛泽东比别人高明的一点就是，他每走一步棋，还要看到第二步棋、第三步棋，甚至看得更远。军事上如此，政治上更是如此。抗日战争快要胜利了，他就想到城市工作问题，为筹划下一步开辟的工作局面做准备，1945年1月，他在《必须学会做经济工作》一文中说：“我们要打击日本侵略者，并且还要准备攻入城市，收复失地。……将来从城市赶跑敌人，我们也会做城市工作了。”

访问人：看来1944年8月他给秦邦宪的信不是偶然的，在那封信中，他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基础是机器，不是手工”这个问题。

逢先知：绝不是偶然的，他还说：“现在的农村是暂时的根据地，不是也不能是整个中国民主社会的主要基础。由农业基础到工业基础，正是我们革命的任务。”这些话讲得多好，多么富有远见，其理论价值也是很高的。1948年的九月会议，他就开始筹划新中国的蓝图，提出了关于国家体制、政治制度、经济形态等等问题。这是很不简单的，因为这时三大战役还没有开始。到七届二中全会进一步把建国纲领提出来了，还提出了工作重心转移问题、经济政策问题以及干部作风问题等等。所以我们在建国后的各项工作是从容不迫，有条不紊，因为我们的建国纲领上都有了，从大政方针到具体政策，规定得很具体。这种科学的预见性，在毛泽东身上是很突出的。

访问人：你觉得，毛泽东的这个特点，是能学得来的吗？

逢先知：这里确有他个人的天分甚至说是天才的原因，但也不能把这个问题绝对化，那就陷入历史唯心主义了。我认为，他之所以能够做到，主要与他的马克思主义的修养和掌握的丰富的历史知识、革命经验有关。比如，提出防止骄傲自满、警惕“糖衣炮弹”，不当李自成，这是从中国历史中汲

取的经验，他对各个朝代的兴衰成败的历史非常熟悉。当然对这些经验，别人或许也知道，也懂得它的对与错，但提出的时机和表达的方法会有大的不同，这又是他比常人高明的地方。“文化大革命”尽管根本错了，但他预见到社会主义国家会有和平演变，提出资本主义还有复辟的可能，这一点是很有历史眼光的。小平同志南巡谈话，也曾讲到法国的历史，复辟反复辟，搞了几百年，新的制度才定下来。毛泽东的这个预见现在应验了，苏联解体了，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演变了，而他讲这些话的时候苏联还那么强大，社会主义制度看起来还比较巩固。他还是看到了历史的反复，预见到了这种反复。

访问人：对和平演变问题，毛泽东在晚年警惕性是非常高的。

逢先知：胡绳同志主编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在讲到这个问题时，使用了“伟大的预见”这个词，我是赞成的。就是说，一个新的社会形态，在它还不是完全巩固的时候，有可能还会出现反复，甚至变回去。如何防止和平演变，毛泽东进行了尝试，但没有找到正确的道路。他在“左”的指导思想下，又把国内形势估计得过于严重，结果走到“文革”中去了。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正确总结了教训，一方面根本否定了“文化大革命”，另一方面又指出他发动“文革”的动机“是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所必需”，这是“他的悲剧所在”。

第五，根据形势的发展，及时提出行动纲领和口号。一个政党，一个领袖，要取得成功，必须有正确的纲领和口号，不然就没有号召力，没有凝聚力，没有团结力。每到一历史关头，毛泽东总能及时提出吸引全党奋斗的口号，如大革命刚刚失败，提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后来又提出“工农武装割据”、“工农革命”。抗战一开始，就提出“持久战”，他论述的持久战的三个阶段，几乎像自然科学家进行计算一样准确，为鼓舞全国人民团结抗战起了重大作用。在同国民党反共顽固派进行斗争中，及时地提出“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给人们指明了方向。抗战接近胜利的时候，提出“联合政府”的口号，具有很大的号召力，对于联合中间力量，孤立国民党主要当权派起了重要作用。解放战争时期，什么时候提打倒蒋介石也是一个非常策略的问题，提早了，由于人民特别是中间力量对蒋介石的真面目还不清楚，会脱离群众。到1947年10月才明确提出这个口号，时机抓得非常好，对于团结人民、动员人民起了很大的作用。

访问人：像“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这样的口号，不仅内容深刻、明确，而且形式也很好，至今还常常为人们所传诵。

逢先知：他使用的语言是喜闻乐见的民族形式，通俗易懂，朗朗上口，又很容易记。内容则概括得非常准确、科学。

建国以后也是如此。在不同的时期，根据不同的任务，提出过许多很好很正确的口号和概念。我这里只举一个例子，是我亲身感受的。1961年毛泽东组织三个调查组，分别到浙江、湖南、广东作农村调查，我也参加了。毛泽东根据大家提供的大量调查材料，在广州会议上概括出反对两个平均主义（即反对人与人之间、队与队之间分配上的平均主义），使人们的思路豁然开朗。当时，那么多人到农村调查，谁也没有提出这个问题。在今天看来，似乎没有什么了不起，但我们看问题不能离开当时当地的具体条件。毛泽东确有这个本领，一下子就能抓到问题的实质，打开人们的思想。他的高度概括能力和善于抓住问题本质的洞察能力不能不使人钦佩。访问人：前面我们

在讨论他的科学预见性时，您谈到天分问题，他的这种高度概括能力和洞察能力，也不应仅仅看作是天才。

逢先知：这就涉及我要说的第六点，毛泽东的刻苦勤奋精神。从青年时代起，一直到他的晚年，他工作起来常常通宵达旦、废寝忘食，问题不解决总是放不下。刻苦的读书生活也伴随了他的一生。他不但勤于学习，更勤于思索。他常说“多想出智慧”。古语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他是又学又思。他的刻苦精神一般人比不上。而且他还会读书，会用脑筋。读文件累了，就换本书读，当作休息。他说，从脑力劳动到体力活动是休息，从读这本书到读另一本书也是休息。他的概括能力、抽象能力，就是从勤于读书，特别是读哲学书，从勤于思考，锻炼出来的。所以不要简单地认为毛泽东就是天才，岂不知他的渊博学识和智慧是从刻苦勤奋中得来的。

访问人：就是说，他有天分，再加上后天的勤奋努力，包括在革命实践中的磨练，才成就了毛泽东。

逢先知：应该这样看。凡是和他接触过的人都有体会，他的记忆力是惊人的。有一次，周恩来在延安干部大会上作报告，陈赓坐在边上，当局副主席讲到毛主席对马列主义的贡献时，陈赓插话，问“毛主席记忆力那么好的秘密是什么？”这时全场鸦雀无声，大家都想听周恩来的回答，停了停，周恩来说了两个字：“死记”。我想，这就是勤奋。毛泽东的超人的记忆力，既有先天的成分，但更重要的是后天努力的结果。

以上是我个人的看法，所谓毛泽东成功的秘诀，这六点也不一定概括的完全、准确，各人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会有不同的角度。总之我相信邓小平的话：“没有毛主席，至少我们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毛泽东的成功，不应简单地看作他个人事业的成功，而是全党和全国人民事业的成功。

### 晚年失误的原因

访问人：那么，毛泽东晚年的失误都有哪些原因？

逢先知：毛泽东晚年的失误的确是使人痛心的，但又不是偶然的。我认为最主要是三条。

第一，他脱离了实际，脱离了群众，脱离了他创立和倡导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他在民主革命时期以及建国后的一段时间里，都是十分强调一切从实际出发，而且身体力行，亲自作调查，因此，他才获得了对中国国情的深刻了解。但从50年代末期以后，这个优点在他身上渐渐减少了，甚至违反了这些东西。1958年的“大跃进”为什么犯那么大的错误，虽与他思想上的空想成分有关，但脱离实际是主要原因，如果他能到农村去了解真实情况，是不会做出那样的决策的。当时他派我们下去，我们亲眼看到农村里，生产是大兵团作战，通宵达旦地干，生活是吃大锅饭，男女分开住，这怎么行。但这些实际情况毛泽东看不到，他只要一下去就被人群包围了。到天津视察时就被人群围了里三层外三层，在这种情况下，他搞调查研究确实受到很大限制。

访问人：是不是也有制度方面的原因，比如保卫制度不允许？

逢先知：制度是一个方面，关键还是他有没有决心。他自己讲过，进城后，官做大了，像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抗日战争时期作那样的调查没有了。1962年派我们到韶山调查，他是准备去的，但终究没有去。解放以后他就没有到农村中作过直接调查，更没有在农村住过。他每次下去，都是省委书记

陪着，听汇报、调查的对象不是地委书记，就是县委书记，这怎么能了解到真实情况？不脱离实际才怪。所以，造成那么大的损失，出现那么大的失误，脱离实际是主要的。

有人写这段历史，把他说成是空想主义者，我不赞成。搞人民公社，确实带有空想的成分。对这个问题也要作点分析。当年提倡农村人民公社办工业，办商业，搞工农商学兵于一体，不能说没有一点合理的成分。我们今天的农村乡镇也是工农商学兵一起搞，不光有农业，还搞工业、商业、第三产业，办学校等等。现在一些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如苏南，许多乡镇企业，就是由过去的社队企业转化而发展起来的。但那时脱离了生产力水平，搞的是政社合一的公社体制。特别是在开始搞公社化那阵子，搞一大二公，的确吃了苦头。“一平二调”，大刮共产风，急于向全民所有制过渡，甚至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这些，确实完全是空想的。但从1958年冬，毛泽东即发现错误，并且费很大力气，去纠正错误。从1959年起，不断提出下放核算单位，先是下放到一个乡范围的生产大队，再下放到一个行政村、一个自然村范围的生产大队，最后是二三十户规模的生产队。广州会议时，他曾经批了一个主张把基本核算单位下放到生产队的材料，但是没有引起注意，为此，他很不高兴。另外，到他的晚年，年龄大了，很多人又都是顺着他讲，这也是脱离实际的一个原因。访问人：陆定一同志讲，能不能坚持调查研究，确实也和年龄有关系，至少年纪大了，跑路也跑不动了。逢先知：那时我们到南方去调查，天气很冷，有时住草棚子，这种条件，让毛泽东去他会吃不消，组织上也不会那样安排。因此，他在早年曾经用过的，很自然的找几个农民，像拉家常那样的形式，很难做到了。他了解情况，不是看报告，就是听汇报，而这些又有相当成分是在看他的脸色行事，喜欢什么给什么，强调阶级斗争了，马上就来阶级斗争的材料，强调生产了，又报来关于生产的材料。长此以往，不出问题才怪。这是第一点。第二，是专断，听不得不同意见。前面我在讲他成功的第二条，是尊重各种意见，善于从群众的呼声中找出我们政策的出发点，这本是他的好作风，后来走向了反面，破坏了党内民主，一言堂而不是群言堂，最后导致犯错误。访问人：他的专断和民主作风的改变，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逢先知：按胡乔木同志讲，是从1958年1月南宁会议批评反冒进开始。但这不是一下子形成的，有一个过程，1958年南宁会议开了一个不好的先例，3月的成都会议还算开得生动活泼，但到1959年庐山会议又来了一个升级，以后专断就占了主导地位。因此，他脱离实际是一步一步发展的，听不得不同意见而导致专断也是一步一步发展的。访问人：有人认为，庐山会议彭老总那种提意见的方式也有不好的一面，如果换一种较为和缓的方式，后来的结果可能不一样，这个问题您怎么看？

逢先知：过去乔木同志也讲过，庐山会议上彭德怀用那样一种态度提意见，确有不妥之处，如果是当面的心平气和地讲，不用堵气，情况也许不同一些。我看有一定的道理。当然，这是问题的一面，问题的根本原因在于，那时党内很多人对“三面红旗”有意见，持不同意见的材料也陆续反映到毛泽东那里，彭德怀只是一个代表，即使不是他出来讲，总会有人出来讲，当然不至于出现那样尖锐的形式。另外，国际上出现的赫鲁晓夫全面否定斯大林以及引起的一股反共思潮，对毛泽东走向“左”的方面影响很大。在那种环境下，他不能不想到我们党，不能不维护他提出的一套在他看来是正确的东西，因此，出现庐山会议后反“右倾”的那种结局也是必然的了。

尽管如此，还要看到，毛泽东晚年的指导思想是在一定范围内偏离了毛泽东思想，并不是全部，如果是全部，没有一点正确的东西，那还不把共产党和人民共和国搞垮了。特别是在国际斗争中，他维护了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维护了中华民族的尊严，并利用国际形势变化的时机，打开了中美、中日关系，创造了外交工作的新局面，这一点要充分估计到。

访问人：这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改革开放提供了一个重要条件，没有这个条件，可能我们后来的改革开放要克服更多的困难。

我们想再问一个问题，毛泽东的失误，从他的思维方式角度看，是不是也有什么原因呢？

逢先知：在回答你们的提问之前，我再补充一点，讲毛泽东晚年失误的又一个原因。毛泽东在晚年不能很好地团结一切可能团结和应该团结的人，像民主革命时期和建国初期那样，相反，在几次政治运动中（最突出的是1957年的反右和1959年的反右倾，伤害和打击了許多人，或者是反右扩大化了，或者是根本不该反右而反右。在党内如此，对党外也是如此。以后搞“文化大革命”，打倒一切，更发展到了极端。我认为，不能很好地团结越来越多的人，是毛泽东晚年的一个失误，又是失误的一个原因。你们看，以上讲的三个失误的原因，恰恰是他三个成功秘诀的反面。他的失误，正是违反了他过去一贯坚持的一些正确的东西。

现在，回过头来，回答你们提的问题。毛泽东的晚年，在思想方法上有极端化的倾向，极端化也是思想僵化的一种表现。他原来的辩证法讲得多么好，不仅写出了《实践论》、《矛盾论》这样的著作，而且把唯物辩证法贯彻到实际工作中去，运用得非常精当，非常纯熟。例如，在统一战线问题上，提出“又联合又斗争”的总政策；在抗日战争期间的反顽斗争中，实行“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在军事斗争中，提出“防御中的进攻，持久中的速决，内线中的外线”的战略方针。在一般的斗争策略上，提出战略上藐视敌人，在战术上重视敌人。等等。这些东西都是他独创的。另外，不知你们注意到没有，延安时期他曾肯定过孔子的“中庸”的概念。

访问人：这是他在1939年给张闻天等人的信中讲的，认为中庸的“过犹不及”“不偏不倚”是“肯定事物与概念的相对安定的质”，不是折衷主义。

逢先知：是这样。但到了晚年，他的思想方法确实出现了极端化，不大讲统一，过分强调斗争，强调斗争是绝对的，以至于说出“中国有八亿人口，不斗行吗？”一类的话。有人提出“合二而一”的哲学概念，就是说“阶级调和论”。这种倾向的产生，从深处说，有思想惯性的作用。在长期的革命战争中，在长期残酷的阶级斗争中，使他形成了一种思维定势——强烈的阶级斗争观念。建国后，他从理论到实践，正确地实行过由阶级斗争为中心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转变。但是这种转变是不牢固的，一遇风吹草动，他马上警觉起来，过分地估计了阶级斗争的形势，把阶级斗争这个弦绷得很紧。当然在这个过程中有曲折，1957年虽然讲了主要矛盾是阶级斗争，到1958年又提出把党的工作着重点转到技术革命，提出超英赶美。“大跃进”失败了，党内出现分歧，他又回到阶级斗争的思路。最后终于导致错误趋向压倒正确趋向，晚年的悲剧就发生了。

### 毛泽东和邓小平在对社会主义 理解上的相同和差异

访问人：上面您给我们谈了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上的成功和失

误，以及成功和失误的原因，很受启发。那么，在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以及对社会主义的理解上，毛泽东和邓小平有区别和差异吗？

逢先知：首先应当肯定；毛泽东和邓小平对社会主义的理解，在根本目标上是一致的。他们都认为社会主义应当是生产力高度发达，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实现全民的共同富裕，使中国成为一个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不能说毛泽东不重视发展生产。早在延安时期他就非常重视革命根据地的生产建设，1942年的西北局高干会议上作了《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的长篇书面报告，把生产事业看作根据地的中心工作之一。特别是在《论联合政府》的报告中，明确提出要把“对于中国人民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之大小”，作为判断“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的好坏、大小”的标志。这就是生产力标准。到七届二中全会，提出工作重心转移，由农村到城市，在城市工作中又以生产建设为中心任务。建国以后，尽快改变中国的贫穷落后面貌，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是他提出并努力为之奋斗的。直到1957年2月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还明确指出，我们的根本任务是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护和发展生产力。这些，都是大家熟知的。但是从1957年夏季起，他的这个思想骤然起了变化，由经济建设为中心逐步转到以阶级斗争为纲，而把发展生产力的任务放到次要地位。这中间尽管有些反复，总的趋势就是这么个趋势。搞“文化大革命”就到了极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邓小平领导全党实行拨乱反正，最根本的一条就是从阶级斗争为纲转变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并指出，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他说，我们对于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没有搞清楚，主要是指五十年代末期以后，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中，认为社会主义的主要矛盾是阶级斗争，而否认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要说对社会主义的理解有什么不同，这应当是最重要的一条。其次，在社会经济形态问题上，毛泽东强调实行单一的公有制；邓小平则强调在以公有制为主体的条件下，适当发展个体的、私营的、中外合资的多种经济成分以为补充。在经济体制方面，毛泽东基本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同苏联有某些区别）；邓小平主张实行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相结合，进而又主张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对外经济关系方面，毛泽东还不够开放，在某种程度上有些封闭；邓小平实行全方位的对外开放政策。

这里，我想着重谈谈他们怎样对待公平和效率的关系问题。对于毛泽东来说，如果把发展生产和实现社会公平比作天平上的两端的话，那么，他的砝码总是更多地加在后一方面。就是说，在处理这两者之间的矛盾的时候，毛泽东更强调公平，有时为了社会公平，甚至可以牺牲效率。拿包产到户来说，这种形式明显对发展生产力、提高经济效益有利，但在1962年的北戴河会议上，他尖锐批评包产到户，认为如果实行包产到户，不到一年，就可以看出阶级分化很厉害。他希望什么呢？希望大多数人都过着较为平均的生活，不要贫富悬殊，大家同步达到富裕。这个愿望是无可非议的。但事实证明，同步富裕和平均发展都不可能，结果是平均主义，这是一条发展缓慢的道路。

访问人：小平同志在这个问题上同毛泽东有什么侧重的不同吗？

逢先知：小平同志也强调共同富裕。他把共同富裕有时叫做社会主义的

目的，有时叫做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有时叫做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东西。他说过，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如果产生了什么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真是走了邪路了。他在南方谈话中还讲到：“如果富的愈来愈富，穷的愈来愈穷，两极分化就会产生，而社会主义制度就应该而且能够避免两极分化。”那么，怎样达到共同富裕呢？小平同志提出一个新路子、新办法，这就是允许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带动和帮助其他人、其他地区达到共同富裕。小平同志把这个叫做大政策。的确，这个政策一实行，经济就活了，被平均主义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所压抑的人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被调动起来了，被发挥出来了，人们的聪明才智也显露出来了。当然，实行这个政策，人与人之间、地区与地区之间贫富差距会有暂时拉大的趋势，但它终究不是我们的目的，我们的最终目的是共同富裕。

访问人：毛泽东在对待公平和效率问题上的态度，是不是有他自身经历的或其他方面的原因呢？

逢先知：当然有。毛泽东出身农民家庭，耳闻目睹广大贫苦农民受剥削、受压迫的苦难生活，从小就对贫苦农民给予极大的同情，产生对贫苦农民的深厚感情，对土豪劣绅，对剥削制度和一切不公正的社会现象深恶痛绝。他17岁那年，长沙饥民造反惨遭镇压，曾给他留下终生难忘的印象。他一生就是要追求一个公平的、人人完全平等的理想社会。在1962年的北戴河会议上，他曾说：“完全不要一点平均主义，比方说，不要基本口粮，不要照顾，光搞按劳分配，光争取富裕阶层，可是把农村的五保户、困难户、军工烈属这百分之二十至三十的人，丢开不管，也是不行的。这些人在农村中是我们的依靠。”毛泽东在他的晚年，一方面反对平均主义，主张实行按劳分配，以便调动人们的生产积极性；另一方面又不彻底反对平均主义，甚至主张搞点平均主义，不彻底实行按劳分配，甚至批判或者限制按劳分配，怕的是发生“阶级分化”。他是想寻找一个既能调动群众生产积极性，以利于发展生产，又能防止“阶级分化”，保证“社会公平”、人人完全平等的结合点。

访问人：这个结合点他始终没有找到，甚至可以说，为了找到这个结合点，走入了歧途。

逢先知：他主观上是要找到这样一个结合点，但实际上走上了平均主义的道路，影响和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邓小平带领下，首先在农村搞联产承包责任制，大力发展商品经济，进而确定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同时，又强调国家的宏观调控，把实现共同富裕作为社会主义的目的。这样，既充分调动了各方面的积极性，同时又避免无政府状态、避免两极分化。尽管现实生活中还有许多不尽如意的地方，但是，只要全面地准确地遵照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去做，去认真地贯彻落实，毛泽东所希望的、也是全国人民所希望的一个富裕的民主的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一定能够实现。

#### 把毛泽东思想研究提高到一个新阶段

访问人：1993年是毛泽东诞辰一百周年，有关毛泽东的研究、宣传与纪念活动也走向了高潮。以后将是一种什么情况呢？会不会出现低潮？

逢先知：毛泽东是一代伟人，不仅影响中国，也影响世界。在他诞辰一百周年的时候对他的纪念，是空前的。高潮的结束，决不意味着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研究，随着高潮的过去而进入低潮，应把这次纪念活动（包括全国毛泽东生平和思想研讨会的举行）看作是一个新起点。当然，对他的宣

传，不一定也不会总是保持在这么一个规模上，但对他的研究会延续下去、深入下去。毛泽东这样一位伟大的人物，是大有研究的。有人说，近代中国有三个为解放和振兴中华民族做出巨大贡献的最伟大的人物：孙中山、毛泽东、邓小平。也有人说，中国几千年的历史，有两个划时代的大思想家，这就是孔夫子和毛泽东。这两种说法我认为都很有见地。不管是从中国近代史这个角度，还是从中国几千年历史这个角度，毛泽东都占有突出的历史地位。孔夫子到现在已有 2400 多年，他的思想至今还深深影响着我们的社会，影响着人们。毛泽东这样一个人物，他的思想也会深远地影响着社会的各个方面，影响着人们。毛泽东给我们留下的大量文稿，是一个大宝库，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已经陆续公布了一些，在纪念他诞辰百周年期间更集中地出版和公布了他的大量著作和其他材料。

访问人：光近期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的《毛泽东文集》、《毛泽东军事文集》、《毛泽东年谱》等就有好几百万字。

逢先知：这就为今后的研究提供了十分丰富的材料。消化这些材料要有一个过程，消化的结果可能会在半年、一年之后表现出来。学术界对孔子的研究经久不衰，对他的思想至今还没有完全研究透彻。对孔子的研究尚且如此，对毛泽东的研究难道会冷落下来、会中断下来吗？显然不会的，我想，同样会经久不衰地继续研究下去。另外，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实践的发展，我们对小平同志的理论越是进行深入研究，越感到有必要研究毛泽东。在对邓小平的不断研究中，人们必然会追溯到毛泽东那里。反过来说，研究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也必需研究邓小平，研究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不能只停留在毛泽东那里，这是因为邓小平的理论是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所以，我一直主张把他们联系起来研究。

访问人：如果说对毛泽东的研究不会中断，那么对毛泽东的宣传势头会不会减弱呢？

逢先知：前面我已经说过，宣传活动不一定总要像百周年纪念那样。我想，今后的宣传，一定要建立在研究的基础上。没有对毛泽东思想的深厚的研究基础，宣传就没有力量，就比较肤浅。真正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才能用活它，宣传才能深入人心。这同样对我们的研究提出了新要求。我们大家都会有这样一个感受，对毛泽东思想总是常学常新，常研常新。毛泽东的科学著作，理论水平高，又很管用，特别是关于方法论的部分。随着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发展，出现了许多新情况，积累了新经验，大家的眼界开阔了，进入了新的思想境界，这样，再去阅读那些科学著作，一定会有新的认识、新的见解，受到新的启发。我想，你们也会有这样的感受吧。

1994 年 1 月 7 日于北京前毛家湾

## 访杨超——毛泽东思想的三个要点——理论·历史·现实

### 杨超

杨超，1911年生，四川达县人。1932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7年10月到延安，曾参加毛泽东组织的哲学学习小组。建国后历任四川省工会联合会主席、四川省副省长、中共四川省委书记，四省第四届政协主席。主要著作有《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毛泽东过程论思想研究》，主编《毛泽东思想史》一至四卷等。

同杨老的这篇谈话，是我们赶赴成都参加一次学术讨论会的采访机会的。他以82岁高龄和在党内60年阅历积淀的这些看法，给人以启发是不言而喻的。

访问人：杨老，您好。今年是毛泽东同志诞辰一百周年，我们想请您谈谈如何看待毛泽东思想的问题，您是否围绕继承和发展毛泽东思想来谈？

杨超：好的。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中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马克思主义产生在资本主义发展初期的欧洲，他的理论首先是在批判资本主义的基础上建立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革命中心转移到俄国，也就是说从资本主义发展先进的小国转到比较落后的封建军事大国，列宁曾说，革命将在哪里开始呢？不一定在工业比较发达的国家，资本主义战线将在帝国主义链条最薄弱的地方被突破。所以，一个时期曾经有资本主义先进国家革命共同胜利论。

访问人：那么，马克思主义介绍到中国来，在中国发生了什么变化？

杨超：革命中心转移到中国，就离开了资本主义范畴。中国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大国，一百多年来，许多志士仁人，为了救国救民，前赴后继，英勇牺牲，我们中华民族首先有这个很光辉的历史传统。所以，十月革命一声炮响，送来了马列主义，就在这个传统基础上，马列主义深深扎根于这个民族之中。又因为中国的情况不同，也就使中国革命的道路一定不是资本主义国家革命的道路，而必然是走它新的发展道路，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新民主主义的革命道路。

但找到新的道路，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开始时，毛泽东虽然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远见卓识，分析了中国社会的性质，初步解决了无产阶级对革命的领导权，提出了农民在革命中的主力军作用等问题，加上当时统一战线的大好形势，从而使国共第一次合作发展起来。但那毕竟是我党的幼年时期，我们党包括毛泽东同志对许多问题还不可能有深刻认识。大革命失败了，促使人们开始逐步清醒起来，我们这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国家必然有它同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国家所没有的特点。大革命失败后，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军上了井冈山，就开始了中国革命究竟走什么道路的探索。

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不单单是学习几篇文章，也不仅仅是研究一些问题。上井冈山仅3年，毛泽东就先后撰写了4篇文章，首先肯定了在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深入土地革命，开展武装斗争是个独特的现象，是全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都没有的独特现象。从《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到古田会议决议，一直到《星星之火，可以燎原》，都充分反映出毛泽东对中国革命独特道路的艰苦探索和理论思考。其实质是走老路还是走新路。毛泽东对一定要走中国特色的新道路觉悟得很早，他这个觉悟，与南昌暴动、广州暴动不同，那个仍然是依托城市在城市发动起义的老路。

访问人：1927年，我们党发动了许多起义，有南昌起义、广州起义、

秋收起义，但只有毛泽东在起义不成功的情况下，选择了上山的道路，他这个思想是不是早就有基础了呢？

杨超：毛泽东带队伍上井冈山，他的这个思想因素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里就有了，他已经认识了群众武装的威力。“好得很”，“糟得很”代表了不同立场的观点和理论。“考察报告”还有个很光辉的思想，就是两类矛盾的思想。因为不管怎样，中国革命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在大革命的高潮中，必然会出现反动的力量，这就需要把一切革命的力量联合起来，作针锋相对的斗争。对农民运动的指责，毛泽东认为是错误的，因为农民问题主要是教育问题，无论如何不应该在背后指责，更不能把一些有错误的农民领袖抓起来，这在《考察报告》里有专门的论述。这个问题实质上就是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的思想的萌芽形态。这表明毛泽东同志是很有远见的。而且毛泽东搞武装不是只盯着城市单纯搞暴动，秋收起义后就赶快带队伍上井冈山，以后又经过改造土匪武装（王佐和袁文才），才使起义部队有了立脚点。也就是说毛泽东很早就认识了农民武装的威力，不是我们的武装到井冈山后才认识的，而是在大革命时就认识了。“八七”会议上毛泽东明确提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但实践还没有。实际行动是秋收暴动后把队伍带上山。毛泽东上山前说的这句话，就是不断开创新局面的思想路线。这句话的含义，从“八七”会议，秋收暴动，一直到文家市改变行动方针上井冈山，以及后来的同朱德、陈毅会合，是贯通一起的。他在打了几年仗之后，很明显地看出中国革命的道路问题，这也是一个理论问题。

访问人：中国革命，同当时人们一般认为传统革命，有什么不同特点？

杨超：中国的民主革命 28 年，有 20 年是两个政权长期并存，这就说明了中国革命的特点和优点。毛泽东曾引过斯大林说过的一句话：“在中国，是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这是中国革命的特点之一和优点之一”。毛泽东虽然引用过这句话，但并不包含井冈山道路的内容。以后共产国际支持的王明路线，实际上是和毛泽东对着干的。所以，在大革命失败以后，中国革命出现了两个历史舞台，一个是在上海的党中央，仍是以城市工作和工人运动为中心，走的是白区秘密工作的老路子；还有一个历史舞台是以毛泽东、方志敏为代表的一批共产党人，他们把工作中心转移到广大农村，深入开展土地革命，进行武装斗争，并逐步走上了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崭新的道路。上海那个历史舞台到 1933 年时候就站不住脚了，不得不迁移到江西革命根据地。这有力地证明了老路子走不通，必须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

访问人：这个问题归根到底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问题。那么，在实践中是怎么结合的呢？

杨超：关于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实践结合问题，毛泽东讲了三次，专门论及了马列主义从来没有专门论及的问题。

第一次论“结合”，是在《反对本本主义》里，要点是三个：理论、历史、现实。所谓理论，就是必须明确指导思想是马列主义理论；所谓历史，就是中国旧民主主义一百多年的革命传统；所谓现实，是指 1921 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马列主义在中国深深地扎了根这个现实。为什么马列主义在中国不论怎么样风吹草动或惊涛骇浪都抵不倒？就是马列主义的根在中国扎得很深，不比一些资本主义国家。我到德国去过两次，了解一点情况，德国是马克思的故乡，却出了法西斯，列宁的故乡也打出了沙皇的旧旗帜。真巧，

历史上的东西都那么直率，那么不留情面，向对立面发展总是一个客观规律。社会民主主义在欧洲的群众中影响是很强的，所以列宁要建党，首先提出“只有以先进理论为指南的党，才能实现先进战士的作用”，才能建立布尔什维克党。毛泽东也是先抓理论，并把这个理论同中国的实践相结合。他总是说，中国革命要由中国同志自己来革，明确要走中国式的道路。人家说他“山沟里没有马列主义”，实际上毛泽东的三个论点首先是反对本本主义、宗派主义。那时教条、宗派还刚得势不久，30年代初还是立三路线统治的时期，但确实是本本主义。《反对本本主义》怎么说的呢？“你对于那个问题不能解决么？那么，你就去调查那个问题的现状和它的历史吧！”说得清清楚楚，最后得出结论：“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也就是说，要真正把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就要把历史的实际和现实的实际密切结合起来。

访问人：这是第一次论“结合”。那么第二次呢？

杨超：第二次论“结合”，是在1938年11月的六届六中全会上。也讲了三次，第一次是《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那时就说到实事求是了，说共产党应是实事求是的模范。第二次是《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问题》，批判了王明“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右倾观点。第三次是《战争和战略问题》，从理论的高度明确了武装夺取政权，战争解决问题。这三个讲话，已经反映出我们党关于中国革命基本经验的“三大法宝”问题。这一次论“结合”，也是“理论、历史、现实”这三个论点，虽然有时讲的次序不同。在理论上明确提出：“如果我们党有一百个至二百个系统地而不是零碎地、实际地而不是空洞地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同志，就会大大地提高我们党的战斗力量。”以后又讲了历史和现实，号召全党同志一定要懂得中国革命的历史和现实。1938年底的六届六中全会，就解决了党的领导问题，首先要求党的领导核心要认真搞好“结合”，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对教条主义的批判：“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

访问人：第三次论“结合”，一定是延安整风了？

杨超：是的，第三次论“结合”，以1941年的《改造我们的学习》为标志。这个报告，实际上是全党整风的开始。1942年洛甫同志带队到晋绥调查研究，回来写了两篇文章，一篇叫《出发归来记》，一篇叫《冲破教条主义的囚笼》，作为党的高级领导人，思想交锋非常激烈，就是老老实实改造自己；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态度非常坚决。反映了延安整风的情形和意义。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毛泽东讲得更充分，他明确指出马列主义必须有的放矢、实事求是，他说：“‘的’就是中国革命，‘矢’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我们中国共产党人所以要找这根‘矢’，就是为了要射中国革命和东方革命这个‘的’的。这种态度，就是实事求是的态度。‘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实事求是”，六届六中全会就提出了，《新民主主义论》也提出了，这次是用哲学的语言作了更深刻的解释。

访问人：延安整风您参加了，有什么亲身体会？

杨超：我承认我自己也是“教条主义”者，因为我坐了5年监狱，出狱后又在延安工作8年，没有接触多少生动的生活。《改造我们的学习》中，毛泽东讲了一副对子，叫：“墙上芦苇，头重脚轻根底浅；山间竹笋，嘴尖皮厚腹中空。”生动地画出了教条主义的形象。他的语言生动活泼，说得恳

切、深刻，完全是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我参加学生运动时，也参加了一些实际斗争。我读到这两句话，感到确实深刻，体会到没有实践知识，当然言之无物。在延安时，毛泽东曾批评我，说我写的东西言之无物，说不出道理，没有实际经验的基础；也表扬过我，因为经过整风学习，我有了进步，写了学习《论持久战》的体会，还写了好多墙报。至今受益匪浅。

访问人：毛泽东提出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实践相结合，有什么历史背景呢？

杨超：毛泽东论“结合”，我的看法是从认识论上论结合，因为他认识得最早，30年代在中央苏区时就提出把马克思主义具体化，强调调查研究，用理论指导实践；1938年六届六中全会，是在党的领导核心端正思想路线；1941年作整风报告，开始全党整风，更是从思想上和理论上端正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路线。当然，延安整风中康生插了一脚，搞了个抢救失足者运动，幸好毛泽东及时发现，定了九条方针，“一个不杀，大部不捉”，把他刹住了。我当时也做过保卫工作，在康生领导下，我是从苏州监狱出来的，对他的情况有些了解，他就对我很不满意。经过全党整风，形成了全党的共识，于是在六届七中全会上通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样召开七大的条件也就成熟了。党的七大准备很早，从1939年、1940年就开始准备，修房子、调干部，办新的党校，一直到条件成熟搞完全党整风，才胜利召开七大。遵义会议上毛泽东成为党的主要领导人，但他把总书记的职务让给洛甫，是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甚至团结反对过自己的人、有不同意见的人，这是毛泽东的伟大所在。

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就必然同中国的国情，和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和中国长期的革命斗争实践特别是长期的武装斗争的实践相结合。毛泽东写完《论持久战》《（共产党人）发刊词》，然后腾出时间来更全面综合地写了《新民主主义论》，以后又开展整风，应该说他的安排是很有计划，毛泽东思想发展的方方面面很有它的历史规律，不能说毛泽东思想的成熟只以整风为标志。为什么《论持久战》成为科学的东西？当时的形势还在节节后退，还没有到相持阶段，他就预见到抗日战争的三个阶段。所以说“结合”是和理论、历史、现实联系在一起的。

访问人：邓小平的理论，其实质也是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原理同现在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这个结合又有什么特点呢？

杨超：邓小平同志的结合，是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在新时期面对新情况的新结合。有人说邓没什么理论，不像毛泽东有长篇大论，他没有专门论过哲学，也没有专门提到范畴，我不这样认为。我的看法是，所谓结合，它是对客观事物的内在联系和规律的认识，在现在，就是和当前的社会实践相结合，而且最重要的是真正抓住理论与现实结合的环节。邓小平的哲学思想的特点是什么？我曾在解放初西南局领导下做过两年工会工作，有自己的切身体会，那对邓小平担任西南局第一书记，他在布置任务时，很突出的一点，就是要求各单位必须抓住矛盾的特殊性，总结自己单位的实际和特点，将自己积累的经验上升到理论上去分析，去总结，这个印象非常深刻。从这也可以看出邓小平哲学思想的特点，就是“实事求是，按辩证法办事”。毛泽东虽然最早阐述了“实事求是”，但从文字强调上没有邓小平这么充分，他从各个方面，解放思想，总结历史经验，起草若干历史问题决议以及对形势分析等等方面，都是强调“实事求是”。马、恩、列、毛、邓，

唯邓讲实事求是充分，超过了所有的前人。我们的第一本书《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出版后，有同志对我们强调的实事求是论点提出疑问，那还是在非毛化思潮很厉害的时候，宋振庭同志在一次会议上说，你们不要成为众矢之的。可见他的担心。因为我们的书突破了教科书的写法，就是突出实事求是。以后，邓小平的讲话发表了，成为全党的共识，这种议论也就无声无息了。邓小平反复强调，“实事求是”是我们党的思想路线的基本出发点，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他思考问题，他的认识论、方法论，就是实事求是。在运用辩证法范畴上，邓小平也说得充分，如党的路线的“左”右问题，红与专问题，姓资姓社问题，党的路线斗争和制度问题等，都有精辟的论点。他在1979年10月《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辞》中，有几句话反映出他的辩证思想非常深刻，他说：我国历史悠久，地域辽阔，人口众多，不同民族、不同职业、不同经历和不同教育程度的人们，有多样的生活习俗、传统文化和艺术爱好，“雄伟和细腻，严肃和诙谐，抒情和哲理”，都应当在文艺中得到反映。这种思想和范畴，邓小平用得很多，邓小平的哲学思想是贯穿在他的整个思维中和实践中的。

访问人：最近人们对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之间的关系，讨论得非常热烈，您对这个问题怎么看？

杨超：这个问题也是我近来思考的重点，我注意到今年6月的上海会议对这个问题的一些观点，其中有的同志说，邓小平理论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为起点，到1992年初的南巡谈话已经成熟了。我觉得，使用“成熟”这个词应当慎重考虑，用这个词有欠稳妥。过去说毛泽东思想在延安整风时就成熟了，我就有不同意见，因为“成熟”这个词概念太窄了，还是改成“完善”，或其他什么字眼为好。如果说到邓小平南巡讲话才是成熟，或者初步成熟，在我思想上通不过，难道南巡讲话才是初步成熟？小平同志以前很英明的论点不成熟？这个论点值得研究，我们理论界、学术界往往容易被一些名词框住。他的理论体系的完善也不是十四大，“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是十三大提出的，十二大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十四大就进一步把它加以“完善”，这是指的具体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发展过程而言的。南巡讲话是他抓住这个机遇，把他的论点更加集中、更加坚决地提出问题。我们的思想界、理论界如果用“成熟”这个字眼要慎重，用这个论点来论证邓小平思想的发展也好，理论体系的发展也好，都值得讨论。

我很早就提出过，对毛泽东思想以整风为标志来说明毛泽东思想成熟不行，毛泽东思想的第一个理论高峰，恰好是在抗战前后，非常辉煌。毛泽东深刻总结了历史经验，总结了哲学思想的两论体系，现在应该说是三论的哲学体系，再加《过程论》，他的《矛盾论》，讲矛盾的特殊性，主要讲的过程论，“矛盾的特殊性”里，最后有句话：“矛盾存在于一切过程中，并贯穿于一切过程的始终，矛盾即是运动，即是事物，即是过程，也即是思想。”这几句说得清清楚楚，毛泽东哲学思想体系，是它成熟的标志。毛泽东思想的发展，是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正像马克思主义一样，也是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我们都知道，《共产党宣言》开头有一句话就不够确切，说“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客观事实不是这样，所以恩格斯在1888年加了一个括弧，即（自从原始公共土地占有制解体算起）全部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从这里也可以看出，坚持真理，修正错误，从马克思到列宁到毛泽东一直是这样。巴黎公社起义前，马克思觉得条件不

够成熟，巴黎公社起义后，马克思才坚决支持。

访问人：您认为邓小平的理论，有什么突出特点呢？

杨超：我体会，有五个突出特点：

一是针对性。这个针对性，最明显的表现在邓小平 1975 年出来工作后，那还是在“四人帮”猖獗的时候，他说，一定要“敢”字当头，坚持党性，反对派性，敢于摸老虎屁股。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他的针对性表现的更强，批评“两个凡是”，提出要全面地理解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针对性，邓小平非常明确，碰到问题决不含糊。

二是敏锐性。邓小平长期处在最前沿，而且三上三下。这就决定了他看问题很尖锐，确实站得高，看得远。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批评“两个凡是”，纠正“左”的错误；后来出现了西单民主墙等。直到最后出现 1989 年的“六四事件”，又都是邓小平站出来理直气壮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

在起草《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过程中，邓小平的敏锐性更表现得充分。他对《历史决议》的谈话主要有九次，重要思想反映在一、四、六、九几次中，第一次，明确提出确立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30 多年的是非要实事求是地作出评价。第四次，说了三句话，充分表达了他对继承和发展毛泽东思想的问题，也说明了毛、邓思想的关系，他说：“从许多方面来说，现在我们还是把毛泽东同志已经提出，但是还没有做的事做起来，把他反对错了的改正过来，把他没有做好的事情做好。今后相当长的时期，还是做这件事。当然我们也有发展，而且还要继续发展。”第六次，是陈云建议写 60 年代历史，因为写好历史才能使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更明确，更能全面来看过去的历史。还讲到学哲学。第九次，讲用不用提“路线斗争”，邓小平提出不要轻易提路线斗争，我觉得很高明。

邓小平提出的每一个问题都很尖锐，他分析毛泽东同志晚年犯错误，主要是破坏了民主集中制，但又提出不能把所有错误全部推到毛泽东个人身上，原因很复杂，制度往往把人推向反面，甚至包括像毛泽东这样的伟大人物。

这次南巡谈话，更表现了他的理论上的敏锐性，他十分清醒地看到国际经济又处在一个转换期，我们的周边国家都在发展，于是要求我们要抓住机遇，加快发展，特别是他明确提出的建立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更把理论界长期争论的一个最关键的问题解决了，使我们党的指导思想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当然这个问题还在实践中。但小平同志对待这个问题很尖锐，站得高，看得远，不愧为我们这个时代的“总设计师”。

三是准确性。邓小平在理论指导上，特别强调要完整准确地学习和运用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毛泽东所论述的理论、历史、现实，邓小平在新时期也有运用和发展，比如在一国两制问题上，台湾、香港、澳门问题上，既有历史原因，又有现在的情况，他认为我们处理港澳台问题，必须把历史和现实情况结合起来。对国际形势，他提出“和平和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主题”，这是经过实践检验得出的科学论断。很多国外学者、知名人士都说，邓是伟大的政治设计家，是当今世界的伟大人物。

四是朴素性。邓小平的语言表达非常朴素，确实是老百姓喜闻乐见的，中国语言非常丰富，什么歇后语、猜谜语，一字多音、多字一义，很复杂，很巧妙。像“猫论”，邓小平说是刘伯承发明的，但他们有共识、有共同语言，他就拿来说明生产力的作用。还有“摸着石头过河”，既要敢于解放思

想，大胆实验，又要实事求是。在他的讲话中、著作中这类语言很丰富，充分表现了他在探索社会主义过程中的态度。这类例子非常多，甚至小标题里也有老百姓说的话，“只要政策对头，路子不会变”“一百年不变”“五十年不变”，这类话经常说。

五是一贯性。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他在1979年就提出了，那还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不久，出现了非毛化的情况下提出的，以后一直坚持。应该说邓小平在这个问题上下了很大功夫的，但先后有两位主要领导人不坚决，出现了自由化倾向，又是小平出来及时纠正。科技是生产力，1978年就提出了，1988年再次强调是第一生产力。这个论点马克思曾提出过，但没有邓小平这么明确，提得这样高。他在南巡讲话里，提到两个“硬”字，即两手硬，发展才是硬道理。我很感兴趣，他说：“恐怕再有三十年的时间，我们才会在各方面形成一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在这个制度下的方针、政策，也将更加定型化。”小平同志南巡讲话的精神，一个是发展、一个是抓住有利时机，十四大、十四届二中全会都是贯彻这个精神。一直到现在，虽然中央6号文件下来，仍然不要误了抓有利时机。现在的国际经济在大转换，党中央很清醒，就是认真解决宏观调控问题和结构调整问题，朱基同志最近表示：我们并不是失误，而是解决结构调整问题，在前进中要有清醒头脑。所以，邓小平的一贯性表现在各个方面，他的南巡讲话非常重要，看问题越来越全面，越来越深，这需要我们认真领会，在实践中贯彻。

总之，邓小平在“实践中结合”的特点非常鲜明，这就是我的体会。

访问人：谢谢您给我们讲了这些深有启发的话。

1993年7月15日于成都

## 访卢之超——探索中的三个突破和悲剧

### 卢之超

卢之超，江苏人，1933年生。曾任《红旗》杂志编辑、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政治组组长、中央宣传部理论局局长、中央文献研究室室务委员、研究员。现任全国政协副秘书长、外事委员会副主任。长期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毛泽东思想和党的理论研究工作，发表有关这些方面的论文多篇，主编过几本关于哲学和社会主义的教课书、辞书、文集等。部分论文收入《冷静下来的思索》、《实地上的足迹》两个集子。

卢之超同志很忙，在接受我们的采访当中，还有几拨客人找上门来，最后不得不匆匆结束。这样多的事务缠身，还能抽暇思考毛泽东，真叫人敬佩。当您读了下面的谈话，一定会和我们一样有着同样的感受。

访问人：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算起，毛泽东领导中国建设27年，既取得了伟大成绩，也留下了深刻的经验教训，我们怎样看待这些成绩和教训？

卢之超：这个问题我也考虑很久了。虽然从50年代后期开始，毛泽东犯了不少“左”倾错误，但他对于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所作的一些探索和设想，是很可贵的，至今仍是我们的一笔宝贵财富。从斯大林逝世到八大前后，毛泽东确实看到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上的弊端，试图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既然是探索，不可避免地会出现曲折甚至失误。因此我把这些探索概括为：毛泽东的三大突破和三大悲剧。突破是创造，悲剧是失败。我在这里所说的突破和悲剧是一回事，就是说它是一个问题或一个过程的两个侧面，从突破这点看，毛泽东是伟大的，是理论上和实践上的创造；但是反过来，从他突破后的发展看，往往又走向失误，或者走向了另一个极端，有的甚至违背了他的初衷，因而不能不认为又是一个悲剧。

访问人：这个问题的关节点是不是在这里：毛泽东在社会主义建设上的探索和迷惘、成功和失误往往交织在一起，解开这个谜，就必须坚持唯物辩证法？

卢之超：是这样。既然我把毛泽东在社会主义时期的探索概括为三大突破和三大悲剧，就是说主要集中在有关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命运的三个重大问题上。下面我分别来谈一谈。

第一个突破，发生在《论十大关系》发表前后。毛泽东突破了苏联经济建设的发展道路和经济体制的束缚，提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设想。这个突破是需要有理论勇气的。不光要有深邃的眼光，更需要勇气。现在我们看苏联几十年的经济建设道路和体制模式，问题和教训当然是很清楚了。但在那时候并不是那么容易的。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又取得了那么大的成就，从一个沙皇统治下的农业占很大比重的落后国家，变成了一个在世界上数第二的工业强国。实现了工业化和农业机械化，而且在50年代苏联经济的弊端并没有完全暴露。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表现了他的过人之处，开始认识苏联建设上的一些根本问题，并结合我们的建设实践，探索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新思路。此前对苏联建设中的问题我们也不是一点没有认识，比如农业集体化，我们搞合作化运动时就有所不同，苏联搞农业集体化是很粗暴的，和农民的关系没有搞好，结果是农业生产停滞不前，一直到二次大战结束后，50年代，苏联的农业生产才达到1913年的水平。比较起来，我们搞农业集体化是平稳的，也是成功的，没有对农业生产力造成破坏。

现在有些人试图想否定农业集体化而肯定工业化，但在我看来，如果否定了农业集体化也就否定了工业化，因为城里是不生产粮食的。所以，统一起来看待苏联的经济建设道路和模式，要有历史观点。苏联的工业化还是应该肯定的，不管怎么说，斯大林的经济模式在当时国内外紧张激烈的情况下，是比较现实的一种选择。问题是在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特别是斯大林逝世后，仍然没有意识到对这个经济模式应有所改变，而是把这个经济模式凝固化了，如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以及有关的用工制度、分配制度等。从1953年开始我们搞工业化，一开始也是把这一套搬用过来。虽然觉得它有些弊病，并没有完全照搬，但并没有从发展道路和体制上去怀疑和有所突破。访问人：那么，从什么时候开始，对苏联经济模式的认识，才逐渐清晰起来？

卢之超：主要是在完成三大改造以后，我们面临一个全新的问题，就是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怎么搞。现在来看，当时毛泽东敢于对斯大林以发展重工业特别是军事工业为重点、忽视农业轻工业的做法以及与它相适应的高度集中的完全靠计划控制的经济模式提出怀疑，提出不同看法，提出另外的思路，这是很了不起的。他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当时急需正确处理的十大关系。提出这十大关系，一方面是从总结我国经验、研究我国建设中的问题提出来的，一方面是以苏联经验为鉴戒提出来的。“十大关系”主要是讨论经济问题，前三条讲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第四、五条讲国家、集体和个人的关系，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后五条是属于政治生活和思想文化方面的，讲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党和非党的关系、革命和反革命的关系、是非关系、中国和外国关系。十大关系的提出，标志着党和毛泽东在探索一条和苏联高度集中的把重工业放在最重要地位而忽视农业、轻工业的不同的建设道路，他指出的方向，今天看来也是对的。它又体现出我党比较讲究辩证法，能自觉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导和探索新的建设道路。这就是我所说的第一个突破。

访问人：您开头说，一个突破，又伴随一个悲剧。这个突破为什么又叫悲剧呢？

卢之超：所谓悲剧，是因为后来出现了1958年的大跃进。这本来是一个很好的开端，如果发展的正确，是可以给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带来好的前途的。但后来的发展出了偏向，搞了大跃进，造成了经济的大混乱。大跃进的失误，关键在如何依靠群众，调动群众积极性的问题上。不是采用商品经济，尊重经济规律的办法，而是按过去那种战争时期发动群众的办法，不计成本，不顾效率。当然这个问题也包含有大胆的尝试和突破，但后来的实践证明那种方法是不对的，主要是没有重视经济规律，把过去领导战争的规律机械地移植到搞经济建设上。还有更重要的，就是没有从实际出发，考虑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阶段和中国经济的落后状况。订了许多不切实际的高指标，发展战略也是越来越强调追求速度。

访问人：有一次，金冲及和我们谈，他说，他读毛泽东建国后关于经济方面的文稿，有一个很深的印象，就是毛泽东有那么高的热情，真心实意想把我们的生产力搞上去，但不懂经济，真是悲剧。

卢之超：毛泽东的认识是受到一些限制，主要是他对现代化的工业不大懂，对商品经济也不大懂，因为他过去接触的多是农村的自然经济和小商品生产的经济形式，虽然对苏联经济体制中的一些问题看到了，仍然没有找到

好的办法，只能把自己过去的经验再用起来，恐怕问题出在这里。

访问人：这也很自然，因为他想突破，就要考虑过去的经验，当然首先想到的还是自己的经验，过去的经验也不好说一点也不管用，包括生产，延安大生产那一段还是管用的。

卢之超：即使是成功的经验，在不同条件下也会有一定的跟制。他把这些经验扩大了。当然这里也有客观原因，比如向西方发达国家学习，当时是对立、封锁的局面，朝鲜战争爆发后，整个资本主义世界都封锁我们，不可能去吸引外资，去了解、学习西方的情况和经验。当时没有这个条件。

访问人：除这些客观原因以外，毛泽东在主观上是不是也有框框？

卢之超：框子也是和国际形势连在一起的。其实毛泽东在对外开放这点上历来是很开明的，在建国前他就曾设想将来如何跟资本主义国家做生意，发展经济关系。1949年12月20日，他在一份给中共中央的电报中又说：“在准备对苏贸易条约时应从筹统全局的观点出发，苏联当然是第一位的，但同时要准备和波捷德英日美等国做生意，其范围和数量要有一个大概的计算。”但朝鲜战争一打，两个阵营对立，西方包围封锁，根本不是你愿不愿意对外开放、做生意的问题，是人家不跟你干，卡你的脖子。所以，闭关锁国并不是我党历来的政策，经济封锁是人家强加给我们的。

访问人：对外开放是有个客观形势问题，但研究资本主义，把它成功的经验吸收一些；我想说的主观上的框子是不是在这里？

卢之超：有这个问题，他头脑中确实对现代化大生产不太了解，特别是对战后资本主义的发展了解不够。但在当时这里还是有客观原因，同后来的情况不同。50年代的资本主义并不像现在这样发展，那还是他们倒霉的时候，当时资本主义世界倒霉还没有完，比如日本还不如中国的情况好，只是到了60年代发生第三次技术革命，资本主义经济恢复过来了，在生产上、技术上以至管理上才发展了许多新的东西。

所以，大跃进的失误，既有客观原因，也有主观原因。没有机会也没有重视学习，结果只能沿用过去的办法，搞出个大跃进。这当然是悲剧，犯了大错误。但人们在分析大跃进的失误时，往往只看到毛泽东异想天开搞出个大跃进，超英赶美，头脑发热的一面，却往往忽视另一面，就是在这个时期，毛泽东对苏联经济体制的弊端提出怀疑，大胆突破，而且在理论上作了阐述。特别他对工业和农业、集体和个人、集中和分散等关系的阐述，从原则上看，直到今天还是正确的。因此我把他看成是个突破。所谓突破，就是创造。创造也就是开了个门儿，有了个开端，以后的路或许还不太清楚，因此又发生失误。我们现在根据中国情况搞经济建设，搞改革开放，搞市场经济，从历史渊源看，应该说是从毛泽东开始的探索的继续，包括吸取他失误的教训。目的就是要把僵化的高度集中的经济体制改革掉，改成适合中国实际情况的，适合世界上生产力发展情况所证明了的市场经济体制。当然这种改革不是改成资本主义，仍然是使大多数人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的经济模式。

访问人：这是不是就是你说的第一个突破？

卢之超：对，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突破是提出“双百方针”和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提出这些问题当然也和苏联有关系，苏共二十大揭露斯大林后，使人们看到斯大林的专横、个人崇拜不仅是思想体制，实际是政治体制，从思想意识形态范畴直到政治范畴，斯大林都是采取了高压政策。斯大林逝世后，赫鲁晓夫揭露斯大林，解冻了一批政治历史问题，也包括文学等方面

的问题，带来的结果是什么呢？就是无穷地咒骂，谁骂的厉害似乎谁就正确。毛泽东在这个问题上比他们想得深、看得远，他首先想到在思想文化领域应当怎么办，提出了双百方针：“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就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党要领导意识形态以及科学、文学、艺术这些领域，但是这种领导应当同一般的行政领导不一样，不能用行政命令的方法，强迫命令的方法，应当允许科学上和文学艺术上的多样性，允许各种观点、流派齐放和争鸣，在相互竞赛和讨论、争论中发展科学和艺术，发展马克思主义。这就要求充分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但仅有“双百”方针还不能解决所有问题。如果有人公开出来反对共产党、反对社会主义怎么办？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都一齐进攻，当然不允许的。不能允许，又要坚持“双百”方针，因此，毛泽东又提出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有了这一条，就有了一个标准、一个界限。敌对势力从政治上攻击共产党、攻击社会主义，是不允许的；而不属于政治上敌对性质的问题，应该按照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办法，让科学、艺术，包括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和运用，都通过发表、讨论、创作、竞赛等等，并经过实践检验，来判断谁对谁错。从赫鲁晓夫到戈尔巴乔夫，就是没有分清两类矛盾，没有任何界限，把共产党、社会主义说得一塌糊涂，从思想深度讲是很表面的，从后果讲只能把自己搞乱。毛泽东提出“双百”方针，再加上区分两类矛盾，就基本上解决了党如何领导意识形态的问题。这些道理直到今天也是对的。

访问人：有人写文章说，“百花齐放”、“推陈出新”，毛泽东早在抗战时期就提出来了。

卢之超：抗战时提的是“百花齐放、推陈出新”，主要是就戏剧讲的，跟后来的“双百”方针有区别，作为政治思想上的一条政策，实际上是从1956年开始提出的，科学上和文学艺术上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党派关系上是“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到1957年，集中起来讲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报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思想，实际上包含了“双百”方针。这个思想是非常重要的，它实际上解决了党对意识形态领导，对文学艺术、科学技术领导，以及整个政治体制、上层建筑如何建设的问题。

现在这问题仍有现实意义，我们要搞改革开放，就要调动和发挥各种积极性，但同时要警惕来自右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侵袭和影响，极少数想要破坏社会主义制度的思想、理论或政治力量，是不能允许的。现在世界上还没有实现大同，哪个国家都要维护自己的统治。但这个范围很小的，在其他不属于这种性质的更大的范围内，要通过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办法，允许人家说话的办法，讨论的办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办法，来贯彻马克思主义的指导，逐步达到在重大问题上的思想的一致；与此相适应，在政治上要实行社会主义民主制度，扩大统一战线，在拥护社会主义的前提下，允许各种政治力量、各种要求、意见能表达出来。这可以说是整个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和政治体制问题。所有这些，可以说突破了斯大林的一套，在批评斯大林的基础上，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访问人：毛泽东指出的这个方向无疑是对的，但后来为什么又酿成悲剧了呢？

卢之超：这个问题更复杂。从历史发展看，出现了1957年的反右派运动，反右派运动本身就违背了区分两类矛盾的方针。当时所说的“右派”进攻，不能说没有存心反对共产党领导。反对社会主义的，但那是极少数；很多是

属于正确的意见，对共产党和党所领导的工作的正确批评建议，或者说虽然不正确但属于人民内部的不同看法，应该是通过讨论、批评等办法来解决的。对于当时的形势，党内有不同意见，反映也各种各样；有些知识分子本身也有毛病，越讲越厉害，有很大片面性，攻其一点不及其余。还有当时的国际形势，波匈事件之后，全世界反共反社会主义的思潮，对国内也有影响，总之情况比较复杂。但不管怎么样，这么大的范围，这么多的人数，一下子都来反对党，这种结论是站不住脚的。这是受过去长期阶级斗争条件下思维习惯的影响，没有真正贯彻新的形势下人民内部矛盾成为大量的主要的矛盾的新认识。反右派以后，就形成了非常严重的形势，在知识分子中以及意识形态领域形成了不正常局面。不过即使在反右派以后，毛泽东也没有完全改变关于两类矛盾的估计，只不过是认为这是补了思想上政治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这一课。到了后来，由于大跃进失败，党内出现不同意见，又来了一次反右倾，连党内生活也不正常了，把党内意见分歧也看成严重的阶级斗争，这就把阶级斗争的观点强化、固定化了。提出“双百”方针、人民内部矛盾，本来可以发展成的一个较好局面，又在实际进程中走向了反面。这些，也是违背毛泽东的初衷的。

毛泽东本来是有相当民主意识的，但由于长期残酷的战争环境和对敌我矛盾的过分敏感，情况就复杂了。对当时的很多情况估计和处理方针，党内思想也是不统一的，毛泽东提出“双百”方针和人民内部矛盾时，有人就不大同意，后来乱得似乎不可收拾，也为持这种意见的人找到了借口。反右派运动的错误的发生，还有更深的社会历史原因。建国之初，国民经济还没有恢复，共和国的政权还没有巩固，因此不得不加强了控制，各种矛盾都积压着，一旦鸣放，就有可能控制不住。社会主义处在初级阶段，经济上跟资本主义发达国家比还比较差，群众中还有各种实际问题得不到解决，存在着各种不满情绪，不让讲不行，不加控制也不行。这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发展民主的困难，那时在处理这个问题上谁也没有经验。现在也还没有完全解决这个问题。这也是今后政治体制改革的任务。但不管怎么说，毛泽东的功劳是应该肯定的，他试图改变斯大林那种在意识形态以及在政治生活中不民主、不能团结大多数、不能让大多数人表达意见的情况，这一点无论何时也是对的。

访问人：从这两个悲剧看，情况不大一样，第一个在经济发展模式上突破，但方法不对，搞了大跃进。

卢之超：有一个问题还是引起重视了，就是关于农、轻、重的发展道路问题。大跃进后，接受了教训，对农业还是比较重视的。后来批判包产到户，属于体制方面的问题，从发展战略讲，没有像苏联那样只是畸形地发展重工业。

访问人：“双百”方针的提出，初衷还是好的，但从发展的结果看，也几乎全部否了。

卢之超：这个问题直到现在还有现实意义，这和第一个突破有所不同。那个虽然也可以看作突破，但本身有缺陷，经济发展和经济体制上有很多问题没弄清楚，比如关于商品经济、关于价值规律的作用，都不甚清楚。第二个突破可以说形成了一套比较完整的理论，到现在看还是非常好的，“双百”方针、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现在还是要坚持。对我们今后搞政治体制改革，仍然有指导的作用。

访问人：这是第二个突破，同时又包含有悲剧。那么第三个突破呢？

卢之超：第三个问题，就是毛泽东一直考虑的如何使我们的党、我们的领导人，在执政的条件下不脱离群众，始终代表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的利益。这个问题，毛泽东从建国前的七届二中全会就开始考虑，到 50 年代 60 年代不断提，他是非常重视这个问题的。也是在 1956 年和 1957 年之交，他在考虑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时，就考虑到党的建设、党和群众的关系。因为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实现以后，人民内部仍然存在着各种各样的矛盾，而这些矛盾，又大量地存在于群众和领导之间。共产党是作为执政党，掌握国家政权，直接管理着经济文化事业，所以要解决党同群众的关系问题。1957 年春天开始整党，提出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官僚主义，就是为了使党不脱离群众。虽然后来出现了复杂形势和反右的扩大化，但共产党在掌握政权以后，无论如何要保证自己代表工人阶级和广大群众的利益，不脱离群众，不能变成官僚主义者，这在毛泽东那里始终是保持警惕的。这确实也是社会主义建设中最根本的问题。建设社会主义没有领导力量不行，但领导力量如果不代表人民利益和社会主义方向了，也不行。现在看，他的一些具体说法不完全对，甚至于到“文革”前他提的一些过头的甚至完全错误的观点，如共产党里有人已经成为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者阶级，这话说得太过了，而且也不符合当时的情况。但这种警惕他一直是注意的。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他提了不少办法，搞了不少运动，如整党、四清，甚至最后搞“文革”，许多是“左”的，“文革”更是完全搞错了。但从一个理想主义的角度讲，其中有一个重要因素，就是想保持共产党的纯洁性和保持党与群众的关系。关于不脱离群众的问题，防止领导干部蜕化变质的问题，列宁、斯大林虽然也讲过，但没有毛泽东那么重视，从取得政权开始就一直强调，50 年代 60 年代反复强调这一点，大概也是吸取了苏联的教训吧。苏联党脱离群众是很严重的，在苏联解体过程中看得更清楚了。

访问人：抗战初期，解放战争初期，建国初期毛泽东都比较集中讲这个问题，建国后他更是不断提醒这个问题。

卢之超：这个问题不只是党员特别是党的干部掌握一定的权，各方面条件都比群众优越一点的问题，是关系到执政党变不变颜色、蜕化不蜕化的大问题。党从一个被压迫的党变成执政党以后，客观条件会发生一些变化，做了领导，考虑问题的角度就不一样，自己的利益、思想感情以及整个行为会自觉不自觉地和群众不一样，如果不注意，脱离群众也会越来越远。这个矛盾是客观存在的，如果把握得好，不会出大问题，如果处理得不好，矛盾有可能发生激化，根本不代表群众利益，整个思想感情严重脱离群众。

访问人：毛泽东提出哪些办法解决这个问题呢？

卢之超：他提出了一些观点和办法，比如吸收群众参加整党，用团结——批评——团结的办法进行整风，强调干部参加劳动，两参一改三结合，以一个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等等。为什么后来他赞扬供给制、搞平均主义，包括军队中不搞军衔制，也是要求在生活大体平均，干部的待遇跟工农差距不要太大，领导层不要太特殊。后来又提出接班人的条件，提出反对“和平演变”等等。这方面提出的观点和办法不少，也比较复杂。有的正确，有的错误；有的作为原则是正确的，实践中搞错了，需要认真分析。但是，我认为他把保持党的无产阶级性质、保持党和人民的联系当作能不能保持住人民民主政权和社会主义的关键，并不断力图加以解决，是很值得注意的。这

也可以看作是一个突破。为什么又没搞好，以至造成悲剧呢？是因为他搞来搞去，始终没有把党的建设与发展经济这个中心任务的关系摆对，同时又没有从制度上解决这个问题。结果找到一个错误的办法，就是发动群众斗走资派，最后搞成“文化大革命”，这是最大的一个悲剧。

访问人：使党不脱离群众，这是他考虑的根本问题，但没有找到一个合适的办法来解决。

卢之超：没解决的原因主要是两个：一个是方法不对，一个是把问题孤立起来，变成阶级斗争为纲。把经济建设的任务放在一边，离开经济建设，离开发展生产力和改善人民的生活，离开现实的社会经济条件，而去专门抓党的纯洁性问题，这个方法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后来把这个问题与党内的意见分歧搅和到一起，无限上纲地搞党内斗争，更把问题搞乱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把这个问题纠正过来，就是说，不能孤立地强调党不能脱离群众，一定要在紧紧抓住生产力不放松的前提下解决党内存在的问题。因为群众最关心的还是生产发展不发展，生活能不能改善。

访问人：首先要给群众带来好处。

卢之超：所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对的，在这个前提下，再去解决同经济发展相适应的党群关系问题。

在现实生活中，党内有腐败现象也确实存在，我们的经济还比较落后，物质还不丰富。掌权了，个别人有可能受到资产阶级的影响，很容易想为自己捞点好处，捞多了群众中就有反映，而且会使一些党员、党的干部蜕化变质。所以这个问题是十分重要的，一定要解决的。从毛泽东当时考虑问题的思路看，他也是想解决这个问题，但他的方法不对，分析他的失误，第一是他把这个问题单独出来，抛开经济建设，在某阶段变成中心任务了，第二是按阶级斗争来对待。解决这个问题不能用阶级斗争的方法，只能用思想教育和搞好制度建设，要有一套制度去保证。邓小平同志看待这个问题就不一样，他强调要靠思想教育和制度建设。当然，这方面现实的问题还不少，也是今后的一个难点，还需要在实践中探索和解决。

访问人：你说的三个突破和三个悲剧，基本意思和内容是这些了？

卢之超：我初步的考虑是这样。细分析起来当然问题还很多，这里也不可能说得很周全，我已准备就这个题目写一篇文章，在那里可能说得全面一点。总之我认为要重视这三个问题。三个问题都可以归结到社会主义的建设道路和社会主义的体制上，这也是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考虑的根本问题。毛泽东的这些突破是有很大贡献的，他的失误也确实是悲剧。但是无论是贡献也罢，教训也罢，这些问题至今仍然具有现实性，仍然要在实践中进一步探索和解决，因而毛泽东的理论创造、实践经验、以及他在探索中造成失误的教训，都是我们的宝贵财富。在复杂的国际国内条件下，在经济文化尚不发达的情况下，我们建设社会主义，虽然不能搞多元化，但一定要采取灵活多样的形式和方法，承认利益是多样性的，在长时期内不可能追求所谓高级的单纯的形式；与此相适应，各方面的意见也一定是多样性的，不可能要求在初级阶段大家都有一样的觉悟，必须容纳各种意见、各种利益。在这种复杂的情况下，要抓住经济建设的中心，使国家经过较长期的建设逐步富裕繁荣起来，就需要一个保持先进性质的团结战斗的党。只要党保持清醒、保持工人阶级的性质，时刻与最大多数人民保持密切联系，不论以后发生什么情况，都不用害怕。中国社会主义是一定大有前途的。

1993年1月6日于北京

## 访姚旭——毛泽东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

姚旭

姚旭，1921年生，江苏靖江人。曾任上海学生救亡协会区干事，新四军连政治指导员、团副政委，总政治部秘书，志愿军政治部副秘书长，军事学院副军职教员，担任《毛泽东年谱》副主编。著有《从鸭绿江到板门店》、《日本投降后我党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决策》、《解放战争初期的南线战场》、《淮海战役作战方针的演变》等。

希腊神话中有个英雄——安泰，当他格斗时，只要身不离地，就能从大地母亲的身上不断吸取力量，所向无敌；一旦他离开大地，就不堪一击了。老将军先给我们讲了这个故事，然后说，毛泽东这位历史巨人，有着如同安泰一样的命运。

访问人：毛泽东奋斗一生，既有辉煌的成就，也有失误，我们想请您谈谈，他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他的失误又是怎么发生的？

姚旭：毛泽东之所以能够成为人民的伟大领袖，就是因为他最了解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况，他对中国社会作了最充分的调查研究，和他同时代的人们相比，没有一个人比得过他。他有句名言：“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可见他对调查的重视程度。有人批评这句话，说不给发言权就是不民主，有人说这是“狭隘经验论”，但是毛泽东始终不悔。

访问人：在中国共产党内，毛泽东的“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这条真理并不是一开始就被全党所能认识的。

姚旭：历史却证明这条真理。同毛泽东一起创建中国共产党的人们比较，读马克思主义著作最早最多的人并不是他，直到1920年他才读到《共产党宣言》的中文译本。陈独秀是懂得外文的，他读到马克思主义著作比毛泽东早，而且主编了《新青年》杂志，传播马克思主义。但是，陈独秀对中国社会情况没有作过调查，对中国社会情况的了解是漆黑一团。在创立中国共产党的时候，恰好是1921年7月1日这一天，陈独秀发表了一篇《卑之无甚高论》的论文，他把中国人民说成是“一堆蠢物”，他说：“若照中国多数人底意思，还应该男子拖下辫子，女子包起小脚，吃鸦片，打麻将，万事都由真命天子做主。这种事实决不是高论能够掩住使我们可以不承认的”。（《陈独秀文存》第三册第125页，上海亚东图书馆1922年11月出版），可见他对中国的社会情况，糊涂到什么地步！

访问人：接下来的还有王明等人，他们也貌似懂得马克思主义，但实践的结果，使中国革命又遭到一次更惨重的损失。

姚旭：王明在大革命时期从武汉一个学校到莫斯科去了，他精通俄语，读过许多马列主义著作，但他不仅没有在中国做过什么社会调查，他没有种过田，做过工，打过仗，就是中央苏区他也从来没有去过。他做中国党的领导人，是第三国际封的。他对中国国情一无所知，要他领导中国革命不出机会主义那才是怪事。毛泽东说：“离开实际调查就要产生唯心的阶级估量和唯心的工作指导，那末，它的结果，不是机会主义、便是盲动主义”。

访问人：如果换一个角度，比如从当时的知名度、学历等方面看，是否也能说明一些问题呢？

姚旭：从学历上看，毛泽东也不能和他们相比，陈独秀在当时已经是北京大学知名的教授，王明也是莫斯科中山大学的“高材生”，毕业后留校讲

授联共党史。毛泽东仅是一个中等师范的毕业生(他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工作,每月工资仅8元)。但是,在同时代的人们中间,没有一个人像毛泽东那样极端重视调查研究,因此,也就没有一个人像毛泽东那样充分了解中国国情。毛泽东从事社会调查,比他接触马克思主义的书本还早。毛泽东第一次读到《共产党宣言》是在1920年,而毛泽东从事的社会调查早在1917年7、8月间就开始了,在长沙、宁乡、安化、益阳、沅江五个县,步行九百余里,历时一个月,从7月中旬出发,8月16日才回到长沙。同行的有萧子升。沿途给一些学校、商店、大户或农民写对联、写信以解决食宿问题。贫苦农民见到毛泽东平易近人,讲的是农家话,又同情他们,关心自己,愿意向他诉说租佃情况和心中的不平。在去洩山的路上,毛泽东和一位曾在县衙里当过门房的老人拉起家常,谈到了官场的黑暗。毛泽东曾把这次调查写成通讯,发表在湖南的《通俗日报》上。这样的社会调查,以后他做过多次。1917年冬,他又在工人中作调查,创办工人夜校,“先当学生,后当先生”。毛泽东把这些调查活动,叫做“读无字之书”。毛泽东在读马克思主义著作的时候,他已经对中国社会情况有了初步的了解,他是带着已经知道的中国社会情况去读马克思的书的。他是应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进一步从中国的历史实际和革命实际的认真研究中,在各方面作出合乎中国需要的理论性的创造。他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情况结合起来了。他在大革命时期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和《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两篇文章,指出了中国革命中最广大和最忠实的同盟军是农民。

没有调查研究,毛泽东就不可能有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的思想,毛泽东关于农民是中国革命主力军的思想,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他脑子固有的,更不是关在房子里苦思冥想出来的。1926年毛泽东和佃农张连初交谈,并将这次交谈写了一本书,书名是《中国佃农生活举例》,从这篇材料,可以看出毛泽东依靠农民的思想,并不是来自他的天才,而是从农村调查得来的。现在已收入《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

如果毛泽东没有农村调查,也就不可能有在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的思想。在大革命失败后他又继续深入地做农村调查,又做了《寻乌调查》、《兴国调查》、《水口村调查》、《长冈乡调查》、《才溪乡调查》等等,这才有一系列的土地革命政策。随着调查的深入,这些政策也一次比一次完善。在《寻乌调查》中“寻乌的商业”一章就三万多字,为保护工商业政策打下了基础。同时,他对国内外形势进行了调查,回答了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在农村存在。从大革命时期的依靠农民到土地革命时期在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是毛泽东思想发展上的一个飞跃,这些都离不开调查研究。

访问人:毛泽东重视调查研究,并且身体力行,所以他对中国革命的认识是逐步加深的。

姚旭:是的。毛泽东思想是在实践中不断发展的。到了抗战时期,1938年10月,他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的报告《论新阶段》中,第一次提出了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这一理论概念。毛泽东在这个报告中说:“总之,在今天的半殖民地大国如中国,存在着许多优良条件,利用我们组织坚持的长期的广大的战争,去反对占领城市的敌人,用犬牙交错的战争,将城市包围起来,孤立城市,从长期战争中逐渐生长自己的力量,变化敌我形势,再配合以世界的变动,就能把敌人驱逐出去而恢复城市。”(《毛泽东军事文选》第150页)他提出这一理论也一点离不开实践。在大革命时期,毛泽东

能够提出农民是中国无产阶级最广大和最忠实的同盟军就很了不起了。有人说，这时毛泽东就有了农村包围城市的思想了，表面上看，这是在抬高毛泽东的地位和作用，其结果是把毛泽东的革命实践和他的理论割裂了。也有的说，毛泽东上井冈山的时候，就有了农村包围城市的理论了，他上井冈山，就是根据他的“农村包围城市”的理论上山的。其实，在当时革命实践中最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农村革命根据地能否存在和发展，红旗到底能够打多久的问题，毛泽东能够解决这个问题就很了不起了。到了抗战时期，1938年5月，毛泽东说：“在山西，我已三面包围了同蒲路（路之东西两侧及南端），四面包围了太原城；在河北、山东等省，亦有许多这样的包围”。（《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27页）这种对敌占城市形成包围的形势，是十年内战时期没有的，于是，毛泽东根据实践中出现的这种现象完整地提出了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理论。可见一切正确的思想都是从实践中来的，认识一点也离不开实践。毛泽东思想是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发展的。否则，正确的思想是从实践来的这一真理，就变成了“天才”创造理论了。

访问人：我们很赞成您的这个观点，但有些搞历史研究的同志还是自觉不自觉的带有片面性。

姚旭：毛泽东的正确思想是来自实践还是来自他的天才？这个争论似乎已经结束了。可是有些同志在写书的时候，总是把顺序颠倒过来，把理论来自实践，变成实践来自理论。他们虽然写了毛泽东的历史功绩，却忽视了毛泽东创造历史功绩的正确思想从哪里来的。

访问人：看来，这是一个方法论问题。

姚旭：是这样，毛泽东说，“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在马克思书本里，也讲过充分占有材料的重要性，但的确还找不到“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这句话。当年有的人说这个规定不民主，有的人说大野蛮，有的人说，马恩列斯书本上已经有了的东西，照办就是了，毛泽东不信邪，他说：“你对那个问题的现实情况和历史情况既然没有调查，不知底里，对于那个问题的发言便一定是瞎说一顿。瞎说一顿之不能解决问题是大家明了的，那么，停止你的发言权有什么不公道呢？”这句话是他1930年5月在《反对本本主义》一书中开头第一段里写的。然而，到了1931年11月的中央苏区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上，“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仍被斥之为“否认理论否认政治的狭隘经验论的落后思想”。

整顿三风，提倡调查研究，毛泽东关于调查研究著作成为整风学习的文献，我们党兴起大规模的调查研究之风，一直到全国解放。

访问人：这里又出了一个问题，建国以后，尽管毛泽东十分清醒地提出许多新问题，但是调查研究少了，比如他就没有开过一次有工人、农民参加的调查会，这个问题原因在哪里？

姚旭：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毛泽东在1961年1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自我批评说，解放以来，特别是最近几年，我们调查做得少了，不大摸底了，大概是官做大了。我这个人就是官做大了。现在有不少同志在研究这个问题。为什么官做大了调查就少了呢？何况遵义以来，毛泽东就是全党的领袖，并不存在“官大了”的问题，对此，各有各的看法。有人说，毛主席为人民的事业紧张操心了一辈子的，脑子紧张过度了，就要出乱子。有人说他骄傲了，他觉得他对农民的了解，就如同京剧界里的梅兰芳，没有别人比得上他。如果有人对他有什么建议，那就是“不知羞耻”。也有人说，由于被

群众隔离起来，他只要到马路上，马上就被成千上万的群众包围得水泄不通，根本没有和工人农民交谈的可能。有人说警卫部门为了毛泽东的安全，不得不把毛泽东和人民群众隔离开来。我觉得，以上这些说法，都有道理，也可能兼而有之。我看，不完全是客观原因造成的。有一本刘少奇的影集，如果你们问我最喜欢哪一张？我可以回答你们，我最喜欢的是刘少奇坐在火车硬席车厢和群众谈心的那一张。建国以后，毛泽东很少和普通工人、农民谈心，他知道的情况是从干部汇报和纸上的报告得来的，而党内有些干部专门琢磨毛泽东的心理，毛泽东爱听什么他就说什么，诌报情况投其所好，1955年批邓子恢为“小脚女人”，1956年批周恩来“反冒进”，为什么毛泽东听信那些人的话？就是因为他和普通工人、农民隔离了，和中国的实际情况隔离了。

请看1958年6月份《人民日报》公布的麦收“放卫星”的亩产消息，从6月8日公布亩产2105斤，12日上升到3530斤，16日又上升到亩产4353斤又12两5钱，最后，23日，竟公布到亩产4689斤10两8钱。

同年《人民日报》公布的早稻亩产“放卫星”的记录：7月9日是3054斤7两，18日上升到5806斤8两，25日上升为7745斤，26日上升到9195斤13两，31日上升到10597斤。8月1日竟上升15361斤，最后8月13日上升到36956斤，8月15日还登载四个小孩站在这块早稻穗上的照片。

1958年8月11日《人民日报》还提过一个口号，叫做“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

访问人：毛泽东当时信不信《人民日报》这些报道？

姚旭：有人说他不信，不对，他是信的。他是管得了《人民日报》的。事实上毛泽东已在忧虑“粮食多了怎么办”这个问题，你们可以查看8月19日的《人民日报》，8月初，他到河北徐水县视察，当县委书记汇报粮食产量时，毛泽东问：“你们县31万多人口，怎么吃得完那么多粮食？粮食多了，怎么办？”其实，毛泽东只要到“丰产田”去看一下，这些弄虚作假的事情，一戳即破的。但是他完全相信干部的汇报，已在考虑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问题。山东范县（今属河南）县委在10月制定了一个1960年过渡共产主义的规划，11月6日毛泽东批示：“此件很有意思，是一首诗，似乎也是可行的。时间似乎太促，只三年，也不要紧，三年不成顺延可也。”“共产风”，归根结底是“浮夸风”造成的。

但实际情况是，粮食产量在年年下降。大跃进的第一年1958年已下降为2亿吨，1959年下降到1.7亿吨，1960年下降到1.4亿吨。城乡居民人均粮食供应量，1957年为406斤，1961年下降到318斤，食油由1957年人均年供应量4.8斤，1961年下降到2.8斤。

全国的人口数字也在下降。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每年平均增加1434万人。1960年却下降一千万，1961年又下降348万人。

这时候，中央震惊了，毛泽东也震惊了。研究问题的根本原因，得出一个共识：“根本上是由于许多领导人员放松了在抗战期间和解放战争期间进行得很多有效的调查研究工作，满足于看纸上的报告，听口头汇报，下去的时候也是走马看花，不求甚解，并且在一段时间内，夸夸其谈，以感想代政策的恶劣作风又有了抬头。这是一个主要的教训，全党各级领导同志，决不可忽略和忘记这个付出了代价的教训”。这是中共中央1961年3月22日关

于认真进行调查工作问题给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的一封信中的一段话，它的确抓到了问题的要害。

这封信还写道：“中央要求从现在起，县级以上党委的领导人员，首先是第一书记，认真学习毛泽东同志的思想方法，深入基层（包括农村和城市），蹲下来，亲自进行有系统的典型调查，每年一定要有几次，当作领导工作的首要任务，并且定出制度，造成风气。调查工作所以是领导工作的首要任务，是因为一切工作都必须从实际出发，调查工作做好了，其他工作才能做好。第一书记亲自进行调查工作所以特别重要，是因为第一书记责任最重，他们的思想方法工作方法是否正确，是否从实际出发，最足以影响全局，他们重视了调查研究，别的同志就会跟上来。”信中还特别指出：“调查应该采取客观态度，不应该抱定一种成见下去专替自己找证据，应该发现事物的真相不要为各种假像所蒙蔽。”

1961年5月刘少奇下去蹲点了，在他的家乡宁乡县炭子冲大队和长沙县天华大队蹲点44天，他的结论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人祸”者，党的领导人闯下的大祸也。后来，他又赞成包产到户，这就注定了他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命运。可惜，毛泽东这次又没有下去蹲点。但他还是大力支持了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也正因为如此，才有了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从而使我国的国民经济出现了转机。

访问人：看来，搞不搞调查研究，能不能了解真实的客观情况，对于制定正确的决策关系极大。这个问题，恐怕至今仍有现实意义。那么，在调查研究问题上，应该做到哪些呢？

姚旭：我想起毛泽东1931年讲过的两句话：“一、不做调查没有发言权。二、不做正确的调查同样没有发言权”。

什么叫“正确的调查”？综合毛泽东的论述，我认为应该有以下几点：

一、“没有满腔的热忱，没有眼睛向下的决心，没有求知的渴望，没有放下臭架子、甘当小学生的精神，是一定不能做，也一定做不好的。”这也是毛泽东说的。可有的同志下去做调查就是放不下架子，前面有车开道，坐的是豪华轿车，后面还有车队跟随，浩浩荡荡，十分气派。摆出这样架子，在群众心目中，形成你是长官，我是百姓，群众不把你当成朋友，你就调查不出真实情况来。所以毛泽东说：“怎样使对方讲真话？……主要的一点是要和群众做朋友”。毛泽东作兴国、长冈、才溪调查时，已在中央苏区担负领导的责任，和在建党前后和萧子升、蔡和森以游学的方式调查时，是一个普通的学生的身分不同了，已是苏区的一个“官长”了。因此就出了一个和群众交朋友的问题。毛泽东对这一点说得很详尽，他说：“群众不讲真话，是因为他们不知道你的来意究竟是否对于他们有利。要在谈话的过程中，给他们一些时间摸索你的心，逐渐地让他们能够了解你的真意，把你当作好朋友看，然后才能调查出真情况来”。“我在兴国调查中，请了几个农民来谈话。开始时，他们很疑惧，不知我究竟要把他们怎么样。所以，第一天只是谈点家常事，他们脸上没有一点笑容，也不多讲。后来，请他们吃了饭，晚上又给他们宽大温暖的被子睡觉，这样使他们了解我的真意，慢慢有点笑容，说得也较多。到后来，我们简直毫无拘束，大家热烈地讨论，无话不谈，亲切得像自家人一样。”如果你下去调查，屁股后面跟着一串官员，一个普通的农民，过去与你素不相识，敢不敢向你反映他们切身利益的问题呢？

二、做调查工作不应该抱定一种成见，下去调查不应是专替自己的主见

找证据。听到合乎自己主见的就赞扬，听到不合主见的就训人。我听说过一个故事：有一个生产大队，养了一批兔子，兔肉可以卖钱，毛皮也可以加工后出售，赚了一笔钱，可以买进拖拉机和化肥，又可以改善社员生活，他们叫做“以副促农”。有一天，上面来了一位官员做调查工作，他脑子里只有“以粮为纲”，把搞副业叫做“抓钱”，认为这是搞资本主义，一声令下，兔子全部宰光。别的生产大队听到这位官员要来调查，连忙重写汇报的稿子，只讲粮食生产，别的事情一概掩盖住了。跟社员们也都打了招呼，这位官员进村以前，社员已经摸清了他的来意，这位官员是带着自己的主见来的，又带着自己的主见走了，在乡村做了一阵调查，什么新东西也没有学到。毛泽东说：“和全党同志共同一起向群众学习，继续当一个小学生，这就是我的志愿”。我看，如果一个人下去调查，没有甘作小学生的态度，结果是误人误己而已。那时，对付上级来的调查，先要摸清政治风向，摸清上级的口味，都调查清楚，如果爱跳舞，舞会也准备好了。

毛泽东早在1961年5月30日就批示，他反对“官僚主义的老爷式的使人厌恶透顶的那种调查法”。

三、领导者一定要亲自下去做调查，这是毛泽东一贯强调的。1962年关于“包产到户”的争论，刘少奇、邓小平、陈云、邓子恢是赞成的，也有人反对。这个问题，如果毛泽东亲自下去做一番调查，我想，是可能正确解决的。因为毛东说过：“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的作用的好坏、大小，归根到底，看它对于中国人民的生产力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79页）。根据他的这个观点，不难判定是非的。即使他不批准，我想或许会允许一切经过试验的。可惜，他没有亲自下去看看，把“包产到户”定性为“走资本主义道路”，造成的损失是惨重的。

四、不仅要调查最好的，也要调查最坏的，这是八届九中全会闭幕后，毛泽东交待的。那时，哪里出现一个先进单位，做调查的就往哪里挤，接待不起。哪里出现一个坏的单位，里面矛盾重重，解决起来棘手，调查的人往往绕开，这些单位成为“老大难”单位，有些地方还制造“假典型”，从全县每个生产队，抽调一个整劳动力，自带粮食工具，到这个队去出“义务工”，这是给上级看的。群众称为“点上一朵花，面上豆腐渣”。毛泽东知道这个秘密，有一次接见外宾，外宾盛赞所见所闻，毛泽东说，你们上当了，他们只给你们看好的，不给你们看坏的。两头都去调查，有了比较就可以鉴别。

五、提倡长期下去蹲点的方式。毛泽东曾经提倡开调查会的方式，对于到会人数，亲自做记录等等，都做了规定。后来，他又提倡长期下去蹲点的方式，1964年9月25日他在刘少奇一封信上的批语中说，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简单他说，就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下决心长期下去蹲点，就能听到群众的呼声，就能从实践中逐步认识客观真理，变为主观真理，然后再回到实践中去看是不是行得通。如果行不通，则必须重新向群众的实践请教”。这段话，在纪念毛泽东逝世十周年之际，收入《毛泽东著作选读》题为《向群众的实践请教》一文之中。这对于我们今天的工作，仍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1993年9月5日于国防大学

## 访汪裕尧——换一个视角：毛泽东怎样看待他自己 汪裕尧

汪裕尧，1933年生，江苏江阴人。现任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室务委员、毛泽东研究组组长、编审。

长期从事毛泽东著作的编辑和研究，参加了《毛东农村调查文集》、《毛泽东书信选集》、《毛泽东期文稿》的编辑工作。是《毛泽东选集》第一至卷第二版、《毛泽东文集》、《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的主编之一。

看文章如同吃饭一样，再好的食多了也会厌烦，我们改换一个角度，倒开出一方新天地。

访问人：在前一段的采访中，接受我们采访的专家、学者都是谈他们对毛泽东的体会和看法。这次，我们想换一个角度，就是把审视的眼光倒过来，探讨一下毛泽东是怎样看待自己的？您搞了近20年毛泽东著作的编辑和研究，接触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一定有您的体会和看法。

汪裕尧：这个话题很有意思，搞清楚这个问题，对于深入了解和研究毛泽东是必不可少的，这也是研究毛泽东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我知道的，有些出版社已经或者准备出版这方面的书，比如人民出版社今年年初出版了一本《毛泽东自述》，辑录了毛泽东1936、1939、1965和1970年同斯诺的四次谈话，其中包括谈他经历的《一个共产党员的经历》。这是研究这个问题的比较权威的材料。但仅仅根据这些材料来研究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在更广泛更充分地占有材料的基础上进行分析和概括，才能得出一些科学的看法。我虽然较广泛地接触了一些材料，但不能说已经充分了，所以只能根据过去的一点积累，粗线条地谈一些不成熟的看法。

如何看待毛泽东说的他一生于的两件访问人：毛泽东曾说他一生干了两件大事，一个是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一个是发动“文化大革命”。“干两件事”的说法流传很广，您认为这能概括毛泽东的一生吗？

汪裕尧：有材料说，1976年6月15日，毛泽东在他的病情加重时，曾把当时的一些中央领导人找去，对他们说了一段话，意思是：人生70古来稀，我已80多岁了。人老了往往要想后事，中国有句古话叫盖棺定论，现在虽然还没有盖棺，但也快了，总可以定论了吧。我一生干了两件事，一是和蒋介石斗了几十年，把他赶到一群海岛上去了，抗战八年把日本人请回老家去了。对这些事持异议的人不多，就那么几个人在我耳旁叽叽喳喳，无非是让我早点把这几个海岛收回来。另一件事，你们都知道是发动“文革”，这件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这两件事还没完，这笔遗产要交给下一代。怎么交法，如果说和平交不成的话，那就在动荡中交，搞不好就要血雨腥风了，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

对这段话怎么理解？我觉得毛泽东讲的这两件事，实际上是用他特有的表达方式概括了夺取政权和巩固政权这两大课题。第一件事比较好理解。他领导人民把日本帝国主义赶出中国，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这是绝大多数人民都拥护的。讲到这件事还没有完，显然是指祖国统一的大业还没有最后完成。

第二件事是发动“文化大革命”。毛泽东曾经说过，这次“文化大革命”，“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毛泽东把这件事看得很重，看作是巩固无产阶级政权

的大事，为什么？这里既有历史的原因，也有国际的原因，还有现实的原因。

访问人：所谓历史原因，是指什么呢？

汪裕尧：毛泽东很注意吸取历史经验，他读了很多史书，历次朝代更替的经验教训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比较明显的事例有两件：一是《甲申三百年祭》。郭沫若的这篇文章一发表，就引起毛泽东的高度重视，他不仅自己读，还推荐给党内高级干部，“把它当作整风文件看待”。二是回答黄炎培关于“历代兴亡周期率”的提问。1945年7月黄炎培访问延安时，向毛泽东提出共产党怎样避免历代“其兴也 焉，其亡也忽焉”的周期率的支配。毛泽东明确回答：我们已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一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这两件事说明，早在抗战胜利前夕，毛泽东脑子里就在考虑如何防止党的干部腐化变质，如何防止政权得而复失的问题。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他更明确地告诫全党，要警惕糖衣炮弹的袭击，夺取全国胜利只不过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在离开西柏坡进京时，他又一次地提出不要做李自成。建国初期他发动三反五反，下那么大的决心枪毙严重贪污腐化的刘青山、张子善这样的高级干部，更反映了毛泽东非常重视掌握政权的共产党防止腐化变质的问题，他曾说，这不仅是对他们两人，处决他们，可以挽救二十个、二百个、二千个、二万个犯有各种不同程度错误的干部。这些都是着眼于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

访问人：那么，国际的原因呢？

汪裕尧：国际的原因，就是苏联的经验教训。毛泽东认为苏联出了修正主义，苏共领导集团背叛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在对外政策上推行霸权主义，妄图由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主宰世界、他对此非常警惕，试图避免苏联的情况在中国重演。因此就提出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把政权牢牢掌握在忠实于马克思主义的干部手里。

访问人：那么，现实的原因呢？

汪裕尧：现实的原因就是对国内情况作了错误的估计，作出了错误的决策。他把中央出修正主义作为一个现实的问题来解决，认为这个问题已迫在眉睫，因此从60年代上半期起，就搞了一系列运动，批判了所谓文艺黑线，又搞了四清运动。但他认为这都不解决问题，于是就自下而上的发动了“文革”，试图用这种办法来解决国际共运史上还没有解决好的怎样巩固无产阶级政权的问题。对“文革”他始终认为大方向是正确的，是得到广大群众的拥护的。他的那段谈话中说对“文革”“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我理解这里不是指群众，而是指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省部级以上的领导干部，他认为他们对这场运动“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因为革命革到自己头上了，产生了抵触情绪。

访问人：他在谈话中说到的“文革”的缺点，并不是我们现在认识到的“文革”错误，而是认为“文革”从整体上是对的，问题是别人不理解。

汪裕尧：当然讲这段话时，他对“文革”的问题是看到了一些，也有了一些认识，但他对问题的估计和我们现在的估计不一样。他认为对“文革”要三七开，基本正确，有所不足，不足主要是指“全面内战”和“打倒一切”两件事。而这两件事也是违背他的意愿的，他也是反对打倒一切和全面内战的，但事情的发展不以他的意志为转移，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控制。这又联系到邓小平的复出，为什么毛泽东让小平同志出来，而且把党政军的大权托

付给他，就是想让邓小平来控制当时已经失控的局面；但当小平同志通过全面整顿，从根本上纠正“文革”的错误时，他又不能容忍了。

访问人：那么怎么看待毛泽东说的这件事呢？

汪裕尧：毛泽东把发动“文革”作为他一生中的一件大事，从他的思路进行分析，应该说是讲有道理的。在他看来，既然历史上有这样的经验教训，国际上已有前车之鉴，国内已存在现实的危险，当采用其他办法解决不了时，采取“文革”的办法来解决是理所当然的。毛泽东把他的一生说成只做了这两件大事，我认为这样的概括是不准确的，理由有三点：第一，这种说法至少把从建国到“文革”前十七年的历史忽略了。这十七年应该说是中国的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的非常重要的历史时期。我们通过三大社会主义改造建立了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建立了独立的基本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综合国力也有很大的增强，并为我国以后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这些成就都是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取得的。第二，毛泽东在《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里曾讲到这样一个观点：只有“社会生产力的比较充分的发展，我们的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才算获得了自己的比较充分的物质基础（现在，这个物质基础还很不充分），我们的国家（上层建筑）才算充分巩固，社会主义社会才算从根本上建成了。”这是一个很好的思路，但后来没有贯彻下去。毛泽东讲的两件事，显然没有包括发展社会生产力这件大事。后来他离开发展生产力的根本任务，仅从政治上、意识形态上考虑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结果无产阶级政权由于缺乏充分的物质基础而得不到充分的巩固，因为人民不会容忍长期地处于贫困状态，经济上的贫困容易引起政治上的动荡和社会的不安定。第三，从根本上看，他把发动“文革”看成一件大事，是建立在对我国现实状况的错误估计上的，因而是完全错误的。

访问人：毛泽东的讲法，我觉得是用他独特的语言和风格说出了他的意愿，其实，他一生干的事比这要多得多。别人也在概括两件事，前不久，薄一波答记者问时，也谈到毛泽东一生干了两件事，一件是创建新中国，一件是在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他说：“一个人的一生，如果能为人民办成一件大事就已经很了不起了，而毛主席却起码办成了足以影响中国或世界历史进程的两件大事，他的伟大就可想而知了。”

汪裕尧：薄老的概括更科学，也更符合实际。毛泽东在建国后的历史功绩都可以归结到建设社会主义这个范畴中去。至于如何理解毛泽东的那段话，我想，我们还要注意他说这段话的处境，其实那段话反映了他当时的心情，他重病在身，深感来日不多，回天乏力了。所以有“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的话。他在谈话中说到交班的两种可能，当时确实是存在的。就他的愿望来说当然是希望在和平中交班，但如果这样交不成的话，就要准备在动荡中交，他说这个话是不无忧虑的，我们也可以把它看作是一种提醒。

毛泽东怎样谈他的人生经历访问人：就我们知道的，毛泽东谈他个人经历的也不少，您能否谈谈这方面的情况？

汪裕尧：毛泽东谈他自己的人生经历，从我掌握的材料看，最早的是在1936年11月同斯诺的谈话。斯诺是经宋庆龄和地下党的帮助于这年7月到陕北革命根据地的保安，党中央和毛泽东很重视他的采访，他到后不久就和他谈了话，而且谈了多次，涉及的问题也很广泛，有抗日战争的形势，我党的政策，以及抗战的前途等等。后来斯诺去了前线，大约在10月回到保安

后几次向毛泽东提出希望他谈谈个人的经历，当时毛泽东对这种做法的必要性表示怀疑，没有很快接受他的要求。斯诺认为毛泽东谈他个人的历史比别的东西更重要，而且提出一个理由，说你需要让外界知道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外面的谣传是很多的，有的说你得了肺结核，已经死了，有的说你只是一个无知的农民，还有的说你是一个狂热分子等等。这样一说，毛泽东有些心动，觉得是需要谈谈，以澄清外界的谣传。

访问人：据说斯诺给毛泽东开了一个很长的提问单子，其中就有个人历史这一项。

汪裕尧：是这样，毛泽东同斯诺谈话最早的一次是7月15日刚到保安不久，而毛泽东谈他个人的经历是11月将要离开陕北前。从这里可以看出，毛泽东向斯诺谈个人经历不是主动要谈，而是经过斯诺的再三要求之后才谈的。

访问人：那么，毛泽东谈个人经历的用意是什么？

汪裕尧：我理解，最直接的原因就是斯诺讲的以正视听。但毛泽东谈个人经历还有更深一层的用意，就是他想通过谈个人经历来展现中国革命发展的历史过程，他不仅谈个人的经历，而且着重叙述了中国革命的历史，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客观上毛泽东个人的经历也是和中国革命斗争紧密联系在一起。谈到后来，比如到红军长征时，他基本上不是谈自己，而是谈整个红军艰难困苦而又英勇悲壮的历史了。这就使外界的人们通过毛泽东个人的经历更真实更亲切地了解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的真面目。

访问人：你觉得毛泽东这篇谈话，表现了毛泽东的哪些品格？

汪裕尧：首先是他的实事求是精神，他把自己的思想变化过程，成长过程、参加革命过程都真实地实事求是地摆出来，毫不隐讳，非常坦率。他说，他小时候信过佛，也接受过孔夫子的教育，后来又接受过社会改良主义、无政府主义，开始并不知道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是十月革命后经过反复比较才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毛泽东并不认为自己是天生的马克思主义者，也没有把自己当作神，而是当作一个普通人，是在斗争中成长起来的，这一点在谈话中很清晰。这样的谈话使外界觉得很可信，很真实，非常具有说服力。第二，毛泽东把自己的成长过程作了辩证的分析，他不仅谈到顺利发展的一面，也谈到自己的沉浮，而且谈这些的时候，他是把自己完全溶合在中国革命的曲折发展过程中了。这就给人的印象是一个朴实的人，是一个真心实意为工农服务，为革命无私奉献的人，丝毫没有一点矫揉造作，也没有吹嘘自己，完全是敞开胸怀，让人们客观地看待和认识自己。第三，在毛泽东的谈话中，我们也会感到他的意志很坚强，他能面对那么多看来是难以克服的困难而不退缩，不怕任何挫折，坚持自己的信仰。我觉得这三点的确反映毛泽东的崇高人格。

访问人：这是《西行漫记》中最漂亮的一篇，影响也最大。

汪裕尧：给人看了后，是活生生的，非常真实可信。为什么《西行漫记》出版后在国内外引起那么大的震动，一方面是使人们了解了一处新天地，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使人们了解了在中国还有这么一批人，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那批人在真心实意地为中国人民大众谋利益，他们廉洁无私、艰苦奋斗的精神和国民党的腐败成了鲜明的对比，为中国人民带来了希望，所以有多少青年自觉奔向延安。毛泽东通过他自己的经历的确显示出了他的人格魅力。

毛泽东是如何做自我批评的？

访问人：毛泽东对斯诺谈他的个人经历的确使人印象很深刻，直到今天对广大青年说来还有教育意义。我们是否换个话题，毛泽东在谈他自己或其他问题时，做过自我批评吗？

汪裕尧：好的。毛泽东有没有自我批评，这方面的材料过去公开得少，人们对这方面的了解也不多，有时反倒使人有这样的印象：觉得他好像自我批评精神不够。我不这样看。就我接触的材料，我觉得可以这么说：毛泽东既是我党三大作风的倡导者，同时也是三大作风的力行者。他不是一个文过饰非的人，而是面对工作中的错误勇于承担责任，在坚持真理修正错误这方面，毛泽东仍然是我党的楷模。为了说明这一点，下面介绍一些材料。

最早的一篇是 1921 年 1 月 28 日给彭璜的信。其中说到：“弟两年半以来，几尽将修养工夫破坏：论理执极端，论人喜苛评，而深刻的自省工夫几乎全废。”“吾兄高志有勇，体力坚强，朋辈中所少。而有数缺点：一、言语欠爽快，态度欠明决，谦恭过多而真面过少。二、感情及意气用事而理智无权。三、时起猜疑，又不愿明释。四、观察批判，一以主观的而少客观的。五、略有不服善之处。六、略有虚荣心。七、略骄气。八、少自省，明于责人而暗于责己。九、少条理而多大言。十、自视过高，看事过易。”在谈了这几条以后他说：“兄之缺点，弟观察未必得当。然除一、三两条及第五条弟自信所犯不多外，其余弟一概都有。”接着又说：“兄常谓我意志强，实则我有自知自明：知最弱莫如我之意志！”这封信是毛泽东由民主主义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后，拿起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进行自我教育的一个例证。像这样的自我批评在那时年轻的人当中真是不多见的。

也许有人会说，这是毛泽东青年时代做的，到他成为党的领袖人物后，是不是还能保持犀利的自我批评精神呢？我再举下面几个材料。

一是我们在前面提到的 1936 年同斯诺的谈话。他在谈自己的人生经历时，充满了自我剖析的精神，不仅不隐讳自己过去信过佛，信仰过一些非马克思主义的东西，甚至于把自己当初很幼稚的观点也毫无保留他说出来，说他曾经主张让孙中山当总统，康有为当总理，梁启超当外交部长，而且讲他并不是常胜将军，也打过败仗，秋收起义就打了败仗，是受挫后才慢慢学会打仗的。

1957 年 7 月他和尤金谈话也谈过这个问题，说：我自己也犯过错误，由于我的过错，在战争中也打过败仗，如长沙土城战役就没打好。如果说我在基本上是正确的，我也很高兴了。

访问人：毛泽东这种诚恳对待自己的精神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汪裕尧：是的。毛泽东还讲过，他对孔夫子的“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随心所欲不逾距”的说法不以为然，他认为这是吹牛。他说世界上不存在生而知之、“不犯错误的圣人，只有学而知之、不犯或少犯大的错误的贤人。他从来不把自己看做圣人，最多把自己看成一个贤人。他在 1971 年 11 月接见武汉地区党政军领导人时说过，中国的第一圣人不是孔夫子，也不是我，我算一个贤人，是圣人的学生。所以他在早年讲到要立圣贤之志可能是从要做一个有作为的人这个一般意义上讲的。

第二个材料，是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在说到自己思想感情的变化时他说：“我是个学生出身的人，在学校养成了一种学生习惯，在一大群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的学生面前做一点劳动的事，比如自己挑行李吧，也觉得

不像样子。那时，我觉得世界上干净的人只有知识分子，工人农民总是比较脏的……革命了，同工人农民和革命军的战士在一起了，我逐渐熟悉他们，他们也逐渐熟悉了我。这时，只有在这时，我才根本地改变了资产阶级学校所教给我的那种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感情。这时，拿未曾改造的知识分子和工人农民比较，就觉得知识分子不干净了，最干净的还是工人农民，尽管他们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还是比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干净。”这段话虽然是用自己的经历来说服教育文艺工作者，但也确实是很动感情地剖析了自己，也是很好的自我批评。

访问人：延安时期毛泽东主动作自我批评还有两个很生动的例子：一个是挽救运动中冤枉了一些同志，他主动出来承担了责任，还脱帽赔礼道歉。再一个是有一次雷击死了人，有人说怪话，“为什么不打死毛泽东”，保卫部门要追查，他制止了，并通过这件事了解到是公粮征的多了，农民不满意，于是决定减轻农民负担。自己动手，克服困难，因而受到广大群众的拥护。这些事例都发生在民主革命时期，那么，建国以后毛泽东是否作过自我批评呢？

汪裕尧：建国后毛泽东作自我批评之所以为人们了解的少，是因为没有在较大的范围内传达。就我知道的材料可以介绍一下：

一次是1953年8月的全国财经会议上，对这次会议如何看，还可以讨论，薄老在他的书里对这次会议有详细的介绍。我这里只想说的是，毛泽东讲话中作了自我批评。他说，这次会议上许多同志都说要负责任，“我说我也要负责任，各有各的帐。我的错误在于：（1）抓得少，抓得迟，这是第一条，也是主要的一条。过去忙于土改，抗美援朝，‘三反’后应抓财经，抓了一些，但没有钻。我对财经工作生疏，是吃老资格的饭，过去一凭老资格，二凭过去的革命工作较丰富的经验，现在是建设时期，缺乏知识，未钻进去，要亡羊补牢。（2）统的死了，我也有份。我说过要统收统支，对统收我抓了，统支我没有抓紧，不注意。这一次会议提醒了我，要统一集中，但分级管理也是很必要的。（3）预算问题。去年十一月搞起，经过一月财经会议，中央也讨论了。预算中十六万亿是虚假数，我现在才知道。利润打的太多，支出的太多了。我虽然说了‘三道防线’——增产、节约、发行，但错误是报纸上公布的早了，应该慢慢来（苏联今年预算现在才公布），我也有急躁冒进。”此外，他还就查田定产、扫盲和失业人员登记工作中的错误作了自我批评。他说：“我是中央主席，都有我的份。这些错误，中央政治局在逐步的纠正中。”作为中央主席在大庭广众面前这样坦率地解剖自己，不能不使人感动。

访问人：从上述讲话里还可以感觉到，毛泽东为自己财经济工作生疏、未钻进去而自责，这个问题他在建国初就意识到了，后来他做了哪些努力？

汪裕尧：他承认自己在经济工作方面的不足，也为弥补这种不足作了努力。1959年庐山会议以后，在9月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他不无感慨他说：我也是个甚为不足的人，很有些时候我自己不喜欢自己，马克思主义各门学科没学好，外国文没学通，经济工作刚开始学，但我决心学，不死不休，对于这些我也要赶起，要进取，那时见马克思时我的心情会舒畅些。从这年12月开始到第二年2月，毛泽东组织了一个读书小组，先后在杭州、上海和广州读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社会主义部分。我们从他在此期间给李讷的信中也能感觉到他的心情。信中说：“现在每天读书、爬山，读的是经

济学，我下决心要搞通这门学问。”毛泽东为什么在这时下那么大功夫读书，就是因为在大跃进中碰了钉子，他觉得自己在这方面没搞通，才下这个决心的。在读书中，毛泽东联系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进行思考，总结经验，提出了一些很有价值的思想，提高了按客观经济规律办事的重要性的认识，这为后来他提倡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作了思想理论准备；

访问人：挺有意思的，土地革命时期毛泽东反对本本主义。建国后他在经济工作上碰了钉子，又向书本请教。

汪裕尧：毛泽东反对本本主义并不是不提倡读书，他酷爱读书而且坚持了一辈子，毛泽东为什么在 50 年代末 60 年代初下功夫研读并提倡领导干部研读政治经济学，是因为那时比较系统地阐述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只有苏联这部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但是他读这本书不是采取本本主义的态度，而是密切联系中国实际批判地学书中哪些东西可以肯定，哪些东西是不足取的，他都一一作出具体分析。毛泽东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社会主义部分时读的意见和体会已由当时参加读书小组的邓力群等同志整理出来，其中一部分已在 1992 和 1993 年《党的文献》上分期刊载，人们可以从中看到它的大貌。

访问人：在这以后，毛泽东还作过哪些自我批评？

汪裕尧：比较集中的是 1962 年的七千人大会。当年听传达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时，自己没有太注意毛泽东所作的自我批评，后来看到这篇讲话的记录整理稿，感到毛泽东当时的自我批评是很深刻的。他讲到：“去年六月十二号，在中央北京工作会议的最后一天，我讲了自己的缺点和错误。我说，请同志们传达到各省、各地方去。事后知道，许多地方没有传达。似乎我的错误就可以隐瞒，而且应该隐瞒。同志们，不能隐瞒。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的，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我不是要别人推卸责任，其他一些同志也有责任，但是第一个负责的应当是我。”这样的自我批评是很诚恳的。他还讲到：“如果有人问，有哪一位同志，比如说中央的任何同志，比如说我自己，对于中国革命的规律，在一开始的时候就完全认识了，那是吹牛，你们切记不要信，没有那回事。”关于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作用和意义，毛泽东还这样讲到：“批评和自我批评是一种方法，是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而且是唯一的方法。除此之外，没有别的方法。”毛泽东对待批评和自我批评的这种态度是很感人的，值得全党同志学习。毛泽东非常推崇鲁迅，认为自己的心和鲁迅是相通的，他说：我喜欢他的坦率，他说解剖自己往往严于解剖别人，在跌了几跤之后，我也往往如此，可是同志们往往不信，要人们相信确有个时间问题，过了多年之后，再回头看，人们会对毛泽东身上的这种崇高精神产生出敬佩之情。我想，对毛泽东有没有自我批评精神这一问题的回答，已尽在不言中了。

关于马克思主义修养和喜欢自己的哪些著

访问人：前面我们探讨了几个问题，这种探讨对了解毛泽东很有意义。我们想再问一个问题：在毛泽东谈自己的人生经历时，他是如何看待自己的马克思主义修养的？

汪裕尧：对马克思主义的修养，他自己有过一些回顾和记述。我们知道的最早的还是 1936 年同斯诺的谈话里。他说：“到了 1920 年夏天，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我已经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而且从此我也认为自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并且说：“1920 年冬天，我第一

次在政治上把工人们组织起来了，在这项工作中我开始受到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俄国革命历史的影响和指引。我第二次到北京期间，读了许多关于俄国情况的书。我热心地搜寻那时候能找到的为数不多的用中文写的共产主义书籍。有三本书特别深地铭刻在我的心中，建立起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后来他在1941年9月对妇女生活调查团的讲话中再一次谈到了这三本书，他说：“记得我在1920年，第一次看了考茨基的《阶级斗争》，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和一个英国人作的《社会主义史》，我才知道人类自有史以来就有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初步地得到认识问题的方法论”。“我只取了它四个字：‘阶级斗争’，老老实实地来开始研究实际的阶级斗争。”

如何理解这些话？当然不能把马克思主义仅仅归结为“阶级斗争”，那样理解就太窄了，但是阶级斗争学说无疑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阶级分析方法无疑是阶级社会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基本方法，毛泽东在这里正是从方法论意义上说的，是讲认识问题的方法。在中国人民摸索自己革命道路的实践中，认识到这种方法，不能不承认是历史的一大进步。至于建国后我们党在50年代后期犯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直到后来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严重错误，那是另外一个问题，不能因此归结为阶级斗争的观点完全要不得，阶级分析的方法也完全不能用了。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毛泽东是怎样把握马克思主义的精髓的，他的马克思主义修养的显著特点是什么。

访问人：我们同意您这个观点。到了延安时期，随着毛泽东思想体系的成熟，也逐渐被人们所理解。当人们提出“毛泽东思想”这个概念时，毛泽东是怎么对待的？

汪裕尧：毛泽东对自己的理论成就是比较谦虚的，他一再强调要端正对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强调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是他一生坚持的原则和方向。当一些理论工作者在1943年前后提出“毛泽东思想”概念时，他表示不赞成。他在1943年4月22日给何凯丰的信中曾说：“我的思想（马列）自觉没有成熟，还是学习时候，不是鼓吹时候，……因我的体系还没有成熟。”七大召开前，这个问题又提了出来，王稼祥、刘少奇等都发表了文章，特别是在七大上，正式把毛泽东思想作为党的一切工作的指导思想写入党章，因为是大家讨论，集体决议，毛泽东也同意了。1948年8月华北大学准备成立，吴玉章校长给周恩来发来电报，请示是否“把毛泽东思想改成毛泽东主义”，毛泽东立即给吴老写信，表示：“现在没有什么毛泽东主义，因此不能说毛泽东主义。”“另外，有些同志在刊物上将我的名字和马恩列斯并列，说成什么‘马恩列斯毛’，也是错误的。”建国初期，他多次将一些报告和文章中的“毛泽东思想”改为“毛泽东的著作”。1960年的军委扩大会议上，他在审阅报告中关于毛泽东思想的定义时，特意加了一句“在党和人民的集体奋斗中”，把它作为集体智慧的结晶。这些情况可以表明，毛泽东对待自己的理论成就是很慎重的，他不赞成过多的评价。

访问人：那么，他对自己的著作有哪些看法，就是说他喜欢哪些著作，不喜欢哪些著作？

汪裕尧：对他自己的著作，我体会有三类比较喜欢：一类是理论性逻辑性系统性较强的著作，如《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实践论》、《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共产党人〉发刊词》等，这些著作既有实

践经验的总结和概括，又有理论的创造，它逻辑严密，论述系统，文笔精采，层次分明，他在讲话中多次提到这些著作。当然他并没有直接的说自己写得怎么怎么好，只是经常提到这些著作，可以看出来他是喜欢的。第二类是战斗性强的檄文。如《丢掉幻想，准备斗争》等几篇评美国国务院白皮书的评论，对美帝国主义和它的走狗蒋介石集团，驳得淋漓尽致，痛快至极。逢先知同志曾介绍说，当年编《毛泽东选集》第四卷，老人家亲自审定，当读到这几篇评论时，越读越高兴，以至敞怀哈哈大笑。第三类，是调查报告，这也是他非常喜欢的，1930年他在《寻乌调查》中曾说，大革命时期作过的湘潭、湘乡等7个有系统的调查，但后来丢失了，“失掉别的任何东西，我不着急，失掉这些调查（特别是衡山、永新两个），使我时常念及，永久也不会忘记。”这些调查是毛泽东认识中国社会、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最基本的依据，从这些实际调查中，他得出了“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重要结论，找到了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必由之路。他那么看重《反对本本主义》，其原因也在这里。

访问人：是不是也有他不太喜欢的著作？

汪裕尧：是的。从他有关编辑《毛泽东选集》的一些书信中可以看出，他不太喜欢教科书式的著作。比如《矛盾论》，最初列入了《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的目录，毛泽东在审读中，觉得它太像哲学教科书，有些段落“词意不畅”，“以不加入此次选集为宜”。因此开始没有编入《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后来经过修改，先收入了《毛泽东选集》第二卷，1952年印行重排本时才移到了第一卷。这个情况，可以从一个侧面反映毛泽东不太喜欢什么样的著作，但绝不能因此得出《矛盾论》写得不好的结论。现在编入毛选第一卷的《矛盾论》，无疑是一篇重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今后仍应好好学习。

毛泽东对他的著作总是改了又改，力求达到完善的程度，奉献给读者以精品。以《论十大关系》一文为例，最初由陈伯达根据毛泽东的讲话记录整理过一个稿子，少奇同志提议作为中央文件下发，毛泽东虽同意下发，但并不满意，他要求在批语中说明是发下去征求意见，以后再作修改。在编辑毛选第五卷时，对这篇稿子反复进行了研究，很长时间弄不清是怎么回事。后来才知道是因为陈伯达整理的那个稿子，把他在讲话中以苏联的经验为鉴戒，用比较研究的方法批评苏联的许多地方抹掉了，所以整理出来的东西缺乏鲜明的针对性。弄清这个原因后，在胡乔木主持下，严格按照毛泽东讲话的原意，重新整理了一个稿子，由小平同志看后送给毛主席，毛主席看后立即批示同意，并指示先编入毛选第五卷。现在看，这篇著作确实提出了很好的思路，它是试图突破苏联模式，走自己的路的一个良好的开端。可惜因为多种原因，我们党当时没有能沿着这条路子走下去。

#### 虎气、猴气：毛泽东谈自己的性格

访问人：在毛泽东的谈话中，时不时也透露出对自己性格的话，您能否谈谈这方面的情况？

汪裕尧：直接的材料不很多，但从他的文章、谈话以及对一些问题的处理中可以看出他的性格特点和意志的。毛泽东的一生经历过许多斗争和风浪，他总是以一种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去迎接风浪、迎接挑战的，真可以说是天不怕、地不怕、鬼不怕。1915年9月，他向长沙各校发出征友启事，提出要结交能吃苦耐劳、意志坚定、随时准备为国捐躯的青年。在湖南省立第

一师范学习期间，他自觉锻炼体魄，进行日光浴、冷水浴、风浴、雨浴。他还发出过“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的豪言壮语。这些都反映了他的坚强意志和性格特点。后来在四一二大屠杀那样严重的白色恐怖下，他毫不低头，而是选择了武装反抗国民党的道路，除了由于他具有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外，也同他的意志和性格分不开的。也因为这样，他几次沉浮，不论受到怎样的打击从不改初衷。

毛泽东的这种性格，从游泳中也反映了出来，他把游泳不仅看作是锻炼身体，而且看作是磨练意志，越是大风大浪他越要去游泳，他说人类就是在大风大浪中锻炼出来的。这一点在他晚年和疾病作顽强的斗争中也充分地反映出来。1972年会见尼克松时，前一天晚上他曾休克，经医生抢救才醒过来。要见外宾了，医务人员做了好多准备，包括把强心针预先抽在针管里，以备急用。当工作人员把他扶起来见尼克松时，他不让搀扶，把旁边的人推开，和尼克松握了手。原来约定这次会见只谈15分钟，结果谈了65分钟，而且谈笑风生，展示了一个伟人的风度。这种坚强的意志和巨人的气魄，是很感人的，也充分反映了他的性格。访问人：这是毛泽东强的一面，也是人们能感觉到和看到的一面，他是否还有另外一面？

汪裕尧：所谓另一面，就是人们议论的虎气、猴气问题。这是他在1966年“文革”开始时给江青的信里谈到的一个问题，他说：“我是自信而又有些不自信。我少年时曾经说过：自信人生二百年，令当击水三千里。可见神气十足了。但又不很自信，总觉得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我就变成这样的大王了。但也不是折中主义，”在我身上有些虎气，是为主，也有些猴气，是为次”。我理解、所谓“虎气”，是讲他的原则性以及坚持原则的斗争精神。所谓“猴气”主要是讲执行原则时的策略上的灵活性。毛泽东为什么喜欢邓小平，赞赏邓小平，一个重要原因是邓小平在性格上有同他相似的特征，原则性很强。毛泽东曾对他说过，我赞成你那个钢铁公司，要柔中有钢；绵里藏针，外面是棉花团，里面是钢铁公司。毛泽东的性格就是这样，意志如钢，性格坚强，但又柔情似水，感情丰富。在对待犯错误的同志身上也能体现这一点。他批评人时要求很严格，在原则上丝毫不让步；可一旦你诚心改正错误，他又很宽容，给人以改正的机会。对待犯错误的同志要“治病救人”就是他提出来的。

他所说的“自信而又有些不自信”，我理解这里主要是指发动“文革”而言的。这里似可包含这样几层意思：（一）对于发动“文革”这件事，他自信是做得对的，是“完全必要的”和“非常及时的”，对于“文革”的大方向，他也自信是正确的；（二）对于“文革”发动阶段林彪把毛泽东著作吹得神乎其神不满意，但又不能不违心地同意那样做，因而担心“吹得越高，摔得越重”，在这方面又不那么自信。

访问人：“摔得越重”到底是谁？是指他自己，还是指林彪？

汪裕尧：我理解两方面的含义都有，既有被吹的人，也有吹的人。他已经感觉到这件事会要走向反面。但处于当时的情况，他觉得他那套意见不被周围大多数同志理解和接受，所以又想要一点个人崇拜。作为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不可能不懂得个人崇拜不是马克思主义的，这从他以后对林彪的“四个伟大”讨厌，批评“大树特树”等可以看出。但他觉得当时有这个需要，因而又“违心”地认可了。这正反映了当时他的一种矛盾心理。他的不自信包含的第三层意思是：对于“文革”能否取得成功没有十分的把握。

他首先从许多领导干部对“文革”“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中感到了这一点，后来又从他借以发动“文革”的依靠力量“红卫兵”的“过火”行动中感到了这一点，因此他在同阿尔巴尼亚国防部长巴卢库谈话时，就谈到了“文革”有两种可能性，可能成功也可能失败，还谈到要有几个月看眉目，一年见分晓。这样分析问题方法是他常用的方法，但也不能说不反映他当时的真实思想和心理状态。所谓“自信而又有些不自信”，我的理解，基本的是自信。这是一个伟人成就所必不可少的品质，毛泽东在这方面是很突出的，正因为有这种自信，才能排除万难去争取革命的胜利。又有些不自信，是指在某个时候、某些问题上。这种情况也不只是“文革”时才有，过去也有过。比如，建国后经济工作上的几次挫折，使他感到自己对经济工作不熟悉，对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还缺乏认识，在这方面他没有底，尽管他一再下决心要搞通经济学，但这门学问要搞通并不容易，所以遇到困难的时候，往往把陈云同志请出来，这也可看出他的不自信。

访问人：在毛泽东身上的不自信恐怕还有另外一些，包括对彭德怀的批判，他曾说，可能真理在你手里，也包括他后来对“文革”的三七开，都表露出他对这些问题有另外的思考。汪裕尧：这里有一个问题需要澄清一下。过去流传过一种说法，说编《毛泽东选集》的时候，毛泽东向斯大林提出派一个马列主义理论水平高的同志来中国，因为在理论上没有把握，后来斯大林派尤金到了中国。尤金来中国确有其事，也确实看过一部分编入毛选的稿子。但内中的原因并非流传的那样。1958年7月他同尤金当面说过：斯大林派学者来看文章，是不是我那样没有信心，连文章也要请你们来看，没有事情了吗？不是的，是请你们来中国看看，看看中国是真的马克思主义，还是假的马克思主义。你回去说了实话，说中国是真的马克思主义。

访问人：话说回来，毛泽东亲自发动了“文化大革命”并认为它的大方向是正确的，但他又说“这件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这多少也说明了他对“文革”的不自信。

汪裕尧，这已是“文革”后期的事了，我们谈话开始时引用的那段话是很能说明这个问题的。如果我们再深入地想一下，为什么毛泽东“自信而又有些不自信”，他的自信建立在什么基础上？我认为是建立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建立在相信群众力量的基础上，他不是盲目的。只要是认准了的事情他会坚持到底，不会随意改变的。

从这个角度看问题，我们就可以看到他在民主革命时期是怎样的坚定和自信，这和他在实际斗争中坚持调查研究，实事求是有很大关系，在对中国国情的认识上，对中国农民的了解上，他比别人认识得都早，都深刻，他能找到一条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是和他对中国社会的深刻了解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如果没有切身的感受和体会，就不可能那样满腔热情地来支持农民的革命行动，也很难说会摸索出一条正确的道路。所以他的自信，他对革命前途的信心，对抗战必胜的信念，对解放全中国的气魄，都是建立在调查研究基础上，而且在这个过程中，不论遇到多大的曲折，他本人受到什么样的待遇和挫折，都能使他自信心不减，坚持到底。

同样，他的不自信也是由于没有坚持调查研究，对真实情况缺乏深刻了解造成的。建国前夕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深刻指出：“严重的经济建设任务摆在我们面前，我们熟悉的东西有些快要闲起来了，我们不熟悉的东西正在强迫我们去做。这就是困难。”“我们必须克服困难，我们

必须学会自己不懂的东西。”应当说毛泽东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并为此付出许多的努力，也取得一定的成功。但是，由于国际国内许多复杂的原因，以及在处理这些问题上某些认识和决策上的错误，加上在调查研究上受到的限制，使他这方面的努力未能一贯到底，失去了对实际情况的真切了解，因而尽管他的本意是好的，是为国为民的，但实践的结果却事与愿违，必然是一场悲剧。访问人：这是人们不愿看到的，也是毛泽东不愿看到的，但历史规律终究是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汪裕尧：是这样。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认真地总结了这些历史经验，包括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经验，恢复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并借鉴了国际的经验，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创造性地解决中国面临的许多新的问题，形成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和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使我们国家的面貌发生了令人惊喜的变化。这是很可告慰于他老人家的。

1993年12月于前毛家湾

## 访林克——读书伴随了毛泽东一生

### 林克

林克，1925年生，江苏常州人。1949年北平京大经济系毕业。1954—1966年任毛泽东秘书。后任新华社国际部编辑组组长、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研究主任、中国西欧研究会副总干事、中国欧洲共同研究会常务理事等。主要著作有《人间毛泽东》、《世界经济概论》（合著）、《2000年中国的国际境》（合著）、《中国经济发展战略问题研究》（合著）等。

这是林克大病初愈后同我们谈的。说起毛泽东，滔滔不绝。他在毛泽东身边工作了12个春秋，要讲的话实在太多了。从什么地方谈起呢？我们围绕着毛泽东的读书谈了下面几个问题。都是切身的感受。

#### 开场白

访问人：您在毛泽东身边工作了十几年，除担任秘书，还教他学英文，毛泽东对您也有很好的评价，称您为“老师”。您是什么时候到他身边工作的？

林克：我是1954年秋到毛泽东办公室工作。前后有12个春秋。我教他学英文是附带的，主要是做他的国际问题秘书。我原来在新华社就是搞国际问题，所以组织上调我去，一方面考虑我既懂英文，另一个又搞过国际问题。开始我对做秘书工作有什么要求，该怎么做？心里没有底。毛泽东找我第一次谈话，记得是1954年11月在广州越秀山的游泳池畔。他在游泳后休息，想读英语，便让我坐在他身边的藤椅上。当时我的心情有些紧张。他先问我是什么地方的人，多大岁数？我回答我的祖籍江苏，童年生活在保定，“七七”事变后才举家迁移到北京的，他便谈到保定有个莲花池，原是为北洋军阀曹锟修的花园，然后又谈到曹锟用五千块银元一张选票的手段，收买五百名“猪仔议员”，贿选总统的丑事。交谈中，毛泽东神态安详，谈笑自若。使我的紧张心情很快平静下来了。

访问人：您到毛泽东身边工作，上班下班有规律吗？

林克：因为思想上有压力，平时大都住在中南海；很少回家，一年中又有半年跟随毛泽东在外面，在北京也是每星期回家一次，一年中满打满算也只有20几天在家里。那段时间由于教英文的关系，我和毛泽东接触较多。我教他学英文不是像学生上课一样，一般是先汇报工作，如最近有什么新闻和动态，他听后发一些议论，然后是学英文，学习当中碰到什么，又发起议论，就停下来听他讲，有时也插句嘴，和他谈论一番，接着再学。这样一般进行一两个小时，最长可学到七八个小时。所以有时三顿饭和他在一起吃，也有一顿、两顿饭的时候，还有吃不上的时候，因为时间都错开了，食堂过了开饭时间，外面饭馆也关门了。学习当中不管天文地理、古今中外、文学、历史、哲学，无所不谈。但这些谈话的内容大多数没有记下来，因为当时中央办公厅有个不成文的规定，要求在领导人身边工作的同志不能做记录。我这人本来是爱记东西的。也喜欢写日记，我当时私下曾作了一些简要的记录，留了下来。现在我已经整理出来，交给了中央文献研究室一份，主要是从1955年到1964年的日记，所谓日记也不是每天都记，比如下去时就没有记，只记了一些自己感到有意思的东西，也包括他的活动。

访问人：您的日记很有价值，对研究毛泽东的生平会有帮助，是无私的奉献。

林克：这是我在患癌症手术后整理的。原来的想法第一步先把日记、笔记等有关的东西整理出来；第二步再把已经出版的东西浏览一下，看都写了些什么内容，准确不准确，有可能引起我的兴趣。结果翻了一些出版物，发现一些问题，本来一些生活中的事情自己不想写，可现在有人写滥了，我觉得实在不真实，反而激起自己要写的念头。比如说我认为毛泽东一生简朴，但决不是苦行僧，现在有人把它写成像苦行僧一样，甚至像不食人间烟火的神仙，还说他在3年困难时期20天不吃一颗粮，长期吃野菜和菠菜充饥，还得了浮肿病，我看到很多书都这样照抄。我当时就在他身边，为了弄确实我还专门打电话问当时给毛泽东做保健的医生和护士长，他们说，根本没有这种事，如果我们使毛泽东得浮肿病，那我们就犯了大错误，是严重的失职，中央也不会允许。中央就设有保健局，配有保健医生，专门负责毛泽东的健康。他有一段时间不吃肉是真的，但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他的营养还是有保障的。我觉得主要是他的这种和人民同甘共苦的精神，但绝不能非把他说得浮肿病不可，这种搞法，弄不好不是走下神坛吗，反而在生活上让他又走向了神坛。毛泽东的食谱是很丰富的，不仅有各种蔬菜、辣椒、豆腐、芋头等，还有富春江的鲥鱼、金华火腿、桂鱼、冬笋、蘑菇等，在外地也品尝过广西的果子狸、广东的蛇肉等。虽然他吃得不多，对这些也无所要求，但营养总是有保证的。也有时为照顾大师傅，晚上不叫大师傅做饭，随便弄点就吃，这种情况也是有的，但不能把这些说成是他的日常生活就是如此，作为大师傅还是尽心尽责地为他做饭，包括晚上加餐。因为简朴，他对其他方面也不太讲究，不讲究衣着、式样，料子是棉的毛的都可以，但衣服要合体、整洁，穿起来比较宽松。他见外宾很重视礼仪，我从来没有见过他穿着带洞的袜子见外宾，有的书说他见外宾还缩着脚，不然就露馅了。搞得很庸俗，完全不真实。为什么要让毛泽东见外宾时还穿带洞的袜子，那你的责任心哪去了？不是说对工作完全负责吗？这等于自己把自己否定了，为毛泽东全心全意服务是假的。这些事别人不注意，还可能当笑话，觉得很有意思，可是我们这些在他身边工作的人就觉得这太不負責任，怎么能这样做呢？毛泽东在生活上不讲究，但很注意礼貌，特别是对外宾和民主党派人士，对内宾比较随便，但随便也没有到那种程度。他穿的内衣，我也没见过什么五颜六色的布补丁，毛巾被说是有几个洞，一捅就破，还在盖，哪有这事？旧毛巾被也是盖的，但不会有那么多补丁，这样的毛巾被能让他睡觉吗？他习惯盖毛巾被，冬天不盖被子，就盖四层毛巾被，这样比较贴身、舒适。他的屋子是恒温的，所以不会着凉。那些书上的描写是夸张和离奇的，很不真实。吃饭吃点小菜，这真实，但有客人来，包括留我吃饭，总让加个菜，那就够简单了。

访问人：您讲的这些很有意义，您在他身边那么多年，应该写出来，其实您的日记整理出来就很有价值。

林克：我是想将来把它整理出来，出一本书，但恐怕这些日记连他和我谈话的几分之一也没有。另外，我的脑子里也还记着一些东西。当时没有写，现在我也想把它们写出来。

访问人：您的日记最好还是保留原样为好，不通的或记得简单的地方可以用加注说明的办法，这样就更有价值了。

林克：那当然，日记也只能做些文字的整理，原意不动，我记错了也只能那样，现在说明就是了。

访问人：我记得毛泽东 1957 年 8 月给您写过一封信，其中说，“您需要学理论。兴趣有，似不甚浓厚，应当培养。慢慢读一点，引起兴趣，如倒淡蔗，渐入佳境，就好了”。这个意思是很好的。

林克：那年的 12 月还有一封信，嘱咐我要“钻到看书看报看刊物中去”。还说“广收博览，干你我都有益。略为偏重一点理论文章，逐步培养这方面的兴趣，是我的希望”。根据他的这个意思，最近我想写一篇“广收博览”的文章，主要写在毛泽东身边岁月的片断，后来我想干脆从他对青年人的教育的角度去写，或许更有意义。瞧，我们的谈话已经进入正题了，想谈些什么？

### 毛泽东为什么学英文？

访问人：我们首先想问毛泽东为什么学英文？据我们所知，毛泽东早在读书时期曾学过，但他对自己的英文成绩始终不满意，断断续续没有坚持下来，比较正规地学英文，还是您到他身边之后。

林克：毛泽东在年轻时对英文就有兴趣，他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时，在给黎锦熙的信中就提到，他现在学三门功课：英文、哲学和报刊，可能那时学的成绩并不怎么好，后来比较热衷于学社会科学和哲学，没有花更多的时间学英文。但我认为他学英文首先是出于兴趣，必须有浓厚的兴趣，如果根本没有兴趣，硬着头皮学是学不好的，像他这样忙的人，国家大事那么多，要集中力量学英文是很困难的。所以有浓厚的兴趣是首要的因素。有人说毛泽东学英文是因为斗争的需要，我觉得这种提法不太恰当，也不太合乎实际。

第二，他学英文的目的是为了开拓知识面，因为读理论方面的书是很枯燥的，如逻辑学及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他采用读英文版马列著作的方法，既学了英文，又学了理论，进一步加深了理解。如在读英文版《共产党宣言》序言时，其中有一段话“这些基本原理的实际运用，正如《宣言》中所说的，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读到这儿时，他说，可惜教条主义者不懂得这个道理。《宣言》序言中还有另一段话：“关于共产党人对各种反对党派的态度问题所提出的意见（第四章）虽然大体上至今还是正确的，但是由于政治形势已经完全改变，而当时所列举的那些党派大部分已被历史的发展进程所彻底扫除，所以这些意见在实践方面毕竟是过时了。”读到这里，毛泽东说，以中国的情形来看也是这样，从清朝的康梁保皇派到袁世凯、北洋军阀时期的研究系（后来的政学系）、吴佩孚、曹锟、段祺瑞、张作霖、青海的五马……都被历史的进程扫除了，惟有民族资产阶级的党派存在下来。他就是这样，既学英文，又从中学到理论，学习时他经常喜欢探讨，所以拓展知识面是他学英文的主要目的。他学英文是很认真的，一边学一边在书的天地、左右两边用削得很尖的铅笔注上字义。到晚年，看东西不太清楚了，就用大字、粗笔在上面反复注，如英文版《矛盾论》、《共产党宣言》从第一页到最末一页，都密密麻麻用很小的行草注满空白的地方。《矛盾论》的英译本他就先后学习过三遍，并在封皮的内页记下了三次阅读的时间：1956 年 5 月 10 日开始读第一遍；1959 年 10 月 31 日开始读第二遍；1961 年 10 月 9 日开始读第三遍。

第三是有坚强的毅力。像他这么大年纪，这种条件，如果没有毅力，学英文是很困难的。经常是有重要会议就打断了，但他还是利用一切机会坚持下来，有时一天学很长时间，也有时几天学不了。

访问人：没有固定时间？

林克：碰到开重要的会，就间断了。一般是起床后或睡觉前，也有是在游泳、散步结束后和我汇报工作时，在外地视察工作时，在火车、轮船和飞机上也利用时间学，时间有长有短。反正我每天要和他见面，选文件、送文件，他什么时候想学了就把我叫来。

毛泽东有很强的求知欲，就读书来讲，党的领导人中没有一个人能超过他，恐怕近代革命家中像他这样强烈求知的人，也是不多的。他又和那些革命家不一样，他已经领导建成了一个国家，国事非常繁重，在这种情况下，还坚持读书，不仅学英文，还读别的，这本身就是很不简单的事。号召领导同志学外文，他曾提倡了几次，但多数人学了几次就放下了，他是一直坚持学到底，虽然他的英语能力远没有达到像其他方面知识那么深，当然这也和他过去的基础有关。

但在学英文上他也有独到的特点，一是记忆力非常强，有时几年不读了，有些单词还能记起来；再一个是他对文法结构很清楚，理解能力也很强，他曾提到英文似乎应该改造一下，不要太烦琐，提出现在没有一部好的汉英词典或英汉词典，他常常喜欢把英语同汉语的语法、修辞作比较，或者提出问题进行讨论。他说：“我学英语是为了研究语言，用英语用汉语比较。如有机会，我还想学点日文。”后来由于工作实在太忙，学习日语的愿望未能实现。

访问人：您教毛泽东学英文，主要是对话，还是讲词义？

林克：主要是阅读，阅读中有的单词念错了，我再纠正。这里我要讲到第四点，就是在学习问题上毛泽东非常谦虚。应该说从各方面他都是我的老师，可在学英文上我当他的老师。他说，你当我的老师有什么不对，我读错了，理解错了，你就及时给我指出来。在学习中，他也从来没有过什么不好意思，大声朗读，一遍不行，读两遍、三遍、四遍。不懂就问，让怎么念就怎么念。不仅学英文，他学其他东西也有这个特点，一篇好的文章都要重复学几遍，既有博览，又有精读。

所以，他后来的英文程度可以达到阅读一般文章、报刊消息，有时碰到生字，就借助字典。

访问人：毛泽东学英文，还有什么和别人不一样的特点？

林克：他学英文的办法和别人不一样，因为他是政治人物，对政治特别熟，所以这方面的知识很丰富。他不是从什么牛、羊、猫、狗一类单词学起，而是适应他自己的特点，选择一些时事消息，短的评论读起，这样生字、词也少一点，以后英文提高了，再读长一些的政治文章。

访问人：您刚去时，他的英文是什么程度？

林克：只会简单的词汇，会话也只会说“你好”“早晨好”一类的话。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他能看中国出版的英文杂志，因为这些刊物比较适合中国读者的要求，还不是 pure English（纯英文），另外有些文章能比较顺利地阅读了。有时接见外宾，他还拿起一篇英文的东西读起来，听起来还比较准确，外宾感到很惊讶。其实他的发音不太准，湖南口音太重，年龄大了也难纠正。

访问人：在 20 年代毛泽东对苏联很感兴趣，还提出要留俄，后来又曾到苏联访问，他为什么不学俄文，而是突发奇想要学英文呢？

林克：我觉得主要因素是兴趣，因为他早有这个兴趣。当然还有另外的情况，比如对苏联的东西我们翻译得比较多，翻译力量也很强，相比之下，

西方的东西翻译得较少，他想通过直接阅读英文，更多地了解西方的情况。

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因素，毛泽东的思想是很开放的，他对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社会科学及自然科学有浓厚的兴趣，他也想借助学英语，更多地了解这方面的知识。

访问人：他为什么在 1954 年想起要找个英文教师学英语？

林克：我想，可能是对外交流慢慢多起来了，客观上有了这种需要。有人就问过我毛泽东学英语的目的，我认为多方面的。有人说是为了斗争的需要，我不赞成这样看。他学了英文难道是去直接和资产阶级辩论吗？不是这样。我看还是上面我讲的，一是他对学英语有兴趣，一是扩大知识面。借助学英语，使一些比较枯燥的学习，换一种方式，更能有效果。另外，这也是一种特殊的休息，看书、看文件看累了，会议开累了，接见外宾累了，就让我和他读英文，一读英文，脑子都钻到单词、句子里去了，其他别的不想了，也就得到了休息。有时他睡不着觉，也把我找来读一会儿，读着读着打起鼾来了。这是一种特殊的休息，也可说是毛泽东式的休息。所以，毛泽东学英语的目的是多方面的，不是单纯只有一个目的。

毛泽东读过哪些外国书？

访问人：这又涉及到毛泽东是不是开放的，他学英语是如此，读外国书恐怕也是如此。你觉得这样说对不对？

林克：大体可以这么说。在对待西方文化上，毛泽东是很开放的。至于他读过哪些外国书？就我的接触，有这么几类：一类是马列经典，一类是西方古典社会学和经济学，他和我讲过，他读过严复编译的《天演论》，亚当·斯密的《原富》，还有卢梭的《民约论》，以及一些经济学著作。但他好像没有讲到近代的社会学和经济学著作，所以他读的西方经济学和社会学都是比较古典的，近代的相对少一些。当然后来他从杂志上也作了一些弥补，他订有 10 几份理论杂志，10 几份报纸，让我也订 6 份。10 几份报纸中，有 6 份中文报、6 份港澳台报，让我经常选些报刊上的理论文章拿给他看。他还比较喜欢看《光明日报》，因为《光明日报》开有“文学遗产”栏，现在我还保留有他批阅过的少数原件和复印件。

访问人：看来毛泽东对理论方面的文章很感兴趣。

林克，特别感兴趣。我给他选过一些理论文章，现在有的保留下来了，有的没有保留下来，面很广，数量也很大，有的我也记不清了，因为那时我对理论的东西不是特别感兴趣，这同我原来的专业有关，主要研究国际形势。所以他那封给我的信中说：“兴趣有，似不甚浓厚，应当培养。”这比较合乎我的实际。以后我就注意钻研理论，还作了一些笔记。

在毛泽东读书当中，哲学占了很大比重，从中国到外国，哲学是他学习的重点，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的《毛泽东哲学批注集》是他读的哲学书中的一部分，就这样也可以看出毛泽东对哲学的重视了，他始终对哲学有浓厚兴趣。

访问人：毛泽东读马恩列斯的著作的情况怎样？

林克：从青年时代起，毛泽东就如饥似渴的学习马列著作，最早的是《共产党宣言》，由于那时出版条件的限制，在中国翻译出版的不多，但也是找到多少读多少。除《共产党宣言》以外，他读过《反杜林论》、《哥达纲领批判》、《政治经济学批判》、《资本论》，列宁的《国家与革命》、《两个策略》、《“左派”幼稚病》《帝国主义论》等，还有斯大林的《苏联社

会主义经济问题》，斯大林这本书，他单独和我学习过一遍，让我把要点标出来，有什么问题也标出来，他看后又作了很多符号。

访问人：我们见到毛泽东读斯大林这本书有三个版本，都有批注和圈点。

林克：在读这本书的过程中，他还对我谈论过他的看法，给我印象特别深的有两点：一是斯大林虽然承认社会主义有矛盾，但比较勉强，不认为有对抗，说社会主义矛盾不会发展到对抗，毛泽东认为不然，在那段话旁边打了几个问号。二是讲到商品生产和商品经济，斯大林不承认生产资料是商品，毛泽东认为，斯大林的这个看法不对，生产资料也应该属于商品范畴，发展商品生产也应包括生产资料。在 1958 年 11 月的第一次郑州会议上，毛泽东对商品经济讲了一大段话，阐述了他的观点。访问人：有人认为马克思的《资本论》他没有读过。

林克：是不是读完了我不好说，但他肯定读过《资本论》，现在中南海毛泽东的书房里就存有他读《资本论》留下的手迹，有批注和圈点。毛泽东读书有个特点，他在考虑某个问题时，就找来相关的书读某个章节。比如《列宁全集》他不一定通读过，但其中的重要文章如《帝国主义论》、《国家与革命》、《“左派”幼稚病》等都写有便条，让我找来给他阅读。《哥达纲领批判》、《政治经济学批判》，在学英文时就跟我读过，《共产党宣言》不止读一遍。访问人：对外国的历史著作毛泽东重视吗？林克：这也是他读外国书的一个方面，不仅重视而且非常熟悉。他在和外宾的谈话中，往往讲出这些国家的某段历史，有些连外宾自己都不熟悉。对一般的历史，如美国史、法国史、英国史，他都能自如地谈论，尤其资产阶级革命的历史，哪一年发生的，哪一年出了什么大事，他的记忆力非常好，这给我的印象很深。

访问人：对日本的历史情况如何，是不是也很熟悉？

林克：他对日本相当熟悉，因为中日文化交流源远流长，在文化上也是相通的。有次他和我说到鉴真 6 次东渡扶桑，传播佛教。并赞扬鉴真的不屈不挠精神，说他前 5 次都失败了，最后第 6 次到了日本，眼睛也瞎了，认为鉴真对传播佛教以及中日文化和技术起了很大作用。最近我去日本，到奈良参观了唐招提寺。里面珍藏着鉴真大师像，见了那里的 92 岁高龄的森本孝顺长者，和他说起毛泽东上面的话，这位长者很感兴趣。

在读历史方面，毛泽东还喜欢读外国人的传记，读得相当多而且熟悉，早年读了，晚年也还读。还经常谈论起《戴高乐回忆录》、《艾登回忆录》、《阿登纳回忆录》等。他对戴高乐的看法和别人不一样，认为戴高乐有民族精神。所以他对外国历史相当熟悉，各国的历史知识非常丰富。

访问人：对外国的专门历史著作也读过吗？

林克：他的书房里就有英国著名作家威尔斯的《世界史纲》，原来放在他的床上，是经常翻的。他读历史，即读通史，如世界通史、西洋史、欧洲史，也读个别的国史，如上面说到的美国史、法国史、英国史等。

访问人：1950 年新区土改时，毛泽东给刘少奇有封信，其中就谈到中国的土地改革和法国、日本的情况不同，可见他对这些国家的历史很清楚。在其他方面是什么情况，林克：再就是逻辑学，50 年代末 60 年代初，是毛泽东读逻辑比较集中的时期，因为 1958 年发生了一场关于逻辑学的论战，主要是在周谷城和马特之间进行的，他们的文章刊登在《人民日报》和《哲学研究》等报刊上。以这个问题为契机，他让我找来几本逻辑书阅读，我记得找过三、四本，有中文的，也有英文的。我还记得人民大学的王方名在《教

学研究》上发表关于逻辑学的文章后，他特别感兴趣。

宗教的书也读过，他和我说起他读过《圣经》，还说，《圣经》不仅是基督教经典，文字也很优美，是著名的文学名著。我说我也喜欢，在大学时我就当作文学著作读过。但关于《圣经》的内容和评价没有细说。

访问人：伊斯兰教的《古兰经》、佛教的《金刚经》等，他也读过吗？  
林克：《古兰经》不记得他说起，但现在一般的说法他读过。佛教的《大藏经》、《金刚经》他读过，关于六祖禅宗的故事，他和我说过多次，对慧能评价很高，特别赞赏他的革新精神，说他不要教条、不要清规戒律，还背出慧能的那首偈：“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这个精神是和他的性格相通的。他还给我专门解释了这首偈的背景，说慧能本来是做下等粗活的，文化不高，几乎不识字，但他的悟性好，在听人诵《金刚般若经》后，才发心学佛，投禅宗第五世祖弘忍门下，弘忍便将禅法秘诀授于他，并付法衣，这也就是“继承衣钵”的出典。这个故事，毛泽东多次提到。

访问人：关于外国文学方面的书，他读过哪些？

林克：相对讲，毛泽东对外国文学读得较少，但也读过一些，我就听他讲到早年读过希腊罗马时代的小说，还有《茶花女》、《简·爱》、《红与黑》都读过。给我印象比较深的是他对我谈起苏联肖洛霍夫《被开垦的处女地》，那是在1958年大跃进出了问题后，有一次和我谈起这篇小说，他说：别人的经验还不能变成自己的经验，自己没有实践经验还不能得到教训。像苏联《被开垦的处女地》里描写的，地主富农都被扫地出门，造成了社会紧张和生产力的破坏。类似现象我们也发生过，如中央苏区时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都造成了失误。现在有人又对农民搞剥夺，刮“共产风”，瞎指挥。这些在《处女地》里都写了，不少人也看过，但就是不能吸取教训，看来没有自己的经验有时还是不能取得教训。比较起来，毛泽东对外国文学方面的书读得少一些。我个人很爱读小说，从中学到大学，不论中国小说，还是西方的小说都读了很多，他要和我谈起来，话题是很多的。他和我谈论过《三国演义》、《西游记》、《水浒传》、《红楼梦》、《金瓶梅》、《西厢记》、《牡丹亭》等等中国文学作品。但他就是很少和我谈西方文学作品，不知为什么。对外国的诗歌也是这样，我不记得他谈过雪莱、拜伦、歌德、席勒的诗歌。对诗，他有个特点，喜欢古诗不爱看白话诗，臧克家讲过这个问题，说他虽然不愿看白话诗，但提倡写白话诗。毛泽东和我说起时，就更坦率了，大概也没有什么忌讳，他说，让我看白话诗，给我一百块大洋我也不看。

访问人：可能嫌没味。林克：意思是那东西不叫诗，诗读起来应该朗朗上口。

毛泽东读书的特点访问人：从毛泽东本身看，他是矛盾的结合体。林克：我认为他是很矛盾的，所以不能说他很传统很封闭，无论从文化的角度，外交的角度。还是从思想、从经济的角度，他都不是封闭的。这和他的文化背景有关。如外交上，在延安时期就对美国做工作，还提出要到美国访问，他的思想一直比较开放。对苏联的经验，既有接受的东西，也有反对的东西。我对他总的印象是，各种学说、各种思想，都广收博览、取其精华、独立思考、为我所用。访问人，在读书上，他是不是一个时期有所侧重？林克：这是他读书的一个特点。如在写《实践论》《矛盾论》时，他就读了大量苏联

的和中国的哲学著作。 1954年搞宪法时，他就让田家英、大逢（指逢先知）和我找过各种西方的宪法书籍，有英、法、美、日及苏联的宪法，这些书找来后他都看了，在上面作了圈点。再如1957年4月修改《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稿，他就集中思考这个问题，晚上睡不着觉，把我找来，说要给各省市党委发个电报，内容我都记下来了，很详细，其中说：“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各地正在讨论。请将党内党外赞成反对两方面的意见，你们自己的意见，你们对整个形势的估计，地县两级态度如何；你们委员会和书记处或党组是否深刻地多次地讨论了这个问题，第一书记和中央一级党员部长或副部长（指党外人士当部长的那些部）是否自己将这个极重要的思想政治工作问题认真抓起来了，还是依然委托二三把手去管，自己仍和过去那样不大去动脑筋，第一书记和各书记和各党员部长或副部长将报纸刊物和学校管起来没有，看过报纸刊物上有关这类问题的文章没有，重要社论在发表之前你们看过没有，动笔修改过没有，党和党外人士（主要是知识界）问的不正常的紧张气氛是否有了一些缓和，你们对人民闹事采取了什么态度，党内某些人中存在的国民党作风（即把人民当敌人，采取打击压迫方法，所谓人民民主，所谓群众路线，所谓和群众打成一片，所谓关心群众疾苦，对于这些人说来，只是骗人的空话，即是说党内有一部分人存在着反动的反人民的思想作风）是否开始有所变化，你们向学校学生和工厂工人做过讲演没有，做过几次，效果如何，以上各项问题，请即写成报告，在接此电报以后15天内用电报发来。”想得非常细，毛泽东就是这个特点，一个阶段抓住一个问题，有一个侧重点，就集中思考，集中看相关的书籍材料，这两个方面是并行不悖的。

当然，也不是绝对的，并不是一个时期只看一个方面的书，其他一点不着。对有兴趣的书，如史学、文学也还是经常看的。他自己就讲过，他穿插读了一些古希腊罗马时期的文学小说。另外，毛泽东经常读书是不是仅仅是个兴趣，这个问题也需要探讨，很难说死，但他对文史哲一生始终有浓厚的兴趣。

访问人：是否应该说，兴趣是主要原因？

林克：还不能这么说，如对哲学就不仅是个兴趣问题；对文学也不单单是个兴趣问题，他往往从哲学和政治的角度来看，从社会发展史的角度来看，而不是单纯从文学欣赏来看。

访问人：大概和他担任的职务及身分有关系。

林克：所以，毛泽东读书和别人不一样，他往往把读书和现实社会或历史哲学联系起来思考一些问题。这是毛泽东读书的另一个特点。

比如，他经常和我说到这样一些命题（我后来知道，他早年也是这样看的）：生就是死，死就是生；劳就是逸，逸又是劳；和平是战争，战争又是和平。他的看法有时和常人截然不同。有一次，他问我：你说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是侵略性的，还是防御性的？问得很突然，我一时答不上来。那时对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是一片谴责，别人不会想这个问题，但他就想。从这点上看，他又是非常现实的，不像我们有个概念后就认定了老是这样。为什么他经常变化呢？他是感到客观情况有了变化，他的思想也跟着变化。在莫斯科会议前就谈到到底谁怕谁多一点？到底帝国主义会不会发动战争？经常提这些大问题，让我回答，也促使我思考一些问题，他在那封信里，要我注意多学理论，就是不仅要从表面形势上考虑问题，而且从理论上、战略上考虑问题。

我觉得毛泽东确实有独到之处。访问人：向你提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问题，他作了解释没有？

林克：讲了他的看法，他认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既是防御性的，也是侵略性的，他说，假如我们强大起来，它就可能是防御性的，因为它怕“共产主义细菌”，如果我们尽出波、匈事件，那么就可能是进攻性的。他的思想是辩证的，非常有道理。

我记得，50年代我刚到毛泽东身边不久，他就提出要我注意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发展的情况，后来我从外交部要了一个关于拉美国家的人口、面积等基本情况的统计表，我还给他找了关于亚非基本情况的小册子，送给他看了，他看后在一些重要国家打了圈，作了记号，并把这些国家总人口、总面积加起来，作个统计。他的意图是在这些材料的基础上形成一个整体概念，看它在世界上有多大的影响和作用。所以，他的思路是比较开放的。最近，我作了一次讲演，题目是《从毛泽东到邓小平对于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我的总的观点是继承和发展的关系。我讲了三点：一、相同和基本相同，如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相同的；二、有些差异或较大差异，我提差异没有提相反，其实差异就包含这个意思了，如人民公社问题，毛在时是要维护那种体制，现在是完全废除，这就完全不同。三、邓小平的新发展，如一国两制，还有关于经济特区、经济开发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都是新时期的新发展。

#### 对毛泽东晚年失误的分析

访问人：对毛泽东晚年的失误，您怎么看？有人说，他的失误主要在阶级斗争问题上，他的整个哲学思想就是世界要动，不断变革，因此给他概括为斗争的哲学。

林克：我认为，毛泽东的失误，主要是在理论上出现偏差，主要有三点：一是对过渡时期的认识估计得太长，过渡时期的主要矛盾又认为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斗争，因此导致阶级斗争扩大化，这些斗争由党外到党内，又由党内到党外，三反五反、反右派，是党外，庐山会议批判彭德怀是党内，最后形成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基本路线；第二是急于求成，他的思想老在变，使别人总有赶不上趟的感觉，总想在有生之年使中国富强起来，急于改变中国的落后面貌，就对别人不大放心，在理论上虽然对生产力、生产关系两个方面都讲过，但实际工作中偏重于在生产关系上的变革，而对发展生产力的力量不够；第三，是国际的原因，中国一直受压，受别人的包围封锁，先是美帝国主义的禁运，后有中苏分歧以至冲突，无论美苏都曾想要对我国动用核武器，1958年金门事件时，美国就要动用核武器，1969年苏联也要动用核武器，毛泽东是有骨气的，他不怕这些，但这在客观上为他的理论的偏“左”提供了外部条件。毛泽东对治乱有他和别人不一样的看法，“大乱达到大治”，他不是随便讲的，是根据历史上的兴衰变化总结出的规律。但问题出在哪？不论“文革”中，还是“文革”前，毛泽东都讲过阴暗面，就是党内的腐化变质问题，现在这些现象仍然存在。解决这个问题，毛泽东采用了群众运动的办法，最后还是没有解决，反而走向了失误。我认为解决这个问题应当采取法治的办法，而不是人治，他是用人治，靠个人的号召力、个人的威望魅力来解决。他又是一个很有魅力的人，年轻时讲的一些话就很一鸣惊人，“读奇书、做奇事、做奇人”，作为一个农家出身的人，那么年轻就有这种抱负确实是少有的。但用这个办法，不能治理一个国家，特别是一

个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的人口众多的大国。我看毛泽东晚年失误的原因，主要是这些。总之，我认为毛泽东是 20 世纪中国大地上崛起的世界伟人，他改变了中国的面貌，影响了世界的历史进程，尽管他也有过严重的失误和挫折，但他的丰功伟绩是永存的。他对我的教诲使我受益终生，他的音容笑貌时常还出现在我的脑海，不仅是我，整个中国人民都不会忘记他。

1993 年 3 月 14 日于北京羊坊店

## 访齐得平——本世纪最珍贵的档案文献 齐得平

齐得平，1933年生，河北平山人。1950年到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处做档案工作。1961年起专做泽东、刘少奇手稿的保管和研究。中央档案馆研馆员，曾任手稿科科长，中共中央档案资料保管副处长，利用部副主任。参加了《毛泽东书信手选》、《毛泽东题词墨迹选》、《毛泽东手书古诗选》的编辑。发表有《亲切的回忆深情的嘉勉》、《诚挚的友谊》、《谈毛泽东书信的收集》等章。

齐得平有辨证毛泽东手迹专家之称，由于工作关系，我们同他经常联系。近水楼台先得月，便有了这篇有意思的文字。看了这篇谈话，您会觉得——毛泽东研究的领域大得很呢！

### 关于毛泽东手稿、文稿概况

访问人：据我们所知，广大读者对毛泽东的手稿、资料的有关情况，包括它的收集、整理以及保管非常关心，您长期从事这项工作，获得了一些研究成果，能否给我们谈谈这方面的一些情况？

齐得平：可以。关于毛泽东的文稿，包括他的手稿、抄件、讲话记录和报刊上发表的文章等，有几万件，如果每件平均1000字，就是几千万字。这是毛泽东给我们留下的一份非常宝贵的精神财富，尤其是毛泽东手稿是宝中之宝，是无价之室。他老人家一生读书不辍、著述不辍，基本上都可在这几万件文稿中得到反映。

访问人：有一次，听王明哲同志说，毛泽东的文稿有4万多件，这比你的估计要多一些。

齐得平：是算法不同的缘故。王明哲同志说4万多件，其中包括毛泽东阅览的部分文电和报刊。

访问人：毛泽东的手稿，保存最早的是哪一年的？

齐得平：1912年学生时代一篇作文《商鞅徙木立信论》和1913年的《讲堂录》，这是建国后征集的。在我们党的档案中，能大量见到毛泽东的手稿是1940年以后的事。1939年以前个别的也有，比如1922年6月20日致施复亮并团中央的信，1931年7月30日准备攻击东固，龙冈的决定，8月8日消灭龙冈之敌的命令，1937年5月在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作的结论《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1938年2月23日毛泽东起草的《战略意见》等，总之，留存下来的手稿是很少的，大量的的是电报抄件。

访问人：1937年、1938年毛泽东的书信已经有手稿了。齐得平：毛泽东的书信好多是后来收集的。现在我馆收藏的毛泽东1913—1939年的书信有50多封。信发出去，有心人会留下，也就保存了下来。电报稿的情况不同，全部是在我们党的档案文件中保存的。我曾问过搞秘书工作的老同志，为什么毛泽东的电报手稿在1939年前很少，1940年以后才多了起来？他们说，那时有个为了携带方便和保密的规定，凡是发出的电报，都集中抄在本子上，原稿烧掉。到1940年，大概由于环境好了一点的缘故，不再把电报原稿烧掉，而是保留下来。访问人：这是谁讲的？齐得平：这是原来在中央办公厅秘书局工作的常可均同志说的，他在那儿工作了许多年，60年代曾调到中央档案馆工作。我觉得他说的合情合理。访问人：看来这个违反保密制度，是坏事变成了好事，为我们后来保管和整理党的文献提供了方便。齐得平：这确

实是为后人编辑出版党中央、军委和毛泽东的文献保留了最可靠的依据。毛泽东起草的电报和文件不只用他自己的名字，而多是用中央的名义，军委的名义，还有几个人联名的，如“毛朱王”“毛周”“洛毛”“彭毛”或以别人的名义发出的。毛泽东的手稿保存下来，一看就明白是毛泽东起草的。1939年以前的就难办，除了中央会议记录上记载的毛泽东的发言，或写明致×××电为毛泽东起草的外，大量的署名“中央”“军委”的电报，还有几个人联名的电报，就不好确定是不是毛泽东起草的了。访问人：二战时期的就更加难办，从1927年毛泽东上井冈山，到1935年10月到达陕北，只有少数几份毛泽东手稿。有些电报尽管多人署名，但其中毕竟还有不少是毛泽东起草的。最难办的有些文稿署的名字不是毛泽东，但根据当时的情况分析，极可能是毛泽东起草的，同时这些文稿又很重要，比如，四渡赤水是毛泽东的得意之笔，但查遍毛泽东的所有档案只有两份非常简单的电报。大量的电报都是朱德等署名发布的。非常遗憾！

齐得平：这是很难办的，只能从逻辑上、思想、语言特色上去分析，毛泽东的东西和其他领导人不一样，有他的特色，但分析总归是分析，还不能更直接更确凿地认定哪一份电报是毛泽东起草的。这是1939年以前没有保留下手稿给我们今天造成的困难。

#### 毛泽东书体的发展和演变

访问人：根据你多年的接触和研究，毛泽东书法的演变过程大体可以分为几个阶段，如早期是什么模样，二战、抗战、解放，直至建国后各是什么模样？

齐得平：根据我的观察，毛泽东书法的演变，可以分为三个阶段。青年时代可谓第一阶段。这一阶段我馆收藏的1920年前的30多封书信的手迹，多为楷书，字体工整有力，有些写的特别工整，如《商鞅徙本立信论》，《讲堂录》中的“离骚经”，1916年1月28日和1916年2月19日给萧子升的两封信，1917年春为萧子升读书札记写的《一切入一》序、1919年春给日本白浪滔天的信，1918年8月11日给罗学瓚的信，1919年4月28日给七、八舅父的信等。充分体现了青年时代毛泽东书法功底之深。其字形1916年前略长，之后字型略扁。

1921年到1949年，可谓第二阶段。在建党初期，特别是在三、四十年代那战火纷飞的环境中，他运筹帷幄，起草文电时的注意力是如何把党建设好，把军队建设好，把根据地建设好，领导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推翻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建立新中国，而不在书法。为使机要人员传达准确迅速无误，他起草的文电多是行（书）而不是草。从他写下的大量文电中，也可以看出他的书体是在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发展变化着。如1922年6月给施复亮并团中央的信，1923年9月给青年团中央的信等，同以前相比，又有变化，变的有点像后来的字形。从我馆收藏的手迹看，毛泽东书体在30年代中后期已独具风格。如1936年读《辩证法唯物论教程》的批注，1937年致范长江的信、致文运昌的信等，字体清秀，字形略长，上下自左向右略有倾斜。1941年以后变为自右向左略有倾斜，如1941年致毛岸英、毛岸青的信及其前后起草的大量文电等。以后还在不断变化。

1949年进北京以后，可谓第三阶段。进北京后，情况变了，条件好了，老人家除起草公务活动的文电外，还写了一千多封回复亲朋故旧和宿不相识的群众的信。从中可以看到他的字越写越好，越写越草。然而，他的复信是

视对象而别。给高级民主人士、老先生、科学家、教授等的书信多为草书，有些写得非常之草。反之，对文化程度低的人，字都写得比较清楚工整。

访问人：毛泽东的字变化显著的是哪几年？

齐得平：毛泽东的书体，从学生时代到五、六十年代有很大变化。一般来说，年代相隔越远，其变化越是明显，然而，其变化又是逐步的。时间相离越近，其变化越不明显。但是，细心观察是可以看出其变化轨迹的。除前边说的以外，明显的变化我认为就属 50 年代了。一个不知道毛泽东青年时代字体的人，用来同他五、六十年代的手迹相比，就不晓得是出自他一个人之手了。

访问人：是不是有笔的问题，比如说买了一批好笔，写出的字比较清秀？

齐得平：笔有关系。新笔写的字笔锋更明显更突出。我看主要还是他的功力和字体变化。毛泽东的字体变化，除从其总体上观察外，还有一个明显的变化，就是他的签名，你们看 1943 年以前“毛泽东”的这些签名，“毛”字一般都是从上面下来，再这么一转，一笔写出来。1943 年以后，“毛”字写成四笔，先点三点，然后竖弯勾，分四笔写出来。到 1948 年、1949 年，又变了，从 1948 年 2 月他修改中央一个文件时写的几封信到 1949 年 9 月给宋庆龄的信、任弼时的信，“毛泽东”三个字同以前相比，“毛”字变化不大，“泽东”二字变化比较大。

50 年代以后，毛泽东的字又发生变化，写得非常之好看。

访问人：这是不是和他 50 年代以后练字有关系？

齐得平：有关系。进城以后，毛泽东的工作虽仍然十分繁忙，但客观条件比进城前好多了，可以看到历代书法家的碑帖，当时中办秘书室陈秉忱同志就专门为毛泽东购买书籍，收集字帖，收藏各种碑帖数百部。50 年代毛泽东休息时书写了数百首古诗词，一首诗往往书写 5、6 次，6、7 次，甚至 10 来次。他作诗词也多是书写许多次，多为草书，而且很规范。毛泽东的书法最好的时期是 50 年代末到 60 年代初，例如他书写的诗词，给华罗庚、章士钊的信件等，都非常漂亮，非常之美，达到自然传神之境地。一位朋友对我说，看毛泽东手迹是一种享受，看过后再看，还想看，每看一遍都受到启迪。

访问人：毛泽东练书法，他主要学哪家的字体？

齐得平：从我馆收藏的毛泽东 1920 年以前的手迹，特别是 1916 年前的手迹看，他青年时代习魏碑，1949 年进城后他收集阅览了历代名家字帖。我以为他是博采众长，不是专门摹仿哪个人，毛泽东之所以成为深受广大读者喜爱的现代书法家，一个是他的勤奋，有好的功底，再一个是他吸收了古人前人的长处，继承了中国书法艺术的传统，写出了自己的风格。我看毛泽东的字，谁的也不是，是自成体系，就是他自己的，可以叫“毛”体。

访问人：研究毛泽东字体的变化，有什么意义和用处吗？

齐得平：书法是一种艺术。研究毛泽东书法，可以得到启迪，就毛泽东手稿的管理工作来说，搞清楚他的字体变化，对判定毛泽东写的文电和书信的年代有很大用处，在毛泽东起草的文件、电报和他的书信里，有许多当时没有留下年代，只写了月日，有些只写明日，连月份也没有写，个别的连日也没有。我们在整理这些文件时，碰到的最大问题就是首先判定年代。准确判定一个文件的写成时间，才能知道它当时起的作用，也才能在现在继续发挥它的作用。判定年代一个是考证文件内容，还有一个就是看他的字体变化。比如 1943 年 12 月 24 日给刘少奇的信，原件没有写年，只有月日，从内容看，

写这封信，肯定是刘少奇在延安，不可能是刘少奇还在华中或其他地方的时候，刘少奇是1943年1月初回到延安，这封信应是1943年或1944年的；从毛泽东的字体看，放在1943年也比较合适。但这样还不能完全肯定，究竟是1943年的还是1944年的？我又拿来其他的文件对照，结果发现，1943年12月24日同一天，毛泽东还给彭德怀写了一份电报，用纸完全一样，字也完全一样。最后定为1943年12月24日。又比如给符定一的两封信，是1976年8月吉林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整理图书时，从一本线装书的夹页里发现经吉林省委办公厅交来的。这两封信，一封年月日全有，写的是1936年11月28日，附有信封，写的是“剑英同志转陈符字澄先生收 毛寄”。另一封没有年代，只有月日，为9月30日。从字体看，我认为这两封信不是1936年的，而应是1946年的。为了判定这两封信的写成年代，1981年我还曾向1946年在北平执行部工作过的中直党委书记刘华峰同志请教，他同意我的看法。1983年编辑《毛泽东书信手迹选》时，准备收入9月30日那封信，还是把它当作1936年的。我反复看了信的原稿，仍觉得9月30日那一封的笔体不是1936年的，应是1946年的，但我手头没有资料可查，不知道符定一具体历史情况，他究竟哪一年去过延安或和毛泽东联系过。1983年3月召开专家会议讨论书稿时，我在会上把这些疑问提了出来，并建议向符先生的家属调查。随后，中央文献研究室找到符定一之女符德芳，得知其父1946年夏应毛泽东的邀请到延安。不久其父先回北平，稍后她回北平时带了毛泽东9月30日给符定一的这封信。调查结果证明我的看法是对的。这样的例子是不少的，如果熟悉了毛泽东字体的变化，对他那些不好判定年代的文件，大致可以划定年代。访问人：除从文件内容考证和从字体变化判定这两个方面以外，还有没有其他的参考证据？

齐得平：还有一个方面，就是从毛泽东书写用的材料上加以判定。比如1947年1月16日给陈 昆的信，这封信原来也没有年代，从内容和字体看，不早于1945年，也不应是1948年，1946年也不是，因为他这时还在张家口，没到延安。于是我拿出当时的文件一对照，和1947年同时写的几份文件在用纸上对上了，上下宽窄，裁纸的刀口也对上了，毛泽东在那一段时间用的是同样的纸，这也是比较准确的。又如，1943年毛泽东为劳动英雄的题词，个人交来时有不同说法，有说是1941年的，有说是1942年的，有说是1943年的，前后相差3年。但从所用材料看，都是写在印好的同一规格的布质奖状上的，字体相同，像是同时写的，不可能相隔3年。于是我查了西北局的有关档案，又查阅了延安的《解放日报》。1943年2月3日《解放日报》登载了毛泽东为王震等21位劳动英雄的题词，题词内容也对上了，这就判定了这些题词的年代。

总之，从文件内容考证，毛泽东字体判定，再加上用纸和其他材料的参考，毛泽东手稿的大致年代一般能判定了，这为我们整理、编辑和研究毛泽东的文稿提供了条件。

### 毛泽东手稿保管工作沿革

访问人：你从哪一年开始接触毛泽东手稿？

齐得平：我原来在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处（1954年改名为秘书局）工作，秘书处住在中南海外，分管文件和历史档案，1954年经党中央批准实行文电合一管理。这是我们党的文书档案工作的一项重大改革。随后我们到中央办公厅接收了1949年以前党中央的历史电报，我就是从那时开始接触毛泽东

手稿的。接收之后，我们将这个时期的文电重新进行了整理。

访问人：在这段整理档案中，你们把毛泽东的手稿单独分出来了吗？

齐得平：还没有。1959年中央档案馆成立，我跟随我保管的中央档案一起进馆。为编辑《毛泽东选集》第四卷提供文稿，1959年底，中央档案馆副馆长裴桐让我把1945年8月日本投降至1949年9月前的毛泽东讲话搞一个目录出来，我照办了。新年过后，中共中央档案保管部30多人全体动员，突击搞了一个月，把解放战争时期的所有文件全部查了一遍，把毛泽东起草的全部文件都做了卡片，编了目录，并推荐提供了许多文稿给编委会。这个工作完成以后，档案馆领导决定把毛泽东的手稿单独管起来，一同考虑的还有刘少奇的手稿。领导决定让我作这项工作。从这时开始，毛泽东的手稿专门有人管了，我的一生也就交给了毛泽东手稿的管理工作，除在“文革”一段时间外，我一直做这个工作。

访问人：领导上让你管理毛泽东手稿，当时给你交待了什么任务，或工作内容一类的项目吗？

齐得平：为做好这项工作，领导曾召开会议具体研究如何做好手稿的管理问题。裴桐同志提出：“一、全面收集毛主席、刘主席的著作（手稿与非手稿）与反映两个主席思想的材料（按收集手稿著作范围），目前要为《毛选》增订版和刘少奇同志选集收集稿件。二、熟悉两个主席的历史和他们的著作，研究他们的重要著作中的思想发展，汇编材料。三、整理编目，编制参考工具书，保证查找工作进行。四、保护原稿，作好保管工作。”几十年来，我一直是按这个要求工作的。

后来，在“文革”中，我也受到冲击，给扣了“盗窃机密”的帽子，还被开大会批斗。这些不说了，反正后来平了反。我于1969年1月到江西中办五七干校劳动，一直到1975年才又回到馆里来。这时的机构全变了，原来的中央部、国家部都没有了，我被分配在业务组工作，参加解放前后的中央档案的保管工作。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曾三等老领导回馆来主持工作，将机构作了调整，成立了中央处、国家处。处下设科，手稿科就是这时成立的，我任手稿科科长，专门保管和整理毛泽东手稿。这时，档案接收也越来越多，毛泽东手稿的数量也大大增加，亟需整理。我根据“文革”前的经验，提出整理方案，将毛泽东文稿分为九类：一是毛泽东起草或署名的文电，他修改的文电和同别的领导人联合署名故文电；二是毛泽东的文章和他修改的别人的文章；三是毛泽东的书信；四是毛泽东的题字题词；五是毛泽东的自作诗词，代别人修改的诗词和书写的古诗词；六是毛泽东的讲话稿和记录稿；七是毛泽东的选集、文集；八是毛泽东阅批的图书；九是他的其他手迹。这个方案经馆领导批准实行。

访问人：你觉得，毛泽东手稿的保管工作是不是非常重要？

齐得平：我一直做这个工作，我清楚，非常重要，毛泽东手稿是我党一笔非常宝贵的精神财富。为什么这样说呢？首先，毛泽东不是一般人，也不是一般的领导人，他是我们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通过他的手稿可以反映他一生的活动，也反映了党的主要活动。再一个，从毛泽东思想发展史讲，这也是毛泽东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体现，反映这个结合的，最能体现的还是他留下的大量手稿和文件。还有一点，就是我们保管好毛泽东文稿的目的是为了用，用它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为出版毛泽东著作坚持和正确宣传毛泽东思想服务。为了说明这项工作的重要性，下边介绍

一些情况，或许对了解这项工作的重要性是有益的。

在60年代初，为增订《毛泽东选集》，我向领导推荐了毛泽东于1941年写的一篇重要文章，毛泽东非常重视此文，他看后批给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彭真、陈毅等同志传阅。在批示中写道：“这篇文章是在延安写的，曾经送给刘少奇、任弼时两同志看过，没有发表。送出去后也就忘记了。1964年有人从档案馆里找出这篇文章的原稿，送给我看，方才记起确有这回事。”后来我看到毛主席他老人家的这个批示高兴极了。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80年代初，我汇集了《毛泽东未发表的关于批评与自我批评的部分论述》、《为什么（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由六届七中全会通过？》。这两份资料刊登在我馆编印的供中央领导同志参考的内部刊物上。前者说明毛泽东对自己是一分为二的，它有助于正确的评价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功过；后者是我党历史上一次成功的经验。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本来是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1982年，我发现毛泽东1963年修改的一篇文章中亲笔写下的“社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马克思主义的科学论断，十分高兴，立即向领导作了汇报，将毛主席的这一手迹复印报送中央。根据中央领导同志指示，中共中央党校《理论动态》出专刊发表了这一手迹，当时在党校学习的老同志争相传阅。毛主席这一科学论断的手迹“受到中央领导同志和思想理论界的重视”。

1983年初，我在刚从一个单位接收来的档案中发现毛泽东1965年在《农村调查》一书清样中，亲笔写的一篇关于认识论的按语，推荐给中央文献研究室，该室领导很重视。为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90周年，我同我馆耿仲琳同志多次研究，于1983年12月将毛泽东同志1941年写的一篇重要文章中关于自由是必然的认识和世界的改造一段编印在本馆供领导参考的内部刊物上，胡乔木同志看后即批示在1983年12月25日《人民日报》上发表。以上两件，1986年以《错误的认识往往是正确的先导》、《自由是必然的认识和世界的改造》为题收入《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中。

长期的工作，我深感从事毛泽东手稿的管理工作是很荣幸的，任务是艰巨的，要做好这项工作是不容易的。要做好这项工作，要充分认识它的重要性，要熟悉研究文稿内容，除根据有关部门的要求作好服务外，在了解到有关部门或社会需要的情况下，还可以主动地有目的地向有关部门提供所需要的有关文献资料，更好地发挥毛泽东文稿的作用。因此，我觉得这一工作，是一项非常有意义的工作。

#### 关于毛泽东手稿的保存

访问人：我们想再问一个问题，这也是广大读者十分关心的，就是毛泽东的手稿形成已经有50年，甚至70年时间长了，现在保存情况怎么样？

齐得平：可以让大家放心，毛泽东手稿保护得非常好，有专人管理，专库存放，为了保护原稿，同时也为了研究和提供查阅，我们不仅搞了复制件，还搞了缩微，非经特别允许是不动用原稿的。

访问人：从保存的角度讲，毛泽东手稿可以保存多少年？

齐得平：如果不出意外，大部分保存几百年没有问题。因为毛泽东手稿的用纸多是宣纸，在所有纸品中，宣纸是最好的，手稿绝大多数是用毛笔写的，所以可以长期保存。为了保存好这些珍贵档案，保管条件现在有了很大改善，基本上做到了恒温恒湿。总之，广大热心的读者可以放心。

访问人：谢谢您告诉我们这些情况。  
1993年5月15日于前毛家湾

## 访高菊村——毛泽东和韶山“情结”

### 高菊村

高菊村，1936年生，湖南汨罗人。自1965年起一直在韶山工作，曾任韶山毛泽东同志纪念馆馆长，现任湖南省韶山管理局副局长、湖南中共党史学会副会长、湖南毛泽东思想研究会常务理事。主编的著作有：《青年毛泽东》、《韶山吟——古今名人墨客咏韶山》、《风景名胜·韶山》、《毛泽东故土家族探秘》等。

韶山因毛泽东而闻名，还是韶山养育了毛泽东？恐怕不是一两句活能说清的。湖南人说，韶山出了个毛泽东，陕北人说，中国出了个毛泽东。我们还是借用高菊村的话：毛泽东——韶山，日月同辉！这篇访谈录是我们趁高菊村来京出差的机会采访到的。

韶山给了毛泽东很多

访问人：毛泽东生于韶山，长于韶山，但他不仅仅属于韶山，而属于中国，在某种意义上说，又属于世界。韶山因为他的出现而闻名中外，走向繁荣。那么韶山曾给了他什么？

高菊村：韶山给他的东西很多，对他的影响深远。可以说，没有韶山昔日的影响，就没有今天的毛泽东，他在韶山的经历，关系到他的一生。他在这里诞生，从这里启程；他的思想、个性、人格，在这里奠定根基，起源发迹。

访问人：请说说少年毛泽东的思想、性格的问题。

高菊村：毛泽东的童年和少年，在韶山度过，1910年秋快满17岁才离开。对于他这段历史情况和故事，已有许多宣传介绍，然而对他当时的思想性格，却缺乏应有的重视和研究。我也是近几年来才注意到它。我认为，少年毛泽东的思想、性格的根本内核是：思想上，爱国爱民，忧国忧民，立志救国救民；性格上，刻苦追求，奋发上进，从不屈辱盲从——这便是独立思考、勇敢抗争。

访问人：他当时这种思想、性格是怎样形成的？

高菊村：这就离不开社会环境，韶山的人和事。具体说来有6个方面。

第一，外祖母家。我先讲这个，人们也许会感到意外和奇怪；但殊不知这正是毛泽东经历中的第一个特点和优点。毛泽东出生时，父亲毛顺生仍是贫穷潦倒；母亲文氏，娘家湘乡唐家（今后韶山市），虔诚信佛，生育不顺，头两胎夭折。毛泽东出世后，父母深感生活无奈，尤恐先例重演，故此，毛顺生外出当兵，文氏抱毛泽东回娘家寄养，直到毛泽东8岁才接了回来。当时文家已是四世同堂、40余口的大家庭，又属小康之家，书香门第，更有优良的家风。这家风一是坚韧不拔、勤劳精细的治家作风；二是行善好施、乐观开朗的人生态度，人人都有一颗善良、纯朴的心，真诚相处，温顺和谐。毛泽东的外祖母、母亲和童年毛泽东深受这文氏家风之影响。同时，毛泽东在文家七、八年，颇受长辈爱护、器重，加之他聪明可爱，被人视为宝贝。舅舅在家办私塾，经常带他在身边，他成了一个特殊的“旁听生”，所受的教益比正式生还多。优越的环境和优厚的待遇，常使毛泽东称心如意，乐而无忧，难免产生某种优越感。他在同辈或同龄孩子中，往往不是被羡慕，便是遭妒嫉，也难免时有口角和“纠纷”。这一切，不能不影响到他思想性格的发展，使毛泽东得到最初的锻炼。

这个情节说明：毛泽东在受父亲、毛家、毛氏家族影响之前，先接受了

母亲、文家的影响，在学会恨之前，先学会了爱，在认识假恶丑之前，先认识了真善美，在产生忧患意识之前，先有了乐观向上。唐家 的生活，使他获得了对人生的重要的第一印象，获得了日后反抗活动的初始依据和初始动力，萌生了最为朴素的善恶观、从而为他回到韶山冲以后，不断地与父亲、族长抗争，打下了根基。

访问人：这个情况的确很特别，也鲜为人知，但又重要。请说第二个方面。

高菊村：第二，父亲母亲。母亲文氏，上面已经提到，她的优良品德及对毛泽东的影响，已广为人知。她是一个典型的贤妻良母，一生勤俭、善良、无私、大度，对人怜悯、同情，对毛泽东的影响特大，毛泽东对母亲十分孝顺、敬重。这些都不多说了。在这里我要借此机会，对毛父顺生及其给予毛泽东之影响，多说几句。

我认为，过去人们对毛顺生的了解是很肤浅而片面的，宣传也是不很公道、客观的。对他过分苛贬，失于偏颇。他固然有专制、自私和对人刻薄、粗暴的消极一面，但这是次要的一面。他更有勤劳、节俭、精明、能干的积极一面，也是主要的一面。这一面还包括他的强悍、武勇、坚韧不屈的性格，无畏、果敢的胆量气魄，奋发进取、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以及他的商品经济意识和经商发家之道。而这些对当时一个普通的中国农民来说，真是难能可贵！又恰恰是这些，对毛泽东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他的身上始终可见毛顺生的影子。

即使毛顺生的消极一面，也给毛泽东带来了积极的反响。少年毛泽东常常自觉不自觉地以文家、母亲对比毛家、父亲，以前者的乐善好施对比后者的刻薄自私，以文家的自由活泼对比毛家的专制压抑，这，正是整个少年时期毛泽东父子间充满火药味的基因。文氏对丈夫只有温顺，而毛泽东对父亲的弱点却是坚决地抵制和斗争；毛泽东的抗争虽未也不能克服父亲的阴暗面，但使自己得到了难得的磨而。

所以我说，少年毛泽东正是在父母的交互溶磨中塑造出来的：父亲给他以棱角，母亲给他以光环，他既扬弃了父亲的自私、刻薄，又保留了父亲的坚强、勇敢；他既接受了母亲的善良、无私，又抛弃了母亲的逆来顺受。他是阳刚、阴柔兼备的伟人！

访问人：你的观点值得重视。全面、准确、科学地评价毛泽东的父亲，成为研究工作者应该重视的一个方面。看来我们应该为毛父“恢复名誉”。还有影响毛泽东的第三个方面呢？

高菊村：第三，毛氏家族。毛姓源于周文王第8子：“郑”，史称“毛伯郑”。毛氏家族历尽沧桑，由中原到江浙，再到江西，明洪武年间，毛太华及其子，从江西经云南到湖南湘乡，最后定居韶山，开韶山毛氏家族之先河，自大华公到毛泽东计20代。这个家族，系韶山最大的家族，组织、制度非常严密，严然是个“小王国”。它的总祠堂——“毛氏宗祠”，分祠堂——几个“公祠”，有如“宫殿”；它的历修族谱，类似“宪法”，族谱所载《家规》、《家训》、《家戒》、《家劝》等，如同法规、法令。这些虽然基本属于封建的东西，但是也有其精华。如规定：敬养父母，友爱兄弟，严于教子，婚丧喜庆不骄奢，不溺女婴，体恤孤儿寡妇，和睦乡邻等；严戒：游荡，赌博，偷盗，酗酒，迷信风水、强占他人财产等；劝行：培植心田，品行端正，奋志芳窗，勤劳务本，等等。这些，多少体现了民族精神、传统

文化和社会公德，曾为少年毛泽东所吸收和效法。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和韶山的毛氏家族，在历史上出了不少的名人，如毛遂、毛亨、毛萇、毛延寿、毛贵、毛伯温、毛晋、毛奇龄、毛有庆、毛正明、毛恩毅等。毛尔达、毛彝生、毛兰芳等在主持修族谱时，不仅对他们都有所载入，而且把韶山的风景和神话、传说写了进去，并配上诗词或骈文，致使本属正儿八经的儒书，染上了难得的文艺色彩和浪漫气息。于是，这本毛氏子孙必读之书，毛泽东更为喜读，并受益匪浅，1959年6月回韶时，还点名要看。

访问人：毛泽东当年看过的族谱还在吗？毛氏家族共修过几次族谱？

高菊村：韶山毛氏家族共修过4次族谱，毛泽东1959年看的是四修（1941年）。这些族谱都已珍存。

第四，蒙馆塾师。毛泽东1959年回韶山祭拜父母坟墓后说：生我者父母，教我者党，人民，老师、朋友也。这老师，也包括了他的蒙馆——私塾老师。所以，他那次请父老乡亲吃饭。就请了当年的塾师，并一一敬酒。当敬到塾师毛字居（堂兄）时，毛字居激动他说：主席敬酒岂敢岂敢！毛泽东即席作答：敬老尊贤应该应该！少年毛泽东在韶山，读过6年私塾，换过7个塾址和6位塾师。

访问人：真是“打游击”一样！为什么换得如此频繁？6位塾师中哪位对毛泽东影响最大？

高菊村：应该说，每个私塾、每位塾师都曾使毛泽东获得益处，如文化基础，历史知识，还有古文写作和书法。他熟读先生点教的“四书”、“五经”，但他不喜欢经书，爱看中国古典小说；他如饥似渴地汲取，但强烈的求知欲望远远难以满足。同时，他很不满意当时的学制和教学方式。他一生中最后也是最好的、对他影响最大的一位塾师，就是毛麓钟。麓钟先生世居东茅塘（毛泽东祖居地），是毛泽东的堂怕父，“韶山冲唯一的秀才”。他才高学斗，品德高尚。他曾游幕江浙，目睹中日甲午战争给中华民族带来的严重创伤，深知清廷之不可救药，乃愤而归乡，在自己家里续办“面山楼”私塾，决心造就下一代，以资救国救民。因此，他办学的方式与前辈迥异，吸收了若干新学成分，将亲身经历的“国耻”引入教学内容，以励学生为国读书。毛泽东于1910年上半年在其门下就读，使他眼界大开，爱国爱民意识更浓，其收获超过了以前的几年。

还有一位，虽然不是毛泽东的正式塾师，但给毛泽东的影响不亚于毛麓钟，那就是李漱清先生。他家住毛泽东家以北三、四里处，比毛泽东大21岁，早期在外地进的是新学堂，思想激进，回乡后大谈维新变法，以拯救中国，主张废除祠堂、庙宇，建立新学，培养救国人才。毛泽东十分钦佩，经常趋前请教，结为忘年之交，并从他那里第一次听到了维新救国的道理，读了不少维新变法的书刊。这时，毛泽东不但有了爱国主义、民本思想的萌芽，而且有了救国救民方法的启蒙。

访问人：中共韶山支部首批党员、5位烈士之一李耿侯，是不是就是他的儿子？

高菊村：是的。李漱清帮助毛泽东走出了韶山，15年后，毛泽东又引导李漱清的儿子走向了革命的道路，培养其成为韶山农运的领导骨干。这也是“毛泽东与韶山”辩证关系的一个逻辑反映。下面。我继续谈韶山对毛泽东的影响。

第五，乡土文化。由于自然地理和社会历史的特殊原因，中国传统文化在韶山的具体体现，内容极为丰富而典型，并为本地文化相融合而形成独具特色的乡土文化。少年毛泽东正是在这种浓郁的文化氛围中度过，受其影响殊深。例如说“儒”和“佛”，在韶山均颇盛行，少年毛泽东既受影响，又有扬弃，充满着矛盾、复杂情况。因我有专著和专文，在此就不说了。

第六，阶级斗争。这可说是毛泽东与韶山关系中的一根红线。韶山的社会状况和阶级斗争，是中国社会的一个具体的表现，对少年毛泽东思想性格的初成，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这是个带实质性的问题。因为它比较广为人知，我就点到为止吧！访问人：不，有两个问题还得请说说。一是毛泽东少年时期韶山的土地占有情况；二是哪一两件阶级斗争的事实对当时的毛泽东影响最深？

高菊村：毛泽东少年时期韶山各阶级的土地占有情况暂无资料可查，但在解放前：仅占人口6.5%的地主、富农，却占去土地60%。而占人口71%的贫雇农，仅占土地5.8%。韶山最大的官僚地主成涤泉的弟弟和儿子6人，共有良田1万余亩，占了韶山水田面积1/7。

解放前，韶山冲有70%以上的贫苦农民靠讨米、做工为生。迫于生活，19世纪末、20世纪初，韶山人民多次掀起自发的反抗斗争。对少年毛泽东影响最大的是1910年上半年的长沙“饥民暴动”、韶山内外闹“平崇”、“吃大户”的运动。毛泽东不仅耳闻目睹这些斗争实际，而且还亲身参加了与封建地主兼族长毛鸿宾的斗争，加之一些带爱国色彩新书报刊的启迪；毛泽东的思想触动很大。他后来回忆说：这些事给我“留下了磨灭不掉的印象”，有的事“影响了我的一生”。从这时起，我“开始有了一定的政治觉悟”，深为国家和民族的前途而忧虑，为人民的痛苦而不安。我认定“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救国救民”是自己的“天职”。“所以我说，毛泽东思想、性格之基牢牢奠在韶山，毛泽东之根深深植在韶山。

#### 毛泽东对韶山的馈给

访问人：韶山既然对毛泽东有这么大的恩赐，那么毛泽东对韶山有何反馈？

高菊村：说到反馈，我想讲三点：一是毛泽东把自己的整个精力和全家6位亲人的宝贵生命，献给了包括父老乡亲在内的全国人民；二是对韶山和韶山人民感情深厚；三是对亲属、亲戚、同宗、同学、同乡关怀备至，要求严格。三者概括起来：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培养了“韶山精神”。

关于第一点，众所周知；关于第二点，表现有三：

其一，多次回韶山。1910年秋到1918年夏，毛泽东在外地求学期间回去的次数很多，之后也不少，最主要有：1921年春回来教育全家亲人干革命，1925年2—8月在韶山领导开展农民运动，1927年初考察韶山农运，还有解放后1959年和1966年两次回韶山。

其二，书信频传。迄今为止，我们发现和掌握的毛泽东在各个时期给韶山和有关人士的信件达80余封，其中有不少封已被收入《毛泽东书信选集》；随书信或托人向亲人、老师、同学、朋友赠款的不下30次。

其三，邀人上京。在解放后，毛泽东邀集或同意去北京见面的乡亲达60人次，他把他们请到自己的住处，同席共餐，连夜叙旧，调查了解情况，临别时还要赠送些生活用品。毛泽东所赠送的这些钱物，都是从自己稿费中开支的。

访问人：韶山是否有人凭借与毛泽东的关系享受特权的？

高菊村：韶山毛泽东的亲属、亲戚等因毛泽东的关系，被引导参加革命并作出牺牲的有，而且不少；但凭借毛泽东的关系捞到特殊权益者一个也没有。毛泽东对亲人、乡亲的关怀、爱护是深沉的，也是全面的，但主要是政治思想上的关心爱护，对他们的要求极为严格。他曾在致文表兄的信中写道：“我为全社会出一些力，是把我十分敬爱的外祖父家及我家乡一切穷苦人包括在内的；我眷念我外祖父家诸兄弟子侄，及一切穷苦同乡。”在给当地组织的信中又写道：我外祖父家的人“都要同乡里众人一样”，任何人都“不应特殊”。“他们是劳动人民，又是我的亲戚，我是爱他们的”，正“因为我爱他们，我希望他们进步”，“完全和众人一样，不能有任何特殊。”

访问人：难道韶山在物质上，也没有因为毛泽东而得什么特别的好处吗？

高菊村：这种特别的好处，不能说没有。例如：因为是毛泽东的家乡，上面在经费、物资分配上适当照顾点，外地支援和优待点，这是有的。尤其是在“文革”期间，这里送拖拉机，那里送卡车，还由红卫兵倡议，经中央批准，修建了一段（22公里长）通往韶山的铁路。

访问人：当时毛泽东知道同意吗？

高菊村：毛泽东在1966年冬开始修筑时是不知道的，是由周恩来批准同意的；1967年通车前夕才知道，并不同意选在他生日那天（12月26日）举行通车典礼。你们提问这个事使我联想到另几件事，即公路、故居和“自力更生”指示问题。50—60年代，湖南和湘潭党政组织决定修路，将湘潭—韶山公路改直加宽，毛泽东知道后，不同意这样做，直到去年至今年才完全实现。解放初，省市决定给毛泽东重建旧居，一切准备就绪，毛泽东知道了，勒令停工，不准兴建；1959年回来时，又有人请示他要不要把旧居修理一下，他回答：不要花钱，最好让地方上的人去住，房子无人住容易坏。现在，故居红匾为小平同志题写，基本上保持了原貌。“自力更生”指示事，发生在70年代初。当时有人请求国家直接资助韶山·生产建设，毛泽东知道后指示：韶山应该艰苦奋斗，自力更生，不应由国家直接拨款。

访问人：我们还是回到精神方面来。你前面提到“韶山精神”，请问：什么叫“韶山精神”？它与毛泽东有何关系？

高菊村：1991年3月11日至12日，江泽民总书记来到韶山。他在参观过程中，曾3次高声背诵1959年毛泽东的《七律·到韶山》，当他诵到“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一句时，情绪尤为激昂。指出：这就是“韶山精神”。韶山精神就是“奋斗，牺牲，奉献，进取”。并挥笔题词：“发扬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的革命精神！”至于它与毛泽东的关系，可以说，韶山精神是韶山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在革命斗争实践中形成的，是韶山148位烈士用鲜血凝成的，也是毛泽东的直接作用和毛泽东思想哺育的结果。

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半个多世纪以来，韶山党政组织和人民，坚持、发扬韶山精神，为中国的革命战争作出了重要贡献，并建设了社会主义新农村。尤其是近10余年来，在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和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的领导下，坚持党的基本路线，走改革开放的道路，使韶山精神得到了大弘扬。

斯人已去，今日韶山

访问人：毛泽东已去世快17年，今年又是他诞辰100周年，现在的韶山

怎么样？

高菊村：现在的韶山，真可谓是：社会稳定，经济繁荣，人民生活不断提高，来韶观众日益增多。

访问人：据说，韶山观众曾有过大起大落，对吗？

高菊村：对。自毛泽东故居 1950 年开放以来，共接待近 3000 万观众，其中外宾、华侨、同胞 16 万人。 3 000 万，这是个充满起伏、波浪的历年累计数。 1965 年 20 万， 1966 年剧增至 290 万； 1978 年遽然下降至 70 万， 1980 年猛跌到 23 万； 1981 年开始回升，至 1989 年 65 万， 1990 年 91 万， 1991 年 105 万， 1992 年 108 万。

访问人：有人说，韶山年观众数如同“政治寒暑表”，你同意吗？

高菊村：如果加以认真思索，这个比拟不无道理。

访问人：现在韶山观众通过参观，反映最强烈的是什么？

高菊村：现在，韶山每天有数以千计的观众、游人。一般来说，他们通过参观、游览，反映最强烈的有三点：

第一是毛泽东的清正廉洁、无私奉献。许多观众含着热泪参观纪念馆“毛泽东同志的革命家庭”展览和“毛泽东同志在中南海丰泽园故居复原陈列”。人们深为毛泽东完全、彻底为人民服务 and 艰苦奋斗精神所感动。一位年过 8 旬的党外民主人士在留言簿上挥毫：“党风在此，风范犹存！”

第二是正在兴建的纪念毛泽东诞辰 100 周年的项目。由中共湖南省委决定、经中央同意的永久性纪念项目有：毛泽东铜像、毛泽东诗词碑林、毛泽东文物馆、毛泽东图书馆。此外，还有“毛氏宗祠复原陈列暨毛泽东家世展览”和韶山烈士陵园。人们看到那紧张、热闹的施工现场，无不从内心高兴，认为：毛泽东值得永远纪念，毛泽东思想应该长期坚持和发展！人们自动捐献赞助的真不少！

第三是韶山的巨大发展变化。许多观众多次到韶山。他们看到现在的韶山，到处是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很自然地认定：这是中国改革开放的窗口和缩影，这是坚持贯彻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的硕果。

### 韶山人看毛泽东

访问人：我们这次交谈得很好。谢谢您的合作。最后还有个问题：韶山人民对毛泽东是怎样看的？

高菊村：我虽不是韶山籍人，但我在韶山工作了 28 年，深知韶山人民的心情。他们认为：毛泽东的确是人不是神，但毕竟是一代伟人，是我党历史上最感人、最全面的杰出领袖！随着历史的流逝，人们将会越来越认识到他的伟大！毛泽东——韶山，日月同辉！

1993 年 4 月 9 日于北京中毛家湾

## 访王行娟——毛泽东的三次婚恋 王行娟

王行娟 1930 年生，广东人。南京金陵大学毕业。长期从事新闻、出版工作，热心妇女事业，现与志同道合者共同创办了中国第一家民间的妇女研究所，中国第一条妇女热线电话。著有《贺子珍的路》、《李敏、贺子珍与毛泽东》。

毛泽东先后与三位女子成婚，渡过 56 个春秋，他是如何对待她们的？她们各自对他又有着怎样的情感？学术界对这一问题涉及较少，但家庭生活却是毛泽东不可缺少的一个侧面，为此我们走访了注意研究毛泽东婚姻的王行娟女士。

访问人：研究一个人，除了他的政治生涯、学术著作之外，他的出身、甚至婚姻状况也是必不可少的。目前学术界对毛泽东婚姻状况的研究比较薄弱、您一直搞妇女问题研究，又发表了《贺子珍的路》《李敏、贺子珍与毛泽东》等著作，您能不能就此谈谈您的一些看法？

王行娟：毛泽东一生遇到过 4 位女性，第一位是他父母给他娶的罗氏。按旧俗说，这是毛泽东家里给他明媒正娶的，但对罗氏，毛泽东 1936 年同斯诺的谈话曾这样提到过：“我 14 岁的时候，父母给我娶了一个二十岁的女子，可是我从来没有和她生活过——而且后来也一直没有。我不认为她是我的妻子，当时也几乎没有想到过她。”这反映了毛泽东所具备的反抗性格，以及反封建的思想意识。

访问人，罗氏的命运也是很苦的，她 20 岁到毛家，22 岁就因病去世了。在毛家的几年她上敬公婆，下田劳作，个人生活抑郁不幸。其实毛泽东对她并没有完全忘记，50 年代毛泽东在一封书信中就曾提到过她的家人。

王行娟：除罗氏之外，毛泽东实际上前后有 3 个夫人。第一位是杨开慧，他们于 1920 年结合，直到 1927 年毛泽东发动秋收起义时分开，一起生活了 7 年。杨开慧在 1930 年牺牲。第二位是贺子珍，他们于 1928 年结合，到 1937 年贺子珍去苏联，在一起有 10 年。第三位就是江青，他们于 1938 年 6 月结婚，直到毛泽东逝世。

访问人，在对这 3 位女性的选择上，是不是可以看出毛泽东在婚姻爱情观里一些共通的东西？

王行娟：毛泽东是一个革命家和政治家，他不是一般的学者，也不是一般的政治家，因此，他的婚姻生活是和他的职业生涯、革命生涯结合在一起的。所以，我认为他选择生活伴侣，首先是看能不能和他志同道合。这一条在他身上非常突出，他的三次婚姻选择都是革命伴侣，如果没有这一条。其他条件再好、再漂亮，他也不会干。

访问人：毛泽东和杨开慧结婚以前，曾有一位女友和他关系比较密切。杨开慧的自述里曾婉转地提到这一点，当时杨开慧很难过，但最后毛泽东还是选择了杨开慧，自此两人关系的发展走上坦途。大概重要的一点就在于他们有着共同的信仰。王行娟：所以，毛泽东在婚姻问题上视志同道合为很重要的一条。他和杨开慧结婚时，正处在共产党孕育过程中，杨开慧全身心地信服毛的主张，不仅他的政治主张，而且还包括他的体育锻炼方式等生活习惯，始终都是他的最热心的追随者，这就是他们的感情基础。后来杨开慧带着 3 个孩子，有时还携着母亲，一会儿武汉，一会儿广州、长沙，风里雨里，颠沛流离，始终跟着毛泽东。到最后，白色恐怖那么严重，还要坚持守在板

仓，杨开慧说过一句话：我不能离开，因为润之没有给我这个指示。可见杨开慧对毛泽东感情非同一般。访问人：用“崇拜”这个词形容杨开慧对毛泽东的信服程度不知道合适不合适？杨开慧在她的自述里谈到对毛泽东的感情时，这样说：“我觉得我为母亲而生之外，是而他而生的。我想像着，假如一天他死去了，我的母亲也不在了，我一定要跟着他死！假如他被人捉着去杀，我一定同他去共一个命运！”可见，后来军阀何键声称只要杨开慧宣布和毛泽东脱离夫妻关系便可放她出狱，而杨开慧却选择了死这一点并非一念之差的选择。王行娟：毛泽东和贺子珍的结合也能说明“志同道合”这个问题。毛泽东上井冈山时，贺子珍已在山上，她和杨开慧不同的在于还不是追随毛。当时毛泽东的声望并不像后来那么高，而且这时贺子珍也有较高的地位，她是永新县县委委员、青年部副部长，但仍然是他们的志同道合使她们走在了一起。

访问人：在遇到毛泽东之前，贺子珍就知道毛泽东这个人吗？

王行娟：也许知道，因为毛泽东搞农民运动也是有名的；大革命时她阅读了大量的革命报刊，毛泽东早期的文章就刊登在一些杂志上。在未遇见毛泽东之前，贺子珍是有心上人的，这个人永新县的欧阳洛，他引导贺走上革命道路，而且后来发展她入团、入党。欧阳长得一表人才，是永新县最早一批到南昌求学、入党的人。后回到永新建立党组织，可惜这个人在参加南昌暴动后回武汉任湖北省委书记后不久，便被叛徒出卖被捕就义。贺子珍一直留在永新，永新暴动后仍坚持革命斗争，她的同学纷纷离开革命队伍，而她上了井冈山，和袁文才等在一起，对这些“土匪”，人家都是不齿的，从这也看出这位年轻的女共产党人突出的个性光彩。这深深吸引了毛泽东。共同的信仰和追求，不屈的斗争性格，这也是他们能结合在一起的前提和基础。

江青也是和毛泽东在革命队伍中认识的。不管因为什么原因，她毕竟没有留在上海，也没有跑到南京、重庆这些大城市，而是到了延安，延安的生活相对于那些繁华都市来说是很艰苦的，江青能千里迢迢跑到延安，说明她当时还是倾向革命，向往进步，这一点，也是毛泽东能和她结合的最起码的条件。

所以，能不能志同道合是毛泽东进行婚姻选择的最重要的也是最起码的一条。

第二，毛泽东在婚姻上表现的自主性和独立性。他主张婚姻要两厢情愿。他对待父母给他娶的罗氏的态度，就很说明问题。他和杨开慧的恋爱是很浪漫的，在当时也算是站在前沿的，用今天的话说，是特别“新潮”。那时杨开慧是教授家的千金小姐，能跟随毛泽东这个农家子弟，非常不简单。贺子珍也是他自己寻找的。甚至包括对江青，也体现了他在婚姻上的自主性，有的书把他和江青的关系写的那样被动，这完全不可能，任何人也不可能强迫他的婚姻，毛泽东怎么能那么随便被人拨弄来拨弄去，特别是他还是党的最高领导人。他作出这种选择，肯定是他觉得对方值得爱，可以爱。

第三，是他的反潮流反传统的做法。他的婚礼都是非常具有革命家的特色。毛泽东和杨开慧结婚时是1920年冬。他们的理想是要为人民为全人类的幸福而奋斗，他们把结婚作为反社会潮流的象征。所以，他和杨开慧实行的是同居，没有举行什么婚礼，过了一段时间。才请来一批人吃饭，吃到最后宣布他们结婚了。

访问人：那个时候，毛泽东在和朋友们的通信中就建议过要成立“拒婚

同盟”，他对向警予、蔡和森的爱情关系——“向蔡同盟”表示了特别的欣赏。这种“爱情同盟”几乎成了那一代青年冲破旧的礼教束缚，争取幸福自由的一面旗帜，一种典范。毛泽东是用类似于“向蔡同盟”的“毛杨同盟”（姑且这样说）去实践自己的爱情诺言和理想的。经历了和罗氏的旧式婚姻，这种爱情的结合就更显得神采动人了。王行娟：这种爱情的理想表现在：我爱我爱的人，我只选择我爱的人，而且用我的形式实现这个爱的结合。毛泽东和贺子珍的结合也是这样。他们能走到一起，完全是一种彼此倾慕的结果。有的书说毛贺结婚，是谁请了酒，我曾经问过贺子珍，贺说，没有这回事，别说请酒，连喜糖也没有，在那种情况下，到哪去买糖？身上没有钱，也没有可能举行婚礼。

访问人：毛泽东和贺子珍结合时，杨开慧还在板仓。那么，贺子珍是否知道杨的存在？对毛、贺的关系又有影响吗？

王行娟：贺子珍是知道杨开慧的。而她对毛、杨关系的态度从1929年1月她不肯随红四军下山这件事就能看出来。当时贺子珍认为红军下山后，毛泽东会有更多的机会和杨开慧相遇，她愿意把位置空出来让他们夫妻团圆，而自己留下来坚持地方斗争。但最后她还是随部队行动了。

访问人：贺子珍关于杨开慧的消息是不是从杨的堂兄杨开明那里了解到的？有史料表明，杨开明上过井冈山。

王行娟：在和贺子珍同居之前，毛泽东就对她讲过自己在湖南老家已有妻子和三个孩子，关山远隔，路途遥远，也不知他们的情况，甚至有传言说杨开慧已不在人世了，也不知真假。毛泽东说的一点不假，白色恐怖下生死两茫茫，这不难理解。1928年，杨开明作为湖南特委特派员身份上了井冈山（贺子珍回忆说是杨开慧的哥哥），从他那里，毛泽东和贺子珍了解到杨开慧还在湖南板仓隐蔽着。这样，贺子珍以后就总把她自己的衣物装在一个包袱里，单放着，从不与毛泽东的衣物混放。包袱里除了换洗衣服，一双草鞋，一双布鞋，还有一把外出防身用的刀子。贺子珍对毛泽东解释说，她之所以这样做的原因是：“你什么时候把开慧姐接来，我什么时候离开你。”可见贺子珍这人是独立很自主的，也真诚。她很爱毛泽东，愿意为他献身，也愿意为他的幸福而离开他。而毛泽东当时也确实为贺子珍所吸引。从特定的角度来看，他的婚姻方式的确是反潮流而不合世俗的。

访问人：毛泽东和江青是不是也深受形式的约束？

王行娟：在延安，作为党的领袖，毛泽东与江青的结合是经过政治局批准的。这是必要的组织程序。但这次仍没有什么婚礼。江青提出过要像样地请次客把自己的身分公开一下，毛泽东不肯，江青则觉得不这样自己就名不正言不顺。

访问人：除父母包办的罗氏那次婚姻之外，毛泽东的后三次婚姻都没有婚礼。

王行娟：第四点，毛泽东选择配偶是爱才也爱貌。他有很高的精神境界，他要求他的配偶也具备这样的境界。杨开慧在当时是一位很出众的女子。可能不一定有倾国倾城之貌，但富于青春，有个性有追求，也很有才，自视甚高，不是什么人都能放在她眼里的。贺子珍被称为永新一枝花，还有古文根底，会写诗。并非只会弄枪弄棒。她的一些诗可能被保存了下来，但我还没有收集到，也没有看到过。

访问人：那么，江青呢？

王行娟：客观他说，江青也是才华的确出众，读了很多书，字也写得好，不仅草书好，楷书也好，毛泽东就曾让李油临摹江青的字。李敏也说过江青能看英文原版小说，口语也不错。有些古诗词，毛泽东念上半首，她经常能接着吟出下半首。她的才华无疑也会吸引毛泽东，特别是在延安那个地方，那个年代。说到江青的漂亮、风度，那就更不用说了。

访问人：您能对毛泽东与他这 3 位夫人的关系分别作一下描述与比较吗？

王行娟：毛泽东不是一般人，是职业革命家，他的革命生涯决定了他的选择。他是一个个性非常强，具有钢铁般意志的男人。虽然他不乏柔情的時候，他才需要女性的爱来温暖他的心，但他鲜明的个性始终是贯穿于他的婚姻生活中，影响着他和 3 位夫人的关系。相对而言，他和杨开慧之间是最融洽的。开慧是一种献身型、忘我型的女子，她确实做到了把自己的所有一切都融化在毛泽东的生活中，为他的事业服务，甚至不惜性命。这对毛泽东这样的人来说，是最合适的配偶。

访问人：杨开慧是很有个性的。从她的自述里，甚至能看出她有些骄傲。但她融入了毛泽东的生活中，为毛泽东而活。在认识毛泽东之前，杨开慧抱了独身的想法。以身相许毛泽东后，她就把毛泽东的生活当作她全部的生活，她的自我。体现在毛泽东的事业和生活中。试想，一个大家闺秀，名教授的女儿，在父亲去世失去生活来源后，嫁给毛泽东这样的农家子弟所感受的生活压力有多重 16 年中，她为毛泽东生了 3 个孩子，不仅在恶劣的环境里承担着繁重的家务，还辅助毛泽东工作，做文字记录，整理材料，在家乡农民中搞识字运动等等，站在毛泽东的身后，她真是任劳任怨。

王行娟：是啊！毛泽东那时四处奔波搞革命，而且不管家。杨开慧生产时他都无法在她身边。尽管她辅助毛泽东做了不少工作，但她的身分始终是家属。国共合作，毛泽东到广州，担任国民党代理宣传部长，杨开慧带着母亲，孩子伴随，也是家属身分。我们经常说一个成功的男人背后都有一个女人的奉献，那么，毛泽东的背后就是杨开慧，杨对毛初期革命事业的扶持是不可磨灭的。

访问人：如果不嫁给毛泽东，以杨开慧的学识能力，她能做到哪一步？如果她身为毛泽东的妻子，不被军阀何键杀害，那她后来又会有怎样的命运？

王行娟：按照贺子珍的做法，她会义无反顾地离开毛泽东，而让他与杨开慧团圆。贺子珍对毛泽东也是一往情深，以身相许，但她同时并不甘于扔下自己的革命工作而仅仅照料毛泽东的生活，给他剪报抄稿。她不甘心仅仅作为毛的夫人存在。她有别于杨开慧。杨开慧是书香门第出身，而贺子珍出身于永新县破落了的大户人家，在见毛泽东之前，她已经在井冈山立住了脚，锻炼了坚强的意志和倔强的独立性。因此，在和毛泽东的近 10 年的生活中，她一直在心理上难以适应。但毛、贺之间的感情是很深的，毛泽东在晚年还用画目的手势叫李敏照顾好她妈妈。他们之间在感情上有许多共同的东西，而悲剧就在于，他们在 1937 年就分手了。

访问人：贺子珍在心理上难以适应只当毛泽东的“家属”，是不是导致他们最后出现裂痕的重要原因？

王行娟：贺子珍和毛泽东关系最融洽的一段就是长征时期，那时十分艰苦，面对生死，其他一切都抛开了，生死与共，相濡以沫。但不能否认，贺子珍不甘愿只当毛泽东的“家属”，想独挡一面工作的想法，一直是有的。

条件稍好一些，她的这个想法就冒出来，这样就跟毛泽东闹些别扭。贺子珍是非常上进、好学的人，而毛泽东就希望她能安心地做一些剪资料抄书稿的辅助性工作，同时照顾好他的生活。其实到延安后，毛泽东已经有了自己的秘书办公室。许多事务性的工作已经用不着贺子珍去做了，贺仅仅照料毛泽东的生活而已。这对毛泽东来说，他需要这些，而对贺子珍来说，就不甘心，不甘心仅仅做个夫人，在毛泽东这棵大树下乘凉。矛盾就是这样产生的，最后贺非要去苏联学习不可，便离开了毛泽东。

至于“后来居上”的江青与毛泽东的婚姻，我把它归为功利型。江青奔赴延安投身革命，希望在革命中得到自我发展，这点没错。但她这个自我发展不像贺子珍的一心要为党独立工作，她是想捞取更多的东西。贺子珍和毛泽东相差 10 几岁，贺子珍同毛泽东结合的时候，毛在井冈山还没有出人头地。上井冈山，是由于秋收起义的失败，毛泽东带了一支很小的部队挑着枪枝，一身破烂地上来就是想在山上找到庇护所。贺子珍对毛泽东一无所求，是因为爱而献身于他。江青呢？比毛小 20 多岁，毛泽东在延安已经确立了在全党的领导地位。江青自己就说过她和毛泽东是政治婚姻，如果不是政治上的原因，年岁相差那么大是无法成夫妻的。这就说明江青更着重的是毛泽东的政治地位。江青是个功利心非常强的不甘寂寞的女人，我们可以再次把她和贺子珍的为人作个比较。毛泽东在延安曾经对贺子珍说过，我现在有发言权了。意思是说我在党内的地位不会让你像以前那样跟着我受苦。这话已经说得很明白了。但当时贺子珍听不进去，她不想因为毛泽东地位的上升而给自己捞些什么，只想能独立地为党做工作。在我采访收集写作材料的过程中，那些不喜欢贺子珍的人也承认，贺从来没有因为是毛泽东夫人而盛气凌人，无论何时，她都以一个普通干部的身分出现在大家面前。到毛泽东确立了党内最高领导人地位之后，她还会离开他，这本身就说明她和毛泽东之间的婚姻关系是很纯洁的。访问人：事实上，后来江青和毛泽东的婚姻感情距离也越拉越大，不仅两个人饭吃不到一起，而且发展到毛泽东看到江青就烦。这对江青来说也是件痛苦的事。刚才我们都是从三位女性的角度来看毛泽东的婚姻生活，那么，从毛泽东的角度呢？他的个性对于她们又意味着什么？

王行娟：毛泽东在感情问题上可以说也是矛盾的组合体。我们可以把他同周恩来比较一下。他和周恩来是两种不同类型的人，周恩来很儒雅，对人对事包括对自己的妻子都是这样。而毛泽东这位农家子弟出身的领袖，成长过程中经受了来自教条主义的打击和排挤，历经沉浮，有着钢铁般的意志和坚不可摧的斗争性。这种强烈的个性和自尊表现在他的婚姻生活中，就是一方面他有着丰富的情感，有时非常温存。但另一方面就有农民式的大男子主义思想。毛泽东自己也曾表示过很羡慕周恩来家庭生活中的那种平静与和谐。的确，这种宁静对于他来说并不总有，他的个性也决定了这种宁静本来就不属于他。

访问人：“其实，我们不防设想，接二连三地为他生孩子，做他的家属，又岂是杨开慧所真正心甘情愿的？对杨来说，她做到的是泪眼相向，欲言又止，最后默默忍受。那种难过与委屈表现在杨开慧身上，不是大哭大闹，而是默默地把它埋在心底。要说宁静平和，最多的还是在毛泽东和杨开慧之间。1923 年春，毛泽东去上海，再去广州，杨开慧想跟着去，毛没同意。两人产生矛盾。当时杨开慧快要生岸青，毛又顾不上她，这是一个原因。后来误会解除，两人 1924 年在上海“重比翼，和云翥”。误会消除了，但毛泽东恐怕

也没能充分理解当时杨开慧的心情。杨开慧的牺牲，是毛泽东心灵难以愈合的创伤，一句“开慧之死，百身莫赎”，复杂的心情尽在其中。

王行娟：贺子珍和毛泽东一样，个性比较倔强。所以两个人的碰撞也就比较多。江青也常常和毛泽东吵，特别是后来。郭化若从长征一直到延安，都在毛泽东左右，贺、毛吵架，江、毛吵架他都见过。延安那么小的一块地方，谁家吵架马上就知道了。毛泽东有时很柔情，有时很暴烈，吵起来嗓门也老粗，发起脾气雷霆万钧。有一回在延安，贺子珍见一小碗辣椒馊了就倒了，毛泽东回来发火，正洗着脸连盆带水一下子就向贺子珍摔过去，贺子珍赶紧跑出去。有时候贺子珍也跟毛泽东打架。但他们打架主要还是生活上一点鸡毛蒜皮的事。张闻天夫人刘英就回忆过，弄到一只鸡，毛泽东的牙齿好，要炒来吃，贺坚持要炖着吃，这样营养好，就为这点小事，两人吵得要死。其实都不是为自己争什么，而是为了对方好。江青就不同了，她和毛泽东吵多数还是要毛泽东顺从她，替她去办什么事。而毛泽东往往原则性很强，不顺从她就吵，吵得跑到周恩来那里哭，周恩来就老给她劝架做工作。江青是想从毛泽东那里获得点什么的。反过来，毛泽东也没有从江青那里获得多少幸福。愈是这样，他就愈加怀念他的前两位妻子——杨开慧和贺子珍。杨开慧已过世了，而贺子珍远在苏联。毛泽东对贺子珍的怀念我了解得更多一些。贺子珍后来对自己那时非要离开毛泽东去苏联很后悔，而毛泽东对她也一直抱着负疚的心情。庐山相会，贺子珍恍惚的精神状态，使他的心情更加沉重，他用专机将李敏送到她母亲身边，不放心，又让身边工作人员跟着专机去。他不断地回忆着他和贺子珍一起在井冈山的那段生活。对于他们来说，争吵不和的恩恩怨怨已经烟消云散，留下的是他们共同拥有的最美好的东西。

访问人：是不是可以这样说，杨开慧之于毛泽东，是青年时代的纯真缠绵，而贺子珍之于毛泽东，是硝烟战火中的激情遭遇。而江青填补的是贺子珍之后毛泽东感情生活中的一段空白。

王行娟：这感情上的空白是非江青所能完全填补的，而江青本人虽然由此一跃而为第一夫人，但她的政治野心也并没能很快得到满足。在延安时期和建国初期这一相当长的时间里，毛泽东严格要求江青做好仍然是事务性的辅助工作，安排好生活，不抛头露面，不参政议政。江青本人似乎也努力这样去做过。直到1962年，那一年我记得毛泽东接见苏加诺总统，报纸上登了大幅照片，照片上江青赫然在目，这是她第一次以第一夫人的身分在新闻媒介面前展露自己。

访问人：这或许表现了毛泽东的一种无奈吧，就像他对自己这次婚姻结局的无奈心情一样。

王行娟：只能这样解释。

1993年2月21日于北京前门东大街

## 访薛明、贺晓明——毛泽东和我们一家薛明，贺晓明

薛明，1915年生，河北霸县人，贺龙元帅的夫人。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天津参加创办《天津妇女》。1938年到延安，先在中央党校、延安女子大学学习，后任延安县委组织部长、陕甘宁晋绥联防司令部政治处主任。建国后任西南妇联福利部长，军委贺龙副主席办公室主任，总参谋部政治部顾问，中国人民解放军检察院检察长。是四届人大代表、五届政协委员、六届七届政协常委、中共十二大代表。

贺晓明，1947年生，湖南桑植人，贺龙、薛明之女。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毕业。曾在外交部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作，现任深圳商地置业公司董事长。主持编撰有《贺龙年谱》。

贺龙元帅在“文革”中受迫害而死，国人无不为之痛惜。他的家人却以宽大的胸襟，在毛泽东百年诞辰之际，畅谈了对毛泽东的缅怀之情，回忆了毛泽东和他们一家的交往和友谊。这种精神实在让人感动。

薛明：在毛泽东诞辰一百周年的时候，你们搞了一项这样的活动很有意义。我认为毛泽东是一位很伟大的人，他和贺老总的关系非常不一般。为了纪念他，把我所知道的毛主席和贺龙过去的交往情况讲一讲，以表我对毛主席的缅怀之情。

访问人：谢谢您！我们觉得毛泽东给后人留下了一大笔文字材料，这些对于研究他老人家无疑是非常重要的，但是要全方位的研究毛泽东，他和战友的关系也是一个重要的方面。在某种程度上说；更能反映他的为人、品性和性格。

贺晓明：对毛泽东的评价，我觉得经历了几个阶段。十一届三中全会时，因为很多人吃了“文革”的苦头，所以讲起毛泽东来，不免带有一些个人情绪，对他的批评也就多一些。后来根据国内形势的变化，有一段又抬得高了些。现在我觉得是越来越实事求是了。总的讲，我认为对毛泽东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要肯定。比如我们现在进行的改革开放，就离不开毛泽东说的要独立自主，发奋图强。国家经济不发达，腰杆不壮，光喊、会喊，也觉得气短。现在对有些好的革命传统讲得少了，我觉得要搞革命历史教育。我们还需要艰苦奋斗的精神。我们小时候写作文，第一句话除了爸爸、妈妈，就是毛主席。这绝对是有烙印的。

薛明：教你们学的第一句话，就是毛主席。

访问人：您这样教育孩子，一定是发自内心对毛泽东的热爱。

薛明：那绝对是发自内心的。我们觉得孩子应该知道毛主席呀！他是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

贺晓明：林彪说什么要融化在血液里，他是出于他的目的。但爸爸他们真是做到了。我的感觉，爸爸对毛主席的感情真是真诚。比如他到体委时，看到一篇署名28画生的文章，如获致宝，兴奋得不得了。

访问人：是不是1917年毛泽东发表在《新青年》上的《体育之研究》？

贺晓明：对。我亲眼看到的。爸爸拿起书还问我，你知道28画生是谁吗？我说不知道。他说，你数数看。因为我不知道是谁，所以数也数不来，后来他让我数“毛泽东”（繁体）三字，果然是28画。爸爸说，这是毛泽东最早讲体育的文章，而且讲得很精彩，我们要在体育界广泛宣传，让大家学习。在他们那种感情的熏陶下，我觉得，我对毛主席的感情也特别深。我每次到长沙，肯定到桔子洲头，因为那是毛泽东年轻时经常游泳、登山的地方，他

年轻时的那种朝气蓬勃，，奋发向上的精神真是给人以力量，叫人振奋！

访问人：这几乎是老一辈革命家的共同特点，他们是一群关心祖国，关心人民的热血青年，包括大姐也一定是毫不例外。请问大姐，您是哪一年到的延安，什么时候和贺龙同志结婚的？

薛明：我是 1938 年经八路军西安办事处介绍到延安的，先在中央党校，延安女子大学学习，后来到清涧工作。1942 年和贺龙结婚，结婚时任延安县委组织部长。

访问人：你们结婚的时候，毛泽东一定去祝贺了？

薛明：结婚那一天没有。但是过了几天他来了，当时我们住在财经办事处延安南门外的山坡上。下面是徐特立办的自然科学学院。贺老总比较好客，再加上那地方空气新鲜，好多的中央领导同志都到我家串门，经常是热热闹闹的。听说毛主席来了，贺老总就往山下跑，一会儿他们就有说有笑地上来了。后来人们把毛泽东看做神，其实他不是神呀！那真是实实在在的人啊！非常热情！他一进我们的窑洞时，我很紧张，但又很兴奋，恭恭敬敬地向毛主席又鞠躬又问好。因为我们刚刚结婚，毛主席握住我的手问：“你姓什么？”我说：“姓薛。”他说：“你是薛仁贵的后代了。”我说：“不是，差得太远了。”他说：“贺师长有福气，讨了一个好老婆！”他还问我，过去干过什么。我说在天津搞地下工作，参加过一二九学生运动。“七七”事变后，国民党不抗日，我们就到处宣传中国人不当亡国奴要求南京国民政府全面抗战。我们曾组织请愿团到南京请愿，逼蒋抗日、还到过山东，结果韩复榘不但不抗日，还把我们的同学绑起来了。我们到处宣传抗日，老百姓是欢迎的，但到官府和驻军附近的地方都碰壁。毛泽东说：“怪不得见了共产党的将军，你就爱上了。贺老总抗日可是最坚决了，最能打仗。人家说他有军阀主义，叫他去学习，我看不是。他有三条：对敌人狠，能联系群众，对党忠诚。贺老总这个对象你是找对了。”说得我们哈哈地笑，接着大家就闲谈起来了。快到中午的时候，毛泽东抬头看看窗外的太阳，说，怎么着，给不给饭吃。贺老总说，给，早就准备了。那次我们做了一碗红烧肉，还有一条鱼。在延安是吃不到鱼的，这是贺龙由晋西北回延安时，警卫员在黄河边抓的一条活鱼，这条鱼一直养着，给毛主席吃，贺龙还特别嘱咐厨师用辣子烧，那真合毛主席的口味。大家看着毛主席吃得很高兴！毛主席说真是香极了。今天来打打牙祭。是的，平时很难吃到这样的东西。

访问人：有别人陪他吗？

薛明：没有。我印象里来的就毛主席一个人。还有和我们住在一起的李并泉夫妇。那时的毛泽东可“自由”了，他经常到处走。在女子大学的时候，我们在延河边散步，还碰到过毛主席，他对我们很亲切、还给女大上过课。他说中国妇女解放之时就是中国革命胜利之时。毛主席的话博得大家热烈的掌声。毛主席特别关心妇女解放事业。

访问人：延安的时候，毛泽东是否经常去您家里串门？

薛明：当时毛泽东很忙，我们住得虽然不远，但常常来不可能。前面说过，我们结婚来过一次。第二次来的情况是这样的：东干篮球队打球非常漂亮，他们从冀甫一路打来，没有对手。到了延安打得好精彩，大家都叫好。贺龙喜欢体育，他叫 120 师战斗队和东干队比赛，贺龙、朱总司令每场必到，许多人都去看。双方竞争得很激烈，比赛结果战斗队赢了。赢球了嘛！大家都很高兴，就向贺老总提出，我们能不能见见毛主席？贺龙说，可以！他到

了毛主席那里，毛主席也向他祝贺。贺龙说，战斗队的小伙子们有个心愿，要见见毛主席呢。毛主席说：“行啊！在哪儿见呢？就在你家里吧！”贺龙说：“行，就在我家里。”一天下午，我看到有20人左右，排着队朝我家走来了，这些人也不说话，进了屋就坐下了。我有些纳闷，这是怎么回事？很快我就看到贺老总陪着毛主席上山来了。毛主席进了屋，战士们起立在院子里排好队向他敬礼。毛主席开口就说，同志们好！他说：“你们是一边打仗一边打球，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下，练就了一身好球艺，这很不简单。你们来延安打球，延安人民都去看，活跃了延安的气氛，我代表延安人民谢谢你们。平时你们在部队里打球，活跃了部队生活，提高了部队的战斗力，这是很好的事情。你们的贺师长红军时候就喜欢搞体育活动，现在又搞了战斗队，很好啊！以后不论多么艰苦，也要继续搞下去，还要搞得更好！大家高兴得不得了。后来有人写文章，说这次毛主席接见战斗队并讲了话对他们来说，是最高奖赏！是啊！不容易的。那时的条件真是太艰苦了，打仗的时候没有球，就用布缝一个；没有运动鞋，就打赤脚干；再说山沟里哪有什么球场，随便找块空地，就坑坑洼洼地打上了。到了延安条件稍好一些。就是在这样的环境里，大家不忘娱乐，也说明同志们们的精神状态是十分积极乐观的。

贺晓明：我看到有的故事片写着，敌人要活捉贺龙，就看看哪里有打球的，哪里有打球的，哪里就有贺龙。

薛明：这未免大夸张了。我认为贺龙喜欢打球，更重要的他是从活跃部队生活来着眼的。

访问人：延安时期的毛泽东平易近人，他和贺龙的交往一定很多？

薛明：那时贺龙任晋绥陕甘宁联防司令部司令员，林伯渠是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高岗是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毛泽东是党政军一起抓，主要抓住他们这几个大的单位不放，所以贺老总经常要到毛主席那里开会。他们相处的非常自然。

1944年我生第一个孩子，是男孩。这个事情毛主席知道了。晚上贺老总又到毛主席那里去开会。他一进门，毛主席就站起来，冲着贺龙说，恭喜你50得子！说得贺龙都愣了，随即开怀大笑。毛主席这样一说，大家都向贺龙表示祝贺，并各自送了一点儿孩子用的东西。其中有康大姐用朱总司令夏天穿的背心做的衣服，还有向应生病时吃的奶粉等等。

贺晓明：爸爸在部队里讲话说过，我50岁应该当爷爷了，因为和日本人打仗，和国民党打仗，把一代人都打丢了。

访问人：他们为了人民的幸福，国家的富强出生入死，无私奉献，确实可敬。我们想贺老总和毛泽东的接触很多，一般说来，作为下级对上级总会存在一些不太尽如人意的地方。贺龙当时对毛泽东是一种怎样的感受呢？薛明：服气呀！真心实意地认为他伟大，非常伟大的人物。像贺龙从1914年就开始闹革命，这中间他加入过孙中山领导的中华革命党，湘西护国军，建国川军，国民革命军，后又参加领导了南昌起义，建立了湘鄂西革命根据地，接触了很多人，大到孙中山，小到地方的土劣，全都打过交道。也就是说，什么样的人全都见过。相比较而言，他和毛泽东见面是比较晚的，是长征以后到了陕北才互相认识，当然这之前双方早已互相知晓。就是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当他见了毛泽东，就觉得不一般呀！觉得他想问题决策事情总是高人一筹，觉得这个人行，做共产党的领袖是当之无愧的，所以从心底里佩服。他一直维护毛泽东的领导。延安整风时，他对王明气愤极了，说毛泽东方向，

就是我们党的方向。王明是个学生，他懂什么？他要再骑在毛主席头上，我就打倒他。

访问人：贺老总的话在延安曾轰动一时，这充分表明了他对毛泽东的真诚和信赖。解放战争时，贺老总离开延安到了晋西北，这时候和毛泽东还有交往吗？

薛明：有。这时毛主席还在陕北，贺龙几次到陕北开会，有一次贺龙血压高，我们建议他请假，他说，毛主席还在陕北，中央有什么决策我应该知道，就这样他还是去了。陕北生活很艰苦，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贺龙都是全力以赴地支援中央的困难。1948年3月毛泽东过黄河，第一站就是晋西北的贺龙司令部。我们把司令部都腾出来，打扫得干干净净给毛主席、周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住。我们则住在外边一个小院子里。

一天毛主席来了，他说：“你们都挤在这个小院里啦，里面还很宽敞，让孩子们到里面去玩，别都挤在这里。”当时我怀里抱着晓明，手里拎着老大。他问大的叫什么？我说叫小龙（本来不叫小龙，大家都说他长得像他爸爸，就小龙小龙的叫开了），这个叫晓明。毛主席听了，说：“你们可能计划好了，将来是一排龙，一排明。老龙老明在当中。”他嘴里说着，脚上还踩着京剧的步子，大摇大摆地走起来，逗得大家全都哈哈大笑。然后他说：“好幸福呀！我祝福你们。”说完他还走过来，看到每个小孩都摸一下头，问问这个是谁家的，那个是谁家的，看看我们吃的是什么饭。当他发现我们吃的是小米时，就说，你们优待我们了，那不公平了。

访问人：看不到一点领袖架子。

薛明：没架子，不像是最高领导。那时真的没有那个感觉。觉得非常亲近、自然。

毛主席在晋西北住了一个礼拜，几乎每天晚上都看山西梆子。贺总征求他的意见，看什么戏，毛主席说，来到了山西，就看山西戏吧，我们不能轻视地方戏。看戏很简单，根本没有戏院，连个戏棚也没有，演员就在土台子上唱。我们提着凳子、马扎，顶多给毛主席背着个椅子、带个炭火盆，提着个马灯照路。毛主席走在前面，其他干部跟着，一边走一边说。到了目的地坐在群众当中就看，好动人呢！回来时也是一边走一边说，七嘴八舌的议论今天的戏怎么样。他们在前面走，我们在后边就一溜小跑地跟着，听他们是怎样议论的。记得那一天演的是《打金枝》，就听毛主席说，山西梆子很不错。郭子仪是个老臣，金枝不和丈夫驸马去拜寿，驸马打了金枝，金枝回宫告驸马的状，唐明皇了解女儿的心理，不但没有惩罚驸马，反而给驸马连升三级。主席说，这说明老丈人还很开明啊！大家全笑了。

访问人：这一次分手之后，再见面就是建国后的事情了。

薛明：后来贺老总率部进军西南。全国解放后任西南军区司令员。1954年冬来到北京，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体委主任。到了北京，就和延安不一样了，在延安的时候，家家户户连个围墙也没有，大家来往非常频繁。这时候，一家一个院子，互相来往就相对得少了，规矩也多了。一般的工作，不该问的不问。

但是有一次他回来笑呵呵地说：“今天开会口渴，富春、谭（震林）老板在我两边，就我中间没水喝。每次去了都有一杯茶水，这次没有，我问富春，怎么你有水喝，我没水喝？他说，你给了钱没有？我说，没带。原来是开会时，每人丢一毛钱，服务员看着，谁给了钱就给谁水喝，贺龙没给钱，

自然也就没水喝了。会议中间休息，贺龙又提起这件事，富春说，我给你垫上一毛钱后，不是给你茶喝了嘛！这时候毛主席走过来，问你们在说什么？他们说，贺老总没带钱，就没茶喝。毛主席说，唉呀！我也没钱，我身上向来不装钱。以后你再忘了带钱，告诉我，我让人给你垫上，先垫上一块，你可以来 10 次都不用想着开会要带钱了。

访问人：大家的关系很融洽，制度也很有效。首长去开会，忘了带钱，服务员就真的不给水喝，这表明上下级的关系很纯洁，廉政也确实是从上做起。

贺晓明：他们那个时候，确实是艰苦朴素。爸爸到主席家里去，看到他的床单、枕头、被子全是素白的，看到主席家里都是书，连厕所里都有，爸爸就特别强调艰苦朴素和读书如何如何重要。有一年冬天他要不穿毛裤，问怎么回事，说总理不穿！

访问人：他们的来往很多，关系也不错。这种情况持续到什么时候呢？

薛明：应该说是“文化大革命”前。1963 年毛主席对贺龙说，林彪身体不好，他需要休息。林彪要是在家，军委就是他当家，他若不在，就由你贺龙当家，贺龙主持军委工作的时间是从 1963 年到 1966 年。他主持军委工作的时候反复强调军事练兵的重要性，所以他重点抓了军事训练。杨村练兵，贺老总连看了 3 次，最后一次他报告总理，说那兵练得真好，你去看看吧！他把总理、陈毅都拉去了，总理看得出神，说：“好！这是精兵。”以后毛主席知道了，就对贺龙说：“贺老总，人家都说你练兵练得好，都请去看了，怎么不请我。”贺龙一听，说：“行啊！咱们就在十三陵组织一次汇报表演。”所以 1964 年 7 月有了北京军区和济南军区的汇报表演。毛主席等中央领导都去了，整整看了 2 天。毛主席高兴啊！还用手捶捶沙袋子。看过表演之后，毛主席又召集贺龙他们开会，要求在全军推广。

访问人：后来的情况变了，贺老总遭受冲击，而且很悲惨，这使很多人感到困惑。这个问题您是怎么看的？

薛明：“文革”的事情很复杂，现在主要是总结经验教

训，要向前看。1966 年 12 月 28 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通知贺龙参加。贺龙一进门，毛主席就跟贺龙打招呼，请他到前面就坐。非常亲切。贺龙无论在什么样的困难情况下，对毛泽东始终是有信心的，认为毛泽东总有一天是要为他说话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讲的毛泽东是伟大的人物犯了严重的错误。我认为这个评价是公正的。1973 年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毛主席说：搞贺龙是搞错了，我有责任。我听了林彪的一面之词，偏听偏信了。贺龙是二方面军的一面旗子，没有这面旗子不行，现在贺龙被陷害了，一定要给他平反。一边说着，还用手拍了桌子。后来中央举行了贺龙骨灰安放仪式。总理带病讲话，他一边讲一边流泪，说我们没有把贺龙保护好！1982 年中央又为贺龙彻底平反。我想这都是毛主席讲那几句话的结果！在那样一种情况下，毛泽东能作自我批评，能为贺龙讲几句话是很不容易的，“文革”中的毛泽东，他的处境大家也知道，他太难了，控制不了了。

访问人：“文革”当中您全家受了那么多委屈。还能敞开胸怀去理解毛泽东，尤其在他百年诞辰之际，大姐一定要谈谈毛泽东，实在叫人感动！

贺晓明：我认为，毛泽东的错误归错误，功绩还是第一位的。他的廉政精神，艰苦奋斗的精神，他的民族英雄的气概等等，是永远值得我们纪念的。

我们看毛泽东不能仅从个

人的角度去看，应该站在国家的、民族的立场上去看，这时候当你谈起毛泽东来，就会客观、公正的多。我想做人应该是端端正正的。

访问人：是的。在毛泽东和贺龙的长期交往中。在你们看来，他们之间有着什么共同的特点吗？

薛明：他们最大的特点：都是出身一般的普通农民家庭，他们心里装的都是普通老百姓，是如何让人民过上好日子。比如贺龙，他家里很穷，没有读过多少书，他之所以拿起枪杆子是因为被官府欺压无奈，才揭竿而起的。之后他做过湘西护国军的营长，建国川军的旅长，湘西镇守使，再后来当了北伐军的军长。虽然他官越做越大，但他亲眼目睹了军阀之间的互相挤压，根本没有人为百姓想想，纯粹都是为了个人的地盘、个人的地位在那里闹，所以他总是不满足，总是在找一个公平合理的社会。当他了解了共产党一心为穷人，为国家的主张之后，他决定加入共产党。贺龙在湘西有根强的号召力，他手下的兵大多是湘西人，他们都是把贺龙当做一面旗子，跟着贺龙干。在军阀挤压当中，他也非常爱惜这支军队，因为这代表着他的实力。1927年在我们党最困难很多人纷纷脱党的时候，周逸群、谭平山介绍他加入共产党，他毫不犹豫的坚决的参加了，从此无论遇到什么困难都没有动摇过。而且把他的军队毫不吝惜地交给了党。要知道那是他的命根子。实践也证明，南昌起义后不久部队就散了。他的兵没了。后来他又要求回到湘西，重新组织武装。贺龙说：干革命没有枪杆子不行。人家说，你为什么脱了马靴穿草鞋，高官厚禄你不要。他回答得很干脆，我现在是共产党了，就是为了穷人，为了让国家富强。

贺晓明：我觉得爸爸和毛主席走上革命的道路，他们有相同的地方，两人的活动都是从民众中开始的；不同的地方，毛主席着重从思想上探索，当然也搞了学生运动等等。毛主席高瞻远瞩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逐渐成为马列主义者，成为中国共产党主要缔造人之一。毛主席读书多，学识渊博，他是文的。爸爸是用枪杆子探索。三湾改编时，毛主席说贺龙两把菜刀起家。他是武的。这样两个人互相吸引，很早就相互慕名。最后终于走到了一起，爸爸之所以能成为国家脊梁，还是受了毛泽东思想的影响和教育。

访问人：他们都是为了革命，走到了一起，干出了惊天动地的事业，虽然中间有些曲折，但友谊是长青的。今天薛大姐还有晓明同志谈了很多，您摔了腰，动弹不了，还躺在床上和我们谈，真是太感谢了。薛明：希望你们的书尽快出版，这件事非常有意义。对我们以及青年人的教育都很大。

## 访陈荒煤——对毛泽东文艺思想应认真、全面地研究

### 陈荒煤

陈荒煤，原籍湖北襄阳，1913年12月生于上海。1938年到延安，在鲁艺戏剧系、文学系任教。建国后，历任电影局局长、文化部副部长、中国作协第三届主席团副主席等职。长期从事文化领导工作和电影评论、散文创作。主要著作有：《为创造新英雄人物的典型而努力》、《解放集》、《回顾与探索》、《探索与创新》，散文集《荒煤散文选》、《荒野中的地火》、《梦之歌》等。陈荒老已年逾八旬，仍身体硬朗、耳聪目明，看一般的文字不用眼镜。我们的谈话进行了一个多小时。

后来又亲自修改记录整理稿，其认真求实的态度让人敬佩。

访问人：毛泽东既是一个伟大的政治家、军事家，也是一位理论家和诗人。他一生中非常关注文艺事业，不仅有理论著述、具体工作指示，而且多次发动和领导了一系列文艺运动。您以为现在应如何加强毛泽东文艺思想的研究？

陈荒煤：早在1981年8月，胡乔木在《当前思想战线上的若干问题》中就已经提出：毛泽东文艺思想，内容很丰富，需要认真、全面地加以研究。他指出：“我们的工作决不能限于研究一篇《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或者加上一篇《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它要包括研究毛泽东同志所创作的优美诗词和大量的散文，研究这些作品的美学观点和美学价值，以及他对历史上和现代一些作家和作品评论、评价。……不要用简单的不明确的概念作为大前提来作这样那样的推论。”我年岁已高，时间精力都有限，我现在能读到研究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文章不多，还不了解这方面的研究工作有多少进展。

但我认为，在今天强调要建设和发展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艺术事业，为建设精神文明作出更多更大贡献的时候，对毛泽东文艺思想加以认真、全面地研究，仍然是文艺界、特别是文艺理论研究工作的一项重要的历史任务。

访问人：近两年来，文艺界每年都要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的时候开纪念会，强调学习《讲话》的精神。

陈荒煤：《讲话》的根本精神，主要如毛泽东所讲的，正是革命文艺工作的中心问题，“基本上是一个为群众的问题和一个如何为群众的问题”。

《讲话》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阐述了革命文艺工作者必须反映人类社会生活，生活是文学艺术的唯一源泉的原理，并指出无产阶级和人民的作家必须深入生活，与群众相结合，站在无产阶级和人民的立场去表现新的世界、新的群众。又进一步回答了：革命文艺工作和整个革命事业的关系，党如何领导文艺工作，文艺的功能和作用，普及与提高，文艺工作者应学习社会、学习马克思主义、改造世界观等一系列重要的问题。

《讲话》的确是我们党第一次全面系统地论述党对文艺工作的政策和方针的一个划时代的重要文献。《讲话》把中国革命文艺运动推上一个崭新的阶段，不仅大大促进了解放区文艺工作的健康发展，也在全国产生很大的影响，以至在新中国建立后，也是我国文艺事业继续发展的指导思想，培养了一代又一代新的文艺工作者，起了重要的历史作用。《讲话》的根本精神，今天也仍然是我们应该坚持和贯彻的指导思想。

但是，我们不能认为，《讲话》已经全面概括了毛泽东文艺思想。随着

历史的前进和发展，新时期以来，经过实践的检验，总结历史的经验，现在对《讲话》某些具体论述和观点，已经作了一些补充和修改。也就是说，我们既要坚持也还要继续发展毛泽东文艺思想。

例如，关于文艺为工农兵服务，为政治服务的提法，现在已经作了修改，改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对于文艺从属于政治，政治标准第一等也不再提了。邓小平在第四次文代会代表党中央的祝词中，对文艺工作成绩的肯定、要求和希望，以及新时期以来他对文艺工作的许多宝贵意见，也显然对毛泽东文艺思想有了更多的丰富和发展。

因此，今天要加强毛泽东文艺思想的研究，既要以《讲话》开始，同时，也应该联系到毛泽东在当时其他著作中的一些论述加以综合研究。例如《新民主主义论》中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评价，对五四运动后党所领导的以鲁迅为旗手的左翼文艺运动的高度评价，以及他对“民族的科学的大众化”的设想；更重要的，不仅要对他的诗词、评论进行研究，还应对建国以来，毛泽东对文艺工作的多次批评以及他亲自发起与领导的文艺运动的思想观点进行深入研究，才能真正解决毛泽东有时候在理论和实践中所发生的矛盾。例如，他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是促进艺术发展和科学进步的方针，是促进我国社会主义文化繁荣的方针，甚至认为推而广之，也是我们进行一切工作的好方法。可是由于文化战线上运动频繁，却始终没有能够得到很好的贯彻。

总之，今天要认真、全面地加强对毛泽东文艺思想的研究，还是一项重要的工作，既有丰富的内容，也有复杂的情况，需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冷静思考，善于总结历史经验，一方面要充分肯定毛泽东文艺思想的科学性和正确的核心思想，以及它在中国革命文艺运动中所起的重大的历史作用，今后如何继承和发展；另一方面又要对某些不正确方面加以澄清、修改，特别是结合学习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和有关文艺方面的许多意见，回顾历史，面对现实，展望未来，高瞻远瞩，才能更好地发扬毛泽东文艺思想，更好地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繁荣创作，活跃理论，人才辈出，为精神文明建设作出更大贡献！

访问人：毛泽东提出文艺为群众服务，他所指的群众的范围似是比较广泛的。

陈荒煤：他在《讲话》中讲得很明确，这个群众的领域是很广泛的，是指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最广大的人民，是工人、农民、士兵以及城市小资产阶级劳动群众和知识分子。建国之后，他也多次说到革命知识分子也是劳动人民的一部分。特别要看到《讲话》当时还在抗战时期，我们还要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团结一切爱国主义人士，我们还要向大后方人民群众宣传党的方针政策，所以，文艺为群众服务，它所服务的对象实际上是非常广泛的。

建国以后，有的同志简单片面地强调为工农兵服务，把为人民服务——首先是为最广大的工农兵服务的原则，理解为只能写工农兵，只能反映工农兵的斗争，这是不对的。又有些同志强调为政治服务，特别强调政治即以阶级斗争为纲，或要求文艺为当前某一项政策，具体的临时的政治事件或任务服务：“写中心、唱中心、演中心”，不管文艺多方面的功能、风格、形式的种种区别，一律都去反映少数几个典型，而忽视了文艺创作应力求题材、形式、风格的多样化，才能充分发挥各门艺术不同的作用，因而既导致理论

方面的偏颇，也导致文艺创作的概念、公式化，因而不能满足广大人民群众在文化生活多方面的需求、爱好，不能真正为最广大群众服务。这种理论和创作的失误，事实上也违背了《讲话》的精神。

访问人：《讲话》中强调作家要到群众中去，与群众相结合，去熟悉工农兵，表现新的人物，新的世界。现在应如何认识这个问题？

陈荒煤：毛泽东强调一切种类的文学艺术的唯一源泉都只能来源于生活。但是他认为文艺作品所反映的生活应“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普遍性。”所以，他进而提出来，“革命的文艺，应当根据实际生活创造出各种各样的人物来，帮助群众推动历史前进。”

新时期以来，党中央反复强调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根本目的，是提高整个民族的思想道德、科学文化的素质，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新人。

我认为这两方面的要求，总的精神是完全一致的，是符合文学艺术创作的客观规律的，要创造典型环境中典型性格真实可信、生动感人的形象——特别是新的人物去表现新的世界。只是由于时代不同，我们今天在改革开放、四化建设蓬勃发展时，特别强调描写和培养社会主义新人的问题。

《讲话》中又曾指出：“了解人熟悉人都是第一位的工作。”

既然生活是文艺的唯一源泉，文艺应该创造各种各样的人，特别是新的人物帮助群众认识、理解历史和现实，努力成为社会主义的新人去推动历史前进；如果作家不和群众相结合，不深入生活，不去了解和熟悉新的人物，作家怎么能进行创作并创作出优秀的作品来呢？

我认为，任何一个民族和国家，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终究有自己民族的先进人物——新的人物起了推动历史前进的作用。这些“当代英雄”形象也往往就是各民族优秀作品所歌颂的新人物。

问题在于时代在不断地发展，新的人物也在不断地成长，不能用一种固定的模式去表现新的人物，脱离生活实际地去描写所谓高大完美无缺的英雄或理想人物。应该看到所有的新的人物，由于每个人的生活经历、思想水平、文化素质、业务能力、工作条件、家庭环境种种各不相同的情况，他们所进行的工作也需要不断探索和创新，也难免有所失误甚至犯严重错误，他既是新的人物，一个“当代英雄”，然而他又是一个普通人，也难免有自己的坎坷遭遇和命运，都难免有自己的局限性。

总之，在今天，我们仍然应该强调作家与群众相结合，去熟悉、去表现新的人物、新的世界。邓小平在第四次文代会的祝词中，号召“我们的文艺，应当在描写和培养社会主义新人方面付出更大的努力，取得更丰硕的成果”的同时，又特别指出“人民是文艺工作者的母亲。一切进步文艺工作者的艺术生命，就在于他们同人民之间的血肉联系”。这既是党对文艺工作者最殷切的期望，也是我们文艺工作者应该视为不可推卸的光荣的职责。

访问人：1979年召开的第四次全国文代会，对《讲话》的精神是否有所修改？

陈荒煤：从周扬在大会所作的报告《继往开来、繁荣社会主义时期的新文艺》来看，尤其是从邓小平代表党中央的祝词来看，我认为对《讲话》的根本精神并没有作什么修改，但是对《讲话》中某些观点的确作了重大的修改。例如把为工农兵服务、为政治服务，改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

不再提文艺从属于政治。邓小平非常鲜明地在祝词中指出：“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不是发号施令，不是要求文学艺术从属于临时的、具体的、直接的政治任务，而是根据文学艺术的特征和发展规律……创作出无愧于我们伟大人民、伟大时代的优秀的文学艺术作品和表演艺术成果。”同时，也还明确指出，要“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

邓小平在1980年1月16日在《目前的形势和任务》中更进一步指出：“不继续提文艺从属于政治这样的口号，因为这个口号容易成为对文艺横加干涉的理论根据，长期的实践证明它对文艺发展利少害多。但是，这当然不是说文艺可以脱离政治。文艺是不可能脱离政治的。……培养社会主义新人就是政治。”

在这个问题上，党中央对新时期的文艺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提法，显然比为政治服务，文艺从属于政治的提法更准确更科学一些。这更有利于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的健康发展，这实际上是对毛泽东文艺思想在社会主义新时期的丰富和发展。

访问人：建国后毛泽东的文艺思想，对照《讲话》来看，是否也有所发展呢？

陈荒煤：我认为，毛泽东对戏曲改革提出的推陈出新、百花齐放，1956年8月《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1957年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60年代上半期，他又提出了“洋为中用、古为今用”等等，这都是社会主义条件下对《讲话》的一些丰富和发展。尤其是双百方针的提出，现在来看，仍然有非常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毛泽东非常明确地指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是促进艺术发展和科学进步的方针，是促进我们社会主义文化繁荣的方针。”反复强调了艺术和科学中的是非问题，应通过自由讨论、实践去解决，采取慎重的态度，不要采取简单的方法去解决。

他后来还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中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个方针不但是使科学艺术发展的好方法，而且推而广之，也是我们进行一切工作的好方法，这个方法可以使我们少犯错误。”可惜，这个方针后来并没有真正得到贯彻。

访问人：双百方针没有贯彻的原因，您是怎么看的？

陈荒煤：毛泽东一贯重视政治战线、思想战线的阶级斗争，在提出双百方针的同时，他就指出：“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但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

紧接着，反右派斗争就开始了，然后，文化、思想战线上的斗争不断发生，动辄开展大批判，认为是阶级斗争的新动向，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活动，这都无法使双百方针得到很好的贯彻。事实证明，艺术创作、理论研究、学术问题都有一个不断经过实践的检验，不断探索与创新的过程，由于缺乏经验，或认识不足，或实践不够，不可能都有完全正确的预见和把握；这大多数是思想认识问题，可以通过自由争论的方式去解决。如果都当作阶级斗争，采取政治运动的方式去进行批判与斗争，也就无法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了。

我们不能完全否认，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还存在阶级斗争，但现在历史

已经证明，建国以来文艺战线上多次的运动的错误，已经得到澄清和平反，恰恰不是激烈的阶级斗争的反映，而正是因为因为在学术、创作方面没有贯彻双百方针。新时期以来，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总路线指引下，文艺工作有了蓬勃的发展，也证明正是坚持和发扬双百方针的结果。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不能很好地贯彻的原因，我认为还有一个如何看待中国知识分子的问题，对知识分子信任的问题。

访问人：毛泽东亲自在文化战线上发动的许多运动中，他显然对党所领导的文化工作、教育工作似乎有些悲观的看法。

陈荒煤：我认为，在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是非常重视知识分子问题的。1939年他亲自为党中央起草了一个文件，就是《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决定。他认为知识分子问题与革命胜利息息相关，号召全党全军大量吸收知识分子参加军队、政府与学校工作。他非常明确指出中国“没有知识分子参加，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他批评恐惧和排斥知识分子的种种心理，是由于不懂得知识分子对于革命事业的重要性，不懂得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知识分子和资本主义国家的知识分子的区别，为地主资产阶级服务的知识分子和为工农兵服务的知识分子的区别，不懂得要和资产阶级政党和日本帝国主义争夺知识分子等等。

此外，他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这些著作中，也都充分地肯定了革命知识分子的作用，他把知识分子归属于小资产阶级，是革命的动力，是无产阶级可靠的同盟军。

在这样一种思想指导下，我们党在“五四”以后的新文化运动中，在抗日救亡运动中，以及在抗战期间，我们都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吸收了大量知识分子，团结了最广泛的爱国人士和民主党派，取得了广泛的信任和拥护。最后，我们取得了中国革命的胜利。

但是建国之后，毛泽东对知识分子问题，显然有些徘徊。他有时认为，大多数知识分子是劳动人民的一部分，是拥护党和社会主义的。但他最后终于认为知识分子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例如，“文化大革命”前他对文艺工作的两个批示，对文艺战线的情况作了错误的估计，“文革”初期对教育的错误批评，以至认为17年来实际上培养的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也是证明。毛泽东这种思想有一定的历史根源：他在抗战时期的许多著作中，往往是一方面强调知识分子的重要性，在革命事业中有不可缺少的作用；另一方面，他也始终强调知识分子的改造问题，要防止思想上的空虚，行动上的动摇，甚至警惕在革命紧要关头的消极和叛变。

建国以后，毛泽东又认为，在社会主义建设中还有阶级斗争，这主要是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阶级斗争，而且还很尖锐（在全国宣传会议上讲话）。因而，一再把文艺方面某些学术、理论研究、创作中某些争论以及一些观点的分歧、缺点或错误，一概视为是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的反映，以政治运动的形式来开展斗争，恰恰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结果，如胡乔木在《当前思想战线上的若干问题》中所指出的：“应该承认，毛泽东同志对当代作家、艺术家以及一般知识分子缺少充分理解和应有的信任，以至长时间内对他们采取了不正确的态度和政策，错误地把他们看成是资产阶级一部分，后来甚至看成‘黑线人物，或牛鬼蛇神……，被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得已利用这种观点对他们进行了残酷的迫害。这个沉痛的教训我们必须

永远牢记。”

访问人：1962年，陈毅在广州召开的全国话剧、歌剧、儿童剧创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曾郑重宣布要给知识分子“脱帽加冕”，要脱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之帽，加上劳动人民知识分子之冕，还宣布向与会人员行了“脱帽礼”。

陈荒煤：但事实上没有能够脱掉这个帽子，1964年毛泽东关于文艺工作的两个指示下来了，文艺界又开始了整风，到了“文革”期间，许多优秀的作家、艺术家、知识分子却戴上了“反动文人”、“资产阶级反动权威”、“黑帮分子”、“黑线人物”以至“黑苗子”的帽子。这实在是一个悲剧。

访问人：为了总结历史的经验，您认为党应如何以毛泽东文艺思想来加强对文艺工作的领导，更好地贯彻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坚决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

陈荒煤：我认为，党为了加强对文艺工作的领导，首先要对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总的精神、根本精神，要有统一的认识，坚决贯彻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精神，认真总结历史经验，对过去每次文艺运动中发生的各种错误予以澄清和平反，清除长时期以来“左”的思想干扰，必须坚决贯彻邓小平南巡谈话的精神，在工作中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

同时，也应该重视，随着改革开放形势的发展，文化市场也不可避免受到西方不良文艺作品的影响和冲击，黄色音像、书刊的泛滥甚至相当严重，也有少数人搞资产阶级自由化，贩卖西方资产阶级文艺思想，甚至企图否认毛泽东文艺思想，这是我们应当进行坚决的斗争的。

我真诚地期望文艺理论工作者作出规划，使得比较全面、系统地研究毛泽东文艺思想的著作早日问世。

现在，我们还没有看到任何一个国家和党的领袖，像毛泽东这样关注革命文艺事业，重视革命文艺事业和整个革命事业的关系和利益，关心青年文艺工作者的健康成长，总的来讲，确实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原理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创造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他那“民族的科学的大众文化”的理想和要求，革命文艺工作者必须与群众相结合，去表现新的人物、新的世界，实际上正是世界各民族新文化共同发展的必经之途。今天，加强毛泽东文艺思想的研究，还应该看到，有一个非常好的条件和机遇。这就是邓小平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更加系统化，更加全面，更加成熟了。他在新时期以来有关文艺工作的重要讲话，已经科学地总结了历史的经验，为文艺工作在新时期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历史重任指明了方向，他对文艺创作开拓了更广阔的领域，也指出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应该加以改善，废止在文艺创作、文艺批评领域的行政命令，对文艺创作不要横加干涉，为培养杰出的人才创造必要的条件；同时，还要坚决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对错误的思想观点开展正确的批评，要肃清封建主义残余的影响和资产阶级种种腐朽的思想等等。总之，在一些重大的理论问题、原则问题方面，邓小平都已经作出了明确的回答，根据新的形势，新的情况，根据改革开放、现代化建设、两个文明一齐抓的精神，对文艺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只有学习、掌握了邓小平这些主要的思想和精神，我们才能更深入地研究毛泽东文艺思想，更好地坚持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更好地坚决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才能使文艺工作者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作出重要贡献。

因此，现在要全面地研究毛泽东思想，必须深入地、全面地学习邓小平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特别是新时期以来有关文艺问题的许多论述，有关重视知识分子、教育、科学的许多重要观点，这都是邓小平在新时期对毛泽东思想的极大的丰富和发展。

这就是我们今天要加强毛泽东文艺思想研究的一个重要的前提。我们必须全面地学习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深刻地理解邓小平在新时期以来丰富和发展毛泽东文艺思想的重要性和必然性，才能真正加强毛泽东文艺思想的研究。

1993年11月于北京木樨地

## 访王蒙——我看毛泽东

### 王蒙

王蒙，河北南皮人，1934年生于北京。194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3年创作长篇小说《青春万岁》，后因发表的短篇小说《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受到错误批判，1958年被错划为“右派”。1979年得到平反。其间在新疆生活了16年。复出文坛后他的文学创作成绩斐然，多次获国内外各种奖。历任《人民文学》主编、中国作协副主席、文化部部长和中央委员等职务。

这是北京早春的一个下午，日光融融，春风和煦，我们访问了王蒙同志。王蒙作为一个中外知名的作家，我们与他的谈话自然也是从文学开始的。

#### 三生有幸的一次关注

访问人：文学不能简单地裁决历史，只能反映人在历史中的命运、体验和感受。毛泽东已经成为历史人物了，但他又不是一个人，而是和现代中国人的命运、历史及文学紧密联系着，您作为一个作家，怎么看毛泽东？

王蒙：我无缘与毛泽东有直接的个人接触，50年代，只是在大型会议上或“五一”“十一”群众游行集会时，他站在天安门城楼上，我在城楼下，作为一个青年团的干部，带领一批青年学生游行而过，算是能见到他一面。记得距离最近的一次，是在中央团校毕业时，受到他的接见。

访问人：哪一年？

王蒙：1950年4月，中央团校第二期毕业。那次接见不光是我们，还有海军一个会议的代表。大家坐在下面，静候他的到来。毛泽东出来后，向大家招手，聚光灯打得很亮，然后由军队的同志和我们团校的学生代表分别上去讲话，向毛主席表决心。这算是最近的一次，所谓近，也有一二十米。

访问人：当时你有什么感受？

王蒙：那时的年轻人都一样，见到自己的领袖，尤其又是见到毛主席，都很激动，好像还喊了万岁。

访问人：除这种人数很多的集体会面外，你和毛泽东还有过什么关系吗？

王蒙：说起来有趣，他对我唯一的一次具体关注，是对我的一篇小说给予了关心，对我来说真是三生有幸。这是1956年底1957年初的事情，当时全国对我的那篇《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小说进行了争论，毛泽东知道了，并且讲了话，他的讲话虽然没有正式发表，但我还是听了他讲话的录音。

访问人：毛泽东是在什么场合讲的，讲了些什么内容？

王蒙：他讲了多次，包括在颐年堂召开的新闻、出版、文艺座谈会上，在最高国务会议上，都讲了这个问题，在中央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我听了录音。几次讲的意思大致内容是这样：听说王蒙写了一篇小说，有赞成的，有不赞成的，争得很厉害，反对的人还写了文章对他进行“围剿”，要把他消灭。可能我这也是言过其词。我看了李希凡写的文章（指李希凡在《文汇报》上发表的《评“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不大满意，李希凡也是新生力量嘛，现在写文章我看不懂，大概是当了政协委员的关系吧。毛说到李希凡时有点讽刺的意味，不过时过境迁，这些都没关系了。现在李希凡还是我的朋友。除李的一篇外，还有一篇，就是陈其通、陈亚丁、鲁勒、马寒冰四个人合写的准备在《人民日报》发的《是香花还是毒草》，主意要把我的那篇小说打成毒草。后来这篇文章的清样送到毛泽东那里，他看后非常不满意。访问人：他们四人当时受到批评，是不是跟这件事有关系？王蒙：可能

跟这有关系，说他们是教条主义。因为在这之前，他们曾发表过一篇文章，谈整个文艺的形势，受到批评。他们后来写的这一篇也被毛泽东制止了，文章没有发出来。毛泽东看了这篇文章后说，反对王蒙的人提出北京没有这样的官僚主义，中央还出过王明、出过陈独秀，北京怎么就不能出官僚主义。王蒙反官僚主义我就支持，我也不认识王蒙，不是他的儿女亲家，但他反对官僚主义我就支持。他是共青团员吗？（别人回答说：不是，是党员），是党员也很年轻嘛，王蒙有文才，就有希望。当然了，《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也有缺点，正面人物写得不好，软弱无力，但不是毒草，就是毒草也不能采取压制的办法。这一点给我的印象很深。接下来，他还引了王勃《滕王阁序》中最有名的两句：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说：我们的政策是落霞与孤鹜齐飞，香花并毒草共放。毛泽东的讲话内容我记得就是这样。他讲这些，当然都是从最高意义上作为一个政治家讲的，我体会他是想通过这件事尽可能把空气搞得活跃一点，创造一个自由环境，真正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些讲话给了我极大帮助，起码也有保护作用，使我的处境一下子变得很好。当然这些都发生在反右之前。

访问人：毛泽东保护了你，后来为什么还把你打成了右派呢？

王蒙：现在有很多外国记者也这样问我，我说，不知道。我只知道反右派运动一起，各报刊对这篇小说还是予以否定，时间不长。我就被定为右派。定我为右派的过程和内情到现在也不知其详，我也不想知其详。《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送到毛泽东那里，他借题发挥讲了那么多道理来开展鸣放，他是不满意苏联的教条主义，也不满意那四个人的文章。四个人的文章在苏联的文学报上转载了，钟惦斐的《电影的锣鼓》在南斯拉夫的报纸上也转载了，毛泽东说真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他认为钟惦斐的文章有点右，四个人的文章是“左”，当时他把苏联作为“左”的教条主义来批评，同后来我们批评苏联修正主义是不一样的。至于我自己定不定右派，我认为没必要报到他那里也不可能是经过他的过问的。访问人：后来的整个形势都变了。王蒙：我当时顶多算副处级，根本用不着报到他那儿去，他也不会再有兴趣。再者他的整个思想有变化，我看他后来的思想是发生了重大变化。访问人：你的小说要是放在1957年后发表，情况可能就完全不一样了。

王蒙：恐怕更糟了，幸亏他老人家说过那些话，虽然给我定为右派，讲老实话对我还是比较客气、对我的处理也是最轻的，报纸上也没有大张旗鼓地要把我批倒批臭。

访问人：这可能和毛泽东年初的讲话有关系？

王蒙：我觉得有点关系，所以从我个人来说，我很感谢老人家，起码他对我的小说保护过。当然我无权也无法要求像他这样的党和国家的领袖不断地过问我的创作、个人的遭遇，我不能那样去要求，也不应该再去麻烦他。说你一次已经三生有幸了，还能等着再来？

#### 浪漫主义的情怀

访问人：你如何看待毛泽东？给你印象最深的是什么？

王蒙：1957年反右以后，我陷入那样一种处境，当然没有可能和毛泽东接触，但即使没有给他汇报工作或接受他的教育的机会，也总有一种感觉存在，这种感觉除去大家都知道的他作为总体在历史上的作用外，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他拥有一种浪漫主义的情怀，他的诗歌是浪漫主义的，他的书法也是浪漫主义的。

访问人：就是说比较有气势。

王蒙：有气势，不受约束。他的思想非常自由奔放，不受条条框框的束缚，也喜欢说些比较惊人的话，所谓“语不惊人死不休”。有时他把一些大事说得很小，“天塌不下来”这是他喜欢说的，还有“文革”中也说过的这样的话“无非是死几个人”。

访问人：50年代末他在提到不怕原子战争时，也曾说过无非死几个人，即使死一半，还有一半继续革命。

王蒙：这个特点最突出。他批评王明教条主义，用的方式也是非常轻松的惊人的方式，说他们无非就是不知道几个事情：第一不知道人要吃饭，第二不知道打仗要死人，第三不知道路要一步步地走。（大意）你看他讲得多么轻松，好像是很小的事情，但实际上抓住了要害。教条主义搞了许多高深的理论，反倒回避了生活，其实革命包括战争是最实际的东西。教条主义的要害不在于用理论比较理论，那很难鉴别，不容易驳倒，我在解放前就看过王明的《为中共党的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的小册子，光看书，王明也是一套一套的，不能看出他有什么错误。毛泽东用三件事来批驳王明，是抓住了他最要害的地方。

他的有些做法，也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比如他最喜欢游泳，就进而在全国掀起了一个高潮，游泳本来是国家体委的任务，最多由荣高棠抓也就够了。可他亲自抓。

访问人：他给游泳赋予了政治方面的意义。

王蒙：不仅是政治方面，还有哲学方面的意义，后来变成一条语录，“大风大浪并不可怕...”。“文革”中的红卫兵拉练，是最典型的毛泽东方式，既解决了实际问题，又给它一种浪漫主义的色彩。实际问题是红卫兵到处串连，都上火车，火车受不了，整个铁路的运行秩序已经一塌糊涂，在这种情况下，他就叫红卫兵不坐火车，徒步拉练，用这种浪漫的方式解决了实际问题。还有金门打炮中提出“单日打炮，双日不打炮”。都是不可思议的，非常富有想象。

访问人：似乎像猫玩老鼠，给人一种游刃有余的感觉。

王蒙：1958年大跃进中批评所谓右倾保守，他引用了枚乘《七发》，这个事例一方面说明了他的才气，另一方面也说明我们中国文化、东方文化的独树一帜，不能什么事情都从第三国际的条文里或《联共党史简明教程》里去找根据。

访问人：就是说，他有中国气派。

王蒙：中国气派，非常独特的。这种浪漫主义和他作为一个革命家的自信、自负有关系，同时也和他的个人经历有关系，他从一个很普通的山坳里出生的农民子弟，到一个师范学校的学生，再到一个最一般的图书管理员；在党内，一开始的地位也很低，可到最后，他成为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位的领导人，并成功地领导了中国革命。这种浪漫主义，还和中国革命根据地所实行的军事共产主义的生活方式有关系，军事共产主义是很平等的，顶多分为大灶、中灶、小灶，区别很小。官兵关系、军民关系、上下级关系都很密切，在人们中有种精神的力量，所以毛泽东实际上喜欢强调精神的作用。

访问人：他非常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

王蒙：很注意精神，比如那段著名的吃苹果论，提出“不吃苹果是很高尚的”，多么形象、深刻。用这种浪漫主义和军事共产主义结合起来，在解

决一些革命任务时他获得了非凡的成功。包括“山沟里出马克思主义”这种说法，也带有浪漫主义的色彩，因为这很难从理论上作出细致的分析，马克思主义本身并不是出在山沟里，而是现代工业，起码是近代产业革命之后的并且积累继承了一个长远的文化传统的产物。但他讲山沟里可以出马克思主义，因为中国革命的依据恰恰是在山沟里，所以他这样讲是有道理的，并且是反驳王明对山沟的不敬。在指导战争中他提出的许多军事思想，既是非常实际的又是很浪漫的，几大战役的策划、总体上的以少胜多具体上的以多胜少，都成功了。

但这种浪漫主义又有它的缺陷，毛泽东晚年的悲剧就在于他把在革命战争中行之有效的经验照搬到经济工作与治理国家中，特别是用那种浪漫主义的办法来搞经济，遭受了挫折。

访问人：这就是说，当他作为一个国家的领导者时，他仍把他的浪漫主义运用到这个范围中就容易出毛病。

王蒙：特别是搞经济建设，因为经济生活的很多规律并不浪漫，至少利益原则一点都不浪漫。但毛泽东不信这个利益原则，他动不动就讲我们在延安时如何，没有这套东西不是照样也成功了吗？完全忽略了在掌握政权前，当时还是一个比较小的根据地或革命队伍人数不太多的情况下，人们组成的军事共产主义的关系，和后来掌握了政权以后，面对一个几亿、十几亿人口的国家把社会生活组织起来，这两个概念是不一样的。

访问人：这恐怕是两个规律，也就是说革命的规律、战争的规律同搞建设的规律是不一样的，不能生硬地搬过来。

王蒙：对。但我觉得还有一个问题，就是马克思主义说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是第一的，人怎样生活就怎样思考。延安时期，基本的一条是军事共产主义，顶多分大、中、小灶，胡宗南进攻延安，把中、小灶撤销，全部吃大灶，毛泽东也去吃大灶。但解放后能这样吗？当然了，就是在延安时毛泽东也不可能天天这样，但起码他可以走到农民那里，抱起一个娃娃，和农民随便说上几句话。建国后这些都不可能了，光保卫制度也受不了。所以军事共产主义可以用它来夺取政权，但不能用来巩固政权，特别是不可能发展生产力，因为政权一掌握，老百姓就要求你提高他的生活，否则他就不会拥护你。可见，你如果不能发展生产，不能提高人民的生活，总是一个缺陷。

访问人：很多问题就会出现，不尖锐的也变得尖锐了。王蒙：所以他的浪漫主义必然要跌跟头，不重视经济规律、不重视物质利益原则、不重视市场价值，发展到“文革”，他的浪漫主义更达到顶峰，严重脱离了实际。他是想建立一个和所有社会都完全不一样的理想国，可是这个理想国不但没建成，相反的，由于“文革”的发病，严重破坏了生产，破坏了社会的安定。访问人：“文革”的发动，有理想主义的因素，是不是还有别的动机？王蒙：原因很复杂，有他对社会的理想主义，但又有党内的斗争、人事的关系，国际环境的作用。这问题太复杂了，一时说不清。在经济生活上，毛泽东一直保留着许多他在革命战争中的习惯用语，所以1958年他提出的一些经济口号都是当年打仗的口号，什么“钢铁元帅升帐”，“电力、交通是先行官”，“打歼灭战”，砸铁锅也要把钢铁搞上来，一年翻一番等等，这些要用在战争上很可能是行之有效的，但搞经济建设不行。战争可以这样，为打下一座城市不惜一切代价，先控制了再说；经济建设不能为了钢铁产量其他一切都不管了，国民经济的均衡全部破坏，以后用了几年国民经济才慢慢恢复。我有个

感觉，从 1959 年以后他已经不太爱大篇地讨论经济问题，他有点回避发展生产力这个根本问题。访问人：是不是对于经济问题的心态很矛盾，一方面他从来就不想照苏联的模式走，但他自己搞了一次又不成功，找不到一条合适的路，心里很矛盾？

王蒙：他对苏联的不满是由来已久的，1956 年前后，他是想摸索出一套和苏联不同的路子，他先提出百花齐放，又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是要树立一个比较灵活、务实的社会环境，建立一个事实求是的社会主义国家，走一个和苏联不一样的中国独特的道路。但他这样做的结果，在 1957 年后受到了来自两个方面的压力，一个是他确实受到了某些知识分子给以他确实承受不了的批评的压力，另一个是他受到了党内一些不赞成他的新思路的人的压力。所以 1957 年后，虽然走了和苏联不一样的道路，但恰恰是走了比苏联更“左”的道路，这又是他的悲剧所在。

### 中国的文人和政治

访问人：在文艺上，毛泽东有些什么特点呢？

王蒙：在文艺上，毛泽东个人的创作是非常豪放的，他对艺术的爱好不俗，他喜欢庄子、孟子、屈原、三李，他的爱好也不是很一般的爱好。

访问人：比较大气。

王蒙：很大气。他有时直接引用李贺的诗，很喜欢庄子“鲲鹏展翅九万里”的境界。但他在文艺上发动的思想批评运动太左、太厉害了。从建国初就一个接一个，从来没有断过。

访问人：从一个因素说，中国的文人和政治好像总爱搅和在一起，脱离不开。

王蒙：这是中国的历史传统。前不久一份报纸登载毛泽东身边工作人员的回忆，其中有一段不管是真是假挺有意思：毛泽东让他的护士读史书，读完后讨论起“秀才造反三年不成”这段话，毛泽东说，这实际上说客气了，三十年也不成。然后问，你说为什么？护士不好回答，他接着说，因为秀才有两个特点，第一，光说不干，说完就完，第二，一个瞧不起一个，永远团结不起来。如果这话是毛泽东说的，那真是说对了。

访问人：毛泽东对知识分子的有些特性摸得很透。

王蒙：他是一道一道收进去的，最后谁也跑不了。

访问人：一国文人和政治分不开，也不能简单说分开就好？

王蒙：这和历史的情况有关。抗日战争时期怎么能分开，大家都是生死存亡的问题；解放战争时也分不开，全国人民都面临两个中国之命运。相反，社会越稳定，文艺反倒可以和政治适当分开。现在实际上已经分得很开了，起码很多歌舞、绘画不能说每个都和政治有密切关系，有的就是娱乐，所以，社会稳定反倒慢慢能分开。据我看毛泽东对文人有一定的蔑视，也有一定的不信任感。

访问人：他有时说，书读得越多人越蠢。

王蒙：他喜欢举一些特别极端的例子。比如说青霉素是一个染坊老板偶然发现的，这作为科学发明的趣闻轶事可以讲，作为科学研究的普遍规律就离谱了。其实，讲到作家的趣闻就更多了，如据说有人最喜欢在大便时构思，必须在抽水马桶哗哗响时，他的思维最活跃。这些当作笑话说可以，但这不是规律。还比如他批评大学教育时，说文学系的毕业生不会写小说。这也不合道理。写小说不是文学系的任务，作家的培养是另外的路子，文学系是研

究文学、文学理论和文学史，培养文学教师和语文工作者，不是培养作家，不能用这个责备。

访问人：毛泽东的讲法表示一种对知识分子的不信任感，但有时他又表现出一种自信，比如他经常说，不要妄自菲薄，不要怕教授，小人物可以打倒大人物等等。

王蒙：历史的规律是小人物打倒大人物，这话又对又不对，小人物打倒大人物是可能的，但小人物也要向大人物学习，如果否认学习和借鉴的作用，只看到打倒就不对了。我们经常说马克思主义有三个组成部分，还有三个来源，说明马克思也是向前人学习的，不能见一个大人物就打倒一个，这太可怕了。

### 毛泽东对现代的影响

访问人：小人物和大人物的关系，也应该看作是批判和继承的关系。我们想再问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现在的时代和毛泽东的时代已经发生了变化，至少思路不完全一样了，那么，毛泽东对我们现时代的意义何在？

王蒙：我看它的意义就是一个革命党要完成从夺取政权到管理国家，特别是要组织好社会生活和经济生活的转变。毛泽东在世时没有很好完成这个转变。这个任务实际是由邓小平完成的，邓小平恰恰是高明地把握了毛泽东失误的这一点，把党的工作重心从搞政治斗争转到经济建设上来。所以邓小平提出现在不搞争论，因为对一个执政党来说，绝对不能是按照条条框框来执政，只能按对国家有利，对人民有利，对发展生产有利这三条，这也是邓小平提出的“三个有利于”，才能努力地起一个国家管理者的作用。但我认为毛泽东的个人魅力仍然存在，我们在现实生活中也会感受到，因为他毕竟开辟并领导了一个时代，哪能一时半会儿就消失呢？至少他的才能是卓越的。

访问人：他的才能起了什么作用？

王蒙：他的才能是超常的，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但超常不见得都是好事。作为一个政治家特别是执政的政治家来说，有时想得太超常就脱离了凡人世界。比如他经常嘲笑，无非是打破一些坛坛罐罐，没有什么了不起。这不应该嘲笑，老百姓当然要保护他的坛坛罐罐，总嘲笑普通老百姓过安定生活，包括在经济上的安定富裕的要求，有什么好处呢？这和他的超常思维有关系，他的超常思维尤其表现在批判资产阶级法权上，那道理太高明、太伟大了，连按劳取酬都是资产阶级的。问题是那时中国连起码的按劳取酬还没做到。现在也没完全做到，脑体倒挂就不符合按劳取酬原则。把这些都批了就更空了，我们到底要干什么呢？所以他的超常，也就带来了悲剧性灾难性的后果。

访问人：他在群体中是不是有一种孤独的东西，还有一种不满足的感觉。

王蒙：别人跟不上，但反过来造成晚年对群众利益的漠视，虽然他一辈子讲群众观点。到晚年时，包括党内的很多干部都有种跟不上的感觉，越喊紧跟越跟不上。他的思想在晚年仍然非常活跃，仍然不断有新东西冒出来，但有些又不完全符合实际。这个经验教训是非常重要的。

访问人：对他领导民主革命的成功有比较一致的共识，但他在领导建设中的曲折和教训，对我们今天可能更 useful。

王蒙：有些问题我无从了解，如他的个人性格，我没有资格胡说。现在追究这些已毫无意思，因为他这个人已经是历史人物了。但从考察历史这点

上说，他没有从革命时期成功地完成向管理国家和组织经济生活的转变，包括我在前面说到的对群众一般利益和要求的漠视，这个教训是非常深刻的。但另一方面，他的坚强的意志、乐观的精神、奔放的思路和对国家前途的憧憬都是好的，是我们这一代甚至包括下一代人都要学习的。作为一个中华民族的英雄，他是了不起的。

1993年2月1日于北京朝内北小街

## 访侯宝林——毛泽东听我说相声

### 侯宝林

侯宝林，1917年生，北京人，幼时曾学京剧并搭班演出。16岁改学相声。1949年后，曾入北京市曲艺工作团，中央广播说唱团。后任中国广播艺术团艺术指导，北京大学兼职教授，中国曲协副主席。著有《谈相声的形式、结构、语言》《曲艺概论》（合著）等。

毛泽东的爱好是多方面的，看京戏、听相声是他人生的一大乐趣。侯老在病床上的这番谈话，既表现了毛泽东的这个特点，同时也表达了侯老先生对毛泽东的深深怀念之情。还要感谢蒋建农同志，这篇谈话是他提供给我们的。

访问人：毛泽东一生爱好文艺，喜欢听京剧、曲剧、特别喜欢您的相声，他还说过：“侯宝林是个人才，是个语言研究家。”我们今天来，想请您谈：毛泽东听您相声的情况。

侯宝林：今年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毛泽东同志诞辰100周年。为了纪念这个日子，有人特意编排了一出叫做“毛泽东与侯宝林”的电视小品，在社会上产生了一些反响。为此，一些老朋友和新闻出版界的同志都要我写点儿什么，我又何尝不想了却一桩旧心愿，只是一场大手术夺走了我的整个胃脏，化疗又摧毁了我百分之八十的体力，手中的这支笔提起来没有一吨也有八百斤，真是力不从心了。毛主席听我说相声不是进城以后的事。那时在香山，还没搬进城住呢。每次开会几乎都有晚会，有时在东交民巷。当时还是木板条儿的大椅子，只有中间第三排放两把藤椅，是为主席和朱老总准备的，因为全国正在打仗，还是“战犹酣”的时候，朱老总是很少来的，可主席每次都来。我记得头几次在我演出时，中央首长都在，那时任弼时同志很瘦，还没去苏联养病呢。后来他从苏联回来，我见到他在天安门城楼上，胖多了，可精神了。那时我的相声节目有点儿特殊，就是说不论什么晚会——歌舞晚会、杂技晚会、还是戏曲晚会，都加我一场相声，大概因为毛主席爱听相声吧，好像是在1950年，杨尚昆同志（当时他还是办公厅主任）见我去了，非常高兴，说：“哪一个人能使我们的主席这样高兴，只有侯宝林，侯宝林是我们的国宝。”当然，这可没有文字记载啊。

访问人：这些晚会，当时都由谁来组织？

侯宝林：那阵儿，彭真同志是总提调，所有的晚会都归他负责。当初北京还没有文化局，叫文艺处，刚进城叫文管会，后来成立了文艺处，张梦庚任处长，后改局了，他就升为局长，他也是主席很喜欢的一个演员。有一次，我和他商量：“今晚有两个晚会怎么办？”他说：“你先到那边儿去，让车跟着你，你那边儿下台，大褂别脱，就跟车回来。”回到这边儿，梅兰芳的戏刚完，大伙儿正不知怎么办呢，我告诉检场的：“你搬着场面桌，顶着走，别等梅院长下来，你就把桌子摆上。”我就跟着上了。那时候没有报幕员，不像后来，每场节目都有报幕的。那就只有听我指挥了。等梅先生快走到下场门儿，主席站起来，把风衣往胳膊上一搭，就要走。桌子搁上了，主席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儿，怎么梅兰芳演完还搁个桌子呀？我们跟着就上了，主席笑了，放下衣服，坐下来听我们说相声。那时节目都长，一段相声至少是25—30分钟，尽管已经很晚了，主席还是从头到尾听完了才走。

主席听我说相声，喜欢用拳头打拍子，这个细节我注意过。主席擅长诗

词，人所共知，那几年刚进城，是他精力最旺盛的时候，写字也是那几年的爱好，诗词也写得多。当我在相声中提到诗词时便立刻引起了他的注意。有一次，主席刚到，还没坐下，正站着脱风雨衣，一听我说到诗词，马上转过头来给了耳朵（注意听）。我就说最近作了一首诗，其实，诗是引用老昆曲《昭君出塞》中王龙的词儿，后来被评剧借过去了，这四句诗是“胆大包天不可欺，张飞喝断当阳桥，虽然不是好买卖，一日夫妻百日恩。”一般主席乐的时候，就是脸憋得红红的也不出声，只有这一回张开嘴哈哈大笑，大概是这首诗尤其是这第四句词儿大出乎他的意料之外吧；

访问人：听说您还和毛主席同场跳过舞，有这回事吗？

侯宝林：有过。1954年，政务院改了国务院，国务院的工作加重了，主席的工作减轻了，仗也打完了，蒋介石去了台湾。主席工作少了，春藕斋的舞厅就是这时候为他盖的，我们原来是在老春藕斋演出，后来又翻修了一下。翻修后我们每周进去两次，每礼拜三、六。主席的舞会很少有人去打搅，朱老总只去过一次，一家三口，老总、夫人，带女儿，那时我看老干部穿布拉吉还是头一回，是康克清同志。江青就去过一次，还是在舞会正式开始前，呆了一会儿就走了，有人让我陪她跳舞，我没跳，因为我不会，陪王光美同志跳过一次，跳了一身汗，她不舒服，我也不舒服。人家会跳，我不会，人家很累，所以后来凡是夫人们来了，让跳舞，我绝对不跳。刘主席夫妇也只是偶尔去一下。说起跳舞还让我想起一件事。一次，我被人硬拉着跳舞，边跳边说精神不集中，一不小心正撞在主席身上，我当时很紧张，心想糟了，那种心情不亚于契河夫笔下谨小慎微的小公务员伊万·德米特里奇·切尔维娅科夫。要知道在半个多世纪里，他毕竟是中国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土地最具权威的大人物啊！当我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看主席时，发现他笑了，目光是那样慈祥，全然没有动怒的迹象。这件事，这令人难以忘却的目光，几十年来一直留在我的记忆中。

访问人：毛泽东听您的相声，除了他喜爱以外，还有什么别的原因吗？

侯宝林：毛主席确实喜欢听相声，这是可以肯定的。有人说毛主席听相声也是搞社会调查，了解民俗，了解民间的喜、怒、哀、乐。我们当时学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非常认真，完全按照“讲话”的精神搞节目，创作新的，整理旧的，把旧相声中那些不健康的東西去掉，创作新社会需要的相声。1950年我们成立了“相声改进小组”，完全靠自己的力量编了四个小册子，都是新相声，使相声打了个翻身仗（而且没有向上级要一分钱）。这在当时太难了，首先就说我们那点儿马列主义水平吧，实在太难了，全靠“讲话”的精神作指导。主席喜欢我的相声恐怕和这一点有关，当然他也很喜欢我这个演员。1956年，大概是由于我发表了几篇有关相声的学术文章吧，主席见到我说：“怎么？你要当博士哟！”从这句话里，我体会了主席的心情。解放后听我说相声最多的可能要算主席了，现在回忆起来，大约有150段左右，连新带旧，一些传统节目我们在外面已经不说了（不合时宜），到了主席那儿人家说：“你还教育主席呀，外边不说的，这儿也可以说。”不过我使的传统段子都是经过自己加工整理的。

旧相声中许多低级庸俗的东西，只有经过改编的主席才听得过去。我这个人适应性强，接受新事物快，我在台上别人看着不旧，没有旧艺人的气质，这大概也是主席喜欢我的原因。上台去俗不可耐，小市民那一套，连蹦带跳，出洋相，胡来一通，他早就厌烦了，所以在主席身边工作了那么长时

间，总算没落下什么不好吧。

访问人：在您说过的相声中，毛泽东最喜欢哪些段子？

侯宝林：《关公战秦琼》是主席喜欢的节目之一，他听我说相声没点过，说什么，听什么（他喜欢的节目还有一个叫《字意》）。怎么知道主席重视《关公战秦琼》呢？是因为当时有好几个人跟我说，比如马专员（马锡五），当时最高法院院长，也就是老区常说的马专员，《刘巧儿》里还提到过，他说：

“你写嘛，写官僚主义嘛。”习仲勋同志也说过，中央提出反官僚主义。当时我们就搞了《关公战秦琼》，讽刺瞎指挥。这个段子后来被许多人引用，老舍先生和夏衍同志都在《人民日报》上发表过文章。1960年我们在广州开创作会议，第一个引用的是陶铸同志，他说：“我们不要做韩复榘父亲那样的人，瞎指挥。”第二个人是陈毅，陈老总，他是1962年讲的。主席当时听了这个段子很高兴，几天后我正在表演，刘主席夫妇抱着一个孩子来了，主席把刘主席叫到身边，让我说《关公战秦琼》。这是主席唯一一次点节目，可见这个节目在当时影响不小，惊动了大人物。

访问人：最后问一个问题：据说您当全国人大代表，还是毛泽东亲自提名的，到了他的晚年，您和他有些什么交往？

侯宝林：四届人大毛主席亲自提名补选10名代表，除了我，还有萧华同志，听说当时他还在劳动。四届人大是1975年1月份开的，我是1974年“五一”才宣布不是“黑帮”的，但什么节目也不让上，不让工作。有个段子叫《种子迷》，我改了十一稿，他们老让改，就是不通过。1975年主席在湖南养病期间，特意要我为他录了10段相声，这10段相声是：《醉酒》、《婚姻与迷信》、《改行》、《串调》、《关公战秦琼》、《买佛龕》、《汾河湾》、《戏剧与方言》、《卖包子》、《阴阳五行》。这些节目有时电视台还放。这就是毛主席最后看到我为他说的相声了。一晃儿，毛主席离开我们已经16年了，可每年12月26日有不少人家仍保留吃“寿面”的传统。这是对毛主席的纪念。

## 访艾克恩——毛泽东和延安文艺运动 艾克恩

艾克恩，1936年生，陕西米脂人。1947年参加西北文工团，开始从事文艺工作。

建国后，曾在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北京市委中国艺术研究院。现任中国文学艺术研究院研究员。著有《延安文艺运动纪盛》、《延安的锣鼓》等。

延安文艺有过它的灿烂，有过它的辉煌，艾克恩同志说，这灿烂、这辉煌是同毛泽东的名字连在一起，它并伴随着中国革命的胜利，一起走向了全国。

访问人：听口音，您是陕西人？

艾克恩：我是陕西米脂人。那是个很有名的地方，民间有段顺口溜：“米脂的婆姨绥德的汉，清涧的石板瓦窑堡的炭。”因为米脂出了个貂，以后都说米脂出漂亮姑娘。

访问人：比较起来，米脂一带在陕北是不是富庶一些？

艾克恩：水土比较好，而且文化教育比较高，像米脂中学、米脂师范都是有名的学校。米脂出了许多有名的人物，像李自成、李鼎铭都是米脂人。我党的一些领导干部如刘澜涛、郭洪涛也是米脂人。

陕北还有很好的民歌传统，《东方红》就是我们隔壁佳县一个叫李有源的农民写的词，他是移民，当时陕北人口多、土地少，人民生活困难，毛主席就动员陕北几个县的人民去延安那边人口少、荒山多的地方开荒，使生活得到了改善。他有这个感受，就一路走一路编歌唱。起初叫移民歌，有九段歌词，延安鲁艺的马可知道后，感觉很好，就记了下来，并请公木改词，由原来的九段改成三段，歌名也改成为《东方红》，就在陕甘宁边区唱起来了。

访问人：曲调变没变？

艾克恩：曲调没变，就是陕北的民歌曲调。但经过后来改编，整个情绪不一样了，听起来很庄重。当时我读书的学校里也唱这支歌，还闹秧歌。我是1944年考上米脂中学的，到1946年，胡宗南进攻延安，我们学校搬到黄河岸西边，一边游击一边读书。1947年西北文工团派人到我们学校招收团员，学校推荐了几个人，其中有我，我唱了个“兄妹开荒”的片断，就录取了。第二天背上铺盖就走，到了绥德的义合，从此我就参加了革命工作。

访问人：以后您就搞文艺工作了，后又搞文艺研究，特别是延安文艺研究，搜集了大量材料，并取得了一些研究成果，最近，我们看到您在《人民日报》发表的《延安的锣鼓》一文，我们主要想请您谈谈延安文艺座谈会前后的情况。

艾克恩：谈这个问题，先要说到大批文艺人才到延安的情况。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之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在这国家危亡之际，成千上万的热血青年冲破重重阻拦，从祖国的四面八方奔向延安。其中有作家丁玲、欧阳山、草明、肖军、罗烽，诗人艾青、严辰，画家张汀，作曲家贺绿汀、冼星海，舞蹈家吴晓邦等。在这当中，丁玲和冼星海最有代表性。著名女作家丁玲，拿着宋庆龄赠送的350元，冲出国民党的牢笼，于1936年11月率先进入陕北，毛主席、周副主席设宴款待。毛主席问：“你打算做什么？”丁玲毫不犹豫地答道：“当红军！”于是她换上戎装、跃马扬鞭到了陇东前线，写下了歌颂彭德怀、左权将军的佳作。毛主席挥毫赠词：“洞中开宴会，招待出牢人”，“昨天文小姐，今日武将军。”冼星海在武汉看到

延安鲁艺要招生的消息，还看了几本介绍陕北情况的书，萌发了到延安去的愿望。他在日记里谈到：看了这几本书，觉得那地方不错，那边是光明的，这边越来越黑暗。但他又一时下不了决心，怕没有创作的条件、没有来去自由。于是他给在陕甘宁边区的人写了封信，提出几个问题：一是那地方是不是自由，进去后想离开能不能出来，再一个是创作受不受限制，有没有创作自由。这些情况是可以理解的，反映了当时一部分知识分子的思想状态。延安来信说，没有问题，你来后看看就知道了。于是冼星海就来到了延安，认定“延安就是新中国的发祥地”，“那里有无限的希望和光明”，他的感受是：延安的窑洞暖，小米香，是最理想的施展才能的地方。很快他和光未然创作了《黄河大合唱》。原来他们在大后方就熟悉，冼星海找光，光未然说，他看到黄河很有感触，准备写歌颂黄河的，谈妥了，光未然用一个星期写出歌词，冼星海用一个星期也写出了曲子。《黄河大合唱》唱出了中华民族的苦难，也唱出了炎黄子孙的刚强。毛主席听后连连赞好，周副主席欣然命笔：“为抗战发出怒吼，为大众谱

出呼声！”《黄河大合唱》从延安唱到全国，所有抗日战场，无不发出“怒吼吧，黄河”的战斗强音。

访问人：为什么如此众多的专家学者、文艺青年、离开大城市跑到小山沟，不住楼房去住上窑，不走柏油路去爬陡坡，就是说从比较舒适的环境自愿跑到艰苦的地方去呢？

艾克恩：我认为，主要是理想、信念和意志给了他们力量。正像“狂飚诗人”柯仲平说的：“青年，中国青年！延安

吃的小米饭，延安穿的麻草鞋，为什么你爱延安？”“我们不怕走烂脚底板，也不怕路遇‘九妖十八怪’，只怕吃不上延安

的小米，不能到前方抗战；只怕取不上延安的经典，不能变成最革命的青年！”这是当时大多数文艺青年奔向延安的心声和志向。那么多文化人从大城市亭子间来到偏僻落后的小山沟，自然只能带来他们所熟悉所喜爱所习惯的那些大城市里的东西。所以一个时期，延安舞台上竟相上演大戏。1940年元旦公演的《日出》，是在延安舞台剧目匮乏的情况下急忙赶排的，这是一件新奇而轰动的事。排演前，毛主席曾邀请鲁艺戏剧系主任张庚交谈，说延安剧目少，可以上演一点国统区的作品，《日出》就可以演。并说这个戏应当集中一些延安的老演员来演。经过20多天突击，搬上舞台，反映甚好。继《日出》公演后，延安青年艺术剧院赶排《雷雨》。西北文工团赶排《蜕变》和《北京人》。上演的大戏还有《上海屋檐下》、《雾重庆》、《法西斯细菌》、《李秀成之死》、《扬子江暴风雨》、《太平天国》、《塞上风云》；外国戏有果戈理的《婚事》、《钦差大臣》，等等。这些剧目搬上延安舞台，无疑对活跃群众文化生活，丰富演员表演技能，沟通文化交流，都是很有益处的。

访问人：但演出这么多大戏，老百姓看得懂吗？

艾克恩：这确是当时的延安舞台存在的一个偏向：脱离群众，脱离实际。延安作家自己写的东西较少，直接反映现实生活的更少。正像张庚1941年4月在《解放日报》撰文所说：“从延安演《日出》之后，演大戏成了风气，这是一种严重的偏向。”

在延安的其他文艺门类，也存在着严重的轻视实践、远离群众的现象。在鲁艺文学系任教的严文井曾说，当时“学校四周住的都是农民，而我们却

不同农民往来，除了有时候要向他们买西红柿和甜瓜，才同他们当中的两个人说说话”。“我们每个人都自认为是大艺术家。农民当然是不在我们眼下的，我们彼此高谈阔论，上下古今，天南海北，海阔天空。农民算什么呢？他们没有文化，啥也不懂，而且连‘百分’也不会玩儿，身上只有虱子。于是我们有的人坐在窑洞里，就写自己5年以前，或10年以前的爱情。”

访问人：除了这些现象之外，在艺术观点上是否也存在一些问题？

艾克恩：艺术观点也属于旧的一套，无非是自我复旧，自我表现一类。由于对工农兵“不熟、不懂”，只好在知识分子圈内找朋友，把创作视为个人情绪的表露，或用工农兵的外衣装饰作品。有人主张还是杂文时代，有人提倡超阶级的人类爱，有人甚至认为马列主义会破坏创作情绪等等。

访问人：文艺工作队伍中在政治思想上也存在问题吗？

艾克恩：更严重的是政治思想混乱，如认为延安一片“黑暗”，没有光明；延安“衣分三色，食分五等”，视而不见从领导到下级，从长官到伙夫，政治平等，团结友爱；认为延安生活“单调”、“枯燥”、“没有趣味”，感觉不到延安那种生机勃勃、歌声朗朗的景象。当时一些文章和作品，明显反映了这种观点和情绪，起到了涣散军心、瓦解斗志的作用。面对这种情况，战斗在晋西北前线的贺龙将军愤然指出：“我们的战士在前方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保卫延安，你们却在后方‘说延安黑暗。如果真是这样，我们就要‘班师回朝’了”。

朱总司令在鲁艺两周年会上的讲话中也谈到：“打了三年仗，可歌可泣的故事太多了，但是好多战士英勇牺牲于战场，还不知道他们姓张姓李，这是我们的罪过，而且也是你们文艺的罪过。”“希望前后方的枪杆子和笔杆子能够亲密地联合起来”。

对此，毛主席也批评说，延安文艺界存在的问题说明：“同志们中间还有很多唯心论、洋教条、空想、空谈、轻视实践、脱离群众等等缺点，需要一个切实的严肃的整风运动。”“必须从思想上组织上认真地整顿一番。”

访问人：看来，这就是要召开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原因了。据说会前毛泽东找了一些文艺工作者调查情况。都找了哪些人？谈了些什么内容？你能否谈谈这方面的情况？

艾克恩：可以。1942年4月的一天，毛主席写信给艾青，说：“有事商量，如你有暇，敬祈惠临一叙。”艾青来到杨家岭毛主席住所。毛主席说：“现在延安文艺界有很多问题，很多文章大家看了有意见。有的文章像是从日本飞机上撤下来的；有的文章应该登在国民党的《良心话》上的。你看怎么办？”“开个会，你出来讲讲话吧。”“我说话有人听吗？”“至少我是爱听的。”毛主席又对艾青谈了一些文艺方针方面的问题。过了两天，毛主席又给艾青写信说：“前日所谈有关文艺方针诸问题，请你代我收集反面的意见。如有所得，希随时赐知为盼。”毛主席在“反面的”三个字下面打了三个圈。艾青并没有收集什么“反面”意见，只是把他平时对文艺工作的一些意见写成文章寄给毛主席。不几天，毛主席又写来第三封信，说“大著并来函读悉，深愿一谈，因河水大，故派马来接，如何，乞酌”。艾青按时来到毛主席的窑洞里。毛主席将他的文章交还说：“你的文章我们看了，有些意见提供你参考。”随手把事先写在几张纸上的意见讲给艾青听，请他考虑。后来艾青根据这些意见对送审稿作了认真修改，写成《我对于目前文艺上几个问题的意见》，发表在《解放日报》上。

毛主席邀请刘白羽谈了三次话。第一次详细询问了许多文艺方面的情况，而后提出了一些问题。并说：我们过去忙于打仗，现在文艺问题摆到面前来了，要研究一下文艺问题。最后叮嘱刘白羽，找一些人议论议论，把议论的结果告他。第二次，刘白羽作汇报，其中谈到文艺界的问题不是立场问题，大家心是好的，只是表现不好，起了坏作用。毛主席听后笑了起来。第三次，毛主席向刘白羽阐述了为工农兵服务与深入工农兵的思想，使白羽恍如登上高峰之巅，眼望辽阔大地，一切一目了然了。

在文艺座谈会前后，毛主席曾多次与党外作家萧军接触，来往书信有10封。其中1942年4月13日的回信说：“来信敬悉。前日我们所谈关于文艺方针诸问题，拟请代我搜集反面的意见，如有所得，祈随时示知为盼！”萧军遵嘱，搜集了一套《文艺月报》（共14期），送交毛泽东。

1942年4月下旬的一天，鲁艺文学系教员何其芳、严文井、周立波、曹葆华和戏剧系教员姚时晓5人，喜得院长周扬通知应邀到毛主席住处杨家岭谈话。毛主席对他们讲：你们多到农民中去，你们了解了农民，农民也了解了你们，你们的戏农民就能看得懂了。

为了开好延安文艺座谈会，毛主席还邀请欧阳山、舒群、罗烽、白朗等叙谈。中宣部副部长凯丰、中组部部长陈云以及干部科长王鹤寿，也分别找文艺界同志谈话，了解情况，征求意见。掌握第一手材料。

1942年5月2日上午9时，座谈会在杨家岭中央办公厅会议室召开。会议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凯丰主持。

毛主席一来到会场，代表们马上活跃起来。周扬陪同毛主席和大家握手见面，当见到《八路军进行曲》词作者公木时，毛主席含笑说：“写兵好，唱兵好，演兵好。”毛主席握住一二·九师战斗剧社社长欧阳山尊的手亲切地问：“你从前方回来了。”

在会议大厅里，大家静静地听着毛主席关于“引言”部分的讲话。他颇有风趣他说，我们有两支军队，一支是朱总司令的，一支是鲁总司令的，即“手里拿枪的军队”和“文化的军队”。而文化的军队是“团结自己、战胜敌人必不可少的一支军队”。他说，召开座谈会的目的是“研究文艺工作和一般革命工作的关系，求得革命文艺工作的正确发展，求得革命文艺对其他革命工作的更好的协助，借以打倒我们民族的敌人，完成民族解放的任务”。当谈到鲁迅总司令时，全场响起了一阵掌声和笑声。接着毛主席提出立场、态度、对象、感情和学习等问题，供会议讨论。

访问人：据说文艺座谈会讨论时，由萧军先发言。艾克恩：萧军发言是丁玲提议的，她说，萧军是学炮兵的，“你先打头炮吧！”萧军没有谦让，滔滔不绝他讲了一通《对于当前文艺诸问题的我见》。接着又有几位同志谈了各自对当前文艺的看法。休息时，女作家白朗打趣他说：“主席，今天可还得请我们吃一顿罗？”毛主席笑着说：“小米是有的。”3天会议，中央办公厅都款待一顿小米饭。大家三五成群地在中央机关食堂里边吃边聊，而毛主席吃着饭，还在翻阅记录，思考着问题。访问人：座谈会开幕之后，讨论了两个礼拜，到5月16日才开第二次会议，会议上发言也很踊跃，实际情况是不是这样？艾克恩：是这样。第二次会议也开了一整天。发言者十分踊跃，热烈，各摆各的问题，各讲各的观点，时而还有一些争论。毛主席、朱总司令等中央领导同志听取了几十位同志的发言。民众剧团团长柯仲平讲了该团下乡演出盛况，说该团离村时，群众恋恋不舍，送出很远，并赠送许多

慰劳品。他说：“我们就是演《小放牛》。你们瞧不起《小放牛》吗？老百姓都很喜欢。你们要找我们剧团，怎么找呢？你们只要顺着鸡蛋壳、花生壳、水果皮、红枣核多的道路走，就可以找到。”与会者都笑了，毛主席也笑了。不过毛主席讲：你们如果老是《小放牛》，就没有鸡蛋吃了。从晋西北来的一二一师战斗剧社社长欧阳山尊发言说：“战士和老百姓对于文艺工作者的要求是很多的，他们要你唱歌，要你演戏，要你画漫画，要你写文章，并且还要求你教会他们干这些。看起来似乎你付出去的很多，但事实上，你从他们身上收到的、学到的东西更多。”他还说：“前方的战士和老百姓很需要文艺工作，这样多的文艺干部，留在后方干什么？大家都上前线去吧，我举双手欢迎！”毛主席十分称赞欧阳山尊的发言，说还是前方来的同志了解情况，熟悉群众，提出了很好的意见。

访问人：座谈会最后一次全体会议是什么时候开的，是不是毛泽东作结论的那次？

艾克恩：就是5月23日那次。朱总司令首先讲话。

最后，由毛主席作结论。他说，座谈会开了三次，开得很好。我对文艺是小学生，是门外汉，向同志们学习了很多。前两次是我出题目，大家做文章，今天是考我一考，大家出题目，要我做文章，题目就叫“结论”。朱总司令讲得很好，他已经作了结论。中央的意见是一致的，有些问题我再讲一点。

毛主席针对大会提出的问题，针对延安文艺界的现状和争论，联系“五四”以来革命文艺运动的经验，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高度，系统明确地阐述了文艺工作的根本问题、原则问题、方向问题，规定了完整的革命文艺路线、方针和政策。《讲话》将现代文学运动推进到一个崭新的阶段。座谈会结束时，毛主席、朱总司令等中央领导同志与全体代表百余人合影留念。一年多以后，1943年10月19日，鲁迅逝世七周年时，《解放日报》发表了毛泽东在座谈会上的讲话。

访问人：《讲话》的发表，对延安文艺运动发生了什么影响？

艾克恩：影响还是很大的，最显著的表现，是作家们纷纷深入生活第一线。萧三、艾青、塞克赴南泥湾，陈荒煤赴延安县，刘白羽、陈学昭下农村与连队，高原、柳青去陇东，丁玲到工厂。鲁艺、边艺、部艺、平剧院、民众剧团、西北文工团、联政宣传队等也纷纷奔赴农村与前线。

《讲话》的贯彻，使延安文艺出现空前的繁荣局面。延安文艺运动敲响的第一声锣鼓，是1943年春节兴起的大秧歌运动。

鲁艺师生率先推出秧歌剧《兄妹开荒》。毛主席、周副主席、朱总司令等中央领导人观看了演出，无不感到耳目一新。毛主席说：“像个为工农兵服务的样子。”朱总司令说：“不错，今年的节目和往年大不同了。革命的文艺创作就是要密切结合政治运动和生产斗争啊！”受热火朝天的秧歌锣鼓感染，大诗人艾青自告奋勇组成秧歌队闹腾起来。他带领的一百多人的中央党校秧歌队，演遍了杨家岭、王家坪、桥儿沟、南泥湾等地。首演周而复、苏一平写的《牛永贵挂彩》，影响很大。中央办公厅特登报表彰。

访问人：在当时延安的文艺舞台上，是否也出了一批新成果？

艾克恩：引起巨大反响的，首推歌剧《白毛女》，它成为中国歌剧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这个由诗人邵子南写出歌剧初稿，后在集体讨论的基础上，重新由贺敬之、丁毅执笔，马可、张鲁、瞿维、李焕之、向隅、陈紫、

刘炽等作曲的歌剧，作为向党的“七大”献礼节目，标志着作家深入生活的重大收获。

与此同时，一大批优秀的文学作品相继推出，如李季的长诗《王贵与李香香》，柳青的《铜墙铁壁》，欧阳山的《高干大》，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以及一百多位美术家、音乐家的作品，给延安文艺园地带来了百花争妍的新局面。郭沫若惊喜写道：“我完全陶醉了。”“这是一个新的时代，新的天地，新的世纪。”“在人民翻身的时候，同时也就是文艺翻身的时候。”徐悲鸿讲：“新中国的艺术必将以陕北解放区为始。”

女作家丁玲和欧阳山在深入边区生活之后，分别创作了报告文学《田保霖》和《活在新社会里》。毛主席看到这两篇作品后，当即写信勉励他们：“你们的文章引得我在洗澡后睡觉前一口气读完，我替中国人民庆祝，替你们两位的新写作作风庆祝！”后来，毛主席又讲：“丁玲现在到群众中去就能写好文章。”丁玲感动地讲：“这封信给我很大帮助，我的新的写作作风开始了。什么是新的写作作风呢？就是写工农兵。”

丁玲的话，道出了延安作家、艺术家的心声，《讲话》给延安文艺界带来了崭新的精神面貌。从此，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引下的中国革命文艺不断出现新的高潮。《讲话》精神，不仅在战争年代，而且在建国以来，都指引着中国革命文艺的方向，成为照耀革命文艺家前进的一座灯塔。

## 访姜思毅——一座雄伟瑰丽的军事理论大厦 姜思毅

姜思毅，1920年生，天津人。中将军衔。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7年参加八路军，历任冀鲁豫军区宣传部长，第二野战军师政治委员，解放军总政治部宣传部长。1983年后任解放军政治学院副院长、军事科学院副院长、研究员。著有《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史》、《中国共产党军队政治工作70年史》、《毛泽东军事思想论》等。

谁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军事家？姜思毅将军以他多年的战争实践和对世界军事理论的精湛研究，告诉人们：你不必把眼光抛向太平洋东岸，也不用转向大西洋西岸，他就在我们身边，这就是毛泽东。

访问人：记得您曾经讲过：毛泽东在古今中外军事家中是无与伦比的。我们想作为一个统帅，除了他能打胜仗，还必须有博大精深的军事理论，这样才称得起是一位大家。您的结论是从这两个方面考察而得出的吗？您能不能比较展开地谈一谈毛泽东在世界的地位？

姜思毅：研究这个问题，是我几年来的一个心愿。我正在写一本书《军事家毛泽东》。这里可以粗浅地谈谈我的一些看法。

访问人：进入主题之前，您能否谈谈毛泽东军事思想大体包括哪些组成部分？

姜思毅：1990年9月，我在全军毛泽东军事思想学术讨论会的开幕词中指出：“毛泽东军事思想是一个博大精深的科学体系。这一体系，至少包括：（一）人民战争及其战略战术；（二）人民军队建设；（三）国防现代化建设理论；（四）战争观及方法论，即毛泽东军事哲学、军事辩证法这样四个组成部分。”在新的历史时期，邓小平关于我国国防建设和军事建设的思想理论，为毛泽东军事思想增添了新的时代内容。

访问人：伟大的理论来自实践。您能谈谈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实践基础吗？

姜思毅：对。实践出真知，实践产生伟大的理论。战争实践是各种军事思想理论价值最公正的检验。

大家知道，战争是力量的竞赛。据目前享誉很高的一部世界军事史著作、美国人杜普依主编的《世界军事史百科全书》统计，从公元前3500年到本世纪70年代，世界上发生过数千场战事。其中，大多数是在力量对比上本来就强大的一方获胜。这类胜方的军事将帅及其战争指导艺术，很少能在军事思想史上占得重要的席位。也有一些战事，是在双方势均力敌的条件下发生的，这类战争获胜一方的军队将帅及其指导艺术，大都能名垂军事史册。欧洲战史上的古斯塔夫二世（30年战争中的瑞典军队统帅）、马尔伯勒（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中的英军统帅）、彼得一世（俄瑞北方战争中的俄军统帅）、弗里德里希二世（7年战争等战争中的普鲁士军队统帅）、库图佐夫（1812年俄国抗法战争的军队统帅）、纳尔逊（15世纪初英法海上战争中的英方舰队司令）、卡尔大公（19世纪初欧洲反法战争中的奥地利军队统帅）、惠灵顿（滑铁卢之战中的英军统帅）、老毛奇（普法战争中的普军首脑）、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法军统帅霞飞和福煦、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德法战争中的德军将领古德里安，苏联卫国战争中的军队统帅斯大林、朱可夫等人，便属于这种情况。还有一些战事，

则是以弱胜强性质的。唯有这类战事获胜一方的军事统帅及其战争指导

艺术。往往在军事思想史上享有最高的荣誉。这类战例、中国历史上的我们比较熟悉，西方战史上也可列举出若干。最著名的，如希波战争中希腊联军统帅小米太亚得指挥的马拉松之战，雅典海军统帅地米斯托克利指挥的萨拉米斯海战，古希腊底比斯——斯巴达战争中底军名将埃帕米浓达斯指挥的留克特拉之战，古代马其顿军队统帅亚历山大三世指挥的伊苏斯、高加米拉等次会战、汉尼拔在布匿战争中指挥的特拉西米诺湖、坎尼等次会战，拿破仑一世指挥的马伦戈、奥斯特里茨等会战。其中，后三位在西方军事思想史上地位最高，分别被推崇为“战争之王”、“战略之父”和“战争之神”。然而、与毛泽东及其军事思想的战争实践成就相比，不要说上述第二类人物，就是西方历史上的“战略之父”、“战争之神”们，在许多方面也显得逊色一筹。

访问人：何以见得呢？

姜思毅：仅举几例，就清楚了。在中国革命战争中，敌我力量对比的悬殊程度，为世界战争史上所罕见；战争的大部分时间里，我军历次重大作战的兵力劣势倍数，远远超过西方战史上那些最著名的以弱胜强战例。如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我中央苏区头四次反“围剿”，敌我兵力分别为 10 万人比 4 万人，20 万人比 3 万人，30 万人比不足 3 万人，和 50 万人比 7 万人，平均比差为 6.5 倍，最大的一次达 10 倍之巨。而马拉松战役弱强两军队的兵力对比为 1 万人比 4 万多人，留克特拉战役为 0.75 万人比 1.1 万人，伊苏斯战役为 5 万人比 10 万人，坎尼战役为 5 万人比 8.6 万人，马伦戈战役为 2.7 万人比 3 万人，奥斯特里茨战役为 7.3 万人比 8.7 万人。平均比差仅 1 倍多，最悬殊的一次也仅达 4 倍多。然而，在毛泽东等精湛战争艺术的指导下，我军在长达 20 年的烽火岁月里，就是以如此劣势的力量，创造了一个又一个以弱胜强的战场奇迹。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亲自指挥的中央苏区头三次反“围剿”，分别歼敌 1.5 万人、3 万人、3 万余人。同时期我鄂豫皖、湘鄂赣、川陕等根据地的反“围剿”、反“围攻”，抗日战争时期我八路军、新四军的大量战役战斗，解放战争时期我军战略防御阶段的一系列大规模歼灭战，也都是如此。如解放战争前期的苏中战役，我军以 3 万余人迎战敌军 12 万余人，七战七捷，歼敌 5.3 万人。定陶战役，我军以 5 万人迎战敌军 30 万人，歼敌 1.7 万人。陕北三战三捷，我军以 3 万人迎战敌军 26 万余人，歼敌 1.4 万人。我军以劣势兵力，数十次、上百次地创造了战绩辉煌的战争奇观。

访问人：的确很说明问题。除了兵力上的对比外，还有其他可比之处吗？

姜思毅：当然有。比如说武器的对比。西方战史上的以弱胜强，其含义基本上限于兵力的以少胜多；双方军队的武器装备，则大都同属一个水平。而中国革命战争除在军队数量方面长期处于敌众我寡的地位外，在武器装备上也处于敌优我劣的境况，是以“小米加步枪”对付“飞机加大炮”。特别是抗美援朝战争，我军装备较之过去虽然有所改善，但较量的对手是世界头号帝国主义强国及其仆从，敌人除了原子弹，所有最现代化的军事技术手段全都使用了。敌我双方装备优劣差距之大，远非西方历史上的战争所能相比。我军人朝后的头两次战役，便一举打出了国威军威，将已经把战线猖狂推至我国国门之下的侵略军打得风声鹤唳，雪崩般地溃到三八线以南。两战共歼敌 4 万余众，其中包括美军王牌陆战 1 师等部所属部队。五角大楼惊呼，这是“美国陆战史上前所未有的惨败”。3 年朝鲜战争较量的结果，拥有世界上最现代化武器的美军，只能第一次在“没有胜利的”停战协议上沮丧地签

字。

访问人：实践证明，毛泽东军事思想非常伟大。如果对比西方各种著名的军事理论、军事著作，毛泽东军事思想又有哪些博大精深之处呢？

姜思毅：战争和军事活动是一种极为复杂的特殊社会活动形态，涉及的问题十分广泛。借用若米尼的一句话说，“至少有一千种因素与战争直接相关”。对于一种军事理论来说，从本质上规律上说明的问题越多，越深刻，它凝结的真理性认识成果就越丰富，其适用范围就越广，对军事实践的指导作用就越大，其科学成就也就越高。在这方面，毛泽东军事思想的成就，大大超越了中外以往的各种军事理论。古代的军事理论不说，仅以近现代西方比较著名的军事学说为例。菲德烈二世的军事理论，基本上限于战术层次，为完善当时的线式战术做出了贡献。沃邦的学说主要是研究军事筑城、射击弹道等方面的技术学理问题，严格他说还够不上军事理论。劳埃德、比洛等人的军事理论主要是研究战前军备建设、军队作战队形，作战基地与作战线的关系等军事学术问题，大量观点是形而上学的。拿破仑的军事活动不乏伟绩，但只留有百把条由别人整理的零散语录，军事理论上的成就甚微。吉伯尔特的军事理论成就只是提出并论证了“公民军队”的思想，为法国大革命时期组建人数众多的民族国家军队提供了理论准备。克劳塞维茨和若米尼的军事理论，在内容的丰富性和思想的深刻性上大大前进了一步。不过，在有关战争和军事活动的许多重要方面，却留下了认识空白。德尔布鲁克的军事著作评述了大量战争史实，得出的本质性规律性认识很少。帝国主义时代以来出现的马汉的海权论，史里芬的大迂回机动作战理论，福煦的“短促战争”论，麦金德、豪斯浩佛的地缘政治论，杜黑的“空中战争”论，富勒的“九大军事原则”说和机械化战争论，戴高乐、泽克特的“小型职业军队”说，贝当的阵地防御战理论，鲁登道夫的“总体战”理论，利德尔·哈特的“间接战略”论，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西方出现的新地缘政治学、核战争理论、有限战争理论、威慑理论、“特种战争”理论、“空地一体作战”理论等等，有些虽然反映了现代战争和军事活动的某些发展规律，但就它们所考察、所回答的问题范围而言，也都是有限或比较有限的。毛泽东军事思想则贯通古今，博采中外，由此而产生的指导理论，也就具有格外博大精深的特点。访问人：这么说来，上述诸人在军事理论方面多是解决了某一方面问题的专家，毛泽东则是对战争规律、战争本质都做出了全面回答的大家。

姜思毅：是这样的。总观毛泽东军事思想这座理论宝库，既有中国革命战争及其军队建设特殊规律的完整理论，又有关于整个战争和军事领域一般本质，一般规律的大量普遍原理；既有作战理论，又有建军理论；既有关于武装夺取国家政权的战争理论，又有关于掌握全国政权后进行国防建设的理论；既有关于人民革命战争的指导理论，又有关于民族解放战争和保卫国防的国际武装斗争的指导理论；既有“小米加步枪”条件下的战争指导理论，又有打现代装备条件下战争的指导理论；既有对诸多军事规律的深入揭示，又有关于如何研究和运用军事规律的认识论、方法论；既有军事战略理论，又有统摄武装斗争和各种非武装斗争的综合战略（西方称“大战略”）理论；既有战略防御理论、战略进攻理论、战略决战理论和战略追击理论，又有战役战斗指导理论；既有游击战理论，又有正规战理论；既有军事工作理论，又有军队政治工作理论，以及军队后勤工作和军事科研工作理论；既有战时经济工作理论，又有和平时期国防经济和国防科技工作理论；既有常备军建

设理论，又有民兵工作理论。凡此种种，从各个不同层次和方面，揭示了战争和军事活动中的本质和规律。如此丰富多彩的具理性认识成就浑然一体，构成了一座雄伟瑰丽的军事理论体系大厦。

访问人：毛泽东这位军事大家是如何将军事理论更加深化、更加系统化的呢？

姜思毅：军事思想的根本作用之一，是帮助人们对战争和军队这一特殊的社会现象建立正确的总看法、总态度。所谓对战争的总看法、总态度，涉及一系列有关基本问题。如：战争的本质，战争产生和根除的社会历史条件，战争的根源，军队的本质，军队的社会功能，军队结构及其作战方式发展演进的基本前提，战争性质的区分标准，对战争应持的态度，决定战争胜负的诸因素及其相互关系，统帅人物与兵民群众在战争中的地位作用，等等。正是在这些基本问题上，千百年来笼罩着种种认识迷雾。毛泽东则第一次完整而深刻地阐明了战争的本质。他指出：人类文明史以来的战争，从来是与政治紧紧相连的；战争本身就是一种流血的政治行为，用以扫除政治前进路上的障碍，障碍既除，战争结束。他又指出：保存自己、消灭敌人是贯彻于一切战争行动（从战术到战略）过程始终的根本军事目的，也是战争特有的军事本质所在。其中，消灭敌人是第一位的，非如此不能真正有效地保存自己。这一系列观点，是迄今关于战争本质问题最全面、也最科学的完整看法。除这个问题外，毛泽东军事思想对于战争和军队其他有关基本问题，也都给予了科学说明。所有这些，构成了一整套关于战争和军队问题的基本原理。而这些原理无论是从内容的完整性上看，还是从认识的科学性和观点的明晰性上看，在中外军事思想史上都是前人尚未达到的。实际生活表明，人们要正确看待战争和军队这种社会现象，并据以正确地进行军事斗争和军事建设活动，毛泽东军事思想的有关基本观点，是迄今最可靠的认识支点和理论指南。

访问人：据我们所知，关于决定战争胜负的因素，以及各种因素之间的关系，很多人有着不同的认识。而这个问题又是人们在战争中根本无法回避的大问题。请您谈谈，毛泽东军事思想关于决定战争胜利的因素，做出了哪些高于前人的新的概括？

姜思毅：战争是一种极为复杂的矛盾对抗活动，决定胜负的因素历来纷杂多样。自军事成为一门科学以来，人们一般都把有关因素归结为两大类，冠以不同的称谓。如物质因素与精神因素，物理因素与心理因素，有形因素与无形因素，等等。不过，怎样看待两类因素的作用及相互关系，中外军事思想界始终众说纷坛。这个问题不解决，就不可能正确地进行战争准备和战争指导。在这个问题上，不少人各持一端，形成了两种谬见。一种是极端夸大精神因素的作用，搞战争问题上的唯意志论。如欧洲中世纪把骑士们的“荣誉感”、“英武气概”视为战争的第一甚至唯一的决定因素。俄国近代军事思想代表人物之一的苏沃洛夫，在战争已进入热兵器时代的18世纪后期，仍然把“刺刀才是最光荣的，枪弹是最没出息的”作为治军作战的格言。本世纪初，日俄战争决战关头，当前线俄军亟盼弹药补充时，大本营送去的却是一节节车厢的神像。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日本军国主义者信奉的“武士道”和德国纳粹主义者鼓噪的“元首意志”说，更是把这种谬见膨胀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另一种则片面夸大物质因素的作用，搞战争问题上的机械论。这种思想有两种主要表现形式。一种是单纯根据双方兵器兵力的数字简单对比，断定战争胜负，进行军事决策。另一种是随着军事技术的日益发达、越

来越大量出现的唯武器论、唯技术论。自工业革命时代起，每发明和应用某种新型兵器，从当年的远程火炮、速射后膛枪、蒸汽铁甲舰、飞机、坦克，到现代的核弹、导弹、电子装备，几乎都随之出现一种相应的理论或说法，宣布这种武器的威力是无法抗御的，是决定战争进程与结局的最高主宰。这类观点，客观上有重视战争物质技术手段的一定合理成分，可以刺激军事技术的发展；但把武器和技术的作用绝对化，这就走到了科学的反面。

关于决定战争胜负的因素，毛泽东提出了战争的“客观物质基础”和人的“自觉能动性”两个新的军事理论范畴。前者包括政治、军事（军队的数量、结构、装备等等）、经济、科技、自然、国际援助等方面的条件。后者则不仅包括一般人所说的勇气、士气、指挥才能、军事技能，还包括广大人民支持和参加战争的热情，官兵群众的主动性、创造性。这样两个范畴的提出，是辩证唯物论在军事认识领域的创造性运用。对这两个范畴涵义的解释，浸透着唯物史观特别是群众史观的精神。毛泽东深刻揭示了两类因素作用的实质所在。客观物质因素为战争胜负提供了可能性，人的能动作用则在于把这种可能性变成现实，真正决出胜负。毛泽东指出两类因素的作用关系是辩证统一的。客观物质条件只有通过人的作用才能产生效用，人的能动性必须依据一定的客观物质基础才能发挥作用，人的因素与物的因素必须紧密结合起来，而不是彼此割裂，在一定的时空也各有侧重。其中，武器是重要的因素，但决定因素是人而不是物。这种强调人与物的结合，强调在一定物质基础上充分发挥人在战争中的能动性的科学观点，真正反映了战争胜负两类因素之间固有的本质联系。毛泽东还提出并阐明了战争中发挥人的自觉能动性所必须遵循的两大原则，一个是不能超越既定的客观物质条件去主观地企求战争的胜利，必须而且可以在一定的客观物质基础上，能动地争取胜利。再一个是必须坚持主观与客观相符合，战争指导与战争实际相一致。也就是自觉地按照客观军事规律办事，不做一厢情愿的战争鲁莽家。这些原则既抛弃了那种放弃主观努力的机械论思想，又划清了“能动”与“盲动”的本质界限，抛弃了一切不顾客观实际的唯意志论思想，为人们正确发挥战争中的自觉能动作用，积极地争取胜利，指明了根本途径。最后，还需指出，毛泽东绝对不是不重视武器装备、军事技术的作用，尤其是建国以后，正是毛泽东特别重视人民解放军的现代化，重视新式武器装备的研制的。包括国防现代化在内的四个现代化，首先是由毛泽东提出来的。1959年底至1960年春，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谈话纪录的论点汇编》中谈到：“建设社会主义，原来要求是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科学文化现代化，现在要加上国防现代化。”早在1952年7月10日给南京军事学院的《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训词》中，毛泽东强调提出：“……我们现在已经进到了建军的高级阶段，也就是进到掌握现代技术的阶段”。1955年秋，刘伯承在南京军事学院向高级系学员作报告中讲到：毛泽东最近在北京与他说，过去我们讲人的因素第一，现在还是人的因素第一，我们反对唯武器论；同时也必须重视发展新的兵器、新的科学技术，特别是空中的打击武器。对于搞一点尖端武器，1958年，毛泽东要求“一年不是抓一次，也不是抓两次，也不是抓四次，抓它七八次”。1965年，他还认为：“三线建设，我们把钢铁、国防、机械、化工、石油、铁路基地都搞起来了，那时打起来就不怕了。搞不成，打起来怎么办？我们就用常规武器跟他们打。”

访问人：以少胜多，以弱胜强，毛泽东一生打了不少这样的漂亮仗，并

因此而著称于世。同时，毛泽东不仅善于作战，而且善于总结。关于战争的强弱转化规律和在战争中如何促成强弱转化的行动规律问题，他是怎样阐述的？

姜思毅：大家知道，战争矛盾运动的物质内容，表现为敌对双方之间的力量竞赛及其消长变化；运动的基本规律，是强胜弱败。因此，古往今来，军事家们无不力求在拥有强大优势力量下进行战争。在包括孙武、克劳塞维茨和马克思、恩格斯在内的千百军事思想家的著述中，譬如“多兵之旅必获胜”那样的名言，可以说俯拾皆是。然而。对于交战双方力量的强弱地位在战争中的相互转化问题，则很少有前人做过深入的理论探讨和回答。毛泽东指出，战争是力量的竞赛，但双方力量的最初对比在战争中可以改变其原来的形态，这是因为，客观物质条件所决定的战争力量强弱固然是赖以进行战争的物质基础，但人在战争中的主观努力即能动性，对战争力量的消长变化又具有反作用。由于敌对双方的能动性在发挥的性质上（发挥得是否正确）和发挥的程度上（发挥得是否充分）存在着不同，所产生的反作用也就各不一样。一般说来，凡是能够正确而充分地发挥主观努力的一方，可以推动战争不断朝着有利于己不利于敌的方向演化，直至胜利。在人的能动作用诸因素中，对战争力量消长变化影响最大的，是对战争的主观指导能力。战争指导能力高明的一方，即使起初处于弱小地位，但因其善于恰当使用既有力量，能使之最有效地充分发挥效用，就可以做到多打胜仗，少打败仗，使己方的战争力量呈上升的发展趋势。相反，主观指导能力低劣的一方，即使拥有优势的战争力量，但因其犯战争指导上的错误，战场上不能充分地有效地发挥既有物质技术力量的效用，结果势必是败多胜少、败大胜小，这就导致该方力量呈现向下的变化趋势。当双方战争力量这种此消彼长的变化积累到一定程度，就会发生整体质变，强方变弱，弱方变强，战争胜负由此揭晓。毛泽东特别指出，从事正义战争的弱小革命军队，最有可能做到实现战争中的强弱转化。这种可能性是由它自身的先进性质、战争的正义目的、以及由此而来的人的因素上的种种优势所提供的。毛泽东军事思想还进一步回答了战争中怎样才能促成强弱转化的行动规律问题。主要是：（1）制定并实行一条正确的战争指导路线。这条路线必须能够动员和组织人民群众中的战争伟力，使之投入到正义战争方面来。做到了这一点，就可能使战争力量对比的天平，逐渐发生根本性的变化。（2）善于把武装斗争与各种非武装形式的斗争结合起来，从各个方面的努力中减杀敌人的战争力量、增加正义战争的物质力量。（3）在武装斗争中，善于巧妙地使用武装力量，把战争总体上的以弱对强，变成各个战役战斗局部上的以强对弱。这种战争局部上的以强胜弱积累到一定程度，战争全局的力量对比就会由量变达成质变，最终实现己彼双方战争力量的强弱易位，这是促成强弱转化最主要的途径。正义弱军的一切战略技术，都应着眼于此；一切非武装形式的斗争，都要为此做出配合。（4）建立巩固的战略基地，创造社会环境良好的战场。有了这样的基地和战场，当强敌压迫时就能有效地保存、积聚和发展己方的武装力量；作战时就易于造成战役战斗上的局部优势和主动，达成集中兵力，以强歼弱。（5）制定并实行一条正确的建军路线，把既有武装力量建设成为一支军政素质优异，凝聚力、战斗力很强的军队。这样，战争中就能以军力质量上的优势，弥补兵力数量上的不足，以政治精神上的优势，弥补武器装备上的劣势，使己方武装力量在作战中能够“以一顶十”。同时，利用并扩大敌方内部的各

种固有矛盾，瓦解敌军，使之军心浮摇，士气低落，离心离德。这样，就能通过降低其军队质量、扩大其政治精神上的劣势，折杀对方在军力数量和武器装备上的优势因素。（6）善于以战养战，尤其是通过歼灭敌人，补充和壮大自己，使己方力量越战越强。总之，通过上述各个方面的综合努力，就能不断推动并最后实现敌我战争力量强弱对比的总体转化。

访问人：毛泽东不仅是军事家，也是哲学家，他最精彩的军事著作，同时又是哲学著作。所以毛泽东在军事辩证法方面，也取得了很大成就。

姜思毅：准确他说，是取得了伟大的成就。他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世界观和方法论，根据我军武装斗争的实际，运用于指导战争，创立了迄今最完整可靠的战争和军事问题的认识论、方法论。其思想要点包括：（1）战争是一种社会历史现象，必须把它放到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社会矛盾运动中去考察。（2）战争有着不依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这些规律是可以认识、可以用来指导战争和军事活动的。（3）战争规律是客观实际在人们头脑中的正确反映，军事实践既是对战争规律认识的来源，又是检验这些认识的真理性的标准。认识战争规律，直接经验和间接经验不可或缺。尤其要重视通过自己的直接经验，验证前人已有的认识，从中吸收或拒绝有用或不适用的东西，增加自己所特有的东西。（4）战争规律有一般与特殊之分，研究战争必须着眼其特点和发展。不但要研究一般的战争规律，尤其要注重研究当时的特殊的战争规律，这样才能发挥军事认识对于具体军事实践的指导作用。（5）研究和指导战争的根本方法，是熟识敌我双方各方面的情况，从中找出其行动的规律，并应用这些规律于自己的行动。也就是说，战争认识的对象必须是双方而不是单方、是各个方面而不仅是某一方面的情况；认识的任务在于从“情况”中找出“规律”；认识的目的必须落脚于指导己方的行动。战争迫使军事家一旦发现客观规律，就必须努力发挥自己的能动性，抓住规律，利用规律为各自的战争目的服务。（6）战争中的认识活动应当遵循辩证的逻辑程序。即在周到和必要的侦察基础上，对侦察得来的情况进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联贯思索，做出正确的判断，然后依次定下正确的决心，做出正确的部署。（7）计划作战和实施作战是战争中认识活动两个紧密衔接的前后过程。要根据第二个认识过程中不断发展变化的客观情况，及时修正改变第一个认识过程所确立的军事计划。如此循环继变，不断解决好主观认识与客观对象之间、作战企图与作战实践之间的矛盾，实现正确的战争指导。（8）研究和指导战争忌带主观性、片面性和表面性。具体来说，要反对下述倾向：明于知彼暗于知己，或者相反；离开客观条件，毫无根据地瞎说盲干；把一时的情况或情况的某一侧面，当做情况的总体；把军事计划建立在一厢情愿的基础上，而不是立足最坏情况、争取最好结果；受敌方的欺骗或一时表面情况的诱惑；受自己部下不负责任的、无真知的见的建议所鼓动；过于乐观而随之冒险，或者过于悲观而随之消极；客观情况变化后仍保守原来的认识和战法；把进攻与防御、内线与外线、集中与分散等矛盾双方彼此割裂开来看待，不知道相辅相成地运用这些作战形式和手段；照搬照抄外国军事条令和自己过去的军事经验，等等。（9）研究军事理论必须坚持继承与发展的统一，贵在创新发展。军事理论必须面向军事实践，易于被广大兵民群众所掌握，便于应用于实践。反对那种从书本到书本、从思想到思想的研究，既不用唬人的形式和泛滥的引证加以炫耀，也不用晦涩费解的词句加以涂饰。访问人：有人说

毛泽东军事思想是“小米加步枪”的军事思想，是游击战争的军事理论，它不适用于现时代，不适用于现代战争，尤其是高技术条件下的战争，这对吗？

姜思毅：不对。关于这一点，我前面讲的已经作了回答。毛泽东军事思想崇高的世界地位，不仅属于过去，而且属于今天。在当代，在现代条件下，在高技术条件下的战争中，毛泽东军事思想仍然是最先进的军事思想体系。一位美国军界人士说得很俏皮：“尽管图书馆的书架已被那些颂扬毛泽东是一位游击战权威的著作所压弯，但是，他何止是一名游击战大师！”“我们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在现代军事理论之林中，毛泽东军事思想在整体性质上是最科学的。我们不否认，就军事科学的某些表面性理论而言，特别是在现代化装备条件下的某些作战理论，西方发达国家目前走在前列。然而，判断一种军事理论体系先进与否，主要看它在总体性质上的科学性，看它是否具有博大的真理性品格；而它的整体性质如何，又取决于整个体系中那些最根本的东西。对于毛泽东军事思想体系来说，其理论内容大体可分作五个层次。居于最高层次的，是对战争和军事活动这一人类社会历史现象的总认识，和如何研究战争、指导军事活动的科学方法。其次，是关于战争和军事领域一般规律的理论。再次，是关于中国条件下我党领导的武装斗争和武装力量建设基本规律及其指导规律的理论。再往下，是关于各个不同历史时期我国革命武装斗争和武装力量建设阶段性规律及其指导规律的理论。居于最低层次的，是针对随时遇到的大量日常问题所做出的具体看法和对策。上述五个层次的内容中，适用范围最广、对毛泽东军事思想体系的整体性质最具有根本意义的，是前两个层次上的东西，包括战争观、军队观、认识论、方法论，和对整个战争和军事领域一般规律的科学认识。这些内容，构成了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基本理论。正是这一整套基础理论，其科学性是当今世界其他各种军事理论无法相比的。

我们之所以这样说，还因为毛泽东军事思想最能指导人们正确看待当今世界战争和军事领域的重大现实问题。一般说来，每当历史条件发生重大变化时，原有理论的内容都会分化成两个部分。那些具有长期稳定指导价值的东西，将继续发挥作用；那些仅适用于当初一时一事的个别内容，将失去现实意义。军事理论当然也不例外。因此，无论是我们党，还是毛泽东本人，都反对对毛泽东军事思想采取教条主义态度，字字句句照抄照搬到今天。但是，反对教条主义的态度，丝毫不意味着毛泽东军事思想已经过时，恰恰相反，它的基本原则，它的立场、观点、方法，在当代条件下依然具有强大的活力。事实反复证明，要正确看待当今世界战争和军事领域的重大问题，最靠得住的还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科学观点。例如：现代战争的致胜因素问题。继50—70年代盛行核武器决定论之后，近年来世界上又出现了一种高技术兵器决定一切的说法。其实，未来战争既有科技、尤其是高技术的对抗，也有人的因素，即人力、人心、士气、人的技能素质的对抗。在现代战争中仍然是把物的因素和人的因素结合好，才能形成战斗力。我们在努力强化高技术、改善武器装备的同时，还要强化人民战争的观念、强化人民战争的政治优势。这才是一切正义之师需要遵循的军事思想。重视加强现代武器装备，重视新的科学技术的重大作用，重视空中打击兵器、电子技术的发展，正是毛泽东及时提出了这个问题。

毛泽东军事思想的世界地位不但我们这样说，有些外国的有识之士，也声言毛泽东军事思想“开辟了战争理论的新纪元”；说他一掌握了打开现代

军事奥秘之锁的成套钥匙”；有的说毛泽东的人民战争理论“在核时代也具有根本性意义”。

当然，毛泽东军事思想在当代世界军事科学领域的先进地位，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关起门来固步自封，或者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相反，我们必须发扬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开放创新精神，积极地有选择地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军事理论中的有益成分，在新的历史时期的军事实践中，尤其在现代条件下，在高技术条件下，自觉坚持运用和发展毛泽东军事思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创造性地研究和充实新的理论，促使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共同的国防现代化事业，继续沿着正确的航道破浪前进！

1993年6月于北京

## 访袁德金——毛泽东和《孙子兵法》

袁德金

袁德金，1951年生，江苏扬州人。1973年入广州中山大学学习，1978年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中国哲学史专业研究生，1981年获哲学硕士学位，现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毛泽东军事思想研究所工作。主要著作有《军事辩证法研究》（合著）、《毛泽东军事思想研究》（合著）等。

《孙子兵法》是古今名著，把它与毛泽东联系起来，也是很有意思的一个题目。我们为此：跑了20里，又到军科院；话题虽深奥，理解却不难——亲爱的读者，您同意吗？

访问人：《孙子兵法》是我国古代一部重要的兵书典籍，即使在世界上也一直受到人们的重视，有人还把它和毛泽东军事思想联系起来，认为毛泽东继承了从孙武子以来的中国兵家传统。因而创造和丰富了毛泽东军事思想。这种观点不是没有根据，毛泽东历来重视对《孙子兵法》的研究，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书中，就称孙武是“中国古代军事学家”，还引述了《孙子兵法》中的观点。对毛泽东军事思想和《孙子兵法》的关系你怎么看？

袁德金：我原来认为从思想渊源来说，毛泽东军事思想比较直接是从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中过渡而来的，在这里面，他更直接地是从列宁的军事著作中吸收了思想。因为当时在延安，毛泽东看列宁的东西比较多，如《国家与革命》、《怎么办》等，那时我们党也比较重视苏联的经验。这不仅因为他们搞成功了十月革命，而且他们在粉碎白军和国外敌人的武装干涉中积累了经验。现在看来，中国传统的东西，特别是《孙子兵法》，也是毛泽东军事思想形成的一个源泉。这一点不能否认。在他的军事思想正在形成的时候，为什么毛泽东那么迫切地需要这本书，就是因为这本书对构造他的思想起了很大作用。《孙子兵法》阐述的许多核心的东西，如积极防御、以退为攻等，正好是毛泽东当时需要的东西。江西反“围剿”时，“左”倾教条主义者反对毛泽东的主张，最主要的一条就是反对他提出的“诱敌深入”的思想。对这一点，毛泽东的印象是很深的，因此到延安后，他做的头一件事，就是从理论上阐述和论证他在第二次国内战争时期提出并实践了的革命战争的经验。

访问人：毛泽东1936年12月写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从正面看是为了总结土地革命战争时的经验，换一个角度，是不是还有别的意图呢？

袁德金：实际上这本书有点为自己在土地革命战争时做法辩解的味道，为了从理论上回答“山沟里没有马列主义”的诸难。你不是说山沟里没有理论吗？我总结出来让你看。理论的东西是很实用的，而且总结时也不完全是从实践构造理论，他还需要借鉴，吸取其他理论的营养。这也可以看出理论和实践虽然是一致的，但不是一个东西，他在理论上借鉴的一些东西，对他后来的实践无意识地起着一定的指导意义。他用兵那么神，实际上看书对他有一定影响。

访问人：就是说毛泽东在没有看《孙子兵法》以前，也一直在打胜仗，也成功地运用了孙子兵法中的战略战术，这些都是自觉不自觉的？

袁德金：他在战争实践中恐怕是更多的吸收了中国传统军事思想中在小

说作品比如《水浒传》、《三国演义》中所反映的战略和战术思想。对中国传统军事文化，我这么区分：一是正规的规范性的传统军事文化，就是以兵书为代表的军事典籍；二是非正规的或半规范性的传统军事文化，如《水浒传》、《三国演义》等民间文学或史学反映出来的军事文化；还有一种是历代农民战争的军事实践，我把它列为反规范性的军事思想。这三个不同层次，毛泽东在总结军事理论时都有吸收。从军事思想角度看，他们之间是一致的，概括出的军事原则，战略战术并不矛盾，这也反映出战争是有它的共性的东西，要想打胜仗就要按这些原则和规律去做。当然，它们各自反映的方式不一样，兵书就是理论性高一点。

访问人：文学的东西可能运用得更活、更生动、更形象，接受起来也比较容易，那么，兵书和文学里反映的战争是互补的吗？

袁德金：就是互补的，文学里实际上有形象思维方法，它对战争的解释和运用是通过对农民战争的描写反映出来的，或者说是有意识无意识反映的；而兵书就高了一个层次，它是有意识地总结战争的规律、原则和战略战术。

访问人：在当时的情况下，《孙子兵法》也不是很难找到吧？袁德金：我看不难找，但一般老百姓家里不一定有，不然毛泽东在延安就不会专门写信让叶剑英替他在西安买《孙子兵法》了，从流传的广度来讲，还是《水浒传》、《三国演义》一类文学作品比较普及。

访问人：毛泽东到延安后，为什么那么急迫地想着看《孙子兵法》？

袁德金：这时他正在撰写《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要给红军大学讲课。红军到达陕北以后，进行完东征、西征，相对的有一段稳定的环境。毛泽东利用这个机会，完全投入理论创作，一方面他想总结一下土地革命战争的经验，一方面也为了对即将到来的抗日战争进行指导。所以，他很紧张地看书、写作，不仅要看《孙子兵法》等中国传统军事典籍，而且对外国的军事书，他也找来看，如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恩格斯的《反杜林论》以及苏联的军事著作等。

访问人：毛泽东读《孙子兵法》，是从什么时候看的？

袁德金：具体时间还搞不大准。1935年在遵义会议上的争论中，凯丰曾说：你毛泽东打仗不就是照《孙子兵法》打的吗？毛泽东反问凯丰：你看过《孙子兵法》没有？《孙子兵法》都有哪些内容？凯丰答不出来。后来毛泽东讲到这件事，说其实我在这之前，没有看过《孙子兵法》，就是在实践中打仗。解放后，他又多次讲到《孙子兵法》对他影响很大。从档案材料看，1936年毛泽东写《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以前，他是完全看过了。

访问人：这是有书信可以证实的。袁德金：对，1936年有好几封书信，《毛泽东书信选集》收入了其中的一封，这是1936年10月给叶剑英、刘鼎的信，其中说：“买来的军事书多不合用，多是战术技术的，我们要的是战役指挥与战略的，请按此标准选买若干。买一部《孙子兵法》来。”《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已经引用了《孙子兵法》中的话。还有一个材料可以说明，就是李德在《中国纪事》中讲到，在长征中，毛曾引用了《孙子兵法》中的话，主要是鼓舞士气，度过困难之后很快取得胜利，也就是《孙子兵法》里“置之死地而后生”那段话。他还说，毛引用这句话，对当时克服困难起了一定作用。在这之前，比较早的，是在1913年的《讲堂录》里也摘录了一些《孙子兵法》中的东西，《讲堂录》是他读书时的课堂笔记，也可能是他

在听杨昌济讲课时记下的。

访问人：也可能有这种情况：他听老师讲课讲到这个问题了，去找一本《孙子兵法》来看看，当然这是猜测。

袁德金：那一段，毛泽东对武侠小说如《水浒传》、《岳飞全传》比较感兴趣，他对曾国藩的东西也比较注意，曾国藩也吸收了许多《孙子兵法》中的东西，这些不能不对他产生影响。但我认为比较系统地真正钻研地读《孙子兵法》还是在1936年，这不仅有那几封书信可以证实，而且他为了写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既读了《孙子兵法》，还读了国外的《战争论》，试图从理论上探讨和总结一些东西。1961年3月，在广州会议上，毛泽东说，直到1936年他写《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书时，研究了一些资产阶级军事学，也包括《孙子兵法》。

访问人：他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引用《孙子兵法》多吗？

袁德金：引用了三次，在第一章第四节《重要的问题在于善于学习》中，引用了孙子“知己知彼，百战不殆”，说明战争规律包括学习和使用两个阶段。在第五章第三节《战略退却》中，引用了“避其锐气，击其惰归”，说明在战争中使敌人“疲劳沮丧，以求减杀其优势。”在这一节中，他还引用了孙子的“示形”，即“示形于东而击于西，即所谓声东击西”，说明战争可以搞欺骗、用计谋，兵不厌诈。毛泽东对《孙子兵法》的学习和研究也主要集中在这些问题上，就是为了论证土地革命战争中他提出的“诱敌深入”的思想是正确的。还有其他一些思想，如“集中兵力”的思想，兵法上有，文学作品中有，历代农民起义的战例中也有，这是战争的共同的东西，不好说谁从谁那儿来。

访问人：《孙子兵法》在毛泽东军事思想形成中，是一个什么地位？

袁德金：毛泽东对《孙子兵法》，从他一生看都是比较重视的，不能因为他在遵义会议上说没看过《孙子兵法》，就说明他不重视，《孙子兵法》的确在他的军事思想的形成中起了很大作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是毛泽东军事思想史上的重要里程碑，这本书标志着他的军事思想和体系的形成。但他构造这个体系时并没有忘记《孙子兵法》，也没有忘记从《孙子兵法》中挖掘有用的东西。1936年9月10日连续写了三封信。里面都提到《孙子兵法》，这说明他不是一般的重视，而是非常重视。从这几封信中还可以看出，毛泽东是用战略家的眼光审度《孙子兵法》的，他比较重视战略问题，就是关于大的理论性的东西，比较具体的战术性的问题不能说他是不重视，因为那不是他考虑的重点，他在那封信中也说：“我们要的是战役指挥与战略的”，以前“买来的军事书多不合用，多是战术技术的”，并嘱咐“买一部《孙子兵法》来”。《孙子兵法》的确对他构造军事思想体系起了作用。从他以后在作战指挥上看，也有意识无意识地吸收了《孙子兵法》中的思想，如搞“示形”、搞诡诈。这也说明，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就产生了许多新的东西。

访问人：在用兵问题上，像《水浒传》里所反映的战略战术，野史及农民起义中运用的战术，同《孙子兵法》有矛盾的地方吗？

袁德金：基本上没有。农民起义战争主要是打游击战，它不受什么条条框框限制。其实在《孙子兵法》里也有这些思想，如先退后进，怎样分散敌人等。毛泽东军事思想的重点也是“先保存自己，然后消灭敌人”，这是历来战争规律的共同处。这里我再说明一点，就是把《孙子兵法》对毛泽东军

事思想的影响，要放在一个恰当的位置，不要贬低，也不要拔高。我曾听说过这样一件事，解放后有人在研究《孙子兵法》时，曾把毛泽东军事思想同《孙子兵法》加以对照，据说毛泽东看后不满意。究竟为什么不满意就不得而知了。我是听说有这么一件事，也没见过这方面的材料，但我总感觉到这是个问题。

访问人：这似乎说明一个问题，毛泽东不是太同意把它的思想仅仅归结为继承中国传统文化，尽管他说要继承自孔夫子到孙中山的一切优秀文化遗产。他还是觉得，他的思想是继承了马列主义。前面你曾说到，毛泽东在写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时，不仅吸收了以《孙子兵法》为代表的中国传统军事文化，他还吸收了马列的军事思想以及近代资产阶级的军事思想。关于这方面，他是怎么做的？

袁德金：毛泽东注意学习和吸收马列的军事思想，最早的应该是《反杜林论》，因为这本书早在井冈山时期他就得到了，他还说过，长征中许多东西丢掉了，只有《反杜林论》没有丢掉。另外，他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许多是通过列宁间接吸收的，因为那个时期我们党翻译列宁和苏联的著作比较多。甚至对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最早他也是通过列宁最先了解到的。他先看到列宁对《战争论》的论述之后，到1937年又找来《战争论》重新看，并把其中的一些思想学习和吸收进来。

访问人：这样看来，毛泽东军事思想有两种继承关系，一是从中国传统的军事文化，再一个就是从马克思列宁主义那里继承来，否则不好解释《古田会议决议》所阐述的建军这个原则问题，《古田会议决议》中涉及的战略战术比较少，主要是解决建立一支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军队，到《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就主要是谈战略战术了。那么，我们想再问一个问题，现在我们说的这些话题，就是毛泽东军事思想和《孙子兵法》还有现实意义吗？

袁德金：很有现实意义。现在国际流行《孙子兵法》热，我们国家也召开了三次《孙子兵法》国际学术讨论会，美国的军事院校里就开有《孙子兵法》课，中国社会科学院曾有人在美国国防大学专门讲这门课，日本、东南亚对《孙子兵法》都很感兴趣。现在他们不仅仅把它看成战争的兵书，而且运用到各个领域，如领导艺术、经商艺术、决策艺术等，他们认为，战争是流血的东西，而和平地把《孙子兵法》运用到其他领域，更能很好显示它的价值。

访问人：在《孙子兵法》热中，他们对毛泽东的军事思想是否也比较关注？

袁德金：美国的军事院校还开有毛泽东军事思想课，从这也可以看出他们对毛泽东军事思想的重视。

访问人：外国是不是在重视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基础上，重视《孙子兵法》的？

袁德金：认为都是中国的东西。在许多外国人看来，毛泽东军事思想基本上就是继承了《孙子兵法》，日本一个军事理论家曾评价说，虽然毛泽东军事思想主要来自于马克思，但更多的来自于《孙子兵法》。外国人就是这么看的。

访问人：《孙子兵法》是不是在新中国成立后，才在国外热起来的？

袁德金：《孙子兵法》在国外流传虽然很久，也受到了一些外国人的重视。但真正形成“孙子热”，还是近几十年的事。随着毛泽东军事思想在世

界军事史上的地位的确立，《孙子兵法》也热了起来，同时，《孙子兵法》中讲的东西和当前的现实斗争有一致的东西，如“不战而屈人之兵”，从现在看，大家都不希望有战争，《孙子兵法》中阐述的这种战略思想，对政治领导人的影响是比较大的。再加上国外的一些大企业运用《孙子兵法》的思想进行管理，在经营上取得成功，比如日本的服部千春先生，他在经营和光建筑有限会社的同时，平时他就非常喜欢研究《孙子兵法》，1974年曾著有《新编孙子十三篇》，并以此书手稿呈赠毛泽东。1987年又在中国出版了《孙子兵法校解》，他把《孙子兵法》运用于企业管理上，使企业越办越好，于是到处鼓动人们学习《孙子兵法》。

美国是另外一种情况，它偏重于在军事上的谋略方面的运用，希望少死人，通过智谋取胜。本来中国的传统军事思想同美国的军事传统不大一样，我们重谋略，讲究以少胜多，他们重实力，靠力量取胜，“以少胜多”在他们看来是不可想像的。但战争实践又告诉他们，中国的确取得了成功，于是他们就想找到这个奥妙，为什么中国在实力小的情况下每次都打胜？这也是《孙子兵法》和毛泽东军事思想引起他们重视的一个原因。

访问人：其实，东西方的东西是可以互补的。

袁德金：美国的某些做法实际上就是互补的，一是重视自己的力量和技术，同时又注意吸收东方的谋略思想，慢慢合并。我们也应该这样，一方面通过我国国力的不断提高和增强我军的实力，另一方面还要不断研究和发发展我国的军事理论，提高军事素质，这后一方面更现实，因为在一个长时期内，我们仍然技术不如人，力量不如人，还是靠智取和人民战争。

访问人：这么说来，对毛泽东军事思想和《孙子兵法》的研究没有止境？

袁德金：没有止境。随着实践的发展和军事技术的进步，我们会越来越感到《孙子兵法》和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博大精深，这一点是应该肯定的。

1993年4月10日于军科院

## 访胡长水——建国后的毛泽东与人民军队

### 胡长水

胡长水，1950年生，安徽巢湖人。1972—1973年曾参加抗美援朝一年。1988年获党史硕士学位。

现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副研究员，上校军衔。主要著作有：《辉煌的七十年》（合著）、《毛泽东之路》（第一卷）；在《中共党史研究》、《近代史研究》等刊物发表学术论文30余篇。

10余年来，他一直致力于研究毛泽东，且小有成果。某日，电话里传来声音：请帮忙查核毛泽东的一件事情。请教姓名，答曰胡长水，正待找他，自己却送上门来。

一直没有放松对军队的领导

访问人：建国后虽然毛泽东国事繁忙，但他一直没有忘记军队，或者说没有放松对军队的领导。他对军队工作有过许多指示，你能否说说这方面的情况？

胡长水：好的。在中国革命历史上，可以说没有谁比毛泽东更重视人民军队的建设了。新中国建立后，作为党、国家和军队的最高领导者，他把几十年的革命和战争历程，看作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他看到的是一个更加辉煌的未来。在为这个伟大事业的奋斗中，他把军队看作是中流砥柱，所以紧紧抓住不放，倾注了大量心血。50年代初，他着重强调的是建设一支强大的空军、海军，加强部队的现代化、正规化建设。1950年初，人民海军组建时，毛泽东召见肖劲光和刘道生，语重心长他说，有海就要有海军。近代中国历史上，没有强大的海军，受帝国主义欺负。我们要尽快把海军搞起来。进入60年代，由于国际形势的变化多端和我国海边防形势的紧张，毛泽东对我军的战略方针、战场建设等，作了一系列指示。他还亲自参与了对中印边境自卫反击作战的领导。

直到晚年，他一直警惕地注视着保卫着祖国的安全。在政治建设方面，他对军队更是发出一次又一次的指示。虽然由于他思想上“左”的错误也给军队建设带来了一定的影响，但是，他仍然坚持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等一系列建军原则。年纪稍大一些的同志都还记得，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后期的一个重大举措，就是实行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对此，邓小平几十年后评价说，这是因为毛主席懂得领导军队的艺术，就是不允許任何军队领导干部有个团团，有个势力范围。军队就有这个传统，经常调过来，调过去。正是由于毛泽东坚持了人民军队这些正确的建军原则，几十年来，我军虽然也遭到了一些挫折，但却始终保持了自己是党的军队、人民军队的性质。

访问人：我们注意到，你对毛泽东50年代后期的情况没有提及，是吗？

胡长水：是的。建国后的27年中，也有几年他对军队过问得不多。这就是抗美援朝胜利以后至1958年。1958年6月21日，毛泽东在军委扩大会议上就军队工作作自我批评。他说，我多年来没有管军事，有许多同志批评我。不管军事，四年如斯矣。朝鲜战争以后，一切推给彭德怀同志。你们批评得对，你们越批评我就越为舒服。应该批评，三四年不管军事，这是不好的。当然，这种“不管军事”只是相对而言。

访问人：请问这一段毛泽东很少过问军队是什么原因呢？

胡长水：这与毛泽东的工作方法有关。毛泽东曾说过，他的工作方法常常是“单打一”，一个时期抓一两件中心工作。1953年6月党中央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以后，随之在全国实行了三大改造。毛泽东全身心地投入了这一伟大运动。在毛泽东看来，他领导中国革命几十年，目标就是要建立一个实行公有制，没有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解放广大人民，尤其是亿万贫苦农民群众。毛泽东后来曾多次回忆说，1949年那样大的胜利，并没有使我高兴。到1955年，等我看到有那么多的农民参加了合作社，接着私营工商业的改造，我开始高兴了。毛泽东是一位对农民有着深厚感情的共产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理解这一点，就可以理解他为什么对三大改造那么专注了。在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这是毛泽东的伟大功绩。

军队现代化：他提出要有自己的航空母舰、核潜艇，又要求依靠手榴弹、黄色炸药打现代化的战争。

访问人：毛泽东认为，决定战争胜负的重要因素是人和物，同时，决定的因素是人。民主革命时期，他一方面着重军队的政治建设，强调人们对革命战争规律的把握和运用，同时还十分重视军事训练和尽可能地装备部队。建国以后毛泽东在重视军队的武器装备和现代化建设方面的情况如何呢？

胡长水：应该说，建国之初，毛泽东就把军队的现代化建设，包括武器装备建设的任务提到了全军面前。最著名的是四大训词的发布。当时，毛泽东是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1952年7月，毛泽东在给军事学院的训词中就提出，由于客观物质条件的变化，现在我们进入建军的高级阶段，这就是建设正规化、现代化国防部队的阶段，进入掌握现代技术阶段。为此，他提出部队要实行统一的指挥、统一的制度、统一的编制、统一的纪律、统一的训练；要从教育训练上来培养部队的组织性、计划性、准确性和纪律性。这就是现在我们军队中仍然常讲的“五统四性”。第二年，也就是1953年，他在给总高级步校和军事工程学院的训词中，对武器装备和技术提出了更加明确的要求。他说；为了保卫祖国免受帝国主义者们的侵略，依靠我们过去和较为落后的国内敌人作战的装备和技术是不够的，我们必须掌握最新的装备和随之而来的最新技术。他强调要培养大批能够掌握和驾驭现代技术的人，我们的领导应该成为掌握现代军事技术的模范。这一时期，他还提出“向苏联的军事科学学习”和“把我军建设成世界上第二支优良的现代化革命军队”的口号。1951年5月，毛泽东派总参谋长徐向前率中国兵工代表团赴苏联，临行前交给他两大任务，一是购买武器装备；二是多搞点技术项目，发展自己的兵工厂。

尤其应该提出的是，毛泽东对发展我国的核工业一直给予了很大的关注。1955年，他就主持中央书记处会议，研究发展我国的原子能事业问题，并说，这件事总是要抓的，现在是时候了，该抓了。1958年，他在军委扩大会议上又指出，搞一点原子弹、氢弹，我看有10年工夫完全可能。3年困难时期，有人主张放慢核武器的发展速度，有人主张停止搞导弹、原子弹等尖端武器。毛泽东则坚决主张把核武器的研制搞下去。1962年，他在有关部门关于核实验的规划上批示，要大力协同做好这种工作。为此，中央成立了由15人组成的以周恩来为主任的中央专门委员会，加强对原子武器的研究试验工作。1964年，毛泽东还说，敌人有的，我们要有的，敌人没有的，我们也要有的。原子弹要有，氢弹也要快。当然，毛泽东的发展核武器，是为了打破帝国主义的核讹诈和核垄断，完全是一种防御性的措施，是为了制止帝国主义

的核战争。正如他所明确表示的，搞起来吓吓人，壮壮胆，并不准备使用。

访问人：毛泽东除了重视原子弹、氢弹外，在建设空军方面有过具体设想吗？关于海军建设，他是否想过要有自己的航空母舰？

胡长水：这个问题很有意思，但是知道的情况有限。建国以后，毛泽东对军兵种建设十分重视，尤其是在建国之初，对如何建设海、空军有过许多具体的指示和批示。比如，还在1949年的7月，毛泽东在给周恩来的信中即指出，我们必须准备攻台湾的条件，因此，我们要有空军。还指出，我空军要压倒敌人空军，短期内，例如一年，是不可能的，但拟可考虑派三四百人去远方学习6个月至8个月，同时购买飞机100架左右，连同现有的空军组成一个攻击部队掩护渡海。

同时须考虑一个条件，即在闽浙两省建立飞机荫蔽库，即开掘大山洞藏飞机，如无此项条件，则飞机不能荫蔽，亦不济事。毛泽东还要周恩来就这些问题召有关同志“商酌”。这些意见是相当具体的了。此后，毛泽东关于空军问题还有许多批示，大到作战方针，作战行动、领导机关的组织机构，小到空军航校校址的选定、空军地勤人员伙食标准。据不完全统计，仅从1949年至1953年，他批阅空军请示报告达124件；为了补充空军的武器装备，40年代末到50年代初，就向斯大林、布尔加宁等苏联领导人发电报和信函达32次。

对于海军建设，毛泽东同样倾注了大量心血。关于毛泽东是否想过要有自己的航空母舰，从现在知道的情况看，毛泽东还没有提出过这个问题。但是，这并不等于毛泽东不重视海军的装备建设，相反，他对此有过许多指示。比如，1952年2月，毛泽东到海军机关视察，对萧劲光说，今天，我来和你们商量一件事：现在抗美援朝需要飞机，我们打算集中外汇解决一下空军的问题。原计划了×亿卢布，准备再给你们海军购买几艘驱逐舰，几十条鱼雷快艇，但这样外汇就不够了，是不是先给空军买飞机？你们要买的舰艇再往后推一推，怎么样？你们是不是买点材料，自己造，打下个基础。先造小艇，来得快，花钱不多，还可以积累经验，把我们自己的造船工业逐渐搞起来。此后，他几次到造船厂视察。1958年，毛泽东在军委扩大会议上又对萧劲光说：“萧劲光同志，我给你打保票，现在不行，搞海军没有钢铁，所以你还要等一下子，不用那么忙，但有希望，我们总是有希望的就是了。干十五年，就有很大的希望。”“到那时候，萧劲光同志的愿望也就可以实现了。”也在这次军委扩大会议上，毛泽东提出，一旦帝国主义向我发动侵略战争时，在打败敌人进攻之后，要实施战略反攻和战略迫击，把侵略者赶回他们的本土，坚决、干净、彻底、全部消灭之，解放那里的人民，以便使侵略战争永远不再发生。为此，除了继续加强陆军和空军的建设外，必须大搞造船工业，大量造船，建立海上“铁路”，以便在今后若干年内建设一支强大的海上战斗力量。1959年10月，毛泽东针对苏联的技术封锁，坚决指出：“核潜艇，一万年也要搞出来。”

访问人：毛泽东为什么对发展核潜艇这样重视呢？

胡长水：我想，这是毛泽东军事战略思想的体现。毛泽东军事战略思想内容之一，就是实行有限核威慑战略。核潜艇是以核能为推进动力源的潜艇，分为战略导弹潜艇和攻击核潜艇，发达国家多注重发展前者。战略导弹潜艇的任务是用于对陆上战略目标实施袭击。其威慑力是相当大的。一位熟悉海军情况的同志告诉我，现代技术条件下的两国交战，即使一个国家打败了，

但只要还保留一艘核潜艇，就能把本钱捞回来，使自己走向复苏。正当超级大国竞相发展核力量，并将战略核力量的主体逐渐由陆基转向海基的时候，毛泽东以敏锐的战略目光，看到了海上核力量在保卫国防和打破霸权主义海上核垄断中的重要作用，所以他表示了坚决制造核潜艇的决心。根据这一思想，中央军委对核潜艇工程实施了具体领导。通过全国上下的艰苦努力，1970年，我国第一艘攻击核潜艇下水，4年后正式编入了海军的战斗序列。1982年10月，我国首次核潜艇水下发射运载火箭试验成功。第一艘核动力战略导弹潜艇于1983年正式服役。从此，我国进入世界上仅有的几个拥有核潜艇的国家之一。

访问人：50年代毛泽东讲军队现代化比较多一些，60年代似乎讲得少了一些。相反，多次强调黄色炸药、大炮的作用。比如，1964年他讲，打仗，我还是寄希望于步兵。坦克我也不那么希望。黄色炸药和大炮很顶事。有根据地、有手榴弹、炸药、步枪、大炮，我们就放心了。所谓陆军也不能靠装甲车载运。像天安门检阅那样，一是桥梁不行，二是公路不行，还是靠两条腿，靠马灯，靠手榴弹、骑马那些东西。毛泽东的这些谈话，是否表示了他对空军、海军的轻视，对现代化武器的轻视？你是怎样理解的？

胡长水：应该承认，60年代以后，毛泽东比较多地强调步兵和小米加步枪在革命战争中的作用，或者说，较多地强调我军战争年代的革命传统。应该怎样理解，是个不容易把握的问题。是否可以这样看，第一，它表现了毛泽东在复杂的国际形势面前的一种革命气概和战略思想。进入60年代以后，中国面临着一个严峻的国际形势：美苏两霸争夺激烈，特别是美国出兵越南北方，把战火烧到了印度支那，烧到了中国的近邻，美国飞机还不断侵入中国云南、广西和海南岛上空，进行了以中国为假想敌的核战争演习；印度军队多次侵入中国领土，引起边境武装冲突，终于迫使我进行了一场大规模的自卫反击作战；台湾国民党当局“反攻大陆”的活动十分猖狂，不断在东南沿海地区进行武装骚扰活动；苏联政府推行霸权主义，对我进行技术封锁和核讹诈。在这种战争形势面前，我们敢不敢打？用我们手中的武器能不能打赢反侵略战争？问题尖锐地摆在全军将士和全中国人民面前。战略上藐视敌人，这是毛泽东一贯的思想。毛泽东这时较多地强调小米加步枪也能战胜现代化军队，其用意正在这里。第二，与毛泽东过分强调政治工作作用的思想也是密切相关的。1957年反右，对毛泽东的思想影响是很大的。其后，他在社会发展战略上，出现了夸大政治工作作用、忽视经济规律的偏向，以为依靠人民的革命干劲和共产主义精神，就可以促进经济的飞速发展，实现生产关系的变革，达到大公无私的理想社会境界。“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实践，就与他的这种思想有关。由此，他强调“政治挂帅”，赞成“四个第一”和“突出政治”，并且越来越把阶级斗争作为政治工作的主要内容。在他看来，战争年代我军小米加步枪战胜敌人的飞机加大炮，体现的正是一种革命精神。由此看来，他强调黄色炸药的作用就是很自然的了。第三，虽然如此，毛泽东并没有否认海军、空军和现代武器的作用。1975年，毛泽东已是垂暮之年，还对海军政委苏振华伸出大拇指说，我们的海军要这样大。海军要搞好，使敌人怕。当然，毛泽东后来对社会关注的重心是在政治方面，对现代化建设的关注程度自然要减弱。

诱敌深入和“不怕死人”

访问人：诱敌深入，“不怕死人”，这是毛泽东对待战争的一个重要思

想。这一思想曾受到葛罗米柯的攻击。你对这一问题怎么看？

胡长水：诱敌深入，是民主革命时期我军以弱胜强，屡战屡胜的一个重要战法。新中国建立后，如何反击侵略者，保卫国防，毛泽东在确定军事战略时，确实把诱敌深入作为战略方针提了出来。还在建国初期，他就反对到处设防，主张把敌人放进来打。他主张。不论敌人从海上来，还是陆上来，应让其登陆，诱其深入。我军应位于纵深机动地区，聚而歼之，而不应到处修工事，摆成被动挨打的姿势。他严厉地批评说，许多共产党员打了二十几年的仗，忽然把经验都忘了，到处修工事，畏敌如虎。60年代中期，国际形势比较紧张，面对如何打的问题，毛泽东又多次强调要诱敌深入。毛泽东是从这样几个方面考虑的：第一，中国海岸线一万多公里，完全不让敌人上岸不一定能办得到，这里不能登陆，那里可以登陆；第二，政治上对我有利。敌人侵入到我国土之内，更加说明我进行反侵略战争的正义性，正义的战争一定能赢得全世界人民的支持。第三，敌人占领我城市和交通线，拉长了战线，分散了兵力，正是背上了包袱；第四，我处于纵深机动位置，便于集中兵力，在运动中歼灭敌人。毛泽东生动地举了古今中外的一些事例说明这一问题：姜太公钓鱼不到，就是因为不给鱼东西吃；五次反“围剿”，不诱敌深入，以堡垒对堡垒，结果遭到失败；斯大林御敌于国门之外，我从来就说不是好办法，斯大林的教训之一，就是分兵到处顶，不是诱敌深入。

对毛泽东诱敌深入的思想，一些人理解得并不全面，把它看成似乎是绝对的、一成不变的东西。其实，毛泽东的诱敌深入是有条件的，这就是小打在边界上打，大打，让出点地方来；毛泽东也不是任何时候都主张诱敌深入。1962年，蒋介石叫嚷“反攻大陆”，我东南沿海部队实行紧急战备，毛泽东根据我在经济上暂时存在困难等情况，一反“诱敌深入”的传统战法，实行坚决顶，不让敌人上来的作战方针。1966年，毛泽东在同有关方面负责人谈话时又指出，诱敌深入也可能不灵，要有两手准备。这些说明，毛泽东用兵从来是根据不同情况，实行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他反对到处设防，但也不是不要设防，而是要重点设防，重点守备。他还具体指出，哪些地方要设防，哪些地方要重点设防。诱敌深入，也不是战争一开始就实行，而是要顶他半年，一年，要防止敌人长驱直入。他在1965年曾说，不管怎样，我们不要学蒋介石那样，让日本人长驱直入，很快就打到南京、武汉、长沙；不要学斯大林那样，让希特勒长驱直入，一下就逼到莫斯科、列宁格勒城下，我们一定要搞几道防线。总之，毛泽东的诱敌深入具有很大的灵活性，而不是把它当成固定的公式。正如他在这一时期重新强调的：你打你的，我打我的；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一切依条件而定。“不怕死人”是针对帝国主义的战争讹诈和宣传的。侵略者既然要发动战争，要把战争灾难强加在我们头上，怕，又有什么用呢？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毛泽东说，帝国主义一定要打，那么我们就得准备一切，要打就打，打了再建设。就是死了一半人也没有什么可怕。他认为，这是极而言之。在整个宇宙史上来说，我就不相信那么悲观。他相信人民最终是会取得胜利的。对于帝国主义的战争威胁，毛泽东表现了一种不怕鬼的气概。毛泽东还常常从坏事可以变成好事的角度来看待问题。他说，紧张局势除过有害的一面外，还可以调动人马，调动落后阶层，调动中间派起来奋斗。紧张局势归根到底于帝国主义不利。在帝国主义战争威胁面前，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回答，无可厚非。毛泽东并不是不要和平，相反，正如他所说，我国和世界各国人民都需要和平。渴望战争、不要和平的，仅

仅是少数帝国主义国家中的某些依靠侵略发财的垄断资本集团。我们要和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加强团结，使帝国主义制造的紧张局势和准备战争的阴谋彻底破产。

### 毛泽东建军思想的优越性

访问人：毛泽东建设人民军队时十分强调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和艰苦奋斗，直到晚年仍然如此。这是毛泽东建军思想的一大特点，它的优越性表现在什么地方呢？

胡长水：在中国这样的环境下，毛泽东自建军之日起，就十分重视军队要在党的领导之下，同军阀主义、分散主义、宗派主义、闹独立性等种种错误倾向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它的意义是非常深远的。中国在近代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以后，帝国主义在中国采取的是一种分裂剥削政策，不同的帝国主义各自在中国寻找一部分政治、军事势力作为自己的代表。这就决定了当时的中国必然是军阀混战。而广大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又为他们实行封建割据创造了条件。因此，中国存在着军阀主义、分散主义、宗派主义、闹独立性等思想的深厚土壤。这些思想必然要反映到人民军队的建设中来。就我军的情况来说，其成员大多数来自农民，还有相当一部分人来自旧军队和地方武装，有的原来就是“山大王”；其生活环境是长期战斗在农村游击战争环境，交通不便，处于分割状态，而且一分割就是八、九年，一个根据地就好像是一个“山头”。由此，在一部分同志中产生了盲目的山头主义、小团体主义等错误倾向，危害着军队的团结统一。为了创建一支党领导下的真正的人民军队，毛泽东对这些错误倾向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古田会议，长征路上反张国焘的斗争，延安整风中宗派主义、山头主义的批判，就是如此。建国后，封建的意识形态仍然会侵入军队中来，党内、军内仍然会出现闹独立性的现象，对此，毛泽东十分警惕。1954年反高饶的斗争是在党中央内进行的，但对军队的高级干部教育也很大。高岗进行阴谋活动的一个重要理论就是“军党论”。“文化大革命”使派性泛滥，也使林彪、江青这些野心家得以结成反革命集团。这是毛泽东所始料未及的。当他发现了一些问题后，立即对此保持高度的警惕，并采取了相应的措施。前面讲到的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就是一个重大的行动。军队是拿枪杆子的，军队在党领导下的团结统一，对于保持社会的稳定，至关重要。所以，邓小平一再告诫全军，要发扬优良传统，保持老红军本色。江泽民在十四大后的一次军队会议上，把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坚决反对宗派主义、山头主义，自觉保持军队高度的团结统一，作为我军的优良传统再次提了出来。这是一件关系到军队建设的重大的战略性问题。

艰苦奋斗是我军在长期的革命战争中形成的一个优良传统。在革命战争年代，长期敌强我弱的态势，长期艰难困苦的环境，使艰苦和牺牲无时无刻不伴随着我军。然而，我军正是以“革命不怕死，怕死不革命”的豪迈气概，不屈不挠，顽强奋斗，为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解放，尝尽人间的艰辛，千千万万的优秀指战员倒在了征途上。没有这种艰苦奋斗的精神，就不可能有中国革命的胜利。所以，毛泽东认为这是我军的政治本色，是一种共产主义精神。新中国建立后，毛泽东仍然强调要发扬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与他反腐败思想是紧密联系在一起。革命者胜利后，要防止李自成式农民革命悲剧的重演，保持党的纯洁，消除社会的阴暗面，以建设一个平等纯洁的美好社会，是毛泽东的政治追求。尽管这种追求最后走向“文化大革命”的歧途，

但这种政治追求本身是无可非议的。围绕着艰苦奋斗和反腐败，毛泽东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思想，比如，关于警惕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进攻，一刻也不要脱离群众、滋生官僚主义的思想；关于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去监督党的干部，反对党内腐败现象的思想，等。今天，反腐败问题是广大人民群众乃至整个社会普遍关注的一个重大问题，关系到我们的现代化事业能否健康地发展。继承我党我军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深刻地领会毛泽东这一方面有价值的思想，无疑是很有意义的。

访问人：如果谈到毛泽东的自我评价，我以为毛泽东对自己评价最高的是他的军事成就。比如他曾评述自己的性格、为人，所写的文章，出版的四卷选集等等，这些评价都是比较谦虚的，但却没有包括自己的军事才能。相反，他在一些谈话中，对自己的军事才能表现得很自信。不行，我就上山，我相信我会打赢的，我别的不行，打仗还行。这样的话，不止一处。请谈谈你对这一问题的看法。

胡长水：毛泽东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也是伟大的无产阶级军事家，这些都是被历史证明并写进了党的历史决议之中。这是我们首先应该明确的。毛泽东在自我评价中突出军事成就是在社会主义建设全面展开以后。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如何搞，毛泽东决意走自己的路。但是，这条道路如同民主革命的道路一样，一切都还在实践之中，因而许多问题是相当陌生的。当打仗的问题重新提到面前，或者是当他对政治形势作最坏的考虑时，他自然想到自己几十年的战争实践，想到他和战友们创建的这支打败了帝国主义和蒋介石的人民军队。50年代，毛泽东在会见外宾时给自己的经历算了一笔帐，说：我们是打了22年仗，如果包括朝鲜战争3年，就是25年。我们这些人半辈子都耗费在打仗上了。的确，毛泽东的军事才能是十分杰出的。他是集军事统帅和军事理论家于一身，是当今世界公认的伟大的军事家、战略家。毛泽东战争指挥艺术的活的灵魂，就在于他一切从变化着的客观实际出发，从来不拘守任何条条、教义。正因如此，60年代，他又多次说过这样的话，打仗并没有什么神秘，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你打你的，我打我的；什么战略战术，说来说去，无非就是这四句话。建国后几十年中，他参与领导的几次边境自卫反击作战等，打得是很成功的。历史决议指出了毛泽东晚年的错误，但对他在警惕地保卫国家安全方面的成就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当然，也应该看到，毛泽东在思考整个社会的发展蓝图时，也有把战争年代军事工作的经验绝对化的一面。比如，一个时期对军事共产主义的肯定，经济建设上的“人民战争”等。

### 毛泽东军队建设的大思路

访问人：最后你能概括他讲一下建国后毛泽东关于军队建设的大思路吗？其伟大和不足之处各表现在什么地方？

胡长水：我们的讨论已经涉及了建国后毛泽东和军队建设的基本方面。他关于军队建设的大思路，就其基本出发点来看，可以归纳为三个方面，一是警惕帝国主义的侵略，保卫国家的安全和全体人民的和平劳动，这是毛泽东思考军队建设问题时贯彻始终的一个基本出发点。二是履行国际主义的义务。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无产阶级自己。毛泽东是马克思主义这一原理的坚定信仰者和坚决实行者。正如他在阐明自己的思想时所说，我们是搞革命的，一个是国内要革命，国际上也希望推翻帝国主义。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三是把人民军队作为实现理想

社会的一支重要力量。毛泽东是共产主义理想的坚定追求者；他一生为之奋斗的是中国人民和世界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在中国和全世界的实现。当他为实现这一理想目标而努力奋斗的时候，他对人民军队的重要性给予了极大的关注。60年代初，面对国际国内的政治形势，他提出，我们以前是靠解放军，以后仍然要靠解放军。他关于全国学解放军的指示信，关于“五七”指示，都是他这一思想的生动体现。从这一思路出发，他从军事和政治两个方面对军队建设提出了一系列主张。军事工作和军事斗争的思想主要是：必须建设一支从单一兵种到诸军兵种合成的现代化的革命军队；实行积极防御的军事战略方针；实行把保卫国防和支援邻国反侵略战争结合起来的作战任务。关于政治建设方面的思想，问题要复杂一些。但是，注意坚持他在民主革命时期提出和确立的一系列正确的建军原则，这个基本的方面则是贯彻始终的。比如前面讲到，他始终坚持人民军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这一根本原则，强调人民军队要坚决执行纪律，如此等等。还可以列出一些。坚持了这些正确的建军原则，也就坚持了军队是党的军队、人民军队的性质。林彪、“四人帮”一伙野心家、阴谋家，虽然一度身居高位，炙手可热，然而在这支军队的制度、原则面前，却碰得头破血流。相反，党中央、毛泽东一声令下，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10天之内就报到了。

同时，我们也应该承认，毛泽东晚年“左”的错误思想。也影响到了这支军队。我认为，他在军队建设指导上的失误，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是对战争的形势估计得过于严重，使军队长期处在准备早打、大打、打核战争的临战状态之中，“盘马弯弓箭不发”，影响了部队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二是过分强调了政治工作的地位和作用，而这种政治工作的主要内容又是阶级斗争，这一方面的错误，历史决议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访问人：未了，还想问一句，近年来，你比较注意对建国后毛泽东的思想的研究，你最深刻的体会是什么？

胡长水：我很喜欢经典作家的这一观点：人们创造历史，但是人们只能在既定的历史条件下进行创造。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局限，我们研究者也是如此。毛泽东的思想是一笔非常丰富的遗产，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对他思想的底蕴将会理解得更加深刻。

1993年6月于军科院

## 访宋一秀——《实践论》《矛盾论》的写作、流传和发表 宋一秀

宋一秀，1931年生，广东五华人。现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会会长。主要著作有：《毛泽东哲学思想与中国革命》、《周恩来早期哲学思想研究》，并主编《毛泽东哲学思想教程》、《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三卷本、《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第六、七卷、《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等。

我们最初给宋教授的题目是《毛泽东的“两论”是抄袭之作吗？》整理记录才改成现题。之所以这样改，不仅因为谈的内容既涉及了“抄袭”问题，而且还涉及了“两论”的写作背景和历史意义，这个范围显然比最初题目大多了。

访问人：关于《实践论》、《矛盾论》写作的时间、修改以及发表情况，国外一些研究者从60年代起散布了种种迷雾，他们怀疑“两论”是1937年的作品，甚至断言它们是1950年和1952年写的，引起了长时间的争论。您多年研究毛泽东哲学思想，我们想请您谈谈这些问题。

宋一秀：除了上面你们提到的说“两论”不是1937年的作品这种观点以外，还有一种“抄袭”论，即认为毛泽东的“两论”是抄袭之作。散布这种观点的主要是前苏联的一些学者，如苏联科学院远东研究所1977年出版的《毛主义的思想政治本质》一书，认为“经过重新修订”发表的毛泽东的《实践论》，“在‘修订’时利用了”、“抄袭了”苏联的弗·伊·哈斯哈契赫的《物质和意识》这部著作。这本书影响很坏，如你们所说，“散布了种种迷雾”，这确有澄清的必要。

访问人：除前苏联人这样说以外，国内有些人也散布这些观点，他们的动机是什么呢？

宋一秀：国内主要是70年代末80年代初非毛化思潮泛滥的时候，他们也没有提出比外国人更新的论据，基本上是拾了外国人的“牙慧”。

访问人：那么，他们说“两论”不是1937年的作品，根据是什么呢？

宋一秀：这是60年代国外有些人提出的，他们的所谓论据是：在《实践论》1950年和《矛盾论》1952年正式发表以前，各种版本的毛泽东选集，其中包括《整风文献》里都没有收过这两篇文章，甚至说当时中国理论家们的文章里也没有提到过这两篇文章。

这只能说明他们的孤陋寡闻。从1937年4月起，毛泽东应抗大邀请讲授哲学，并开始准备讲稿，总题为《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其中包括辩证法唯物论的许多基本原理和范畴。首先讲的是第一章绪论部分，如哲学中的两军对战，唯物论与唯心论发生与发展的根源、世界观和方法论的一致性问题；第二章接着讲物质论、运动论（发展论）、时空论、意识论、反映论、真理论和实践论；在第三章“唯物辩证法”部分，除重点讲“矛盾统一法则”这一节外，还列举了质量互变法则、否定之否定法则，以及本质与现象、形式与内容、原因与结果，根据与条件、可能与现实、偶然与必然、必然与自由、链与环等对立统一的范畴。后来正式公开发表的《实践论》即该提纲的第二章第十一节；《矛盾论》的原本则是该提纲的第三章第一节，原题为“矛盾统一法则”。和其他一些章节相比，这两部分实际上已不完全是提纲性质的东西，讲得相当详细、充实，具有较完整的逻辑结构，反映出毛泽东当时对辩证法唯物论哲学的体系内容，已有了比较系统的研究和某

些深刻独到的见解。据一些回忆文章说，从1937年4月到7、8月，毛泽东的哲学课共讲了约100多个学时，后来主要由于“七七”事变的爆发讲课中断了。辩证法部分只讲了“矛盾统一法则”，其他法则和范畴都没来得及讲。当时红军总政治部宣传部曾派人做过讲课记录，记录稿连同整个讲授提纲经过整理后印发给大家学习，从此便非正式地在一些地区或单位印行和流传开来。

访问人：现在人们普遍的看法是，最早印行的是《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的油印本。1983年我曾访问过吴亮平，他给我看了一本《实践论》油印本，封面上毛泽东还写着：“吴亮平同志：请阅处。毛”字样，吴亮平说：这是1937年毛主席赠送给他的。我拿回来和《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对照了一下，虽然都是油印本，但字体不一样，一个是手写仿宋体，一个是普通字。这样看来，当时就有单独的《实践论》单行本流传了。

宋一秀：你说的吴亮平藏的那个本子我也看过。那个本子应看成和《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油印本同时期。此后这个讲授提纲又有许多翻印本，如1938年4月广州统一出版社出版发行的《抗战大学》（半月刊）第一卷第六期和以后几期新哲学讲座专栏上，就曾连载过这个提纲，并署名“毛泽东主讲”；1940年3月上海出版的《民主》杂志从第1卷第1期起也署名连载过，这些杂志都不是中共的正式刊物。在1940年，延安八路军军政杂志社把《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铅印成书。以后冀中第四军分区政治部国防社出版社（1941年），新华书店晋察冀分店（1942年），张垣印刷局、大连大众书店都翻印过。这些翻印本都源于1937年9月的那个油印本，除翻印过程中发生的错漏外，内容完全一样，未作过任何修改。

访问人：日本学者竹内实在70年代曾收集到一个版本并公布了，引起了一场对《实践论》版本及修改情况的争论，这是怎么回事？

宋一秀：竹内实找到的那个版本，就是我在上面提到的大连大众书店的那个版本，题为《辩证法唯物论》。1980年12月《中国季刊》发表《毛泽东的矛盾论和实践论：解放前的文本》一文，详尽地考订了他们看到的这些文本，并说：“这些被发现的解放前的文本，其意义不只是为了这两篇论文写作期的争论提供了新的证据，而且涉及到关于延安时期毛泽东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才能和历史地位的争论。”这个评价是很高的，也说明一些外国学者在事实面前还是公正的。

访问人：但是，他们又提出一个观点，认为既然从1946年的文本看不出《实践论》在1950年发表时作了很多修改，那么，1946年的文本必定已经作过很多修改。实际情况是不是这样呢？

宋一秀：这纯粹是主观推测，我在前面说过，1946年的文本包括其他在建国前出版的文本都出于1937年9月那个油印本。1950年编辑《毛泽东选集》时，作者作了一些修改，但《实践论》的内容同油印本的内容基本上是一样的，内容上的修改主要是增加了第四自然段的“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人类社会的生产活动，是一步又一步地由低级向高级发展……”一段话，删去了原稿中在论述人们的思想常常落后于实际是因为人的认识受了许多社会条件的限制的缘故时对社会条件的具体论述；另外还加上了“无数相对真理之总和，就是绝对真理”一句，其实这句话原来写在《讲授提纲》第二章第十节《真理论》中，这里是移来的。除此之外，只是一些个别文字的变动和修饰。《矛盾论》修改较多，为此，收入《毛泽东选集》时，本篇的题解专门

作了交代：“在收入本书的时候，作者作了部分的补充、删节和修改。”《矛盾论》原稿大约有 25 000 字，重新发表的稿子大约有 24 000 字，其中删去了近 7000 字，增加了 6000 字。关于《矛盾论》的修改情况，我们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第七卷第一章中作了详细交代。总之，我认为这些修改是符合科学精神的，既保持了原貌又吸收了自抗大讲课以来的新的经验，增添了一些新思想；同时也表明毛泽东希望把他的著作作用他所能达到的最完善的形式贡献给读者。对这一点也是无可指责的。

访问人：对“两论”写于 1937 年持怀疑态度的人，还说到当时的理论家都没有提到过这两篇文章，是这样吗？

宋一秀：对这个问题，我们可以引用几个材料。1941 年 4 月，张如心在《解放》月刊上发表《在毛泽东同志的旗帜下前进》，认为毛泽东之所以能够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除了其他的原因之外，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他能够真正唯物地具体地理解我国的情形，真正掌握创造性马克思主义的灵魂——唯物辩证法。从毛泽东同志编的《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他如何深刻透彻地了解唯物辩证法的本质，如何善于把长期的丰富的革命经验以辩证法的方法科学地综合起来”。同年 6 月，另一位青年哲学工作者和培元在《中国文化》上发表《论新哲学的特征和新哲学的中国化》，其中说：“1937 年毛泽东同志在抗大的哲学讲座迄今犹脍炙人口，他的讲授提纲——特别是对立统一规律一章是最好的中国化了的马列主义的哲学著作，他对辩证法原则阐述之所以那样爽朗、生动、有力，这不仅由于他的文字的流畅易懂，更重要的是由于在字里行间洋溢着活的中国革命经验。这就预示着新哲学中国化的正确道路。”1943 年 8 月艾思奇也撰文说：“铁的事实已经证明，只有毛泽东同志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发展了和具体化了的辩证法唯物论，才是能够把中国之命运引到光明前途去的科学的哲学，才是人民的革命哲学。”这里说的“发展了和具体化了的辩证法唯物论”，就是指的《实践论》、《矛盾论》。这些材料表明，“两论”流传开不久，对“两论”的研究也就开始了。外国人对我们的历史资料不熟悉，还有情有可原，我们自己的学者也跟着起哄，就太不应该了。

访问人：那么，所谓“抄袭”之论又是怎么来的？

宋一秀：对前苏联科学院远东研究所出版的《毛主义的思想政治本质》中认为《实践论》“抄袭”了苏联的弗·伊·哈斯哈契赫的《物质和意识》一书，可以说不值一驳，哈氏写作《物质和意识》大约在 1939 年 1941 年间，这时毛泽东的《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已经写成并流传；哈氏的著作的出版在 40 年代末，翻译成中文是在 1951 年五十年代出版社出版的《论世界可知性》，它是《物质和意识》中讲认识论的两章，这时毛泽东的《实践论》已公开发表。前面说过，1950 年《实践论》正式发表时根本没有作多少修改。根本谈不上任何“利用”、“抄袭”哈斯哈契赫著作的必要和可能。因此，只要摆出这些事实，苏联某些人的信口谬说就不攻自破了。

至于谈到毛泽东写作“两论”和苏联 30 年代哲学教科书的关系，这确是一个可以探讨的问题。1988 年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出版的《毛泽东哲学批注集》，提供了最直接的原始文献资料。毛泽东在写作“两论”之前，阅读过苏联 30 年代的一些马列主义哲学教科书，并作了大量的批注。主要有：1936 年 11 月至 1937 年 4 月研读苏联西洛可夫、爱森堡等著、李达和雷仲坚译的《辩证法唯物论教程》（中译本第三版），1937 年以前读米丁等著、

沈志远译的《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上册），毛泽东在“西氏本”中写下了12 000多字的批语，并从头至尾作了圈点和勾画。其中第三章“辩证法的根本法则”批注文字最多。对“米丁本”的批注约2600字，从内容上看，批注最多的是统一规律问题，占批注文字的一半，其次是对认识论问题的批注。这说明，毛泽东研究的重点仍是矛盾问题和认识论问题。我们把毛泽东读这两本及其批注同“两论”对照，可以看到他在阐述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时，曾利用过苏联哲学教科书中的思想资料，吸收了“西氏本”和“米丁本”中论述的观点，其中不少观点及其分析使毛泽东受到启发，并且他还以自己的方式吸取了其中一些有见地的思想。否认这一点，不是科学的态度。

但是，“两论”同苏联哲学教科书相比较，又有它自己的许多特色和独到之处，它以长期中国革命实践经验作基础，在理论上进行了独立的创造和发挥，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

访问人：主要体现在哪里呢？

宋一秀：首先，从体系结构上看，“两论”没有像苏联教科书那样广泛地涉及马克思主义哲学各个方面的问题，而是从中国的具体实际出发，根据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和实践需要，有目的、有选择、有重点地来安排、构造自己的体系内容。这充分体现了中国革命的历史和逻辑的统一。《实践论》所以要突出认识和实践的相互关系及其矛盾运动这个中心，侧重于论述和解决认识论问题，《矛盾论》所以要突出唯物辩证法的实质和核心，强调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相互关系，特别是分析矛盾特殊性的重要意义，侧重于论述和解决方法论问题，不仅因为它们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辩证法中的根本问题，更因为它们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观主义者长期以来没有解决的根本思想路线问题。

其次，从内容上看，“两论”克服和弥补了苏联教科书的某些不足之处，如对某些哲学概念、范畴、原理等，有的无明确的定义，或者论述得不全面、不系统、不准确等，而“两论”在阐述和论证问题时，密切联系中国的实际，以中国革命的丰富实践经验为基础，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辩证法进行了系统的独创性的发挥。

第三，从论证、表达问题的方式和用语上看，“两论”具有明显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它们继承了中华民族所特有的哲学理论思维方式和风格，论著短小精悍、言简意赅、思想鲜明，写法上深入浅出、通俗易懂，善于运用中国民间谚语、格言、典故以及中国人民日常生活经验，具体、生动地形象地阐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辩证法的深刻哲理。因而“两论”作为富有中国民族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论著，较之苏联哲学教科书，更为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广大人民群众所喜闻乐见，也更便于他们理解和接受。

第四，就“两论”和苏联教科书的作者在阅历、斗争经验、思想素质和境界等主客观方面的因素来说，两者的差别也是明显的，作为既是伟大的政治家、思想家、革命领袖，同时又是哲学家与专门从事学术研究的学者、哲学家相比，即便是对同一概念、论点、命题的理解和阐述，无论在广度和深度上都是有差别的。特别是对实践经验的总结和概括，前者较后者显然有其优越条件和过人之处。毛泽东之所以写出“两论”是同他长期参加革命实践和党内斗争积累起来的丰富经验分不开的。而只有一般的哲学知识素养，或者只是利用前人和同时代人的思想材料和哲学成果，是写不出“两论”这样思想深邃、具有鲜明针对性、战斗性的杰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论著的。

访问人：在所谓“抄袭”这个问题上，国内有些人还散布了这样的观点，即认为毛泽东还抄袭了艾思奇、李达等人的著作和观点。

宋一秀：艾思奇到延安是1937年10月，这时“两论”已经油印流传开了。在这之前，毛泽东的确阅读了艾思奇的《大众哲学》，1936年10月22日他在给叶剑英、刘鼎的信中就提到过：“要买一批通俗的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及哲学书，大约共买十种至十五种左右，要经过选择真正是通俗的而又有价值的（例如艾思奇的《大众哲学》，柳 的《街头讲话之类）”。但是，《大众哲学》毕竟是通俗的哲学读物，不能同“两论”同日而语。另外，有人还说他利用了艾思奇编辑的《哲学选辑》，这也是站不住脚的，《哲学选辑》是艾思奇到延安之后于1939年编的，只从时间上看也对不上。对于李达的《社会学大纲》，虽然这部书在1937年就出版了，但由于道路曲折，毛泽东得到它，已经是1937年底或1938年初的事情了。毛泽东在1938年2月写过一篇读书日记，里面详细记载了他读李达这部书的情景，从1938年1月17日读起，中间虽有间断，但用了两个月的时间，到3月16日全书读完。这说明毛泽东在写作“两论”时还没有读到过这部书。但是，我们也不要否认“两论”的写作同30年代中国哲学战线上的论战和研究成果的联系。因为中国30年代的哲学论战同毛泽东写作“两论”时同处于一个时代，有着共同的时代要求，他通过阅读艾思奇等人的著作和资料也了解了那场争论，虽然“两论”解决的问题主要是针对“左”倾教条主义，但也间接地驳斥了张东荪、叶青等人散布的反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同时，更重要的是，毛泽东写作“两论”阅读这些资料时，肯定和吸收了艾思奇等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在论战中阐发的许多正确观点和思想，并加以补充使之更精确化和系统化，达到一个新的理论高度，同时也纠正和克服了他们的某些不正确、不恰当的提法。在当时哲学界普遍存在着脱离中国革命实践的情况下，“两论”的写作本身实际上起了扭转这种不良倾向的作用，为在哲学研究中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特别是联系中国革命具体实践，提供了范例和指导。访问人：看来，国内外有些人散布的“种种迷雾”，不是主观臆测，就是别有用心推断，都站不住脚。宋一秀：站不住脚。事实胜于雄辩，“两论”最初写于1937年7月和8月，是确定无疑的，无可辩驳的。毛泽东在答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的提问时也说，“两论”是写于1937年夏。谁也否认不了《实践论》、《矛盾论》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而且随着历史实践的发展，人们会越来越感到它的博大精深和深远的理论意义。

1993年2月21日于北京大学

## 访毕剑横——毛泽东与中国哲学传统

### 毕剑横

毕剑横，1935年生，四川成都人。现任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硕士生导师。长期从事理论教学、宣传和研究工作。主要著作有：《毛泽东与中国哲学传统》、《国外毛泽东研究述评》，并主编了《毛泽东思想史》、《毛泽东战略思想研究》、《毛泽东过程论思想研究》等。

7月的成都，细雨绵绵，不冷不热。我们趁一次开会的机遇，拜访了毕剑横教授。他在这个领域已耕耘了十几年。下面这篇谈话，既是对他以前研究的总结，又是他今后研究的开始——我们这样想。

访问人：关于毛泽东思想的来源研究，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基本没有涉及，也谈不上专门研究，近些年这个课题热了起来。作为一般读者，总觉得“传统文化”是个时髦名词，又是个中立词。人们想了解这方面情况，恐怕更关心的是想知道中国传统文化究竟是什么？它最核心的内容有哪些？毛泽东是怎样继承中国优秀文化传统的？你在这方面有专门研究，并出版了《毛泽东与中国哲学传统》一书，我们想请您谈谈有关方面的情况。

毕剑横：我想，要回答这些问题，首先把我怎么研究这个课题的过程讲一下，中间可以穿插我的观点，这样谈更活泼。

访问人：好的。

毕剑横：对中国传统文化问题，我是从研究毛泽东思想体系特别是毛泽东哲学思想体系才开始接触的。当时我们协助杨超同志整理他的第一本书《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他谈到一个观点，认为：中华民族是富于辩证思维传统的民族，植根于中华民族这块土壤的毛泽东思想，特别是毛泽东的辩证法思想，不仅与马列主义唯物辩证法原理和中国革命的客观辩证运动有着甚为密切的关系，而且与中国的辩证思维传统也有着甚为密切的关系。因此，我在研究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时候，便注意发掘和整理中国辩证思维传统的丰富资料，并把这二者联系起来加以考察。我认为：毛泽东哲学思想既然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要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这个实际不仅有现实的实际，还有历史的实际，历史的实际就涉及到历史上的传统文化。中国的文化遗产非常丰富，我在清理诸如烟海的古代典籍时，首先从哲学传统方面来清理，而在哲学里又首先从辩证思维传统来研究。因为我对历史有点癖好，喜欢看古代典籍，杨老便让我首先收集关于辩证法方面的资料。经过努力，我想理出一本近10万字的《中华民族辩证思维传统》的专题研究资料。

访问人：这项工作从哪一年开始搞的？毕剑横：十多年前，那还是刚粉碎“四人帮”后不久，是1977年初的事情了。“文革”中，杨超被迫害、投入监牢，这反而使他能集中精力，认真细致地钻研毛泽东著作。1967年至1969年他写了几十万字的学习笔记，在这个基础上写成《试论毛主席哲学思想体系》初稿，以后正式出版，改为《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

访问人：我看到过初稿，是个白皮本子，有30万字的样子。

毕剑横：杨超同志恢复工作后，担任中共四川省委书记，他就组织张伟民、彭泽农和我等6个人，成立了一个“‘两论’学习研究组”，对他的书稿进行整理修改。他早就对这个问题思考过，但当时由于身处逆境，不可能接触那么多史料，但根据他过去读的书，觉得在中国古代文化典籍里，有很多包含着极其丰富的朴素辩证法思想的材料。他给我提供了线索，说首先有

三本书：《易经》、《道德经》、《孙子兵法》辩证法思想非常集中、丰富，但又不要仅限于这三本书，在中国古代的经史子集里也有许多材料。因为中国古代文化的特点是什么都有，不一定是专门的辩证法专著，也许是政论性的、伦理性的，里面也有丰富的辩证法思想，甚至在诗词歌赋、琴棋书画以至民间格言、谚语里，也蕴含着大量的朴素辩证法思想资料。资料搜集后再进行第二步，和毛泽东的辩证法思想联系起来，看是不是源流的关系，是不是批判地继承中国文化的优秀遗产。我的研究工作就是这样开始的。十多年前，我年富力强、精力充沛，不分昼夜，不分巨细，用一年多时间，搞出十多万字材料。收集的结果，辩证法方面的材料的确不少，但已越出了这个范围，唯物主义和无神论传统的材料也有，涉及到军事、政治、伦理方面的材料也不少，我都汇集起来了。

访问人：认识论方面是不是也有很多？

毕剑横：当然，如在知行观方面的材料也不少，所以，集中起来就大大越出了辩证法的范围，旁及到认识论、朴素唯物主义和无神论、军事、政治、伦理道德等各个方面，基本上哲学的各个部分的资料都有了，这些丰富的资料的确证明中华民族是一个富有理论思维传统的民族。

这些材料对我很有启发，但总要和研究联系起来，不是光为占有材料而收集材料，我们的目的是为研究毛泽东哲学思想体系而服务。它究竟和毛泽东哲学思想有什么关系？这就需要好好研究。收集材料固然要下功夫，但要驾驭、分析它，对我来说的确很困难。后来我就去请教学者专家。武汉大学教授肖 父是我的老师，他在中国哲学史学界颇有名气，也参加了杨老那本书的讨论。我对他说：我收集了不少关于中国古代哲学的材料，想把它和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源流联系起来研究，不知从何着手，您看怎么办？肖教授给我提出个方法，对我有很大启发，他说：你可用“逆追法”。你们对毛泽东哲学思想体系不是提出了个三条线的观点吗？既然坚持这个观点，就沿着三条线往上追。当时我们以杨超同志为首的这个学派，认为毛泽东思想是个体系，毛泽东哲学思想也是个体系，这个体系的特点概括为：以实践理论为基础，矛盾学说为纲要，后来又加上：以实事求是为主线（或精髓）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于是我就沿这三条线往上追溯，在矛盾学说方面，我往上追溯到古代的朴素辩证法、追溯到古代的矛盾观，一两观，然后联系起来研究；在实践理论方面，《实践论》的副标题“论认识和实践的关系——知和行的关系”，对我很有启发，就从知行关系往上追溯，并把这与认识和实践的关系联系起来研究；“实事求是”也是这样，原话从哪里来的？当时是表达什么意思？后来怎样有了哲学的意义？毛泽东是怎样继承改造成现在的意思的？等等。看来方法问题很重要，经老学者一指点，我就豁然开朗了，不然真是“老虎吃天—无法下口”。所以，我最初是抓住这三条线往上追，结果自然而然地把它们联系了起来。矛盾观、一两观、对立统一思想在《易经》等三本书里很集中，如《易经》中的“一阴一阳之谓道”等；生与死、柔与刚等，能列出几十对；《孙子兵法》有各种对立统一的转化，如强和弱、胜和败等等，这样一直“追”到明清。访问人：除先秦这三篇外，两汉、三国、一直到明清，这些古代文献你是否都查了一遍？

毕剑横：先秦以后的文献也很丰富，如汉代的王充，南北朝时期的范缜，唐宋时的柳宗元、刘禹锡、王安石、张载，明清时的王夫之等等，后来我稍微旁及到近代如严复，近代不大多，但可以清晰地看到一条唯物主义、无神

论发展的线索。

访问人：孙中山呢？孙中山在知行观上有许多重要论述。

毕剑横：孙中山的著作我也查了，虽然他有机械唯物论的色彩，但也还有许多辩证法思想。我感到，孙中山的知行观有些和毛泽东的认识论比较接近。把这些材料集中起来看，的确可以看出毛泽东思想对中国古代文化是一个批判继承的关系，从春秋战国时的“知之非难，行之惟艰”，一直到孙中山的“知难行易”说，这就贯彻下来了。

“实事求是”一词，我们查到最早是在《汉书》里出现的，出在《河间献王传》，书中称赞河间献王刘德“修学好古，实事求是”，唐朝的颜师古把这段话训为“务得事实，每求真是也”。这表明“实事求是”在当时只是指一种“求实”的学风，还不是像现在这样表述为一种世界观和方法论，但“实事求是”作为中华民族的优良学风一直流传下来，而且发扬光大。毛泽东最早也受到“实事求是”传统学风的影响，他早年读书就受到胡适、梁启超甚至曾国藩等人的影响，这些人对实事求是的学风是推崇的。邓小平说：“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我“就是一条，相信毛主席讲的实事求是”。那么，毛泽东什么时候把“实事求是”提到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高度呢？我们追到最早是在《改造我们的学习》里，毛泽东对此作了逐字的科学解释，他说：“‘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因此，我们要从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既然要从客观存在的事物中探求规律性，以指导我们的行动，这不是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什么？从那时开始，“实事求是”已经完全不是原来的含义，完全不限于学风，而是已经提到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高度了。所以，我们就以《改造我们的学习》作论据，说明毛泽东批判地继承和革命地改造了“实事求是”这个传统概念，使它具有了全新的含义。

访问人：毛泽东对“实事求是”的新解释，也是对他前面那段理论创作和实践的总结，因为从发表的时间上看，《实践论》、《矛盾论》在前，《改造我们的学习》在后。

毕剑横：你说的这个问题很好，我也考虑过这个问题。“两论”就集中阐发了他的这种思想，虽然“两论”中还没有出现“实事求是”的字样，但如果提到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认识论和方法论的高度来考察，那么，实际上“两论”就是“实事求是论”或“论实事求是”。对知行观的改造就是明显的例子，毛泽东为什么在《实践论》上加个副标题？“两论”重新发表后，注家蜂起，很多人写了阐释“两论”的书，其中毛泽东最欣赏李达的，因为李达把这同知行观联系起来，他很赞赏。所以，《实践论》总结的不仅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学说，而且是对中国古代知行关系的论争的总结，还有对前一时期中国革命实践的总结。通过总结起了一个质的变化，已经不是朴素的知行观，而是辩证唯物主义的知行观了。

访问人：他是很巧妙地把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中国传统的知行观高度地统一了起来。

毕剑横：这比以前的认识上升了一步。看来我们研究毛泽东思想特别是毛泽东哲学思想，不仅要把马列主义发展史这条线，还要把包括中国哲学史在内的中国思想史这条线联系上，理论渊源不仅有西方，还有东方。当然，

主线还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因为毛泽东思想是对马列主义的继承和发展；但另一条线也是不可缺少的，作为毛泽东哲学思想来说，既是对中国优秀哲学遗产的批判和继承，也是对中国优秀文化遗产的批判和继承，因为哲学是毛泽东整个思想体系的基础。这样，就形成了我们的观点：毛泽东思想的来源不仅有马列主义这条主线，还有中国传统文化这条副线，或叫主要来源或次要来源。杨超同志说：就叫“两源说”，说得确切点，是“有主次的两源说”。这个观点提出后，对主线没有什么争论，对次线就有很大的争论，最早发生在我们召开的学术讨论会上。

访问人：这是哪一年？是不是在真理标准讨论前后？

毕剑横：真理标准的讨论已经开始了，大约是1978年11月，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那次讨论会的热点是关于“两源问题”，有人根本否定“两源”，认为只有“一源”，他们说，中国的封建社会最长，占统治地位的文化自然是封建文化，如果说毛泽东思想有两个来源，那么毛泽东思想里是不是还包含有剥削阶级的文化，这会影响毛泽东思想的纯洁性。这个反问够厉害的，但我们又不甘心，因为我们接触了大量材料，既然说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体系，是中国的马列主义，中国的马列主义是和中国现实相结合的，那么，中国的现实是怎么来的？是历史来的嘛！既然承认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那么，中国的实际不能仅仅是现实，因为现实是从历史发展来的，中国的今天是由昨天发展而来的。这样就辩论开了。辩论有好处，有支持的，也有反对的，还有思考的。那时“一源说”还占上风，我们是少数，当然，也有些地方可能我们表达得不清楚、研究得不深，但我们的基本观点不能放弃。

访问人：那时，杨超同志出来说话了吗？

毕剑横：他知道这些情况，但没有发言。当时我们主要是为书稿征求意见，不管什么意见都要虚心听取。但观点还是要坚持。不然，说明不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怎么来的，而脱离了中国历史也是说不通。事实上，在毛泽东的著作中，大量地运用马列主义观点，批判地改造和汲取了中国优秀的传统思想，他在阐述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和党的方针政策时，不仅字里行间辩证地融合了这些思想，而且还直接引用了不少中国古代典籍。但持“一源说”的同志，又从毛泽东在《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中找到一个论据，即“中国今日发展着的辩证法和唯物论哲学思潮，不是从继承与改造自己哲学的遗产而来的，而是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习而来的。”还说，对中国古代的哲学遗产，必须进行“批判”的“清算”。实际上只要我们认真研读原文，便可发现，毛泽东在《提纲》中还有段涉及中国古代文化关系的话，他说：“现代的唯物论，不是过去各种哲学学说之简单的继承者，他是从反对过去统治哲学的斗争中，从科学解除其唯心论和神秘性的斗争中产生和成长起来的。”“辩证法唯物论，继承了过去文化之科学的遗产，同时又给此种遗产以革命的改造，形成了一种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最正确最革命同最完备的哲理的科学。”这就最有力地驳斥了“一源说”的观点。因为毛泽东不是否认他的哲学思想与中国传统哲学的联系，否认它们之间的继承关系，而只是说明这二者“不是简单的继承”，也就是说不是全盘地继承，而是批判的继承，毛泽东这里所说的对古代哲学遗产应当“批判”和“清算”，也正是这个意思。因为“批判”不等于全盘否定，“清算”也不等于完全推翻。根据否定之否定规律，历史上的任何一种文化，决不可能是空地上创立的。作为意

识形态，当然是现实经济基础的反映，另外，它又同过去的意识形态和文化成果有联系，这种联系，不是笼统的接受下来，而是批判地继承，是一种“扬弃”，用毛泽东的话说，就是“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有人也抓住这段话，认为毛泽东说得不严密。我们说，毛泽东不是专职教员，他的讲课提纲是在一种比较紧的情况下写的，考虑得可能不严密，也可以抓出漏洞，但从毛泽东一贯的思想来看，他对历史文化不是持全盘否定的态度。这方面的论述太多了，从《新民主主义论》、《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直到《论人民民主专政》，都是讲怎样“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甚至用肠胃运动来说明哪些应该吸收，哪些要排泄出去。毛泽东在青少年时代就读了大量古代典籍，这方面的修养很高，他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以后，并没有简单地否定他过去读过的东西，而是批判地继承并加以革命的改造，很多东西都是“古为今用”，赋予了新的含义。他不仅这样说，而且把它作为党的方针提出来。

我觉得在理论探讨中有争论很有好处，可以从不同观点的争论中思考别人的合理部分，人家抓住了你表述不严密的地方，促使我们把论据搞得更充分，更有力，论证也更严密，的确是个促进。后来我们在杨超同志的《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一书中写了我们的观点，现在看来，这个十多年前的论述可能比较肤浅，只是亮明观点，然后分门别类用史料说明，仅仅限于这个，把它贯通起来，糅和在一起差一些。但这确是一个良好的开端，《光明日报》还予以转载。

以后，赞同“两源说”的比较多了，看来否定毛泽东思想有两个来源，认为毛泽东对中国历史文化只有批判而无继承的观点是说不过去了，有人就提出所谓“批判地继承”，仅限于形式而不是内容，也就是说，只有形式上的继承，“旧瓶装新酒”，毛泽东只是运用中国的语言、中华民族的形式来表达马列主义，而在思想理论上并没有继承中国古代的东西。我不同意这种看法，我认为，形式上的继承是肯定的，那么在内容上有没有批判地继承关系呢？回答也是肯定的。我觉得这两者的关系是双向的：一方面，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对中国古代历史文化遗产加以分析、鉴别、批判地继承；另一方面，在阐述马克思主义时，又把中国古代优秀的文化内容也参加进去，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访问人：在这个过程中，除了哲学思想，在其他方面是不是也很显著？

毕剑横：因为我们是先从哲学着手，搞了辩证思维传统，又搞了唯物主义和无神论传统，还有在认识上对古代知行观的总结。除了这些之外，军事问题又增加了一章，政治学说、伦理学说又增加了一些内容和说明。

访问人：中国古代的伦理思想也很丰富，毛泽东在这方面也有许多论著，如《为人民服务》、《反对自由主义》等，这方面你们也搞过吗？

毕剑横：我们从整风文献中发现，不仅毛泽东，而且党的其他领导人，如刘少奇在他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等著作中，涉及道德、伦理问题也大量引用了古代典籍。这是宣扬封建道德吗？不是。已经完全是无产阶级的伦理观，但用了中国人民喜闻乐见的语言形式，把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给予了全新的解释。毛泽东的《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和《愚公移山》这三篇著作确实是思想教育的好教材，也是中国伦理思想的典范。他不仅举洋人（白求恩）、举革命队伍中的人（张思德）作为范例，还举了古代寓言里的愚公，是形象化的民族精神的体现。

访问人：我想再问一个问题：就是在毛泽东和中国传统文化这个课题上，还需要在哪些问题上有所拓展，有所发掘？

毕剑横：尽管我们重点研究了毛泽东哲学思想这个重要方面，但还不够，在其他方面还要加以拓展，尤其在军事、政治、经济、伦理包括文化、教育思想等方面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根据我们初步接触的史料，在这些方面的内容是相当丰富的。

比如军事思想。毛泽东军事思想是举世公认的，当然他主要是从中国革命战争的实践中总结的经验，并上升为军事理论，但中国古代兵书相当丰富，他是不是也吸收了古代兵书中的精华？中国古代的封建社会很长，历朝历代真是“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有统一，有分裂；有和平，有战争，因而古代文化遗产中的军事著作很多，毛泽东又有那么深的古文功底，他是怎样在总结现代革命战争经验的基础上，批判地吸取这些丰富的军事学遗产的？的确值得很好研究。

再比如政治艺术。杨老有个想法，他说，中国古代政治策略太丰富了，兵书、三十六计都是策略，毛泽东在这方面也有许多“批判地继承”。我们翻阅了有关史料，如“民以食为天”，“以民为本”等这些思想很可贵，当然其中也包含历代统治阶级推崇的统治术，即所谓“南面之术”，他们的目的是为了巩固统治，但比较开明的统治者却深谙“水可以载舟，亦可覆舟”的道理，因而能重视人民，以民为本，注意民心的向背，不然要翻船，这里是不是也有“合理内核”？

访问人：我们可以叫领导方法、领导艺术。

毕剑横：这是经过马克思主义的改造后的概括和表述，尽管我们的出发点不一样，但可以进一步研究。

还比如伦理思想和教育思想。中国古代的哲学和伦理学往往很难分开，在教育上还是把德育放在首位的。当然它的“德”是封建道德，“三纲五常”、“四维八德”、“智仁勇”等等，但它把思想教育放在首位，按照它的思想要求去塑造人、教育人，这个方法可以学。毛泽东也是这样，他强调把思想政治教育放在首位、先解决人的世界观、人生观问题。在教育方法和教学方法上他都有许多独特的见解，如倡导启发式、废止注入式等。这说明中国文化有这个好的传统，并在毛泽东那里得到了新的解释和发挥。

总之，在军事、政治策略、伦理教育等方面，中国古代的传统文化有不少优秀的遗产，有的至今不衰，还有它的活力，当然，这个活力是经过马克思主义的彻底改造，赋予了它新的内容。

访问人：国外的学者对这些非常感兴趣，当然他们的理解有他们的角度，我们不一定完全赞同，但对他们说得有道理的，对我们的研究也是个启发。

毕剑横：我们和国外的学者也有些交流，在接触中也感受到了。他们研究角度和观点我们不一定赞成，如把毛泽东看成是民族主义者，是大儒，还有的认为他是民粹主义者。但他们很重视毛泽东思想和中国历史文化传统的关系，也有一些比较客观的学者，如施拉姆、特里尔等，有些见解很可取，他们研究毛泽东思想，总是把他和中国历史文化传统联系起来，而且信息多，这给我们很好的启发。国外研究毛泽东的学者把这些作为热点和重点进行了认真的研究，而且出了成果，为什么我们自己反而不去研究？说到拓展，也有一个和国外交流的问题，这肯定是个热点和重点问题。在和国际学术的交流中，我们应该拿出自己的研究成果，不能只限于对“雄文四卷”的诠释和

注解，或只是对毛泽东思想某些理论原理本身的阐释和说明。应当对毛泽东的生平和思想，从多角度、多侧面进行研究，从纵深方面发展，既要从过程上进行历史考察，又要从各个领域深入进行探讨，在我们的研究论著中，既讲出历史的本然，又讲出所以然，既要有深度，又要有新意。这样，我们就不会在国际交流中汗颜了。

1993年7月15日于成都

## 访张承先——毛泽东教育思想和当代社会

### 张承先

张承先，1915年生，山东高青人。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任清华大学中共地下党支部书记，抗日战争爆发后，奔赴鲁西南抗日前线。建国后，历任中共中央华北局宣传部副部长，华北行政委员会文教委员会副主任。河北省委书记处书记，国家科委副主任，中央教育部副部长等职。现为中国教育学会会长。著有《历史转折与教育改革》等。毛泽东的教育思想有哪些内容？和当今的社会现实是什么关系？我们访问了张承先同志，张老已年近八旬，精神矍铄，思维敏捷，讲起话来抑扬顿挫，常常“以手势助说话”。访问人：张老，您是教育界的老前辈，搞了一辈子教育工作。我们想请您谈一谈毛泽东的教育思想，联系现在的实际，这个问题的现实意义还很大。张承先：毛泽东的教育思想很丰富，它不仅体现在有关文化教育的论述方面，而且包括在他的整个思想体系里。我不想一般地泛泛地谈毛泽东的教育思想，而是想联系现在的实际，着重谈谈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教育思想的重大现实意义。第一个问题：坚持毛泽东教育思想，确立正确的教育观问题。这是一个带根本性的问题。毛泽东同志在《新民主主义论》一文中，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精辟地阐明了教育的本质、教育在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他提出：“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而经济是基础，政治则是经济的集中的表现。”毛泽东同志在这里所谈的“文化”是个大概念，教育也包括在里面。他在这里论证了教育与政治和经济的关系。毛泽东同志在《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一文中，指出：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只能从社会的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三项实践中来”。他要求人们学习这三大斗争的实践经验 and 知识。他提出：要在学习和实践中，由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掌握事物的客观规律，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实践中改造人的主观世界。从毛泽东科学的思想体系出发，对教育本质的认识可以概括为：教育的本质，就是要把人类改造自然的斗争、改造社会的斗争，在改造客观世界中改造人的主观世界的斗争，这诸方面的斗争经验和知识，集中起来，传播下去，使人类由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不断迈进，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访问人：这是您自己概括的观点吗？张承先：在毛泽东同志的著作中没有这么一段集中的话，根据毛泽东的科学思想体系，可以得出这样的论断。我认为这样认识是符合毛泽东思想的。

在涉及教育本质这一根本性的问题上，从拨乱反正以来，我国的教育界和理论界不断展开热烈争论，要求在理论上作出正确回答。

访问人：发生过哪些争论？

张承先：主要有三次。第一次争论是关于教育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问题。在“拨乱反正”中，邓小平同志提出实现四个现代化，科技是关键，教育是基础；纠正了“文革”中把学校单纯地看成是阶级斗争工具的“左”的错误观点，确认了科技是发展生产力的第一要素，而经过教育培养出来的科学技术人才和具有高度科学文化水平的劳动者则是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从而使我们更深刻地认识了教育的经济功能，确立了教育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战略地位。教育理论是由此展开了一次大讨论。有人从教育的经济功

能出发，认为教育是属于经济基础范畴的；有人强调教育涉及意识形态，具有阶级性，仍然属于上层建筑范畴；有人则认为教育既与经济基础有关，又与上层建筑有关，是二者兼而有之。

访问人：这次争论涉及面很广吗？

张承先：涉及面很广，后来争论反映到胡乔木同志那里，乔木同志说，教育涉及整个社会生活的各方面，简单地说它是经济基础或上层建筑都不合适。经过反复讨论，大多数同志认为教育确实涉及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教育的功能是多方面的，有经济功能、有政治功能、有文化功能、有全面育人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功能等。把教育机械地、片面地或划入经济基础或划入上层建筑范畴都是不科学的。科学的结论还得回到毛泽东对教育本质的认识。

访问人：这是第一次争论的结论，那么第二次争论呢？

张承先：第二次争论是关于教育的社会功能和育人功能的关系问题。在我国一度出现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泛滥的情况下，某些人说，过去提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错了，现在提教育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服务也不对，教育的功能在育人。持这种观点的人还批评我们的教育观点是功利主义的，把教育仅仅看作是社会工具而忽视了育人。

访问人：这次争论是发生在哪一年？

张承先：是在1989年春。这里涉及的问题是如何认识教育的社会功能与育人功能的关系，如何理解人的发展与社会发展的关系。毛泽东同志从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出发，认为人不仅是自然的人，而是社会的人。他在《实践论》一文中提到：“离开人的社会性，离开人的历史发展去观察、认识问题”，“不能了解认识对社会实践的依赖关系”。马克思主义是重视人的发展的，说它忽视人的发展是对它的歪曲。马克思主义十分重视人的发展，并积极地为人的全面发展创造条件。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人的发展和社会发展之间存在着辩证统一的关系。人的发展离不开社会的发展，社会的发展为人的发展创造条件，而人的发展又促进了社会的发展。笼统地说教育的功能在育人，好像没有问题；关键在于育什么样的人？根据毛泽东同志在《新民主主义论》中的论述，不能脱离一定的社会、一定社会政治和经济发展的需要，去抽象地孤立地谈育人。教育的育人功能和社会功能之间存在着相互影响的辩证统一的关系。如果脱离了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发展的需要，抽象地谈育人，那就很容易陷入历史唯心主义和人本主义。

访问人：第三次争论是什么？

张承先：第三次大讨论是最近进行的，涉及的问题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教育是否具有商品性。有人提出建立“教育市场”，按价值规律办教育。这也涉及到对教育本质的认识。当然，我们要高度重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对教育改革所起的积极促进作用，教育必须积极主动地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但同时必须注意教育的特点，教育不仅应当充分发挥其经济功能，还要发挥教育的政治功能、文化功能和促进人的发展的功能等方面，教育要促进社会的全面进步。我们既要重视市场经济的发展对人的发展和社会进步所起的积极促进作用，又要注意市场经济的发展如得不到正确引导可能产生的消极作用。要防止出现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个人利己主义。因此在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进行教育改革过程中，必须坚持教育的社会主义方向，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不能简单地把

商品交换原则引入教育领域。

访问人：看来在历史转折中，教育战线的思想是很活跃的。

张承先：是这样。从以上三次大讨论中我们可以看到，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教育观，还是宣扬历史唯心主义、人本主义的教育观，这是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搞好教育改革首先要解决的根本问题。从实践中，我们深切感到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毛泽东教育思想，确立正确的教育观具有极重大的意义。

访问人：您谈的这个问题很重要，很本质，很有现实意义。

张承先：以上是我谈的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坚持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教育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更好地为经济建设这个中心服务。

毛泽东非常重视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里，这是改造社会的最强有力的手段之一，在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后，这是培养理论与实际结合，学用一致全面发展的新人的根本途径，是逐步消灭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差别的重要措施。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他在第二次苏维埃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中，就把教育与生产劳动联系起来，列为苏维埃文化教育的总方针之一。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他又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提出“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以后在中央批转的高等教育六十条、中等教育五十条、小学教育四十条等条例中，又明确提出“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专政服务，教育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建国以来，我们贯彻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虽然走过曲折的道路，但总的说来是取得很大成绩的。过去贯彻这个方针着重点是放在克服学校工作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倾向上，通过加强学校教育的实践环节，参加生产劳动，增强劳动观念和群众观念，改造世界观，培养全面发展的新人。我们贯彻这一方针，培养了一代新人，其中许多人成为各条战线的骨干。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同志在继承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上，又有了新的发展。他从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战略全局出发，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为了培养社会主义建设需要的合格人才，我们必须认真研究在新的条件下，如何更好地贯彻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现代经济和科技的迅速发展，要求教育的质量和效率的迅速提高，要求我们在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内容上、方法上不断有新的发展。要做到这一点，各级各类学校对学生参加什么样的劳动，怎样下厂下乡，花多少时间，怎样同教学密切结合，都要有恰当的安排”。邓小平同志强调指出：“更重要的是整个教育事业必须同国民经济发展的要求相适应。不然，学生学的和将来要从事的职业不相适应，学非所用，用非所学，岂不是从根本上破坏了教育与劳动相结合的方针？”1983年10月1日，邓小平同志为北京市景山学校题词，提出：“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这一战略指导思想，充分反映了时代精神、时代要求。按照毛泽东同志和邓小平同志的教育思想，近些年来，贯彻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有了新的发展。适应国民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需要，进行了教育结构的改革，大力发展了职业技术教育和成人教育；对普通教育进行了综合改革，加强生产劳动教育，引入职业技术教育因素，在农村和城市建立起“农、科、教”，“经、科、教”相结合，协调发展，相互促进的运行机制，促进了当地经济文化的发展，这些都说明在邓小平同志指导下，贯彻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教育与生产劳动相

结合的方针，有了新的突破，并结出了丰硕成果。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我们要进一步贯彻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更加完善“经、科、教”结合的运行机制，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访问人：毛泽东提出的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这个方针是正确的，但是在他的晚年走了弯路，可不可以说，他提出了正确思想，但在实践中没有找到正确的途径？

张承先：不能说完全没有找到途径。“文革”中这一方针被扭曲了，是走了曲折的路。“文革”以前大体上看执行的还是好的。贯彻这一方针，曾造就了一大批和工农群众相结合，又红又专，理论联系实际的知识分子队伍。拨乱反正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有了新的发展；从根本上说，还是沿着毛泽东关于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思想发展而来的。

我要谈的第三个问题，是坚持毛泽东提出的红与专相结合的育人方针，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教育的社会主义方向，把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放在学校工作的首位，更好地完成培养社会主义事业接班人的历史任务。

毛泽东同志总结长期革命斗争和建设实践的经验，总结出一句名言：“政治是统帅，是灵魂，政治工作是一切工作的生命线”，他在《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中提出，思想政治工作是完成经济工作和技术工作的保证，思想政治工作又是统帅，是灵魂。他还提出，学校应该把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放在第一位，培养的人才应是又红又专的。毛泽东同志提出：红与专，政治与业务的关系是两个对立物的统一，一方面要反对空头政治家，另一方面又要反对迷失方向的实际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承和发扬毛泽东同志这一光辉思想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目前我们正面临着两个挑战，一个是世界新技术革命的挑战，一个是国际敌对势力对我国进行“和平演变”的挑战。我们需要极大提高我国的科学技术和文化水平，同时又需要极大提高人民的思想政治觉悟。邓小平同志说：“我们要掌握和发展科学文化知识和各行各业的新技术、新工业，创造比资本主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把我国建设成为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并且在上层建筑领域最终战胜资产阶级的影响，就必须培养具有高度科学文化水平的劳动者，必须造就宏大的又红又专的工人阶级知识分子队伍。”在学校教育工作上，他提出“毫无疑问学校应该永远把坚定正确的方向放在第一位。学生把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放在第一位，这不仅不排斥学习科学文化，相反，政治觉悟越高，为革命学习科学文化就应当越加自觉、越加刻苦”。在1989年3月23日，他又指出：十年来，“我们最大的失误是在教育方面，思想政治工作薄弱了，教育发展不够”。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与此有一定关系。如何改进和加强学校的思想政治教育，成为迫切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这些年来，我们总结经验，接受教训，在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改进和加强学校思想政治工作方面有了进展，但问题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特别是在发展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搞好学校的思想政治工作是一个需要认真研究的新课题。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必须以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坚持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坚持教育的社会主义方向，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方针。学校的教育工作在自觉地服从于、服务于经济建设这一中心的同时，要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使学校成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基地，完成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接班人的历史任务。

访问人：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确实重要，请你谈一谈这方面的问题。

张承先：这是我要讲的第四个问题。要继承和发扬人类一切优秀的文化成果，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毛泽东同志曾说：“中国的长期封建社会中，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中国现实的新政治新经济是从古代的旧政治、旧经济发展而来的，中国现代的新文化也是从古代的旧文化发展而来的；因此，我们必须尊重自己的历史，决不割断历史。”他还说，我们要批判地继承从孔夫子到孙中山以来的一切优秀文化成果。对外国文化，毛泽东同志认为“采取排斥主义的方针是错误的，应当尽量吸收一切进步的外国文化，作为发展中国文化的借鉴”；他还认为“盲目搬运的方针也是错误的，应当以中国人民的实际需要为基础，批判地吸收外国文化。”“中国应当大量地吸收外国的进步文化作为自己文化食粮的原料。这种工作过去做得很不够。”访问人：你认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贯彻落实毛泽东同志的“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方针。

张承先：对于毛泽东同志的这些光辉思想，过去我们贯彻落实的确实不够。对中国的传统文化过去批判得多。当然，在革命过程中，批判其封建性的糟粕是必要的；但如何继承和吸收其民主的精华，这方面的具体工作则做得很少。在“文革”中，从“左”的方面对传统文化来了个彻底否定。前几年，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一度泛滥，以《河殇》为代表，用“蓝色文明”来否定“黄色文明”；又从右的方面对传统文化来了个彻底否定。无论是从“左”的方面还是从右的方面来否定传统文化都导致了民族虚无主义，伤害民族自尊心，影响民族凝聚力，使我们丧失前进的基础。今年5月下旬，在北京召开了一次关于《东方传统伦理道德与当代青少年教育》的国际研讨会。有不少西方学者参加。他们提出的共同论调是西方出现了道德危机，个人主义走到了尽头，要向东方来寻找智慧，挽救西方文明。他们找到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从新加坡来的吴德耀博士在研讨会上介绍了新加坡发扬东方文化的优良传统抵制西方腐朽思想渗透的经验，引起了与会学者的兴趣。许多西方学者认为西方的价值观强调个人发展，而东方先哲提出的“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思想，反映了东方传统文化强调整体协调。到会的西方学者主张把西方的个人进取精神和东方的整体协调精神融合起来。当然，我们很清楚西方社会病态的根源是社会制度问题。用孔孟之道治不了它的病，它的最终出路是以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这是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但西方有些有识之士，确实看到了西方的社会病态，在谋出路，从而研究东方文明的优秀成果。西方学者在研究借鉴东方文化的优秀成果，难道我们自己反而认为可以全部抛弃吗？这是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对西方文化的吸收和借鉴，虽然前一个时期在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一度泛滥中，曾出现“全盘西化”的错误思想，今后对此仍要保持警惕，但从总的方面看，正如毛泽东同志过去所说过的，对吸收和借鉴西方文化还“做得很不够”。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更显得不够。邓小平同志从现代化建设的全局出发，对在新形势下发扬毛泽东同志“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光辉思想作出了杰出贡献。他在1992年视察南方的重要谈话中，提出了深化改革，扩大开放，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历史任务，并提出“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对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

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邓小平同志在强调改革开放，大胆吸收和借鉴西方文明的优秀成果的同时，对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保持了高度警惕。他反对“全盘西化”的思想，在他领导下，全国曾开展了清除精神污染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要深刻领会邓小平同志的这些思想。学校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基地。学校特别是高等学校在贯彻“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方针，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中，要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访问人：这个问题也十分重要，真正解决好同样也要具备操作性，这就涉及到教育方法，您怎么看？张承先：下面我讲第五个问题：根据毛泽东教育思想，指导教学改革。

毛泽东同志非常重视学习方法。强调要树立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反对本本主义。1941年他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说：“我们学的是马克思主义，但是，我们中的许多人，他们学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是直接违反马克思主义的。这就是说，他们违背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所谆谆告诫人们的一条基本原则：“理论和实际统一。”“在学校的教育中，在在职干部的教育中，教哲学的不引导学生研究中国革命的逻辑，教经济学的不引导学生研究中国经济的特点，教政治学的不引导学生研究中国革命的策略，教军事学的不引导学生研究适合中国特点的战略和战术，诸如此类。”在《实践论》一文中又说：“人的认识，主要地依赖于物质的生产活动，逐渐地了解自然的现象、自然的性质、自然的规律性、人和自然的关系；而且经过生产活动，也在各种不同程度上逐渐地认识了人和人的一定的相互关系。”1964年8月，他在接见尼泊尔教育代表团时谈到：“清华大学有工厂。它是一所理工科学校，学生如果只有书本知识而不做工，那是不行的。但是，大学文科不好设工厂，不好没什么文学工厂、历史学工厂、经济学工厂，或者小说工厂。文科要把整个社会作为自己的工厂。师生应该接触农民和城市工人，接触工业和农业。不然，学生毕业，用处不大。如学法律的，如果不到社会中去了解犯罪情况，法律是学不好的。1965年12月在杭州会议的讲话中，他很严厉地批评了教育制度的一些缺点，说：“现在这种教育制度，我很怀疑，从小学到大学，一共十六、七年，二十多年，看不见稻、粱、菽、麦、黍、稷，看不见工人怎样做工，看不见农民怎样种田，看不见商品是怎样交换的，身体也搞坏了，真是害死人。大学教育要改革。要改造文科大学，要学生下去搞工业、农业、商业。至于工科、理科，情况不同，他们有实习工厂、有实验室，在实习工厂做工，在实验室做实验，“但也要接触社会实际。”毛泽东同志说的这些，都是贯穿一个精神，就是教育要注重理论和实际相结合。在教学方法上，早在1929年毛泽东同志提出的红军大学十大教授法，其中重要一条就是倡导启发式、废止注入式。他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提出：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问题。这也是教育战线所要解决的根本问题。毛泽东提出，教书就是为人民服务。校长、教师要为学生服务，决不能让学生为校长、教师服务。教师要先当学生、后当先生，要先向学生学习，了解他们，认识他们，然后从实际出发，教育学生。教师教育学生要充分注意学生的情况，要把精力集中在培养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上。要鼓励学生生动活泼地主动地学习。他严厉批评学生学习负担过重的情况，认为那是摧残青年。毛泽东同志的这些观点至今还是我们进行教育教学改革，改进学风的正确指导思想。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根据毛泽东同志和邓小平同志的教育思想，以邓小平同志提出的“三个面向”为指针，进行了教育教学改革，取得了一些成功的经验，涌现出一批好典型，如小学的“愉快教育”，中学的“成功教育”、“希望教育”、“创造教育”等，总结这些改革实践经验，其所以取得成功，主要是坚持和发展了毛泽东教育思想，正确处理了传授知识和发展智力，特别是创造力的关系，正确处理了教与学的关系，既要充分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又要尊重学生的主体地位；正确处理了教育与生产劳动的关系；正确处理了集体教学与个别指导，因材施教的关系；正确处理了课堂教学与课外、校外活动的关系。举一个例子：武汉市粮道街中学夹在几个重点中学之间，学习成绩好的学生都被重点中学收去了，这个学校是收底的。学生觉得上这个学校没有前途。学校怎么办下去，成为校长、教师面临的难题。该校领导提出开展“希望工程”。其内涵是每个学生都是希望向上的，学校要热爱学生，不要厌弃“差生”，从学生的实际出发，挖掘发挥每个学生的特长和特点，启发起学生学习的积极性，鼓励他们前进，结果面貌改变了，学习成绩不亚于重点中学。学校请我给他们题词，我题了：“热爱每个学生，点燃起学生内在的希望之火，引导他们奔向未来。”由此看来，“差生是可以教好的，关键看教育思想、教育方法对头不对头。但是，从大面上看，目前学校脱离实际，学生负担过重压制学生发展的问题至今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

访问人：学生负担过重的问题，一直是人们关心的焦点。社会舆论压力也很大，这个问题长期得不到很好解决，您认为原因出在哪里？张承先：这个问题比较复杂，有一定的社会原因，学校在社会压力下，陷入片面追求升学率中。把学校教育由全面素质教育变成片面的应试升学教育，这样办下去，教育不可能办好，也很难培养出人才，有许多学生是“高分低能”。毛泽东同志曾经说过：封建社会的状元，没有几个有出息的，人才常出在落第人中间。蒲松龄就是个例子，他屡试不第，到71岁方为贡生，而他却写出了《聊斋志异》一部好书。再如英国首相丘吉尔，年少时学习成绩并不好，只好去上骑兵学校，但丘吉尔后来却做了一番大事业。由此看来，端正教育思想改革教育制度、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是十分重要的。从办得好的先进学校看，学校固然受到社会上片面追求升学率的压力，但也不是无能为力的。关键是提高校长、教师的素质，树立起正确的教育思想和教育方法。

访问人：片面应试教育，学生负担过重，确实压抑了好多天真活泼的孩子，影响了他们的发展。

张承先：我要说的第六个问题是根据毛泽东教育思想必须重视普及教育，提高整个国民素质。

毛泽东同志非常重视普及教育，多次提出：“工人、农民要知识化。他在《新民主主义论》一文中提出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它应当为全民族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农劳苦群众服务，并逐渐成为他们的文化。”在《论联合政府》一文中说到“农民——这是现阶段中国文化运动的主要对象。所谓扫除文盲，所谓普及教育，所谓大众文艺，所谓国民卫生，离开三亿六千万农民，岂非大半成了空话？我这样说，当然不是忽视其他约占人口九千万的人民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的重要性，尤其不是忽视在政治上最觉悟。因而具有领导整个革命运动资格的工人阶级，这是不应该发生误会的”。

在今天，在我们这样一个农民人口占多数的大国，贯彻毛泽东这一发展

教育的指导思想仍具有重大的经济意义和政治意义。我们国家经济、文化基础都比较薄弱，过去可以说是“一穷二白”，尤其是广大农村。而“穷”与“白”之间有密切的联系，广大农村在开展脱贫致富，由温饱奔小康的过程中，广大群众从实践中深深感到“治穷先治愚，治愚办教育”，不提高广大农民的科学文化水平，再先进的发展生产的技术、经验也推广不开。如今，广大农民已认识到科学和教育的力量，“科教扶贫”、“科教兴农”已成为大家的共识。从政治上看，工农翻身后，要成为国家的主人，要实行民主权利，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没有知识是不行的。列宁多次强调指出：工人一分钟也不会忘记自己需要知识的力量，没有知识，工人就无法自卫，有了知识，工人就有了力量。列宁还说：“在一个文盲充斥的国家内是建成不了共产主义社会的。”这个科学论断在今天更加显示出它的重要性。

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抓教育要从基础教育抓起，要认真贯彻执行义务教育法。实行义务教育法的重点，难点在农村。要下大力量抓农村教育。要深刻认识加强基础教育从根本上提高整个国民的素质，这是关系到经济振兴、科技进步、文化繁荣、社会发展的奠基工程。在改革开放中，科学技术可以引进、科技人才可以引进，但国民素质不能引进。这个问题解决不好，实现四个现代化就没有希望。要注意克服只重视高等教育，而不大注意加强基础教育的情况。在搞好普及教育的基础上，要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和成人教育，高等教育的结构要进行合理调整，以适应经济建设发展的需要。高等教育要把重点放在提高上，集中精力办好一批重点大学和重点学科，使之成为世界第一流的大学，逐步做到能独立自主地培养高级人才。

以上我从六个方面来谈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毛泽东教育思想的重大现实意义。这是我的实际感受。

## 访崔奇——毛泽东关注《人民日报》的国际宣传 崔奇

崔奇，1927年生，吉林市人。1946年起从事新闻活动，先后在《辽东日报》、《安东日报》、《东北日报》、《长江日报》、《人民日报》工作。曾任人民日报评论员、国际部领导成员。从40年代后期至90年代初，撰写有关时事问题和国际问题的文章达300篇，100万字。近年来主编有《周恩来政论选》、《我国的改革是一场新的革命》、《东欧剧变的历史反思》等。

国际宣传是毛泽东关注的重点问题之一。崔奇同志参加过诸如中苏论战的“前7篇社论”、“九评”、“两论尼赫鲁哲学”等著名评论和文章的起草工作，对当年毛泽东如何指导《人民日报》的国际宣传了解较多，体会颇深。看了这篇谈话，您会觉得，做好任何一件事都是不容易的。

访问人：作为中央党报的人民日报的国际宣传，从50年代初到70年代中叶的四分之一个世纪中，始终得到毛泽东的关怀和指导。在您看来，这种指导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

崔奇：我认为，第一，毛主席、党中央在不同时期对国际局势及其演变的基本估计和处理国际外交关系所采取的政策与策略，包括对战后世界基本矛盾与政治格局的分析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的制定，对我们党报工作人员观察和研究国际问题，进行国际宣传和国际评论工作，具有根本性的指导作用。

第二，在这四分之一个世纪中，人民日报为配合外交活动和国际斗争而开展的历次重大的国际宣传活动，包括50年代初关于中苏友好、抗美援朝和日本问题的宣传，50年代中后期关于支持民族解放运动、召开日内瓦会议与亚非会议和关于台湾海峡局势的宣传，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关于中印关系的宣传，60年代关于中苏分歧的宣传，70年代初关于支持印度支那人民正义斗争、实现中美中日关系正常化和恢复中国在联合国合法权利的宣传，都是在毛主席、党中央的部署和指导下进行的。这些气势恢宏的宣传，引起了国际舆论的广泛反应，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第三，在这期间人民日报发表的有关国际问题和国际关系的重要社论和编辑部文章，都是经过毛主席亲自审定的。据统计，从1950年至1976年，经毛主席审阅的人民日报社论和文章共计115篇，其中40余篇是有关国际问题的。

第四，毛泽东同志不但细心修改人民日报送审的评论和文章，而且经常教导编辑部工作人员如何写好政论文章，包括国际政论。还有的政论文章就是经过毛泽东口述，由编辑部工作人员执笔写成的。毛泽东本人是马克思主义政论家和文章大家，他对于人民日报起草的文章所作的修改，对于应该怎样写文章的一些谈话，体现了他对写作规律和政论艺术的深刻把握和丰富经验，对我们尤其珍贵。

访问人：回顾毛泽东对人民日报国际宣传的部署和指导，您认为他对人民日报国际宣传工作及其风格特点的基本要求是什么？

崔奇：根据我个人的体会，概括起来说，就是：调查研究，注意动向，独立思考，掌握主动，抓住时机，发挥效力，高屋建瓴，调动全局。

访问人：您可以具体地谈一下毛泽东在这方面作过一些什么指示，提过一些什么意见吗？

崔奇：可以。1958年9月，毛泽东同志把总编辑吴冷西找去，作过一次谈话，特别提到国际宣传问题。他说：对国际问题应该有研究。有一定的看法，不要临时抱佛脚，发表感想式的意见。对许多国际问题都要有基本的看法，应该有比较深刻的议论。现在对国际问题的意见，有些是感想式的。同年10月，他又说：可多同一些有见解的人交换看法，慢慢形成比较符合实际的观点，遇到国际上突发事件，就不致惶惶无主，就可以抓住时机阐明我们的观点。他还提出，搞新闻工作，光务实，不务虚，不好。有了看法，有了意见，就要找机会、找题目发挥。这些谈话，表达了毛泽东同志对人民日报国际宣传总的要求。

访问人：国际风云变化无常，搞国际宣传需要注意掌握政治动向，毛泽东在这方面有些什么指示，您能举几个例子加以说明吗？

崔奇：毛泽东同志多次指示，研究国际问题，要注意抓动向，并强调抓动向要下功夫，要善于抓。1958年10月28日，吴冷西传达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说，你们编报的人要懂得抓动向。看起来，现在还不懂。比如杜勒斯9月30日谈话，有从台湾海峡局势中脱身的味道，这就应当引起我们注意。同年12月13日，吴冷西又传达说：毛主席很注意杜勒斯11月18日的讲话，认为他很清醒，不是信口开河。当然他有他的观点，有些对我们的诬蔑，但他有他的政治经济学。他讲的六大变化值得注意，是对世界面貌的概括。〔注1〕

毛泽东同志所以注意研究对方的重要谈话，从中抓住政治动向，一是为了据此考虑我们需要采取什么样的政策，二是为了考虑针对这种动向如何进行我们的国际宣传。善于利用反面教材，是毛泽东的一种宣传艺术和政治艺术。他多次提议把对方的讲话或材料在报上刊登，甚至全文刊登，这样既可以使读者群众了解政治动向，又可以运用这些材料进行对内对外的广泛宣传工作。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同志敏锐地抓住美国国务院发表中美关系白皮书这件事，亲自执笔，一口气撰写了5篇评论，为我们树立了抓动向，抓时机，抓题目，加以发挥，造成巨大宣传效果的典范。

访问人：毛泽东、周恩来同志都非常重视研究对方的重要讲话和国际间的新闻报道，通过这些材料来观察和把握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的动向。您可以再举一个例子吗？

崔奇：还有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1971年7月6日美国总统尼克松在堪萨斯城发表的一篇演说，他提出以世界上5个力量中心为基础的新的国际秩序正在形成的观点。这篇演说立即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的特别注意和重视。7月9日基辛格来华，周总理在同他会谈时，花了不少时间表示他大致上同意尼克松总统7月6日演说中所列举的一些观点。有趣的是，基辛格却对他们总统的这篇演说的内容一无所知，搞得他十分尴尬。据基辛格说，还是“第二天早上，周恩来以他特有的作风，派人将他作了记号的那篇英文演讲稿连同我的早餐一起送来，不过请我看完之后还给他，因为他只有这一份。”（见《白宫岁月》第3卷，第22页。）

访问人：毛泽东很强调报纸宣传包括国际宣传要掌握主动权，您对这个问题的有什么体会？

崔奇：毛泽东同志部署国际宣传，像他指挥战争一样，历来强调掌握主动，不要被对方牵着走，也不要为形势所迫，采取被动应付的姿态。不论就一个时期国际宣传的部署来讲，还是就一篇政论文章的写法来讲，都要站得

高，看得远，全局在胸，调动自如，形成一种高屋建瓴，势如破竹的气概。

怎样才能掌握宣传上的主动，造成高屋建瓴之势，关键在于：一要理论联系实际，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去分析国际形势和国际关系的新情况；二要知己知彼，既要敏锐地掌握国际动向，又要准确地体现我们的方针政策，从而使我们的宣传报道和评论文章具有较高的思想水平和政策水平。毛泽东同志多次讲，报纸宣传，一个时期要有一定的方向，要有中心的思想，把大家注意力集中起来。1957年12月，他曾批评当时的人民日报不是一流报纸，因为不谈理论，不谈思想。他说，人民日报的重要评论应有理论色彩，要提到理论高度和政策高度，有较强的思想性。这些意见，也适用于国际宣传和国际评论。在毛主席、党中央部署和指导下的一些国际宣传和评论文章所以能够在国际上产生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其根本原因就在这里。

访问人：要掌握主动，就必须坚持独立自主，而不能仰俯随人，50年代中苏友好时期我们的国际宣传是否有过这种不正确的倾向？毛泽东对此有过什么指示？

崔奇：在50年代，我们的国际宣传要掌握主动，必须解决一个重要问题，就是不能盲从苏联。当时，中苏关系友好，我们党提出向苏联学习的口号。在国际宣传方面，我们这些工作人员就往往自觉或不自觉地追随苏联《真理报》和塔斯社的调子，甚至在文风上也受他们的影响。毛主席及时地提出我们在外交上和 international 宣传上都要坚持独立自主的思想。1953年3月25日，邓拓同志传达：毛主席谈过几次，要求报纸执行，国际宣传的专栏不能只有一个纲领，即马林科夫报告中的纲领。1956年4月，毛主席在一次省委书记会议上谈到国际关系时又指出：不要盲从，但不是说苏联没有东西可学，凡是适合的都要学，不只苏联，其他的也要学。要平等，不要站不起来，也不要翘尾巴。“不要站不起来”，这句话形象地说明了不可仰俯随人，而要坚持独立自主，独立思考。很明显，如果遇事随声附和，亦步亦趋，那就等于丧失了自己对国际事务的发言权，更谈不上在国际宣传上掌握什么主动，采取什么高屋建瓴之势了。

1958年3月9日，吴冷西传达毛泽东同志对报纸宣传的意见，进一步强调了要坚持独立自主的思想。毛泽东说：苏联的经验只能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不从之。把苏联的经验孤立起来，不看中国实际，就不是择其善者而从之。办报纸，搬《真理报》的一套，不独立思考，如像3岁小孩子一样，处处要扶，就会丧魂落魄，丧失独立思考。

访问人：国际宣传具有时效性，是它的一个特点，毛泽东怎样看待这个问题？

崔奇：是的，国际宣传和国际评论的特点之一，是有很强的时效性。该讲话、该写文章时就动作要快，如果拖延时日，丧失时机，就不仅要影响舆论的力度，而且反应快慢本身就是态度和政策问题。因此，要掌握宣传上的主动权，就要讲求时效性。毛主席和周总理过去布置人民日报写的许多国际评论（不是全部）往往是“十万火急”的，而我们评论工作人员却往往不能得心应手地完成任。有几件事，至今记忆犹新。1958年7月13日晚上，毛主席看到亚洲某个国家人民推翻封建王朝的正义斗争取得胜利的消息，立即布置人民日报写一篇社论要明天见报。胡乔木同志为此赶到报社来，先是让国际部值班同志起草这篇文章，他坐等审阅发排，但过了一些时候，那位

同志还没有写好，乔木同志急不可待，就自己拿起笔赶写了一篇，这样才完成了毛主席交代的任务。1970年12月，东欧某个国家发生政治风暴，我们本想看一看再说，不料12月21日晚毛主席决定人民日报立即写一篇评论要明天见报，我们在没有思想准备的情况下集体赶写了一稿，送到周总理那里已是后半夜，几乎耽误了发表时间。教训就在于我们未能敏锐地抓住动向，抓住时机，从而在精神上和工作上陷于被动状态。

掌握宣传上的主动权，当然并不是说要事事表态，天天讲话，也不是对于国际上发生的任何重大动向都要赶快发表意见。毛泽东同志说过，写评论要结合气候，看得准，抓得准，还要转得快。这也是要掌握主动的意思。总之，需要讲话时讲，是主动；不需要讲话时不讲，也是主动。例如，1965年印度尼西亚事件，我们曾准备了一篇文章，毛主席决定不发。1971—1972年间，中美开始接触，调整双方关系时，毛主席指示，中美关系问题不写文章。70年代毛主席根据他提出的三个世界理论，指示对第二世界的国家不要批评或少批评，但“四人帮”歪曲毛主席关于宣传上要掌握主动的思想，借意大利人拍摄的一部关于中国的影片发动一场大批判，受到毛主席的严厉指责。他说，这是小题大作，要立即停止。

访问人：在“文革”期间，特别是初期，随着极左思潮的泛滥，在国际宣传中，包括人民日报的国际版上，曾出现了一种虚张声势，自我吹嘘，夸大其辞，空洞抽象的文风。对于这种现象，毛泽东采取什么态度，提过什么意见？

崔奇：“文革”期间报纸上出现的这种恶劣的文风，实质上是极左思潮在报纸宣传上的反映，是“文革”的错误思想路线的产物，因此“文革”的错误不纠正，这种文风也难以彻底纠正。即使在这种情况下，这种恶劣的文风也受到毛主席和周总理的坚决反对，因为它不仅损害党报的声誉，而且损害我国在国际上的形象。1967年12月至1968年4月间，毛主席关于对外宣传问题作了三番五次的指示和批示。他说：对外宣传要坚决地有步骤地进行改革，应注意自己的宣传，不应自我吹嘘，不应说得不适当，使人看起来好像有强加于人的印象。1968年5月29日，他再一次指示：第一，要注意不要强加于人；第二，不要宣传外国的人民运动是由中国影响的。毛主席还经常提醒我们，要反对大国沙文主义。1972年8月，周总理在外交部大使学习班上作报告时也说到：毛主席不赞成说过分的话。周总理把这种文风同极左思潮联系起来，指出：极左思潮，几个外事宣传部门都没有批透。极左，即形左实右，夸夸其谈，空洞抽象，极端的话，形式主义的东西。他指示新闻单位要整顿文风。

访问人：毛泽东本人是文章大家，他对于如何写政论文章讲过一些什么珍贵的意见？

崔奇：关于写政论文章，包括国际政论，毛泽东同志的基本要求是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同时他又说，政论应当像政治，但不排斥抒情。要喻之以理，动之以情，既有说服力，又有感染力。

毛泽东同志要求，首先要把事情交代清楚，切合实际。他在《工作方法六十条》中说过：为什么写的文章别人看不懂？就是没有钻进去，没有掌握材料，没有把每个问题都交代清楚。又说：写文章是给人看的，一切问题都要有个交代，交代不出不要勉强，勉强写出来就不能说服人家。为什么会勉强呢？就是对事情没有真正的了解。有些文章没有说服力。说明你对业务本

身不了解，不认识，不了解群众心理。

毛泽东同志在 1958 年 10 月间同吴冷西的一次谈话中，以 10 月 25 日国防部《再告台湾同胞书》为例，谈了如何写文章的许多道理。他说：你们报社不会写文章，金圣叹会写。他谈国防部文告的写法是：

一、开头提出问题，绝大多数人爱国。内容贯穿一个中心思想：中国人的事由中国人自己解决。要有内在联系。抓住这个问题不放。应该像刘姥姥进大观园，虽有穿插，但贯穿一个中心。

二、你们报社不会做文章，不会形象化。文告中不说“沿海岛屿”，而说“大、小金门，大担岛、二担岛”等等；不单说“供应”，而说“粮食”、“蔬菜”等等，都是具体的东西。现在你们写文章大多是抽象的。

三、洋腔洋调，不知从哪里学来的。中国人写文章却没有中国气味。中国文字中，有的不一定要主词、宾词等。这是中国气派。

毛泽东谈文章，很讲究气势。他强调文章要有个中心思想，而在章法结构上又能展得开，收得拢，波浪起伏，跌宕有致。1959 年 6 月，他在审阅人民日报编辑部起草、经胡乔木大力修改和改写的《西藏革命和尼赫鲁哲学》一文时说：文章的提笔好，看起来一段段不相关，但有内在联系。金圣叹很讲究文章的提笔。金瓶梅、红楼梦也好，刘姥姥见凤姐一段，开头扯得很远，但却有联系，扯得开，又收得回。

毛泽东同志很注重政论文章的标题以及文章的开头与结尾。他在审阅修改我们的送审稿时，往往只改了一个标题，或者亲笔在开头或结尾的地方加一段话，从而使文章大为生色。

访问人：毛泽东怎样修改文章，包括标题和头尾，您能够举几个例子吗？

崔寄：关于改标题。例如，1962 年 12 月 15 日人民日报社论的标题原为《坚持真理，团结对敌》，毛泽东同志改为《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反对我们的共同敌人》，〔注 2〕并在送审稿上作了批语：题目似宜改一下，更为概括和响亮些。《九评》中最后一篇编辑部文章的标题原来只提“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毛泽东同志改为《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就显得更有气势。

当然，也不是所有社论的标题都以更响亮和更有气势为最高标准。有时候，毛泽东同志反倒把看似生动的标题改为更平稳些。例如，人民日报 1950 年 7 月 15 日庆祝日共成立 30 周年社论标题原为《日本人民争取独立的道路》，毛泽东同志改为《庆祝日本共产党的三十年》，并作批语：此件应以庆祝为主，故改了一个题目。这一改，看似平淡，实则在政治上更胜一筹，因为原题有在庆祝兄弟党成立周年之际对人家的事情指手划脚之嫌。1962 年 12 月 30 日人民日报社论初稿的题目，陈伯达标为《陶里亚蒂的堕落》，在中央书记处讨论时为邓小平同志所否定，改为《陶里亚蒂同志和我们的分歧》，这一改，也看似平淡，其实在政治上和政策上要高明得多。毛泽东同志审阅这篇社论时作了批语：文章已看过，写得很好，题目也是适当的。他特别肯定了小平同志标的这个标题。

关于修改文章的头尾。例如，《九评》中第二篇文章，原来只是从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我们如何不同意，这样开头的，毛泽东同志却在最前边加了一大段话，指出：“斯大林问题，是一个世界范围内的大问题，曾经引起了世界各国一切阶级的反响，至今还在议论纷纷。各个不同的阶级，代表各个不同阶级的政党或政治派别，意见不同。估计在本世纪内，这个问题

还不可能作出定论……我们同苏共领导人的争论，是同一部分人的争论。我们希望说服这一部分人，以利于推进革命事业。这就是我们写这篇文章的目的。”这个开头，使整篇文章从而形成高屋建瓴的恢宏气势。第八篇文章，也是在开头的地方，毛泽东同志加了几句话，说“本文想讨论一个大家都熟悉的、很出名的问题，这就是所谓“和平过渡”问题。这个问题之所以出名，弄得大家都注意起来，是由于赫鲁晓夫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提了出来……。”这样的文章开头有如异峰突起，引人入胜。在1964年7月28日中共中央给苏共中央的一封复信的结尾，毛泽东同志顺笔写了一大段话，并引用了宋人晏殊的词句。在反复劝告苏共领导不要召开分裂会议之后说：“如果你们不听，一定要走绝路，那就请便吧！那时我们只好说：‘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这个结尾寓意深远，耐人寻味，给这封后来公开发表的复信增添了文采。

毛泽东怎样修改政论文章，是一门大学问，可以写成一本书，这里只是提一下给我印象很深的个别事例，而且只限于对个别国际文章与文件的修改。

访问人：毛泽东对政论文章的体裁有何意见？

崔奇：毛泽东同志主张，政论文章包括国际政论的体裁要多样化。他曾说解放前《大公报》记者范长江写的通讯很有名，杨刚写的美国通讯很有见地。在50年代时，苏联《真理报》有位专栏作家萨斯拉夫斯基，经常发表国际小品文、国际杂文。毛泽东对这种体裁也是欣赏的，并且说过，中国也应当有自己的萨斯拉夫斯基，自己的国际问题专栏作家。

访问人：1958年毛泽东说过，要保持和发扬党报的优良传统，但别的报纸，如解放前的《大公报》，也有他们的好经验，我们一定要把对我们有益的东西学过来。这是否表明毛泽东的办报思想是开放的，主张吸取前人所创造的一切优秀文化成果？

崔奇：是这样的。这里我可以转述一下1958年春毛泽东同吴冷西的一次谈话。在这次谈话中，毛泽东畅谈了他对中国近代几位资产阶级革命家及其政论文章的看法和评价。他说：

邹容是青年革命家，他的文章秉笔直书，热情洋溢，而且用的是浅近通俗的文言文，《革命军》就很好读。章太炎前半生正气凛然，尤以主笔《民报》时期所写的文章锋芒锐利，所向披靡，令人神往，不愧为革命政论家。鲁迅对章太炎的一生评价甚高，但对他文笔古奥，索解为难，颇有微词。毛泽东谈到章士钊，说他也是清末民初的著名政论家，他的文章比太炎的好读，没有那么古奥、怪僻，也较梁启超严谨而有条理。毛泽东对梁启超有褒有贬，说他最辉煌的时期是办《清议报》的几年。那时他同康有为力主维新变法。他写的《变法通议》在《时务报》上连载，立论锋利，条理分明，感情奔放，痛快淋漓，加上他的文章一反骈体、桐城、八股之弊，清新平易，传颂一时。他是当时最有号召力的政论家。毛泽东又说，梁启超写政论往往态度不严肃。他讲究文章的气势，但过于铺陈排比，他好纵论中外古今，但往往似是而非，给人以轻率粗浅之感。他自己也承认有时是信口开河。

毛泽东同志强调，写文章尤其是政论最忌以势吓人，强词夺理。做新闻工作既要知识广博，又要避免肤浅，这不容易做到，但一定要努力学习做到。

毛泽东同志这一番议论，对于我们应该怎样写好政论文章以至怎样搞好报纸宣传和国际宣传，都有很大的启迪作用。

崔奇：最后我再讲几句。报纸宣传和政论文章，特别是国际宣传和国际政论，乃是时代的镜子，历史的量音，因此它总是带有时代的特色和历史的局限。随着时代的进步、历史的发展和国际形势的变化，我们外事工作的方针政策以及国际宣传的内容、形式和风格，都会随之发展变化。但我相信，回顾毛泽东同志在四分之一世纪中对人民日报国际宣传的部署和指导，尽管这些回顾只是一些零星的片断。我们还是可以从中获得许多深刻的教益。

1993年7月于北京

〔注〕1958年11月18日，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在克利夫兰教会全国委员会发表演说。他在谈到“不断变化着的世界”时说：

让我首先说明促进变化的力量非常明显的六个方面。

一、发生了从殖民主义变为独立的变化。在过去十五年内，二十一个国家的七亿人民赢得了政治独立。这种趋势将会继续下去，并且会带来许多新问题，因为给予政治独立并不是结束，而是开端。它产生了新的责任、新的希望和新的危险。

二、在过去是一片冻土、人们无法到达的广大地区发生了变化。北极和南极加入了我们的有生命的世界。北极现在提供了新的通道，而使人们可以很快彼此建立接触。在南边，地球物理年探索过的南极显示了新的、令人兴奋的为人类服务的可能性。

三、自然力量的世界发生了变化。原子的分裂显示了新的力量来源，这种力量是如此强大，如此无处不在，因而意味着一场新的工业革命。这个新的力量也改变了战争的性质，而且如果原子战争不首先毁灭我们，它也将改变和平的性质。

四、我们头上的天穹也发生了变化。以前对人类来说，“天空是不可逾越的。”现在科学正在开辟外层空间，它带来的结果到现在为止我们还了解得不多，但是这些结果必定会为和平也会为战争带来意义巨大的可能性。

五、国际社会内部也发生了变化。自称在一切世界性组织中最富有“国际主义”色彩的国际共产主义，企图用控制一切国家的政府的办法来统一和协调这个世界。在一个世代内，它控制了大约九亿人口（约占世界人口三分之一）的十六个独立国家的全部或大部分。它在大部分非共产党国家里面都有一个有力的颠覆和宣传机构。它正在竭力想把世界统一在它的统治之下。

在非共产党国家内部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它们的人民珍视同共产党统治下相容的宝贵的东西。它们在共同的危险面前趋向于团结一致，它是世界事务中的一支空前未有的凝聚力量。

六、所有这一切都要求世界社会从一个无政府的社会发展到一个有秩序的社会，以确保各种竞争性的努力将通过和平手段来进行，而不会引起一场可能会把我们大家都毁灭掉的战争。

我们确实生活在一个形势发生变动的真正旋风里。

〔注2〕1962年12月14日深夜毛主席审定人民日报这篇社论时，把标题改为《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反对共同的敌人》。15日晨，我值班安排一版版面时觉得这个标题不大好排版，如排成一条，文字较长，还有一个逗点，即使通八栏，字号也不可能很大；如排成两行，前半句与后半句一长一短，又不对称。我给吴冷西同志打电话，说明上述情况，我建议改为《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反对我们的共同敌人》，即加“我们的”三个字，去掉逗点，这样可放大字号，排成两行。我说电台已对外广播，但报纸尚未压

版，不知可否请示中央改一下。吴冷西同志说，请示已来不及，就照你的意见改，等主席起来时我再报告一下。

## 访彭大成——“唯楚有材，于斯为盛”的历史之谜

### 彭大成

彭大成，1947年生，湖南衡阳人。现为中共湖南省委直属机关党校副研究员、理论教研室主任，船山学社理事。长期从事中国哲学史，中共党史，和毛泽东、邓小平思想及湖湘文化与王船山等人思想的研究。著有《湖湘文化与毛泽东》、《从列宁到邓小平的伟大探索》等。

巨人毛泽东因为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才成为一名共产主义者。但他首先是一位中国人，更是一个湖南人。湖南的文化到底是一种怎样的文化？给了他怎样的影响？毛泽东的同乡彭大成，积10年之功，写出《湖湘文化与毛泽东》一书，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因此当我们想到这个题目时，就首先想到了他。

访问人：了解中国近、现代史的人，都会注意到这样一个奇特的历史现象：在中国近100多年的政治风云中，湖南这个经济落后的内陆省份，却成了每次政治变革的前导。从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一直到新民主主义革命，湖南涌现出了一批又一批革新志士、革命英雄和革命领袖，以及其他各种政治军事人物和著名学者。造成这一风云际会，群星灿烂，“唯楚有材，于斯为盛”的历史之谜是什么呢？而当代巨人毛泽东，正是产生在这一“地灵人杰”的人才群体之中，请问这仅仅是历史的偶然吗？

彭大成：当我对这一历史奇观进行穷本探源的研究时，发现这与湖湘文化的影响有着很大的关系。

访问人：那么，湖湘文化的主要内容和特点是什么？

彭大成：依我看，湖湘文化主要可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与特点：（一）哲理思维与诗人才情的有机统一；（二）经世致用的实学思潮与力行践履的道德修养；（三）气化日新、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四）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群体参政意识；（五）运筹决胜、平治天下的军政谋略。正是这五个方面，构成了湖湘文化的丰富内涵与主要特点，使湖湘文化成为中华文化丛林中一株后来居上的参天奇树。

访问人：从毛泽东来说，他主要受了湖湘文化的哪些影响呢？

彭大成：我们从湖湘文化的内容与特点中，就不难看到它对毛泽东的影响是多方面的。

首先从第一个内容与特点来看，湖南自古就有探索宇宙、人生“大本大源”的哲理思维兴趣，从2000多年前的屈原在湖南进行“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哲学思考，到北宋周敦颐首创《太极图说》，一直到明末清初的王船山创立空前博大精深的唯物主义与辩证法相结合的哲学思想体系，湖南历代知识分子在立志救国之始，总是力图首先从宏观总体上把握宇宙、人生的根本规律，作为自己的最高信仰和治国平天下的指导原则。深受这一思想传统影响的毛泽东，在青年时代同样是从探求“大本大源”的哲学问题开始，提出“从哲学、伦理学入手，改造哲学，改造伦理学，根本上变换全国之思想”。

与哲理思维相联系，湖南的文学形象思维能力也很发达，二者共同交织成湖湘文化的云锦天章。湖湘文化一直深受楚文化的影响，屈原瑰丽浪漫的诗篇，庄子神奇精妙的散文，深深哺育了湖湘文化。湖南历代志士仁人，在进行哲理思维的同时，也进行着大量诗词、散文的创作。他们的作品，充满

着呼风唤雨的时代精神，洋溢着光芒四射的文采。这一文化传统也培养了毛泽东的诗人性格，使毛泽东不仅成为一位伟大的哲学家，而且成为一位千古绝唱的大诗人。

从湖湘文化第二个内容与特点看，从南宋胡宏、张 等人开始，湖湘学者就十分重视“经济之学”，主张从国计民生、“日用之实”中去探求富国强兵之道。其后王船山、魏源、曾国藩、左宗棠、谭嗣同等人无不提倡“经世致用”之实学。同时，湖湘学者也十分重视自身的道德践履，“严于自守”，“苦行清修”，注重内省。这种自修并不是与世隔绝的“闭门思过”，而是十分注意联系社会实际，进行广泛的社会调查。例如，王船山“自少喜从人间问四方事，至江山险要，士马食货，典制沿革，皆极意研究”。魏源也主张：“夫士而欲任天下之重，必自勤访问始。”深受这一传统影响的毛泽东，在青少年时代就懂得“练达世情皆学问”，提倡“重在行事”，主张不仅要读“有字之书”，还要善于读社会这本“无字天书”，并且身体力行，于1917年暑假，与同学肖子升，徒步漫游考察了长沙、宁乡、安化、益阳、沅江等5个县。后来，毛泽东进一步提出了“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著名论断，都可以看到湖湘文化这一优秀传统文化的影响。

从湖湘文化的第三个内容与特点看，自从胡宏提出“日新不息”的辩证发展观，到王船山发展成为一整套“造化日新而不用其故”的日新哲学与人类进化史观。这种日新不息、奋斗向上的精神一直盛行于湖南。正如陈独秀所指出：“湖南人底的精神是什么？‘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湖南人这种奋斗精神，却不是杨度说大话，确实可以拿历史作证明的。二百几十年前底王船山先生，是何等艰苦奋斗的学者！几十年前底曾国藩、罗泽南等一班人，是何等‘扎硬寨’、‘打死战’的书生！黄克强历尽艰难，带一旅湖南兵，在汉阳抵挡清军大队人马；蔡松坡带着病亲领子弹不足的2000云南兵，和10万袁军打死战；他们是何等坚毅不拔的军人！”所以，陈独秀大声疾呼：“欢迎湖南人底精神”！（《陈独秀文章选编》第480、481页）从魏源、谭嗣同、黄兴、蔡锷，一直到毛泽东，都表现了热烈追求新事物，敢为天下先的革新精神或革命首创精神。毛泽东在青年时代就热烈提倡：“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这种奋斗向上的人生观，与湖南刚健质朴、吃苦耐劳的“霸蛮”精神相结合，使湖南在中国近100多年的历史，发挥了特别重要的作用。湖湘文化的第四个内容与特点，表现为一种特别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与“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历史责任感。无论是王船山还是魏源的史论著作，都是在研究历代治乱兴亡之道，具有书生参政，经邦治国的强烈意识。湖南知识分子由此而形成了一种师徒相传，朋兴景从，薪尽火传，联系紧密的群体参政意识。湖南近代第一代学术群体是以两江总督陶谢为宗主，团聚了贺长龄、贺熙龄、唐鉴、魏源、邓显鹤等一大批能吏学者。第二代以曾国藩为领袖，集合了胡林翼、左宗棠、罗泽南、郭嵩焘等一大批书生出身的文武人才。他们平时以道德文章相交往，互相切磋学问，提倡陶铸人心，转移风气，一到国内政局发生重大变化与需要的时候，这种学术文化圈子，很快就转变成能左右中国政局的巨大政治和军事力量。第三代是谭嗣同、唐才常等人在长沙创办的“南学会”和“时务学堂”，成为戊戌变法中的重要领导骨干和政治力量。稍后的第四代是黄兴、宋教仁、刘揆一、刘道一等人组成的“华兴会”，这是以青年知识分子为主体的革命团体，是辛亥革命中武装反清的主

要骨干力量。第五代是以毛泽东、蔡和森为代表的“新民学会”，开始也是青年学生的文化团体，但在五四运动之后，“新民学会”很快发展成为以“改造中国和世界”为目标的政治团体，成为1921年创建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批重要骨干力量之一。在革命实践中，毛泽东超越他的前代，进一步把这种知识分子的群体参政意识，发展成为“民众的大联合”、“与工农大众相结合”的群众观点与群众路线，对中国革命的胜利产生了十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从湖湘文化的第五个内容与特点来看，早期湖湘学者就十分重视研究治国用兵的方略，出了不少能征善战的名将和民族英雄。王船山、魏源的史论总结了在中国几千年平治天下军政方略，具有很高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指导意义。以曾国藩、左宗棠为代表的湘军，在全国范围内空前地实践和传播了这些军事理论，表现了经文纬武的高度军政才华，造成了“无湘不成军”的特殊历史传统，在湖南形成了“士乃器然喜言兵事，人颇、牧而家孙、吴”（《谭嗣同全集》第194页）的特殊社会风气。流风所及，连湖南一师这样的师范学校也是“以激发爱国思想，提倡尚武精神，研究军事学术，实施军国民教育为宗旨。”在这样的社会风气与教育宗旨的培养熏陶下，毛泽东在青少年时代就对历史上“事态百变，人才辈出”的战争史实特别“喜读”，认识到中国“二十年内，非一战不足以图存”，必须“磨砺以待日本”，因而对战争问题着意加以研究。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与思想文化土壤里，诞生出毛泽东这样伟大的政治家和军事家，以及一大批中国共产党的开国元勋、卓越的党政军高级领导人，就不是偶然的了！我们只要认真研究一下湖湘文化的丰富内涵，就不难从这一文化系统的“模板”结构中，清晰地破译这一军政韬略的遗传密码。

访问人：在这些影响中，最主要的是什么？

彭大成：从以上介绍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影响是十分丰富和多方面的。我认为其中最主要的影响是在哲学思想和军事思想两个方面。

首先，从哲学思想上看，从王船山创立“欲尽废古今虚妙之说而返之实”的唯物主义思想体系，提出“有即事以穷理，无立理以限事”；到曾国藩提出：“夫所谓‘事’者非物乎？‘是’者非理乎？实事求是，即非朱子所称即物穷理者乎？”即事穷理，实事求是的实学思潮一直盛行于湖南。这对毛泽东辩证唯物主义的实事求是思想的形成，提供了直接的思想资料。在知行观方面，王船山全面论述了“力行第一”、“知行相资以为用”，“并进而有功”的辩证知行统一观，这对毛泽东的辩证唯物主义的知行统一观、即实践论思想的形成，提供了直接的逻辑起点。在辩证法方面，王船山对阴阳矛盾的同—性与斗争性及其相互转化，对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以及质量互变规律，都作了空前系统的总结。这为毛泽东矛盾论思想的形成，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营养。

第二，从军事思想上看，王船山不仅第一次提出了发动全民游击战争的反侵略军事思想，而且还比较系统地总结了历史上“如火如荼燎原”的农民战争经验，如农民军“胜亦走，败也走，无所不走”（《宋论》卷十），灵活机动的游击战术；曾国藩也指出农民军的惯用战术是“我进则彼退，我退则彼又进”；“如蚁旋磨，忽左忽右，贼中相传秘诀曰：‘多打几个圈，官兵之追者自疲矣。’”（《曾国藩全集·家书》）他们虽然是站在反对农民战争的立场来加以总结的，但这些反面教员所总结的农民战争规律，对毛泽东军事战略战术思想的形成，不是没有启迪作用的。又如，王船山与

曾国藩等湘军人物都主张以“全军破敌为上，不以争城池土地为意”；集中兵力于主攻方向；主张“自立”、“持己”，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丰富系统的军事思想，对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形成都有过重要影响。这些复杂的军事战略战术问题，都是在马列本本里找不到现成答案的，却可以在王船山、曾国藩等人的著作中找到其民族的渊源。这是“中国式智慧”的生动体现与高度发挥。

以上两个方面的影响，在拙著《湖湘文化与毛泽东》一书中都作了详细的考察，在此不一一详举了。

访问人：您认为我们应该怎样看待湖湘文化的这些影响？它通过毛泽东而对现代中国历史发生了什么样的作用？

彭大成：首先，湖湘文化的爱国主义思想传统，激发了毛泽东的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唤醒了他的民族民主革命意识和救国救民的伟大革命抱负，为他尔后向共产主义战士转变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第二，湖湘文化中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与高尚的人格修养，培养了毛泽东坚强的革命意志，自力更生、排除万难的拼搏精神，高尚的情操和广阔的胸怀，使他具备了成为革命领袖的优良素质、政治风度与性格特点。第三，湖湘文化中的唯物主义与辩证法哲学思想，为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形成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营养，经过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加以彻底的改造和吸收，而发挥出新的强大无比的战斗威力。第四，湖湘文化中的丰富军政谋略，启迪了毛泽东高越卓绝的军政才华，使毛泽东成为具有雄才大略，文能安邦、武能定国的伟大政治家和军事家。湖湘文化中的这些丰富的优秀思想精华，为毛泽东思想的形成提供了多方面的宝贵思想资源，并通过毛泽东而对现代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建设发挥了巨大的历史作用。

访问人：当我们全面观察毛泽东的时候，除了赞叹他的伟大，他的英明之外，还能感到他的不足，他的不尽人意的地方。关于他的弱点，是否也与湖湘文化有关呢？

彭大成：我想是的。当我们在看到湖湘文化优点与长处的时候，也应实事求是地指出它的缺点与短处。这就是长于研究社会人生问题而短于研究自然科学；长于研究政治军事斗争的谋略而短于研究社会经济运动的规律，特别是缺乏对现代化经济建设规律的研究。这些特点在毛泽东的身上都有鲜明的体现，并通过毛泽东而影响了中国近半个多世纪的历史发展进程。从这种影响中，我们也就不难理解，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斗争中创造了那么多震惊世界的辉煌胜利，为什么却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一再发生严重的失误。我们从湖湘文化的研究中，可以从民族思想的渊源中，更深刻地认识这一发人深省的问题，从而更加自觉地继承、弘扬民族文化的精华与优点，克服民族文化的糟粕与缺点，更加积极认真地学习和吸取全人类的一切先进思想文化成果，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更加坚定不移地坚持、继承、丰富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

## 访萧克——我经历的红四军党的“七大”

### 萧克

萧克，1908年生，湖南嘉禾人。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南昌起义。1928年参加湘南暴动，后上井冈山。曾任中国工农红军第一纵队参谋长、十二师师长、红六军团军团长。长征后任红二方面军副总指挥。抗战时期任八路军一二师副师长。解放战争时期任华北军区副司令员。建国后历任军委军训部部长、训练总监部部长、国防部副部长兼军事学院院长等职。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

红四军党的“七大”是一次充满争论的会议，近些年为党史研究界所关注。萧克将军作为当事人的回忆显得尤为珍贵。老将军出生入死，饱经风霜，他用平静的语气告诉我们的，远远不是这个事件本身。

访问人：对中共红四军“九大”，人们比较熟悉，特别是“九大”通过的《古田会议决议》中外闻名。其实在“九大”以前，中共红四军前委还召开了“七大”和“八大”，尤其“七大”也是红四军历史上有名的一次会议，并被历来的研究者所关注，我们想请您重点谈谈红四军“七大”的情况。

萧克：中共红四军“七大”是1929年6月22日在福建龙岩召开的，如同你们刚才所说，这也是红四军史上一次很有名的会议。虽然时隔半个多世纪，好多当事人都故去了，我作为还健在的当事人之一，有责任把这次会议的前因后果谈一谈。需要声明的是，我提供的有关会议的情况，有些是我个人的经历，还有些是我看过当时的历史资料后的思考，我的议论只代表我自己的看法。

“七大”是在什么情况下召开的？

访问人：红四军军委是什么时候成立的？

萧克：红四军军委是1928年4月成立的，当年10月，按照中共中央1928年6月4日的指示，在成立前委的同时又改组了军委。前委书记和军委书记都是中央指定的，军委隶属于前委，军委委员的名单由前委决定，经红四军“六大”选举，朱德任军委书记。

1929年1月14日，朱毛红军主力为了打破敌人对井冈山的“会剿”，离开井冈山，向赣南、闽西进军。沿途行军打仗，形势严峻，军情紧急，“遂决议军委暂时停止办公，把权力集中到前委”。这样，以朱德为书记的军委停止了活动。后来形势发展了，工作多了，到了5月，前委颇觉“兼顾不（过）来，遂决定组织军的最高党部（即军委）”，也就是说，红四军军委这一级党的组织，在停止活动4个月之后，又恢复了。前委还决定军委书记一职，由新到红四军的刘安恭担任。同时，还接替了毛泽东的政治部主任职务。

访问人：红四军在进军赣南、闽西时，既然已将军委停止办公，权力集中到前委，那时红四军人数又不多，只有几千人，为什么又恢复军委呢？是不是由于刘安恭的原故？

萧克：前委之所以决定军委恢复办公，也是想让军委做些事情。当时红四军在闽西和赣南广大地区活动，红四军前委不仅要管军队本身工作，还要大力发动群众，管地方工作，就感到“兼顾不（过）来”，也就会产生些问题。毛泽东在1929年6月1日给中央写信谈道：“党内现发生些毛病，正在改进中。”恢复军委，正是改进这些毛病的一项组织措施。当时大家对刘安恭还不太了解，因为是中央派来的，又是前委确定他为书记，也就没有异议。这时候，都想扩大革命局面，多干工作，争取革命力量大的发展。访问人：

后来在军委问题上发生争论，又是怎么回事呢？萧克：问题就出在新组织的军委上。刘安恭在军委会议讨论工作时，对上级机关——前委作了条决议，“前委只讨论行动问题”。对这条决定，当时许多人就觉得不合适，下级怎么能决定上级的权力范围呢？从而议论纷纷。从6月初的湖雷会议起，大会小会进行讨论，有时甚至争论起来。那时党内不忌讳争论，党内文件、党章都规定党内实行民主集中制，党员对问题有看法，在未作出决定之前，可以自由讨论。我们刚刚学习过的中共第六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党章说，“在未经决议以前党内的一切争论问题，可以自由讨论”，还说“可以举行争论”。所以，大多数人从关心党、爱护党的角度出发，发表自己的看法，展开争论。访问人：争论最集中的问题是说军委侵权了，还是前委专权了，或者说设了军委反而事多了呢？

萧克：当时争论的中心和焦点集中在红四军军委是否设立。

有人说，“既名四军，就要有军委”，“完善组织系统应有军委”。这些人认为军委是红四军的一级党组织，从支部、营委、团委直到军委，缺一不可。并说前委之下设军委是中央的决定。

而反对设立军委的人认为有前委直接指导就可以了，因为红四军“现在只有4千多人，又处在游击战争环境，行军时多的游击时代与驻军时多的边界割据时代又截然不同，军队的指导需要集中而敏捷”，所以不应再设军委。他们说：做事要从实际出发，“实际弄得不好，形式上弄得再好看又有什么用呢？”

主张设军委的人说：“党管得太多了，权太集中于前委了”，说前委不但“包办了下级党部的工作”，还“代替了群众组织”。还有人说，前委的领导是“家长制”、“书记专政”。所以，他们要求成立军委，以改进这些缺点。

而反对设军委的人则认为，设立军委“是要一个党的指导机关拿在他们手里”，“为要成立新的指导机关——军委，便不得不提出旧的理由，攻击旧的指导机关——前委以至支部”。这样做的目的就是想设法成立军委，结果只能是“前委军委成分权现象，前委不好放手工作，但责任又要担负，陷于不生不死的状态”。所以，不能同意成立军委。

这是争论的中心和焦点。毛泽东曾说过，“近日两种不同的意见最明显的莫过于军委问题的争论”，“争论的焦点是现在时代军党部要不要的问题”。经过争论，大家的认识渐趋一致，在一次会议上以36票对5票作出决议，取消了临时军委。

访问人：取消了临时军委，问题是不是就解决了？

萧克：没有那么简单，由此引发的议论不仅没有减少，反倒多起来了。对红四军成立以来的军事行动，如出击湘南，坚持井冈山斗争和赣南游击等；对红四军的各种制度，如军需制度，宣传兵制度，以及士兵委员会制度等；还有的就红四军的政策（如经济政策、对地方武装的政策）等进行分析和讨论；而更多的则是对前委的领导方式提出自己的看法，诸如：“过去党有没有家长制度的倾向”；“过去党有没有代替群众组织的错误”；“过去是不是上级党部包办了下级党部的工作”。争论最大的是“党应不应管理一切？”毛泽东把争论的内容归纳为三方面：关于“党管一切”，关于“一切归支部”，关于“党员个人的自由”。由于主要领导人也参与争论，就加强了争论的气氛，影响很大。

毛泽东认为，由于前委和军委的根本分歧使党的“三个最大的组织原则发生动摇。”第一，有人反对党管一切，说“党管太多了，权力集中于前委了”；第二，有人反对一切归支部，说“支部只是教育同志的机关”；第三，有人反对党员的个人自由受限制，要求党员要有相当的自由。有人“主张党所过问的范围是要限制的”，甚至说“一支枪也要过问党？”毛泽东认为，由于在组织上的指导原则根本发生问题，所以现在的工作没法开展，“完全做不起来”。所以，他提出了辞职，他说他不能担负这种不生不死的责任，请求马上更换书记，让他离开前委。

朱德对毛泽东的三条意见提出了不同的看法。第一，他认为“党管理一切为最高原则，共产主义中实在找不出来”，并说这种口号“是违背党的无产阶级专政的主张”，所以，他不同意“党管一切”的说法。第二，对于“一切工作归支部”的原则，他是“极端拥护的”，但是他认为红四军在原则上坚持得不够，成为“一切工作集中于前委”。前委“对外代替群众机关，对内代替各级党部”，“这样何尝有工作归支部呢？”第三，他认为党员在党内要严格执行纪律，自由要受到纪律的限制，他认为只有“赞成执行铁的纪律方能培养全数党员对党的训练和信仰奋斗有所依归”。同时，他指出，恰恰在这个问题上，前委书记毛泽东没有做好，不仅自由发表意见，……而且对中央和省委的指示也不认真执行。

几天后，毛泽东对这场争论的看法有了发展，他认为“个人领导与党的领导这是四军党的主要问题”，“是四军历史问题的总线索”。他还指出：“这次议论的问题虽则分成了三个（党的势力所及的范围，支部的工作，个人无自由），但精神是一贯的，就是个人领导和党的领导争雄的具体的表现。”毛泽东在给林彪的信中，认为自有红四军以来，党内共存在 14 方面的问题：

- （1）个人领导与党的领导；
- （2）军事观点与政治观点；（3）小团体与反小团体主义；
- （4）流寇思想（与反对）流寇思想；
- （5）罗霄山脉中段政权问题；
- （6）地方武装问题；
- （7）城市政策与红军军纪问题；
- （8）对时局的估量；
- （9）湘南之失败；
- （10）科学化、规范化问题；
- （11）四军军事技术问题；
- （12）形式主义与需要主义；
- （13）分权主义与集权；
- （14）其他腐败思想。

在这 14 个问题中，毛泽东认为主要是个人领导与党的领导的斗争，具体他说，有人“与党争权”、他在给林彪的信中虽然没有指名，也有呼之欲出之势。

访问人：这样一来，对问题的争论就系统化了。

萧克：事实是毛泽东此论一出，红四军党内争论更加激烈。有些高级领导人不实事求是，主观猜测，偏于一面而轻率发言。刘安恭与林彪就是这样的。刘安恭“把四军党分成派”。在争论发生之后，刘安恭“提出完全选举

制度及党内负责同志轮流更换来解决纠纷”。林彪则在前委会议之前3小时，给毛泽东写信，内容是党的问题而且是极严重的问题，用的词句是“封建关系”、“无形结合派”、“政客的手段”、“卑污的行为”、“阴谋”等超出当时红四军党内领导集团政治生活常态的危言。毛泽东公布了林的信，林在会议上说此信专指军委问题，还说朱德用手段拉拢部下，想成立军委以脱离前委的领导。

在这种情况下，各纵队、支队党委讨论得更热闹了，甚至连朱毛去留问题都提出来了。红四军驻新泉的七八天，连以上尤其是支队、纵队干部天天开会，老是争论这么几个问题：党应不应管理一切？是管理一切、领导一切还是指导一切？等等。当时，领导上号召大家发表意见，放手争论。但得不出结果，大家觉得该由上边领导人来管了，多数干部希望停止争论。

访问人：当时的敌我形势和我军的主要任务是什么呢？

萧克：敌我形势也开始严峻。当时摆在红四军面前有两个大问题。第一，战争形势开始发生变化，蒋桂战争已结束，蒋冯已妥协，我们意识到敌人要来进攻，不久就证实了。1929年6月16日，蒋介石调动闽粤赣三省敌人向红军发动了“会剿”。虽然我们当时还不清楚敌人的具体计划，但从各方面来的情报看，形势比较严峻，敌人有13个团又2个营约2万余兵力，在红四军附近。在这种形势下，必须对付敌人的“会剿”。第二，要分兵发动群众。闽西是新建苏区，原有的几点游击区，尚未连成一片，必须由主力军分兵发动群众，才能成为大块苏区。这也是应付敌人“会剿”的战略措施之一。

红四军第七次党代表大会，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为着这样的目的召开的。

### 会议的经过和主要内容

访问人：您能简要地介绍一下红四军“七大”开会的经过吗？

萧克：1929年6月19日，红军第三次攻下龙岩，这时，陈毅任红四军政治部主任，在前委的授意下，22日由他主持召开了红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支队的干部和士兵代表约四五十人参加会议。陈毅向大会作了报告，毛泽东和朱德都发了言，最后，大会通过了《红军第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决议案》，选举了新的前委。毛泽东、朱德、陈毅、林彪、刘安恭、伍中豪、傅柏翠及红四军直属队，一、二、三、四纵队的士兵代表共13人为前委委员，选举陈毅为前委书记。大会只进行一天，原定两个议题只讨论一个“党内争论问题”，另外“分兵问题”则留下“由新前委讨论”。

访问人：我们知道，前委书记原来是毛泽东，而且前委书记一职是由中央决定的，那么为什么“七大”还选举陈毅当书记？萧克：当时在红四军上下比较有威信的是毛、朱、陈。朱毛因对一些问题认识不一致，大家认为他们两人都有不对的地方，陈毅受命筹备“七大”并主持召开会议。因为自红四军成立以来，陈毅同朱毛一样也曾担任过军委书记、前委书记，尽管我们也觉得毛陈二人相比，毛应居先，但陈亦是好领导人之一。所以通过民主选举，陈毅担任了前委书记。但决议还强调了一点，要把决定呈报中央批准，没有批准之前，先开展工作。

访问人：“七大”开得怎么样？如何评价这次会议？

萧克：现在保留下来的历史文件，可资研究的除若干书信记录外，主要是“七大”的决议，因此，要研究“七大”，主要就得研究这个决议。

决议的基本内容是：

第一，在总结红四军自成立以来的工作时，肯定了“工农武装割据”的理论和政策，以及在实际工作中创造的各种制度。

在“过去工作的检阅”一节里，决议首先就红四军成立以来的方针、政策进行总结，在总的政治策略上，认为红四军建立以后，在罗霄山脉中段坚持武装斗争，发动群众，武装群众，发展边界党和群众组织，建立罗霄山脉中段政权，扩大地方武装，“这是十分对的，很正确的”。虽然有个时期出于不得已采取极端没收的经济政策，有点军事共产的意味，随着红四军情况的变化，这种做法已得到纠正，决议肯定了自下山以来采取的经济政策。关于政权的形式，决议肯定了“合群众的需要采取公开与秘密两种形式，是很对的”，而批评了“在边界时采取有部分是强迫性质，不顾群众的需要是不对的”。

决议对红四军成立以来的有争议的行动，也进行了分析与研究，认为：1928年5月，因边界经济困难，又少枪支，将由湘南农军编成的三十、三十三团送回湘南是对的。但当时军委不考虑湘南的具体敌情，未作充分准备、周密计划，没有整顿，这是不对的，迁就了农民意识的回家观念，是躲避边界斗争的逃跑主义；9至12月，在军事上有保守主义的错误，没有很好地有计划地进行游击战争，是一种单纯的军事割据，而且因为红军“物质上的需要给群众以不好的影响”，甚至“有脱离我们的倾向”；1929年1月，为粉碎湘赣两省敌人对井冈山的第三次会剿，红四军主力出发赣南进行游击战争是对的，然而，前委于1929年5月在于都会议上决定一年内夺取江西全省的决定是不正确的，是对主观条件缺乏正确的估量的结果。

决议还对若干制度进行说明。认为由个人支配经济转到团体支配经济，并经士委会的审查，这种军需制度是应该确定的；决议明确没收土豪的财产由政治部统一指挥；关于边界时期的“行动委员会”制度，决议认为长处不少，能够公开领导群众，指挥所到之处的地方党与群众组织，联络群众亦广泛，但短处是代替了党，意即不能继续使用；决议充分肯定了红四军内部建立的宣传兵制度和士兵委员会制度，认为士兵委员会制度可以使士兵群众参加军队管理，维持红军纪律，对士兵进行政治教育，这个制度是绝对正确的，而宣传兵制度是红军非单纯打仗的工具的特征之一，宣传队、演讲队，作用很大，决议认为，有少数人视宣传兵为吃闲饭的，妨碍行军，这是偏见，必须坚决纠正。

第二，对党内争论的几个主要问题作出了结论。

“党应不应管理一切”是争论的问题之一。当时，争论没有结果，就找中央文件，、特别注意传达不久的“六大”的党章、决议等，但没有这个口号。经过分析，觉得从意思上讲，“党管一切”与党的组织原则并不矛盾，因此决议就肯定这个口号，但又认为这个口号在文字方面太简单，不明显，可以引起不正确的解释；今后不要多引用，一切按中央文件的精神办。尽管有些问题还不大明确，但军队的一切要由共产党来领导。用后来的话就是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这一点是很明确的。

关于前委和军委的关系问题，这是“七大”前夜争论的中心和焦点。决议认为，军委是前委的下级党部，它有决议须报告前委审查，不能说前委与军委是分权式，只能说军委分担了前委的工作。但决议又指出，一部分同志要求在前委之下再成立军委，是形式主义地看问题。当时认为前委之下再设立军委，确系机关重叠，意即不设。

对在“七大”之前的争论中提到的三个问题也作了说明。1.关于“过去党有没有家长制的倾向？”决议认为，这种倾向在客观上是存在的。因为红四军党员对党，下级对上级，只有机械式的服从而无活泼的党的生活，将一切工作推到书记一人身上。但对于有人说红四军党内有“书记专政”的提法予以否定，认为这是偏见。因为在组织上是前委书记兼党代表和政治部主任，这样，有时难免出现把一切事情集中于一个人的现象。这不是“书记专政”，是属于组织上人才安排得不合适。2.关于“过去党有没有代替群众组织的错误？”决议认为，从实际情况上看，红四军未犯此种错误，因为红四军党并没有一切事情直接管理，而是充分发挥群众组织的作用。但是在执行过程中，常有不足之处，有待改进。3.至于“过去是不是上级党包办了支部的工作”，决议断然否定，说这“完全不是事实”，过去红四军党能领导红军艰苦奋斗，大半由于连支部起作用。

对于红四军党内历史上存在不存在个人领导与党的领导的斗争，具体说就是有没有个人“与党争权”的事？决议认为，红四军少数同志在组织纪律上犯错误是有的，但绝没有个人“与党争权”的事实，认为把这次争论看成是“个人领导与党的领导争雄的具体的表现”的说法是“最要不得的”。

第三，大会中坦率、严肃、与人为善的态度，至今仍值得我们思考与借鉴。

决议在分析这次争论的性质和原因时，指出其原因之一就是“过去党的批评精神缺乏”，领导人之间“因某种政策与意见不同而互相怀疑，互相猜忌，又不提出来批评交由党解决，以致造成这次党内严重的争论问题，给党以不好的影响。”所以，决议一再强调要“增加批评精神”。当时大家也都深深地感觉到有批评、有争论，是好事情。毛泽东说：“党内有争论问题发生，是党的进步，不是退步。”把争论的问题搞清楚，“四军改造的工作由此可以完成，四军的党由此可以得到极大的进步，这是绝对无疑的”。朱德也说：“此次的辩论不但对党没有损失，并且使党有长足的进步。”在“七大”会议前后，党内热烈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双方都能坦然处之，即使是高级领导人也不例外。

访问人：据我们了解，“七大”决议也批评了毛泽东和朱德。

萧克：是的。决议批评毛泽东“见着前委有‘不生’、‘不死’的状态，不去积极挽救，反施以消极态度，这是不对的”。在批评他给林彪的信中谈的“四军有个人领导与党的领导的斗争”时，决议认为，这些判断是不正确的，并一条条地进行了说明。决议对毛泽东的个人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也作了严格的批评。

决议也批评朱德，认为他给林彪的信中的第一条“完全不是事实”，第二条又是“失于武断不合事实”，第三条有点“互相攻击的意味是最要不得的”。同样，对朱德的思想作风和工作方法，也有严格的批评。

决议批评刘安恭、林彪“离开党而谈党的严重问题”，“过分估量，失之推测”，“凭空臆断”，甚至“不调查清楚事实状况，偏于一面之词轻率发言”，对他们在党内争论中所起的不良影响也直言不讳，认为他们的做法“不但不能解决党内纠纷而使之加重”，“助长党内纠纷”，“这种轻率的工作是不对的”。

决议指出，认为红四军党内有“书记专政”的说法，是一种偏见；认为主张成立军委的人有只求形式不顾需要的缺点；认为把红四军军事技术不稳

定说成是军事负责人爱作政治游说的结果，是不实际的；还指出把党内不同意见，简单地上纲为一系列两种思想的斗争，是不正确的。等等。

毛泽东和朱德受到批评，决议认为他们在这次党内争论中都犯有错误，并且宣布给他们以严重警告和书面警告的处分，但在组织处理上则没有采取不利于团结、不利于工作的措施，不仅保留他们的前委委员，还明确宣布毛泽东和朱德在红四军的职务不动，在中央未派人来之前继续工作。林彪、刘安恭的错误是严重的，决议在批评他们的错误时严肃认真，但在选举前委委员时，他们仍被提名并被当选。那时候，不管上级还是下级，有意见在党内指名道姓批评。好不好？我看好，一个组织，如果主要领导人讲了定性的话，不管正确与否，就没有人敢讲话了，那就危险了，如果犯错误就是大错误。红四军“七大”的决议案批评红四军在位的党的主要领导人是有利于党的事业的。我曾向一位老同志谈过，如果在“文化大革命”前夕我们党还保持像红四军“七大”那样一种批评精神，“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也许就搞不起来。

第四，决议分析了党内争论的性质和原因。

对红四军“七大”前夕党内争论的性质的看法，历来不一样。毛泽东在给林彪的信中强调：这场争论的原因是“因为党的意志最大限度的伸张，个人意志感到从来未有的痛苦，一连打了几个胜仗和一种形式主义的理论从远方到来，这三样汇合，所以爆发了近日的争论”，其性质是“少数同志们历来错误路线的结果，两个指导路线的最后斗争”。一年多以后，1931年4月，苏区中央局扩大会议的决议第一号指出：“流氓路线曾经在四军七次代表大会正式进攻，起了领导作用，统治了前委，党的正确路线，一时失败。经过八次大会，特别是九次大会严重奋斗，流氓路线的领导又从事实上宣告破产，正确路线对于流氓路线的坚决斗争，才在这个时候作了一个总结。”这个批评是在六届四中全会的决议到苏区之后的第一次会议作出的。此后，虽然有时也说明这次党内争论不是路线斗争，但大多数时间都肯定了这次争论是建军史上“两条路线的第一次决斗”。今天，仍有人认为“七大”是错误思想占上风及毛泽东受排挤的一次会议。

红四军“七大”决议是怎样看待这件事的呢？决议首先认真分析了党内争论的原因，一是由于四军党员的经济背景复杂，思想认识不一致；二是负责同志间工作方式与态度不好，引起了意见纠纷；三是组织上不完备，兼职较多，责任心都很重，爱多管事；四是新的理论批评；日的习惯反响；五是过去党缺乏批评精神。然后，决议指出这次党内争论的性质“不仅是朱毛闹意见，不仅是组织原则的解释不同，实由于过去党的斗争历史上各种不同的主张，各种不同的方式互相精神（原文如此，意为僵持）着，历久不得解决，加上组织上有缺陷，及党内批评精神缺乏，造成这次争论总爆发”。但这“并不是简单的两种路线思想的斗争的结果。”

第五，开会和选举，都坚持民主集中制，坚持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

第七次代表大会到会代表有代表性，每纵队、支队、大队大部分都有代表。大会选举前委委员的方式是按党的“六大”通过的党章要求办的。党章规定：“各级党部的高级机关为党员大会，代表会议或全体会议选举之。”“下级党部与高级党部由党员大会代表会议及全国大会选举之”。大会举手表决选举了新的前委委员。除毛泽东和朱德是中央指定的前委委员及中央曾指示所在地方党部亦委派一名负责同志为委员参加前委工作外，选出陈毅、

林彪、刘安恭、伍中豪、傅柏翠及军直属队、一、二、三、四纵队的士兵代表 10 人，这 13 名前委委员组成新的前委。

无论选举还是通过决议，都采取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七大”以后，朱德曾告诉中央，“党内争论问题，自七次大会后，即告结束，虽有少数同志仍留点成见，但正确的指示，大家很诚恳地接受，消除一切成见去对付敌人。”实际情况就是这样。

### 关于红四军“七大”的研究和评价

访问人：对红四军“七大”，党史界、军史界都有不同看法。好在事情已经过去半个多世纪，人们应该有一个客观的评价。您怎样看待“七大”？

萧克：客观他讲，红四军“七大”的情况是复杂的。研究这个历史问题，我认为首要的一条是忠于史实，只有忠于史实，才能忠于真理。列宁曾说：“如果从事实的全部总和，从事实的联系去掌握事实，那么，事实不仅是‘胜于雄辩’的东西，而且是证据确凿的东西。”忠于史实的最基本条件，就是要广泛地搜集材料，并认真地整理，仔细地鉴别，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借以清洗出混乱了或已经被湮没的历史事实。“七大”现存的资料也不算少，有些还是当时的主要记录。我们的认识是否正确，主要应该研究这些资料。以历史资料来印证是比较准确的方法。因为“没有抽象的真理，真理是具体的”。

考察历史问题要把历史事件放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去分析，去认识。红四军的基础是大革命时期我党直接掌握的部队。大革命失败后，在党领导下，在极端艰难困苦中继续坚持革命事业。大多数干部，尤其是领导人，是有共产主义的理想和信仰，有伟大的革命抱负和一定的革命经验，中国革命的低潮把他们汇集到一起，为了共同的大目标而出生入死，艰苦奋斗。了解这一点就能弄清问题的性质，分清主流与支流。“七大”也有不少缺点。比如没有从政治上提出明确的指导方针，对党内错误思想的分析，几乎就事论事，对如何纠正错误思想，只提出了问题，而很少分析问题，更没有解决问题。对朱德、毛泽东的批评有不实事求是之处，过于重现象。组织处理有些简单、草率，毛泽东是中央指定的前委书记，被选掉了。后来，又批准毛去苏联留学兼养病休息，使他暂时离开了红四军。尽管毛本人有要求，但应该考虑到他提要求时的复杂背景，两方面做工作，效果会好些。不过，这些缺点不能算作“七大”的主流。

中央在处理这个问题上就站得高。在听取了陈毅的汇报后，指出了前委及代表大会的错误，批评了朱德、毛泽东的缺点，明确要前委“纠正朱毛两同志的错误，要恢复朱毛两同志在群众中的信仰”。在谈到朱毛两同志仍留前委工作之后，中央还强调：“经过前委会议，朱毛两同志诚恳接受中央指示后，毛同志仍任前委书记，并须使红军全体同志了解并接受。”不久证明，这样更有利于红四军党和军队的建设。

“七大”达到了停止党内争论，增强团结，以便分兵发动群众，扩大苏区，并为打破敌人“会剿”作准备。真有“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之慨。此外，决议对两年来军队的自身建设和根据地的建设作出的总结，为中央“九月来信”的产生，提供了重要依据，使中央的指示建立在比较正确地反映客观实际的基础上。红四军党内争论的各种问题，不仅使红四军的同志有一个思索提高的过程，也让中央领导人有一个思索和提高的机会。提出问题才能解决问题，所以在某种意义上说，“七大”为“九大”的召开创造了条件。

“七大”之后的新前委率领红四军在闽西打破了闽粤赣三省敌人的“会剿”，攻下上杭城，使汀江两岸直到永定、龙岩之间红旗连成一片，成为当时全国最大的一块苏区。总之，完成了战略任务，达到了动机与效果的统一。

研究红四军“七大”，应注意到这些情况。

1993年7月14日于北京

## 访黄允升—— 三十年代初：毛泽东的坎坷与挫折

### 黄允升

黄允升，1935年生，浙江义乌人。长期从事毛泽东生平、著作的编辑研究工作，现任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研究组副研究员。参加了《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和《毛泽东年谱》（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编辑和起草。主要著作有《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合著）、《韶山曲——毛泽东的故事》（合著）等。

北京西城有个毛家湾，高高的灰墙围成一方天地，这就是中央文献研究室所在地。那里的一群人们，甘于寂寞，乐于清贫，每天翻阅、研究着一大堆文献资料，与历史对话，同现实交流……这其中就有黄允升。

访问人：毛泽东的一生经历了无数的重大事件，在那些事件中，他往往又是最重要的参与者、决策者、指挥者或者说是导演。他有着这么丰富的、极不平凡的经历，却为什么对 30 年代中央苏区那一段不愉快的印象那么深刻，以致常常提起？他究竟受了哪些不公正的待遇？据我们所知，直接打击他的并不是王明本人，又为什么把帐算在了王明头上？

#### 先说说王明

黄允升：你们提的问题比较大，说起来话就长了，从何说起呢？要弄清这个问题，就必须弄清王明是怎么回事。

王明 1904 年生，比毛泽东小 11 岁。安徽六安县人，出身于金家寨镇做小本生意的家庭，人很聪明，6 岁开始上学，16 岁毕业于农业学校。后在武昌商科大学学习，并加入共青团。1925 年入党，也就是在这一年赴苏联中山大学学习。他在中山大学学习期间，俄语和列宁主义课学得很好，得到副校长米夫的赏识，成了米夫的得意门生。可以说，王明是有书本知识的，但他的缺点是不注意中国社会的实际，只学到了马列的名词术语，没有学到他们观察、分析问题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所以他没有自己的东西，一切都是从条条出发。他 1929 年回国，1931 年初在共产国际代表米夫的扶持下上台。当时中央的总书记是向忠发。向是工人出身，文化不高，没有自己的主见，而王明是中央政治局委员，能说会道，还有共产国际代表的支持，所以他把王明看成是执行共产国际路线的代表。这样，王明就成了中共中央的实际领导人。

访问人：王明上台不久就去莫斯科长住，为什么还要把帐算在他的头上？

黄允升：王明虽然去了莫斯科，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但他一直遥控着临时中共中央的领导。那时临时中央的行动都是向王明汇报，所以临时中央的实际领导人仍然是王明。王明在莫斯科也曾经自鸣得意他说过：“列宁大部分时间居在外国，主要关键都是列宁决定的”。言下之意，我王明在国外，临时中央的主要关键问题也都是我王明决定的。可见第三次“左”倾冒险主义路线以王明的名字来命名是事出有因的。

王明遥控指挥中央苏区，首当其冲和“山沟里”的毛泽东发生碰撞访问人：开始的时候王明远在上海，后来他又去了莫斯科，而毛泽东在江西农村，他又是如何和毛泽东发生关系的呢？黄允升：王明为了实现他的“左”倾政治纲领，提出“改造充实各级领导机关”的组织纲领。在中央一级把坚持不同意见的人一个个地打下去，如瞿秋白等一批人；在各个苏区，派人下去代表中央行使职权。所以有句话，叫“钦差大臣满天飞”。这个时候的毛泽东在农村搞武装斗争已经积累了丰富的革命实践经验，正确地提出了中国革命

的一系列方针路线问题。他提出了中国革命要以农村为中心实行“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他起草的《古田会议决议》，确定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成为我党我军建设的纲领性文献；他写的《反对本本主义》提出了“共产党人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在反“围剿”战争中总结的作战原则和古田会议确定的建军原则相结合，形成了反映中国革命战争特点和规律的军事路线。从《井冈山土地法》到《兴国土地法》、到1931年2月提出的土地所有权归得地的农民所有，“租借买卖，由他自主”的思想，形成了土地革命路线。毛泽东的这套理论和办法，已经被苏区实践所证明是正确的，是行之有效的。但这和王明所推行的“左”倾路线显然是不合拍的。所以当王明的东西要在中央苏区推行的时候，首先受到了毛泽东的强烈抵制。话说回来，毛泽东在那里抵制，就是在和王明“左”倾路线碰撞，当时的毛泽东虽然也是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但毕竟是呆在农村山区里的人，只是中央苏区的领头人。王明则是受到共产国际支持的，而且他是在贯彻国际的路线，换句话说，他就是中共中央，毛泽东和王明发生冲突，就是地方领导和中央、和国际路线冲突，所以受批的当然就是毛泽东了，所以就发生了后来的一系列的事情。

访问人：1931年中共六届四中全会派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到中央苏区，正好是反第二次“围剿”的前夜，一上场两边就发生了意见分歧，是吗？

黄允升：是的，开始有分歧。中央代表团到达中央苏区，第一个碰到的是军事问题，也就是反“围剿”打不打的问题。项英主张不打，因为敌人有20万，装备精良，红军只有3万多一点，根本看不到民众的强大力量。毛泽东不同意项英的主张，并且指出：“不做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不做正确的调查同样没有发言权”。

访问人：项英到苏区是怎么回事？

黄允升：项英是1930年中共六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央派他到苏区贯彻全会精神，任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任弼时等到中央苏区，参加苏区中央局的领导，要纠正三中全会“调和路线”。在苏区中央局会议上，中央代表团传达了中共六届四中全会精神、中央关于第二次反“围剿”战略方针和肃反问题政策。会议经过讨论，基本同意四中全会决议对第二次反“围剿”问题存在打与不打的争论。中央代表团不懂战争，面临20万敌军的大举进攻，开始倾向项英的意见。当时任弼时带去临时中央的三月指示：前面说“当着敌人力量尚未集中的时候，我们必须利用优势的兵力，去击溃敌人的主力……”，后面说“遇必要时，可以抛弃旧的与组织新的苏维埃区域”。也就是说，换个地方开辟根据地，比如到四川去创造新的根据地，并引斯大林的话说，四川是建立根据地最理想的地方。所以，在苏区中央局会议上，毛泽东主张打的意见占少数，于是建议召开苏区中央局扩大会议，讨论打不打的军事问题。

访问人：苏区中央局扩大会议开得如何呢？

黄允升：第二天开扩大会议，各军军长、政委和红三军团的总指挥、总政委等都到会了。代表团传达了中共六届四中全会精神和中央关于第二次反“围剿”的战略方针。会议通过了《接受国际来信及四中全会决议的决议》等几个决议案。对于打不打第二次反“围剿”问题，争论双方阐述了各自的观点。毛泽东分析了敌我形势，着重指出：第二次“围剿”的敌军数量虽多，但全属蒋介石的非嫡系部队，内部矛盾重重，弱点很多，地形不熟，情况不

明，官兵恐慌。我军战后士气旺盛，上下团结，准备充分；地方群众对敌仇恨，对红军热烈拥护，参战工作比前次更有经验，更有准备，更有办法，胜利的条件比第一次反“围剿”时更具备。现在的问题是我们到底敢不敢打？会议一开始讨论，军队高级干部发言非常热烈，个个信心十足，慷慨激昂，一致主张坚决地打。赣南、闽西的领导干部也不同意中央红军这时退出中央苏区。这样，毛泽东主张打的意见占了绝对优势，使那些主张转移开辟新根据地的人不再坚持了。这是毛泽东抵制不打二次反“围剿”错误主张的胜利。

访问人：据说王稼祥在青塘会议上说了一句忿忿的话：“山沟里没有马列主义”。黄允升：这个话也不无道理，因为毛泽东在说明应该打的理由时，讲了一大堆话，都是中国、江西，一句也没有涉及马列主义。而转移根据地则是斯大林的主张。但也有人没有被一些马列主义辞句所吓倒，勇敢地站出来批驳，那就是周以栗。周以栗是中共中央长江局军事部负责人，1930年9月底，他本来是到红一方面军司令部贯彻立三路线的，要求再打长沙，结果经过毛泽东摆事实讲道理的说服工作，他改变了原来的主张，并支持毛泽东的军事部署。所以他理直气壮地说：山沟里就是有马列主义，没有马列主义怎么能打败几倍于红军的敌军呢？怎么能够搞出这么大的根据地来呢？这是实践中的马列主义吗！在这以后，毛泽东找出很多文件给王稼祥看，找王稼祥谈话，谈得很深，比较务实的王稼祥受益匪浅；同时也影响了任弼时同志，他觉得毛泽东在军事上确实有道理。这样，中央代表团转而同意了毛泽东的主张，支持毛泽东的军事部署。在东固中央局会议上，他们要毛泽东首先讲第二次反“围剿”的战略方针和作战部署，同时觉得项英的“分兵退敌”是机会主义的。这样就为第二次反“围剿”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于是才有第二次反“围剿”的胜利。接着是第三次反“围剿”。第三次反“围剿”，我们是以3万多对30万，两军实力更为悬殊，由于根据地人民群众的热烈支援，中央代表团完全支持，又取得了重大的胜利。

赣南会议再起波澜访问人：第二次反“围剿”的风波过后，表明毛泽东在军事上已受到了中央代表团的信任和理解，尤其从中央局代理书记这个职务来看，如果项英不行，应该由中央代表团的一位成员来代，但他们并没有那样做，而是选择毛泽东来代。这表明他们对毛泽东是十分尊敬的，或者说看得比自己要高。可是后来的赣南会议，又起波折是怎么回事呢？黄允升：这主要是中央的干预了，为什么把帐算在王明头上，也就表现在这些地方。1931年8月31日临时中央给苏区中央局和红军总前委写了一封长信，主要在军事和土地问题上批评中央局，说他们犯有很严重的错误。信里谈道，中央苏区容许地主残余租借土地耕种，对待富农只是抽肥补瘦、抽多补少，是阶级阵线不明；在军事上红军还没有完全抛弃游击主义的传统与小团体观念，这与红军已在进行的大规模战争和担负着争取一省几省首先胜利的任务是不相称的。中央要求苏区：必须迅速扩大根据地，必须向外发展，必须占领一个两个顶大的城市；必须进行彻底的土地革命，贯彻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国际精神。中央的这封信是十月到苏区的，这时红军的第三次反“围剿”已经取得了胜利。如何贯彻中央的指示呢？于是大家的意见发生了分歧。中央代表团认为，苏区应根据中央指示，迅速扩大根据地，乘胜夺取中心城市，如赣州、抚州、吉安，然后扩大战果，实现革命在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毛泽东认为，这是行不通的。他提出：红军在粉碎第三次“围剿”后，从敌人方面说，蒋介石已忙于应付全国高涨着的抗日救亡的反帝运动，不会很快

进行下一次“围剿”；从红军方面说，红军在第三次反“围剿”中连续作战，打得精疲力尽，急需休整和补充。另外闽赣两个苏区之间还有七八个县的一些土围子被地主武装霸占着，当前的中心任务应该是扫除土围子，打通两个苏区，然后再打通赣南与赣东北两苏区。而所谓中心城市则被蒋介石军队固守着，我们这个步枪鞭炮多，很少机枪重炮的红军，此时绝无战胜攻取之可能。毛泽东坚持“从容不迫地去打土围子”，把打中心城市“放在脑后”，或者说“比脑后还要后，叫做放在屁股后”。

访问人：这样两种意见就对立起来了。从毛泽东的话语来看态度极其坚决，毫无妥协之意。

黄允升：关键是双方的思想方法不一样，对当时的敌情我情的认识也不一致，当敌人来了，如何消灭敌人，毛泽东和中央代表团的思想一致了。胜利以后，如何巩固和扩大根据地，就产生了矛盾。

访问人：记得毛泽东谈到过这段历史，他说：那些老爷们恨不得第二天早上就把国民党打光，哪有那么容易的事情。设身处地地想想，那些同志的思想似也可以理解，既然一、二、三次反“围剿”都胜利了，说明红军有了一定的实力，那么我们就抓住这个机遇。乘胜占领一两个城市嘛！

黄允升：他们这种想法完全是脱离实际的，是只看到了局部的暂时的胜利，没有看到革命的长期性和艰巨性。在条件还不具备的时候，就去进攻，猛烈扩大根据地，那是军事冒险，那是“左”。因为双方意见的不一致，1931年11月苏区中央局召开了赣南会议。

因为中央代表团要贯彻中央的指示，毛泽东嘴上虽然不是明顶，实际上是另外提出了自己的一套，明显有悖中央精神。还有一点：这之前，中央代表团对毛泽东撰写的《反对本本主义》一书，就觉得不妥。毛泽东的《反对本本主义》中，提到的本本，是指中共“六大”决议，作为党的一级组织，怎能不执行党的决议。这一次大家在讨论执行中央指示时，毛泽东又是另有一套，所以他们认为毛泽东不太重视党的指示和决议，总是从自己的经验出发，未免太经验主义了。所以这次会议，他们对毛泽东提出了三条批评：一是从思想上批评狭隘经验论；二是军事上的批评游击习气；三是土地革命上批评富农路线，因为他的按人口平均分配，遵守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的原则与中央的“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主张相违背。会议由中央代表团主持，强调贯彻四中全会路线，集中火力反右倾，并开始排挤毛泽东在中央苏区对红军的领导。当然，这次会议并没有撤掉他的中共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访问人：毛泽东明明是正确的，却被误解为是错误的。同志们不接受也罢，且还给戴了三顶帽子，确实让人难过。黄允升：难过的事情还在后面。毛泽东关于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的职务虽然没有被撤，但会议确定成立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朱德任主席，王稼祥、彭德怀任副主席，毛泽东仅仅是个委员。中革军委成立之后，就取消了红一方面军总司令、总政委的名义。也就是说，毛泽东的总政委被取消了。这个问题怎么看？有人说，与此同时毛泽东还当选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主席。主席一职比政委高多了，不是谁都可以当的。按理讲，毛泽东当主席也是非常合适的人选，但是共和国主席必定有些名义的成分在里面，况且当时是极端恶劣的战争环境，我们党的任务主要是打仗，像这样一位战争经验相当丰富的人，不让他指挥部队打仗，却让他在后方做政府工作，总是有欠公正，因为把他闲起来了嘛！

有种说法，赣南会议，毛泽东丢了兵权，我想这话也不为过。实事求是

的讲，是受了排挤的。当然也不像有些书中所说，会议对毛泽东批得很厉害，撤了他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前面已经讲到，书记没有撤；批评他是极严重的一贯的右倾机会主义。关于极严重的一贯的右倾机会主义，这个话有，但也不是这里说的，是 1932 年 5 月 11 日苏区中央局的决议讲的。

毛泽东主张不打赣州打漳州。

漳州打下来了，但他的日子并没有好过多少

访问人：那么，毛泽东是什么时候卸任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的？

黄允升：那是在 1931 年 12 月底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周恩来抵达中央苏区中心瑞金之后，经过叶坪会议。这里还需要介绍一点情况：1932 年 1 月上旬，中央苏区中央局召开会议，讨论贯彻执行临时中央要红一方面军“首取赣州”和反对主要危险右倾的决议。毛泽东不赞成打赣州。他根据以往攻打赣州的经验发言指出：赣州是敌军必守的坚城，三面环水，红军技术装备差，很可能久攻不克，于我不利；即使要打，也只能采取围城打援的战术。朱德也不赞成打赣州。但是，多数与会者执行临时中央指示，主张攻打赣州。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提议再听听红军前线主要指挥员的意见。前线主要指挥员回到瑞金，表示执行临时中央指示，坚决主张打赣州，并拍拍胸脯说，打赣州包在我身上，在 20 天内打下来。10 日，中央军委发布攻取赣州的军事训令，规定中央红军坚决夺取赣州，以赣州为中心向北发展，争取革命在江西省的首先胜利；任命彭德怀为攻赣前敌总指挥。接着，开始赣州战役，红三军团担任主攻，红一军团担任策应，红五军团担任预备队。这样，毛泽东就成为不执行临时中央“进攻路线”及攻打赣州城市的人了，中央局代理书记不能再继续了，于是有个叶坪会议。

访问人：叶坪会议是什么时候开的？毛泽东会议主持人的身分中途被换，是吗？

黄允升：叶坪会议是 1932 年 1 月中旬开的。当时作会议记录的同志回忆：在叶坪，毛泽东先主持中共苏区中央局会议，报告三次反“围剿”的情况和九一八事变后的全国形势。认为日本帝国主义灭亡中国的大举侵华，势必引起全国人民的抗日高潮，国内阶级关系必将发生变化。中央代表团有的成员贯彻王明“武装保卫苏联”的主张，不同意毛泽东作这样的分析，指责说：“日本占领东北主要是为了进攻苏联，不作此估计就是右倾机会主义”，“我们必须提出武装保卫苏联”，不这样提出口号，“就是典型的右倾机会主义”。毛泽东以沉默来抵制，一声不吭。会议中途，因毛泽东“太右”，另选了主持人。会后不久，毛泽东就向苏区中央局请病假，到瑞金郊外东华山休养去了。

访问人：毛泽东不同意的赣州战役，到底打得怎么样？据说主攻部队反被敌军团团围住。

黄允升：中央红军攻打赣州，历时 33 天，不仅城未攻克，反遭很大伤亡，不但没有为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进攻路线”增添光彩，反而造成了相当严重的后果。

这次打赣州，担任主攻的是红三军团，他们虽然打得很英勇，但仍然久攻不下，反而被敌人援军团团围住，造成严重危机。攻赣前线指挥部急电毛泽东中止休养，火速赴前线决策。毛泽东不计较自己主张被否定和批评，而是顾全大局，停止休养，带病冒雨下山，日夜兼程，赴前线决策解围。他雄才大略，知人善任，掌握团结改造红五军团情况，致电前线，建议大胆起用

作为预备队的红五军团。前线指挥部采纳了毛泽东的建议，把红五军团从预备队位置调到前线参战，将其中的第十五军开到赣州城外，恰遇敌军从城内出击。红十五军在董振堂同志指挥下跑步前进，手持大刀与敌人展开肉搏战，杀得敌军尸横遍地，逼使敌军仓皇退入城内，扭转了战局，使红三军团中被围的这个师转危为安。当毛泽东赶到赣县江口前线指挥部，朱德告诉他：按照你在瑞金复电的意见，把预备队红五军团拉上来，杀向敌军，红三军团一个被反包围的师已经解围脱险。随后，毛泽东经过调查，提议中共苏区中央局在前方开会，总结、检查打赣州的问题。在这次中央局会议上毛泽东明确指出，攻打赣州是错误的。

访问人：实践证明毛泽东反对打赣州是正确的，5月11日的苏区中央局会议，毛泽东又受到批评是怎么回事呢？

黄允升：这件事与项英到上海临时中央汇报工作有关。他汇报了中央代表团对一些问题的处置和赣南会议情况，同时认为反右倾还不够。临时中央对这位工人出身的干部意见特别重视，于是有临时中央对苏区中央局的连续批评。4月5日一封信，4月14日又一封信，说：“右倾机会主义是各个苏区党面前的主要危险”，对“革命形势估计不足”、“忽视反苏联战争的危险”等，这封信要求苏区党组织领导军民“进行坚决的革命的进攻”，强调对“右倾作最坚决无情的争斗”。对于这封信，毛泽东和苏区中央局有着截然不同的两种态度。毛泽东是在漳州前线看到这封信的，他联系实际，于5月初复电苏区中央局，指出：“中央的政治估量和军事战略，完全是错误的。”改组后的苏区中央局于5月11日开会讨论，否定和批评了毛泽东的意见，表示同意和接受临时中央的指示和批评，承认中央局“自去年三次战争胜利以来对于目前政治形势的估量，犯了极严重的一贯右倾主义错误”；“须彻底纠正中央局过去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右倾机会主义是苏区党内的主要危险”。当时毛泽东在漳州，未出席这次会议。毛泽东后来说，他被缺席审判，一审终结，不许上诉。访问人：据了解5月20日临时中央还有一封信，批评了苏区中央局，是吗？黄允升：是的。5月20日临时中央又电示苏区中央局指出：苏区党代表大会（赣南会议）“一般的接受了中央的指示”，“对于争取一省数省首先胜利及进攻的路线，缺乏明确的肯定的指示”。指示电还指责赣南会议以反对所谓狭隘的经验论，代替了反机会主义的斗争。就是说，临时中央认为赣南会议对毛泽东批评得还不够。6月17日苏区中央局开会，讨论中央5月20日电示，承认中央的批评是正确的，这就预示着王明“左”倾路线要对毛泽东进行更严厉的批判和斗争了。所以怪事也就出来了，1932年4月毛泽东以中华苏维埃中央临时政府主席身分率红一、五军团攻克漳州，缴获两架飞机和大量军用物资，并筹集了大批款项，为反击敌军“围剿”奠定了物质基础。但是，当红一方面军恢复番号时，苏区中央局只任朱德为司令，毛泽东的总政委职务就没有恢复。

访问人：这里面有一个问题不明白，中央反复指示苏区中央局要坚决执行进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中央局也因此一次次地作出决议，要贯彻执行。那么，中央局的同志的态度是诚心诚意接受中央指示，还是服从组织原则呢？为什么只有毛泽东站出来顶？

黄允升：这不是一句两句可以说清的问题。简单他说，既有和中央思路比较一致的一面，也有服从组织的一面。应该说当时的毛泽东是看得准的，所以他顶起来就比较坚决。因为思想认识的不一致，反映到红军的行动问题

上，必然产生分歧。在红军打下漳州后，关于红军的作战，一段时间内大家的思想还比较一致。项英从中央汇报回来以后比较神气，好像掌握了临时中央的精神，连中央局书记也要同他协商办事。后来周恩来去前线，在他力荐的情况下，毛泽东才又担任了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职务。他可以名正言顺的指挥打仗了，这对毛泽东来讲，是一件快乐的事情。

访问人：可是好景不长，在作战方向问题上，很快就和后方中央局的同志产生了分歧。

黄允升：是的。8月上旬苏区中央局会议在兴国召开，接受了毛泽东关于红军主力在赣江以东北上作战，先消灭乐安、宜黄之敌，再打南城、南丰等地来援之敌，进而威逼和夺取吉安、抚州，以配合鄂豫皖、湘鄂西红军反“围剿”的建议。

访问人：这次会议的精神，8月8日中央军委发出了训令，是说首先消灭乐安、宜黄之敌，进而威胁与夺取吉安、抚州、南丰、樟树及南昌附近的较大城市。实际上这还是一种积极进攻的姿态，这自然也是毛泽东的意见了？

黄允升：你们想想，在那样一种环境下，他不以进攻大城市为前提，毛泽东的意见能被采纳吗？仔细琢磨，毛泽东很讲究策略，在他看来，只要大家同意消灭乐安、宜黄等地的敌人就行，至于像抚州、南昌那样的大城市打不打，那是以后的事情，先打了小的和可以打的地方再说，不然他恐怕连发言权也没有了。因为毛泽东打乐安、宜黄的意见被通过，红军立即采取了迅速果敢的行动，从8月17日至22日，一周之内就连克乐安、宜黄、南丰三城，歼敌5000多，给抚州、南昌、樟树之敌以极大震动。本来按原定计划还要打南城，因为红军在乐安等地的胜利，敌人重新调整了驻防部署，南城一下子集中了17个团的兵力，工事坚固，不可能再行进攻。这样就和中央局产生了分歧，中央局对他们不乘胜进攻南城很不满意，要求他们立即找寻机会与敌人作战。毛泽东等认为“出击必须是有把握的胜利与消灭敌人一部，以便各个击破敌人，才是正确策略，否则急于求战而遭不利，将造成严重错误。”这样来回反复定不下来，中央局认为他们贯彻的不是中央关于积极进攻的策略，是在延缓作战时间，这顶大帽子底下，毛泽东等前线同志解释：我们是在贯彻积极进攻的路线，只是必须寻找合适的作战机会，不能鲁莽从事。正在争执不下的时候，苏区中央局收到临时中央关于中央红军行动方针的指示电：说蒋介石由武汉回庐山，召集在赣将领开会，即将倾全力向我中央苏区及赣东北取进攻之势，我方须立即紧急动员警戒，并以最积极迅速之行动，择敌人弱点击破一面，勿待其合围，反失时机，望即定军事动员计划。9月26日毛泽东、朱德又正好发了一个红一方面军的训令。这个训令不是积极寻找敌人作战，而是就地发动群众，准备反“围剿”战场，无疑这是正确的，后来的第四次反“围剿”也是在这里打的。但却使中央局火了，立即致电说，这个训令“完全是离开了原则，极危险的布置。”对这种离开原则的观点，要“给以无情的打击”。因为原来前后方意见不一致，前线曾提议后方的中央局到前线开会讨论决定，他们没有同意。待接到临时中央关于军事行动指示电和毛泽东、朱德的训令，中央局立刻命令前线暂时停止行动，他们立即到前方开中央局全体会议，并把中央指示电转发给前方。因此就有了10月上旬的宁都会会议，就有了毛泽东又丢兵权，回后方做政府工作的事情。

第一次宁都会会议，毛泽东挨批，而且，受牵连的还不止他一个人

访问人：宁都会会议都有哪些人参加，会议主要讨论和决定了什么问题呢？

黄允升：这次苏区中央局全体会议是在宁都县的小源开的。出席会议的有在前方的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后方来前方的有任弼时、项英、邓发和顾作霖，还有从后方来的刘伯承列席参加。会议由中央局书记周恩来主持。“开展了中央局从未有过的反右倾向的斗争”。会议开始时，前后方的意见并不一致，比如周恩来在报告前线这一段作战情况时，他说前方的行动是符合中央“进攻路线”的。毛泽东坚持关干部队分散向北工作一时期的训令是正确的，是从敌强我弱的实际出发，符合前线的客观情况。但是临时中央关于军事

行动方针指示电不是这样的，所以后方的同志认为，前方同志的表现是对革命胜利和红军力量估计不足的表现，是等待主义，所谓“诱敌深入”，是守株待兔，是不合中央精神的。

因为是中央的精神，所以周恩来在发言中也承认前方同志确有以准备为中心的观念，“泽东表现最多”，并温和地批评了毛泽东，同时也指正了后方同志对毛泽东的过分批评。

访问人：这时，毛泽东那种“老子不信邪”的精神又出来了，他据理力争，还想说服众人。

黄允升：遗憾的是宁都会会议没有留下会议记录，具体毛泽东是如何讲的说不清楚，但从会议简报记载的情况来看，说毛泽东“不尊重党领导机关”，“承认与了解错误不够”，表明毛泽东是比较坚决地坚持了自己原则立场。因为毛泽东态度坚决，所以会议对他进行了比较系统地批评，算了老帐：比如打赣州问题，本来因为城坚我们没有攻下，损失较大，作自我批评的应该是主张打的人。但是被说成是因为毛泽东等反对攻城，不执行“进攻路线”而“遂未坚决布置”。

攻克漳州问题，按事情的本来面目，攻克漳州，这是毛泽东的一大功劳，但会议认为：“进占漳州曾获胜利，有很大政治影响，但来往延缓了北上任务之实现。”说到底就是延缓了北上攻打大城市。

访问人：事情完全弄反了，一切都本末倒置了。

黄允升：发展战略问题。3月中旬，毛泽东在赣县江口苏区中央局会议上曾提出，红军沿武夷山脉向赣东北方志敏苏区逐步前进，发展闽浙赣三省之交的大块地区，然后向浙西皖南发展，造成较为巩固的阵地，准备对付蒋介石的第四次“围剿”。会议未能采纳。后来毛泽东的这一主张遭到了临时中央的批评，说是向偏僻区域发展的右倾机会主义。

访问人：事实上我们党开辟的根据地几乎都是在穷乡僻壤开始，仔细想想这是无可奈何的事情。红军十分弱小，如果在交通便利、富庶的地区，敌人剿起来很方便，我们很难立足，所以只有钻山沟一着，然后逐渐扩大。

黄允升：但是当时的中央和许多同志不理解。毛泽东的主张受到批评以后，他在一次给项英的信中又提到了这个问题。在宁都会会议上项英公开揭发了此信，所以毛泽东被指责为是“上山主义”、“东北路线”，说“泽东同志认为早应北上，过去七个月都错误的的不正确观点”，是动摇并否认过去胜利成绩，掩盖自己的错误。当然这次会议对后方的同志也有批评，批评他们“对于敌人大举进攻认识不足，因之对于动员的准备缺乏注意”，但与会的多数同志认为，“集中重要火力反对等待观念是对的”。由于毛泽东在原则问题上不承认错误，与会者多数认为，他“承认与了解错误不够”，“不尊重党领导机关”；“如他主持战争，在政治与行动方针上容易发生错误”。

所以，会议最后批准毛泽东“暂时请病假，必要时到前方”。会后毛泽东立即回后方，在同周恩来话别时表示：前方军事急需，何时电召便何时来。

访问人：当时临时中央是否也开了一个批评毛泽东的会？

黄允升：是的，几乎在开宁都会议的同时，临时中央于10月6日开政治局常委会讨论苏区中央的问题，批评毛泽东“分散工作的观点”，“是保守、退却”，“是不能容许的”。强调对毛泽东应作坚决的斗争，但不一定指出名字，并提出他“可调回后方作苏维埃工作”。会议决定，立即给苏区中央局去电。

中共临时中央电示到达中央苏区前线，宁都会议已经结束，毛泽东已离开前线去长汀福音医院休养。苏区中央局立即开会（可说是宁都会议继续）贯彻执行临时中央的来电指示，周恩来、王稼祥、朱德在宁都会议上不赞成毛泽东回后方的意见也无法坚持了，所以一致确定毛泽东回后方主持临时中央政府工作，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一职由周恩来代理。10月12日，中革军委奉苏区中央局之命发布了这个命令。26日，中共临时中央任命周恩来兼任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毛泽东没有出席被撤职的中央局会议，是缺席裁判的。

访问人：把毛泽东摺在长汀福音医院，他们有没有让毛泽东写检讨之类？

黄允升：毛泽东到长汀福音医院，同受排挤的先期到医院休养的周以栗会合，因为他讲过“山沟里有马列主义”而挨整。据我们现在看到的材料，没有见到毛泽东写过检讨这类材料，倒是向中央局写过思想汇报材料。这从1932年11月26日苏区中央局在答复临时中央问题的电报中知道的。这份电报中说，毛泽东仍不同意进攻路线而坚持积极防御路线。还指出：“现在对进攻路线除毛泽东同志最近来信仍表现有以准备为中心的意见外，并无其他反对与抵抗，不过在地方上进攻路线还不深刻了解与未坚决执行。”这就引起了临时中央的极大注意。

访问人：临时中央迁入中央苏区后又怎样排挤、打击毛泽东的正确路线的？

黄允升：临时中央在上海大城市屡遭破坏，是被迫来中央苏区的，时间是1933年1月下旬。早在1931年王明离开上海去莫斯科前，找博古等谈话，互相谈到：毛泽东小事有办法，大的问题是错的。当博古等进入中央苏区经过长汀时，有人提议去看一下在福音医院的毛泽东，傲慢的博古根本看不起毛泽东，并反问说，为什么要去看他。临时中央到中央苏区第一件事就是批评福建的“罗明路线”，第二件事，是批江西的“罗明路线”和“军队中罗明路线”，就是批邓、毛、谢、古，有七个书记被撤职，还有大批干部撤换。

第二次宁都会议，毛泽东为自己的不公正提出“申诉”，又被否定

访问人：据说还有个第二次宁都会议，是吗？

黄允升：是的。第二次宁都会议是在1933年6月上旬开的，会议由临时中央主要负责人博古主持，总结了前段工作。毛泽东出席会议，仍然坚持积极防御路线，认为第一次宁都会议确定红军主力北上、击破敌军一面、粉碎敌军于“进剿”合围之前的进攻任务并未实现，而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采用的仍然是“诱敌深入”、运用大兵团伏击战的办法取得的，于是对上次宁都会议提出批评，对自己受到不正确的批评提出申诉。这里可以看到毛泽东不怕压力、坚持原则的韧劲，为当时好多人所折服。但是，博古在作结论中重申前次宁都会议是正确的，说没有前次宁都会议就没有第四次反“围剿”

的胜利。这样，毛泽东有根有据的批评和正确的申诉又被否定，仍处在挨批的位置上，心情沉重。

好在毛泽东能不断平衡自己，把那些所谓“山沟里没有马列主义”、“狭隘经验论”的观点，当作自己看书学习的“兴奋剂”，下决心看了很多马列著作，比如《反杜林论》、《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和《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个策略》等等。他联系中国革命实践读，很有心得，找到了反对教条主义的思想武器，并把《两个策略》一书转给前线指挥作战的彭德怀同志，在书皮上写着：此书要在大革命时读着，就不会犯错误。不久，又把《“左”派幼稚病》一书寄给彭德怀，在书面上写着：你看了以前送去的那一本书，叫做知其一而不知其二；你看了《“左”派幼稚病》才会知道“左”与右同样有危险性。

访问人：毛泽东在苏维埃中央临时政府几年，做了大量工作？

黄允升：是的，他相忍为党，在王明“左”倾路线下做了力所能及的大量工作。比如：中央根据地的经济建设、政权建设和文化建设等，使错误路线造成的损失减少到最低限度，还是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稳定群众生活，大力支援了前线指战员的战斗。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毛泽东领导的查田运动。尽管有“左”倾路线的干扰和影响，用博古后来认识的话说，干扰得使毛泽东无法做“查田运动”的领导，但终究还是基本上战胜了“左”的一套。1933年10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颁布毛泽东主持制定的《关于土地斗争中一些问题的决定》和他写的《怎样分析阶级》两个文件，对怎样划分地主、富农、中农、贫农作出明确规定；对劳动与附带劳动的区别、地主与富农的区别、富农与富裕中农的区别、富裕中农与其他中农的区别、贫农问题及地主富农兼商人的问题，都作出了明确的政策规定；纠正了土地斗争中因“左”倾而造成阶级阵线混乱的偏向。这两个文件的贯彻执行，分清了阶级阵线，“查田运动”健康发展，使广大农民群众的革命积极性更加发挥起来，有力地支援了前线的军事斗争。这两个文件，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土地改革政策的重要文献。

但是，王明“左”倾路线领导者博古等，对毛泽东的作为更加不满，又要采取组织措施了。博古等主持中共六届五中全会，把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路线推进到顶点，同时把毛泽东等整到了最低谷，仅有一点实权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人民委员会主席也给搞掉了，由洛甫来代替。毛泽东没有出席这次会议。到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结束时，毛泽东只剩下一个挂名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主席了。

毛泽东在军事问题的争论上没斗过王明们。于是，长征开始了

访问人：毛泽东在土地革命问题上取得很大成绩，但在军事问题上一直未斗过“左”的东西。

黄允升：是的。毛泽东尽管不断挨整，但仍维护党的团结，忍辱负重，从党的利益出发，积极向中央提出军事上的建议。于是，傲慢的宗派主义者对毛泽东、彭德怀等的军事方面的建议，一一加以拒绝，听不得半点不同意见。不仅如此，还把共产国际派来中国工作的一般人员李德聘为军事顾问，并推为“太上皇”，竭力推行王明的军事冒险主义、实行“御敌于国门之外”，“六路分兵”、“全线抵御”的作战方针，结果中央苏区日益缩小。所以，第五次反“围剿”也不能不失败，造成中央苏区的丧失，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迁移，迫使中央工农红军不得不作战略转移——长征。红军长征初期，由

于博古、李德等军事指挥错误，在湘江一战就使 8 万多红军锐减为 3 万多人，可说是惨败，在红军历史上是没有过的，这也可说是王明“左”倾教条主义所创造的另一个“奇迹”。

以上种种过火斗争、无情打击说明，博古等一直贯彻执行王明《两条路线》中“目前党内主要危险”是右倾和“改造充实各级领导机关”的两项互相联系的错误纲领，造成最大恶果就是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红军主力退出中央苏区继续惨败；其他根据地和广大白区工作，也同样由于王明“左”倾路线的统治而陷于失败。

物极必反，广大指战员在湘江惨败情况下开始思考问题了：为什么毛泽东、朱德指挥的第一、第二、第三次反“围剿”都取得了胜利，为什么第五次反“围剿”却失败了呢？！毛泽东启发中央高级干部总结经验教训。王稼祥、张闻天、周恩来支持毛泽东转兵到贵州的主张，通过通道会议、黎平会议、猴场会议，为遵义会议作了准备。

1935 年 1 月，遵义会议召开，通过了《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对党内两条军事路线这场大争论作出了正确结论，重新恢复毛泽东的积极防御的军事路线，批判了王明“左”倾军事冒险主义“进攻路线”。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教条主义路线在党中央达四年之久的统治，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共中央的正确领导，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次独立自主地解决组织问题，是党和红军生死攸关的转折点。从此，中国革命走上了坦途。

1993 年 10 月 24 日于北京前毛家湾

## 访郭洪涛—— 迎接毛泽东到陕北

### 郭洪涛

郭洪涛，1911年生，陕西米脂人。1925年参加中国共产党，1933年任中共陕北特委组织部长，1934年兼任陕北游击队总指挥部政委。1935年后任陕甘晋省委副书记，陕西省委书记，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建国后任铁道部副部长，国家经委副主任，国家计委顾问等。曾是中共七大、八大、十二大代表，十三大、十四大特邀代表，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经过两万五千里的长途跋涉，历经千难万险，落脚到陕北。陕北有块根据地，那里的好兄弟欢迎了他们。郭洪涛当时任陕甘晋省委副书记，于是有了他和毛泽东的交往，有了这一段不平凡的经历。

访问人：1935年10月毛泽东率中央红军到达陕北，这是我党历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当时您和程子华同志作为陕北红军的代表去迎接中央红军，您是什么时候见到毛泽东的？郭洪涛：中央红军于1935年10月19日到达陕北的吴起镇。红军有个好传统，一路走，一路开展宣传工作。写标语、散发传单、张贴布告，使陕北苏区群众都知道中央红军来了。当时我担任中共陕甘晋省委副书记。在这之前，我们只知道中央红军到了甘南，不知以后去哪里，那时红十五军团政委程子华也在后方。怎么迎接中央红军，前方有人提出越出苏区，到关中彬县一带的大道上去迎接。程子华不同意这个意见，认为不应远离苏区，应该继续南进，到洛川方向，既可钳制敌人，又可迎接中央红军。当时，我们陕北苏区的第三次“围剿”还未打破，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红军远离苏区，敌人一下子进来怎么办？朱理冶和我同意程子华的意见。这个方针是对的。朱理冶就让程子华到前方，部署这个工作。后来我也去了前方，是中央代表团负责人派我去前方停止捕人的，同去的还有派去担任红二十六军政委的崔田民。我们先找到程子华和十五军团司令员徐海东。记得是在一个房里，有两盘炕，我和崔田民坐在这边，徐海东、程子华坐在那面，我说：逮捕红二十六军刘志丹、高岗等一批老干部是错误的，没有证据。后方已停止逮捕和审讯，前方也应停止捕人。程、徐说：很好，我们同意。马上叫来红二十五军保卫科负责人，命令停止捕人。就在这个时候，有人把红军抗日先遣支队司令部的布告送来，我们知道中央红军到了陕北吴起镇。

当我们知道了这个消息，就商量由程子华和我一道去迎接中央和中央红军。我们从稻左堡出发，走了一天，到了下寺湾，首先碰见了贾拓夫，后又见到了李维汉。

访问人：你们什么时候见到的毛泽东？

郭洪涛：我们先和李维汉谈了一些陕北两个苏区和错误肃反的情况。李维汉认为我反映的情况很重要，一两天后李维汉就领我去见了毛泽东、张闻天。

访问人：您见到毛泽东，他给您的第一个印象是什么？

郭洪涛：印象很好。毛泽东是我久仰的领袖人物，还有其他中央领导同志，他们都来了，我非常高兴。见面后，毛泽东就肯定了陕北红军，说因为有个陕北根据地，中央来了才有落脚点。我早就看过毛泽东在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也看了遵义会议的决议，对毛泽东是十分佩服的。也知道朱德。朱毛领导的红军很有名气。周恩来在黄埔军校工作时就听说过，他在党内和社会上都很著名。周恩来在下寺湾找我谈话，代表中央分配我担任

陕西省委书记。

访问人：从保存下来的照片看，当时的毛泽东非常瘦弱，两只眼窝深陷，颧骨老高，完全一副营养不良的样子，但精神很好。

郭洪涛：是的，瘦得很，也很累，天天走路、打仗，饥一顿饱一顿的，哪能不瘦？大家都很瘦。但又因为心里有着崇高的信仰，我们是为美好的理想而奋斗，而牺牲的，所以大家的精神是饱满的。从毛泽东的照片里就可以看出这种精神来。我们就是在这种精神之下奋斗出来的。

访问人：你们初次见面谈了些什么？

郭洪涛：我向毛泽东、张闻天做了简要汇报。主要是陕甘边和陕北两个苏区的创立和发展过程。如陕北经过几次暴动，成立了红 27 军，陕甘边较早地成立了红 26 军。这两块根据地在发展中互相联系，互相配合，互相支援，终于在 1935 年 2 月成立西北工委和西北军委，达到完全统一的情况。还有谢子长负伤去世后，红 26 军和红 27 军在刘志丹统一指挥下，粉碎了国民党军的第二次“围剿”，把原来的两块苏区连成一片，创造了大片的革命根据地等。因为我在陕北特委工作，对陕北的情况比较熟悉，所以对陕北根据地的情况谈得比较详细。此外还汇报了陕北错误肃反问题。

访问人：您对陕北的肃反问题怎么看？

郭洪涛：对这个问题，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所编的《党史通讯》1987 年第 4 期《更正》中写道：“1935 年 9、10 月间，在中央代表团主持下，陕北发生了错误肃反，使苏区陷入严重危机，这是王明‘左’倾错误路线的产物”。当时，我虽然不是中央代表团成员，但我是本地干部，担任陕甘晋省委副书记的职务，因此，我在政治上也负有重要的责任。

访问人：中央认为陕北的肃反是错误的，对吗？

郭洪涛：是的。当我汇报了陕北错误肃反的情况后，中央当即决定纠正肃反的错误，释放所有被捕同志，王首道担任西北保卫局局长。中央到瓦窑堡后，又决定成立了以董必武为首的五人委员会负责处理错误肃反问题，释放了被冤的红 26 军刘志丹等老干部，因而挽救了革命根据地的危险局面。

访问人：有一部电视剧说，是周总理亲自放了刘志丹。

郭洪涛：是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等中央领导同志决定释放的。但释放的时候，他们正在直罗镇前线打击敌人。

访问人：下寺湾中央政治局会议有什么决定？

郭洪涛：中央在下寺湾召开的政治局会议，程子华和我参加了，是决定中央和红军的下一步行动计划。程子华讲了劳山战役和榆林桥战役以及当时第三次反“围剿”的情况。这次会议决定中央分两路行动，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到直罗镇，打击、消灭尾随之敌；洛甫、博古、刘少奇、董必武、林伯渠、王稼祥、李维汉等率领党中央机关、中央军委等非战斗单位去陕北苏区的中心瓦窑堡。

会后，我先回到瓦窑堡，动员了数千名群众夹道欢迎中央的到来，群众热情高涨，送茶送水，街道两旁红旗招展，到处贴着欢迎的标语，中央领导同志和干部也频频向欢迎的人群招手致意，大家都高兴得了不得，那热烈兴奋的情景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仍然记忆犹新。

我请中央领导同志到省委机关就餐。这顿饭比较丰盛，有海参、鱿鱼等佳肴。这些海味当时在陕北很罕见，是解放瓦窑堡后打土豪的战利品，中央领导同志讲，这么好的饭菜只在遵义吃过一次，这是第二次。在直罗镇，我

军取得了巨大胜利，歼灭敌军一个多师，打破敌人第三次“围剿”，直罗镇战役打完后，毛泽东、周恩来等先后来到了瓦窑堡。

访问人：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你们是如何解决其吃、穿问题的？

郭洪涛：中央到达瓦窑堡后，第一件事就是要解决红军的吃穿问题。中央指定林伯渠负总责，我通知西北军委供给部长白如冰和陕西省政府财政厅长艾楚南参加，并告诉说：部队需要什么，我们就发动群众解决什么，要粮食给粮食，要服装就动员群众去制，布匹不够，就拿钱到白区去购买，并将没收地主豪绅的猪、牛、羊送往前线，使红军战士都穿上了新的棉军装，改善了部队的的生活，大大鼓舞了士气。

访问人：1935年12月中央召开了著名的瓦窑堡会议。这次会议您参加了，一定了解不少情况。

郭洪涛：我是列席会议。毛泽东、周恩来回到瓦窑堡，正好张浩从苏联回来了，带来了共产国际关于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精神。于是，中央决定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这就是著名的瓦窑堡会议。会议是在张闻天的窑洞里开的，窑洞中间放着一张长桌，多数人围坐在长桌两边，个别人就坐在炕上。会上讨论了全国的政治形势和党的路线策略问题，军事战略问题。在讨论政治形势和党的路线策略时，对如何对待民族资产阶级的的问题发生了争论，这也是我第一次见到在党内最高领导层内的争论。毛泽东认为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有两重性，对中间势力是可以争取的，并指出我们在江西时，对十九路军的问题上有错误，我们本来是可以争取他们一起抗战反蒋的，但没有争取。博古不同意毛泽东的意见，他引经据典，还引了斯大林的话，就中间势力是最危险的敌人，不可能和无产阶级联合。毛泽东一点也不示弱，第二天再次发言，强调他说的这些是从中国的具体情况出发的，是合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最后他反问道：“难道这样做（指联合民族资产阶级中间势力），就是对祖宗不忠？对祖宗不孝吗？”博古哑口无言，往床上一躺不说了。

访问人：这次会议上的争论，其他人参加了吗？

郭洪涛：毛泽东和博古争得面红耳赤。

访问人：当时您是怎么看待他们之间的争论呢？

郭洪涛：感到很惊奇，从未见过这么激烈的争论。总的印象，觉得还是毛泽东有道理。而博古只是引用了斯大林的话，显得软弱无力。最后张闻天做结论，他和毛泽东的意见是一致的。

访问人：瓦窑堡会上毛泽东提出东征山西的战略方针，并得到会议通过。会后立即开始了准备工作，扩红成了一项重要任务。

郭洪涛：是的。周恩来亲自到陕西省委作了动员和布置，并派李维汉指导陕西省委的扩红工作。李维汉给我们介绍了中央苏区扩大红军的经验。我们的措施是组织突击队，每个县都派一个突击队去，并动员了几位女同志担任队长，比如李坚贞同志是秀延县的扩红突击队长。那时苏区老百姓参军的热情很高，分了田，废除了高利贷，取消了苛捐杂税，得到了实惠，一说当红军，群众都争先恐后地报名参加，当时那个场面非常热烈，先后两次扩红，扩大了9600人，壮大了红军。

访问人：关于东征，大家的意见似不甚一致，担心东征不能成功。

郭洪涛：东征的意义很大。出河北打日本，可扩大我党我军的政治影响；同时既可扩充红军，又可筹集军费。瓦窑堡会议上，大家对实行东征的意见

是一致的，没有人反对。决定东征时，我也发了言，意思是不要远离苏区，从黄河边向东推进，这样，进可以攻，退可以守。

访问人：红军东征时，有多少人？

郭洪涛：大概有二三万人。毛泽东、洛甫、彭德怀等都去了前线。由于蒋介石出兵 10 个师，阻挡我军东征抗日去路，毛泽东和党中央决定回师河西。毛泽东率领红军东征取得了伟大的胜利，打击了敌人，扩大了政治影响，扩充红军 7000 多人，筹集了大量的军需财物。通过红军东征，我对毛泽东更加敬佩。他调兵遣将，气派非凡。在刚打了直罗镇战役，喘了一口气，就在 12 月的瓦窑堡会议上决定东征，一环扣一环，别人是没这个战略气魄的。

访问人：毛泽东从东征回来，你去欢迎了吗？

郭洪涛：东征战役结束，他们先到了延长一带，以后才回瓦窑堡，回来后就准备西征。

访问人：这以后您去山东，到东北和毛泽东的接触就少了。1949 年 3 月毛泽东和中央领导人从西柏坡到北京，您曾亲自迎接毛泽东，是吗？

郭洪涛：是的。1949 年 2 月中央军委任命我为平津铁路管理局局长。我上任后的第一件大事就是迎接党中央领导同志安全进入北平。当时，李克农和滕代远向我交待，中央要从西柏坡迁到北平，由高碑店乘坐火车直抵清华园，你们要绝对保障安全。

访问人：中央为什么不从石家庄上车，而从高碑店上车呢？

郭洪涛：由于战争的破坏，当时北平往南的铁路只通到高碑店。北平刚刚解放，政治情况异常复杂。如果遭到敌人的破坏，就不得了。我们详细研究了铁路列车的指挥、调度、编组及各站值班等具体问题。行车调度由副局长刘英才亲自担任，并采用了安全措施，如每个车站只留下正线的一个道岔，其他都钉死了，而且各个车站派了两位可靠的同志负责看守。铁路专列由三趟同样的列车组成；前一趟为开道车，我坐在上面；毛泽东和中央领导同志乘坐中间的一趟列车，最后一趟列车串警卫人员乘坐。专列上一时找不到可靠的炊事员，为防止意外，暂由副局长刘建章从老区带来一个炊事员跟车。他只会做拉面，我又派人买了一些罐头。制定了详细周密的方案，经李克农电报中央，得到了批准。

3 月 25 日上午，我随列车到高碑店迎候毛泽东和中央领导同志。不久，他们就来了。毛泽东还是当年在延安我见到的那样，目光炯炯，神采奕奕，他看见我，微微一笑，我急忙过去握住他伸出的手，他见我头戴一顶旧水獭皮帽，身穿一件皮大衣，风趣他说：“你这‘土包子’变成‘洋包子’了。”周围的其他人都笑了。刘少奇给我介绍了王光美同志，周恩来和我打招呼后，便问列车的安全情况，我向他作了汇报，他满意地点点头，说中央感谢你们。

访问人：当时同毛、刘、周一同乘火车进京的还有哪些中央领导？

郭洪涛：还有朱德、任弼时、董必武、林伯渠、王稼祥等。所以，我们觉得责任重大，非常谨慎，列车启动以后，我在第一趟车上，目不转睛地注视着前方，惟恐出一点差错。一路上全线绿灯，顺利地抵达了清华园车站，毛泽东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乘汽车前往香山，我们圆满地完成了任务。

1993 年 5 月 28 日于北京月坛北街

## 访林一山——延安党的全国代表会议前后 林一山

林一山，1911年生，山东文登人。193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9年后任水利部长江水利委员会主任，水利部党组成员、顾问，水电部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主任、顾问，六届全国人大常委，国务院财经委员会委员等职。

时间已经跨越了半个多世纪，当时的热血青年，今天已是耄耋之年。回顾起那一段历史，老人有着很多的感慨！

访问人：林老，您好。抗日战争爆发前夕的1937年5月，党中央在延安召开了全国代表会议。我们知道您参加了这次大会，想请您谈谈会议前后的情况。

林一山：那次会，会场上红布横幅上写的是中国共产党苏区党代表会议。后来在党的正式文件中，称为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会议开始时，毛主席在大会上说，我们苏区党代表会议，实际上是全国党代表会议，为什么不这样叫呢？是为了减少对国民党的刺激。因为我们正在举行国共合作谈判。会议是1937年5月2日至14日在延安召开的，我参加了全部会议。这次会议之后，接着又开了白区党的工作会议，因为有其他情况，我只参加了开幕，没等会完，就回了北平。

访问人：你是作为会议代表参加的吗？

林一山：是的，我们一起参加会议的北平地下党的同志，还有黄敬、杨学诚、李昌，共4位。黄敬是北平地下党的书记，杨学诚是清华大学党支部的书记，我是北师大中心党支部的书记，李昌是北平民先总队的队长，我们4人是一起走的。

在走以前还发生了一件很有趣的事。1936年12月12日，发生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由于我们党的和平主张，事变得到了妥善解决，准备放蒋介石。这个消息传到北平，我们的朋友斯诺和他夫人知道后很着急，尤其是斯诺夫人（即尼姆·韦尔斯）更是睡不着觉，她找到黄敬，说全世界的共产党我最爱的是中共，而你们第一次同他合作时上了大当，好不容易这次抓着了，又要放，你们中共又要吃亏，我睡不着觉，看来也活不成了。黄敬和她讲了很多道理，从我们党为什么主张放蒋介石，到实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说了半天，她仍不信，还是认为我们党放蒋介石是放虎归山。黄敬没办法，只好说我说不服你，有机会你去陕北，听听毛主席的意见。这样，地下党就准备让我陪她去陕北，我一听心里有点急，一个中国人带一个洋女人，那时的斯诺夫人又年轻又漂亮，带个洋人走路是很显眼的，还有保密问题也很难办。国民党特务可不讲这一套，走到半路出事怎么办。我当时很担心这个问题。后来斯诺亲自坐车到北师大来找我，赶巧我不在，他就留了一张英文名片。别人也奇怪，怎么一个外国人来找林一山。斯诺找我也是商量送他夫人去延安的事。到我们走时，组织上也感觉让我带斯诺夫人不合适，因为我不是燕京大学的学生，我若是燕京大学的，斯诺是燕大的教授，那还好说，我的公开身份是北师大的学生，要让国民党特务抓去，怎么辩也辩不通。好在到走时没叫我带。黄敬我们一起走的。后来据说委托东北大学校长玉卓然通过燕京大学这个关系带斯诺夫人去陕北了。

我们原来开会的地点不在延安，是瓦窑堡。当时延安由东北军占着，我们刚到，开会地点临时变了。为什么呢？因为东北军和我们党订了协议，他

们把延安让了出来。这就是有名的红军跑步进延安。我们到延安时，环境还没有来得及清理，满街的摊贩，不少是卖鸦片烟、鸦片枪的。

在进延安之前，从西安出发一过渭河，住旅馆，一进门也是鸦片盘子，黄敬当时很风流，他见到拿起来就抽，看起来还很内行的样子。

访问人：你们在延安见到斯诺夫人了吗？

林一山：斯诺夫人先我们到了，我们是在大街上看到她的，戴着红军帽，穿着红军的衣服满街走，非常显眼。我原来在燕京大学见过她几次，斯诺已经访问过陕北，见了毛主席、朱总司令、张闻天、彭德怀等，照了很多红军的照片，当时英美反对日本独占中国，燕京大学校长是司徒雷登，他支持斯诺采访红军，对我党的抗日政策也同情。在司徒雷登办公室中间悬挂的白银幕上，曾放映过斯诺拍摄的红军纪录片，还有彭德怀等人的人头像，斯诺夫人作讲解，还开玩笑说，这个头值多少钱，以讽刺国民党悬赏杀共产党人头，引得大家

都笑。因此我们都是熟人了，见面后我们另一位同志问她，你思想通了吗？她说完全通了，毛泽东说得对，应该放蒋。

访问人：这时她见过毛主席了？

林一山：她一到延安，当天就和毛主席谈了一个通宵，她提的问题，毛主席都给予了解答。看她当对的样子，很满意。

访问人：你们没有和她一块见毛主席？

林一山：没有，她单独见的。我们是去开会的代表，时隔不久，就开会了。

访问人：《毛泽东选集》记载，会议是从1937年5月2日至14日开的。

林一山：5月2日开幕，第二天，即5月3日毛泽东就作了报告，这个报告就是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上的《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一文。听完毛泽东的报告，就分组进行讨论，讨论过程中毛主席曾到我们白区党的小组来听讨论情况，我向他提了一些问题。

访问人：您提了些什么问题？

林一山：一个是同国民党合作的问题，一个是关于三民主义的问题，一个是苏区五次反“围剿”的经验总结问题，还问了一个林彪的短促突击论对不对的问题。为什么我提这些问题，因为当时我想研究中国的苏维埃运动、红军战史和毛泽东军事思想，这时我已经看了很多材料，而且还有许多绝密的材料，脑子里有许多问题，那时年轻，思想又单纯，想什么就说什么，好不容易见到毛主席就向他提了出来。关于同国民党合作的问题，当时党内也有不同意见，也有一些混乱思想，有的同志就不赞成同国民党合作抗日，当然这还是受到“左”倾思想的影响。我认为应该同国民党合作，因为形势变了，全国人民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危险，但同国民党合作要提高警惕，要防止蒋介石叛变。在北平时，我就将自己的意见写成书面报告送给中央，到延安后，中央同志对白区来的同志很重视，博古、张闻天都单独找我谈过。博古同我谈得很好，他赞成我的意见。不想在和张闻天谈时，发生了争论，可以看出来他不同意我提出的在统一战线中对蒋要警惕的意见。张闻天问我，这个报告是你写的，我说是的，他说，你这个意见是不对的，是个小老婆思想。我反驳说，这怎么成了小老婆的思想，我这是列宁主义的意见。他说，你主张今天跟这个合作，明天跟那个合作，这不是小老婆吗。我说，列宁主张跟同路人合作，尽可能争取同路人走到底，就是不能走到底也要尽量把路走远

一些，中途有退出的可以允许，退出后再来的也欢迎。我说这是列宁的主张，怎么成了小老婆。他说，我们跟国民党合作就是跟蒋合作。我说从总的方面这样说可以，蒋介石还不敢轻易叛变，但他也可能叛变，我们思想上要做这个准备。我们还是力争他不叛变，相信他不敢随便叛变，但也要做另一手准备，如果他叛变了怎么办？到最后我问他，谁敢保证蒋介石不叛变？他没话说了。这次辩论我也得罪了他，以后在东北，又有几次我也对他提过不同意见，从此有积怨，他对我一直不好。当然那时不知道后果。

访问人：这个问题你向毛主席提过吗？

林一山：毛主席来参加我们的小组会我就向他提了，毛主席同意我的意见，说我的观点同中央是一致的。毛主席说，万一蒋介石叛变了，无非再打10年，我们党比国民党年轻，我比蒋介石年轻十岁。我又问了三民主义的问题，认为三民主义问题有群众性，是个大问题。毛主席回答说，在三民主义问题上我党是有教训的，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在群众中是有相当影响，而且它本身也是有进步意义的。但从蒋介石叛变革命后，我们党把三民主义的旗子丢掉了，而蒋介石却把这个旗子打起来了。那么怎么办呢？我们方针是你打三民主义的旗子，我打得比你高，说到这儿，他很形象生动地把手举起来，表示把三民主义的旗子举很高。毛主席在他的报告中也专门讲了三民主义的问题，提出“重新整顿三民主义的精神”，并阐述了共产主义和三民主义的关系，重申：“我们不但拒绝三民主义，而且愿意坚决地实行三民主义，而且要求国民党和我们一道实行三民主义，而且号召全国人民实行三民主义。……为民族独立、民权自由、民生幸福这三大目标而奋斗。”这些话，我当时都亲耳听过，至今记忆犹新。

访问人：刚才您说向毛主席还问了林彪发表的论短促突击的问题，他是怎样回答的？

林一山：这也是我在小组会上向毛主席提的，为什么我提这个呢？刚才我说了，我想研究红军战史，看了一些材料，包括绝密的第五次反“围剿”的军事总结，我向主席说，这是我们红军的宝贝。毛主席说：就是敌人拿去了也不能用，这些东西他学不会，但到了蒋介石手里总是对我们不利。接这个话题，我提到林彪的短促突击论，因为这篇东西我是从西北剿匪总司令部印发的小册子上看到的，据说是从巴黎出版的《救国时报》转载的，想知道是不是真是林彪写的。毛主席很严肃地回答说“那是错误的”。那时林彪的威信很高，同时在党内一般的高级干部中不能随便讲另一个人的缺点错误，毛主席这样回答，当时给我的印象是这个问题太严重了，他是提醒我不要上当。但为什么错，他没有细说。直到后来我更多地了解了红军在江西的10年奋斗史，才知道这个问题的来龙去脉。

访问人：听说在那次全国代表会议上，你们从白区来的同志对毛主席的报告有不同意见？

林一山：这里指杨学诚和李昌的发言，我们在听了毛主席开幕时作的报告后，在小组会讨论时，他俩对毛主席报告中的第一句话，即“由于中日矛盾成为主要矛盾、国内矛盾降到次要和服从的地位而产生的国际关系和国内阶级关系的变化，形成了目前形势的新的发展阶段”，表示不同意见。其实这是个很幼稚的意见。那时我们都年轻，20岁左右，脑子里想什么就说什么。杨学诚不仅在小组会上说，还到大会上去发言，这就引起了争论。毛主席搜集了一些意见，又在会议结束时作了结论性报告，回答和反驳了错误意

见。这个报告也收入了《毛泽东选集》，这就是那篇《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一文。

访问人：党的全国代表会议结束后，又接着开了白区党的工作会议，您参加了吗？

林一山：我只参加了开幕，后来的会议没有参加。因为当时我们4人中，黄敬、李昌已不是学生，没有学籍，我和杨学诚还在念书，有学籍。学校是有规定的，每年请假不能超过多少时间，超过就要开除。我和杨学诚说，白区党的工作会议还不知开多长时间，我们的假期快到了，索性留中央党校学习算了。当时罗迈（李维汉）是党校校长，成仿吾是教育长，我们去那里，他们很欢迎。我这样说，杨学诚也同意。但跟中央一提，中央不同意，说那可不行，红军经过长征减员不少，白区党的干部更宝贵了，苏区想派都派不出去，你们有关系，有职业掩护，生了根，怎么能离开白区呢，赶快走。所以，过了开幕式，听完少奇的报告后，我和杨学诚就回了北平。回到北平，已是6月份。时隔不久，七七事变就爆发了，形势急转直下。中国的抗日战争正式开始了。

访问人：现在看，那次会议确实解决了许多问题。

林一山：这是在中国历史的一个转折关头开的，非常及时，也非常重要。它统一了全党的思想，特别是澄清了一些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上的糊涂观念，统一了步调，为我们党从国内革命战争顺利转入抗日战争做了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准备。

1993年3月于北京

## 访林默涵——毛泽东三篇著作对我人生道路的影响

林默涵

林默涵，1913年生，福建武平人。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解放后任政务院文教委员会办公厅副主任、中宣部文艺处长、副部长兼文化部副部长、中国文联副主席。现任中国文联党组书记，鲁迅研究会会长，《中流》杂志主编。著有杂文集《狮和龙》、《浪花》，文艺论文集《在激变中》，专论《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旗帜》、《林默涵劫后文集》等。

林老长期担任文艺界的领导工作，是一位有影响的著名文艺理论家。他畅谈了毛泽东对他人生道路的影响，使人感受到他们那一代人的追寻，那一代人的奔腾……

访问人：您做了多年的文艺领导工作，经历了建国后的许多运动，像《武训传》、《红楼梦》的讨论，以及胡风问题等等，就您所经历的能给我们谈谈这些情况吗？也算是对毛泽东文艺思想的体会？

林默涵：文艺方面的事情大多了，我谈得也够多了，不想再谈这些事情。我还是给你们谈谈毛泽东对我影响最深的几篇文章，也就是《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和《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三篇。因为这三篇文章给我影响很深，对我奔赴延安，指导我的人生，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访问人：您是什么时候到延安的？

林默涵：1938年。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是那一年发表的，它在最关键的时刻发挥了最关键的作用，指出了抗战的前途和国家的命运，也使我的思想产生了一次最重大的变化。我就是因为看了《论持久战》，才萌发了去延安的愿望。

访问人：您是从哪里去延安的？从上海吗？

林默涵：不是，我是从武汉去的，早先在上海。上海失陷后，我去了一个国民党的部队，这个部队的司令是张发奎。张本人还是比较进步的，北伐战争时期有个第四军，就是张发奎率领的，叶挺独立团是他的部队。张在北伐时期比较进步，而且和郭沫若熟悉。

访问人：那时，他的部队在武汉周围？

林默涵：他是战区司令，但没有实际部队。因为他几次反蒋，反又拥蒋，蒋对他一直不放心。到抗战时期，因为他是老军人，还有号召力，蒋介石还是给了他一个位置。他让郭沫若介绍一些人到他的部队去搞文化宣传工作，郭老介绍了一批人。这批人都是左翼知识分子，其中有写“大刀向鬼子头上砍去”的麦新，有写救亡进行曲的孙慎，还有老共产党员、文化名人钱亦石等等。他们到了张发奎司令部组织一个战地服务队，队长是钱亦石。在上海时钱亦石曾主编《世界知识》，我在他手下负责《世界知识》的一个小栏目《科学与发明》，专门介绍世界科学知识动态，各国科学的新发明等等。因为这个关系，我向钱亦石提出也到他的队里去。那时上海已经失陷，我没有心思安心伏案工作了，只想着要为抗日救亡做点事情。所以向钱提出了这个要求，钱同意了。于是我到了张发奎的战地服务队。

访问人：你们的战地服务队住在哪里呢？

林默涵：先是在上海的青浦，后又退到浙江的嘉兴一带。那时日本人的攻势十分猛烈，中国的地盘每天都在缩小，所以我们一退再退。在青浦的时候敌人的飞机总是在头上飞，天天轰炸，我们既没有防空洞也没有力量驱赶

这些飞机，就躲在乡下的破房子里眼睁睁地挨炸。尤其日本人在金山卫登陆，国民党军哗哗地往后撤，一溃千里。这时大家的情绪就很不稳定了，再加上钱亦石不在（去上海治病，不久逝世），服务队乱得很。当时的南京、武汉还没有丢，人们就商量着到武汉去。这样我也碾转到了武汉。

访问人：到了武汉您就看到了《论持久战》是吗？

林默涵：是的。到武汉之前我顺路去了杭州。杭州是我国最美的城市之一。心里想着趁日本人还没有占领，先去看一看，再看以后就去不成了。结果杭州一片萧条，一座偌大的城市连一名警察也没有，都跑了。当时我们的心情是苍凉的。面对日本人的进攻，尽管国民党的口号喊得很响，要保卫这儿，保卫那儿，胜利一定是我们的，结果没等敌人来就先跑了。怎么办呢？感到非常茫然。我到了武汉，武汉有郭沫若的第三厅，不少人去了那里，我觉得第三厅的文人很多也不太愿意到三厅去，就到柳提主编的《全民周刊》工作。那时胡绳也在《全民周刊》，并小有名气了。不久，武汉又发生危机，蒋介石提出一定要保卫大武汉，但是人们已不相信能守住了，因为南京他也是这样说的，还不是照样丢了嘛？在这种情况下，人们的思想一片混乱，完全是一种无所适从的样子。大概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我看到了毛泽东撰写的《论持久战》。

访问人：您看到的是小册子还是报纸？

林默涵：是《解放》周刊。我看到的时间也就是1938年7、8月的样子。我是在武汉郊区的山上一口气读完的。越看心里越亮堂，越看越高兴。中国不会亡，但也不会速胜。我从心底里呼出了这句话。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分析了日本，分析了中国，分析了中国的历史和现状！分析了中日战争的性质，世界各国的动态，回答了为什么不会亡国，又不有速胜的一系列问题，提出中国的抗日战争分三个阶段，战略防御阶段、相持阶段、反攻阶段，在这三个阶段各应采取的办法等等，毛泽东都作了非常详尽的论述。我过去怎么也想不清的问题，现在觉得一下子全清楚了，心里有底了。当时奇怪得很，仿佛自己换了个人一样，由茫然变得有信心了。

访问人：所以您鼓起勇气去延安，去见见毛泽东是吗？

林默涵：是的。当时我想，在日本人猖狂进攻的情况下，为什么其他人讲不清楚，蒋介石讲不清楚，为什么国民党表现的毫无秩序，或者说惊慌失措的样子，毛泽东能讲清楚，共产党显得胸有成竹呢！关键是中国共产党掌握了马克思主义这个武器，他们用马克思主义来分析、研究中日战争的形势，决定救亡的办法，预测战争的未来，所以得出了叫人信服的结论。这样我决定到延安去，到延安的马列学院去学习马列主义。当时延安有名气的学校还有抗大、鲁艺等，我都不想去，一心想去马列学院学马列，觉得自己大没有马列主义了，所以糊涂。

访问人：看来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对您的影响非同一般，某种程度上说，改变了您的人生道路。那么您是怎么去延安的呢？

林默涵：我首先向柳提提出了自己的想法，柳把我介绍给凯丰，凯丰又写信给张闻天介绍我去。张闻天当时是马列学院院长。我拿着凯丰的介绍信同演员吕班、田蔚一块去了延安。到延安后我直奔马列学院。第一天没有见到张闻天，先找到秘书长朱光，说明来意。张闻天的办公室就在马列学院附近，当我第二天见到他的时候，他非常痛快，当即答应了，让我进第二班。但第一班的课还没有讲完，剩有列宁的战略与策略，这门课是张闻天亲自讲

的，他让我听听这最后一课。最初的时候，还让我进了马列学院的编译室，因为我懂点日文。我过去曾翻译了一本书，书名是《人类的婚姻发展史》，这本书的原作者是苏联人，由日本人译成日文，改名为《唯物恋爱观》，我又按日本版翻译成中文，其实原来的书名挺好，没必要更换书名。

访问人：去延安之前，您已是中共党员了吗？

林默涵：不是党员，是共青团员。到了延安才入党。我做社会工作的时间比较早，大约在你们还是上学的年岁，我已经做社会工作了。引导我走上革命道路的是我高中的同学，我们两人很要好，他家里穷，吃饭连伙食钱都交不起，我知道了就替他交，因为我的家境还比较好，年轻人又比较热情，所以我做衣服就做两套，买皮鞋也买两双。

访问人：您的这个同学叫什么名字？

林默涵：他叫姜树民。当时他已经是共产党员了，担任福州团市委宣传部长。他还是一个很有才气的青年，文化水平也高，他写了不少白话诗，在福建的报纸上发表。我对文学的爱好也是他启蒙的。那时我从偏僻的山区走到城市，山区的文化很落后，所以我的文化水平也很低，什么新文艺作品都没有看过，是在他的介绍下读鲁迅、郁达夫的作品，郁达夫的作品比较好读，鲁迅的作品似懂非懂，是以后慢慢才读懂的。也是在他的影响下，我才知道了共产党、国民党的区别等等。他见我富有同情心，又痛恨现实社会的黑暗，就介绍我加入了青年团。慢慢地我也学着写点白话诗，在刊物上发表，那调子“左”得很，什么打倒土豪劣绅，剥他们的皮等等。当时根本不懂得做地下工作，结果学校盯上我了，呆不下去，我只好离开福州到上海。从此我和姜树民同学分手就再也没有见到过。建国后，多方打听，也不知他的下落。

访问人：您是哪一年到上海的，到上海和党组织接上关系没有？

林默涵：大概是1929年。到上海要和党组织接上关系比较难，因为党在上海也是秘密的，我是由福州市委入团，要把组织转到上海，必须从厦门省委转才行。转不了关系，朋友介绍我到艺术大学，说里面有很多好教员，如黄药眠、阳翰笙等。于是我到艺大旁听，也就是不交学费偷听。因为家里不同意我去上海，所以断了经济来源。黄药眠、阳翰笙的课我都听了，觉得很受启发，他们讲得真是好极了。当时日本人抓中国留学生，学校闹起风潮，我很积极地参加了进去。学生中派别很多，有国民党的、国家主义派的，也有我们地下党。我那时因为关系没转到，就和一个同乡自己干，自己编墙报，晚上贴出去。白天大家看了不知道谁贴的。学校的党支部也不知道。那时的情况很乱，同学们也不知道我不是正式学生，还把我选为学校学生会负责人。

我是在马列学院正式入党的。我是第二班学生，我爱人是第三班。说到去延安，我还想再重复一遍，我之所以去，受影响最深的就是《论持久战》。因为那时内心最焦虑，抗战能不能胜利，喊口号都是抗战必胜，最后胜利是我们的，总感觉那是空的，只有毛泽东讲的才是实实在在的，说服力很大。我当时精神状态很特别，看完后觉得什么问题都解决了，一下子轻松了，思想影响就这么深刻。

访问人：您到延安见到毛泽东了吗？

林默涵：没单独见过，倒是在公开场合常常见到。因为他经常出席一些会议，到马列学院讲课等等。

访问人：这是《论持久战》对您的影响。那么《新民主主义论》对您的

影响是什么？

林默涵：我是 1938 年去的延安。 1939 年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蒋介石缓过手来，又开始限共反共，民族资产阶级也从中间活动，企图建立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在我们党内大家的认识也不很一样，有的主张服从国民党，担心破裂统一战线，有的要直接搞社会主义。也就是说这样的中国向什么地方去呢？抗战胜利后建立什么样的国家呢？这是摆在每个人面前的很现实的问题，也是天天要遇到的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人们工作起来就会觉得心里没底。也就是在这样的时候，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回答了这些问题。

《新民主主义论》是毛泽东 1940 年 1 月 9 日在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作的讲演，题目是《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当时我已离开了马列学院，到文协筹备处工作，所以毛泽东讲话的时候，我也在场。听了他的讲话，真觉得豁亮。革命必须分做两步走，第一步是新民主主义，第二步是社会主义。要在中国建立大资产阶级专政，或者民族资产阶级专政，或者直接搞社会主义都是不可能的。为什么不可能，为什么中国革命必须分两步走，他深刻地分析了中国的历史，世界的历史现状，以及他们的发展趋势，分析了中国社会的各阶级，规划了新民主主义社会的蓝图，讲得句句在理，给你的感觉前途是明确的，放开手脚干就是了。

我之所以对《新民主主义论》印象深刻，还有一个原因。毛泽东在文协讲演之后，正好《中国文化》创刊。创办《中国文化》是在张闻天的窑洞里商定的，我记得除了张闻天、艾思奇，还有周扬，我也到场了。艾思奇当时是文协主任，丁玲是副主任。《中国文化》由艾思奇主编，我协助他做具体工作。当时大家都很忙，实际上主办《中国文化》的也就是艾思奇和我两个人。从组稿、发排、校对到跑印厂都是我一个人。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就在《中国文化》的创刊号上作为发刊词发表，这也是我没有想到的。

接过毛泽东的稿件，我们就开始编排，跑印厂校对。印《中国文化》的印厂不在延安，远在六七十里路以外的安塞。本来毛泽东对自己的文稿一贯是很认真的，要亲自校对，因为安塞很远，交通也不方便，他也只好作罢，就由我全包了。我借了一匹老马，到安塞去看清样，校对。那马虽然很老，但很“负责任”，走起路来相当稳当，不要滑，给我印象极深。当时我知道毛泽东的这篇稿子很重要，反复看了几遍，生怕有错误，才最后开印。

访问人：据我们了解，毛泽东的讲演是 1 月 9 日， 15 日补充修改成文。《中国文化》2 月 15 日刊出，在当时的印刷条件下，真是够快的。

林默涵：我们是加班加点干出来的。出版后毛泽东没有说哪里还有错，为此我也很得意。

访问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 1942 年的事情，对您影响很大，表现在什么地方呢？

林默涵：毛泽东在发表讲话前，找了很多文艺界的同志谈话，了解他们对文艺工作的意见。

访问人：毛泽东也找过您？

林默涵：没有。我本不是文艺界人士。但是有一天突然接到要我出席座谈会的请柬，打开一看，两个人署名，是毛泽东、何凯丰。请柬上写着：“为着交换对于目前文艺运动各方面问题的意见起见，特定于 5 月 2 日下午 1 时半在杨家岭办公厅楼下会议室内开座谈会，敬希届时出席为盼。”当时我感

到很奇怪，为什么邀请我？我想可能有两个原因：一是抗战爆发前我曾在香港参加过邹韬奋主编的《生活日报》、《大众生活》工作，韬奋去世后，大家将华北书店改名为韬奋书店，实际上就是三联书店。后来我又到三联书店工作。延安也办了华北书店，是韬奋书店的分店。毛泽东、凯丰发给我的通知就发到了华北书店。我想如果真与这有点关系的话，大概是凯丰知道我的情况。这是我猜想的一个原因。另一个原因可能是这样的，当时的延安有几个人写杂文写得不好，对延安批评得很多，我那时在书店里经常看到重庆来的材料，那里面国民党攻击我们的东西很多，所以我针对国民党的言论也写了一些杂文，专门驳斥国民党。这和王实味不一样，后来我看到丁玲写的文章（她当时是《解放日报》文艺版的主编），她说，杂文很不少，但杂文也不都是一样的，有攻击延安的，有的人写的杂文就很好，例如林默涵、许立群、田家英等。她还举了几个人的名字，我记不起来了。我想让我出席座谈会，大概与此也有关系。

访问人：整个座谈会您都参加了？

林默涵：参加了。

访问人：听了毛泽东的两次讲话，您当时的感受和前面的两篇文章一样吗？

林默涵：是一样的。这一篇很对我的心思，完全能够接受，没有什么格格不入的地方。我觉得毛泽东讲的，也正是我自己想说的，但没有他那么周到，那么好，概括得那么高。

最后我总述一下毛泽东的三篇文章：第一篇，他对抗战能不能胜利作了最科学的分析。第二篇，胜利后怎么办？那时他就提出了要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国家，不可能再回到蒋介石一党专政的老路上去，但也不可能马上建立社会主义国家，要经过一个新民主主义阶段，逻辑非常强。第三篇，他解决怎样才能胜利，解决干部世界观问题，干部要和群众相结合，要为人民服务，这是根本问题。所以我认为《讲话》不只是文艺问题，是讲整个世界观问题，干部和群众的关系，如何为人民服务的问题。这些问题解决了，我们的党，我们党的事业才有后来的兴旺发达。

1993年9月2日于北京南沙沟

## 访郑新如—— 50年代对资改造的断想 郑新如

郑新如，1922年生，四川自贡市人。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重庆《新华日报》工作7年，以笔名芦发表文章。建国后任中共中央统战部工商统战处副处长、中财委第六办公厅副主任。1979年任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组副组长。著有《论城市合作》一书（署名芦蕻）。

面对个体经济的增长，三资企业、独资企业的纷纷建立，人们不禁会问：50年代初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否必要？“早知今日，何必当初？”解答这个题目找谁呢？我们想到了郑新如同志，他不仅在研究这个问题上卓有成就，而且亲身参加了那场运动，为此，我们敲开了他的家门。

访问人：50年代我国经过国家资本主义完成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对于这一历史事件，当时，无论国际、国内都有极高评价。近年来，随着改革开放的进展，各种非公有制的经济有了很大的发展，不仅个体的、私营的经济迅速增多，三资企业纷纷建立，外资企业也在逐步增加；有人提出：“既有今日，何必当初？”不难看出，这是对50年代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以下简称对资改造）的必要性和正确性有了不同的看法，你对此有何评价？

郑新如：我个人认为，研究、考察50年代的对资改造，像对待任何重大的历史事件一样，应该遵循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联系当时的历史条件和我国的基本国情，全面地、历史地进行考察，而不能片面、孤立地看问题，列宁说过：“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范围之内。”从我国的情况看，全国革命胜利后，建立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但在国际上还面临着帝国主义对我们的封锁、孤立；国内的反革命残余势力还在进行顽强的垂死挣扎，民主革命的许多未了任务亟待完成。国内的经济形势是：近代中国经济的发展十分落后，并遭到长期战争的严重破坏，人民政权没收了反动的官僚买办资本，建立了社会主义经济，掌握了国家的重要经济命脉，在国民经济的五种经济成分中居于领导地位；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还占有相当大的比重，但处在被领导地位；农业、个体手工业经济则是一片汪洋大海。新中国面临的首要任务，是要迅速地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把中国建设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中国共产党在建国前夕就明确指出：由于中国经济还处在落后状态，私人资本主义经济还是一支不容忽视的力量；更由于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在民主革命期间，常常采取参加或中立的立场，人民政权建立后，对私人资本不能采取剥夺、消灭的政策，而要尽可能地利用城乡私人资本主义的积极性，以利于国民经济的向前发展。允许私人资本主义的存在和发展，但并不是任其不受限制地泛滥，让它同社会主义互不干扰地平行发展，走资本主义的老路。根据我国的国情和历史前进的方向，中国共产党制订了对资本主义经济采取利用、限制的政策，以便逐步地、和平地过渡到社会主义。实行利用、限制，在某种意义上说，也就是私人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量变过程的开始。

1952年，国民经济恢复的任务完成后，国际国内的形势有了新的变化：抗美援朝的胜利结束，和平、民主阵营的进一步巩固、壮大，为我国的经济

建设提供了外部条件；在国内，人民政权更加巩固，全国土地制度的改革已基本完成，农业开始走上合作化道路，各种经济之间的相互关系、阶级关系发生了深刻变化，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上升为国内主要矛盾，工人阶级力量进一步壮大，资产阶级的影响相对削弱。国家即将开始实施第一个五年建设计划，进入有计划、大规模的经济建设新时期。从国民经济发展的全局来考察，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已经不能适应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国家在利用、限制私人资本的同时，有必要对它进一步实行变革。在全面考察建国后三年来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变化，总结了我国国家资本主义发展的实践经验后，我们党提出：经过国家资本主义的各种形式，用和平赎买的方法，完成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一政策不是任何人的主观意志产物，而是完全符合我国国民经济发展客观规律的。

访问人：很明显，您对此是持肯定态度的，那么，您认为它所取得的成就是哪些呢？

郑新如：成就是巨大的。通过国家资本主义的途径，采取利用、限制、改造的方法，终于比较顺利地完成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实现了对资产阶级的和平赎买，成功地把资产阶级中的绝大多数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它开辟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在这场巨大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中，社会安定，社会生产和商品流通不但没有停滞和遭到破坏，而且得到了发展。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为此后的一切进步和发展奠定了基础。我认为，历史的经验需要认真的总结，离开具体的环境、条件，用现行政策否定过去的一切，是决不可能科学地总结历史经验的。我们现在实行的改革、开放，是在我国已经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虽然还只是它的初级阶段），创建了比较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上进行的，没有过去又何来今天呢？

访问人 这一战略决策的形成必定有一个过程。您能简单地作个回顾吗？

郑新如：我想从两方面谈谈个人的认识。一是对国家资本主义理论的探索和认识的逐步深化：一是利用、限制、改造政策的形成。

作为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形态的工商企业，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在部分解放区就曾经出现并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对支援革命战争，保障军需民用，繁荣解放区经济起了积极作用。据目前见到的不完全材料，1942年2月，陕甘宁边区就建立过公私合营的裕顺通股份有限公司。1947年，冀中行署对泊头市永华火柴公司实行公私合营，这在当时的华北解放区是规模最大的火柴工业。1947、1948年，东北解放区的北满根据地（基本包括现在的黑龙江省），发展了多种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性质企业，如公私合营、加工、订货、经销、代销和出租林场、牧场等。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多种形式的早期实践，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同志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思想，并为国家资本主义理论的探索开阔了视野，拓宽了思路。

1948年8月，张闻天在总结东北解放区的经济实践后，明确指出：“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在东北是已经有了……所谓国家资本主义也就是使资本家的重要生产条件上依靠国家，和国家订立合同，国家给它一定便利条件，保证它一定利润为公家生产。”他不仅看出国家资本主义在现实经济生活中的存在，而且预见到它在新民主主义国家经济构成中的地位。同年9月，张闻天写成《关于东北经济构成及经济建设基本方针的提纲》，经中共东北局常委讨论通过报告中央，得到《提纲》“很好”的肯定评价，并准备转发全党，

作为各解放区经济建设的方针。《提纲》提出东北解放区是由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小商品经济五种经济成分所构成。这是从理论高度首次把国家资本主义作为新民主主义经济构成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1949年3月，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决议对新民主主义经济构成作了更完整、更准确的阐述，指出：“国营经济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社经济是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加上私人资本主义，加上个体经济，加上国家和私人合作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这些就是人民共和国的几种主要的经济成分，这些就构成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形态。”同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明确规定：“国家资本与私人资本合作的经济为国家资本主义性质的经济。在必要和可能的条件下，应鼓励私人资本向国家资本主义方向发展，……”《纲领》列举了加工、合营和租借等形式。这不仅标志着对国家资本主义理论在认识上的进一步深化，而且作为国家的基本政策确定下来付诸于实践。

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在多种形式下有了很大发展。由于没收官僚资本，发展了一部分公私合营企业。在国民经济改组过程中，为了稳定市场、保证军需民用和帮助资本主义企业克服暂时遇到的困难，维持和发展生产，政府大力发展加工、订货、统购、包销等一系列由低级到高级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据1952年统计，公私合营工业生产总值，较1949年增加5.8倍，在全国机器工业和工场手工业中所占比重达5.7%。政府对私营工业的加工、订货等约占全国机器工业和工场手工业生产总值的35—40%。至此，资本主义工业的主要部分已转变为国家资本主义。

国家资本主义的广泛发展，是不断总结实践经验，不断深化理论认识的结果。1952年10月，周恩来在提出如何通过和平转变进入社会主义时指出：“如经过国家资本主义的方式，达到阶级消灭，个人愉快。”这是把国家资本主义和对资改造联系起来，在理论探索上迈出的重要一步。1953年6月，李维汉在对国家资本主义进行系统调查、研究基础上，向党中央和毛主席提出关于《资本主义工业中的公私关系问题》的报告，将通过实践检验的经验总结为：“国家资本主义是我们利用和限制工业资本主义的主要形式；是我们将资本主义工业逐步纳入国家计划轨道的主要形式；是我们改造资本主义使它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主要形式；是我们利用资本主义工业来训练干部并改造资产阶级分子的主要环节，也是我们同资产阶级进行统一战线工作的主要环节。”这一报告得到毛主席的肯定，并把它提交党中央政治局讨论。经过中央政治局的两次讨论，党中央从理论、政策上肯定了通过国家资本主义完成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改造的正确性。同年9月，毛泽东同志在对工商界代表的讲话中明确指出：“经过国家资本主义完成对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较健全的方针和方法。”

这些回顾表明，关于国家资本主义的实践和理论探索，我们是遵循马列主义关于过渡时期的理论，特别是列宁关于国家资本主义的理论，借鉴苏联新经济政策时期发展国家资本主义的实践，结合中国革命的实际不断深化与提高的。从东北解放区把“出租”作为国家资本主义的重要内容，到《共同纲领》把“出租”作为鼓励发展的国家资本主义的形式，可以看到这种影响。

访问人：在遵循马列主义原则的基础上，我们是否有所创造和发展呢？

郑新加：当然有。理论上继承、有发展，实践上有借鉴、有深化。我

们对民族资本不是实行“没收”而是采取利用、限制的方针，实践上我们不是发展租借、租赁，而是发展加工、订货、统购、包销、公私合营等一系列由低级到高级的形式，适应各种不同情况，推进社会主义改造工作。以国家资本主义企业为基地，完成私营企业和资产阶级分子的双重改造；经过统一战线工作，培养和团结资产阶级中的进步分子，通过他们带动和影响更多的资产阶级分子，消除疑虑，提高社会主义觉悟；通过国家资本主义企业中工人劳动创造的价值，完成对资产阶级的和平赎买等等，这些方面极大地丰富了国家资本主义的内容，是对马列主义理论宝库的重大贡献。关于利用、限制、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政策，也有一个发展和形成的过程。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决议，明确规定对资本主义工商业采取利用、限制的政策。国民经济恢复时期，我们党确实没有提出变革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要求，但在国民经济改组过程中，为了帮助资本主义工商业解决生产、经营中遇到的困难，增加生产，促进物资交流，稳定市场，维持工人就业，国家大量发展了加工、订货、统购、包销、代购、代销等各种形态的国家资本主义，使私人资本在生产、流通、消费等环节上不同程度的发生了变化。实行利用、限制，在某种意义上说，就是变革的开始，是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量变过程的开始。1953年6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两次会议后，全国统战会议根据中央讨论的精神，把对资改造的方针概括为利用、限制、改造报送中央，之后在中央的总路线宣传提纲中得到肯定。李维汉在回忆录中讲道：“从1949年3月七届二中全会提出利用、限制私人资本主义，到1953年6月政治局会议明确为利用、限制、改造，这是全党指导思想上的一个飞跃。我国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和民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终于明确化和具体化了。”

访问人：有人认为：加工、订货以至公私合营等，建国前已经在解放区出现，党对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道路与方针早已明确地规定下来，1953年夏季不过是重新加以肯定，并不具有新的内容。对此，您怎么看？

郑新如：这种看法是把经济生活实践中出现的零星的、不自觉的行动，不适当地提高到自觉的、理论的高度来看待了。众所周知，无产阶级的革命理论、方针、政策，来源于实践，是千百万群众实践经验的概括和总结，并且要经过实践的检验，不断地得到修正、补充而逐步成熟与完善。利用、限制、改造的政策，正是在国民经济改组过程中，特别是经过1950年下半年和1952年10月两次调整工商业，国家资本主义已经有了很大发展的情况下，在广大干部、群众的实践基础上，共产党人以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深入考察建国以来私人资本的发展变化，系统地总结国家资本主义的发展经验之后，明确提出来的对资本主义企业和资产阶级分子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具体道路和方法。

访问人：如果再进一步考察，在肯定的基础上，对这一历史事件您觉得有什么失误和不足吗？

郑新如：历史发展是有继承性的。科学地研究和总结历史经验，是为了借鉴有益的经验，汲取失误的教训。对资改造这一伟大的社会变革，也难免有它的历史局限性。不承认失误和缺点，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近年来，理论界结合改革开放后的国家建设形势，多层次、多角度地就对资改造这一历史事件开展了深入的讨论，从这场社会变革的整体合理性，以及它的每一步骤和措施是否符合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提出了各自的看法。我认为，对资改造的失误可以列举许多，但主要的是：

第一，指导思想上求快、求纯，改造的步伐一再加快，最初规划要两个五年计划（到 1962 年）完成按行业公私合营，到 1955 年下半年，就提前到两年完成，以后又由两年变一年，一年变几月。脱离实际的求快、求全，造成工作上的简单、粗糙，遗留下的问题多。由于追求使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所有制成为唯一的经济基础，追求高度集中和全面的计划经济，忽视了必要的分散生产和分散经营，过急、过粗地进行裁、并、改、合，使部分企业失去原有特色，造成产品单一、质量下降、商业网点减少、流通阻滞。

第二，全行业合营高潮中把大批小商小贩、小手工业者、小业主等，不加区别地带进公私合营，一律称为私方人员，按资本家对待。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按党中央把原工商业者中的劳动者区别出来的指示，各地贯彻实施后所作的统计，合营高潮及其扫尾期间，作为私方人员按资本家对待的共计 86 万人，其中小商小贩、小手工业者、小业主共 70 万人，实际约 81% 是属于劳动人民范围。这样作，既挫伤了这部分原应属于劳动者的积极性，又使国家背上沉重的包袱，社会生产和流通中留下许多空隙无人填补，给人民的生活带来极大的不便。

第三，对资改造要求对企业和人的双重改造，即对资本主义企业和资产阶级分子的同步改造。1954 年，在有计划开展公私合营时，提出以企业为基地对资本家及其代理人进行团结、教育工作，使他们能充分贡献与发挥其经营管理经验和专业技术专长。刘少奇、陈云都曾强调指出：要把资本家的经营管理经验和专业技术专长，当作历史文化遗产继承下来，汲取有益的知识，提高社会主义企业的经营管理水平。但在全行业合营高潮以后，由于政治生活中“左”倾思想逐步发展，党的八大制定的正确路线被打断，导致 1957 年反右派斗争严重扩大化，在原工商业者和他们的代表人物中，一部分人受到错误处理。合营企业中的合作共事，团结教育工作遭到忽视，因而也影响到充分调动原工商业者为社会主义服务的积极性。时间的积淀，有利于人们对历史事件作出更清醒的判断。我深信随着研究领域的开拓，研究方法的改进，对这一场社会变革，一定能作出更加符合历史实际和历史规律的结论。

1992 年 7 月 31 日于北京前毛家湾

## 访杜润生——1955年前后毛泽东的变化并非突然 杜润生

杜润生，1913年生，山西太谷人。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中共中央华中局秘书长，中南局秘书长，中央农村工作部秘书长，中国科学院秘书长，国家农委副主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主任，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中国农业经济学会理事长，中国合作经济学会会长，中国农村信托投资公司董事长等职。长期研究中国农村问题，著有《中国农村经济改革》等。

杜老从事农村工作几十年，有着丰富的工作经验，这段历史又是他亲身经历的。几十年后的今天，当我们一起回顾时，老人的目光显得那样深远、深远……

访问人：中国农业合作化的高潮是在1955年。这一年毛泽东的思想变化比较大，党内的争论也比较大。省市委书记会议上，毛泽东曾激烈地批评当时的中央农村工作部，特别是点名批评邓子恢，说他犯了右倾错误。这个问题现在中央已经作了结论，认为邓子恢当时主张是符合实际的，并为他平反。这件事已过去38年了，人们回想起来，都认为1955年这场争论来得很突然，您现在怎么看？

杜润生：1955年的事情，从毛泽东同志本人说变化并不突然，他在1953年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已经完成了两个革命转变的思路。过去人们在许多场合听过中央领导说，非社会主义因素将存在一个较长时期。此期间要创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社会，建设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新民主主义的政治，要有个相对稳定的阶段，如果一个社会没有相对稳定的政策，就是说要建立新民主主义社会，在允许非社会主义因素存在的同时，又提出消灭它们，政策预期目标不确定叫人不可理解。

访问人：在逻辑上也说不通的。

杜润生：毛泽东同志恰好在建国初期提出主张：要即时开始并预期完成对农业、对手工业、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因而人们有突然变化的感觉。所以，很多人包括我在内，在头脑里的新民主主义，和毛泽东同志当时所理解的新民主主义是不一样的。他说：“新民主主义在桥上”，不是一个稳定下来的历史阶段，而是个社会制度新旧转换的过渡时期。不能讲什么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当时我们没有深刻领会毛泽东的这番意思。所以反映到实际工作中产生了矛盾。事实上，就和前苏联一样，前苏联是两个革命直接转变，夺取政权之日就是社会主义革命开始之时。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曾领导我们走出中国式道路，在建设社会主义方面，因生产力水平差异，同样设想力求另走中国式道路，结果就农业方面讲，还是以俄为师，土改后过快进入集体化。

访问人：列宁还搞了一个新经济政策，虽然时间很短。

杜润生：那是后来的事。从二月革命到十月革命，只有8个月就完成两个革命的转变。十月革命后有一个军事共产主义时期，列宁在逝世前，才提出新经济政策。从1928年始在斯大林主持下，改变了列宁的政策，很快完成农业集体化。我们原来设想似乎不是这样。有段时期，毛泽东说，新民主主义与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有共同点，“平均地权，节制资本”，允许资本主义存在和发展，要经历一个历史阶段。

访问人：毛泽东曾说，进入社会主义大约要15年左右。

杜润生：事实是 15 年后，还属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你看我们 1957 年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只用了几年时间。20 年后，消灭了资本主义又要让私人经济恢复，外国的三资企业也在兴起。现在重新肯定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要恢复市场经济以公有制为主，各种经济成分同时并存。总不能说又在提倡三资企业，同时就宣告要消灭三资企业，那人家还来吗。社会主义必须建立在物质文化高度发达的基础上。这样的社会制度转换要按世纪来计算，50 年至 100 年。

访问人：从哪一年开始算起？

杜润生：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起点是从 1957 年，因为在那一年建立了社会主义所有制。

访问人：您体会，毛泽东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新设想是什么时候提出的？

杜润生：1953 年 6 月正式提出。更早一点，1951 年关于山西试办合作社的争论，他就说私有制就应当动摇它。1952 年下半年提出设想，用 10 到 15 年时间完成向社会主义过渡。

访问人：正式提出是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时候吧？

杜润生：从那个时候明确地形成中央决策。搞新区土改时，还说富农经济一定要保留，因为保留富农经济对农业发展有好处，“富农放哨，中农睡觉”。他还说，“你们下去看看，家家户户都贴着对联：‘生意兴隆通四海，财源茂盛达三江’，老百姓都想发财，你能挡住？”这是 1950 年的事。

访问人：新区土改时，确实贯彻了这个政策吧？

杜润生：实际进行中没有完全执行。中央允许个别省区征收富农出租土地。不少地方把富农经济搞掉了，只是华东和西北某些省份没有征收。

访问人：有种说法，认为当时保留富农的政策，实际上是对着中农的，中国的富农经济哪有那么大？

杜润生：数量只占 5—6% 左右。毛泽东同志提出剥削收入量超过 25% 的就是富农，和外国比起来就不算是富家，前苏联的规定是有多多少少匹马，我们是看剥削关系。

访问人：我们的划分是不是要科学一点？

杜润生：这就如同雇工过 8 人就算资本主义的规定，不能说有什么标准根据，但有了个阶级划分标准文件，就算一个大进步。从照抄前苏联消灭富农政策，到有别于地主加以保留，也是一个进步。毛泽东那时肯定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对富农经济采取保留政策，是必要的。

访问人：请说说毛泽东在合作化运动开始后的变化。

杜润生：合作化初期，两件事，农民有了抵触。一个是粮食统购统销，搞得老百姓意见很大，突然把所有私人的粮店关闭，把市场经济完全取消，余粮统统卖给政府，老百姓多少年自由交换的习惯一下子改变了，大多数群众当然适应不了。而且征购的粮食一年比一年多，1954 年要的就够多了，1955 年又要增加，有些地方搞得口粮不够吃。这件事又和互助合作化搞到一块，土改才结束，农民正想在分得土地上好好经营一番，此时，却叫他们带上土地、农具参加集体，有些困难户还有要求，一般农户并不自愿，于是杀鸡宰羊、杀牛卖牲口、逃荒。周总理派人下去调查，我们农村工作部也派人下去，报来一些材料。起初对这个情况毛泽东是很重视的，对我们的一些建议，如不单纯追求办社数字，保证自愿，办好试点，留足口粮等，他都接受了，即时提出主张有的地方停下来整顿，有的地方慢一点，不要提什么时候进入社

会主义。然后有了三字方针，一曰停，二曰发，三曰缩。

但这时毛泽东社会主义革命新的基本思路已经确立，这是战略性的，不会轻易改变。上边三字方针只是战术性措施，因此和我们之间的一致也是暂时的一致。后来他亲自下去看，第一件事就是看到铁路两旁的麦子长得很好，他就认为说农民种田不积极是不准确的，麦子长得半人深，这么好的麦子，还能说老百姓种地不积极？第二件事，上海的柯庆施向他上报了些重要情况，最核心的是领导干部有三分之一对合作化是消极的，而这些同中央农村工作部控制过紧有关系，农村部散布消极思想，从而影响了下面。这正符合毛泽东的看法。于是他把南方各省市的第一书记召去，开了一个会，调子就变了。

访问人：这是哪一年开的？

杜润生：1955年4月。在这个会议上，毛泽东讲了重要的看法，说广大农民有社会主义积极性，这是主流，与此相反的现象都是支流。农村部这些人代表了支流。希望大家给合作社说点好话，代表主流说话。并对三字方针重新做了解释。

访问人：关于主流和支流的问题您怎么看？

杜润生：我现在也难以从理论结合实际的高度上、从哲学上，将主流和支流涵义解释明白。长期以来，我们总结工作，一般说到符合领导方针的东西就是主流，不符合的就是支流。在庐山会议后，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是主流，“文革”中把极“左”的东西说成主流。今天评价这种说法，就不能证明是对的。我只觉得，在这问题上容易出简单化。

访问人：不是采取分析的态度。

杜润生：毛泽东历来提倡处理问题要采取分析态度，可是他提出这个概念，却使人感到很难把握。难处在于：有时候被我们判定是支流的东西，却代表了群众多数人的动向与行为。如在中国农业合作化问题上，如果按生产力标准考虑问题，那么必须是当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小农经济容纳不下生产力的发展时，才是合作化的成熟时机。如果这是正确的，那么合作化必须和工业化相配合，不能离开工业化的发展程度，把合作化的规模一两年内搞得太大。化肥多一点、科学技术多一点、机械多一点，大量劳动者农外就业，劳动生产率有变化，才能使农业合作化获得物质基础。那时这些还都谈不到。在这条件下家庭经营的潜力还应充分利用，给农户一点可支配资源去自由发展是有利的。正是当时农民的一种愿望。当时农民当中，不只是富裕中农，一般中农也对入社抱怀疑抵触情绪，这是可以理解的。

访问人：农业基本上是手工劳动，几把锄头，一头牛，最多有部水车。

杜润生：就是说，生产更多靠人的因素。第二个问题是，在当时条件下，合作化规模搞得越大管理越困难，大农业需要现代型管理方法，对于农民说来，这要有一个学习过程，循序渐进，利于培养人材。另外，农民入社后和土地的关系疏远了，都变成了工人，劳动报酬靠记工分，对于生产的好坏可以不负直接责任。如果我们有办法能像工厂对劳动纪律予以监督也可以，但农业和工业不同，工业是集中在一个工厂里，农业劳动则是散在四面八方的土地上，完全靠自觉。靠自觉就要有某种直接性利益动机，离开利益推动，光靠教育是不够的。所以，主张慢一点，有准备有步骤地前进是对的。但这方面讲的多了，是不是混淆主流与支流的错误？这就难以把握了。那时我们坚持15年时间，这就够快了，这本是毛泽东同志原来所提的计划。后来他认

为土改后应乘热打铁，加快发展。他出于维护战略方向的需要，当别人反对他认为正确的东西时，他就逐条批驳，树立起了一个十分明确的对立面。

访问人：毛泽东有很强的挑战心理，喜欢挑战。

杜润生：邓子恢与毛泽东的争论，起源于合作社发展数字的变化，原定100万，毛泽东要加30万，邓子恢主张不动。这本来是可以妥协的问题。邓子恢还是坚持前一段的想法，不愿轻易改变。他反复说，太大不行，过快不行，没有会计不行，干部水平太低不行，毛泽东逐条加以驳斥，并看出邓子恢思想不好通，提出“必须大炮轰”。从此，着手编《怎样办合作社》一书，并决定召集七届六中全会扩大会议，来一次大辩论。毛泽东在最后大会总结中，就此问题，提出如下极其明确的结论：

这次会议，破除了很多迷信。

合作社大发展还是小发展？群众要求大发展。

新区能不能发展？新区也能发展。

山区能不能发展？山区也能发展。

灾区能不能发展？灾区也能发展。

落后农村能不能发展？落后农村也能发展。

少数民族地区能不能发展？除西藏、大小凉山外，少数民族地区也能发展。

没有资金能不能办社？也能办。

干部少能不能办社？也能办。

没有文化能不能办社？也能办。

大社能本能办？能办。

没有机器不能办社的空气也不大了。

毛主席历来主张战略上勇敢，战术上慎重，此时为鼓舞大家前进，反对保守倾向，慎重讲得少了。主张稳步前进的人，被视为“小脚女人走路”。看条件办事，说成是清规戒律。下边同志为避免右倾保守错误，把原来一直强调的“由点到面，由少到多，由低到高，循序前进”的工作方法，当作应该抛弃的清规戒律，一定要快、要高、要大，造成一股潮流。那时毛泽东的威信非常之高，过去对时局估计，每言必中，如解放战争中，说消灭国民党多少个旅，每次都实现了。新中国伟大的创始人，他的话，我们完全相信，再加上他提出区分现象与本质、主流与支流问题，从思想方法上批判，我们觉得自己就错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作了检讨。与会同志一致拥护毛主席的决策，还有一些同志也作了检讨。现在回想起来，有些代表前进方向的东西，并非一定是现实的东西，合乎理想而缺乏现实性的东西当作主流，就容易搞成理想主义。

访问人：但既然脱离实际，要付诸实践就会碰壁。你们当时主要检讨些什么呢？

杜润生：我们当时检讨的是右倾保守思想和思想方法的片面性。内容一个是对农民的社会主义积极性估计不足，一个是区分不清主流和支流、本质和现象。检讨不是违心的，是诚心实意的，和后来“文革”中的检讨不一样，那时承认走资派，多有违心成分。

访问人：当时毛泽东说的主流，意思是大多数群众有合作化愿望吗？

杜润生：合作化代表一个历史前进的运动方向。他看到一些事实，认为农民群众是支持合作化的，而在北京很少听到看到替合作社说好话的人，是

报忧不报喜，只看事物的支流，罗列现象，看不见主流和本质。

访问人：根据你们当时到农村考察的情况看，当时的农民是真的那么强烈要求合作化吗？

杜润生：1952年才结束土改，当时农民才分了土地，农民有个体经营积极性，同时也愿接受共产党号召，走合作化道路，但不明白怎么合作，“跟共产党走没错”，但一定要看看事实。

访问人：毛泽东应该了解农民，当时也说过，要保护农民的个体积极性。

杜润生：听说1953年春，在起草第一个互助合作决议的时候，赵树理说，他家乡的农民都是想奔富，互助可以，很少想搞合作化的。赵是文学家。这个意见陈伯达反映给毛泽东了，很受重视。在第一个互助合作决议上写了农民有两种积极性，决议说：中国农民在土地改革基础上所发扬起来的生产积极性，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个体经济的积极性；另一方面是劳动互助的积极性。毛泽东在修改这个文件时，还加了这样一段话：“在一个农村内，哪怕绝大多数农民都加入了互助组或合作社，单干农民只有少数，也应采取尊重和团结这少数人的态度。”可见，这时毛泽东是很讲求实际的。

访问人：那么，他后来为什么变得那么快呢？搞了互助组，还没巩固就搞合作社，合作社也刚开头，又搞人民公社，一个接一个，使人有点跟不上趟。

杜润生：他在农村问题上，是马克思主义者，但同时也把中国古代知识界提倡的“大同”社会思想继承下来，如建立一个公社，工农商学兵一块搞，共同生产，公平分配，认为有了这个体制就能建立起走向共产主义大桥了。1958年，一度走到了极端，废除商品，实行供给制，搞公共食堂，认为共产主义已不是遥远的事情了。

但是，群众吃不饱饭这个事实把他唤醒了，又重新用马克思主义认识现实，承认价值法则和商品的作用，反对“共产”风和一平二调，最后，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体制。不过在这以后一段时间内，他还是认为三面红旗是主流、是本质、是方向，认为这是亿万群众的伟大理想和向前进的伟大运动，决不是什么资产阶级狂热性。所以把说此话的彭德怀打成右倾机会主义，认为党内有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1955年时说邓子恢等是代表富农和富裕中农的利益讲话的，实际已经把认识上的问题提到阶级斗争的高度。到了庐山会议，就明确了党内有两条道路的阶级斗争。到八届十中全会，就是“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到“文革”就更厉害了，革命的矛头主要朝向党内的走资派。

经济落后的国家如何过渡到社会主义，亿万农民从个体经济走向合作制应经过什么样的中介性步骤和组织形式，党内有不同主张大多属于工作是非认识是非问题，从此都被判定为两条道路是非和阶级斗争是非了。

我上面说的这些，就是想说明毛泽东在1955年前后的变化并不突然，是前有起源后有继续的，有历史渊源的。我们今天谈话限于时间还没有就国内外环境进行分析。应该认识，当时国内外环境，决定中国必须动员国内一切资源，赶超先进国家，使人民富裕，国家安全有保障，这正是全国人民的愿望。当时，加速农业合作化被看作一个先决条件，这是可以理解的。

毛泽东的思想中始终有实事求是的一面，比如他曾同意“停、发、缩”的三字方针，提倡整顿，不要过急等等。一度搞人民公社，这个理想化的设计，是对建设工业国的困难估计不足，发展生产力的先决性作用几乎被忽视

了。这属于认识问题。说到底，还是对社会主义的理解。社会主义原来的设想是在资本主义经济充分发展的基础上建立的，而我们却是在生产力很不发达的一个农业国的基础上建立。按正常的道路，首先应当以工业为主导，全面发展社会生产力，凡有利于发展生产力的因素，包括私人经济要给它一个发展机会。社会生产力没有发展到一定阶段，对非公有经济一下子取消是不行的，国家还必须以公有经济作为主干，允许各种经济成分同时并存发展。这些主张都是毛泽东提出过的，可是到了50年代初，有某些新的因素限制人们继续执行这些主张，毛主席带头作出新的决策。70年代末，形势又有变化，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起，实行了战略转变，又回到正确的毛泽东思想上。邓小平同志在这个关键时刻树立了不朽功勋。

访问人：其实毛泽东的一些失误，也是在探索中的失误，您怎么看他这个人？

杜润生：毛泽东的伟大是世界公认的，我同意中央的文件中的话：没有毛泽东，中国革命仍可能在黑暗中摸索，还要用更长的时间来完成。他提出的农村包围城市、在农村建立根据地，依靠工农联盟，武装斗争，统一战线，党的建设，中国必须走社会主义道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以及群众路线、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等等构成一个思想体系，武装了千千万万干部，起到了推动历史发展的作用。中国近代以来，有多少革命起义，都没有成功，只有到了有了共产党，共产党又有了毛泽东领导，才使革命走上成功。建国以后，毛泽东确实想走一条有中国特色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他进行了艰苦的探索，也出了许多好主意，可惜后来一度自己也未能一贯地坚持毛泽东思想。这个历史任务由邓小平同志继承下来了。

访问人：毛泽东在建国后探索中的一些失误，是不是在于他的理想主义？

杜润生：没有理想不行。树立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为社会主义社会奋斗看来是完全必要的。哪个国家没有理想家，哪一种民族没有理论思维？没有理想屈服在现实面前，无所作为，会被历史所淘汰，只是认识客观世界不是一次完成的，为理想奋斗要通过实践，检验理想，校正理想。所以要讲求实事求是。我们中国共产党干了70多年，一直为理想奋斗，成为民族振兴的主要动力。

访问人：理想也是个凝聚力。

杜润生：这是个了不起的东西。不过要记住单从理想模式出发，不顾现实条件要付出代价。历史长河中，有点曲折，为前进提供了教益，坏事变成好事。一个政党不可能没有错误，问题在于当错误被认识之后，能不能修正错误。我们党从来就是既无畏地坚持真理，又能勇敢地修正错误的。如农村问题，三中全会以来，不是接受群众要求，朝着正确的方向上前进了一大步吗？过去的探索是产生了好的结果的。80年代起，邓小平掌航的时代，把理想和现实结合得更好了，这正是我们这个民族所以兴盛不衰永远前进的希望所在。

1993年3月24日于北京西黄城根南街

## 访雷英夫——一场震惊世界的大炮战 雷英夫

雷英夫，河南孟津人，1921年生。1938年8月到延安抗大学习，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建国后历任周恩来总理的军事秘书、顾问，军委作战局副局长兼总参作战室主任，总参作战部处长、副部长，军委国防部发言人。

30多年过去了，谈起金门炮击，雷老却记忆犹新，仿佛就像昨天的事情一样。他说：因为工作关系，我参加了这一作战的全过程，亲眼看见了毛主席、周总理等中央军委首长组织指挥这一斗争的奥妙，大开眼界，大长了见识。

访问人：雷老，您好。听说1958年我军炮击金门，是一场震惊世界的大炮战，是毛主席周总理精心策划，亲自指挥的一场史无前例的大炮战，也可以说是毛泽东军事思想中的一曲绝妙之笔。同时，听说，您当时在毛主席周总理身边，参与了这场战争，对各方情况比较了解。因此我们想请您谈谈这场战争的情况。

雷英夫：可以。但必须声明，我虽然参与了这场战争，做了一点具体的参谋工作，但由于水平太低，了解情况有限，特别是现在年老体弱，记忆力急剧衰退，故所谈情况和看法不一定准确妥当，敬请各位批评指正。1958年炮击金门时，我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作战部副部长兼周恩来总理的军事顾问，又是军委（国防部）的发言人，因为工作关系，参加了这一作战的全过程，又亲眼看见了毛主席、周总理等中央军委首长组织指挥这一斗争的奥妙，大开眼界，大长了见识。

1958年8月23日到10月25日，我军对驻守金门的蒋军发动了一场持续近三个月的大炮战，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炮击金门”，又叫“8.23大炮战”。所谓“炮击”也好，“炮战”也好，都是一个概括的名称，并不完全准确，因为除了炮兵之外，空军、海军也都参加了战斗，并取得了光辉战果，但由于炮兵作战是主要形式，而且大家也叫惯了“炮击”“炮战”，故也就沿用了下来。照我看，这确实是一场震惊世界的大炮战，一场包括军事、政治、外交、宣传在内错综复杂奇妙无穷的大炮战，一场典型的斗智战争，也是党中央、毛主席得心应手运用毛泽东军事思想指挥战争的又一绝妙之笔。

### 炮击金门的前前后后

访问人：从这场战争的规模看，最激烈的是1958年8月23日至10月底，那么，这场战争是不是仅限于这三个月呢？

雷英夫：按照历史情况，炮击金门并不始于1958年的8月23日，也不止于1958年的10月底，而始于1954年的9月3日，那时台湾国民党和美国政府正在商谈签订《美蒋共同防御条约》。为了打击美国的侵略政策，制止国民党蒋军对我东南沿海的袭扰，我福建前线炮兵部队奉命对金门蒋军发动了第一次大规模的炮战。在此之后，双方的炮战时有发生，有蒋军主动打的。也有我军主动打的。反正断断续续，炮声不停。1958年8月23日炮战后，到1979年元旦中美正式建交，美国承认只有一个中国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我国防部长徐向前下令停止对金门的一切炮战为止的21年中，双方也还有断断续续的炮战。1960年6月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访问台湾，我军在他到达和离开时，也曾奉命发动过迎送瘟神大炮战。因此，炮击金门的时间，准确些说应该是包括从1954年9月3日到1979年

元旦的整整 25 年。如果把 1949 年金门作战以后，金门地区不断发生的炮战计算在内，炮击金门的时间则应是 30 年，但在这 20 年或 30 年的炮战中，规模最大、最猛烈、最令人胆战心惊、最错综复杂的是 1958 年 8 月 23 日到 10 月 25 日这近 3 个月的大炮战。在此期间，我共大打发射万发炮弹以上的 7 次，中打发射千发炮弹以上的 80 多次，零星打炮一千多次。直打得金门岛上硝烟滚滚，天翻地覆，蒋军狼哭鬼嚎，连续呼救。直打得美帝国主义手忙脚乱，仓皇调兵遣将改变战略部署。直打得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集团之间矛盾激化，公开争吵对骂不休。也打得赫鲁晓夫大国沙文主义者，慌慌张张，原形毕露。但全国人民和全世界被侵略被压迫的国家和人民却拍手称快，扬眉吐气。总之当时天下议论纷纷，金门和台湾海峡局势，成了当时国际局势的热点，也对后来台湾和台湾海峡局势的发展和中美关系的变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访问人：有人说炮击金门是我军主动打的，也有人说炮击金门是自卫性质。您怎么看？

雷英夫：这两种说法都有道理，都有根据，那时我们和蒋介石集团仍处在战争状态，内战一直未停。既然战争未停，谁先打，谁后打，也就无关紧要了。正如周恩来总理 1958 年 9 月 4 日针对杜勒斯的声明所说的：“中国政府有权对盘踞在沿海岛屿的蒋介石部队，给予坚决的打击和采取必要的军事行动。”也就是我国国防部 10 月 13 日命令中所说的，“打不打，什么时候打，我们有自由权，要打就打，要停就停，外人无权过问。”

正因为这场炮战是古今中外罕见的奇妙斗争，所以当时很多人不理解，甚至有些很高的人物还提出过一个疑问：“这叫什么战争，不懂，不懂。”我们说，这确实是一个创举，可以叫做 20 世纪 50 年代，中国共产党毛主席精心策划和指挥的一场奇妙的新型战争。这场斗争，在某些方面说确实带有戏剧性，是一场典型的斗智斗争。斗智的一方，是那样潇洒自如，要打就打，要停就停，要谈就谈，虚实并用，把一条又粗又长的绞索，套在了不可一世的美帝国主义的脖子上；斗智的另一方却是那样的惊慌失措，乱成一团，互相对骂。美帝国主义在国际舞台上像过街老鼠一样，人人喊打，狼狈不堪。为此当时的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伤透了脑筋，据说他在华盛顿 3 天睡不成觉，说这实在是“在进行一场滑稽歌剧式的战争”，并作出了一个错误的战略判断，认为从中国人民解放军陆、海、空三军一齐出动的情况看，显然是解放台湾的前奏，不光是解放金门。因此，赶快从地中海、西太平洋、日本、菲律宾等地抽调兵力到台湾海峡，并宣布要把“斗牛士”导弹也调到台湾，对我进行战争威胁，摆出一副大打的架势，结果正好中了圈套。倒是中国人民和共产党的老对头蒋介石，还懂得一点其中的奥妙，因此，当他得到金门蒋军遭到猛烈炮击时，不仅没有惊慌失措，反而出乎众人意料之外，眉飞色舞地连声说“好！好！好！”炮声一响，他就有了向美国主子讨价还价的本钱，他就可以在中、美、台三角斗争中求生存，蒋介石的英文秘书沈剑虹在他《使美八年纪要》一书中说，1958 年美台共同防卫条约生效后第四年，中共 8 月间对金门实施持续猛烈炮轰，以试探《中美共同防卫条约》和《台湾决议案》的效能。当时国民党的“国防部长”俞大维后来对人说，8 月 23 日大炮战之后，台湾海峡便不再有战争了，蒋军才得到了一个几十年安定的生存环境。

本来解决台、澎、金、马，完成祖国的统一大业，是我国人民和军队的

神圣义务和既定方针。为此，建国以来，随着形势的发展，我们采取了各种措施，为实现这一方针进行了不懈的努力，政治上，我们一再声明，台湾是我国不可分割的神圣领土，解放台湾是我国的内政，不容别国干涉，国共之间可以实行第三次合作，一切“和为贵”，并连续派人和蒋介石集团进行暗中商谈。外交上，我们一再反对美帝国主义侵占中国的领土和干涉中国内政，希望中美进行会谈，解决美国从台湾和台湾海峡撤军，实行中美邦交正常化。军事上，继朝鲜停战和1954年日内瓦会议之后，我国又一再重申了一定要解放台湾和沿海岛屿的决心，至于用武力或和平方法解放台湾和沿海岛屿，那是可以商量的，时间迟一点早一点也是可以的。时至1958年，美国在全球更加横行霸道，积极推行“大规模报复战略”挑动战争和进行战争威胁，并于7月中旬公然派遣海军陆战队5000余人，侵入黎巴嫩，镇压中东人民的革命斗争，蒋介石集团在美国的支持下，不仅和美国签订了《中美共同防卫条约》，宣布要把“斗牛士”导弹运到台湾，准备对中国大陆使用核武器，还不断派遣飞机轰炸福建、广东、浙江、上海等沿海城市，派军舰和小股匪特在沿海登陆袭扰并一再叫嚣要反攻大陆，宣布台、澎、金、马等地进入紧急战备状态，千方百计要制造紧张局势，挑起中美战争，他好混水摸鱼重返大陆。

在这种情况下，为了支援中东人民的斗争，为了惩罚蒋介石集团的袭扰破坏，彻底摸清美帝国主义对中国的战略企图，粉碎美帝国主义搞两个中国的阴谋，也回敬赫鲁晓夫集团控制中国的野心，党中央毛主席经过反复的考虑乃下定决心：炮击金门。

#### 炮击金门的军事部署

访问人：炮击金门前，毛泽东和中央军委都作了哪些部署？准备的怎么样？

雷英夫：遵照党中央毛主席的战略决心，7月中旬，国防部长彭德怀、总参谋长黄克诚在北京旗坛寺召开了军委作战会议，制定了炮击金门的具体实施方案。参加会议的有各总部、各军兵种和有关军区的负责人。经过反复研究确定：

一、以福州军区为主，调集32个炮兵营，部署在厦门、莲河地区，打击大小金门的蒋军目标；以6个岸炮连，部署在莲河、围头、厦门一线，打击料罗湾的蒋军舰艇。

二、以福州空军为主，先以2个歼击机团进驻连城、福州、龙田各机场；轰炸机、侦察机随后进驻樟树等地，以夺取东南沿海的制空权，并准许必要时轰击金门，但轰炸行动必须经毛主席中央军委批准。

三、以东海舰队为主，除以歼击机掩护策应汕头、连城空军作战，并掩护三都沃海军基地外，另集中8个岸炮连，配合陆军打击大小金门，调5个鱼雷快艇大队、2个潜艇大队，1个高速炮艇中队，分别进入泉州、东山、三都沃等地，准备从海上打击蒋军的舰艇部队。

以上各参战部队共火炮459门，舰艇80余艘，飞机200架，这些部队统于7月24日部署调整完毕。

各部队得到炮击金门的预令后，欢欣若狂，纷纷发电报，打电话，写申请书，要求参战，希望早打、狠打。

访问人：7月27日，毛泽东曾有一封信给彭德怀、黄克诚，提出“打金门停止若干天似较适宜，目前不打，看一看形势。”这是怎么回事？

雷英夫：情况是这样，由于当时福建沿海遭受台风袭击，连续19天暴雨，

道路泥泞不堪，冲毁桥梁 43 座，公路铁路塌方情况严重，部队阴雨中昼夜作业疲劳过度，病员骤增，空军、海军的部署尚未调整完毕，加上国际形势尚须看一看，于是毛泽东 7 月 27 日写信给彭德怀、黄克诚，信是这样说的，“睡不着觉，想了一下。打金门停止若干天似较适宜，目前不打看一看形势。彼方换防不打，不换防也不打。等彼方无理进攻，再行反攻。中东解决，要有时日，我们是有时间的，何必急呢？暂不打，总有打之一日。彼方如攻漳、汕、福州、杭州，那就最妙了。这个主意，你们看如何？找几个同志议一议如何？……如彼来攻，等几天，考虑明白，再作攻击。以上种种是不是算得运筹帷幄之中，制敌于千里之外，我战则克，较有把握呢！不打无把握之仗的原则，必须坚持。如你同意，请将此信告叶飞，过细考虑一下，以其意见见告”。叶飞同志当即表示拥护。在克服了部队中的急躁情绪之后，毛主席于 8 月 20 日看准了各方形势，我各种准备工作均已完成之后，才决定立即对金门国民党军予以猛烈打击，把金门封锁起来，造成要解放金门的声势。

根据毛主席党中央的决心，军委预定 8 月 23 日对金门蒋军进行第一次大规模炮击，着重打击敌人指挥机关，炮兵阵地、雷达阵地和停在料罗湾的蒋海军舰艇，要各参战部队加紧做好一切准备。8 月 23 日上午，军委下达了“一级战备”的命令，下午，毛主席正式下达了当日（23 日）下午五点半钟炮击金门的命令。

### 炮击金门的指挥

访问人：在炮击金门开始的这段时间里，毛泽东正在北戴河召集中央工作会议，所以有人说，这次炮击金门是毛泽东在北戴河坐阵直接决策和指挥的。这样说，准确吗？

雷英夫：这样说基本上是对的，但只说了一半，还应该再补充一句，即炮击金门的筹划工作和最初阶段（9 月 2 日）以前的决策和指挥是毛主席在北戴河决定的，9 月 2 日至 10 月 25 日毛主席则是在北京决策和指挥的。当时的情况是，1958 年 7、8 月，毛主席党中央正在北戴河开政治局扩大会议，炮击金门的重大决策也在北戴河决定，国防部长彭德怀，作战部长王尚荣和福州军区政委、炮击金门的前线指挥叶飞也赶到北戴河。遵照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布置炮击金门的具体指挥。8 月底中央会议结束，与会同志都返回原单位，叶飞同志也回福建。8 月 30 日总参谋长黄克诚、外交部乔冠华和我奉召到北戴河开会，研究和决定有关炮击、领海线划分等问题。会后，9 月 2 日毛主席、周总理及彭德怀、陈毅、黄克诚等都返回北京。炮击金门的事也就在北京进行策划和指挥，直至 10 月 25 日。

访问人：这么大的一场错综复杂的战役，如果没有一个效率很高的组织系统，上情不能下达，下情不能上传，恐怕很难取得那么大的成绩。我们的具体指挥和组织实施怎么样？

雷英夫：情况确实是这样，实践证明我们的组织指挥机构很精干、效率是很高的。

由于炮击金门的情况错综复杂，中央的重大决策照例是在毛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之下，由周恩来总理召开国防外交方面负责人的联席会议办理。参加联席会议的通常是周恩来、彭德怀、陈毅、张闻天、黄克诚、章汉夫、王尚荣、乔冠华和我。涉及到某一具体问题时，如要起草重要新闻、公报、声明稿时，就临时请吴冷西、姚臻、田家英等人参加。所以炮击金门作战中第二阶段、第三阶段的重大决策，例如反对美帝护航，对金门岛封而不死，

打而不登；保留金门在蒋介石集团手里，以及国防部长一告、再告台湾同胞书；提出国共两党和为贵等重大决策，都是毛主席周总理在北京决定的。

联席会议一遇到重要情况和问题，需要研究商量对策时即开会。然后把对情况的分析，准备采取的措施，或用电话向毛主席汇报请示，或将起草好的电报、文件、新闻稿子送毛主席党中央常委（毛、刘、朱、陈、邓等）审阅批准后，即分别用军委、总参、外交部、新华社的名义发出。一般是由总理当场签发或电话告有关部门处理，各单位所收到的重要情报也随时向周总理和联席会议报告。这是一个工作效率极高的指挥机构。抗美援朝战争、中印边境自卫反击作战、边海防斗争的重要时刻，都是采用这个办法进行领导指挥的，这是我党的一个好传统。福建前线的战场指挥则是由叶飞、韩先楚、刘培善、张翼翔等同志组织的前方指挥部在厦门进行的。

### 炮击金门的三个阶段

访问人：您能具体地谈谈这场炮击大战的实际进行过程吗？雷英夫：可以。炮击金门之战，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8月23日到9月2日。这一阶段的主要任务是摧毁金门蒋军的重要军事目标，严密封锁大小金门，牵制调动美国的兵力，造成美国的错觉。为此，第一天8月23日我发射炮弹3万余发、当即击毙敌金门防卫司令部中将副司令三人，击伤蒋帮国防部长俞大维和中将参谋长一人，击毙美军顾问二人，岛上蒋军死伤6百余人，所有炮兵阵地、雷达阵地、通讯设施均受到严重破坏，岛上蒋军叫苦连天，不断呼救。第二天我又发射2万余发，将妄图还击的敌人炮兵打得偃旗息鼓，不敢还手，打得停在料罗湾的17艘运输舰艇纷纷外逃。这时我鱼雷快艇部队突然出动，当即击沉、击伤敌运输舰各一艘，打得敌人胆战心惊。8月26日为了严密封锁大小金门、大担、二担，使敌舰船不能海运，飞机不能空投，军委下令增调远射程火炮二个团，加强封锁料罗湾的火力，切断金门敌人的一切补给。敌虽想尽各种方法抢运，但在我军的严密封锁下，从8月23日到9月2日，敌人的运输量不及平时的5%。

访问人：在这个阶段，前方将士功不可没，正是他们坚决地贯彻执行了毛主席中央军委的英明决策，浴血奋战，才取得了这么大战果。我们的统帅部还做了什么部署？

雷英夫：8月30日接到周总理从北戴河打来的电话，通知黄总长、乔冠华和我到北戴河开会。我们到后，在毛主席住处开了两次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刘主席、周总理、彭总、张闻天、黄克诚、乔冠华和我。研究领海线问题时还临时扩大了外交部的刘泽荣等两个老法律顾问列席会议。

在毛主席召集的两次会议中，主要解决了三个问题：一、审查批发了我们代中央军委起草的电报稿，认为此通报很及时，很必要，写得很好。二、确定了中国领海线为十二海里的建议，并决定9月4日公布，但对外不公布十二海里的具体划法，以利对美斗争。三、听取了炮击金门的情况，对下一步炮击金门作出了指示。主要是把大打、中打、小打结合起来，有时打，有时可以不打，打打停停，停停打打，不要千篇一律。

研究领海宽度时，毛主席周总理很有兴趣地听了刘泽荣等两个法律顾问的意见，他们按照海牙会议的文件和美英等许多国的领海线都是3海里的情况，主张我国的领海线也应定为3海里，不宜定为12海里，以免引起国际纠纷。这两个老专家虽然思想比较古板，但对国际法比较熟悉，又敢在毛主席、

周总理面前充分申述自己的意见，深得毛主席周总理

的喜爱。毛主席说他就喜欢这些人的书呆子气。总理说他们提出不同意见，对我们决策有好处，可以比较，而这两个老

头又深为毛主席、周总理亲自接见他们，让他们在会上充分阐述自己的意见而感到荣耀和自豪。刘泽荣为此兴奋得一夜未眠，说他这一辈子最荣耀的有两件事，一是亲眼看见过列宁，二是这次参与毛主席党中央关于划定领海线的决策会议。

根据主席、总理的指示，彭总又找黄克诚总长和我到他的住处，具体地研究了一下继续炮击的方案和军事上需要解决的几个问题，如部署调整、炮弹供应、军事订货等等。

访问人：大炮一响，美蒋方面有什么反应和动向？

雷英夫：炮击金门一开始，台湾蒋介石即根据《美蒋共同防御条约》要美国和蒋军一道袭击福建、广东、浙江沿海的城市、机场、码头、炮兵阵地，并施行登陆，想拖美国下水，扩大战争为中美大战。美国从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出发，不同意蒋方的要求，反对蒋方的袭拢登陆计划，双方发生争吵，最后美国答应蒋军防守金门，并予以护航。于是9月4日杜勒斯代表美国政府声明，一方面说美国将通过谈判解决问题，一方面又说美国军队将负责保护金门、马祖并宣称不承认中国领海12海里的规定。针对美国杜勒斯的声明，周恩来总理兼外交部长立即发表声明“中国政府有权对盘踞在沿海岛屿的蒋介石部队给予坚决的打击和采取必要的军事行动，任何外来干涉都是侵犯中国主权的罪恶行为。美国政符如果继续对中国进行侵略和干涉，把战争强加在中国人民头上，必须承担由此而产生的一切严重后果”。同时指示王炳南在中美大使级会谈中坚持中美之间只存在美军从台湾和台湾海峡撤军问题，不存在停火问题。指出美国只谈停火问题是干涉中国内政的阴谋。在我国政府宣布中国领海宽度为12海里，并宣布自9月4日起外国军用船舶和飞机，未经中国政府许可不得进入中国领海及其领空的同时，军委则下令福建前线停止炮击3天，以观察各方动态。

9月7日蒋介石集团海军副司令黎玉玺及美国顾问率2艘运输舰、5艘作战舰艇，在美国2艘巡洋舰、5艘驱逐舰的护航下，驶进金门海域，14时45分到19时美国四艘军舰侵入金门厦门领海以内活动。中国外交部当即向美国提出警告，党中央毛主席指示以打击蒋军的形式，反对美舰护航。当晚24时，军委决定9月8日对金门再进行一次惩罚打击，主要是侦察一下美国的护航程度。

访问人：这时我们对美国人恐怕还不摸底，对他们叫嚷的要打大仗，打大规模报复战争，毛泽东和党中央是怎么考虑的？

雷英夫：有这个问题，这时美国的意图是真是假，几分是吓唬，几分是真的？换句话说，在台湾海峡，美国究竟是攻势战略，还是守势战略，我们要摸个底，不然，军事、政治、经济上也不好安排，打糊涂仗是不行的。具体讲在美军护航或侵入我领海线后，我们打不打美舰！美舰向我开火我还不还击？即成了最关紧要的重大政策问题了，稍一不慎或某一门炮稍微打偏了，就有引起中美战争或麻烦的危险。为此，9月8日上午毛主席在中南海勤政殿又专门召开了一次会议，参加的有毛泽东、周恩来、陈毅、张闻天、黄克诚、乔冠华和我。会议先要我汇报了美蒋护航编队的编成、活动情况和我军炮击后美国可能的反应，然后经过认真讨论，确定“炮击金门照打不误”，

“只打蒋舰，不打美舰”，“即使美舰向我开火，也不还击”的方针。于是，9月8日中午12时43分到18时，我军42个炮兵营，连同所有海岸炮兵对料罗湾蒋军舰艇及金门的重要军用目标进行第三次大规模炮击，发射炮弹2万余发。蒋军运输舰一艘起火沉没，一艘外逃。美国护航的军舰，见势不好仓皇逃至料罗湾12海里以外，徘徊观望，未敢发射一炮，美国纸老虎顿现原形。

但美国仍不甘心，为了维护面子，9月10日杜勒斯又大施战争威胁，说什么“国会联合决议，授权总统使用美国武装部队，确保和保护像金门马祖等有关阵地”。从本土、地中海、日本、冲绳、菲律宾等地抽调第六舰队加强到台湾海峡第七舰队并将原子武器“斗牛士”运到台湾对我搞战争边缘政策。9月11日美国4艘军舰再次掩护蒋军11艘运输、作战舰艇驶向金门海域，意在对我再次施加压力。于是我又以40个炮兵营，6个岸炮连对料罗湾蒋舰和金门重要军事目标进行第四次大规模炮击，发射炮弹二万五千发，侵入我领海的美舰和9月8日一样，在我军猛烈炮击下，连忙逃入公海。这些行动充分说明，美国虽然在台湾海峡摆出了大打的架势，口口声声对我进行战争恐吓，但它不敢挑起中美大战，它虽然口头上不承认我国12海里领海线，实际上又不敢不遵守12海里领海线的规定。因此，美国虽然答应给蒋军护航，但一遇危险就丢下蒋舰逃之大吉，这又引起了美蒋的争吵叫骂。使美国在全世界面前大丢其脸。

访问人：从这以后，就是炮击金门的第二个阶段了？

雷英夫：是这样，经过4次大规模炮击、83次中打和无数零炮射击，到9月底10月初，金门被我全面封锁，蒋军不顾一切的运输增援计划、美国的护航和战争威胁活动，都一一宣告破产。这是炮击金门的第二阶段。这时美国借机进一步逼迫蒋介石集团放弃金门马祖，杜勒斯公开声明，说什么蒋介石在金门马祖等福建沿海岛上驻扎军队，是“愚蠢的”，“不明智的”，也是“不谨慎的”。蒋介石对此极为恼火，马上公开声明他对杜勒斯的声明“无接受的义务”，“若至紧急关头，台决独立作战”。这样美蒋之间的矛盾，进一步激化和表面化。

这里还有个重要插曲需要交代一下，即8月23日我一炮击金门，前苏联赫鲁晓夫就急急忙忙派他的外交部长葛罗米柯秘密跑到中国来，一方面责问我们打炮之前为什么不通知他们！一方面又建议成立中苏联合舰队，共同防卫中国的沿海。显然，这是干涉中国内政和妄图控制中国，把中国变成他人附属国的阴谋，当即遭到我党中央的坚决反对，我党中央还告诉他，我们打炮之前曾通知了苏联派在我总参谋部的顾问，为什么说我们没有通知呢！这个插曲充分说明我们炮击金门，不仅打痛了美帝国主义，惩罚了蒋介石集团，而且也暴露了前苏联赫鲁晓夫集团的大国沙文主义。当然，我们当时的主要矛头是对准美帝国主义和蒋集团的。

访问人：10月6日，毛泽东起草的《告台湾同胞书》的发表，是不是标志着炮击金门第三阶段的开始？

雷英夫：第三阶段从10月6日到10月25日。针对着美蒋矛盾的激化，党中央毛主席马上改变策略，把原定封死金门，逼蒋撤退或打到一定程度相机登陆解放金门的方针，改为对金门采取“封而不死，打而不登”“保留金、马在蒋军手中”的方针，也就是联合蒋介石集团和美帝国主义斗争，扩大美蒋矛盾的方针。为此，毛主席党中央以国防部长彭德怀的名义，在10月6

日发表了《告台湾同胞书》，明确宣布我们都是中国人，三十六计和为上计，炮击金门是惩罚性质。台澎金马是中国领土，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没有两个中国，这两点蒋介石的文告中都是同意了，证明美帝国主义是我们的共同敌人，建议用谈判的方式来解决中国内部的争端，和为贵。因此，下令福建前线从10月6日起停止炮击一周，以利蒋方充分自由的运输供应品，但以没有美国人护航为条件，“如有护航，不在此例”。这是炮击金门之战的转折点。

美国一看到彭总的文告，马上宣布自10月8日起停止护航，实际上是乖乖地接受了彭总的命令。蒋介石对美国停止护航的决定更加不满，为了向美国闹独立性，蒋介石乘10月10日国民党国庆节的机会，要蒋空军起飞44批，182架次，到大陆上空进行示威性袭扰。我空军立即起飞，大败蒋家空军，击落蒋机3架，又一次严重打击了美蒋的气焰。

10月13日，根据形势的变化，我们又发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命令》。宣布从10月13日起，炮击金门再停两个星期，以便观察敌方动态，并使金门军民能够得到充分补给，长期固守。如台湾不和谈，打是免不了的。我们有自由权，要打就打，要停就停。完成祖国统一，这是我们中国人的神圣任务，外人无权过问，同时郑重宣布“金门海域，美国人不得护航，如有护航，立即开炮”。

彭总的《告台湾同胞书》和国防部命令一发表，炮击金门即进入了新阶段。为了贯彻党中央毛主席的新方针，10月17日晚总理召集彭总、陈总、黄老、张闻天、刘亚楼、乔冠华、王尚荣和我开会，详细地分析了形势和各方面的评论，进一步研究了以后炮击中的一些具体措施，并根据毛主席的指示，要我第二天乘飞机到福建前线，向叶飞、韩先楚、刘培善等负责同志进行传达解释。

当我到达连城机场，乘车赶往厦门时，一过漳州就听到了猛烈的炮声。到达厦门后，我当即向当时在厦门指挥炮击金门作战的刘培善（福州军区副政委）、张翼翔（福州军区副司令）、石一宸（福州军区副参谋长）、陈锐霆（军委炮兵副司令）等负责同志进行了传达，然后又赶往福州，向叶飞、韩先楚同志进行了传达，并看望了海军、空军和炮兵等部队。大家一致拥护毛主席中央军委的决定和指示。

10月24日我接到黄克诚总参谋长的长途电话，告我毛主席起草的以国防部长彭德怀名义发表的《再告台湾同胞书》明日即行广播，希望转告大家好好学习，切实领会精神，坚持贯彻执行。《再告》的主要精神就是告诉台湾蒋介石集团说：我们完全明白，你们绝大多数都是爱国的，甘心做美国人奴隶的只有极少数。中国人的事只能由我们中国人自己解决。一时难于解决，可以从长商议。要化敌为友，此其时矣。一切爱国者都有出路，不要怕什么帝国主义者。我们两党间的事情很好办，我已命令福建前线逢双日不打，以利你们长期固守，但仍以不引进美国人护航为条件。如有护航不在此例。

至此，炮击金门的高潮即告一段落，以后炮击金门即转入象征性的零炮或小打，在这个阶段里，除1960年9月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到台湾访问时，我又进行了迎送炮击外，其他时间都是象征性的零炮射击。1961年8月毛主席、周总理和中央军委为了稳定台湾海峡的局势，决定不再炮击金门，只打些宣传单。1979年中美建交，美国宣布与台湾蒋邦断交并撤军，于是国防部长徐向前发表声明，“停止对金门的一切炮击”。

总计从 1958 年 8 月 23 日到 10 月底炮击金门的高潮时期,我共进行大规模炮击七次,即 8 月 23 日、24 日、9 月 8 日、11 日、13 日、10 月 20 日、25 日,每次炮击发射炮弹都在万发以上,最多时 3 万余发,空战 13 次,海战 3 次,击落击伤蒋机 34 架,击沉击伤蒋军舰船 27 艘,击毙蒋军中将副司令以下 7000 余人。

### 炮击金门的七大收获

访问人：炮击金门,已经过去 35 年了,作为那场战争的亲身经历者,您有何感想和体会。

雷英夫：炮击金门之战,打得痛快,打得奥妙,是一次光辉的胜利。我觉得它的主要的收获有七个方面：

一、打乱了美军的战略部署,牵制了美军,有力地支援了中东人民的反侵略斗争。我炮击金门一开始,美国不仅无法从台湾海峡抽调兵力增援中东,反而急急忙忙把地中海第六舰队的一半舰只调到台湾海峡,并从本土、日本、菲律宾抽调兵力加强第七舰队。据不完全的统计,到 9 月初,美在台湾海峡集中的兵力计有飞机 430 架,舰艇 630 艘。

二、惩罚了蒋介石集团。使他们懂得,不和大陆和谈,想用武力长期割据和袭扰大陆的政策,是非挨打不可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要什么时候打,就什么时候打,要怎么打,就怎么打,这是我国的内政,外人不得干涉。但对蒋介石坚守金马,反对美国搞“两个中国”的立场是赞赏的。说明蒋介石还有些民族气节,这就为台湾的和平统一大业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三、摸清了美帝国主义想长期侵占台湾和台湾海峡,千方百计搞“两个中国”的底,用杜勒斯的话说,台湾是美国战略上永不陷落的航空母舰。因此,它既不愿从台湾和台湾海峡撤兵,也不愿给蒋介石守金门马祖以护航,更不敢出兵侵犯大陆。这就是说它在台湾海峡的战略是守势,而不是攻势,再次证明美国的战争叫嚣,甚至把“斗牛士”导弹运到台湾,完全是战争恐吓政策。

四、打出了我国我军的威风,这场战争的胜利再次表明,在胜利了的中国人民面前,什么帝国主义的战争威胁,什么赫鲁晓夫的阻挠,控制干涉,都是不行的。说我军炮击蒋军指挥部只打蒋舰不打美舰的准确性,海军空军作战大胜等事实,又一次证明我军是不可战胜的。兵是精兵,将是良将,指到哪里打到哪里,要打就打,要停就停,毫不含糊。

五、告诉中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中国的大陆虽然已经解放,但仍然是被侵略被欺侮的国家,大陆和蒋介石集团大的战争虽已结束,但内战并未停止。因此大家要齐心协力,安不忘危,为统一祖国的大业,为祖国的独立、自由、繁荣富强而努力战斗。同时炮击金门也是一次非常实际的练兵活动,对炮兵、步兵、空军、海军和地方上的支前工作都是一次最逼真的实战锻炼。对于部是一次最实际的教育。这里还有一个问题,值得交代一下,即自我公布了领海线 12 海里及我们对美机美舰侵入我领海的行为,都提出了抗议,一次、二次、十次、百次、……有些人不懂此事的奥妙,说老是抗议,不带劲,不管用,是放空炮。毛主席说：“我们对抗议就是有兴趣,第一它可以告诉人们,我们是一个独立了的大国,但美国还是天天在侵略我们,我们天天被侵略。”

第二我们对美国侵略行动的抗议,不是一次二次,也不是十次、百次,而是几百次,上千次,说明我们对他们的无理行动实在是忍了又忍,世界上

哪有这样的先例呢？因此全国人民怎能不发愤图强，誓雪国耻呢！

六、确立了中国领海 12 海里的规定，为进一步有效地保卫祖国的领海领空护航护渔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七、毛主席亲自起草并用国防部长彭德怀名义发表的 10 月 6 日《告台湾同胞书》和 10 月 25 日《再告台湾同胞书》是两篇绝妙的历史文献，立场鲜明，方针明确，策略灵活，气势磅礴，文字生动，逻辑性很强，很有说服力和吸引力，是永远载诸史册的光辉文献。本来 10 月 13 日毛主席还写了一个《再告》稿子，这个稿子也准备用彭德怀名义发表的，是 10 月 6 日《告台湾同胞书》的续篇，是用驳斥各种奇谈怪论的方法，劝蒋介石集团进行和谈，不要上美国人的当，最后被人抛入大海里去，并表扬蒋介石处理孙立人案件、胡适案件、“5·20”台湾人民砸烂美国大领事馆案件，都做得对，做得好！鼓励蒋介石集团坚决和美帝国主义分离，跟伟大祖国靠拢。因为自从美国占领台湾以来，形势已经变了，美帝国主义成了我们共同的敌人，国民党已经不是我们的主要敌人，国共双方可以化敌为友。并说我们决定自即日起停止炮击 70 天，到时有必要，还可能延长，等等。后来主席总理考虑到杜勒斯 10 月 20 日要到台湾，各方情况错综复杂，以再看看为好，故未发表。这篇文告和 10 月 6 日的一篇，10 月 25 日的一篇，加上 10 月中旬国防部的命令，共 4 篇，是不可分割的姐妹篇，都是毛泽东著作中的精品。

1993 年 3 月 18 日于北京

## 访谢春涛——毛泽东和中国的 1958 年

谢春涛,1963年生,山东临沐人。中央党校党史教研部副教授。主要著作有《“大跃进”狂澜》,并主编当代中国国是丛书。

这是我们采访 100 位名人学者中年龄最小的一位,题目却是个大题目。他的这番谈话,应了一句俗语:后生可畏。

访问人: 1958年,是一个不容被忽视和遗忘的年份。这一年,发生了许多在现代中国历史上有着重要影响的事情。其中最为世人所瞩目、影响最大最深远的还是后来被称作“三面红旗”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大跃进”运动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你对这个问题研究了多年,你是怎样思考的?

谢春涛: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弄清“三面红旗”的简要情况。先说第一面“红旗”——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这条总路线的表述很简单: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单从字面上看,似乎并没有多大的问题。但是,由于它是在错误批判“右倾保守”和反冒进的过程中形成的,是在“左”的思想指导下制定的,因此,从当时的中央文件、领导人讲话以及《人民日报》社论等对其内容、实质的解释和阐述看,便明显地存在着严重的缺陷。它只讲力争上游,不提稳步前进;只讲多快好省,不提综合平衡;片面强调经济建设的发展速度,过分夸大人的主观能动作用,忽视了经济建设所必须遵循的客观规律。它的制定,是对八大确定的正确的经济建设方针的否定。“大跃进”运动,就是这条总路线的直接产物。

第二面“红旗”——“大跃进”运动。这场运动从 1958 年上半年开始,到 1960 年底基本结束,持续了将近 3 年时间。其最典型的特征是高指标、瞎指挥和浮夸风。先是 1958 年夏收前后大放农作物“高产卫星”,《人民日报》上出现了水稻亩产 13 万多斤、小麦亩产 8 千多斤、花生亩产 2 万多斤的数字和“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只怕想不到,不怕做不到”等口号。接着,8 月在北戴河举行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错误地以为粮食问题已经解决,要求各省、市、自治区党委把注意重心从农业转到工业方面来,制定了 1070 万吨的钢产量指标。会后,全国 9 千万人上阵,大搞小(小高炉)、土(土法炼铁、炼钢)、群(群众运动),砍树砸锅,掀起了全民大炼钢铁的高潮。与此同时,其他行业也开展了一系列的“全民大办”(据后来统计,1958 年下半年曾提出过 50 多个“全民大办”口号)。从 1958 年 11 月到 1959 年 7 月,“大跃进”运动一度有所降温,但庐山会议和“反右倾”运动后却变本加厉,直至国民经济出现严重困难、不少农村人口非正常死亡,才不得不最后刹车。

第三面“红旗”——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这场运动基本上是与“大跃进”运动同时进行的。发动运动的的目的之一就是生产关系的变动来推动“大跃进”运动。当时宣传的人民公社的主要优点是“一大二公”,“大”即规模大,比原来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大 10 倍以至几十倍;“公”即公有化程度高,不但把合作社的公有财产合并到一起,而且还把社员个人的自留地、林木、牲畜等也收归公社所有。而这两点,却恰恰是人民公社的主要弊端。“大”,严重脱离了低下的农业生产水平和基层干部管理能力这一中国农村的客观实际,必然会带来管理等方面的一系列问题。“公”,实际上是大刮“共产风”的结果,它不可避免地会极大挫伤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导致对农村生产力的破坏。此外,人民公社普遍实行的以“吃饭不要钱”为主要内容的供给

制和所谓“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等，也导致了很严重后果。1958年底以后，虽然在纠正“共产风”错误方面作出了不少努力，也解决了一些问题，但以平均主义为核心的严重问题却长时期存在，成了阻碍中国农业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实行农业生产责任制，1984年取消人民公社，才最终得到解决。

访问人：有种观点认为，“大跃进”运动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是毛泽东个人意志的表现，你赞成这种观点吗？

谢春涛：这个问题似乎可以从两个方面来回答。一方面，在本世纪50年代末期的中国，人民公社化运动，特别是“大跃进”运动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饱经磨难的中国人民，急于使自己的国家在取得政治上的独立后，在经济、军事上也富裕和强大起来。出于这一愿望，他们容易响应和支持旨在尽快改变中国贫穷落后面貌和使中国尽快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大跃进”运动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也能够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为达到美好前景而付出各种艰辛的努力。从这个方面来说，“大跃进”运动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并非仅仅是毛泽东个人意志的表现，也反映和体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良好愿望。

但是，若从另一个方面，即从毛泽东在发动和领导运动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和应负的责任看，可以认为“大跃进”运动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是毛泽东个人意志的表现。

因为：“大跃进”运动是毛泽东在错误地批评反冒进的过程中发动起来的。本来，周恩来、陈云、李先念、薄一波等对1956年初经济工作中急躁冒进错误的纠正，是完全正确的，在组织原则上也无可指责，它得到了包括毛泽东在内的中央其他主要领导人的赞同。但是，1957年反右派斗争后，毛泽东却把极少数右派分子的进攻部分地归咎于此，在党的八届三中全会、南宁会议、成都会议等一系列重要会议上，对反冒进及其主持者进行了愈益严厉的批评和指责，直至1958年5月党的八大二次会议正式作出了否定的结论。与此同时，他还提出了15年赶上英国，生产计划实行两本帐，5到7年内地方工业产值要超过农业产值等许多超越现实可能的口号、任务和方法，片面强调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和破除旧的规章制度，从而急剧地滋长了1955年底1956年初即已产生的急躁冒进情绪，导致了“大跃进”运动的发动。因此，我认为，“大跃进”运动的发动，是毛泽东冲破中央的集体领导、将他的个人意志凌驾于中央集体决策之上的结果。

对于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毛泽东虽然讲过他只有推广之功，而无发明之权，但根据目前所能看到的资料，实际情况并非如此。他所推广的仅仅是别人发明的具体名称，建立政社合一、工农商学兵合在一起、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的基本构想，还是出自于毛泽东本人。能够证明这一点的材料很多，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

至于谈到毛泽东对运动的领导，就更能说明问题。“大跃进”运动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期间，毛泽东不但不辞劳苦，事必躬亲，直接指挥他过去不太与闻的经济工作，而且，为了推行和维护“大跃进”、人民公社的理想和原则，不惜一次次地发动严酷的政治斗争。这当中，影响最大的自然是1959年的庐山会议和会后的“反右倾”运动。此外，还有拔白旗、农村社会主义教育、整风整社和民主革命补课等。据1962年甄别平反时估计，几年间受到斗争和打击的干部、群众多达1000万人。

当然，说以上这些，并不是要开脱其他领导人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问题上的责任，将错误完全归咎于毛泽东一人，而只是要说明毛泽东确实是“大跃进”运动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最主要的发动者和领导者，在此问题上他应该负第一位的责任。现在国外有个别学者，仅仅因为抓住了“大跃进”中的某些具体错误最先来自于其他领导人这一事实，就轻率地认定“大跃进”运动的真正发动者并不是毛泽东，是不符合历史的本来面目的。

访问人：如果这个观点成立，请问毛泽东为什么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这样感兴趣？

谢春涛：其实也就是毛泽东发动这两个运动的原因。我把两个运动分开来说。毛泽东发动“大跃进”运动的原因，主要有三点：第一，急于改变中国的贫穷落后面貌。可以说，使中华民族以繁荣富强的形象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是毛泽东多年的夙愿和终生追求的目标，而战后两大阵营之间的冷战和可能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危险，又大大加剧了他的危机感和紧迫感。因此，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毛泽东考虑最多的问题，便是如何加快建设的速度，这是他发动“大跃进”运动的最重要的原因。第二，过分夸大了人的主观能动作用。毛泽东哲学思想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强调发挥人的主观能动作用，认为它在一定条件下能够起决定性的作用。但是，发挥人的主观能动作用，必须以了解和尊重客观规律为前提。在对经济建设的客观规律知之不多的情况下，片面强调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敢说敢做，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作用，便难免走上唯意志论的歧途。第三，机械地套用了革命战争年代的经验。1956年上半年，毛泽东明确提出了借鉴苏联的经验教训，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道路的任务，但他最终找到并运用于经济建设的，却是革命战争年代的经验。在毛泽东看来，开展政治斗争，大搞群众运动的办法，不但使民主革命取得了胜利，也使社会主义改造得到了成功，在经济建设方面同样也能够适用。“大跃进”运动就是用革命的方法进行经济建设的一次典型的实践。

访问人：毛泽东发动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原因是什么？谢春涛：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片面理解了生产关系对生产力发展的促进作用，以为生产关系越先进，公有化程度越高，就越能推动生产力的发展。二是机械地搬用了马克思、恩格斯等人关于社会主义的理论，把他们设想的在高度发达的生产力基础上才能实行的东西搬到了落后的中国社会，如按需分配和破除资产阶级法权等。三是错误地认为“穷则革命，富则变修”，想通过人民公社趁穷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四是受到了中国历史上农业社会主义的影响，如人民公社化运动期间毛泽东就推崇过东汉张鲁的“置义舍”、“置义米肉”和康有为的《大同书》等。五是不切实际地看待了革命战争年代的成功经验，企图推行在战争年代起过重要作用的军事共产主义。另外，50年代末苏联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的理论与实践，也对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发动产生了重要影响。

除以上主观方面的原因外，“大跃进”运动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发动还有重要的客观条件。这就是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遭到严重破坏的党内民主、小生产者的汪洋大海和低下的文化科学水平。如果没有上述几方面的条件，那就很难想象能够出现“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这样荒唐的错误，并且在短时间内得不到及时有效的抵制和纠正。

访问人：在工农业的高指标中，毛泽东似乎更欣赏农业的高指标，他是

否真的相信粮食能亩产几千斤、几万斤？

谢春涛：对农业的高指标，确切点说，应该是农业生产的“大跃进”，毛泽东的确是很欣赏的。1958年8月初，在与来访的赫鲁晓夫谈话时，他就表露过自己的喜悦之情。他说：1949年中国解放我是很高兴的，但是觉得中国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因为中国很落后，很穷，一穷二白。以后对工商业的改造、抗美援朝的胜利，又愉快又不愉快。只有这次大跃进，我才完全愉快了！按照这个速度发展下去，中国人民的幸福生活完全有指望了！在工农业的“大跃进”中，毛泽东更欣赏农业的“大跃进”，大概与他出身农家，深知农民长期不得温饱之苦和身为大国领袖，不得不以很大的精力关注6亿人口的吃饭问题有关。也有农业是发展工业的基础，要想工业“大跃进”必须先取得农业的“跃进”发展这一重要因素。

至于说毛泽东是否真的相信粮食能亩产几千斤、几万斤？也就是说是否真的相信当时发射的农作物“高产卫星”？应该说，他在1958年夏秋，特别是1958年夏，还是基本相信的。例如，他在视察河北、河南、山东和北京郊区时，不但相信了当地干部汇报的农作物高产数字，而且，还对他们提出的棉花亩产5千斤、水稻亩产4万斤、白菜亩产120万斤等高产计划表示了赞赏。也正因为相信农业“大跃进”取得了很大的成绩，相信长期困扰着自己的粮食问题真正地得到了解决，他才在视察河北省徐水县时要求考虑粮食多了怎么办的问题，提出粮食多了，以后就少种一些，一天做半天的活儿，另外半天搞文化、学科学、闹文化娱乐、办大学、中学，一天吃5顿也行；也才在随后又进一步考虑出可以用1/3的耕地种粮食、1/3的耕地轮休、1/3的耕地种观赏植物这一解决粮食多了问题的“三三制”方案，并将其写进八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

当然，对农业方面虚报浮夸的数字，毛泽东也不是完全没有怀疑的。即使是在热度最高的1958年夏天，他也对个别过于离谱的做法表明过不以为然的态度。例如，天津市郊区新立村把从10亩地上收割的水稻“密植”到1亩地里，宣称亩产达到10万斤，他在到此视察时就尖锐地指出这是吹牛皮、放大炮。对于农业部汇报的1958年全年粮食估产达到1万亿斤的数字（1957年是3700亿斤），他也表示怀疑，在宣布时砍掉1/3，降为6000—7000亿斤（后来核实的结果仅为4000亿斤）。在1959年春天“大跃进”、人民公社化错误的恶果开始显现，全国范围内粮食供应紧张，不少地区出现农民逃荒要饭、被饿病饿死的情况后，毛泽东就基本不再相信农业方面的虚报浮夸了，“高产卫星”以后也再没有放过。

访问人：英明者，莫如毛泽东。所谓高产卫星，稍有农业常识的人都会知道那是浮夸，对农村有相当了解的毛泽东，为什么相信了呢？是什么因素使他相信的？

谢春涛：关于这个问题，毛泽东自己曾经说过，他上了科学家的当。有位著名的科学家在1958年6月16日的《中国青年报》上发表文章，论述了粮食作物能够巨额增产的“科学”道理。文章说，如果植物能利用射到一亩地上太阳光能的30%，稻麦的亩产量就有可能达到4万斤。事实上问题不会这么简单，这位科学家的文章对毛泽东的影响固然很大，但也不会是使他相信虚报浮夸数字的唯一因素。在这一问题上，下列几方面的因素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一、1958年农作物确实丰产。由于1957年秋冬全国农村大搞农田基本建设，大力积肥造肥，加上天公作美，风调雨顺，1958年夏秋作物

明显好于往年，毛泽东视察河北、河南、山东等地看到的确实是一派大丰收的景象。二、大量的浮夸宣传。翻开 1958 年夏天的《人民日报》，几乎每天都有几条放农作物“高产卫星”的消息。虽是虚假的报道，但内容却显得很真实：高产田面积的计算精确到几分几厘，农作物总产和亩产的计算精确到几两几钱。登在中央机关报上的如此精确的数字，很容易让人信以为真。三、层层虚报的数字。为了显示自己的“跃进”成绩，各级机关在上报农作物产量的统计数字时，几乎都要加上相当数量的水分。但是，这种层层加码、虚假成分很大的数字，反倒以经过压缩、稳妥可信的面目出现在毛泽东面前。例如，1958 年 11 月 16 日分管农业的领导人向毛泽东汇报的 8500 亿斤的全年粮食总产量，就被说成是经过省、市、自治区压缩后上报的，而且，压缩的幅度比地、县委报的数字少 10—30%。这样的数字，很难让人完全不信。四、其他领导人的影响。1958 年夏秋，除毛泽东经常在外地视察外，其他主要领导人也纷纷外出考察，他们几乎众口一辞地对“大跃进”的“伟大成绩”进行了充分肯定。有位领导人就曾在 9 月 26 日的《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宣传自己亲眼看到的广东省番禺县亩产 100 万斤番薯、60 万斤甘蔗、5 万斤水稻的“事实”。这样的言论，不会不对毛泽东产生一定影响。不过，说到最后，我认为最重要的原因还是毛泽东不懂自然科学和缺乏对实际的深入了解，否则，他就不能相信那些天方夜谭式的神话。

访问人：事情已经过去了 30 多年，我们应该如何看待这段历史？

谢春涛：同“文化大革命”一样，“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是毛泽东在建国后的一次严重失误。这段历史，对毛泽东个人来说，自然是很大的不幸；对党、国家和人民来说，更是一场沉重的灾难。“大跃进”期间，仅直接经济损失就高达 1200 多亿元。至于在 50、60 年代一些国家和地区经济起飞情况下，因 3 年“跃进”、5 年调整而贻误 8 年的发展时间所造成的损失，更是大得无法数计。政治上，也导致了严重的后果。1958—1960 年间毛泽东发动一次次政治斗争，是为了推行和维护“大跃进”、人民公社化的理想和原则。1962 年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大批“黑暗风”、“单干风”和“翻案风”。并系统地提出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理论，也与他不愿彻底承认“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错误，仍然坚持某些带有浓厚空想色彩的社会主义构想有关。因此，可以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实践及其失败，是毛泽东日后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重要根源。

对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评价，有人认为应该一分为二，应该肯定其还有正确的一面，承认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对这一观点，我是不同意的。诚然，“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期间，由于人民群众的艰辛努力，工农业生产取得了一定成绩：建立了少量新兴工业的基础，增加了部分工业生产能力，在农田水利建设方面也完成了一些适合需要的工程。但这是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取得的，其投入和产出根本不成比例，如果没有“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其成绩必然更大，效益一定会更好。在这个问题上，应该像评价“文化大革命”时把“文化大革命”运动同“文化大革命”期间分开一样，也把“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同“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期间分开。不能因为否定“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而否定 1958—1960 年间的全部工作，同样，也不能把这 3 年间的一些成绩归功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

“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是党在开始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

设道路过程中的重大失误。它的发生，不是偶然的，与党的领导人对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理论准备和实践经验严重不足有着很大的关系。不但毛泽东如此，就是周恩来等负责经济工作的领导人也有同样的问题，他们之间的差别不过是不足程度的不同而已。因此，对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的错误，除毛泽东应负主要责任外，其他领导人，包括一些地方的负责人，也都程度不同地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在此问题上，邓小平 1980 年在谈到如何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时，曾经发表过很好的意见。他说：“讲错误，不应该只讲毛泽东同志，中央许多负责同志都有错误。‘大跃进’，毛泽东同志头脑发热，我们不发热？刘少奇同志、周恩来同志和我都没有反对，陈云同志没有说话。在这些问题上要公正，不要造成一种印象，别的人都正确，只有一个人犯错误。这不符合事实。”

访问人：研究过去，为的是现在和未来。根据你的研究，我们怎样做才能彻底避免这类历史错误的发生？

谢春涛：我认为最好的态度，首先应该是注重研究和分析其发生的各种原因，从中总结和吸取经验教训，力求在以后的工作中避免重蹈过去的覆辙。几十年来，我们虽然没有在同等程度上重演“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悲剧，但与其性质相同的急于求成和急于过渡的错误却也大大小小地出现过几次，这不能不说是因为没有真正深刻地总结和吸取历史的经验教训。第二，近十几年来，随着改革开放事业的深入进行和正反两方面经验的不断积累，理论界人士在与“大跃进”同出一辙的经济过热问题上，越来越多地将其发生原因归结到旧的经济和政治体制上，认为中国经济要想真正走出过热和紧缩的怪圈，就必须彻底改革其赖以存在的经济和政治体制。我是很赞成这一观点的。

1993 年 6 月于中央党校

## 访张化——毛泽东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 张化

张化，1952年生，原籍山西。现任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助理研究员，从事社会主义时期中共党史的研究。发表过《试论“文化大革命”中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九·一三事件后毛泽东的思想矛盾及其变化》、《走出阶级斗争为纲的误区》等论文。

张化也是“老三届”，后来从事党史研究，谈起来颇有见地。她几次对我们说，这一代在“广阔天地”里度过了少年和青年时代的人们，有一个共同的感受——决不后悔。

### 一代人的追寻

访问人：发生在中国五六十年代以至70年代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一事，曾经牵涉到千家万户，在中国现代史上留下了深深的印记。它是怎么兴起的？有着怎样的社会背景？它和毛泽东又有什么样的联系？这些问题至今还萦绕着人们。你在这方面有研究，我们想听听你的看法。

张化：对于这个问题深入的研究，我还谈不上，但是愿意和更多的人一起作进一步的探讨。1986年，我写过一篇论文：《试论“文化大革命”中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在写作论文的过程中，做了一些调查，也接触了一些不同年代上山下乡的知青朋友。我在“文化大革命”中也有过当知青下乡插队的经历。此时，与这些不同年龄却经历大致相同的知青一起回顾这段历史，真是思绪万端。在这些知青中，有的是五、六十年代就下乡、支边的老知青，他们中的不少人已经年过半百，还留在当年下乡、支边的地方。一些人在生活和工作上仍然面临着各种困难。所以，这个问题不仅是历史问题，还是一个比较敏感的现实问题。当我们从历史角度谈到这个问题时，我感到一个需要注意的前提是，要使自己从中“跳”出来，采取远距离审视的方式，才能把这个当代中国史上贯穿了20多个年头的复杂问题看清楚。

访问人：这几年研究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的东西渐渐多了起来，其中，包括一些文学作品，你感到这些作品，对上山下乡运动把握得怎样？

张化：对于这些年社会上发表的作品，我看了一些，感到这些年以知青生活为题材的文学作品从总体上讲在不断走向成熟。作者们正在运用文学手段，通过塑造的各种人物越来越深入地触及这段历史生活的一些深层矛盾，写出了一些令人思考的东西。不过，文学创作毕竟和历史研究不同。历史研究需要冷静、客观，从整体上把握这一事物的来龙去脉，既要说出它的本然，还要说出它的所以然。不管人们用怎样的形式反映这段历史，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对于这段历史，人们并没有随着它在1978年的结束逐渐地淡忘它，相反的是，对于它的回顾、反思在不断加重。也许大家都注意到了，这几年不仅以知青生活为题材的文学作品不断问世，不少地区还举办了知青回顾展。在一些城市，“知青饭馆”、“老插餐厅”等已成为人们流连忘返的场所。这种“知青热”的现象是耐人寻味的。

访问人：你认为这种现象的出现，有没有更深层次的原因呢？

张化：从浅层看，由于这段历史形成了一个特殊的群体，涉及到数目很大的一代人，因此这段历史成为使成千上万的人难以忘怀的一个内容。举一个例子，1990年底在北京举办的北大荒知青回顾展，参观人次达到10万多，有的是从千里之外的上海、云南、陕西、四川等地专程赶来的，甚至有

人5次走进展览大厅。这个展览在社会上引起的强烈反响，超过了主办者的预想。一个地区的知青回顾展，何以会在全国产生如此轰动的社会效应？这说明了更深一层的原因，即一代人的精神追求。

访问人：有人把这个现象概括为“知青文化”。还有人把这段历史说成是“一代人的梦想”。

张化：不论人们怎样去概括，它反映出人们已经开始从一定的高度来认识“知青热”的社会现象。“知青热”的出现，固然与我们刚才谈到的一代人的特殊经历有关，不过，在这一现象背后起支配作用的并不完全是“向后看”的感情因素。可以观察一下周围，在我国今天的生活中，当年的知青已经成为共和国向现代化迈进的骨干，成为中华民族跨世纪的中坚力量。他们那一段特殊的人生经历，不仅对现在，对将来也有重要影响。一些知青说得好，回顾、反思知青经历，是要去寻找当年的一种精神，寻找当年艰苦奋斗，勇于开拓的知青精神。无怪乎许多知青在参观知青展览，或走进知青饭馆时，并不是自己一个人，随行的还有他们的子女。这说明一大批知青对于那段经历的回顾已经超越了人生经历的一般意义。他们把自己的经历与共和国的历史发展联系在一起，从中去体味人生，在国家曲折发展的历程中追寻具有积极意义的奋斗精神和人生价值，使之成为一种宝贵的精神财富。这就使对于这段历史的回顾超越了过去，关注着未来，具有了“向前看”的深刻意义。我们搞历史研究，应该注意到这个现象，也站在这样的高度来看问题，从中总结出一些有益的东西。如果有了这样一个立足点，那么在谈到毛泽东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关系时，在谈到其中的利弊得失时，也就能谈得客观一些。

#### 发端与号召

访问人：不管是五、六十年代，还是70年代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都有一个共同的感受，就是当年他们选择的这个行动是为响应毛主席的号召而去的。从这里，可以看出毛泽东与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的关系。实际情况怎样？

张化：在谈到这个问题时，我有一个总的想法，就是要把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一定历史阶段出现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这一事物，与“文化大革命”中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区别开来。基于这种考虑，我看最好不要对这20多年的历史笼统地冠以“运动”二字。另外，在这20多年中，毛泽东确实先后不断地有过号召，但是从其影响程度来说，还是有差别的。我们还是分阶段地谈比较好。

访问人：1955年下半年，毛泽东在他编辑的《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的按语中有过这样的指示：“一切可以到农村中去工作的这样的知识分子，应当高兴地到那里去。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这段话曾经成为50年代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号召，是吗？

张化：1955年毛泽东的这一号召对于全国城镇知青开始上山下乡确实起了推动作用。不过，从当时党中央领导集体的状况看，毛泽东的认识也反映了新中国第一代领导集体对于这个问题的基本思路。这样，我更倾向于把毛泽东的指示看作是他代表党中央发出的号召，也就是说，这个时期毛泽东个人对于这一事物出现的影响并不突出。

访问人：你是否能详细地谈一下。

张化：这要从知青上山下乡出现在50年代的基本原因谈起。1956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1956—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中提出了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口号。当时，国家发出知青上山下乡的号召，是

以新中国成立不久的社会状况为背景的。这时，成立不久的新中国经济刚刚恢复，国家还不可能马上就解决城市中的就业问题，因此，新中国第一代领导人的思路就是把城市里容纳不了的、闲散在社会上的中小学毕业生组织起来支援农业和边疆建设。1957年4月，由刘少奇主持写成的《人民日报》社论《关于中小学毕业生参加农业生产问题》讲得很明确：“就全国说来，最能够容纳人的地方是农村，容纳人最多的方面是农业。所以，从事农业是今后安排中小学毕业生的主要方向，也是他们今后就业的主要途径。”可以说，知青上山下乡这一事物在50年代中期出现的基本原因，在于经济方面。

当然，根据我国当时农业合作化的需要，根据开发、建设边疆的需要，组织知青上山下乡这一作法也显出了它的必要性。毛泽东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的按语中就提出这样的问题：“全国合作化，需要几百万人当会计，到哪里去找呢？”接着，他便写道：“其实人是有的，可以动员大批的高小毕业生和中学毕业生去做这个工作。”在同一年，团中央开始组织知识青年支援边疆建设。团中央书记胡耀邦在一次报告中列举了我国国土辽阔，但是可耕地面积有限，有一半还没有开垦的情况。他情绪激昂地号召青年人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向困难进军。在党中央的号召下，1955年8月，由北京青年杨华等5人发起组成了北京青年志愿垦荒队，在黑龙江萝北县建立了全国第一个知青垦荒点。随后，团中央先后在京、津、沪等10多个省、市组织了远征垦荒队。仅在1956年这一年，全国就有近20万名青年参加志愿垦荒。由城市下乡、回乡，参加农业生产的青年更多。

访问人：这么看，50年代中期毛泽东的号召虽然对动员知青上山下乡起了重要作用，但并不是基本的原因。

张化：是的。50年代知青上山下乡的出现是与我国当时的历史条件联系在一起的，这就是经济落后，人口众多，城市就业困难，与此同时，农业合作化需要能写会算的人才，广阔的边疆地区也需要开发建设，这样就产生了这个在当时历史条件下还是比较好的作法。

访问人：为什么说是“比较好的作法”？

张化：“比较”，是相对于80年代我们找到的更好作法而言。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除了确实有社会的客观需要以外，考虑问题的出发点也是好的，着眼于中国实际，试图把解决城镇剩余劳动力问题和改变我国经济、文化发展不平衡的状况结合起来，在农村、边疆探索出一条适合我国国情的就业路子。另外，当时的组织工作也做得不错，强调自愿，政策稳妥，大多数知青的思想是安定的。因此，我不主张把这一事物的出现简单地归结为毛泽东号召的结果。当时，许多国家领导人在这个问题上都有过号召，认识基本上是一致的。我觉得毛泽东的号召代表了这一时期党中央的认识，不应过分强调这时他个人的作用。

访问人：这一事物的出现，恐怕还同那时的经济体制有关。50年代中期，我国建立起了高度集中的经济体制，就业的门路就更窄了。

张化：有这个原因。准确他说，这是知青上山下乡延续下去的一个重要原因。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我国建立起了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体制，生产关系过于简单化。在劳动制度上，所有城镇劳动力都由国家统包统配，这就使我们这样一个经济不发达、人口众多的国家的就业问题更加突出了。这可以说是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与我国国情不相适应的一个重要表现。怎么解决问题呢？当时不可能有我们今天这样的认识，于是就想到要

分流就业压力。流到哪里去？城市容纳不下，只有流向农村。当然。这一作法延续下去的原因还有两个方面：一是长期忽视计划生育，城市每年出现的大量新生劳动力就业的压力；二是60年代调整国民经济，精简职工，减少城镇人口的需要。

访问人：我们再回到50年代毛泽东与知青上山下乡的关系上来，尽管知青上山下乡的基本原因是一个就业问题，但是毛泽东的号召很有浪漫色彩，“广阔天地”一词是很有感染力、号召力的，不是吗？

张化：我不主张在谈到知青上山下乡的起因时，过于突出毛泽东个人的影响，并不等于否认这种影响。“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号召，固然反映了毛泽东对中国农村在社会主义建设中重要性的认识，但也表现出他对一代青年在农村、边疆建功立业的殷切期望。这与他个人的经历有密切关系。在中国土地上成长起来的毛泽东，在领导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过程中就十分重视农村和农民的地位、作用。在他的领导下，中国共产党成功地开创了一条建立农村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新中国建立后，如何改变中华民族贫穷落后的面貌，使广大的农民走上富裕之路，是他长期考虑的问题。农村和农民，在毛泽东的思想上占有重要位置。教育子女时，毛泽东也是这样，要求他们一定要了解农村，了解农民。毛岸英从苏联回国后，毛泽东把他送到农民中去进行再学习，已是广为传颂的佳话。毛泽东的思想、精神对于五、六十年代的青年是很有影响的。所以，在他的号召下，一大批志向远大、抱负不凡的青年主动要求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曾经形成一种风尚。应该提到，在五、六十年代志愿到农村、边疆去的青年中，有些人并不是为了解决就业问题，而是主动放弃了升学、就业的机会，立志改变农村的落后面貌而去当农民的；还有一些人是学有所长的大学、中专毕业生，为了开发、建设边疆而奔赴边疆的。从这一点说，这一代知青身上体现的“好儿女志在四方”的精神，与毛泽东那种“我自欲为江海客，更不为呢呢儿女语”和“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的精神境界是一脉相承的。从总体上讲，“好儿女志在四方”；或许是毛泽东时代的青年的一种精神特征吧！刚才我们

谈到在这几年的“知青热”中人们所追寻的或许正是这种精神。

访问人：在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时，有人提出对于知青上山下乡也要予以否定。

张化：这种说法不仅不科学，也难以让人接受。首先，它否认了50年代知青上山下乡这一事物出现的客观社会原因，把这一事物与“文化大革命”中的知青上山下乡运动混为一谈了。其次，它从根本上否定了一大批知青那种不避艰难，无私奉献，艰苦创业，勇于开拓的献身精神和奋斗业绩。

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曲折历程中，不管出现过怎样的问题和失误，对于一大批知青的献身精神和奋斗业绩始终应予肯定。事实也是如此，这一代青年以他们的青春，热血，以至生命，已经在共和国的历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一页。

### 高涨与扭曲

访问人：到“文革”时期，知青上山下乡又掀起一个高潮。怎么看待这一时期的知青上山下乡呢？

张化：在“文化大革命”的特殊历史条件下，知青上山下乡变成了一场政治运动，成了那场史无前例的“革命”的一个组成部分。这是一个重要的

变化，也是这一时期的知青上山下乡不同于以往的根本区别。

访问人：这一时期，毛泽东与知青上山下乡是怎样的关系？

张化：“文革”时期知青上山下乡变成了一场运动，这里，主要的原因是毛泽东晚年“左”倾错误的影响。这种错误的影响与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的关系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文化大革命”造成的严重混乱，使知青上山下乡成为解决“老三届”毕业生就业出路的一项应急措施，这是形成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的政治社会原因。二是“再教育”理论的提出，把知青上山下乡提到了“反修防修”的战略高度，使其具有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强烈政治色彩，这是形成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的理论指导。这两个方面根源于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和错误实践，都明显地表现出了毛泽东个人的思想影响。

访问人：“文化大革命”中的知青上山下乡是哪一年开始的？

张化：1967年10月，北京曾经有一些中学的红卫兵自动前往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插队落户。这时，他们的行动还不具有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的特点。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的发端在1968年下半年，1968年年底形成高潮。自“文化大革命”发动后，大量的中学生由“停课闹革命”，成立红卫兵组织，到走上社会“造反”，一直积压在学校没有进行分配。当时大学不招生，工厂不招工，商业和服务行业处于停滞状态，这样到1968年积压在校的1966、1967、1968届的初、高中毕业生，已经达到一千余万人之多。这么一大批中学生积压在校，不仅成为社会动荡不安的一个因素，而且影响到正常教学秩序的恢复，实际上已经转化为城镇的剩余劳动力。1968年下半年，随着各地权力机构“革命委员会”的建立，毕业生的分配问题终于提上了日程。在国民经济全面衰退的情况下，当然无法解决数以千万计的中学毕业生的就业问题，于是，一场轰轰烈烈的知青上山下乡运动就开始了。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知青上山下乡运动和红卫兵运动是“文化大革命”中两个相互衔接的“上下篇”。这种以不正常的方式解决大量中学毕业生就业问题的作法，是形成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的直接的政治社会原因。

访问人：在这一次知青上山下乡的高潮中，毛泽东发出过“接受再教育”的号召。实际情况怎样？毛泽东的号召起了什么作用？

张化：1968年7、8月起，全国掀起了宣传“再教育”理论的高潮。毛泽东发表了一系列指示，提出对于知识分子“要在正确路线领导之下，由工农兵给他们以再教育”。年底，毛泽东又发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号召。同是号召知青上山下乡，把50年代毛泽东的号召与60年代毛泽东的号召对照一下，从“广阔天地”、“大有作为”，到“接受再教育”，这里，知青的地位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是由于毛泽东思想认识的变化，导致的知青上山下乡性质的改变。“再教育”思想的提出与毛泽东对建国后教育工作的看法有关。他认为建国后教育战线基本上是修正主义的，培养了一批脱离实际，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青年学生。他要求青年不要脱离实际，关门读书，要注重在社会实践中增长才干，这种思想当然是正确的。但是，他错误地把阶级斗争作为青年的“一门主课”，要在“革命的大风浪”中培养和造就接班人。这就把知青上山下乡运动提到了反修防修的战略高度。成了青年学生“脱胎换骨”，“彻底改变旧思想”的改造过程。

访问人：你谈的这两个方面很重要。这样一比较，知青上山下乡在 50

年代中期与 60 年代中期是有了很大的不同。

张化：上面谈的两个方面主要是侧重毛泽东个人的影响。在实际工作中，由于“文化大革命”中极“左”思潮的泛滥，知青上山下乡在方针政策、方式方法等方面都表现出明显的政治运动的特点，这也是完全不同于以前的。作为一项应急措施，它一哄而起，缺乏整体规划，工作相当混乱。出现了许多简单生硬的作法，提出了一些绝对化的口号，比如，下不下乡，走不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是衡量一个青年真革命或假革命的唯一标准；越是条件不好的地方，越是要去“扎根”，等等。人为地造成了许多困难。

访问人：你认为，应该怎样评价“文化大革命”中的知青上山下乡运动？上山下乡的实践，对于知青来讲，是“得”大，还是“失”大？

张化：“文化大革命”中的知青上山下乡运动，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在错误的思想指导下形成的一场政治运动。我的看法是应予否定的。要说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的得失大小，这可以从知青个人和国家两方面来讲。首先，我想从长远的影响看，从知青个人讲，通过上山下乡的实践固然可以得到一些有益的锻炼和收获，但是他们丧失了接受系统教育的最好时机，对于人才的成长来说，这是一个很大的损失。其次，从国家讲，这一作法加剧了“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教育中断。在“文化大革命”中，知青上山下乡曾被宣传为有利于缩小三大差别的“战略部署”。事实上，强制性地使上千万知识青年放到农村去的作法，不仅没有使三大差别缩小，反而拉大了我国与世界发达国家和部分发展中国家的差距。这种社会后果是很值得思考的。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知识分子应当采取怎样的形式与社会实践相结合，运用科学知识为振兴农村和边疆服务？在我国这样经济不发达的国家里，通过怎样的途径才能逐步缩小三大差别？可以说是这段历史遗留给我们的问题。显然，毛泽东一直在考虑这些问题，但是方法不对。

访问人：动机和效果不统一，这大概是毛泽东的悲剧所在。

张化：是的。毛泽东在领导国家从革命转向建设时，在许多问题上，仍沿用了他领导革命时的思路去指导建设。他有使国家富强的愿望，一直到晚年，他对国民经济的发展也是十分关心的。遗憾的是，如何更快地发展社会生产力，如何认识处理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如何认识知识和知识分子的地位、作用，等等，在这些问题上都出了偏差。

访问人：涉及到对这些问题的认识，在那个时代，并不止毛泽东一个人，党内相当多的领导人也是这种看法。

张化：所以，“文化大革命”的悲剧，并不仅是毛泽东一个人的悲剧，从某种角度讲，也是全党的悲剧。这说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在完成了一个大的社会变革转向现代化建设时，很重要的一个问题是思想观念的转变。转变过程伴随着痛苦。好在我们党在经历了痛苦的曲折之后，终于找到了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

#### 新的探索与好的前景

访问人：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知青上山下乡的情况怎样呢？

张化：三中全会后，党和政府在搞活经济的过程中，逐步认识到在我国城市和农村都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需要就业的情况下，试图通过知青上山下乡来解决城镇青年就业问题的作法是不成功的。劳动就业问题的解决，从根本上说，取决于生产的发展，有赖于社会经济关系的全面调整 and 改革。因此，随着经济体制的改革，实行多种形式的经济所有制，广开就业门路，使我国

长期存在的就业难的矛盾基本上得到了缓解。从 1979 至 1981 年全国共安排了 2600 多万人就业。这样，全国范围内的知青上山下乡就逐步结束了。

在改革开放中，一个值得注意的可喜现象是，随着农业改革的成功，乡镇企业的兴起，正在吸引着不少知识分子到农村去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有些地方的农民们把欢迎知识分子称为“请财神”。这种自发的流向完全不同于旧体制下采用的行政手段。

访问人：这是完全不同的思路。到南方去过的同志都说，在一些地方城乡、工农差别在逐步缩小。

张化：变化是很大的。仔细观察一下，现在志愿到农村、边疆去工作的，已经不仅是有知识的青年，还有老年。一些教授、工程师退休后接受乡镇企业的招聘，把工作岗位转向农村、边疆的事例并不少见。农村、边疆的发展为不同年龄段的知识分子提供了用武的广阔天地。知识分子作为知识的载体，通过走向农村和边疆，促进这些地区经济的发展，这是更高层次上的“结合”。另一方面，乡镇企业的发展大量地吸纳着农业劳动力，我国农业人口的一部分正在向非农产业转移。这是像我们这样落后的农业国向现代化国家迈进的重要途径。这一切都将引起社会的深刻变化。而这些变化，正是毛泽东曾经设想的，但是没有实现。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他的愿望正在逐步实现。这是可以告慰于他老人家的。对于我们国家正在出现的变化和已经取得的发展，我想，不论是有过上山下乡经历的人们，或者是一直留在上山下乡地方的老知青，都会感到由衷的高兴。

访问人：通过知青上山下乡这一段历史，可以感到我国探索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艰难。

张化：这是一段比较复杂的历史，几经变化，在每一个阶段都有不同的内容和表现形式。在回顾这段历史时，最好把它放到 50 年代中期党开始探索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曲折过程中去认识，而不是依据自己的一段亲身经历来下结论。更不要因为一些时期表面形式的相同而忽视了内在性质的变化。1986 年我那篇论文发表后，有的人找到我，问：对于知青上山下乡，到底应该肯定，还是否定？我很抱歉，实在无法用非黑即白的方式作回答。对于这段历史的再认识，对于毛泽东与知青上山下乡的关系，自然是我的同龄人——在毛泽东时代成长起来的、有过上山下乡经历的一代人都会关心的问题。我想，如果我们历史地、客观地回顾这段历史，既不苛求前人，又不一概而论，那么，对于这段历史中哪些应该肯定，哪些应该否定，哪些应该坚持发扬，也就可以得出自己的结论了。

访问人：谢谢您给我们谈了这些有启发的话。

1993 年 9 月 12 日于颐和园后街

## 访竹内实——我看毛泽东的最大特色

竹内实，1923年出生于中国山东省。现为京都大学名誉教授、立命馆大学教授。曾获1991年度亚洲文化奖。主持编辑了多卷本《毛泽东集》。还著有《毛泽东——其诗与人生》（合著，中文译《诗人毛泽东》）、《毛泽东笔记》、《毛泽东与中国共产党》、《毛泽东》等。

竹内实先生是日本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他以主编多卷本《毛泽东集》享誉国际学术界。我们的谈话，是先寄去提纲，他用日文笔答的，这要感谢卢洁女士，来往相寄，翻译中文，都由她代劳。

访问人：您认为毛泽东的最大特色是什么？

竹内实：这个问题也是我的研究中感兴趣的一个问题。我认为毛泽东革命的最大特色是与农民相结合。在农民中建立革命的基础，对农民进行宣传，在农民中征募革命的参加者，并且将革命中获得的成果首先返还给农民。换句话说，就是在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并把它扩大，继而包围城市。但是，我所说的“革命根据地”，不是指利用防御阵地来保卫周围的区域，而是指拥有广阔空间的农村。因此，与其说是农村，不如说是农民更为妥当。

访问人：那么，这里所说的“与农民相结合”是指什么呢？

竹内实：它是指采纳了“吃大户”这一传统的农民反抗形式。农民受到地主欺负，到了饥懂而无法生存的时候，他们就冲入地主的宅邪，抢夺粮食、钱财（主要是抢粮）。1910年4月，长沙发生了大规模的暴动，其余波也波及到了韶山。毛泽东父亲的大米也被抢走了。这给毛泽东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他接近农民（他在孩童时代就干农活）、不蔑视农民。但这时他家成为农民“造反”的对象。1927年上井冈山以后一直开展游击战，当时采取的就是袭击地主的宅邪、没收其粮食、钱财，以供工农红军活动的需要，同时也分给那片土地上的农民。

与农民相结合的方法是“吃大户”。但不只限于没收粮食、钱财，还没收其土地并重新进行分配。于是就更加强了与农民的结合。中国的革命，可以说是与“土地革命”相结合后，才获得了胜利入场券。然而，以莫斯科为中心的共产国际的方针是组织城市的工人进行罢工，推翻政权。毛泽东完全没有接受共产国际的这一方针。反对共产国际，对于当时的共产党员来说是做梦都不敢想的事情。反对共产国际的共产党员，“被戴上“反革命”的帽子。因此可以说毛泽东由于走上了“反革命”的道路，才把革命引向胜利。

但是，需要说明的是，并不是说任何人只要走上“反革命”的道路，就可以把革命引向胜利，必须要看其动机和结果。调查也是必要的。毛泽东反复不断地强调调查活动的重要性，这是理所当然的。

访问人：他的这些特色，在中国现代史上起了怎样的作用？

竹内实：在回答第一问中，我提出了“与农民相结合”。如果把它与中国现代史相联系的话，那么，仅仅提出“与农民相结合”是不够的。然而，中国革命的特色却是没有因此而受到挫折，而是胜利了。因此，最重要的还是“与农民相结合”。而且，革命取得了胜利，结束了1840年以来一百年的近代史。在这里，如果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看成是“现代”的话，可以说革命胜利以后的历史是呈现安全局面的历史。

共和国的成立，无非是要完善国家体制。这个国家把现代化作为目标。

现代化无非是工业化。肩负工业化的是科技人员和工厂的工人。农民在提供工业原料的同时还必须提供工业化的资金。于是，为了把革命引向胜利而“与农民相结合”的毛泽东的革命路线，在革命胜利后，为了使现代化成功也必须进一步加强。但“与农民相结合”的方法不能不说变得复杂了。其方法之一就是成立了人民公社。但这是有限度的，被否定了。我所说的“不能不说变得复杂了”即为此。

进而，我想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即“与农民相结合”的革命中受到锻炼的领导者，在推进现代化的工业建设过程中是否能发挥其领导能力。如果说能够发挥的话，继而又应该提出它将在怎样的领域里发挥的问题。而且，如果“与农民相结合”是正确的话，那么这次也许需要“与科技人员、工厂工人相结合”。如果说有必要的话，又产生怎样结合的新问题。因为舞台由农村转到了城市。然而这不是说因此可以无视农村了。

既然现代史仍在继续进行，因此对于这个问题无法明确回答。但是，在现代历史进程中，如果人们认为可以继续“沿用使革命胜利的方法去做”的话，那么毛泽东的革命特色在这里就起到了“负”的作用：相反，如果人们学习他的睿智、热情、努力，特别是从调查出发的冷静的头脑，并加以创造，就起到了“正”的作用。

提问用了“起了”这一过去时时态。但我认为现代历史大潮仍在进行。因此脱离提问的范围，请原谅。

访问人：他的成功与失败和上述特色有什么关系？

竹内实：中国有“更上一层楼”这一诗句。提问进入第三问，好像也到了更微妙的阶段。

提问用了“他的”，指毛泽东个人。然而到哪儿为止是属于他个人的，从哪儿开始又是属于官方的、社会的，这很难区分开来。在前面的回答中，我使用了“复杂”一词，也是考虑到了“他的”个人因素。

“他”作为湖南省一位农民的孩子出生。乳名叫石三讶子。——由此看来，可以说不能把毛泽东的“与农民相结合”思想分离开来。这种断言也许太极端了，而且“相结合”的内容不一定只是一个。但是正由于是极端的判断，才有人人都能看得见的事实。

我以为和他的成功与失败有关的另一个因素，就是他是诗人。他的诗词几乎都很优秀。当然其中也有平庸之作。既然是在革命中创作的，就很难舍弃。尽管任何人都无法知道革命是否能胜利，但我认为他的乐观态度源于作诗的兴趣。此外，正如虚幻的思想时常表现于诗词中那样，陷于深深的思考也是因为他是诗人。他在剖析自我时，称自己具有猴气和虎气，叫我说他是诗人。是具有诗人气质的人。

新中国成立以后，关于国家建设的规划，更要集中大众的智慧。关于政策的制定与修正，也要建立分析研究来自下层意见的制度（相当于通信机械的“回路”）。然而没有迹象表明考虑过有必要建立这种制度。那么，为什么没有考虑？——由于他的诗人的气质是自始至终的。

毛泽东的诗词应该作为诗人的作品来读。但是既然他的诗词是在革命中咏唱，又是在国家建设中咏唱，因而读者不能不联想到他的政治上的业绩。他没有发表不符合“主席”身分的作品。如果能弄清他丢弃的作品、他不允许发表的作品的话，诗人毛泽东的地位就更明确了。作为国家主席的毛泽东，被诗人毛泽东压倒了，这也关系到他的成功与失败，特别是与建国后的失败

有关，这是我的回答。然而，如果他仅仅是国家主席，仅仅是党的主席，我们就会因此而失去一本诗集。我的心境很复杂。

1993年12月5日于京都

## 访施拉姆——美国人怎样看毛泽东

斯图尔特·R·施拉姆，美国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教授，长期从事毛泽东生平

与思想的研究，出版有《毛泽东》、《毛泽东的政治思想》等多本著作。

这是一篇有点“过时”的访谈，时间是1989年5月。之所以再现于此，原因在于：施拉姆教授对毛泽东的研究早已为中国党史界所熟知，但在美国一般人是否了解毛泽东？他们对毛泽东有怎样的印象？却是国内许多读者不甚知晓的。当初，我们也是带着这个疑问去采访施拉姆教授的。那时，教授行色匆匆，然而他的介绍却使人印象深刻。

访问人：施拉姆教授，您的《毛泽东》一书，自1987年在中国出版以来，一版再版，发行了几十万册，成为外国人研究毛泽东在中国的第一本畅销书。

施拉姆：我的《毛泽东》那本书是20年前写的，不一定代表我现在的观点。我现在的观点并非与以前的完全不同，但确有些区别。《毛泽东的政治思想》一书，现正在翻译，准备出版。这本书我修改了4次，比较地能够反映我现在的观点。我现在写了一篇文章，叫《党的领袖或者君主》，谈到晚年毛泽东的思想。你们要了解我最近关于毛泽东个人的观点，也应该看这一篇。我这篇文章主要是讲毛泽东个人的权威，领导作风及其结果，写得比较具体，都谈到毛泽东个人的作用、性格、行为等。最近也准备在中国翻译出版。

访问人：《毛泽东》是您过去20年前的观点，《毛泽东的政治思想》和《党的领袖或者君主》都没有翻译过来，所以我们很想了解一下您现在对毛泽东是如何评价的。

施拉姆：我最近的观点是：毛泽东这个人是不容易评价的。有一个湖南人给我写信说，他好几年研究毛泽东（我不晓得他在长沙是干什么的），得出的结论：毛泽东是一个既伟大又很复杂的人物。这句话我认为很对。毛泽东确实伟大，他领导你们党。领导你们人民胜利了，建了国，这不能不说是一个伟大的领袖；他的后半生，特别是最后20年左右，很复杂，这个问题现在不容易一下子谈清楚。你们中国人了解毛泽东，比美国人了解得多，不过完全了解这个人恐怕也很不容易。

访问人：我们认为，毛泽东不仅在中国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在世界也是一个有相当影响的人物。请问美国人眼中的毛泽东是一个什么样的形象？

施拉姆：20年前，在美国有一股毛泽东热，学生要造反，他们认为请他们造反的是毛泽东。毛泽东是最伟大的领袖，是最伟大的人。在学者当中，有一批人认为苏联不行，斯大林不行，毛泽东是真正的民族的有创造性的革命者。对毛泽东评价很高。但后来他们知道了“文化大革命”乱子那么大，打死的人那么多，大跃进饿死的人也很多，他们对毛泽东的热情就不那么高了。还有一大批人认为，毛泽东不完全是新权威主义的理论，以为他和斯大林一样，在历史上起过积极的作用，但他是一个可怕而又不可爱的伟大人物。当然，毛泽东请尼克松到中国，并且同美国建立外交关系，中国人认为这是晚年毛泽东为中国人民做的一件好事，在美国有大批人也持这种观点。

1979年以后，毛泽东的活动在美国影响不太大。有一点是最重要的，学生、学者、舆论最感兴趣的是中国三中全会以后的改革，尤其是邓小平。

访问人：我们国内有人说，西方对中国的研究相对来讲有三多，即研究毛泽东的多，孙中山的多，康有为的多。在这三人当中又属研究毛泽东的最

多。

拖拉姆：不能说美国研究毛泽东的人最多。研究梁启超的书比康有为的书多三倍，比较重要的有五六本。关于康有为，比较重要的有一两本。他们也研究严复。严复是中国 19 世纪末的改革派，对西方了解的比较多。研究谭嗣同，所见的有两本书。关于蒋介石的有几本，阎锡山的有两三本，冯玉祥的有一两本。另外，也有研究梁漱溟的。西方学者并不以为写中国历史就是写一本毛泽东传，或者写一本孙中山传就完了。对毛泽东的评价，现在在学者里面否定毛的多一点，他们都知道大跃进的后果，“文化大革命”的后果等。

40 年代以来，一般他说，美国学者对蒋介石评价并不高，认为国民党是腐朽的、无用的。毛泽东使中国人民站起来了。美国舆论认为这是一件好事。毛泽东历来提倡中国不做苏联的傀儡，有自己独立的政策。在这一方面也是美国舆论所肯定的。不能说现在苏联同中国的关系越来越好，戈尔巴乔夫要来华，美国就要反对。这说明国际关系进入新的时代（中东问题除外）。现在美国同苏联的关系也比较好。

1989 年 5 月于北京

## 访比斯塔——毛泽东对我充满理解

基尔提·尼迪·比斯塔，在70年代数次担任尼泊尔政府首相。1993年5月在上海参加第11届国际行动理事会期间，接受中央电视台为拍摄大型电视纪录片《毛泽东》而进行的采访。

对一些国家的前首脑人物的采访，是由中央电视台《毛泽东》摄制组主持实施的，本书的作者之一作为该片撰稿人，也参加了这一工作的前期准备。本篇及后6篇采访录的发表，须感谢摄制组同仁及杨培英、周勇、刘政铸、刘家清等翻译人员。

记者：您曾同毛泽东会见过3次，对他的第一印象是什么？

比斯塔：1965年，我第一次来中国，那年我见到了毛泽东，他给我的印象很深。他的思维敏捷，我们的谈话很好，对我很有启发。实际上，我来自一个非常小的国家，他对我的态度是充满理解的，这种印象一直持续下来。

记者：在他第三次会见您的时候，对贵国的农业问题很关注，您当时有什么想法？

比斯塔：1972年，我最后一次见到毛泽东，在许多中国重要的领导人，特别是毛泽东已经到了生命的最后几年。但他还是问许多问题，主要是农业问题。因为中国有着庞大的人口需要解决温饱，只有通过提高农业生产才能解决这个问题，所以很自然，就会考虑有什么好的办法可以处理这个问题。我发现中国领导人是非常敏锐的。

记者：毛泽东逝世时，您对他有一个非常高的评价，认为他是20世纪最伟大的政治家之一，您现在还这样认为吗？

比斯塔：我仍旧认为他是个伟人，他彻底改变了这个世界的一部分，没有毛泽东，中国不可能有这么大的进步，变得如此富足。真正起到领袖导师作用的是毛泽东。

1993年5月于上海理解这可能是在向美国做某种表示。我们错过了它。我们一直在试图同毛泽东接触，中国人理解了我们的意图，而我们没能理解中国人的意思。我们用了两年时间才真正走到一起。

记者：当您在1975年见到毛泽东时，他的健康状况已非常不好，您是否认为他的健康状况影响了他的才智？

基辛格：我在1975年见到他两次，一次是单独会见，一次同福特总统一起。两次都是他主持会谈。尽管谈话已比较困难，但两次会谈都持续了两个小时，我不认为他的健康影响了他的才智。

记者：当我们观看您访问中国的纪录片时，我们注意到您同毛泽东的第一次会见是在他的书房，那时，您对他的印象如何？是不是知识渊博？

基辛格：我们的会见多数在同一个地方，就是书房。唯一不同就是第一次会见时，他在躺椅上学习，后来那躺椅一直在那里。在地板上，有许多书。第一次会见时，他总不时说一些中国的诗词，我几乎很难理解。他当然是极为睿智的。

记者：我们同样注意到一些有趣的事情。1975年他会见了您和您夫人，当他看到您夫人时脸上露出了有趣的表情，您那时有什么感觉？

基辛格：他觉得有趣是因为我妻子比我要高。

记者：他说了些什么？

基辛格：他对这事做了些评论，问我对比男人还高的女人有什么感觉。

记者：还有一个问题。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毛泽东，在中国被看成是神，是中国的拯救者。您对于他这样一个世界政治家有什么看法？

基辛格：世界上对毛泽东有很多见解，他们认识到毛泽东在统一中国获得了成功，建立了他的体制；另一方面，从他运用的方法和取得的结果上，他是个伟大的人，取得了伟大的成就，同时也有比较大的错误。

记者：您和毛泽东会见了5次，您对他最深的印象是什么？

基辛格：具有极高的权力和格外的睿智。

记者：谢谢。

1993年5月于上海

## 访德斯坦——毛泽东体现了一种哲学思想

吉斯卡尔·德斯坦，1974年至1981年期间担任法国总统。1993年5月在上海参加第11届国际行动理事会期间，接受中央电视台的采访。以下就是有关的采访内容。

记者：我们注意到毛泽东去世后，您曾发表过一份声明，给中国人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声明中，您把毛泽东比作人类思想的灯塔，并高度评价了毛的精力和他大胆的抉择。您从没见过毛泽东，请谈谈您是如何得出这些结论的？

德斯坦：我从没见过毛泽东，因为我是1974年当选法国总统的，而1980年我访华时，毛主席已经上世了。在毛泽东去世后，我做了两件事：一件是我参加了中国驻法使馆举行的悼念仪式。要知道，法国总统几乎是从来不去外国使馆的，当时我却去了。因为一方面出于对毛的尊敬，另一方面则是出于对中国人民的友谊。另一件是我自己撰写了那篇声明，并在中法两国发表。

还有一件事让我颇受感动。就是1974年我当选总统前，我的前任在4月份去世了。就在此前几个星期，一位访华的非洲国家的元首会见了毛泽东，他们谈到下届法国总统的入选，因为那时蓬皮杜总统已经生病了。毛对这个来访者说：“我知道下届法国总统是谁，是吉斯卡尔·德斯坦先生。”那位非洲的元首很吃惊，我也很惊讶，他竟然知道我，而我当时既年轻，名气又不大。可见毛主席是非常了解法国政治的，并且还有很正确的判断力。

法国的知识分子阶层是很受尊敬的。在当时，毛泽东在他们中的威望很高，一方面由于毛的文学作品，他的文章写得很美，诗歌在法国很有名；另一方面由于他本人的政治活动史，特别是他领导中国共产党进行的漫长而艰苦的斗争史以及他本人伟大的决策力。我自己也曾梦想能到长征的路上，例如江西、陕西等地走走，看看那些红军走过的地方。

记者：看来，您很了解中国的历史。

德斯坦：我比较了解，而且正在研究汉、宋、明、清以及19世纪的中国史。因为19世纪是中国与欧洲关系最为恶劣的阶段。欧洲人不了解19世纪的中国，我想知道原因何在。既然对于我们来说，20和21世纪的中国史很重要，那么，中国在过去都发生了什么事也同样重要。

记者：您能谈谈今天法国人民是怎样看待毛泽东的吗？

德斯坦：首先，法国人知道中国人对于毛泽东仍旧很虔诚很尊敬。要知道，现代社会变化很快，很多国家元首都被人忘记了，只有少数人仍被人所知。例如法国的戴高乐将军，法国人知道他，敬重他。那么在中国，毛泽东也是一样。另外，现代社会的国家领导人并不体现一种哲学思想，他们只是解决一些问题，诸如经济、社会、军事等等。法国人却认为毛泽东体现了一种哲学思想，并且努力地把它付诸行动。这正是我们对政治的认识。我们在1789年进行的大革命，正是为了一种哲学思想。我们清楚地认识到毛泽东思想也正是使中国走向一种哲学，即给予中国人民最大的权力和最高的地位。

记者：就毛泽东的性格，您还能谈些什么吗？

德斯坦：要知道，当你没有见过另外一个人的时候，谈一个人是很难的。毛泽东的外形很特殊，他个子高大，体质很好，又很有力气，他给人的印象并不是知识分子型的。一般来说知识分子总是给人一种柔弱的印象。从毛的身上也能看出他农民的本质，是后来的环境和知识把他变成后来的毛泽东

的。

记者：您能把周恩来和毛泽东比较一下吗？

德斯坦：我见过周恩来，他和毛很不同。首先文化背景不同。周恩来和邓小平等人由于为国内政治做准备的原因到过法国。他们在雷诺汽车厂工作过。周恩来很习惯我们做事的方式，见过很多重要人物，是个具有丰富国际经验的人。在法国人心目中，他正是中国知识分子阶层领导人的代表。

记者：您知道邓小平也是一个重要的政治家，您能谈谈对他的看法吗？

德斯坦：他是我的朋友（用中文说）。他曾多次到巴黎来，我们也举行过多次私人会谈，我们两家人还在一起吃过饭。我研究过他的政治生涯，现在关于他的传记很全面。我认为我能理解他变革中国的思想，并相信这种思想是很睿智的。因为像中国这样一个国家，最大的问题是必不可少的经济改革和维护国家统一。也可以说是在巨大的经济变革的后果和维护国家统一之间寻找一种平衡，所以我认为邓所采取的措施是十分正确的。

1993年5月于上海

## 访特鲁多——毛泽东是具有伟大理想的人

皮埃尔·埃利奥特·特鲁多，1968年至1979年任加拿大总理。1960、1973、1979年曾三次访问中国。1993年5月在上海参加第11届国际行动理事会期间，接受中央电视台为拍摄大型电视纪录片《毛泽东》而进行的采访。以下就是有关的采访内容。

记者：我们注意到，1976年毛泽东去世后，您曾发表过一篇声明，声明中您说毛是20世纪最伟大的领袖之一，请问您今天还是这样认为的吗？

特鲁多：是的。历史已证明，毛泽东是一个伟人，因为无论是战争年代还是平时时期，毛都能够把自己的理想付诸行动，并且明白中国人民需要鼓舞，需要领导，这就是伟人的特征。

记者：1973年，您在会见毛泽东时，曾送给毛一枚银制白求恩像章。您是如何选择这一礼物的呢？

特鲁多：白求恩是加拿大人，当时加拿大青年人把他视作一个献身于一种事业和一个伟大民族的典范，加拿大人民也把他看作成一个忠诚于自己正义事业的楷模。而我们也知道，毛泽东曾写过论述白求恩的文章，连中国的小学生都知道白求恩医生这个人。所以可以说，白求恩这个名字是连接中加两国人民的桥梁。

记者：1973年的那次会谈持续了一个半小时，您能谈谈当时毛给您的印象如何吗？

特鲁多：毛泽东很健谈，谈话的口气很庄重。当时他谈了很多中国和世界的問題。那时正是冷战时期，我们一起讨论了结束冷战的必要性。我对他说，我正是为此访华的。我们还商讨有关交换外交官的事情。那一次会谈我们还特别谈到近东问题，那时候这一地区和现在一样存在着潜在的战争。毛则谈了恢复这一地区和平的一些自己的看法。

记者：毛泽东的性格给您留下什么样的印象呢？

特鲁多：他是一个很庄重、审慎、具有伟大理想的人。

记者：您能谈谈加拿大人民是怎样看待毛泽东的吗？

特鲁多：加拿大人是知道毛泽东这个人的。现在中加关系不错。从前，由于冷战的原因，加拿大人对毛的看法可分为两种：一种认为毛是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人，所以他不是加拿大人的朋友。另一种（包括我）认为毛自信能领导中国人民，就该尊重这一事实。现在冷战结束了，加拿大人领会到，毛是20世纪最伟大的领袖之一。

记者：您还能谈谈周恩来吗？

特鲁多：我和周在一起的时间较长。我和他在北京有过一次很长的会谈。他还陪我到上海参观，我们一起看了一场杂技。后来他还陪我去洛阳。在火车上我们几乎谈了一夜。周是个非常聪明的人：在政治方面他有根敏锐的洞察力，他本人人情味很浓，也很开朗，我很欣赏他。

1993年5月于上海

## 访福克·耶诺——毛泽东的见解令人惊讶

福克·耶诺，1967年至1975年间担任匈牙利政府总理。1993年5月参加在上海举行的第11届国际行动理事会期间，接受中央电视台的采访。其时，中央电视台和中央文献研究室等单位正在合作拍摄大型电视纪录片《毛泽东》。据说，福克·耶诺当时非常乐意谈及毛泽东。以下就是这次采访的有关段落。

记者：今年是毛泽东诞辰100周年，中央电视台正在拍摄大型电视纪录片《毛泽东》。为此，我们想请您谈谈您个人对毛泽东的看法。

福克·耶诺：我听说今年是毛泽东诞辰100周年。世界是如何评价毛泽东的，我看很不一致。一些人一味地歌颂，一些人则一味地谴责。我看这两种意见都不对，应全面看待他的一生。毛泽东为中国人民，为世界人民，特别是为中国人民做了许多许多的好事，但也做了不少错事。从总体看，我认为，对毛泽东的评价应该是肯定的。

记者：您是怎样得出这样的结论的？1957年您在苏联见到毛泽东，这是您第一次见他吗？印象怎样？

福克·耶诺：1957年在苏联，如果我未算错的话，我当时40岁，毛泽东64岁。毛泽东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从16岁起我对他就有很好的印象。我先是从电影，从他的作品，从别人的介绍中了解他的。我对他的印象是相当好的，是肯定的。我回忆起1921年，当时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在这座城市里成立了中国共产党。我回忆起中国领导人和中国人民的英雄事迹长征。

1957年我对毛泽东有同样好的印象。在苏联庆祝十月革命40周年的时候，我在莫斯科第一次见到毛泽东。他在莫斯科参加庆祝活动，我也是。我和毛泽东，及其代表团在一起度过了几分钟。他讲了一些很有意思的问题，从此以后我对他的印象更好了。他讲的问题很有意思，使人感到惊讶。他说，匈牙利1956年发生的事是好事。我对他的说法很诧异，因为我当时认为，1956年在匈牙利无故地、白白地死了许多人，当时的领导人拉科西之流，及其同伙应该对此负责。我问毛泽东：“您有什么理由说明是好事？”他解释得很好，很英明，我明白了他的意思。他说：之所以是好事，因为你们肯定从这一事件中吸取了教训，明白了错误和罪过将导致什么样的后果。全世界都从中吸取了教训，中国、苏联和其他国家都吸取了教训，这不是变成了好事了吗？一个小国发生的事，别的国家就不要再发生了。这是令人惊讶的见解。他还说：你们咒骂斯大林，咒骂他的罪行，全盘否定斯大林。不要骂嘛！因为他有坏的建议，但也有好的建议。而你们的领导人什么都听，惟命是从，像奴仆一样，斯大林说什么，你们就做什么。斯大林提的是建议，而你们则当作圣旨接受。斯大林给中国，给我个人也提了许多建议。我们告诉他，我们回去研究研究，与我们的领导人和人民商量以后再定。斯大林好的意见我们采纳了，错误的我们摒弃了。我理解毛泽东讲的话。我一直认为，受孙中山影响成长起来的毛泽东是一位英明的人物，他能深入浅出地解释一些问题。我对毛泽东的看法不是在“文化大革命”开始时发生变化的。在头一二年中我以为“文化大革命”是好事。但二三年后我发现，毛泽东领导人民干的这件事是极大的错误。他说斯大林听不进别人的话，拉科西听不进别人的话，结果他自己也这样，听不进任何人的话。也许你们会担心，说一位主要领导人错误，会动摇人民对他的信任。我看，不要怕，不要担心，因为他

把毕生贡献给了他的理想，他的人民。我认为对毛泽东的评价，对卡达尔·亚诺什的评价，对一些西方领导人的评价，对所有人的评价，不仅要看他的过，更要看他的功，要看一个人的一生，毛泽东尽管在“文化大革命”中对中国人民做了许多错事，但对他的评价仍然是功大于过。

1993年5月于上海

## 访弗雷泽——毛泽东被世界各国人民所尊重

约翰·弗雷泽，1975年曾任澳大利亚总理。

1976年6月曾访问中国。1993年5月在上海参加第11届国际行动理事会期间，接受中央电视台为拍摄大型电视纪录片《毛泽东》而进行的采访。以下是其中的有关内容。

记者：您同毛泽东是同一时期的政治家，可否谈一下您对他的印象和想法？

弗雷泽：我从未见过毛泽东，这是我一生的一大憾事。因为他是中国的伟大领导人，为世界各国人民所尊重纪念。我不知道中国怎么说，但在世界许多国家，他被看成是时代之父。他给予这个国家以生机，关心人民，建立了能使整个国家走向富足的制度。

记者：在您的国家里，是否还有人知道毛泽东、熟悉毛泽东？

弗雷泽：像我这个年纪的人知道。年轻人、中学生是知道的。也有一些人不大了解。总之，很多人都知道毛泽东和他为中国所做的一切。但时光流逝，再过10年、20年，那时的年轻人，也许就不知道了。

记者：您来中国多次，与过去的中国相比，您觉得今天的中国有什么变化？

弗雷泽：今日中国是一个生机勃勃的社会。她变得越来越开放、自由，城市中街道宽阔，灯光明亮，商店林立。当今中国确实在世界上占有引人注目的地位，并在解决世界性问题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当然，澳大利亚处于亚大地区，这个地区的未来很大程度上要取决于中国和她的政策以及各国间的关系。总的来讲，尽管我们这个地区还有些问题等待解决，如柬埔寨问题，许多人也在为此努力，但情况还是不错的，很多国家的关系都已正常化。比如越南，不仅同中国，她与其他国家的关系也趋于正常。我认为，亚大地区这个舞台已经证明了自由开放经济。这些国家的采矿业和其他方面都成了自由经济了，在这个基础上，确立了良好的国家间关系，使亚大地区成为世界上快速发展的部分。

记者：您对于中澳关系的未来有什么看法？

弗雷泽：中澳关系发展得很好。1976年中国是我当总理第一个访问的国家。中澳关系不仅在政治上很重要，在经济上也是如此，尤其是在贸易方面，中澳关系得到了进一步加强。我希望两国关系进一步发展下去。

1993年5月于上海

## 访平塔西尔戈——我虽未见过毛泽东，但对他十分尊重

玛丽亚·德卢尔德斯·平塔西尔戈，1979年曾任葡萄牙总理。是葡萄牙第一任女总理。1993年5月在上海参加第11届国际行动理事会期间，接受中央电视台采访。其时，中央电视台和中央文献研究室等单位正在拍摄大型电视纪录片《毛泽东》。以下是采访的有关片段。

记者：您和葡萄牙人民关于毛泽东有些什么看法呢？

平塔西尔戈：我的想法也许同我国人民差不多。就我个人来讲，尽管我从未见过毛泽东，但对他的人格十分尊重。他对人民十分得关心。给我印象很深的是他强烈的思想信念；而且人们坚信这种物质资料的分配方法是他们当前生活的最佳方式。正是这样，我深深意识到，毛泽东是人们关注的中心。同时，我认为，在他漫长的掌权时期里，确实有某个时期可能过分统治和对人权不够尊重，这使他不像在其他方面那么伟大。当然，我们是从远离亚洲大国的欧洲来接触这些问题得出的结论。但我必须认识到在那个时代——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当时的人们期待较大的变革，毛泽东的思想和实践很有说服力。在这里我想我的观点同葡国人民是一样的。

记者：在很长一个时期里，毛泽东被当做一个神对待，被认为是我们国家的拯救者，可他也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人。您对他作为新中国缔造者有什么看法？

平塔西尔戈：毛泽东为团结中国人民创造了一个全新的道路。关注工人和农民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过去他们一无所有，就我所知，在社会中既无政治地位，又无经济地位。我认为改善他们的地位是毛泽东对中国所作出的重要贡献。在欧洲很难让人将一位社会知名人士当做神来对待。我来自这样一个国家：对于领导人，我们不可能将其看成是神，如果你不喜欢，你在某方面有不同的看法，可以把他撤换下来。……我国在1974年发生过革命，他们认为自己是在走毛泽东的道路，当然，年轻人一般都是非常理想主义的。

记者：中葡之间相隔甚远，可能在某些想法上产生误解。

平塔西尔戈：的确如此。那些懂些政治的人可能会恰当地考虑这些事，而不太懂的人由于某些限制就不能正确地思考这件事。希望你们的拍摄工作能顺利进行，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主题。

记者：谢谢！

1993年5月于上海

## 访吴正裕——毛泽东、鲁迅——现代中国人民的骄傲

吴正裕，1935年生，江苏宜兴人。现任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审、毛泽东研究组副组长。长期从事毛泽东著作的编辑、生平和思想的研究工作。主持编辑《毛泽东著作选读》（新编本），参加编辑《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毛泽东诗词选》、《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是《毛泽东选集》第一至四卷第二版、《毛泽东年谱》的副主编之一，还著有《毛泽东》传略（合著）等。

一个人在历史上的地位，有口碑，有心碑，有史碑，用这三者来衡量中国20世纪的两位伟人，是不为过的。所谓伟人现象，也是因为他们对历史的巨大贡献的结果。

### 两颗璀璨的巨星

访问人：在中国现代史和革命史上，有两个人是人们有口皆碑的，这就是毛泽东和鲁迅。他们对中国革命、中国文化以及中国的进步，都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毛泽东曾说过，他的心是和鲁迅相通的。能否就毛泽东和鲁迅的关系，谈谈您的看法？

吴正裕：毛泽东和鲁迅是现代中国人民的骄傲，无论站在什么角度看，他们都是中国思想史上和文坛上的两颗璀璨的巨星。

鲁迅长毛泽东12岁，可以说是长一辈的人，他上学较早，在现代中国思想界和文坛上出名也早，特别是到晚年，理论上、文学上的成就达到了他的巅峰，在中国和世界都有很大的威望和影响。毛泽东在鲁迅成就卓著之时，虽然也在中国出了名，在革命方面已作出了很大贡献，但在理论上、在文章成就上还没有获得很高的成功，他的影响主要还只是波及部分地区和部分人群。他在全中国以至在世界，是逐步被人们认识的。应该说，是从斯诺写《西行漫记》后，世界对他才逐步有了了解。

鲁迅和毛泽东有共同的地方，也有不同的地方。

共同的，总的来说他们都是伟大的革命家、思想家。鲁迅还是伟大的文学家，毛泽东虽不好说是伟大的文学家，但也是一个大作家和大诗人。作为文化名人，毛泽东的才华是多方面的，他对历史、文学以至书法的造诣都是很高的。

访问人：胡绳最近写了一篇纪念胡乔木的文章，称乔木同志是一个大作家。毛泽东当然也是一个大作家。

吴正裕：另一个共同点，就是他们都在青年时代就抱着救国救民的伟大志向，后来都信仰马克思列宁主义，并且把他们的革命志向付诸实践。鲁迅为了改变国民精神，选择文学作为武器，他在中国文化革命方面是个巨匠、旗手，有很多的文学作品，如小说、杂文等，在中国文坛上有杰出的成就。毛泽东献身革命后，为了改造中国，不仅在中国文化上贡献巨大，而且还在中国革命、文化建设以及思想领域的各方面都有巨大影响，同时，他还是一个伟大的战略家、军事家。

访问人：也就是说，毛泽东不仅停留在思想上，还付诸了实践。吴正裕：是这样，所以他还是一个伟大的革命家，当然鲁迅也是革命家，他对旧社会进行了彻底的批判，对旧制度、旧文化、旧思想、旧道德作了艰苦卓绝的斗争，也是大革命家。

访问人：刚才你说，他们之间有共同的，也有不同的，不同的地方表现在哪里呢？

吴正裕：不同的是，毛泽东做出的成就更全面、更辉煌。他不仅在思想文化领域有很大贡献，还改变了中国的历史进程，改变了中国的面貌，甚至可以说，改变了世界的历史进程，改变了世界的面貌。如果说鲁迅是中国 20 世纪的一代伟人的话，毛泽东不但是中国而且是世界 20 世纪的伟人。

毛泽东同鲁迅见过面吗？

访问人：毛泽东和鲁迅都曾为改变旧中国而奋斗，他们又共同生活在为改变中国而斗争的年代，他们两人见过面吗？吴正裕：毛泽东对鲁迅相知是比较早的，可以说很仰慕他，但现在没有文献记载足以证明他们曾经见过面。过去有人说他们见过面，是没有根据、不可靠的。关于这个问题，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一是《鲁迅日记》，鲁迅记日记从不间断，他把每天的重要事情都记录下来，我们从《鲁迅日记》中查不到他们会面的记载。二是毛泽东的文稿和讲话，毛泽东的文稿中没有这方面的记载，他也没有说过曾见到鲁迅的话。如果再仔细一些分析，他们有可能接触的时间，也就是 1918 年 8 月至 1919 年 3 月毛泽东第一次赴京，和 1919 年 12 月至 1920 年 4 月毛泽东第二次赴京时。1918 年毛泽东到北京后，曾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当助理员，他接触了当时新文化运动的一些知名人物。但这段时间的《鲁迅日记》没有记载他同鲁迅见过面。据冯雪峰回忆，1933 年底毛泽东曾对他说：“五四时期在北京弄新文学的人我见过李大钊、陈独秀、胡适、周作人，就是没见过鲁迅。”又据胡乔木回忆，1954 年他审阅《鲁迅全集》注释时，曾询问毛泽东，是否同鲁迅会过面，毛泽东明确回答：早年在北京，是会过不少名人的，见过陈独秀，见过胡适，见过周作人，但没有见过鲁迅。许广平也曾回忆说，鲁迅生前虽然没有和毛泽东见过面，但他对毛泽东是倾心拥护的，对他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也是拥护的。我认为这些回忆是可信并且是可靠的，就是说毛泽东同鲁迅没有见过面。

虽然毛泽东和鲁迅没有见过面，但他们之间是互相仰慕、心是相通的。从鲁迅方面讲，在 30 年代前期，他对毛泽东逐步有了了解，大概通过这么几个渠道：一是瞿秋白在 1931 年受到王明教条主义者的打击，被排斥于中共中央领导机关之外，在上海同鲁迅合作领导革命文化运动时，同鲁迅交往密切，并建立了深厚的友谊。这段时间，也有可能他从瞿秋白那里得到有关毛泽东在井冈山以及赣南、闽西创造革命根据地的情况。作为一个十分关注着中国人民革命事业的人，这一点是不难想象的。二是我党在 1935 年底作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决策后，曾派冯雪峰到上海向鲁迅及当时文艺界的知名人士传达了我党的新政策。我想，冯雪峰在向鲁迅传达这个政策时，可能会讲一些主持制定这个政策的毛泽东的一些情况。鲁迅完全赞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他根据当时文艺界的情况，提出了“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另一些“左联”的同志也提出了“国防文学”的口号。由于这两个口号提出的角度不同，曾引起了一场关于口号的争论。

访问人：这两个口号是不是有较大的分歧？

吴正裕：现在看来，分歧也是在“左联”内部。从历史上讲，鲁迅对“左联”的一些领导人有些意见，而“左联”也有一些人对鲁迅有误解，由于都写文章进行了公开批评和争论，当时的关系不融洽。另外，从两个口号的内容看，都是对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一种理解。“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就是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影响下由鲁迅提出的，它是在“国防文学”口号提出后作为对于左翼作家的要求和对于其他作家的希望，

并强调文艺工作者将一切斗争汇合到抗日反汉奸的总流中去。“国防文学”是1935年冬周扬等为响应中国共产党组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号召而提出的，在团结各阶层、各派别爱国作家、艺术家，以文艺为抗日救亡运动服务上起了积极推动作用，但这个口号没有在文学创作方面提出要求。因此，笼统地说哪个对，哪个错，确实说不清楚。总的说，两个口号都符合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但比较起来，鲁迅提出的口号还明确主张，无产阶级在建立文艺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过程中，不要放弃它的阶级领导责任，而要更加重视它，要使全民族，不分阶级和党派，一致去对外。

访问人：我们扯远了一点，再回到鲁迅对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的认识上。鲁迅虽然没在组织形式上加入中国共产党，但他对我党和毛泽东一直是十分关心的，有许多事例可以说明这一点。

吴正裕：这两方的例子有几个：一是在得知红军完成长征到达陕北后，鲁迅曾给中共中央拍了一个电报，称红军的事业是中国人民的希望。过去对有没有这个电报还有不同意见，现在已经证实了。二是在1936年前后，鲁迅买了一批书籍，还有怀表、火腿等送给在陕北的中共中央，这充分说明了鲁迅对中国共产党的热爱和期望。

访问人：鲁迅给毛泽东等送书籍、食品、用品的事，我在1983年曾访问过王林，据王林说；那时他做党的地下交通工作，这批东西装了两个骡馱子，是他经手送到陕北的。

吴正裕：这是完全可信的；

#### 毛泽东读鲁迅的著作

访问人：上面我们说了鲁迅对我党的关心和认识，那么，毛泽东是如何看待鲁迅和他的思想以及作品的呢？

吴正裕：毛泽东非常敬重鲁迅的人品，也很爱读他的著作。至于毛泽东什么时候开始读鲁迅的作品，早年是否读过，现在还没有文献可查。最早的记载是到延安不久，毛泽东曾从陕西一所中学图书馆陆续借了一些鲁迅著作的单行本，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读完了这些著作，并作了圈点。1938年1月12日毛泽东给艾思奇的信中说：“我没有《鲁迅全集》，有几本零的，《朝花夕拾》也在内，遍寻都不见了。”通过这封信，至少可以看出毛泽东在1938年1月以前已经读了一些鲁迅著作的单行本，但限于当时的客观环境，他还没有系统地读到鲁迅的著作。

访问人：这时《鲁迅全集》出版了吗？似乎要晚一些。

吴正裕：《鲁迅全集》是1938年下半年出版的，毛泽东信中既然提到《全集》，可能他已得到了消息。1938年8月，鲁迅先生纪念委员会曾把已出版的二十卷本《鲁迅全集》专门托人带到延安，送给毛泽东，封套是紫红布面的，装帧别致。毛泽东一直带在身边，转战南北，直到中南海，现在还在他的藏书室里。这套书留下了毛泽东的圈画、批注，有些著作还是多次圈阅，1949年访苏时，还特别选出几本。抽空阅读。1958年后人民文学出版社相继出版了鲁迅的《花边文学》、《为自由书》、《三闲集》等单行本，他把这些单行本放在床上，随时翻看。70年代初，毛泽东的眼睛患了白内障，动手术后视力也差了，他提出把《鲁迅全集》印成大字本，这套大字本也一直放在他的床上，有的地方还夹着纸条，有的书角折了起来。据他的身边工作人员说，当他读到鲁迅著作深刻的议论和犀利的笔锋处，往往赞不绝口。可以说一直到他去世，都在读鲁迅的书，在他的读书生活中，除了马列著作，文

史古籍，读得最多的就是鲁迅的著作。

访问人：毛泽东读鲁迅的著作，最喜爱读的是哪些？

吴正裕：首先是鲁迅的文学作品，特别是小说。毛泽东对外国小说和中国现代小说读得较少，他比较喜欢读中国明清优秀小说，如《西游记》、《三国演义》、《水浒》、《红楼梦》等，有的不止读一遍，对《红楼梦》，他曾要求党政军领导人至少读五遍。对中国的现代小说，从文献中，从他的讲话中还没有看到他读过谁的小说，但对鲁迅的小说，他全都读过，并且常在讲话和文章中引用。提得较多的是《阿Q正传》，1956年，他在《论十大关系》中说：“《阿Q正传》是一篇好小说，我劝看过的同志再看一遍，没看过的同志好好地看看。鲁迅在这篇小说里面，主要是写一个落后的不觉悟的农民。他专门写了‘不准革命’一章，说假洋鬼子不准阿Q革命。其实，阿Q当时的所谓革命，不过是想跟别人一样拿点东西而已。”“我们要记住这个教训。无论在社会上不准人家革命，还是在党内不准犯错误的同志改正错误，都是不好的。”在党内的会议上，他还多次提到写文件要像《阿Q正传》那样通俗化、口语化，这是对《阿Q正传》的另一种赞扬。

在文艺思想上，毛泽东也受到鲁迅的影响并给予很高的评价。比如在《反对党八股》一文中，他多次引用鲁迅的话，因为鲁迅对文化界长期存在的洋八股进行过严厉的批评，他说：“八股无论新旧，都在扫荡之列……例如只会‘辱骂’‘恐吓’甚至于‘判决’……这也是一种八股。”毛泽东运用鲁迅的思想和风格，针对当时存在的党风不正的实际情况说：“党八股也就是一种洋八股。这洋八股，鲁迅早就反对过的。”“空话连篇，言之无物，还可以说是幼稚；装腔作势，借以吓人，则不但是幼稚，简直是无赖了。鲁迅曾经批评过这种人，他说：‘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为了搞好延安整风，毛泽东还亲自审阅编成《宣传指南》的小册子，其中收入了鲁迅创作的一封信（即《答北斗杂志社问》一文），毛泽东非常赞成鲁迅的观点，他详细地介绍了鲁迅创作的思想，指出：鲁迅说，文章写好后“至少看两遍”，至多呢？他没有说，我看重要的文章不妨看它十多遍，认真地加以删改，然后发表。《宣传指南》是延安整风运动二十二个必读文件之一，并被编为《整风文献》。

访问人：鲁迅的诗，也是毛泽东非常爱读的。

吴正裕：鲁迅的旧体诗是鲁迅全部创作的不可分割的部分，他的诗同他的小说一样，有鲜明的个性和战斗精神，所以毛泽东非常爱读。1938年出版的《鲁迅全集》第七卷中收入了一些旧体诗，毛泽东都用心读过。1959年1月，人民出版社出版了鲁迅《集外集》《集外集拾遗》中的诗作，毛泽东得到后都认真读了并在题目旁作了圈点。1959年3月，文物出版社刻印了一册线装本的《鲁迅诗集》，共收诗四十七题五十四首。对这本诗集，毛泽东不知读过多少遍，他不仅作了圈点，大多还能背下来。在这年的12月，他还改写了鲁迅的一首诗，原诗名叫《亥年残秋偶作》，将其中的“竦听荒鸡偏闾寂，起看星斗正阑干”，改为“惊听自吹皆圣绩，起看敌焰正阑干”，表达了他那时的心境。1961年10月7日，毛泽东还亲笔将鲁迅的无题诗“万家墨面没蒿莱，敢有歌吟动地哀。心事浩茫连广宇，于无声处听惊雷。”书赠来访的日本朋友，并说：“这一首诗，是鲁迅在中国黎明前最黑暗的年代里写的。”

毛泽东有一段时间，每次练字，差不多都写鲁迅的诗句。书写得最多的

是《自嘲》中的两句：“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1942年5月他在延安文艺座谈会的讲话中就引用过，他说：“鲁迅的两句诗，‘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应该成为我们的座右铭。”“一切共产党员，一切革命家，一切革命的文艺工作者，都应该学鲁迅的榜样，做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的‘牛’，鞠躬尽瘁，死而后已。”1945年10月在延安时，他就书写过这一诗句。1958年12月在武昌召开党的八届六中全会期间，著名粤剧演员红线女随团应邀为全会演出。演出结束后，在接见演职员时，红线女请求毛泽东给她写几个字，毛泽东高兴地答应了。当晚，他就书写了：“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并在诗句前写了一段话：“1958年，在武昌，红线女同志对我说，写几个字给我，我希望。我说：好吧。因写如右。”

访问人：听说整风期间对如何理解鲁迅这两句诗，曾发生过争论，到底是怎么回事？

吴正裕：这是1944年的事。当时各抗日根据地都要整风，发了一批学习文件，其中包括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这年1月24日山东省文协给中央总学委打来电报，说：“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引用鲁迅两句诗，第一句‘横眉冷对千夫指’，解千夫为敌人。惟细读原诗所用千夫指典故，似即‘千夫所指，无病而死’，若然，则千夫是大众，而千夫所指的家伙则是敌人。这样的解释，虽不违背毛泽东话的精神，但千夫的解释恰恰相反，请问明毛主席电示为盼。”2月8日，毛泽东亲笔写了复电，其中说：“鲁迅虽借用‘千夫指’古典的字面，但含义完全变了，你们的解释是不适当的。”按一般典故来讲，千夫指大众，千夫所指的就是敌人。但毛泽东把千夫解为敌人。这说明毛泽东非常了解鲁迅作诗时的情况，鲁迅当时受到国民党御用文人、小报记者、文坛小丑的围攻，所以千夫是指的这些人。1931年3月6日鲁迅在给李秉中的信中，也有自己的解释，他说千夫指的是敌人。这个例子很能说明毛泽东对鲁迅的著作有很深的研究，有特别深刻的理解。所谓“我和鲁迅的心是相通的”，大概就在这里。

访问人：鲁迅的杂文是非常生动和有特点的，既有深刻的思想性，又有根强的战斗性，对鲁迅的杂文毛泽东怎么看？

吴正裕：鲁迅一生写了六百多篇约130多万字的杂文，先后共出了16本集子，这些杂文无情地揭露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军阀、国民党反动派统治下给中国造成的黑暗和罪恶，反映了中国人民的反抗精神，是二三十年代中国文苑中的奇葩。鲁迅的功绩除了他的小说，成就最大的就是杂文。对鲁迅的杂文，毛泽东有很高的评价，也曾多次称赞。1939年12月9日，他在延安纪念一二九运动大会上的讲演中，说到国民党文化“围剿”情形时说：“关于这一点，我们只要看一看鲁迅先生的杂感，就可知道。他的抨击时弊的战斗的杂文，就是反对文化‘围剿’反对压迫青年思想的。”1957年3月12日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讲到片面性时，他又举了鲁迅的杂文作例子，他说：“有人说，几百字、一二千字一篇的杂文，怎么能作分析呢？我说，怎么不能呢？鲁迅不就是这样的吗？分析的方法就是辩证的方法。所谓分析，就是分析事物的矛盾。”在这次会议期间，毛泽东召集新闻出版界部分代表座谈时讲道：报纸上的文章“短些，短些，再短些”是对的，对“软些，软些，再软些”要考虑时，又举了鲁迅的杂文，说：“鲁迅的文章就不太软，但也不硬，不难看。”在回答如果鲁迅现在活着会怎么样的

问题时，毛泽东说：“我看鲁迅活着，他敢写也不敢写。在不正常的空气下面，他也会不写的，但更多的可能是会写。俗话说得好：‘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鲁迅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是彻底的唯物论者。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彻底的唯物论者，是无所畏惧的，所以他会写。”鲁迅的杂文涉及面是很广的，政治、艺术、文学都讲，特别是后期杂文政治讲得最多。他的东西都是被逼出来的，他的马克思主义也是逼着学的，所以特别有思想性和战斗性。杂文还是鲁迅独创的一种文体，最能体现鲁迅的彻底革命的战斗精神，因此毛泽东称赞鲁迅的杂文，提出要理解它至少读两三遍才能懂，这也说明毛泽东对鲁迅杂文读得很多，也理解得很透。可以这么说，毛泽东对鲁迅的作品，评价最高，论述最多，最推崇的就是杂文，他认为“鲁迅后期的杂文最深刻有力，并没有片面性，就是因为这时候他学会了辩证法”。

### 毛泽东评鲁迅：中国的第一等圣人

访问人：毛泽东是怎样评价鲁迅的？

吴正裕：在我们党内，特别是主要领导人，比如瞿秋白、周恩来、张闻天等，在他们的讲话中，文章中对鲁迅都作过很多很高的评价。但给予鲁迅评价最全面、最高的还是毛泽东。他对鲁迅的评价，是给予中国历史人物都难于比拟的最多最高的评价。他对孔夫子的论述是比较多的，但总的看是贬多于褒，1958年在武昌中央工作会议的讲话中，他曾说：“我们共产党人看孔夫子，他当然是有地位的，因为我们是历史主义者。但说是圣人，我们也是不承认的。”对中国历史上的好的帝王将相，如曹操、李世民、海瑞等，也有些肯定的话，但都是就某一方面，谈不上全面评价。对近代的孙中山，毛泽东曾作过很高的评价，1956年11月12日在孙中山诞辰90周年时曾写了《纪念孙中山先生》，这是评价孙中山最集中的一篇。对其他历史人物也作过一些评价，但都是等而下之了。可以这么说，倾注着毛泽东全部感情的评价都是给予鲁迅的，对其他人的评价都是冷静的分析。

鲁迅于1936年10月19日逝世，毛泽东闻讯是很悲痛的，第二天，中共中央就给许广平发了唁电，电文说：“本党与苏维埃政府及苏区人民，为中华民族失去最伟大的文学家，热忱追求光明的导师，献身于抗日救国的非凡领袖、共产主义运动之亲爱的战友而同声哀悼，谨以挚诚唁电。”10月30日，中华苏维埃政府在保安举行了鲁迅追悼大会，毛泽东亲自出席并发表了讲话，倡议在延安创办鲁迅艺术学院、鲁迅图书馆和鲁迅师范学校，并发出了《为追悼与纪念鲁迅先生告全国同胞和全世界人士书》。在鲁迅逝世一周年时，即1937年10月19日，毛泽东又发表了《论鲁迅》的讲话，这是毛泽东关于鲁迅唯一的一篇专论，高度评价了鲁迅在中国革命史上的地位，指出：我们纪念他，不仅因为他的文章写得好，是一个伟大的文学家，而且因为他是一个民族解放的急先锋。他的思想、行动和著作都是马克思主义的，他是党外的布尔什维克。并概括了鲁迅的三个特点：一是政治远见，二是斗争精神，三是牺牲精神。认为这三个特点“形成了一种伟大的‘鲁迅精神’”。讲话强调指出，鲁迅是一个彻底的现实主义者，他丝毫不妥协，具备坚决的心，一点没有假慈悲的伪君子的色彩。在这篇讲话中还称颂鲁迅“是现代中国的圣人”、“是中国的第一等圣人”。建国以后，毛泽东在一次讲话中还曾说到鲁迅是圣人，我们只能说是贤人，是他的学生。在《新民主主义论》中，称赞“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些评价，充分表达了毛泽东对鲁迅的钦佩和崇敬之情。

访问人：毛泽东这么崇敬鲁迅，原因是什么呢？

吴正裕：从鲁迅方面看，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他既有小说、散文、杂文，又有诗歌、翻译作品和研究著作。他的文章在近现代是独步文坛的，是没有人可以和他相比的。对他的文笔，毛泽东是非常喜爱的；对他的作品的深刻内容，毛泽东也是非常赞赏的。

访问人：对作品的喜爱是一个方面，恐怕还有另一个方面，就是毛泽东所说他的心是和鲁迅相近的。鲁迅的斗争精神、痛打落水狗的精神、不怕孤立的精神和敢于反潮流的精神，都和毛泽东的性格相吻合，他们两人在精神上、性格上很接近、很相像。

吴正裕：是这样。如果我们把两位伟人放在中国革命大舞台的视角上来分析，毛泽东对鲁迅的推崇原因是多方面。主要有这样几点：

第一，他们两人都是文化巨匠，作为一个具有高度文化素养的人，毛泽东非常喜爱鲁迅的作品，包括他的文笔，前面已经说了很多，这里不再细说。

第二，毛泽东非常敬仰鲁迅的人品，钦佩他的奋斗精神。鲁迅的人生经历有许多方面和毛泽东有相同的地方，从青年时代起，他们都立下了救国救民的远大志向。鲁迅在年轻时是先学工，后学医，可为什么他又改学文了呢？就是因为他看到中国国民的劣根性，认为医术只能治人的身体，不能治人的精神，所以他后来弃医从文，立志从文化上，从改造中国国民的思想上改造中国。从他的小说也可以看出，《阿Q正传》、《狂人日记》、《孔乙己》等，都是批判封建落后的东西，对中国的旧制度、旧思想、旧礼教进行了无情的揭露与批判。这一点同毛泽东青年时代的思想和主张是一致的。

第三，在中国的二三十年代，鲁迅成了反国民党文化“围剿”的旗手。当时国民党反动派不仅在军事上对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根据地进行军事“围剿”，而且在文化方面，组织了一批御用文人对以鲁迅为首的左翼文坛进行文化“围剿”。可以这么说，在反抗国民党“围剿”中，毛泽东是反军事“围剿”的统帅，鲁迅是反文化“围剿”的统帅。他们一个用枪杆子，一个用笔杆子，在为中华民族的解放而战斗。这一点他们也是相通的。

第四，鲁迅的作品中包含了深刻的思想，独特的见解，毛泽东在文章和讲话中常爱引用鲁迅的观点和主张。鲁迅1927年从广州回到上海后，广泛阅读马克思主义书籍，并转变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他的文章特别是杂文起了一个飞跃，善于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用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论，对问题进行分析，揭示事物的本质，说理非常透彻精辟。为什么毛泽东很赞赏鲁迅后期的杂文，道理也就在这里。

第五，鲁迅具有不怕死的战斗精神和硬骨头精神，是向敌人冲锋陷阵的空前的民族英雄。在中国30年代复杂的历史情形下，鲁迅受到的攻击和压力不仅来自敌人方面，还有来自于自己阵营中的一些人的明枪暗箭。当时革命阵营中一些带有小资产阶级思想、世界观还没有得到改造的人，对鲁迅的一些思想和做法不理解，他们多少带有“左”的激进的想法和做法，这又恰恰是鲁迅所反对的，因此也给鲁迅造成了一些麻烦。当然，鲁迅主要还是对国民党反动派、包括鲁迅所说的文坛小丑进行斗争。在那种复杂的、白色恐怖的环境下，鲁迅是冒着生命危险的，敌人的暗探、特务活动猖獗，有段时间他从家里躲出去，到日本人内山完造开的书店里去藏身，可见环境的险恶。面对这种情况，鲁迅没有退缩，继续用他的笔来战斗，充分表现了他的硬骨头精神和不怕死的战斗精神。这一点是毛泽东非常钦佩的，所以称“鲁迅的

骨头最硬”。

上述五点，不一定概括得全面，但至少可以看出，毛泽东对鲁迅的评价是  
是不为过的。

访问人：谢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

1993年11月7日于北京前毛家湾

## 访唐宝林——毛泽东和陈独秀

### 唐宝林

唐宝林，1939年生，上海人。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长期从事中国革命史研究工作，重点研究陈独秀、中国托派、宋庆龄、“一·二九”运动等问题。主要著作有：《试论陈独秀与托派的关系》、《论大革命时期陈独秀与共产国际的关系》、《陈独秀传——从总书记到反对派》、《宋庆龄传》（主笔）、《深谷幽兰——战时“国母”风采》等。唐宝林是中国革命史研究领域比较活跃的人物，发表和出版论文、著作近300万字，引起学术界的注意和好评，论著曾多次获奖。于是，有了我们下面的谈话……

陈独秀影响了毛泽东，毛泽东视陈独秀为思想界的明星

访问人：陈独秀是中国共产党第一任总书记，曾是一段历史的代表人物。毛泽东谈到自己的成长道路时说：陈独秀“对我的影响也许超过其他任何人”。我们应该怎样理解毛泽东的这句话呢？陈独秀对毛泽东到底有哪些影响？

唐宝林：我认为毛泽东说的是心里话，这是他多少年反复实践、体会出来的结论。根据我掌握的材料，陈独秀和毛泽东最早的联系是在1917年4月。

访问人：您是指毛泽东在《新青年》上发表的《体育之研究》？

唐宝林：正是。当时毛泽东是一个年仅24岁的青年，第一次在全国性的大杂志上发表文章。这时候的《新青年》是陈独秀一个人主编，所以这篇文章陈独秀不但看到它而且还选中了它。从文章的内容看，毛泽东主要讲体育问题。陈独秀从1902年开始提倡重视体育，提倡德智体同时发展。1915年他创办《新青年》以后，有很多文章批判旧教育摧残青年健康，描写中国青年知识分子的书呆子形象，说他们弱不禁风，力不能敌，所以我们国家贫弱，被人欺侮。他提出新青年的标准，很重要的一条就是体格强壮。我们想想看，毛泽东的文章恰恰和陈独秀的主张相吻合，而毛泽东写的这篇文章又恰恰寄给了《新青年》，这不能说是偶然的。因为两年来毛泽东一直是《新青年》的热心读者。他说他非常钦佩陈独秀的文章，陈独秀一时成了他的“楷模”。

访问人：坚持德智体全面发展，后来成了毛泽东一生的主张，可见陈独秀对他的影响是很大的。除此之外，还有哪些影响？

唐宝林：新文化运动的影响。这个运动的主要内容是：高举民主和科学，推动三大革命，即批判儒家纲常，进行伦理革命；提倡白话文等，进行文学革命；提倡教育与社会相结合，德智体全面发展等，进行教育革命。提倡白话文为陈独秀、胡适首倡。这个事情现在来看很是一般，但在当时来讲是一个很大的革命。因为自古以来中国人使用的都是文言文，这已经在人们的脑子里深深地扎下了根，要一改过去的行文习惯，作为提倡者来讲，要有极大的勇气，作为一般文人，有的激烈反对，年轻人则大有耳目一新的感觉。毛泽东属于后者，1918年9月毛泽东第一次到北京；就拜访了陈独秀和胡适等人，实现了他一睹心目中“楷模”风采的愿望，而对陈独秀的印象最深，说他“对我的影响也许超过其他任何人”。1945年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上回忆此事，还称“这是一大发明”。这的确反映了毛泽东当时的心情。

陈独秀提倡的民主和科学，更是深深地打动了毛泽东。五四期间，陈独秀被警方逮捕。这年7月毛泽东在《湘江评论》发表文章《陈独秀之被捕及营救》，比较集中地反映了他崇拜陈独秀，受陈独秀影响的原因。他在文章

中说：陈独秀平时所标揭的就是民主和科学两样东西，而我们的国家缺少的就是这两样东西。因此他称陈独秀为“思想界的明星”，说陈独秀被捕“决不能损及陈君至坚至高精神的毫末。”甚至说：“我祝陈君万岁！我祝陈君至坚至高的精神万岁！”

访问人：这一点我们也颇有同感，1919年毛泽东从北京回来之后，思想发生很大变化，这之前他还哀叹中国缺少像托尔斯泰式的大思想家，还要探求“大本大源”来救中国，从北京回来后，他的调子完全变了。在他创办的《湘江评论》上大力提倡要解放思想，反对宗教、文学、政治、教育、经济、思想、国防的各种强权，这些强权统统都要用民主和科学来改革他，打倒他。其思路和陈独秀是一样的，甚至语言也是相同的。

唐宝林：毛泽东的悟性很高。他首先是在陈独秀发起的新文化运动旗帜下觉醒、成长起来。其次他善于思考，勇于实践，很快就成了全国小有名气的先进知识分子，引起了陈独秀、李大钊等人的注意。

访问人：陈独秀唤醒了一代青年，更创造了毛泽东。在毛泽东由民主主义者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的问题上，陈独秀也是一个关键人物，请谈谈陈独秀又是怎样影响毛泽东的？

唐宝林：这个话说起来就长了。1920年毛泽东是一个刚走出校门不久的学生，胸怀拯救祖国、改造世界的大志。当时社会上流行着各种主义，如无政府主义、新村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等等。究竟信仰哪一种主义，毛泽东曾经倾向过无政府主义，但不坚定，尚在比较选择当中，通俗他讲，就是还一时拿不定主意。这年春天他因宣传驱张运动（驱逐湖南反动军阀张敬尧）和欢送新民学会会员赴法勤工俭学去了上海，拜访了陈独秀。这个时候的陈独秀已经先毛泽东转变成马克思主义者，开始酝酿在中国成立共产党的事情。毛泽东和他讨论了马克思主义和湖南自治的计划。毛泽东说：“陈独秀谈他自己的信仰的那些话，在我一生中可能是最关键的这个时期，对我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七大”上，他还说，他最早是听陈独秀“说世界上有马克思主义”的。于是，毛泽东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并接受陈的委托，回湖南发起组织该地区的共产党。

访问人：根据毛泽东的实践活动来看，他在1920年夏天回到湖南，搞的是湖南自治运动，并没有进行马克思主义的活动。

唐宝林：这个现象容易解释。首先，表面上，湖南自治运动的形式没有变，但内容已经变了。原来是驱逐反动军阀张敬尧，宣布湖南脱离北京而独立，建立“湖南共和国”，这方案带有无政府主义的色彩；现在的目标是实现“劳工专政”，即劳动阶级当家作主。这自然是马克思主义的活动。第二，当时的马克思主义活动只能秘密地进行，如成立俄罗斯研究会，建立青年团，筹备共产党等。当时陈独秀、毛泽东等信仰的马克思主义，就是走俄国人的路，照搬十月革命的模式，所以，上海、北京等地首先成立了俄罗斯研究会，毛泽东也不例外。关于湖南的建党活动，现在没有材料证明在“一大”前湖南成立了共产党支部的史实，只是成立了青年团。实际上这个青年团就是湖南共产党的筹备机关。这年8月，陈独秀在上海组织了共产党，办了《共产党月刊》，作为这个共产党发起组织的机关刊物。陈独秀不仅给毛泽东寄去青年团团章，还表示要去亲自参加青年团的成立会；还给毛泽东寄去《共产党月刊》，创刊号发刊词就是陈独秀所写，其中有中共最早的党纲，明确宣布“用阶级战争夺取政权”，“建立劳动专政制度”。这完全是马克思主义

的，没有丝毫机会主义的色彩。毛泽东见后完全拥护，向法国的蔡和森写信介绍时，称赞陈独秀写得“旗帜鲜明”。这表明毛泽东这时已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

同时，在这个过程中，陈独秀通过与毛泽东的接触，从他组织新民学会、创办《湘江评论》、组织赴法勤工俭学、领导驱张运动和湖南自治运动等一系列活动中，看到了毛泽东非凡的革命精神、领导才华和组织能力，对毛泽东十分赞赏。当时他写了一篇《湖南人的精神》的短文，在赞颂了历史上一些湖南志士的奋斗精神后说：“我曾坐在黑暗室中（指1919年6—9月被捕坐牢），忽然想到湖南人死气沉沉的景况，不觉说道：湖南人底精神哪里去了？仿佛有一种微细而悲壮的声音，从无穷深的地下答道：我们奋斗不息的精神，已渐渐在一班可爱可敬的青年身上复活了。我听了这类声音，欢喜极了，几乎落下泪来！后来我出了暗室，虽然听说湖南人精神复活底消息，但是我盼望有许多事实，可以证明他们真实的复活，不仅仅是一个复活底消息，不使我的欢喜是一场空梦。”

这里，虽然没有提毛泽东的名字，但是，他指的“一班可爱可敬的青年”，显然是指毛泽东等一批新民学会的青年。陈独秀不仅赞赏他们的革命精神，还对他们寄予很深的期望。正是出于这样的赞赏和期望，他才把湖南建党的重任放在了毛泽东的肩上。

访问人：毛泽东自己说，他是1920年夏，读了三本书《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史》、《阶级斗争》，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的。这个问题您怎么理解？

唐宝林：这与他受陈独秀的影响并不矛盾。这三本书，现已查明至少有两本书是这年夏天陈独秀组织翻译出版的，是中国最早的中文全译本。即《共产党宣言》是陈安排陈望道翻译的。考茨基的《阶级斗争》是陈请恽代英翻译的。而《阶级斗争》和《社会主义史》是属于《新青年》丛书。这三本书以及《共产党月刊》等小册子，当时都由上海大批寄往北京、武汉、长沙等地，以指导这些地区建党。所以毛泽东才能在1920年夏天读到这些书，比较系统地接受马克思主义。

由此看到，毛泽东从1920年春天与陈独秀讨论马克思主义，到夏天转变成马克思主义者，短短几个月，陈独秀给了他多么巨大的影响。为什么毛泽东一再提到陈独秀对他影响最大、说了上面的情况我想就不难明白了，而这个影响，对毛泽东来说，是他人生的最大转折，用他自己的话说，从此，他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一生都没有动摇过。

### 在毛泽东眼里陈独秀 身上的光环渐渐退去

访问人：早年的毛泽东非常崇拜陈独秀，那么从什么时候开始不怎么崇拜，甚至有些失望呢？

唐宝林：毛泽东和陈独秀的关系似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从1917年至1923年是第一阶段。这个阶段的特点是，毛泽东和陈独秀直接接触较少，神交较多，也就是说他是在远处看陈独秀，从《新青年》、五四运动中被捕和筹备成立中共的活动中看陈独秀。从陈独秀来讲，这一段他的确也是光彩照人：发动中国近代启蒙运动——新文化运动，传播马克思主义，组织中国共产党，……是关键时刻推动历史前进的巨人形象。所以，这是毛泽东崇拜陈独秀的时期。1923年至1927年是第二阶段。这个阶段初期，由于毛泽东执行

中央决议领导湖南工人运动成绩突出，受到陈独秀的赞扬，在“三大”前夕，毛泽东调到中央当秘书，与陈独秀共同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中央文件均由二人共同签署。因此双方接触较多。当时国共合作的局面非常复杂，陈独秀已经感到很难驾驭，不像他写起文章来那么得心应手。他常常做出一些决策，而这些决策经过实践的检验有些是对的，有些则是行不通的。所以陈独秀在毛泽东的眼里，他身上的那层耀眼的光环渐渐退去，呈现在毛泽东面前的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人，有伟大的一面，也有不伟大的地方，或者说还有不尽人意的地方。在这一阶段后期他们关于农民问题已不知不觉地出现了分歧。第三段是1927年初以后，毛泽东开始批评陈独秀。原因是毛泽东从湖南考察农民运动回来，思想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用他自己的话说，他对农民问题提出了一套全新的路线，对中央关于农运的政策提出了尖锐的批评。总的讲毛泽东主张积极全面的发展农民运动，解决农民土地问题，陈独秀则主张对农民运动要有所限制，更不能马上解决土地问题。因为在农民问题上两人产生了比较严重的分歧，所以毛泽东也受到了一些不公正的待遇。比如在中共五大上，他的正确意见，受到压制；在选举时，他才当选为候补中委，五大后他的中央农委书记也撤了。1927年毛泽东在“八七”会议上讲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他说，他过去以为领导者的话都是对的，这说明他对陈独秀已经不那么敬佩了。他还谈到了党内有家长制，实际上也是说的陈独秀。

访问人：我同意您这三段概括法。具体说到他们分歧的产生，有种观点认为是从毛泽东写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开始。

唐宝林：我不同意这种观点，我认为1925年关于无产阶级领导权的思想毛泽东还不如陈独秀。中共四大前陈独秀就接受了这个思想，至少在口头上。但毛泽东在当时写的《阶级分析》中根本没有提到这个问题。《毛泽东选集》中的那句话，是解放后加进去的。

访问人：这是否与他担任国民党中央代理宣传部长、文章又发表在国民党的刊物上有关。从文章内容上看，毛泽东认为只有工人阶级特别能战斗，是中国革命的主力军，那么它不来领导谁来领导呢？这已经是不言而喻的事情了。

唐宝林：这属于辩论问题。若分析起来，大家可以见仁见智，没什么标准。而且我的根据比你更充足，因为他白纸黑字，谁也否认不了。你则是分析出来的。我认为毛泽东的《阶级分析》，其思路和陈独秀是一致的，他们之间没有分歧。他们真正有点分歧，还是在农民问题上。也就是说，在谈到国民革命时，毛泽东更重视农民问题，而陈独秀就不那么重视，或者说他把资产阶级的作用估计得更高一些。

访问人：1927年陈独秀不赞成毛泽东关于农民问题的观点，我想这也是他过高估计资产阶级作用的原因。

唐宝林：陈独秀的秘书黄文容对访问者说过：你们现在根本不了解情况，当时陈独秀的日子非常难过，睡不着觉，一方面是广大农民群众和包括毛泽东在内的一些农民领袖，要求陈支持农民运动；另一方面国民党和北伐军官坚决反对农民运动，他毫无办法，找不到出路。所以他听听党内同志的意见觉得有道理，又听听国民党方面的意见，又感到这样乱来不行，非常痛苦，非常矛盾。但总的来说，他还是遵守国际的决议，维护国共合作，要先打倒军阀，打到北京去。所以从倾向来讲，他还是二次革命的主张。所以他落伍了，最后被历史抛弃了。

**毛陈之间虽曾互相欣赏，但因种种原因，未能建立起真诚的友谊**

访问人：毛泽东很崇拜陈独秀，对陈独秀也满怀着深情，但从陈独秀来讲，对毛泽东似比较平淡。比如：1937年陈独秀出狱，我党曾派人劝他到延安，他说，大钊死了，延年、乔年也不在了，延安就不去了。话虽然很简短，但我们可以体会到他和毛泽东之间并没有建立起友谊，尽管他们曾有过这样的机会。

唐宝林：我认为感情是单方面的，比如：我崇拜你，被崇拜人并不一定知道，因为客观条件的限制，又没有机会接触，我可以把感情埋在心里。友谊就不一样了，友谊必须是双向的，平等的，互相交流，互相帮助。从毛泽东和陈独秀两人早期的关系看，只看到感情，是一个学生对一个师长的崇拜和尊敬。从年龄上说，陈长毛泽东14岁，这对他们的平等交流带来了一定的困难。陈独秀对毛泽东很赞赏，也有过鼓励和支持，但那是一位长者的赞赏，是上级对下级的鼓励与支持，所以因为地位的不同，也影响了他们的双向平等的交流。还有陈独秀是国内知名学者，毛泽东当时仅是一个初出茅庐的学生，这种知识上的差距，也是影响发生友谊的。再加上陈独秀有一种家长作风，不太容易和小字辈建立忘年交，他比较缺少主动和年轻人打交道，并给以帮助的风格，这一点他不如鲁迅。他决不会因为欣赏毛泽东而主动接近毛泽东。陈独秀和李大钊就有友谊，他们地位相同，知识水平接近，认识客观世界的观点接近，所以他们产生了深厚的友谊。

访问人：恐怕与两人的性格也有关系。陈独秀的外号是“火山”，脾气很暴且很倔，其实毛泽东的脾气也很大，且很有独立思想，他们在一起共事，可能会产生些碰撞，妨碍他们之间感情的交流。

唐宝林：这个问题还很难说清楚，因为没有材料。1923年夏到1924年底陈独秀是中共总书记，毛泽东是秘书，他们一起共事一年多，从留下的文件看，看不出他们有什么明显的冲突。当然这年底毛泽东生病不得不回家休养，并且不再当中央秘书，是不是与陈独秀发生矛盾有关，这还要待有材料证明才行。相反，1925年毛泽东从家乡回来，就当上了国民党代理宣传部长，这自然要经过陈独秀的同意，说明当时的陈独秀仍然是赏识毛泽东的。他们真正产生分歧是1927年在对待农民问题、国民党问题上意见不一致。以后天各一方，毛泽东到农村搞武装斗争，陈独秀在城市搞国民会议运动，而反对农村武装斗争。这个时候，两个人实际上代表了两条路线，也就彻底没有产生友谊的基础了。

1937年陈独秀出狱的时候，延安毛泽东是负责人，陈独秀虽然已经离开了托派组织，但仍保留城市为中心的托派观点，中共也还把他视为托派首领。当时的共产党在国际影响下，对托派采取绝对打击的态度，康生、王明诬陷陈独秀是汉奸，并且发表在党的机关刊物《解放》上。作为陈独秀，他分不清毛泽东和康生、王明有什么区别，他看到的是共产党的报纸在骂他，自然也就把这笔帐记在了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头上，不可能对毛泽东产生好感，不去延安也是很自然的事情了。

**毛泽东对陈独秀的评价在中共党内是最高的**

访问人：从陈独秀那一面来讲，他缺乏和毛泽东建立起友谊的基础，如果从毛泽东这一面来分析，您是怎样看的？

唐宝林：毛泽东对陈独秀始终保持了他青年时代的感情。比如在陕北同斯诺的谈话，他谈到了陈独秀给他的影响。1945年“七大”预备会议上他的

报告，更给陈独秀高度的评价，说他是“有功劳”的，称他是“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他在传播马克思主义、建立共产党方面，相当于俄国的普列汉诺夫，将来我们修党史时要讲到。建国后，他对陈独秀的后代很关心，亲自指示政府给予补贴，就是在“文革”中也没有断过。据我了解，毛泽东是我们党内对陈独秀的历史功绩评价最高的，而且是一贯的。他批判陈独秀主要是批判他的右倾错误，为党总结历史经验，并不抹煞他的历史功绩。而王明等人批判陈独秀，则是一笔抹煞，一棍子打死。

访问人：毛泽东在延安虽然强调了陈独秀的历史功绩，但若干历史问题决议并没有提到这一点，相反我们的党史对陈基本持否定态度。后来毛泽东对陈独秀否定的也是比较多的。

唐宝林：这并不矛盾。党的决议和毛泽东批判陈独秀比较多的是大革命后期推行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和后来搞托派的错误，这是对的，因为陈的确犯有这种错误。但这并不意味着抹煞他的历史功绩。一个人有功又有过，批评他过错，不否定他的功绩；同样，肯定他的功绩，也不是说他没有错误。这就是我们现在提倡的实事求是评价历史人物的方法。过去搞形而上学，说一面，就无限夸大、无限上纲，不能提另一面，这是很不得人心的。其次，谈到毛泽东对陈独秀的历史功绩的评价为什么没有写到党的决议中去，我认为从两方面看：一、毛泽东的观点，没有被党内多数同志所接受；二、毛泽东是一个政治家，懂得怎样处理感情与政治、个人意见与党的主张的关系，当两者发生矛盾时，前者必须服从后者。就是说，他作为个人发言时，可以谈他对陈的历史功绩的看法，但党的决议反映的是整个党的意见和主张，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必须服从党。不能因为我和陈独秀的感情比较深，就必须把我的意见写到党的决议里，这是不可能的。根据我的研究，党内大部分高级干部对陈独秀都有一种极“左”的情绪，否定较多。建国后我们党对陈独秀发了两个文件，1954年一次，1983年一次，直到1983年中央宣传部发出的通知还说陈独秀不是党内人物，令人惊讶！

访问人：党内对陈独秀有“左”的情绪，原因恐怕是他后来成了托派，而对于托派，我们受斯大林影响，那是绝对反革命的。

唐宝林：所以从毛泽东来讲，他对于陈独秀，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吾爱吾师，亦爱真理”。

### 毛陈之间的异同

访问人：陈独秀是毛泽东的导师，是陈独秀导引着毛泽东走上了马克思主义的道路，但最后的结果，毛泽东坚持了马克思主义，陈独秀则放弃了马克思主义，这是什么原因呢？他们之间有什么异同吗？

唐宝林：陈独秀和毛泽东都是有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渴望中国强大富强，同时又都是有独立思想的人，都主张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但由于二人在理论创造性上的差异，前者失败了，后者成功了。由于失败，陈独秀最终抛弃了马克思主义；由于成功，毛泽东才始终坚持了马克思主义。这是两个是否善于结合，决定是否坚持马克思主义旗帜的典型。

访问人：您能具体谈谈“理论创造性”上的差异是指什么？

唐宝林：建党初期，由于“二七”惨案的结果，党中央企图在中国照搬十月革命模式直接进行无产阶级革命的计划失败后，陈独秀一度产生“二次革命论”的思想，认为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要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必须先进行由资产阶级领导、无产阶级协助的民主主义革命，在这样的思想指

导下，再加上接着进行的国民革命由国民党来实施领导，而国共合作的形式由于采取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共产党实际上处于次要的服从的地位；而当资产阶级反共时，共产国际又命令中共不许反击，只能让步，结果导致大革命的失败。失败之后，他又不能像毛泽东那样，正确总结经验，找到正确的道路，而是转向托洛茨基主义。这种理论上极“左”（直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行动上极右（当前没有革命形势，不能进行武装斗争，只能在城市里进行国民会议运动）的理论，又导致陈独秀领导的托派在国民党的白色恐怖下不断地失败。由于他们一直标榜托洛茨基主义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所以陈独秀晚年对马克思主义产生了动摇。这也是符合社会思想规律的，一般来说，只有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不断胜利，才能巩固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总是失败，自然就会产生动摇情绪。相反，对于毛泽东来说，他认为中国的资产阶级不能领导革命，中国革命的主力军是农民，所以他在大革命失败后就引导党下到农村去，领导农民开展武装斗争。实践的结果虽有曲折，但总的来说是不断地取得胜利。所以他越来越坚信马克思主义，这就是他们两个人的差异。同样道理，毛泽东晚年搞什么“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由于不断地给党和人民带来灾难，终于被人们所否定；而邓小平的“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所以能取而代之，获得人民衷心的拥护，是因为它能指导社会主义建设不断取得胜利。由此可见，实践不仅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而且还是维护一种理论得到人民信仰的唯一根据。

访问人：我们还考虑，陈独秀与毛泽东两个人的差异还与经验有关系。陈独秀纯粹学者出身，学者闹革命就要带很多的书生气，缺少灵活精神。毛泽东虽然学生出身，但他更注意了解中国国情，更具有政治家的素质，这似乎也是他们两人很重要的一个不同点。

唐宝林：这是一个重要的不同点。我认为，毛泽东是政治家，没有书生的迂腐气。陈独秀有学者的风度，但缺少政治家的品性。这样完全不同的两类人物一起放到革命的风浪中去检验，最后的赢家肯定是毛泽东。一般来说政治家在政治斗争中能正确估计形势，审时度势，确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能在坚持原则的基础上采取灵活的策略，善于妥协，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达到自己既定的目标。毛泽东这方面十分出色，表现出非凡的才能，不愧为伟大的领袖。相对来讲陈独秀在政治上却是个矮子，他在几十年的政治生涯中往往不能正确估计形势，提不出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同时又不能团结人共同奋斗，最后成为孤家寡人，共产党离开了他，托派离开了他，他还以“终身反对派”为荣，宣称“不怕孤立”，自然不可能成功和胜利。他晚年在文章里两次承认，自己奔波一生，政治上失败了。但是，作为学者则不然，他这种为真理而执着奋斗、能自圆其说、自成一家、创造一种学说而不怕孤立的精神，往往会取得很高的学术成果。所以，他在学术上是个强者。然而，如果用这种学者品性去从事政治斗争，往往会转化成书呆子气，固执己见，迂腐，不能照顾全局，不能团结大多数。书生从政，这是陈独秀政治上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不过由此也给他带来一个优点，即不会搞阴谋诡计。有些政治家为了保持自己不败的地位，塑造自己“一贯正确”的形象，往往耍政治手腕，搞阴谋诡计，诸如翻云覆雨、文过饰非之类。陈独秀由于是书生，不会这一套。于是，他在政治上失败的同时，个人品格却高大起来。所以李维汉说过：我党早期的领袖中只有两个人不搞阴谋诡计，陈独秀一个，

瞿秋白一个。恰恰瞿秋白也是“书生从政”的典型。陈独秀一生光明磊落。他自己说过：“我绝对厌弃中庸之道，绝对不说人云亦云豆腐白菜不痛不痒的话。我愿意说极正确的话，也愿意说极错误的话，绝对不愿说不错又不对的话。”（《给陈其昌等的信》1937年11月21日）可见耿直得可爱。

陈独秀与毛泽东还有两个差异：一、时代的差异。由于年龄上的差距，两人主要的历史功绩产生在两个不同的时代。陈独秀的历史功绩主要产生在1915年创办《新青年》到1927年大革命失败之前，包括领导新文化运动、创建中共、领导早期工人运动、五卅运动和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暴动等。这个时代我称之为“陈独秀时代”，因为这时代的任何人的历史功绩都不能与他相比。这时代的特点是旧民主主义革命向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转变时期，打一个比方，是资产阶级把革命领导权的接力棒交到无产阶级手中的接力区，或者说是两个阶级激烈争夺革命领导权的时期。1927年以后，中国革命的领导权就完全落到无产阶级的手里。毛泽东的历史功绩主要在1927年以后，可以延长到1956年。同样，这个时期内，没有任何人的历史功绩可以与他相比，我们可以称之为“毛泽东时代”。陈独秀在这个时代里，已经失去了对历史的影响。由于两个人的时代相承而不相叠，两个人的主要历史活动不相混杂和冲突，历史功绩就互不掩盖，再加上毛泽东时代在陈独秀时代之后，这是毛泽东可以坦然地肯定并公正客观地评价陈独秀历史功绩的重要原因。

访问人：您上面讲到陈独秀在学术上是很强的，是否再说得具体些。

唐宝林：好的。他不仅汉学很好，还懂得几门外语，学识非常渊博，一生中，在从事政治活动之余，进行了不少学术研究。我在编写《新论语——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陈独秀卷”一书时，深切地感觉到，他在政治、经济、文化、学术、教育、民主、科学、民族、宗教、伦理道德、人生观、文学、艺术、语言、文字、妇女、家庭、婚姻、人口、法律、中外经济和文化交流、社会主义等广泛的领域都有很深的思考和研究，撰写了大量论著，发表了不少深刻的见解，有的至今仍闪烁着真理的光芒。尤其在音韵学、文字学领域，他的学术成果有较高的造诣，撰有约100万字的论著，除了台湾出的陈独秀文字学专著《文字新诠》之外，《陈独秀音韵学论集》也将由中华书局出版。

所以，胡适、傅孟真和王森等著名学者，都曾为陈独秀把过多的精力放在政治上而惋惜，认为他若专心于学术，“当代名家，实无其匹”。王森然在1934年得知陈在狱中刻苦读书、潜心著述时评论说：“先生书无不读，又精通日文、法文（更精通英文、拉丁文）。故其学，术无不精；其文，理无不透；雄辩滔滔，长于言才，无论任何问题，研究之，均能深入；解决之，计划周详；苟能专门致力于理论及学术，当代名家，实无其匹。……其个性过强，凡事均以大无畏不顾一切之精神处理之。无论任何学说，必参己意以研究之，无迷信崇拜之意。故每当大会讨论之际，其意见迭出，精详过人；常使满座震惊奇绝，或拍掌称快，或呆目无言，诚为一代之骄子，当世之怪杰也。惜仍以指挥行动之时多，精心研究学术之时少，虽有专一、有恒、自信之美德，致不能完成其哲学理论之中心。”（《近代二十家评传》）

所以，在学术上，无论是学识、成果和风度，陈独秀和毛泽东不在一个层次上。

由此看到，政治家与学者犹如鱼与熊掌，不可兼得。陈独秀的悲剧，也许就是人生错位，即“学者从政”，结果“两败俱伤”，最后还是回到“书

生”的本分上来。如他的好友朱蕴山最后赠诗所云：“僵死到头终不变，盖棺论定老书生。”

1993年3月21日于北京近代史所

## 访张培森——毛泽东和张闻天 张培森

张培森，1931年生，江苏镇江人。1958年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专业研究生毕业。先后在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从事中共党史的教学和研究。1980年起进行张闻天研究。现任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张闻天选集传记组组长、研究员。主持编辑了《张闻天文集》、《张闻天研究文集》等。

在毛泽东的战友中，张闻天是比较特殊的一位，先不论他们的经历不同，单从他们的地位变化，也有不少内涵外延值得探究——话题也正是从这开始的。

访问人：毛泽东和张闻天都是我们党的领袖人物，一段时间内张闻天曾是毛泽东的上级，后来毛泽东又成了张闻天的上级。他们之间的关系比较特殊。既有很多事业上的接触，也有私人之间的交往，相互间还有些恩恩怨怨。张培森：毛泽东长张闻天7岁，原来两人并不认识，直到1933年张闻天到中央苏区，他们才第一次见面。但一个偶然的巧合，早年他们两人的名字曾一起排列在少年中国学会会员表上，原来他们差不多同时参加过少年中国学会，那是建党之前的事情。

访问人：但两人并没有因此见面认识。

张培森：是的。少年中国学会是一个松散的进步团体，两人入会的时间基本相同，彼此未曾谋面是可以理解的。但从他们两人同时入会的情况来看，表明他们当时都是要求进步、锐意改造中国的先进青年。

### 成长道路的不同特点

访问人：从两人青年时代成长的道路来看，您认为有什么不同之处吗？

张培森：我认为两人在成长道路上是有不同特点的。当然他们建立的理想都是走十月革命的路，都是实现共产主义，但个人成长的具体道路两人有很大不同，就这个不同来说，对他们后来一生的发展有很大的影响。

从毛泽东来讲，他师范毕业，教过书，搞过学生运动、工人运动、农民运动；有过国共合作的经验，最后拿起枪杆子上了井冈山，根据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况开创了农村包围城市的伟大道路。他的经验非常丰富，可以说十八般武艺样样试过，党内没有人能比得上他。

张闻天呢？他基本上是一个文化人。他和毛泽东虽然都是五四时代的先进青年，但他走的是另一条路，是学者式的道路。五四以后，他写文章，写小说，搞翻译，这是他的主要活动。特别在文学方面，他从歌德到泰戈尔都做过研究，而且还有相当的成就。据研究歌德的专家评论，张闻天在1922年《东方杂志》上发表的论述歌德的长诗《浮士德》的文章，称得上是我国最早的一篇。一般来说，《浮士德》是很难看懂的，而张闻天那个时候就不但把它翻译了过来，还进行了系统的评述，这很不简单。张闻天写的小说，茅盾备加赞赏。茅盾说他自己1927年才写中篇，而闻天比他早3年就进行创作而且是长篇，对此他自叹不如。如果闻天同志不是全身心投入革命斗争成为革命家，很可能在文化上占据一席之地。所有这些表明张闻天和毛泽东有着不同的经历。

访问人：他们两人的活动范围似乎也有区别。

张培森：是的。毛泽东的活动范围全部是在国内。张闻天在成长过程中有相当一部分时间是在国外。他1920年去日本半年，1923—1924年到美国

一年多，入党后又去苏联5年，回国时31岁。应该说在我们党的高级领导人中，像张闻天早年到过美国这样的生产力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就只有他一个。从上面的情况来看，张闻天拥有大量的书本知识和广泛的阅历，眼界很开阔，但他的弱点是实践经验少。

访问人：张闻天从苏联回来就受到了国际的重用。张培森：是的。国际把他放在重要的领导岗位上，对于一个缺乏实际斗争经验、不甚了解本国国情的同志，必然要照搬国际指示，这样就犯了错误。而从当时在苏区的毛泽东来看，因为他有丰富的实践经验，有自己的一套办法，不同意照搬国际的条条，因而遭到打击。张闻天缺乏经验但受到了国际的重用，因而犯了错误。

### 从分歧走向合作

访问人：因为两人的经历不同，对中国革命的一系列问题也就产生了不同的认识。那么请问他们在苏区时有过正面冲突吗？

张培森：没有。应该说两人是从有分歧逐渐地走向一致。毛泽东无疑当时是正确的。从张闻天来说，他从苏联回来，先在上海，对下面的情况不了解，自然就要盲目服从中央贯彻国际进攻的路线，当他看到毛泽东在中央苏区贯彻的一套不一样，因而有人说毛泽东右倾，是富农路线，张闻天也这样认为就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了。张闻天本人在回忆这段历史时，表示他和毛泽东之间并没有私人成见，更没有仇恨，不过就是不了解毛泽东，不认为他是正确的。后来才看到他军事上有一套。

访问人：由于思想路线不一致，两人来往比较少。是吗？

张培森：事实上随着张闻天和苏区中央主要领导博古的意见分歧越来越大之后，他和毛泽东的关系越来越好。虽然完全掏出心里话是在长征前夕，但这之前他们彼此比较互相尊重。当过毛泽东英语翻译的吴亮平，我曾访问过他多次，中央苏区时他是国民经济部部长，毛泽东是他的上级，张闻天也是他的上级，应该说他是毛张关系的历史见证人之一。他对我们说：毛泽东、张闻天两人的办公室就隔一堵墙，我请示张闻天时，他总是说你去问问毛泽东。毛泽东病了。张闻天去看他，用手抚摸他的腹部，很关切他的病情。长征出发前，毛泽东得了一场疟疾，昏迷不醒，是张闻天派傅连璋星夜赶去抢救，才缓解了病情。所以毛泽东这场病，从某种意义上说，张闻天无起了救毛泽东命的作用。当然张闻天也从毛泽东那里学了一些东西，比如毛泽东善于调查研究，张闻天在苏区也搞了一些调查。张闻天说，我是模仿毛泽东。他们的思想是在实践中开始接近起来的。

### 遵义会议合作的历史作用

访问人：这么说经过战争的摔打、失败，张闻天醒悟了，他认识了毛泽东的英明，因此在我党历史上才留下了一段毛张合作的历史。那么关于毛泽东同张闻天遵义会议合作的作用您是怎样估计的？

张培森：遵义会议是同李德、博古错误军事路线的斗争，王稼祥、周恩来所发挥的作用不可否认，但我认为从一定意义上说毛泽东同张闻天所起的作用似乎更为关键。毛泽东就曾经说过当时只要能争取到张闻天，问题就解决了一大半。事实上张闻天正是苏区中央局最高领导层中最早站到毛泽东正确路线一边的中央领导人，他当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中华苏维埃主席。这里书记处书记实际上就是中央常委。张闻天这个职务对遵义会议所发挥的作用可以从一件事看出来。过去人们只说毛泽东发了言，但不知道张闻天还有一个报告。事实是这样的，博古作正报告，周恩来作副报告，

张闻天作反报告，然后是毛泽东发言。

访问人：反报告是什么意思？

张培森：反报告，就是张闻天把博古的报告批了一通，作为代表正确方面的报告。因为在党的高层几个常委里，如果一把手的报告被否了，那常委当中必须有人站出来讲正确的意见，当时的毛泽东还不具备这个条件，他还不是常委，那么这个人是谁，是谁站出来首先讲话了，正是张闻天。自然这个反报告主要也是根据毛泽东的意见搞出来的，是毛张合作的结果。所以为什么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上讲，没有洛甫和王稼祥，遵义会议是开不好的。从张闻天来说，这是其作用的表现之一。

访问人：我们想是否还有另一面，当时大家最信奉的是共产国际，张闻天是国际信任的人物之一，由他站出来批评是比较合适的。

张培森：这正说明毛泽东的高明，想想看，当时国际是我们的顶头上司，权力很大，过去它让谁当第一把手谁就是，这种情况下，把国际信任的人轰下台来，国际派来的顾问靠边站，这样大的事情，如果没有国际信赖的教条宗派集团内部有影响的人出来讲话，那是很难办的。所以毛泽东团结了张闻天、王稼祥等。

访问人：那么您认为在张闻天向毛泽东靠拢同博古错误斗争中，是主动还是被动？

张培森：从事实来看张闻天的转变是主动的而不是被动的。1931年他回国以至后来中央苏区，开始和博古的思想是一致的，后来在一些政策问题上明显表现出他和博古的分歧，不仅仅是分歧，而且发展到很尖锐的冲突。同时张闻天不只是认为博古推行的军事方针行不通，而且发现组织上博古从党的核心内部排挤他，所以在长征出发的前一天，他把心里的郁闷全跟毛泽东讲了，从此两人接近起来。想想看，张闻天的郁闷为什么不跟别人讲，而是找处于无权地位的毛泽东去讲，说明他信任毛泽东，认识了毛泽东的伟大。

### 毛张合作克服了党的三次危机

访问人：毛张合作的重要作用是否仅限于遵义会议呢？

张培森：不。从遵义会议召开前到六届六中全会前我们党实际上遇到了三次大的危机，一次是王明博古“左”倾路线导致的军事失败，一次是张国焘右倾分裂主义，再一次是1937年王明从国际回来推行右倾投降主义。而这三次危机过程中应该说毛张都进行了很好的合作，对克服危机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也就在此过程中从确立走向了巩固。

访问人：在第一次大危机中毛泽东、张闻天等合作反掉了王明博古。第二次、第三次又怎么说呢？

张培森：有的外国学者把张国焘看得比王明、博古还严重，不管怎么说，这应该算做一次大的危机。因为论资历张国焘是党内数得上的老资格，加上当时他仗着四方面军人多，所以一、四方面军会师后他根本不把中央放在眼里。

访问人：据我们了解，同张国焘的斗争，中央领导人的意见是一致的，包括博古在内都是站在毛泽东一边的。

张培森：但张闻天的位置很重要。因为张闻天遵义会议后已经被推举为党内负总责，而一个党的总负责人的张闻天是否坚定地站在毛泽东一边当时就非常重要。须知会师之后张国焘对遵义会议后军事方针也是否定的，散布流言说是违反五中全会的进攻路线。对此毛泽东在沙窝会议上作了巧妙的回

答，肯定我们在政治上是进攻的，但革命战争则要根据情况决定防御和退守。而张闻天则是在这次会议结论中作了同毛一致的说明，并以负总责的身分提出遵义会议决议“应在四方面军党的支部讨论”。可见张闻天对毛泽东讲话支持的重要。

第三次危机是 1937 年 12 月王明从莫斯科回来，指责中央的一套抗战方针，鼓吹他的一套右倾投降主义。他这一搅和使很多人一时弄懵了。尤其他当时是打着共产国际的旗号，加上当时是民族斗争环境，国民党也抗战了，所以就迷惑了一些人。这种情况下，党内首先顶住的就是毛泽东。同时毛自然也就承受了很大的压力。而这时毛泽东又一次得到了张闻天的合作和支持。现在找到 1937 年 12 月 22 日张闻天在中央一次会议上所作的一个“总的结论”，从讲话的口气来看实际是不指名地软顶王明的，而且明确指出统一战线中不能放弃基本原则，对八路军与新四军不仅要扩大，而且要保存党的领导。“我们必须扩大三五十万党能直接领导的军队，统一战线才能更有力些。”这话实际上就是坚持了毛泽东独立自主的原则。而毛泽东在当时困难处境中向华北发出的许多发展根据地和游击战争的指示就是以“毛洛”联署形式发出的。所以，毛泽东在“九大”时还没有忘记张在这关键时刻的立场，他说：王明回国以后张闻天没有站在王明一边，是站在我一边的。

#### 毛张合作的历史地位

访问人：既然毛张合作有这样的作用，为何过去人们很少知道呢？

张培森：这里的原因很多，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是张闻天这个人物长期在党史宣传上是被当成机会主义代表人物看待的，而 1959 年庐山会议又被打成反党集团成员，像这个党史人物全面历史面貌的恢复，应该说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实事求是路线的结果。因此毛张合作这个重大史实一个长时期内是被沉到史海里了，现在是钩沉，这一点也不夸大，就是两人的合作在党史上应该有足够的地位。王震同志 1985 年就在一个批示中向邓力群、胡乔木、胡绳建议：在修改党史时应该“将张闻天同志任中央书记（特别是长征结束后）主持会议的史实载入史册”。

访问人：那么请谈谈您的观点。

张培森：从遵义会议后到党的六届六中全会这个阶段里，毛是党中央领导的实际核心，张是中央的总负责人，他们两人的合作应该说是很好的。从这段时期保存在中央档案馆的中央 100 多份会议记录中可以看到大部分会议都是张闻天主持，许多重大决策都是毛或张先作报告，并在讨论的基础上张作总结发言，毛作结论。我在编辑《张闻天文集》时还做了一个不完全的统计，从 1935 年 6 月到 1938 年 10 月 3 年多的时间里，仅保留下来的洛毛或毛洛联署的电报就有 338 份，其中相当大一部分都是直接关系到当时中央许多重大决定的贯彻。我给邓力群同志写报告时说到这件事，他认为很有价值，要我整理出来。仅从这里也可以看出这一段毛张二人的关系，可以说毛离不开张，自然张也离不开毛。

访问人：这个合作的重要历史地位是否还应该放到中国整个革命发展进程中来评价？

张培森：是的。从 1935 年 10 月中央红军长征抵达陕北到 1938 年 10 月这 3 年，应该说，是中国革命历史上相当重要的阶段。对我们党来说也可以说是困难和机遇并存。现在我们搞建设要抓住时机，那时也有个时机问题，如果不抓住，中国革命的大发展恐怕也是很难的。毛泽东曾经戏言要“感谢”

日本人，这句话里包含着很深刻的道理。如果没有抗战，没有世界大战，中国革命的道路将是会更漫长的。红军长征虽然找到了落脚点，但毕竟处在陕甘一隅，其生存发展仍然遇到了很大困难。在这种情况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紧紧抓住日本帝国主义入侵造成的民族矛盾这个突出矛盾，大力开展统战工作，终于推开第二次国共合作抗日的大局面。如果那时对民族矛盾的地位不认识，就很难扭转乾坤，打开局面。而毛张在这个主要矛盾问题认识上是完全一致的。须知这是在中央决策核心内两个关键人物战略思想的一致，对于开创革命新局面的我党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正如历史决议所说，如果没有毛泽东，我们党和人民可能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时间。然而单靠毛一个，没有中央集体中其他同志的配合，我想也是肯定不行的。而这段重要时期，张闻天对毛泽东的配合就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 合作的一个特点

访问人：从我们所看到的陕北初期毛张的来往电报来看，他们完全采取互相讨论，互相切磋的方式来确定党的大政方针。例如 1935 年 12 月 1 日毛泽东从前方给张闻天的一份复电，告诉他反蒋抗日统一战线的策略内容及具体的口号与纲领完全同意。同时在另外问题上也有不完全同意的，这就是同意张闻天提出的“红军靠近外蒙的方针”，却不同意张提出的行动时间与路线，还有的问题基本同意又加以补充，这就是关于转变对富农的策略。张培森：你说得对，毛这份电报所说完全同意的反蒋抗日策略内容实际上就是后来构成瓦窑堡会议决议的内容。至于电报中所说的红军打出去靠近外蒙在行动路线问题上，张与毛起初是有不同主张的，张的意见是占据宁夏背靠外蒙，而毛则主张先占领山西，后来是张接受了毛的意见，因此便有后来的东征。事实上也有张在重大问题上先出了好主意的，例如，西安事变发生的第二天就提出了“尽量争取南京正统”的主张，这在当时是同毛的想法不一样的。想一想当时谁是南京政府的正统，除了蒋介石没有第二人。当然，后来党内很快统一了认识，最后还是毛做出和平调解的结论。从事实材料来看他们的这种合作，是坚持真理的合作。凡是毛正确的张就帮他论证并加以支持。而张错了的话毛可以指出，毛不正确的张也可以纠正。同时整个中央的民主气氛也比较好，正如林伯渠后来曾经有过这样一段评语：“在中央苏区时，表面上的组织生活很严，但怕一句话说错了要斗争。1996 年保安的 9 月会议时，我感觉党是进步了，到双十二时便感到党更统一了。”总之这 3 年多中国共产党开辟了那么大的局面，首先是因为确立了毛的领导核心，同时也是与洛、毛的通力合作，中央集体领导搞得比较好是分不开的。

访问人：据周恩来回忆，长征时博古下来换成张闻天，就是毛泽东提议的。这表明毛泽东对张闻天是好的。张闻天和刘英的红娘也是毛泽东。

张培森：这段时间他们的关系确实是比较好，毛泽东也尊重张闻天，认为张比较民主，戏称他是“明君”，刘英是“娘娘”。张闻天与刘英两人在瓦窑堡结婚，毛泽东打完仗回到瓦窑堡还去闹新房，关系比较融洽。

### 关系的变化

访问人：从你上面谈的可以看出毛张是从有分歧到走向合作，那么后来又如何从合作变成疏远，以至再发生分歧的呢？

张培森：这个问题比较复杂，不是三言两语能说得明白的，同时有些情况也不完全清楚，尚需要研究。这里只能向你们谈一点已经知道的情况。

先说一件事，是毛同江青结婚，结婚之前党内有些同志得知江青过去的

历史就认为不合适，他们把意见集中到张闻天那里，张本人觉得个人私事不便干预，但是又感到大家意见有道理。考虑一番之后综合大家意见，以个人名义给毛写了一封信。结果毛大为不悦，结婚喜酒也没有请张。这在当时虽说算不了大事，但也多少看出一点两人关系的变化。

再一件事，是毛对张领导的马列学院的批评。延安马列学院成立于1938年，院长是张闻天兼任。1942年张响应整风号召去晋西北调查期间接到毛一封信，大意说，有人提出马列学院方针是否错误问题，凯丰、弼时意见待你回来再讨论，我觉得不必等你，即指示是错了。信最后要张回电表态。事隔半个世纪，现在还健在的大部分马列学院的学员都不同意马列学院犯方针性错误的说法，认为张闻天在主持学院期间还是努力贯彻理论联系实际方针的。只能说张对理论与实际关系的认识当时尚没有达到后来整风认识的高度，但不能简单说是教条主义。何况人不在的情况下就匆忙做出结论，也未免欠公允。张当时对毛发动的整风是衷心拥护的，但认为毛看人有偏向，这是他在整风笔记中坦诚说过的。这件事也多少表现出当时他们二人的关系。

访问人：那么张闻天党内负总责是什么时候不再担任的，从党内职务上说张毛党内最高职务又是如何交替的？

张培森：这个交替是有一个过程的，这个过程对于张闻天来说有两点是表现非常突出的。一是不争权，他在1943年整风笔记中说1938年六届六中全会期间，他曾向毛泽东提出要把“总书记一职”辞掉，但毛没有同意，尽管如此，张还是把自己的工作转移到宣传教育部门工作方面；二是不计名位自觉地要求到基层去，1942年3月他从基层应召回延安参加政治局会议，正是这次会议推举毛为政治局主席、书记处主席。从这次会后张正式离开了书记处。不过张从中央核心中下来，只是工作中毛张的来往少了，中央许多重要的会议张那时也还都是出席的。抗战胜利后张又主动要求到东北去做地方工作，这时毛张地域上已经不在一起，自然也就更加疏远了。

#### 庐山会议分歧的探究

访问人：众所周知，毛张建国后的明显分歧发生于1958年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1959年张因庐山会议发言而遭致打击，中央对于这段历史已有明确结论。那么为什么一向掌握真理的像毛这样的领袖这次却犯了错误，而过去历史上犯过错误的张却反倒头脑比较清醒呢？

张培森：关于毛这段错误，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历史决议已有全面分析。这里很重要的一条教训是共产党人千万不能与实际脱节。论及这个历史教训倒是用得上张闻天1943年调查回来写的总结报告中的两句话。“接触实际，联系群众，这是一个共产党员的终身事业”，“任何共产党员，即使他过去既接触实际，又联系群众，只要他一旦脱离实际、脱离群众，他就会硬化起来。”因此，即使像毛这样的伟人，一旦脱离了实际也同样会犯错误。而张虽然过去犯过错误，然而却真正从思想上吸取了教训，从而在新的历史时期反倒相对来说站到了真理的方面。历史的遗憾是当时我们党却并没有能够分清这个是非，以至张闻天这样真正忠于党和人民事业的共产党人竟遭受打击而含冤终身。当然从整个党来说就不只是个人的悲剧，而是严重地损害了党的肌体，导致整个国家、民族都遭到了一场严重的灾难。

访问人：据说建国后是毛泽东亲自提议张闻天担任外交官的，这对于张可不可以说是人尽其才了呢？

张培森：张闻天转外交战线是1950年的事情。那时我们为了争取早日进

入联合国，需要很快发表我国出席联合国首席代表的人选任命，时在苏联访问的毛泽东亲自从莫斯科致电刘少奇，提议张闻天出任此职。由于时间过于紧急，此事事先都未能来得及同当时在东北工作的张本人商量，征求他的意见。张虽然感到突然，但还是接受了中央的这项任命。后来由于美国的阻挠，我进入联合国的计划未能实现。而张却从此开始了他 10 年的外交生涯。先被任命为我驻苏联大使，后又担任外交部常务副部长。若要论条件来说，张做外交工作自然也是很称职的。不过从张本人的心愿来说，似乎更愿意从事经济工作。

访问人：您是否认为张闻天更是一位适合领导经济的人才而没有得到毛的重用呢？

张培森：张闻天很早就对经济研究有兴趣，1923 年在旅美期间就写过纵论战后世界经济的长文；1931 年从苏联回国不久就参与并领导了与托派在中国经济性质问题上的论战；1933 年进入中央苏区后又直接接触并研究了苏区经济。他 1933 年在苏区发表的一篇批评“左”的劳动政策的文章中，明确提出要利用资本主义发展苏区经济，这在当时毛的文章中也还没有这样明确。延安时期他深入农村进行了长达一年零两个月的调查。张不但一直对经济有兴趣，而且有相当的理论根底，他是我们党内少有的系统读过《资本论》的领导人之一。建国前，当毛泽东主要精力还在集中于战争的时候，张已经在东北研究解放后的经济问题，他 1948 年就勾画了新民主主义经济的五种经济成分的最初蓝图，初步提出了国营经济为主，多种经济协调发展的经济建设方针，受到毛的称赞，并被吸收到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之中。因此，张可以称得上是新中国经济建设道路探索的先驱者之一。他在东北领导经济过程中有不少好的设想，如果不是中央调他去搞外交，他肯定会在经济方面钻研下去。

后来据了解，他在担任驻苏大使期间还曾提出过回国搞经济工作的想法，但是毛没有同意。意见是由陈云转达的。这当然是个遗憾，但即使让张搞经济，是否就一定能够得到毛的重用，充分发挥其作用也很难说，因为看来毛张在经济方面思路是不完全一样的。

#### 在经济建设问题上的不同思路

访问人：毛张在经济问题方面又如何表现出思路的不同呢？

张培森：要说不同，一个很大的不同是毛强调政治统帅经济，搬用战争年代一套群众运动乃至军事领导的办法来领导和管理经济，而张则强调要尊重经济规律，按照经济本身的规律来领导经济。1959 年庐山会议张在这个问题上的不同看法表达得最为清楚。张在庐山会议发言中有这样一段话是意义深远的，他说：“我们一定要研究、认识和掌握运用客观经济规律”，“中国的经济建设有其特殊性，但是普遍规律在我国的建设中同样起作用。问题在于要使普遍规律同我们的实际相结合，使马列主义理论得到发展。”毛认定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要走自己的路是对的，但是如果是脱离了或者违背了普遍的经济规律，就不可能真正找到适合自己的路，“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就是证明。

访问人：张闻天这里强调普遍经济规律与我们的实际结合，其意义又怎么看？

张培森：这在理论上是有非常重大意义的，因为长时期在“左”的思想影响下根本不承认社会主义还存在有与资本主义共同的普遍经济规律，从斯

大林到毛泽东实际都没有能够在这个问题上实现突破。而真正在这个问题上突破的是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一套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张闻天当时虽然也没有完全搞通，但他却是把这个大的思路提了出来，应该说这是不简单的，正是在这个思路之下，他 60 年代初一方面理论上提出社会主义经济学应该大胆运用《资本论》中的某些经济范畴，另一方面则又在调查的基础上向中央提出开放全国市场的建议。可惜这种可贵的探索不久却被当作“修正主义”进行批判。

### 怎样以毛泽东思想评论张的晚年文稿

访问人：张闻天庐山会议被罢官之后写了许多笔记文稿，这些笔记文稿毛泽东都看过没有？今天从毛泽东思想的角度来说又应该怎样评价？

张培森：直到“文革”发动之前，张闻天写成的读书笔记差不多都要送给毛泽东和党中央。而毛起初还批给中央其他常委、书记处同志传阅，后来就连看也不看了。

这些笔记文稿不久自然都成为张进一步挨批的罪证。然而今天来看其中确实有不少宝贵的思想，尤其是他在私下保存的笔记本中敞开心扉写的一些读书笔记更是显得可贵。如对阶级斗争扩大化错误理论的批评，对社会主义任务是充分发展生产力的强调，对所谓资产阶级法权理论混乱的澄清等，这些都是带有根本性的和鲜明的针对性的。而今天来看，这些问题也正是毛泽东当时所犯错误的重大理论误区。及至“文革”中张所写的“肇庆文稿”，如《无产阶级专政下的政治和经济》、《党内斗争要正确进行》、《衡量党的路线政策的最高尺度》、《人民群众是主人》等则更是他庐山会议以来思想发展的最高升华。

张闻天六七十年代的这份理论遗产若是要给予评论的话，我认为至少这样系统地批判“左”的理论错误在当时是独一无二的。从毛泽东思想的角度来说，如果毛泽东晚年的错误是由于违反了作为科学思想体系的毛泽东思想，那么张闻天的许多论述恰恰是坚持了毛泽东思想，并从一定意义上讲也是丰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其中一些根本的思想，则是同今天邓小平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完全一致的。

### 毛张关系的演变给我们留下的启示

访问人：从毛张关系的演变来看，您认为有什么经验教训可以总结吗？

张培森：毛张作为中共党的领袖人物，在党的历史上是值得联系起来进行研究的。比如他们的合作是怎样建立的，后来分歧又是怎么发生的，有什么规律性的东西没有。好好总结对于我们改善党的领导会很有好处。从毛张关系的演变和最终的结局来看，我认为很重要的一条教训是党内的民主建设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这样形成从上到下都是第一把手说了算，这从表面上看起来挺顺手，实际上是违反客观规律的。

因为人无完人，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无论何人都不可能时时、事事正确，如果只听一个人的，必然走向失误。尤其是当第一把手威信不断升高的时候，把主要领导人的权威强调到绝对化，这就是个人崇拜，因此是很危险的。毛泽东最伟大的时候，也正是他广揽人才，注意吸取集体智慧的时候，像张闻天这样原来缺乏经验，但有思想的人，也能跟他很好地合作，并没有因为他犯过错误而排斥他，而是一起共事团结奋斗，开创了新局面。所以党内民主，事业就兴旺发达。但后来不注意吸收集体智慧，不能容人了，特别是听不得反面意见了，因此就不断出现失误，走向了歧途。这是很大的教训，

我们应该牢牢记取。

1993年4月27日于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

## 访薛洪兴——毛泽东和刘伯承

### 薛洪兴

薛洪兴，1944年生，江苏常州人。现为国防大学科研部第一编研室研究员，副教授。长期从事有关刘伯承的写作和研究，参与撰写《刘伯承传》，为主要撰稿人。还著有《中共党史人物传·刘伯承》、《刘伯承的军事思想撮要》、《刘伯承智破日军“铁桶阵”》等。

同薛洪兴的这篇谈话，谈起来很顺当，落笔成了难题，后经两易其稿，才最后完成。

访问人：毛泽东和刘伯承都是我党我军卓越的军事家，他们两人不仅在国内享有盛名，在国外也很受人瞩目。你们在写作《刘伯承传》的过程中，是怎么体会和把握他们两人的关系的？

薛洪兴：这个问题，我们传记组的同志都思考和议论过，今天我主要说一说大家共同的一些看法。

由于我们主要写的是刘伯承，因此，对刘伯承了解得相对多一些，对毛泽东了解得较少，但毛泽东是党的领袖和全军的统帅，刘伯承是大战略区的负责人，要写好刘伯承，不可避免地要涉及毛泽东。所以对他们两人之间的关系，也有一些体会。总的来讲，刘伯承和毛泽东的关系是亲密而融洽的。从纵向看，这种亲密而融洽的关系有一个发展过程。从横向看，他们两人在性格、秉赋、气质、才智、志趣、修养等方面，有许多相似或相近的地方，使彼此比较容易接近，从而逐步达到互相了解、信任、尊重和钦佩。当然，他们之间的情谊是建立在共同的革命理想和共同为之奋斗的革命事业的基础上的。

访问人：你能不能把刘伯承与毛泽东的关系的发展过程详细地介绍一下？

薛洪兴：刘伯承同毛泽东的关系，大致经历了一个相互仰慕、相识、相知过程。刘伯承和毛泽东的出身、经历不同，革命的起点不同，走上革命道路的方式也不同。刘伯承是旧军人出身，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之前曾在四川军阀部队里干了10多年，从士兵当起，逐级升至排、连、营、团长，最高职务是旅属两团制的路一级指挥官。他的军事才干就是在这个时期打下的基础。他的智勇兼备是川军各方都公认的，被称誉为“川中名将”。他可以说是一位职业军人。参加革命后，他的活动一直侧重于军事方面，成为我党我军杰出的军事家、军事理论家和军事教育家。毛泽东的出身、经历是众所周知的了，用不着我在这里多说。我只想强调一点，毛泽东最初是一位职业革命家。从表面上看，一位是职业军人，一位是职业革命家，似乎个性特点上相差太远，难以一下子达到交往亲密的程度。然而中国革命的显著特色是武装夺取政权，军事斗争是我党当时面临的最紧迫的任务。毛泽东很快具有了革命家兼军事家的双重身分，而且他的军事思想成为中国革命胜利和发展的指针。正因为这样，毛泽东很早就注意物色和使用党内的军事人才。刘伯承是建军初期党内屈指可数的军事奇才，他对四川泸（州）顺（庆）起义的组织指挥和在南昌起义中的谋划筹策，赢得了我党领导层内的一致赞许和佩服，曾被人称为无产阶级的孙武。在未与刘伯承接触之前，毛泽东对刘伯承是十分仰慕和推崇的。1929年4月5日，毛泽东给中共中央的信中曾提到，如果调朱德、毛泽东离开部队，必须让刘伯承和挥代英来替换才行。可见刘

伯承在毛泽东的心目中位置是很高的，认为只有他才能指挥红四军，才能代替朱德。

差不多是在同一时候，1929年春，刘伯承在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听了国内来人关于湘赣革命根据地斗争情况的介绍后，由衷地对毛泽东肃然起敬，当即对同学屈武说：毛泽东、朱德在井冈山搞出了这么个好的局面，真了不起。中国的武装斗争总算有了基础，只要坚持下去，胜利是毫无疑问的。我真希望现在就能回国，与毛泽东、朱德一道战斗。

对革命道路的共同认识和对军事斗争规律的共同理解，把两颗充满理想和智慧的心紧紧连在了一起。这富于传奇色彩的彼此仰慕的情景，最充分不过地表明了刘伯承与毛泽东亲密交往的思想基础。

访问人：刘伯承与毛泽东直接交往以后的情况又是怎样的呢？

薛洪兴：刘伯承与毛泽东初次会面是在1931年底。当时，刘伯承从上海地下斗争的环境转到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受命接办中国工农红军红军学校。毛泽东代表组织跟刘伯承谈话。两位彼此仰慕已久的同志得以直面相对，都感到分外的喜悦和激动。毛泽东对刘伯承寄予厚望，直截了当地要求刘伯承把红军学校的水平推进一步，又快又好地培养出一批能攻善守的红军指挥员。他对刘伯承强调说：学校对于军队的发展壮大意义至关重大。新旧军阀很懂得有权必有军，有军必有校的道理，蒋介石就是靠黄埔起家。我们要把红校办成“红埔”，要镀这个红点子，把红校办成培养干部的基地。刘伯承当即表示决不辜负中央和毛泽东的重托，一定尽力把红校办好。刘伯承虽然在红校只干了一期，但确实竭尽自己的才智。从教育指导思想到教育内容，从教材编写到教育方法，以及行政管理、作风纪律等，都提出和建立了一系列新的原则和措施，大大促进了红军学校的建设。

后来，刘伯承与毛泽东先后遭到党内“左”倾错误领导的排斥。1932年10月毛泽东在宁都会议上被剥夺了对红军的指挥权。1934年9月刘伯承被李德等撤消了红军总参谋长的职务。在同样艰难的处境下，他们都发表了摆脱根据地困境的战略性意见，这使他们之间的友谊又进了一层。事情大致是这样的：1933年9月，李德来到中央苏区，在中共中央主要负责人的支持下，掌握了红军的指挥大权。在李德等的指挥下，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节节失利，红军陷入严重的被动。当时刘伯承任总参谋长，他逐步看出李德等人推行的消极防御方针完全脱离了斗争实际，是导致反“围剿”失败的根本原因。他多次向李德等提出不同意见，结果反而遭到李德的不满，指责他不会当参谋长。他看不惯李德闭门造车式的指挥方法和骄横跋扈的军阀作风，善意提出批评，更引起李德的忌恨，不让他参与重大的指挥活动。刘伯承不计较个人的得失，抓紧时间致力于总结和宣传积极防御的战略战术，以期使上层领导改弦更张。1934年5月至9月，他接连发表了《现在游击队要解答的问题》和《到敌人后方开展游击战争的几个教训》等专论，明确提出到敌人深远后方开展游击战争，威胁敌人根本重地，破坏敌人交通运输线，迫敌回援，以打破敌人“围剿”的战略设想，这与后来毛泽东提出的红军主力“应该突进到以浙江为中心的苏浙皖赣地区去”“将战略防御转变为战略进攻，威胁敌之根本重地，向广大无堡垒地带寻求作战”的战略方针，可谓不谋而合，异曲同工。这种在重大关头对战争指导的共同的真知的见，使两位军事家之间的感情更为亲近，由相识发展为相知，相互视为知己的战友。

再后来是毛泽东等决定恢复刘伯承的总参谋长职务，从此可以说刘伯承

归到了毛泽东的直接领导之下。中央红军长征前夕，刘伯承被李德等撤掉了总参谋长职务，降为第五军团参谋长。1934年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的黎平会议，初步扭转了长征初期中央红军因消极退却造成的严重不利局势。会上毛泽东等力主重新起用刘伯承当总参谋长，得到会议通过。刘伯承一扫忧虑压抑的沉闷情绪，心情舒畅地投入了新的工作。长征中，他是毛泽东在军事上的得力助手。他根据毛泽东等的意图严密计划，精心部署，保证了红军的胜利进军。四渡赤水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他积极提出带有战略意义的建议，供毛泽东等参考。例如在遵义会议上，他联合聂荣臻提出北渡长江与第四方面军会合，以便集中力量，协同作战，得到毛泽东等的欣然采纳。他最突出的贡献是受命率部先遣，迭克强敌，屡闯险关，为红军前进开辟通路。突破乌江、智取遵义、抢夺娄山关、巧渡金沙江、通过彝民区、强渡大渡河，这一连串光辉的胜利中，充分显示了刘伯承非凡的勇气和过人的谋略。这也是毛泽东知人善任的结果。毛泽东多次当面赞扬刘伯承的功绩。在乌江浮桥上，毛泽东称赞刘伯承：真了不起，你们就地取材，用竹排架起这样的桥。在大渡河畔，毛泽东专程赶到刘伯承的先遣队司令部，祝贺先遣队强渡成功。毛泽东端起一大碗米酒说：“祝贺先遣司令和干部战士们！”问起刘伯承彝海结盟的经过，说：“诸葛亮六擒七纵才使孟获心服，你怎么一下就说服了小叶丹呢？”对刘伯承的功绩大加赞赏。

红军第一、四方面军会合后，刘伯承随朱德到左路军工作，积极团结第四方面军广大干部战士，与张国焘的分裂主义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他坚强的党性和高超的斗争艺术，事后得到了中共中央、毛泽东的充分肯定。

访问人：以后的情况又是怎样的呢？

薛洪兴：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一直让刘伯承在重要战略方向上独当一面，连任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师长、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司令员等重要职务，充分发挥刘伯承的指挥才能。这期间，由于工作的关系，刘伯承与毛泽东很少见面，彼此靠文电往还沟通联系，这种联系基本上限于工作的范围。毛泽东向刘伯承下达作战指示和任务，刘伯承则向毛泽东报告执行情况和有关建议。毛泽东对刘伯承十分信赖和尊重，不但在刘伯承负责的方向上注意听取刘伯承的意见，而且常就一些重大决策或部署向刘伯承提出征询，行文往往采用商讨式的语气，称呼上除刘伯承、邓小平并提时称“刘邓”外，单独发给刘伯承的电文则称“伯承”，显得很亲切。刘伯承对中央和毛泽东的命令、指示是无条件执行的，有关征询必定认真回答。他总想用自己的积极努力来减轻中央和毛泽东的负担，替中央和毛泽东分忧。这里面基本上又可分为三种情况。一是在贯彻执行中紧密结合战场实际，争取最佳的效果，总结出带有普遍规律的经验；二是时时刻刻维护全局利益，只要对全局有利，哪怕局部遭受一些损失也在所不惜；三是敢于发表有价值的建议和意见，供中央和毛泽东决策参考。第一种情况，例如1940年4月刘伯承提出“敌进我进”的方针，在民族战争的新形势下对传统的“敌进我退”方针作了补充和发展，并运用内外线转换和组织敌后武工队等方法来贯彻落实这一方针。毛泽东及时肯定了 this 方针和有关措施，很快总结、上升为指导全国解放区的战略方针，使它成为毛泽东军事思想中的有机组成部分。为了使毛泽东提出的游击战战略方针具体化，他解决了根据地游击战的组织法和游击战的基本战法。前者叫“游击集团”，村、区、县、军分区等各级都建立起基干武装、地方武装与人民武装相结合的游击网络，发挥根

根据地军民的综合战斗力。后者是关于伏击、袭击、急袭、吸打敌援、断敌交通等一整套游击战术，使根据地军民有所遵循。再如解放战争中，毛泽东规定了“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作战方针，刘伯承针对不同的战场条件和不同的敌人，创造性地提出了“攻强则弱亦强，攻弱则强亦弱”“攻敌所必救，歼其救者，攻敌所必退，歼其退者”“攻敌一点，吸其来援，啃其一边，各个击破”等战术原则，指导和指挥了一连串胜利的歼灭战。毛泽东在电文中多次给予了表扬。

第二种情况，全国解放战争开始不久，毛泽东电令刘伯承伺机攻击敌第五军和整编第十一师，取得打国民党王牌军队的经验。刘伯承明知以自己组建不久的部队打敌精锐部队有很大困难，但他坚决从全局需要出发，指挥部队与敌第五军和整编十一师交手。战役取得了歼敌一个团的胜利，但自身也付出了代价。刘伯承认为这个代价是值得的，通过实战摸了一下敌王牌部队的底，为中央和毛泽东主席下一步的作战指导提供了依据。1947年6月，刘伯承与邓小平奉中央、毛泽东之命，率领晋冀鲁豫野战军12万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开创了战争史上大兵团无后方远距离突入敌纵深的先例。这次行动的风险是很大的，毛泽东曾要他们作好站不住脚被敌人打回来的思想准备。可刘邓下了义无反顾的决心，表示即使牺牲自己这支部队来换取兄弟部队转入战略进攻也是完全值得的。挺进大别山以辉煌的胜利而告结束。中共中央、毛泽东高度赞扬了刘邓顾全大局的英勇行为。

第三种情况，在一些重大作战行动上，刘伯承总是积极、主动地给中央和毛泽东献计献策，加强和完善中央与毛泽东的决心、部署。淮海战役开始前夕，刘伯承精心分析了战场的敌我态势，建议采取斩断敌人中枢的办法，先行控制津浦铁路徐州、蚌埠间的宿县等战略要点，形成对徐州国民党重兵集团的战略包围。这个重要的建议很快被中央和毛泽东采纳。刘伯承不失时机地指挥部队一举攻取宿县，实现了“关门打狗”的有利局势，为淮海战役的胜利进展创造了条件。在选取战役第二阶段打击目标的问题上，刘伯承与陈毅、邓小平坚持主张打黄维兵团，并反复向中共中央、毛泽东陈述理由，得到了毛泽东的支持和批准。毛泽东的复电说：“完全同意打黄维……情况紧急时机，一切由刘陈邓临机处理，不要请示。”如果不是彼此深入的了解和高度的信任，不可能出现这种上下融洽、协商一致的动人情景。通过以上事实和过程，可以看出刘伯承与毛泽东的关系是随着革命战争的进程而日益加深的。

访问人：你上面说到刘伯承与毛泽东的关系还可以从横向上看，这方面的情况可否也请您介绍一下？

薛洪兴：刘伯承与毛泽东在个人性格特点与素养等方面，有不少相同或相似之处，这也是他们亲密交往的基础。除了军事上易于沟通外，还有些别的因素。如他们都是果断、刚毅的人，对理想和具体目标有百折不挠的气概。他们又都是才华横溢的人，对客观世界具有深刻的洞察力，指挥作战、处理事务具有丰富的想象力和惊人的创造力。他们还都是幽默风趣的人，待人接物和蔼可亲。但毕竟刘伯承与毛泽东不是属于同一层次的。毛泽东是属于那种领袖型、全面型的，不仅是军事家，还是思想家、政治家、文学家等。相对而言，刘伯承的才能和成就更多地表现在军事领域。这既是实践造成的差异，也有秉赋的关系。刘伯承很早就懂得扬长避短，他在川军时就对人说过，干别的行当也许难有作为，干军事一定会干出名堂来的。事实证明他对自己

的判断是完全正确的。毛泽东内心感情世界非常丰富，有时显得深沉，有时又比较外露。刘伯承比较内向，他自己的座右铭是“深思断行”。刘伯承的特点，周恩来曾概括为举轻若重，这与他长期从事军事指挥活动有关。作战事宜，关系到千千万万指战员和人民群众的生命。他曾说，下命令如果一字不慎，影响战局关系甚大，得枉流多少人的血啊。毛泽东高瞻远瞩，气魄宏大，善于抓本质、抓关键。周恩来还评价邓小平是举重若轻，毛泽东也应是如此。

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个性方面的因素不是最主要的条件或障碍，起主导作用的是政治立场和政治态度。在整个传记的写作过程中，我们感到刘伯承与毛泽东的关系是亲密而融洽的，因为他们都是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奋斗者和领导者。然而也不能完全抹煞个人特长、爱好、志趣等对交往的影响，多一点共同的东西，思想上就多一些交会点。不能不承认刘伯承在性格、志趣等方面与毛泽东的差异影响着他们在更广阔领域里的交往。例如，毛泽东可以与陈毅、叶剑英等谈诗，刘伯承在这方面似乎略逊一筹。

访问人：能不能从军事上把刘伯承与毛泽东做一些比较呢？

薛洪兴：毛泽东和刘伯承都是军事天才，他们不仅具有极其丰富的军事知识，而且对战争规律有透辟的理解，表现为高超的谋略思想和出色的指挥艺术。由于各自所处的地位和负责的范围不同，毛泽东更擅长于战略指导，刘伯承则精于战役指挥。当然不是说刘伯承不具备战略家的条件和水平，因为他不负担全局性的指导，只负责一个方向，一个战略区，用现代军事术语讲，是战区战略。刘伯承最大的特点，一是实事求是，作战训练都是从实际出发，解决实际问题；二是创造性，善于把毛泽东的军事思想与自己担负的任务与工作相结合，创造出具有一般指导意义的方针、原则和方法来。像上面提到的“敌进我进”方针和游击集团的组织方法，就是这样的成果。建国后创办军事学院，从培养目标到教学计划，从教学内容到方式方法，从制度到校风，他都提出了一整套的东西。其中著名的有：培养红专的军官，建设一支精通业务的高水平的教员队伍，贯彻“战术为经，技术为纬”，交织上升的教学方法，遵循“博而约”的学术研究方向。陈毅元帅说他“论兵新孙武”，确实是非常恰当的评价。

访问人：刘伯承对毛泽东是怎样看的？

薛洪兴：刘伯承对毛泽东历来是非常崇敬的。除了早期与毛泽东在军事上的心心相印及不谋而合外，后来曾一再肯定和强调毛泽东及毛泽东军事思想的伟大作用。1942年8月1日，他在《合同战术》译版序言中提出：“我们应该把毛泽东同志所著《论持久战》与《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作为基本的第一种教材”。1947年5月，他在《关于自卫战争十个月来形势的报告》中指出：“毛主席的集中优势兵力消灭敌人有生力量的思想，在军事指导上是划时代的人民军队的天才指导”。1948年4月17日，他在一次报告中说：“我们要学习毛主席的战略，这是人民的战略，在政治上军事上是完整的一套，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1948年7月7日，他又指出：“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实有它的特出之点，即以装备与兵数劣势的军队对美帝国主义所装备的蒋介石现代化军队作战，由于我军富有特殊的机动力，善于在耗散敌人之中，集中绝对优势兵力捕捉敌人弱点而不断围歼之，所以能够源源不绝地俘获敌人的武器兵员以补充自己。这就是毛泽东军事原则所独有的特质。”1951年1月，他在《为建设正规化现代化的国防军而奋斗》的报告中

说：“毛主席在各个历史时期中，对于军事思想都有伟大的创造”。

以上可以充分看出刘伯承对毛泽东怀有深厚的感情，对毛泽东军事思想有着深刻、精到的认识和理解。正因为有深刻、精到的认识和理解，所以运用起来也就能得心应手，发挥自如。

即使在被误解的情况下，刘伯承也能够泰然处之，正确对待。1958年的反教条主义运动中，他受到了不公正的批评。但他不计较个人的得失，仍一如既往地为人民积极奉献。他充分运用自己丰富的斗争经验和敏锐的理论思维，对国防建设、军队建设和边境安全提出了很多宝贵的建议和意见。邓小平称赞他：“无论何时何地……始终把自己的一切贡献于、服从于党的需要，把自己融合于党的事业之中，毫无个人荣辱得失的考虑，真正达到了忘我的境界。”

1973年，毛泽东指出刘伯承打仗是有功的。这个最后的评价可以说是为他们之间的关系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1993年6月13日于国防大学

## 访顾永忠——毛泽东与贺龙

### 顾永忠

顾永忠，江苏无锡人。现任《贺龙传》编写组组长、研究员。长期从事军事研究工作。著有《贺龙用兵》、《贺龙军事大事记》、《贺龙军事文选》（主编）等。

在毛泽东周围聚集着一批中华英才，他们如同群星簇拥着毛泽东，一同光辉灿烂，改变了中国的昨天和今天。他们经历不同，性格各异，却唱出了中国现代史上最雄壮的时代交响曲。当然，这里面也不乏令人回味与思考的地方。

访问人：毛泽东与贺龙见面相识在十大元帅中是最晚的一位。十大元帅中有八位毛泽东在江西苏区就曾和他们一起共事，一起作战，和徐向前是在红军长征途中见面的，贺龙则是 1936 年长征结束，到了陕北，他们才第一次见面。

顾永忠：毛贺见面认识的确是最晚的。但他们彼此相知是比较早的。或者说，毛泽东知道贺龙这个人，在十大元帅中又是最早的。

访问人：怎么说呢？

顾永忠：贺龙是湖南桑植人，毛泽东是湘潭人，他们都是湖南人。1916 年贺龙“两把菜刀”闹革命，在湖南是一个赫赫有名的人物。当时非常关心时事政治的毛泽东正在湖南一师读书，对这个情况不会不知道。1927 年湖南秋收起义失败之后，在三湾改编起义部队时，毛泽东就曾把贺龙两把菜刀起家的故事讲给大家听，他说：“贺龙同志两把菜刀起家，现在当军长，带了一军人，我们现在不只两把菜刀，我们有两营人，还怕干不起来吗？”毛泽东用贺龙不屈不挠进行革命斗争的事迹教育部队，鼓舞斗志，说明他对贺龙其人知道得比较早，对贺龙的经历也是相当了解的。毛泽东这个名字也是很响亮的，贺龙也早就知道了。有文字记载的可以追述到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初期，当时毛泽东在江西，贺龙率红军第四军在湘鄂西。中共中央与红四军保持联系，并把江西朱毛红军的经验介绍到湘鄂西。1929 年 9 月 10 日贺龙以湘鄂西前敌委员会书记名义给中央写了一个报告，报告中谈道：“我们的战术，也同朱、毛方面红军所指示的军事原则一样，我们对于此一重大的军事（行动）决不冒险，当视敌我力量，斟酌或进或退，自当随机应变。”由此可见，贺龙不仅早已知道毛泽东，而且知道朱、毛提出的 16 个字军事原则，并把它与本地区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指导湘鄂西的根据地建设及红军的军事行动。再后来，进一步认为朱毛是红军的灵魂。1931 年 1 月贺龙在一次收编川军的大会上讲话：“大家跟着我拖来拖去，不是拖着好玩的，也不是无獐打野。我是有‘老板’的，我的“老板”就是中国共产党，就是朱（德）、毛（泽东）、彭（德怀）、黄（公略）。”可见朱毛已经在贺龙的心里深深地扎了根。

访问人：因为贺龙把毛泽东、朱德等视为红军的领导人，所以在 1935 年张国焘闹独立性，分裂党、分裂红军，反对毛泽东等领导人时，贺龙毫不犹豫地支持了毛泽东。

顾永忠：是的，旗帜非常鲜明，坚定地站在毛泽东正确路线一边。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会师后，张国焘搞分裂活动，贺龙和任弼时开始是不知道的。因为中共中央与红二、六军团联络的电报密码留在红军总部，中央与贺龙曾失去了联系，直到 1936 年 7 月 1 日红二、六军团与红四方面军会师

后，朱德、刘伯承向贺龙、任弼时等介绍情况后，才了解了事实的真相。两军会师后，张国焘积极活动，向红二、六军团派了工作组，散发《反对毛、周、张、博逃跑主义路线》的文件和《干部必读》的小册子，煽动对中央的不满。贺龙知道后，很严肃地指出：“张国焘分裂中央是错误的，材料不能发”，并立即通知部队把已收到的材料统统收起来，不准讲反对中央和关于红一、四方面军的关系问题。在庆祝两军会师的大会上，贺龙坐在张国焘旁边，他对张国焘说：“国焘啊！只讲团结，莫讲分裂……”因此，张国焘没有敢讲不利团结的话。由于贺龙、任弼时和朱德、刘伯承等同张国焘分裂主义进行了坚决斗争，迫使他同意北上，实现了三支主力红军胜利会师。朱德后来说：“贺老总对付张国焘很有办法，不争不吵，向他耍人要枪要子弹……，张国焘对贺龙、弼时都有些害怕呢？（三支主力红军）一起北上会合中央，贺老总是有功的。”1943年1月7日，任弼时在《向贺龙同志学习》一文中说：“他是坚决反对张国焘所采取对抗中央行动的。在延安的一次批评张国焘路线的会议上，贺龙同志手指着张国焘说：‘当你是共产党员的时候，我还是个军阀，现在我做了共产党员，你反而成了军阀了！’这说明了你对党是忠诚的……”

访问人：贺龙率二、六军团（后改为红二方面军）经过长征到达了陕北，见到了毛泽东，这两位神交已久的风云人物关系如何？

顾永忠：毛泽东对贺龙坚定的革命立场作了充分的肯定，特别是对他高超的指挥艺术作了很高的评价。在三支主力红军会师后，毛泽东在保安会见二、四方面军部分领导人时十分高兴他说：“二、六军团在乌蒙山打转转，不要说敌人，连我们也被你们转昏了头。硬是转出来了嘛！出贵州，过乌江，我们一方面军付出了大代价，二、六军团讨了巧，就没有吃亏。你们一万多人，走过来还是一万多人，没有蚀本，是个了不起的奇迹，是一个大经验，要总结，要大家学。”

在抗日战争期间，贺龙先后任八路军一二 师师长、晋绥军区司令员，后来到延安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员，他与毛泽东工作上的接触就比较多。贺龙对毛泽东十分敬佩，而且始终站在毛泽东的正确路线一边。毛泽东对贺龙也是相当尊重和信任的。

访问人：在抗日战争初期，1937年12月又发生了王明瞎指挥的问题，当时毛泽东的压力很大。在这个重要问题上，贺龙的态度又是怎样的？

顾永忠：在这个问题上，贺龙同样是不含糊地坚决拥护了毛泽东关于必须坚持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的原则，坚持山地游击战，不放弃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的战略方针。1937年12月，王明从苏联回来，并召集会议，批评中央的方针不对，说什么国共已经合作，要国共两党共同负责领导抗战，国民党的军队多，共产党的军队少，不能把国民党惹翻了。鼓吹“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一二 师的一些干部也受到了王明这一错误观点的影响，不敢放手发动群众，壮大自己的力量，在开辟抗日根据地方面缩手缩脚。贺龙生气了，他在一二 师干部会议上严肃地批评说：“我们要按照毛主席确定的‘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原则，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不能照某些人提出的“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主张办，把自己的两只手脚绑起来，任凭顽固派来打我们”。但一二 师的有些干部听了，认为贺龙的讲话会损害统一战线。有几位干部就写信给毛泽东，建议将贺龙调离一二 师到中央学习。让师政委关向应也签

了名。信发出后，关向应又觉得不对头，就赶到延安找毛泽东。毛泽东在和关向应谈话时，批评了这种错误作法，并对贺龙作了很高的评价。毛泽东说：“贺老总有三条嘛：一、对党忠诚；二、对敌斗争坚决；三、联系群众。一直到“文革”毛泽东还是重申这三条。

访问人：据我们了解，贺龙对毛泽东是非常崇敬的。延安整风时，贺龙提出毛泽东方向，就是我们党的方向。他还说，王明是个学生，他懂什么？他要再骑在毛主席的头上，我就要打倒他。贺龙的这个讲话轰动了整个延安。顾永忠：据胡乔木回忆，是有这么回事。前面讲了，王明从共产国际一回来，就说毛泽东等制定的方针是错误的，在全党贯彻他传达的共产国际指示。接着王明就到武汉去了，在武汉成立了长江局。到武汉后他给中央来了一份电报，建议延安以后不要再用中央名义发电报了，其理由是在延安的中央负责人不占多数，如果以中央的名义出来的电报就是命令和指示了。胡乔木说：这以后很长一段时间，延安中央发的电报就是用毛（泽东）洛（甫）康（生）王（稼祥）陈（云）李（富春）的个人署名，不能用中央的名义了。可是王明本人呢，他不仅管长江局范围的事，像新四军，他也派人到那里去，说新四军应该怎么怎么办，还打电报给华北，对华北八路军的活动提出意见，就连晋察冀边区政府他也插手，管得很宽。所以毛泽东说，当时中央在延安嘛，“周天子守土”，我这个中央只能管延安城。从结果来看呢？王明的那一套根本行不通，在武汉蒋介石对他很冷淡，没怎么理睬他。蒋介石只承认一个党、一个政府、一个领袖、一个主义，他根本就不想和共产党共同负责，共同领导。所以毛泽东又说了，王明是“胭脂水粉打扮前来，一个巴掌打将回去”。意思是说，王明要讨好蒋介石，结果挨了巴掌。他的那一套根本行不通。所以事隔一年之后，中央召开六届六中全会，批评了王明。这就是贺龙对王明十分气愤的原因之一。

访问人：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和贺龙的关系如何？

顾永忠：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在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的威望越来越高，贺龙对毛泽东也是更加尊敬，在国内外竭力维护他的威望，对毛泽东的决定是坚决服从。1952年8月，政务院决定组建全国体育运动委员会，共青团中央向中共中央建议：“委员会的主任委员，最好请贺龙那样的一位将军来担任。”当时，贺龙是西南局第三书记、西南军区司令员、西南行政委员会副主任。因为西南局第一书记、西南军区政委邓小平，西南局第二书记、西南军政（后改“行政”）委员主任已先后离开，贺龙实际上是握有西南地区党政军大权的一路诸侯。但当政务院常务副总理邓小平打电话征求贺龙意见时，贺龙首先问：“毛主席的意见呢？”邓小平告诉他：“毛主席也赞成。”贺龙听后毫不犹豫他说：“好。毛主席叫我干，中央叫我干，我就干！”就这样，贺龙不计个人得失，放弃了西南地区党政军大权，到北京担任了在一些人看来“没有实权”，当时还被有些人瞧不起的体委主任。

贺龙在建国以来对毛泽东的一些错误不是没有察觉。如他对“大跃进”中的高指标、浮夸风、强迫命令瞎指挥；对人民公社的吃大锅饭是不赞成的。特别是他担任国防工业委员会主任后，对“大跃进”造成的军工企业追求高产值，只讲数量，不讲质量，使国防工业基本建设和军工产品质量普遍下降，严重地影响了国防建设和部队战备训练的状况深有感触。但贺龙根据当时的国内外环境，从大局出发，无论在国内还是国外都尽量维护毛泽东的声誉和威望。1964年10月，原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下台。11月，应苏共中央和苏

联政府的邀请，以周恩来为团长、贺龙为副团长的中国党政代表团去苏联参加十月革命 47 周年纪念活动。中国派出这样高规格的代表团，意在了解苏共新领导的对内对外政策，力争改善中苏两党和两国的关系。但是，苏共新领导却要继续执行没有赫鲁晓夫的赫鲁晓夫路线，坚持反华政策。7 日晚，苏联政府在克里姆林宫举行国庆宴会。当贺龙穿着漂亮的元帅服与周恩来等一起走进宴会厅时，科涅夫、罗科索夫斯基、莫斯卡连柯、崔可夫、扎哈罗夫等贺龙熟悉的苏联元帅走上前来同周恩来、贺龙握手，表示友好。在苏联领导人致完祝酒词后，周恩来同贺龙来到苏军元帅们的席前，向他们祝酒。这时，苏联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走了过来，他先是向周恩来挑衅，碰了钉子。但他仍不甘心，又向贺龙挑衅。他别有用心地对贺龙说：“贺龙同志的元帅服很漂亮，这已经不像当年的布棉袄了。”贺龙说：“还是当年的棉衣好，我舍不得它！”马利诺夫斯基说：“我也认为棉衣好，元帅服是浮华虚饰。我们的元帅服被斯大林玷污了，你们的元帅服被毛泽东玷污了。”接着，他更放肆他说：“我们已经把赫鲁晓夫搞掉了，你们也会把毛泽东搞掉的，只是时间未到。”贺龙听后勃然大怒，瞪着眼睛指着马利诺夫斯基说：“你的话完全是错误的，我根本不能同意……。”说罢走到周恩来身边，报告了刚才马利诺夫斯基的言行。周恩来很愤慨，立即找来米高扬说，马利诺夫斯基胡说八道。米高扬立即表示：“这绝对不代表我们的路线。他多喝了几杯酒，才说这样的蠢话……。”第二天，勃列日涅夫等苏共主要领导拜会中国代表团时，我方向他们郑重提出：马利诺夫斯基在宴会上的挑衅，是对中国人民伟大领袖毛泽东同志的侮辱，是对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和中国党政代表团的侮辱。这种事连赫鲁晓夫在位时也未发生过。你们欢迎我们来的目的，是不是为了当众侮辱我们，要煽动反对毛泽东同志？要知道，这根本是妄想，丝毫不能损害毛主席在中国党内的崇高威望。苏共领导再次以中央委员会的名义向周恩来、贺龙道歉，并一再声明：这决不代表苏共主席团看法，并让马利诺夫斯基向中方正式道歉。我方表示，你们说马利诺夫斯基是酒后失言，我们认为是“酒后吐真言”，他反映了一部分人的情绪，决不是一件小事。因此，必须先解决这个问题，才能谈及其他问题。这一次，中国代表团提前回国，以示抗议。由于中国代表团坚持有理、有礼、有节的斗争，维护了中国共产党、中国政府和毛泽东的尊严。所以，代表团回来时，毛泽东破例亲自到机场迎接。他的这一举动，一方面是要向苏共新领导表明：中国共产党、中国对苏联的观点是完全一致的；另一方面，也表明他对周恩来、贺龙在苏联的表现是十分满意的。毛泽东认为，贺龙是一个方面军的旗帜，一直对他比较重视，并委以重任。1959 年成立新的中央军委时，设三个副主席，贺龙为第二副主席。1960 年起，又兼任国防工业委员会主任，主管国防工业。后来林彪生病长期休养，贺龙实际上主持军委的日常工作。1963 年 4 月，毛泽东在一次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提出：“林彪同志长期生病，身体不好，我建议由贺龙同志主持军委日常工作。”与会的政治局委员一致同意。直到“文革”之前，毛泽东与贺龙的关系总的看是比较好的。

访问人：从上面您介绍的情况可以看出，贺龙对毛泽东一贯忠贞不渝，请问是什么原因促使他这样做的？

顾永忠：贺龙出生在贫穷的农民家庭，饱受地主豪绅、贪官污吏的欺压，看到了社会的黑暗，所以立下了打倒贪官污吏和地主豪绅，为广大劳苦大众谋利益的宏伟誓言。贺龙是一个绝顶聪明的人。他虽然读书不多，因从小走

南闯北，见多识广，生活阅历和社会经验十分丰富。贺龙也是一位很有个性，善于独立思考，很有判断能力和自主能力的人。他自 1914 年加入孙中山领导的中华革命党和发动“两把菜刀起义”以来，一直在寻找革命真理，探索革命的道路。他对无政府主义、三民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对国民党和共产党作了比较，认定只有马克思主义和共产党才能救中国，所以在共产党最倒霉的时候义无反顾地加入了共产党，从此无论遇到多大风浪，都坚定不移。贺龙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同国民党的领袖蒋介石、汪精卫，与共产党的领导人陈独秀、李立三、王明、张国焘、毛泽东等都直接或间接打过交道，经过反复比较，他认定只有毛泽东最英明、最正确，所以心悦诚服地爱戴与信任毛泽东。贺龙的性格豁达豪放，但对毛泽东，像学生对师长那样发自内心的崇敬，忠心耿耿，坚贞不渝。贺龙对毛泽东的感情，也是十分纯洁的同志之情、战友之情。

访问人：贺龙对毛泽东一片忠心，但在“文革”中，贺龙却遭到那样不公正的对待，这是为什么？

顾永忠：“文化大革命”中的问题比较复杂，不是几句话说得清楚的。贺龙在“文革”受迫害的情况，也比较复杂，首先，当然是由于毛泽东错误地发动了“文化大革命”运动。这场“文革”运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的灾难。在“文革”中，不仅是贺龙，而且包括刘少奇、邓小平、彭德怀、陈毅等一大批党和国家领导人受到迫害，有的被迫害含冤去世。其次，照贺龙的说法：“党内出了奸臣”。就是林彪和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他们利用毛泽东的错误，兴风作浪，千方百计地迫害反对他们，或与他们不同观点，不愿意跟他们走的人。林彪把贺龙视为篡党夺权的重要障碍，所以必欲除之而后快。

访问人：林彪与贺龙有什么矛盾，他为什么一定要把贺龙除掉？

顾永忠：在南昌起义前，贺龙是军长。南昌起义时，是起义军总指挥，而林彪当时只是一个连长，与贺龙的地位相差甚远。在南昌起义后，国内革命战争各个历史时期，两人地位相当，但从来没有在一起共过事。建国后到 1959 年，林彪任国防部长，中央军委第一副主席时，贺龙与林彪才有工作上的来往。贺龙对林彪是尊重的，工作上支持的。在林彪养病期间，贺龙也经常向他通报情况，请示工作。但林彪容不下贺龙。首先，毛泽东在 1963 年让贺龙主持军委日常工作，使林彪有大权旁落之感，认为贺龙夺了他的兵权。第二，贺龙主持军委工作后，对军队建设的指导思想与林彪有明显的不同：林彪搞空头政治，强调“突出政治，四个第一”，政治好，其他一切都好，鼓吹“政治可以冲击一切”，专门搞虚的。贺龙则既务虚，强调加强部队政治思想工作，军队要绝对服从共产党的领导，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但他更务实。他狠抓军工生产，努力改善部队的武器装备；抓部队的基层和机关建设，落实民兵工作；加强部队的军事训练，注意提高其军事素质，他强调政治工作必须保障部队战备训练和其他各项任务的完成，这显然与林彪的观点大相径庭。林彪岂能容得。于是，他先派他的老婆下部队调查搜集材料，然后自己出面，说什么“大比武冲击了政治，方向出了偏差”。第三，贺龙主持军委工作期间，工作有声有色，成绩卓著，受到毛泽东的赞誉，也得到全军广大指战员的爱戴。1965 年 10 月，贺龙率中央代表团去新疆参加自治区成立 10 周年庆祝活动时，解放军各总部、军兵种和各大军区的主要领导也随同前往。对此，林彪十分猜疑。他的老婆叶群散布流言蜚语说：

贺龙竟有如此强的号召力，他一声召唤，那么多大军区的领导跟他走。后来，进一步诬蔑贺龙在“拉山头”。所以，林彪把贺龙当作对头。开始他还想拉拢贺龙。1965年12月，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批判罗瑞卿会议，贺龙事先一点也不清楚，会议期间林彪专门派叶群去看望贺龙。她说：“林彪很关心贺总，要她来代为问好。还说，1965年8月1日《人民日报》上刊登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民主传统》一文，是林总决定用贺总名义发表的，因为林总考虑到贺总在群众中的威望高，特别是近几年来在国防建设上有功。”意在拉拢贺龙，但贺龙没有理睬他。上海会议后，罗瑞卿被免去了军委秘书长和总参谋长的职务，也不让贺龙主持军委日常工作了。林彪见拉拢这一招不能奏效，于是就决心千方百计地要把贺龙打倒。他先是在总参组织揪罗瑞卿的后台，随后对他在空军的亲信吴法宪说：贺龙有野心，到处插手，总参、海军、空军、政治学院都插手。空军是一块肥肉，谁都想吃，你要警惕他夺你的权；又打电话给海军的亲信李作鹏说：你要注意贺龙，贺龙实际上是罗瑞卿的后台，他拉了一大批人来反对我，军委很快要解决他的问题。并授意他们给毛泽东写诬告信。不久，林彪就在一个由少数党政军高级干部参加的“小型打招呼会”上，把贺龙问题端了出来，他要大家对贺龙的所谓“夺权阴谋提高警惕”。

访问人：毛泽东对贺龙应该是了解的，为什么不来说句话？

顾永忠：开始，毛泽东是保贺龙的。1966年9月初，毛泽东把贺龙招进中南海，在游泳池的休息室里，把由林彪送去的吴法宪的诬告信给贺龙看，并对贺龙说：你不要怕，我当你的保皇派。我对你是了解的，我对你还是过去的三条“忠于党、忠于人民、对敌斗争狠，能联系群众。”但是，后来毛泽东看了一些所谓贺龙问题的揭发与调查材料，又改变了主意，他在1968年10月举行的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上说：我对贺龙原来是想要保的，现在看来不能保了。这实际上给打倒贺龙定了调。

访问人：所谓贺龙问题，主要是什么，是“二月兵变”吗？

顾永忠：贺龙的所谓问题，主要是两个：一是所谓“通敌”问题。此事发生在1933年，由于党内“左”倾错误和不停地“肃反”，使贺龙指挥的红三军到了毁灭的边缘。蒋介石便乘机派国民政府参议员熊贡卿去游说。此人是在1925年贺龙任澧州镇守使时，他作为省府驻镇守使官邪代表与贺龙结识的。蒋介石的如意算盘是：利用红三军艰难的处境和熊贡卿同贺龙的私交，劝贺龙投降。贺龙请示中共中央湘鄂西分局批准，先同意熊贡卿到红三军，在摸清国民党的意图后，便将他逮捕，公审枪决。湘鄂西分局将事情的经过向中共中央作了详细的报告。所以，说贺龙“通敌”完全是颠倒是非，蓄意陷害。二是所谓“图谋篡夺军权”和支持军队一些单位的“篡夺军权”的问题。这完全是林彪和他亲信对贺龙的蓄意诬陷。至于所谓“二月兵变”，完全是无中生有。

访问人：贺龙被送到西山后，对毛泽东是怎样看的？

顾永忠：贺龙被送到西山后，就失去了自由。但他还是认真学习毛泽东著作，关心形势。开始他还是对毛泽东抱有希望。他说：我相信党和人民是了解我的。毛主席总有一天会说话的。并针对林彪一伙的诬蔑，给毛泽东和党中央写信，就参加南昌起义、湘鄂西肃反、枪毙熊贡卿及其他一些历史问题作了详细的如实的反映，但没有任何回音。后来，随着形势的发展，贺龙也越来越意识到，对他的所谓问题的看法，不只是林彪的问题了。有一天，

他曾用手指着毛泽东和林彪的像对薛明说：“现在已经不是这个人（林彪）的问题，而是这个人（毛泽东）的问题了。只要毛主席说一句“贺龙没有问题”，事情就完结了。我相信，毛主席总有一天会说这句话的”。可惜，贺龙生前毛泽东没有说这句话。

访问人：林彪死后，毛泽东一定想了很多事情，所以立即给贺龙平反了。

顾永忠：林彪是毛泽东指定的唯一接班人。他叛逃出国摔死后，无疑对毛泽东精神上是一个很大的打击，对过去的一些事必然要进行反思。但毛泽东不愧为一位伟人，一旦他认识了自己的错误，就能承认并加以纠正，对贺龙的冤案也是如此。1973年2月，毛泽东在中南海对张春桥说：“我看贺龙没有问题，策反的人，贺龙把他杀了。”并公开承认“我有缺点，听一面之词”。但张春桥既不向中共中央政治局传达，也不为贺龙平反。12月，毛泽东在军委常委扩大会上，再次提出要为贺龙平反。说：“我看贺龙搞错了，我要负责呢？”“当时我对他说，你呢，不同。你是一个方面军的旗帜，要保护你。总理也保护他呢。”“要翻案呢，不然少了贺龙不好呢。”“都是林彪搞的，我听了林彪一面之词，所以我犯了错误。”1974年9月，毛泽东再次催问：“贺龙恢复名誉搞好了没有？不要核对材料了。”在毛泽东再三催促下，中共中央于1974年9月29日，发出了为贺龙恢复名誉的通知。但因“四人帮”干扰，这次平反并不彻底；1975年6月9日，周恩来总理抱病参加了八宝山贺龙骨灰安放仪式；1982年10月，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为贺龙同志彻底平反的决定》。

在这场“文革”的空前浩劫中，一代开国元勋贺龙含冤而死，这是“文革”造成的历史悲剧。

抚今追昔，我们必须明白，今天安定团结的局面，是以巨大的代价换来的，所以应该更加珍惜。

## 访黄瑶——毛泽东和罗荣桓

### 黄瑶

黄瑶，1933年生，江苏扬州人。长期从事宣传工作和编辑工作，著有《罗荣桓传》（合著）、《在战斗中成长的罗荣桓》、《罗帅最后十五年》（合著）、《罗荣桓元帅的故事》、《碧水苍山》、《罗瑞卿传略》、《一个大写的人》等。

毛泽东吊罗荣桓，一句“君今不幸离人世，国有疑难可问谁？”道出了许多感慨。人们自然会问：毛泽东为什么这么看重罗荣桓，他们之间有着怎样的交往和关系？

#### 相识在秋收起义

访问人：毛泽东对罗荣桓评价很高，在元帅中是少有的，那么他们是什么时候开始认识的？

黄瑶：据我了解，他们开始接触的时间是秋收起义以后，大约在文家市。1927年大革命失败以后，罗荣桓同叶重开率通城农民自卫军参加秋收起义。9月19日部队到达文家市集合。次日清晨，毛泽东对全体官兵讲话，提出改变攻打长沙的计划，部队要找个地方休养生息，回来再打长沙。毛泽东讲了很多道理。这对于当时为起义失败不知如何是好的罗荣桓来说，感到像久渴之后饮进了甘泉。这是罗荣桓第一次见到的毛泽东。

访问人：这之前罗荣桓知道毛泽东这个名字吗？

黄瑶：知道。他早就听说这个名字了。还在1919年毛泽东搞驱张运动的时候，他就知道了毛泽东是湖南著名的学生领袖，当时的罗荣桓正在长沙读中学。1927年年初，他还知道毛泽东到湖南傅山考察过农民运动，他也读过毛泽东写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对毛泽东有着深刻的印象。过去只闻其名，现在见到了本人，听了他的讲话，觉得毛泽东有办法，是可以信赖的人。

访问人：那么他们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有了接触呢？

黄瑶：据杨勇回忆，可能是通过朱建胜认识的。当时的起义军准备从文家市撤退到萍乡，派朱建胜和罗荣桓探路打前站。因为杨勇是文家市人，他们就先到杨家，问杨勇路怎么走，并且在杨家吃了饭。这次探路的结果，朱、罗发现萍乡街上和车站住满了军队，所以起义军改变了行军方向，未到萍乡。估计这期间和毛泽东可能发生了联系。

以后是三湾改编，起义军由师缩编为团，下辖七个连，支部建在连上，罗荣桓任特务连党代表，是当时七个连党代表之一。这个时候毛罗之间应该有接触了。再以后就是前往井冈山的途中，有件事可以说一下：10月22日部队在江西遂川县的大汾宿营，次日清晨，战士们还没有醒，突然枪声大作，四周都是敌人，队伍遭到了敌人的袭击。这时罗荣桓和连长曾士峨带着特务连迅速撤退，一口气跑到黄坳，一路上只剩三四十人，里面就有毛泽东。停下来了，战士们稀稀拉拉地坐在地上，又渴又饿。搞点饭吃吧，结果呢管伙食的也跑丢了。大家就凑点钱到老乡家买饭吃。买来的是一些剩饭和泡菜辣椒，没有碗筷，大家就用手捧着吃。毛泽东穿着长衫，就用衣襟兜着，用手抓着吃了。当时的人们未免有点狼狈，吃饱后，毛泽东首先站起身来，向空地走了几步，双脚并拢，身体笔挺，精神抖擞地对大家说：“现在来站队了，我站头一名。请曾连长喊口令。”罗荣桓立即入列，自动向毛泽东看齐。曾士峨也双手握拳，跑步走到指挥位置，下达了“立正”的口令。战士们被

感动了，他们抬起头来，纷纷提枪人列。后来张宗逊带着一排人也赶到了，罗荣桓要张宗逊护送毛泽东先走了。这件事是罗帅自己回忆的，因为当时的情景非常艰难，所以他印象很深。

访问人：上了井冈山，毛泽东和罗荣桓接触就多了，是吗？黄瑶：印象深的是八月失败。这时朱德和毛泽东已经会师，组成工农红军第四军，其中28团和31团是全军主力团，罗荣桓任31团第3营党代表。八月失败后，毛泽东到桂东接朱德、陈毅回来，率领的就是第3营。一路上从井冈山下山很不好走，有的地方坡比较缓，长着又高又厚的草。这种草叫野萁茅，走路时特别容易绊倒，红军就想了一个办法，坐在草上往下滑，结果又快又省力。

访问人：毛泽东《吊罗荣桓》的诗中，“记得当年草上飞”是否就指这件事呢？

黄瑶：这句诗是毛泽东借用的，相传是唐朝黄巢《自题像》诗中的第一句。既然是借用到这里，又有这回事，可能是毛泽东想到了当年的这种情景才用的。

下山途中还有一件事，一天夜里部队正在行军，突然遭到敌人袭击，队伍被打散了，但因为部队政治思想工作做得好，比较稳固，打散了很快就能集合起来，结果各连清点人数，发现只丢了一个担架兵。当部队回到井冈山时，这个战士已先他们到达井冈山了。这次罗荣桓领导的3营远征湘南，行程几百里，打了好多仗，却没有一个开小差的，创造了巩固部队的新纪录，真正成了拖不垮、打不烂的红色铁军。这年11月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一文里对连党代表的作用评价很高，当然这里也不一定仅仅指罗帅这个营，但起码包括进去了。尤其31团是毛泽东组织秋收起义亲自带出的部队。

访问人：毛泽东提出的一些建军原则，如民主制度，尊重士兵人格、不打骂士兵、反对军阀主义，经济民主、政治民主、军事民主、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等都是从这时慢慢积累起来的。在这一过程中，罗荣桓起了什么作用？

黄瑶：我认为罗帅是实践者，当然党代表还有其他人，但大部分后来都牺牲了，而他是幸存者。这一时期他们之间的交往比较直接。1929年下山的时候，我军十分被动，敌人一直尾追不放，当时的前卫部队也是罗荣桓的第3营。到了大柏地，后卫28团的肖克那个连和敌人接触了，敌人追得很紧。这时的3营突然不走了，要求和敌人打。据江华回忆，当时军队的民主气氛很浓，用现在的眼光看，可能是过分了。罗荣桓和营长去军部向朱毛反映，朱毛决定不走了，就在这里打伏击，结果打胜了，并扭转了被动局面。

**毛泽东说：罗荣桓是个人才，我们对他发现晚了**

访问人：红七大时期四军内部产生争论，这似乎给毛泽东留下了深刻印象。几十年之后的1966年毛泽东同外宾谈话时还提到这件事。他说，七大时，遭到内部同志的不谅解，把我赶出红军，当老百姓了。那时林彪同我一道，他赞成我。他是在朱德领导下的队伍里，他的队伍拥护我。我自己的秋收暴动的队伍却撤换了我。同我有长久关系的撤换了我。这里面包括罗荣桓吗？

黄瑶：对于这段历史，罗帅所持什么态度，没有材料说明。但根据我掌握的情况分析，这里面不包括罗荣桓。红四军召开“七大”时，毛泽东所领导的秋收暴动部队是第31团，下山后不久改称第三纵队，司令是伍中豪，党代表是蔡协民，罗当时是这个纵队中小支队的党代表，古田会议时，据冯文彬回忆，他当时从上海到闽西不久，古田会议前后有次毛泽东和他散步聊天，这时罗荣桓从旁边走过，毛对冯说，这是个人才，我们对他发现晚了。这恐

怕是毛泽东对罗荣桓的真情的流露。我认为这话也符合罗帅的性格。罗平时沉默寡言，不张扬，不露锋芒，很少说话。因为毛泽东认为罗荣桓是个人才，红四军“九大”选举前委委员，罗帅当选了。毛泽东给中央的报告里讲有几个人做基层工作，因为“观念正确，斗争积极，经前委介绍而当选”。这里面就包括罗荣桓。

访问人：能否说这是毛泽东第一次发现了罗荣桓，重用了罗荣桓。

黄瑶：前面已经说过，毛早就认识了罗，但发现他的才华可能经过几次反复的认识。在黄坳搞饭吃是一次；打遂川是一次；八月失败后第3营去桂东，“记得当年草上飞”，是一次；大柏地战斗前罗到前委请战是一次。到古田会议前的调查会，毛对罗的认识可能经过几次反复，而产生了认识的飞跃，古田会议后罗帅升任为二纵队政委，这段时间毛泽东一直随二纵队行动。到1930年6月，罗帅代理红四军政委，军长是林彪。待打长沙时，正式担任四军政委，又是四军军委书记，比林彪的职务还高。当时的红一军团是主力，军团长和政委分别由朱德、毛泽东兼。红一军团的主力是第四军，可以说四军是主力的主力。那么担任这个主力最高职务的是罗荣桓，可见毛泽东对他是十分信任和器重的。

访问人：1931年第三次反“围剿”结束后，军委书记换成林彪，罗荣桓只当政委，是怎么回事？

黄瑶：第三次反围剿胜利不是很大，其中有一仗打成对峙了。打的过程中我们的一些伤员，敌人的一些俘虏，都归后方管，打完仗部队就撤走了，伤员和俘虏来不及转移。当时的敌情犬牙交错，我军刚走，敌人就来了，把俘虏又抢回去了，我们的伤员也被抓走。罗荣桓作为政委，承担了责任，所以军委书记改由林彪担任。

#### 罗荣桓曾跟着毛泽东倒霉

访问人：后来朱毛不兼任一军团职务了，军团长由林彪担任，政委聂荣臻，罗荣桓是政治部主任。第四次反“围剿”后，罗又离开前线，调到江西省军区任政治部主任。这里面有些什么说法没有？

黄瑶：1963年毛泽东说：“凡是我倒霉的时候，罗荣桓都跟着我倒霉。”这个话是王力回忆的。王力说是1963年12月16日他陪同毛主席去向罗荣桓的遗体告别时讲的。王力的话虽是孤证，但联系当时的情况，我认为还是符合实际情况的。

1931年底，毛泽东就慢慢地离开了工作岗位，罗荣桓也就越来越不行了。罗荣桓对当时王明路线是不满意的。就这件事我访问过江华、宋任穷等。江、宋分别和罗聊天，都发过对王明“左”倾路线的牢骚。

访问人：主要牢骚是什么呢？

黄瑶：关键就是山沟里有没有马列主义的问题，他们有看法，想不通，是不是必须吃洋面包的才叫马列主义？

访问人：这几个人都是没有吃过洋面包的了。

黄瑶：是的。实际上罗帅到江西军区当政治部主任时间也不长，不久就调到总政当巡视员，没职务了。然后任命当了一段军委动员部部长。长征初期，罗帅到八军团担任政治部主任，军团长周昆，政委黄，原来都是罗荣桓的下级。八军团时间不长就打散了，几乎没有什么工作，一直到出了草地，任命他为一军团政治部副主任，邓小平是宣传部长。这一段罗邓关系比较密切，他们一起行军，一起宿营，邓小平回忆当时他们是无话不谈。

访问人：这个时候的罗荣桓对毛泽东怎么看呢？

黄瑶：经过中央苏区的曲折经历，长征路上的痛苦磨难，他对毛泽东应该说更加信服了。仅举一例就可说明问题。1936年毛泽东在红军大学中讲的革命战争战略问题，这个讲义是用敌人的传单反过来印的。敌人的传单正面是光的，反面是毛茬，红红绿绿的，印出来模模糊糊不太好看。但罗帅一直珍藏着，后来又带到山东，告诉他的秘书要保管好，他一有机会就拿出来读，里面作了很多圈点、批注。如果他不信服毛泽东，对此书决不会如此认真地反复研读。

访问人：据说毛泽东也曾向罗荣桓发过脾气？

黄瑶：是有这回事。那是1937年，一天有个外国人要到延安来。当时罗帅任后方政治部主任，他看到毛主席的被子太破太脏，就让供给部的人换个被子。毛知道后发了脾气。责问罗荣桓，为什么要换被子？我们就是这个条件，吃的是小米、高粱米，还是带壳壳的，穿的就是破旧的衣服。为什么盖旧被子就不能见洋人，要另搞一套？毛泽东在电话中的声音很大，连在一旁的林月琴都听到了。罗帅想想毛泽东讲得也有道理，就把原来的被子换回来了。

### 毛泽东重用罗荣桓

访问人：毛泽东向罗荣桓发脾气，一方面表明毛泽东脾气很大，一方面也恰恰说明毛泽东对罗荣桓的感情很近，他觉得用不着客套，后来的情况也证明了这一点。抗战时期罗荣桓调往山东和毛泽东有关系吗？

黄瑶：这个事说来就话长了。1937年抗战开始时，红一方面军改编为115师，师长林彪，政委聂荣臻，政治部主任罗荣桓。1938年3月，聂荣臻留在了晋察冀五台山，115师就没有政委了。不久林彪又因负伤被送回延安，师长也没有了。这时对115师一天有两个命令。一个是毛泽东下的，时间稍晚，一个是集总下的，时间稍早。毛泽东的命令是任命罗荣桓代理师长，集总的命令是由343旅旅长陈光代理师长。两个命令打架了，因为集总的命令早了几小时，就以集总命令为准，从这件事来看，毛泽东对罗荣桓是器重的。同时在这件事上毛泽东对集总也有些意见，这大概也是事后毛泽东对彭德怀不满意的原因之一。

访问人：后来罗荣桓还是当了115师师长。

黄瑶：大约是在1938年六届六中全会前后，是政委，不是师长，代师长是陈光。六中全会后罗帅带着部队到山东，这段时间集总和中央来往电报较多，主要是商量115师干部的配备问题。这时集总和中央还是有分歧，当时集总感觉115师拿不起来，在山东开展工作有困难，所以在115师上面成立一个单位叫八路军第一纵队，司令员是徐向前（1940年6月回延安），政委朱瑞。意图是把山东的地方部队和115师统一领导起来。1940年9月115师召开高级干部会议，朱瑞（第一纵队已不存在，朱当时任山东分局书记）一方面发电报给中央告115师的状，一方面在会上对115师做了严厉的指责。结果罗荣桓以个人名义致电中央请求离开山东，回延安学习。这时毛主席来电报说：“115师有极大的成绩，你们的总路线是正确的，你们均应继续安心工作，目前没有可能提出学习问题。”这时中央已知道了山东领导人间的分歧，毛泽东在延安也找了一些从山东去延安学习的干部，还有115师的干部了解情况，1942年毛泽东又让刘少奇从苏北到延安路过山东，解决山东的问题。当时的分歧主要反映在对形势的看法不同。朱瑞估计较高，认为我

军对顽固派已占优势，对敌伪也走向优势，所以打仗就偏于搞运动战；罗认为不占优势，我们是劣势，”所以主张游击战。刘少奇来后，经过调查研究认为朱瑞的看法不对。在这个过程中，刘和毛往返有很多电报，1943年初任命罗荣桓为115师政委兼代师长，山东军区司令员兼政委。后来又任山东分局书记，朱瑞回延安了。这样在山东便实现了一元化领导。

访问人：能否说这是毛泽东和党中央对罗帅的第二次重用？

黄瑶：能不能这样说，还可研究。总的说来毛泽东对罗帅比较重视，而且山东的工作也搞得确实不错。1943年到1945年，实现了一元化领导以后，山东的一盘棋就活了。抗战后期我们比较完整的根据地，山东就算一块。抗战结束后，我们同国民党谈判要求出任四个省的省长，其中就包括山东。山东出的兵相当多，解放战争初期，东北的部队大部分是从山东去的，三野部队的老底子有一半是山东的，二野杨勇部也是山东部队。

访问人：关于罗帅在山东的工作，毛泽东有过评价吗？

黄瑶：正式的文件没有看到。据王力1985年回忆：1961年毛泽东曾找他谈过半天话。因为王力曾长期在山东工作，当谈到山东党史时，毛主席谈了他对罗帅在山东工作的看法。毛泽东说：“山东只换了一个罗荣桓，山东全局的棋就活了，山东是执行中央十大政策的模范，他（指罗荣桓——引者注）把山东所有战略点线都枪占和包围起来了。当时，只有山东一个全省是我们党完整的、最重要的战略基地。北可以抢占东北，南可以直到长江，这都是主要依靠山东。罗荣桓在决定中国革命成败的地区，做好了决定中国革命成败的事业。”

“罗荣桓同志他到山东的第一天，想的就是谁领导谁，谁团结谁，谁统一谁的问题。也考虑到依靠谁、团结谁、打击谁的问题。当时建设根据地的中心任务，就是依靠群众、发动群众、武装群众。所以，他一到山东就想着：要把山东全部拿下来，而且要为把全国拿下来尽义务”。

访问人：看来毛泽东对罗荣桓的评价是很高的，王力的这个材料可靠吗？

黄瑶：据王力讲当时有个笔记本，这个本子抄家时被抄走了，1985年只能根据记忆来回忆了。不过王力的记忆力还是很好的。当然这只是孤证，只能供我们参考。

访问人：您认为毛泽东对罗荣桓的评价准确吗？

黄瑶：根据上面我谈到的情况，我认为是恰当的。

访问人：罗荣桓到东北任四野政委也是毛泽东的提议吗？

黄瑶：1943年4、5月间罗荣桓得了肾病，当时病得很重。因为山东医疗条件很差，医生建议到上海手术，毛主席同意了。罗帅到了苏北盐城新四军所辖地区后，又接到毛主席一个电报，不同意他去上海治病，担心那里不安全。毛主席的担心是有道理的，因为罗帅红军时打梅县负过伤，腹部有伤痕。罗帅一行到新四军3师驻地阜宁县时穿的是八路军的衣服，八路军是黄衣服，而新四军是灰衣服，当地老百姓一看衣服不一样，就传开了，有的说毛主席来了，有的说八路军南下了，这时不可能保密，所以罗帅又回到了山东。

1945年夏天，罗病情更厉害了。他致电中央，要求派人接替他的工作。8月26日，毛泽东致电山东分局，决定派林彪、萧劲光到山东，林为山东军区司令员、萧为副司令员，罗为山东分局书记兼政委，“如罗因病必须休养时，林代理罗之职务。”当时，在毛泽东心目中，罗比林更重要。当然，这

也可能是因为林刚到，不熟悉情况，需要罗带一带。

抗战结束后，中央要他去东北，而且立即动身。罗帅提出去东北可以，但不要当主要负责人，中央同意了。所以罗帅刚到东北时担任的是东北人民自治军第二政治委员。在东北检查身体，诊断为肾癌。到莫斯科进行手术治疗，回国后毛泽东任命他为东北军区副政委，东北野战军政治委员。林彪是司令员。

访问人：延安分手以后，毛泽东和罗荣桓的再次见面是什么时候呢？黄瑶：是1949年1月初，在西柏坡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商讨1949年作战的基本方针。毛让他由平津前线去参加了。他们一别就是11年。因为罗帅身体一直不好，北平解放后在天津看病休养，这期间毛泽东还专门派黄树则代表他去看望罗，毛泽东还专门写了封信，有“既来之则安之”的话。建国后毛泽东任命罗荣桓作总政干部部部长时，还嘱他要少开会，注意身体。

### 毛泽东曾说，罗荣桓是老实人

访问人：在毛泽东的戎马一生中，他周围集聚了很多的战友和同志，他们一起出生入死，建立起深厚的友谊。从这些战友去世的情况来看，给人印象最深的，一个是延安时期张浩去世时，毛泽东亲自为他抬棺送葬，一个是陈毅去世时，他拖着病体去参加追悼会。再一个就是罗帅了。罗帅去世时，第一，中央政治局常委开会，毛泽东提议大家默哀三分钟。第二，他到医院向遗体告别。这些似乎还不能排遣他心中的悲哀，又作诗一首，来抒发他对罗荣桓的痛惜和怀念。这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是独一无二的。您能讲讲其中的原因吗？黄瑶：毛泽东对罗荣桓的确非常看重，他曾两次对罗帅的夫人林月琴说罗荣桓是老实人。毛泽东还举例说，高饶事件中，高岗到处活动，曾找了小平与陈云，他们报告了毛主席。高岗自己说，罗荣桓是党内圣人，他不敢去找罗乱说。

此外，中央政治局会议为罗荣桓逝世默哀时，毛泽东还讲了话，说罗荣桓这个人原则性强，对党忠诚，对党的团结起了很大作用。这恐怕是他看重罗帅的原因之一。其二在井冈山、在中央苏区毛泽东对罗帅有很深的感受，他真正的好感恐怕也是那个时候建立起来的。第三，罗帅在山东时工作出色，前面已经讲到了。这里有一个问题还可以讲一下，罗荣桓比较实事求是，注重调查研究。比如：延安整风后期进行审干，康生趁此机会搞抢救运动，又称之为延安经验。在山东贯彻这个经验时，罗荣桓就有自己的看法，因为他分不清哪是中央的，哪是康生的，就提出个办法先搞试点，找不掌握枪杆子的单位如卫生部、报社等，动员群众给领导提意见。结果试验一开始就乱了，有的领导干部是四川人，喜欢吃个辣椒，就把他的锅给砸了，说是特殊化。罗荣桓一看不行，就订了几条，部队不搞，如要审干，就调到党校学习整风，然后发电报请示中央，毛泽东同意了。1963年罗荣桓去世时，毛泽东还向王力谈到了这件事。毛泽东说：罗荣桓是执行中央政策的模范，又是提不同意见的模范。山东在整风中没有搞抢救运动，是罗荣桓向我提出不同意搞的。他说：敌人早已把我们的干部审查过了。罗荣桓领导整风，把主要目的放在从检查领导思想作风开始，到改进领导思想作风结束。重点是端正路线，而且抵制了延安的抢救运动，这很难得。第四，罗荣桓在东北解放战争的表现大家有目共睹。第五，罗荣桓任总干部部部长时注意搞五湖四海，调动各个山头的积极性。比如1955年授衔时，大将以下的名单都是他主持提出的。整个授衔绝大多数都感满意，甚至有的要求往下降，像徐立清上将，因名额有

限，主动要求降为中将，许光达大将，要求当上将，有意见的很少。所以毛主席说他对党的团结起了很大作用。

### 关于毛泽东“吊罗荣桓同志”

访问人：罗帅从参加秋收起义一直到他去世，从没有因为工作和毛泽东产生过不同意见，也就是说从没有发生过正面冲突，也不无关系。请问您对毛泽东吊罗荣桓这首诗是怎么看的？

黄瑶：这首诗表明了毛泽东对罗荣桓怀有很深的情谊，对罗荣桓的逝世十分痛惜和悲伤。具体诗的内容，首先要弄清它的时间，才能说明它的含义。现在把它定为1963年，是根据毛泽东身边工作人员的回忆定的，但从字体上看不像1963年的。1963年毛泽东的书法相当潇洒漂亮，而这首诗的字迹手有些抖。王力对这个问题的解释是：毛泽东每天睡前要吃三遍安眠药，吃完第二遍安眠药后，他写字手就抖了。因此仅从字体也不能证明这不是1963年写的，现在找不到其他根据，所以只能以毛身边工作人员的回忆为准。比如“战锦方为大问题”一句，很多人理解为是打锦州中林彪动摇。其实打锦州中，林彪一度犹豫，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情，如果是别的老师的事，可能就不公布，确实也有很多没有公布。因为毛泽东批评其他老师的电报也不少，有的批评得更严厉。为什么打锦州中林彪一度犹豫不是个什么事呢？林彪率大部队南下后，听说敌人在葫芦岛增兵，他有个思想活动，像《辽沈战役》影片中说：做了一桌菜来了两桌客，他有些犹豫怕打不下来，因为1947年打四平没打下来，后来我们撤了，打长春试了一下，后来决定长困久围，现在打锦州，敌人在葫芦岛增兵，我们的机械化部队都开来了，用汽车拉着大炮，锦州打下来就可以补充汽油，那就好办了；如果打不下来汽车开不走怎么办，没有回程的汽油。出于这些考虑，林彪给中央发电报，提出两个方案一个是打锦州，一个是回去打长春。这只是他的一种设想，并没有变成行动。就在他发电报的同时，部队也没有停下来，还在继续往锦州开。当然，如果变成行动，那就糟了。因为唯有打下锦州，才能把蒋介石的军队封闭在东北予以歼灭。如果回去打长春，可能把东北敌人驱赶入关，就会增加下一步作战的困难，所以毛泽东着急了，一连两封电报要林坚持攻锦。在毛泽东批评电报尚未到的时候，罗荣桓劝他还是打锦州，于是，他又发一个电报，下决心打锦州。这对林彪来讲，前一封电报只是向毛反映他的一种思想活动。他把这种设想报给军委，从组织原则上讲并不错，当然他这个想法本身是错误的。可是并未成为事实，几个小时就纠正了，因此也不是个了不得的事。为什么成了问题呢？这是林彪折朝沉沙后揭发出来的。对林彪叛逃，人们当时都很气愤。而在那个时代，翻老帐是经常可以见到的。林彪集团整人时也常用这个方法。林彪垮台了，人们“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这是可以理解的，因此这件事就公布出来了。

访问人：那么毛泽东“战锦方为大问题”怎么理解呢？

黄瑶：我为什么说打锦州中林彪犹豫不是什么大问题呢？还有两件事可以说明问题。第一件事是就在罗帅逝世的同一天，毛泽东给林彪、贺龙、聂荣臻等写了一封信，指出：“解放军的思想政治工作和军事工作，经林彪同志提出四个第一。三八作风之后，比较过去有了一个很大的发展，更具体化又理论化了。”毛不可能在同一天又表扬林又斥责他是“斥鸮”和“昆鸡”。另一件事是就在毛泽东写怀念罗帅诗的先后，毛泽东还为林彪写了一首《龟虽寿》，书法特漂亮。按当时的情况推理，毛一方面为罗去世很悲伤，一方

面希望林保持健康。由此可见当时毛泽东对林彪还是很信任的。如果“战锦方为大问题”是指打锦州中林彪犹豫，把林说成了“斥”和“金鸡”，那么这首诗就不是1963年写的，起码得在“九大”以后；如果是1963年写的，就不会是批评林彪。在当时，毛正信任林的情况下，不可能用写诗的方式算林这个老帐。因为林当时动摇的时间并不长，关于“战锦方为大问题”这句诗，如果确认是1963年写的，似应放在当时国际国内历史大背景下来理解。“战锦”当然是打锦州，这是三大战役中第一个战役的关键一仗。“战锦”是不是可以理解作为一种象征，即中国人民革命胜利及巩固这个胜利的象征。诗无达话，对不对，仅供参考。

访问人：毛泽东在诗中谈到“国有疑难可问谁”，这个话表明罗荣桓在毛泽东心里的位置是很重要的，评价相当高。罗荣桓生前是否起到了一种这样的作用呢？

黄瑶：这可能和毛泽东当时的心境有关。1963年中苏论战白热化，毛泽东对赫鲁晓夫深恶痛绝。在国内他和党的第一线领导人如刘少奇等有着意见分歧，在这种情况下他的心情可能比较复杂。也正是在这种时候，罗荣桓去世了，当他想到罗帅的老实、本分、能干，就发出了这样的感慨。当然并不是说处在一线的刘少奇等当时有何不对。历史也证明当时是毛泽东已开始脱离实际，脱离群众，而他自己并未认识到这一点，反而认为别人不对，所以才产生一种孤独感，对第一线领导人的不信任感。当然，人类的历史是不可重复的，不可能“例如”。例如我们“例如”一下，罗帅60年代如果没有病，也处在中央工作的第一线，由于他非常实事求是，他也会引起已经脱离实际的毛泽东的不信任感的，罗未在第一线，而且逝世了。有些事物失去了往往才会感到更珍贵，这也许是毛泽东写下“国有疑难可问谁”的缘故。

1993年5月9日于北京羊坊店

## 访张麟——毛泽东和徐向前

### 张麟

张麟，1927年生，山东枣庄市人。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教授，传记作家。战争年代，曾任新华社前线支社记者。建国后长期从事中共党史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的研究工作，主要著作有：《徐向前传》（合著）、《徐海东将军传》、《杨靖宇将军》、《赵一曼》（合著）、《徐向前的故事》、《雪天》等。

张麟教授自50年代起就与徐向前相识，80年代又主持《徐向前传》的撰写工作，对徐向前了如指掌。由他来谈毛泽东和徐向前，我们的选择没错。

### 寻找毛泽东

访问人：您多年从事徐向前的生平和思想研究，对党史、军史也很熟悉。我们想请您谈谈毛泽东与徐帅交往以及他们之间友谊的情况。据我们所知，在十大元帅中，南方籍的有九个，北方籍的只有徐帅，毛泽东和徐帅相识也晚一些。

张麟：是的，他们在1935年7月才第一次见面，是在长征路上相识的。不过这之前有段插曲挺有意思：1927年上半年，徐向前在中央军事政治武汉分校当少校队长。大革命失败前夕，我党的一位地下交通员，给他一张条子，要他赶快离开武汉，里面写着“找毛泽东”。当时风声很紧，我党已经转入地下，到哪里去找毛泽东呢？没处去找，又不能公开打听，这时武汉又不容他留身，他就到江西张发奎司令部任参谋。张发奎虽然还没有清共，不过那只是迟早的问题，所以徐向前总是觉得不踏实，心里依然想着党的“交通”给他的那张字条：“找毛泽东”。

访问人：这之前徐向前知道毛泽东吗？

张麟：知道，而且还很敬佩。徐向前1925年在黄埔军校，就听说过毛泽东的大名。在武汉军校时，毛泽东也在武汉，担任中共中央农委书记，在国民党内也有很高的地位，是一个很知名的人物。徐帅说，当时他听人讲过毛泽东，对毛泽东评价很高，他和周围的人也议论过，认为毛泽东是中国有学问的人。所以当党的“交通”，要他找毛泽东时，他是很高兴的。

访问人：但他没能找到毛泽东，可谓失之交臂，是件遗憾的事情。后来张发奎宣布驱逐共产党，徐向前怎么办呢？

张麟：当时的徐向前犯了难。到哪里去呢？去找毛泽东？却不知毛泽东在什么地方；南昌起义爆发后，他曾想到南昌去，只是既无介绍信，又不知道南昌起义军的去向。他自己回忆说，当时躺在床上怎么也睡不着，最后下定决心，还是返回了武汉，去找党的组织。

徐向前到了武汉，找到了那个从前与他秘密接头的交通站，结果交通站已遭破坏。没有办法，他到了上海，到上海找党中央。上海同武汉一样，也是一片白色恐怖，党的组织不是那么好找的。有一天，他正在街上转，忽然碰上了武汉军校的李楚白，李是他在武汉入党的介绍人，真是喜出望外。这样徐向前才和党接上了关系。直到这个时候，“找毛泽东”的那张字条，他还保留着。

访问人：党的地下交通让他找毛泽东，是不是分配他去和毛泽东发动秋收起义，还是别的什么？

张麟：这些都不清楚，徐向前本人也不清楚。他到了上海，先是中央派

他去广东，在工人赤卫队中做秘密工作，领导第六联队参加了广州起义，起义失败后，他撤退到东江海陆丰和彭湃一起开展武装斗争。后来海陆丰又失败了，他奉命辗转到了香港。中共“六大”以后，再次回到上海。这一段经历比较曲折。在上海党中央问他准备做什么，他说还是做军事工作。中央说，鄂东北有个红三十一师，师长吴光浩最近牺牲了，你就去那里吧。这是1929年底的事情。从1929年到1932年，徐向前在鄂豫皖由开始是师长，到任军长，到任四方面军总指挥，一路发展比较顺利。后来第五次反“围剿”中，因为敌人重点包围大别山，四方面军突出重围，跨过秦岭、巴山，到川陕建立了苏区。在川陕根据地，四方面军由2万人发展到8万人，号称10万。四方面军也发展到鼎盛时期。

访问人：这期间徐向前虽然一直没有见到毛泽东，随着战争的深入和发展，他是否对毛泽东间接的有了更多的了解呢？

张麟：井冈山时期，朱毛红军，后为中央红军，在全国影响很大，对各个根据地都有影响。大别山红军开始没有电台和中央联系，但从报纸上，从中央派来的巡视员口中，都知道毛泽东和朱德，以及他们的作战情况，像“十六字诀”、“诱敌深入”等等，对各根据地红军是有影响的。特别是毛泽东关于建立根据地的思想，建设人民军队的思想等等，所有这些对徐向前不能说没有影响，当然，徐向前在实践中也有他的创造和发展，如他的游击战术七条原则，他的“围点打援”战术，既与毛泽东的作战方针原则吻合，又有发展。根据我了解的情况，包括张国焘对毛泽东都是比较赞赏的。张国焘在鄂豫皖讲课，当讲到王明一伙上台后的中央时，张摇头，说这些娃娃能搞出什么名堂。私下里和徐向前谈到中央领导人时，张国焘认为毛泽东还是比王明等人高明的。所以徐向前对毛泽东是敬仰的。各根据地其他一些领导同志，我听说一些也是敬佩毛泽东的。

访问人：1935年6月，当两军会师时徐向前一定很高兴了？

张麟：是高兴的。其实开头包括张国焘也高兴。当他们知道中央红军即将和四方面军会师时，做了大量的宣传和组织工作。提出迎接百战百胜的中央红军，在物质上准备了很多毛衣、毛袜、草鞋、粮食、药品、衣物等等，同时派李先念率30军前去迎接，徐向前还代表四方面军领导人起草了致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的信，派他的警卫班长亲手交给毛泽东。这表明了徐向前对毛泽东、对中央是很信任的。当时徐向前有个想法，一旦红军会合后，他要离开四方面军，到中央做点具体工作。

访问人：是否他心里有点什么想法？

张麟：心里很不舒服，老婆都被当成AB团杀了，张国焘对他一直是“用而不信”。他与张国焘、陈昌浩虽一起共事多年，但在许多问题上说不到一块。他这个人比较实际，对那些吃洋面包培养的教条主义者，有许多事是格格不入的。分歧多，心情总不那么愉快。

访问人：当徐向前见到毛泽东和中央领导同志时发生了什么事呢？

张麟：两军会师的时间是1935年6月，徐向前因为在前方指挥打仗，一直到7月12日在芦花才第一次见到了毛泽东。这期间发生了许许多多曲折的事情。开始是迎接百战百胜的中央红军，看到的中央红军只有2万多人，而且穿的破破烂烂，像一路逃难的样子。相反四方面军有8万人，整整齐齐。张国焘因此就向毛泽东和党中央争权，说中央有什么正确，是逃难，中央的政治路线是错误的，向下边散布了很多对中央不满的话。中央红军中也有人

指责四方面军有“土匪作风”，“政治落后”，退出通南巴是逃跑主义等等。公平他讲，一方面军自古田会议以后，纪律比较严明，政治工作开展得也好。相比之下，四方面军差一些，纪律比较涣散，存在着打人骂人、枪毙逃兵等等。但不论怎么说，他们毕竟发展了8万红军的队伍，创造了除中央苏区之外的第二大根据地。尤其说他们是“逃跑主义”等等，徐向前听了也反感。他说：我们是拥护第三国际实行土地革命的，莫非我们打蒋介石打错了吗？

访问人：徐向前从1927年就开始找毛泽东，找了8年才在这里相见。相见之时又有这么多复杂的现实问题在里面，是否使他们的相见蒙上了一层阴影呢？

张麟：尽管徐向前对一些问题有看法，有想不通的地方，但他和张国焘不同，他是积极拥护两军团结的，积极拥护中央的北上方针。所以当他见到毛泽东时，还是很高兴的。尤其看到毛泽东的安详大度，印象非常深刻。毛泽东也很高兴，他代表中央政府亲自将一枚红星金质奖章授给徐向前，以表彰徐向前在四方面军的突出功绩。

：这次见面徐向前是否向毛泽东谈起他1927年找毛泽东的事，谈起他准备离开四方面军的事？

张麟：当时的敌情十分严重，人们最关心的是敌情。所以他们谈起的主要是敌情，以及红军的战略方针问题。当然，徐向前也说到大革命失败前夕“交通”给他的那张纸条的故事。为此我问过徐帅，他说当时当个笑谈。

访问人：这以后毛泽东和徐向前是否就在一起活动了？

张麟：没有。7月22日中央在芦花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这次会议是为统一认识而召开的。徐向前只参加了一天会，7月22日就和陈昌浩一起率军从芦花出发，向毛儿盖进军了。8月10日红军分左右两路行动，徐向前率右路军北上，随同毛泽东和中央机关行动。但是行军中徐向前和毛泽东是很少见面的。

### 9月9日的遗憾

访问人：9月9日张国焘发来电报，要徐向前、陈昌浩率右路军南下，第二天毛泽东等率中央机关和中央红军单独北上，对这件事徐向前是怎么看的？

张麟：9日晚上，也就是在中央红军单独北上以前，毛泽东曾来到徐向前的住处。徐向前看到毛泽东来了，心里还是高兴呀，虽然这时领导层有分歧，对毛泽东他是敬仰的，他立即吩咐卫兵搞点吃的，还给毛泽东找来香烟。毛泽东显得很沉重的样子，站在院子里，对徐向前说，向前啊，现在要分开了，你看怎么办啊！实际上这是毛泽东在征求徐向前的意见，在某种程度上说，也是在试探徐向前。徐向前这人的性格就是那样，不大爱多讲话，他大概也没听懂毛泽东的意思，他只是想左路军如北上，我是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队分成两半怎么行呢？所以徐向前就说部队分开不好，还是说服张国焘一块走好吧！毛泽东没有说更多的话，也没有吃饭就走了。多少年以后徐向前每当向我们讲起这件事时就叹口气，说，唉！我这个人很笨，当时毛主席的意思就是不要管他们了，我们一块走吧！我呢，和毛主席一起走就算了，可是我总是想着整个部队怎么办，没想到他们当夜就走了。徐向前听说毛泽东和中央红军走了，躺在床上半天都不说话，蒙起头流泪呢。现在来分析，当时的毛泽东也作难，因为两支部队有隔膜，也不可能把话挑明，他只能试探徐向前，试探的结果徐向前的态度不很明确，所以就走了。徐向前在《历史

回顾》中说，他因此犯了一个“终生抱愧的错误”。

访问人：徐向前说的一块走，是指所有部队全部南下，还是北上？

张麟：徐向前的四方面军大部分在张国焘和朱德率领的左路军那边，住在阿坝。徐说要一块走，意思是右路军不要单独北上，要说服左路军张国焘一起北上。

访问人：毛泽东没有把话挑明，说明当时的情况非常复杂，对徐向前没有把握。如果他认为徐向前和张国焘一样，就不会去找他；如果他完全信任徐向前，就会把话挑明。是这样看吗？

张麟：可以说是对徐向前有点戒心吧，这也完全是当时的历史环境造成的。10日早上徐向前刚刚起床，部下就报告，中央机关和中央红军已经走了，徐向前和陈昌浩都大吃一惊。接着前面的部队打来电话，就说中央红军走了，而且对我们放出警戒哨，情况相当混乱，有人提出打不打呀？电话是陈昌浩接的，过去有人说，陈昌浩主张追打，这不对，陈尽管有错误，在这点上还是慎重的，他问徐向前怎么办，徐说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叫他们听指挥，谁不听枪毙谁。在这关键时刻，徐向前是立了功的。另外，陈昌浩的表现也是好的，因为他是政治委员，他如果坚决主张追，中央红军包括毛泽东、中央机关真是很危险的。

访问人：这就是徐向前英明大度的表现，这个英明大度的根基是对革命事业的忠诚。关于这件事毛泽东和中央是否有个说法？

张麟：毛泽东和其他党的领导人，不论在什么场合，讲起这件事时，都认为徐向前起了重要作用，立了功。从这件事我们也可以看出，徐向前对中央，对毛泽东的根本态度。徐向前率部队南下后，中央红军在陕北取得了直罗镇战役的伟大胜利，徐向前看到这个消息很高兴，建议张国焘赶快在报纸上公布，张开始不愿意，最后报纸上还是登了。张国焘成立第二中央，还做出开除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的党籍的决定，徐向前没有表态，他认为这样做是错误的。以后经过千难万险的曲折，红四方面军和红二方面军一起北上，在陕北同第一方面军会师，胜利完成了二万五千里长征，在这过程中，徐帅起了很好的作用，我就不多说了。

### “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访问人：三支主力红军会师以后，接着发生了西路军西征，失败后，徐向前只身回到延安，这件事您是怎么看的？

张麟：徐向前率两万红军在河西走廊惨遭失败，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决定徐陈离开部队去延安。路上陈昌浩病了，徐向前最后一个人回来心里是很难过的。在延安，首先见到的是张闻天，张闻天批评了他。之后见到了毛泽东，毛泽东的态度大不一样，不仅没有一句批评的话，还安慰了他。这给徐向前留下了很好的印象，以至使他终身难忘。毛泽东说：“不要难过，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你能回来就好，有鸡就有蛋。”实践证明毛泽东的这席话很有远见。徐向前后来在抗战中，解放战争中确实发挥了巨大作用。真如同“老母鸡”一样，在敌后抗日根据地下了不少“蛋”，发展了军队，创建了冀南和山东抗日根据地。

访问人：毛泽东虽然没有批评他，但在西路军的问题上，徐帅似乎有些意见。

张麟：就这件事，我曾和徐帅谈过多次。以前谈起来他不是沉默、回避，就是说按中央的说法吧。一直到最后几年才说出自己的意见。我想在西路军

问题上，如果说徐帅有意见，就是毛泽东和中央有些领导同志该说的话说得不够，反而在《毛泽东选集》注释中说西路军是奉张国焘命令擅自过河，致使两万红军失败。这不符合历史事实，实际上作为西路军总指挥、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徐向前率红军过河不是奉张国焘命令，而是奉中革军委命令，开始是执行宁夏战役计划，后中央又命令西路军向西打通国际路线。当然现在这个问题已经基本清楚，《毛泽东选集》第二版的注释也改了。

### 延安时的交往

访问人：抗战开始后，徐向前先到山西，后到山东，1940年回到延安准备参加“七大”，从此一直留在延安，1947年才到晋冀鲁豫指挥作战。这段时间，他和毛泽东相距很近，他们之间的交往如何？为什么他一直留在延安，未去前线？

张麟：1940年6月，徐向前回延安后就开始生病，后来因为骑马去开会不慎从马上摔下来骨头折了。他长期患有头疼病，一紧张就犯，犯起来很厉害，坐不下，躺不住，满地打转转，另外还患有胸膜炎。在延安，他一直处在养病休养状态。党的“七大”他都没能出席。生病期间毛泽东曾亲自去看望他，还送他一些钱叫他买点东西吃。毛泽东搬到王家坪，亲自安排徐向前到王家坪住，说徐向前同志回来了，身体不好，作为客人请他住在王家坪。当时住在王家坪的还有朱德等，这时徐向前和毛泽东见面多了一些，但更多的还是和朱德，他们经常在一起打扑克。1942年和1943年，徐向前的病稍好一些后，出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部副司令员兼参谋长。这一段和贺龙司令员共事多，和毛泽东见面谈话的机会少一些。1943年6月，毛泽东亲自找徐向前谈话，说徐向前身体不好上前线有困难，就在延安办抗大吧，当抗大校长。徐向前说，我没有办学经验。毛泽东是很了解干部的，说他是黄埔毕业生，在家里就教过书，延安的学校也要办，要培养干部。徐向前说，那时教的是小学生，现在是教干部。最后，在毛泽东的安排下，徐向前还是当了抗大校长。关于此事，过去史书一直说徐向前是代校长，不对，我们查到了命令，是校长。

访问人：看来毛泽东对徐向前还是比较关心的，但又比较客气。您认为这是什么原因？张麟：徐向前有个特点，不太善于交际，更没有什么私交。平时话很少，没事很少和人来往。徐帅下面的战将最多，没有哪个人和徐帅的关系特别好。论山头，他的山头最大，但他对部下的接触不很紧密。哪个部属找他办点什么私事，他从来不开后门。我亲眼见过一件事：有一年在南京，有个老红军来找他，当时我在场。那位老红军说，徐帅，我只住着两间房子，实在太困难。徐帅说，你现在有两间房子已经不错了，在草地一间房子也没有。话出来的很直。原武汉军区司令员张才干，和我讲过一个笑话似的情节，当年在四川，有一次他顺路去看看徐总指挥，徐向前一共讲了三句话。进屋时，徐帅正在看地图，说了一句“你来啦”；快吃饭时说“吃饭吧”；第三句话是吃完饭后，“走啦”。还有一件事也说明他的性格，在黄埔军校时，蒋介石是校长，每期学生入学后他都要逐个单独接见谈话。轮到徐向前时，他进去后站着，蒋坐着。蒋介石：“你叫什么名字？”徐向前答：“徐象谦（这是徐帅以前的名字）。”“哪里人？”“山西人。”“在家干过什么？”“教过书。”当时军校学生见到蒋校长都要自我推荐一下，给校长印象深些。日后图个提升什么的。蒋介石也很希望听听学生的谈话。但在徐向前是蒋问一句，他答一句，不肯多说一句话。蒋介石立刻挥挥手，徐向前出

去了。这是徐向前亲自讲的。所以他和毛泽东，从大革命时起，对毛泽东就很崇敬，当他真正和毛泽东共事时，话就很少了。建国后开会，他总是坐在后面，周总理叫他封前面坐，他才去。但战场上他是另一个样子，多谋善断，蒋介石面对着当年的徐向前，决不会预见到这竟是他日后的对手。说到这里我们就不难明白，毛泽东徐向前之间，为什么只有工作关系，而没有多少比较亲近的个人往来。

### 晋东大捷，毛泽东称赞徐向前

访问人：解放战争时期，徐向前同阎锡山的作战打得很漂亮。受到了毛泽东的赞扬。

张麟：是的。日本投降前夕，徐向前就向前去看望他的毛泽东表达重返前线的愿望，毛泽东劝他不要着急，安心养病，并意味深长他说：“以后国民党是不会叫你闲着的！”1946年11月中央决定放弃延安，徐向前被疏散到绥德。在绥德只住了20多天，他就再也呆不住了，仍请求上前线。这样毛泽东批准了他的报告。1947年夏季，徐向前到晋冀鲁豫军区任第一副司令员。刘邓挺进大别山后，晋冀鲁豫军区范围内处于内线的敌军主要就是阎锡山了。在同阎锡山的作战中，几个战役打得很漂亮。这里有运城的坑道作业战，临汾的攻坚战，晋中的运动战，太原的攻坚战。特别是晋中战役，我们消灭敌人20个团，是以6万人消灭10万人。当时中央拍来了电报，说“仅仅一个月中，获得如此辉煌的战绩，对于整个战局帮助极大”。原来的电报稿是帮助“很大”，毛泽东亲自改为“极大”。可见毛泽东对徐向前指挥的这次战役的评价，也是对徐向前的称赞。

访问人：这的确是很了不起的事情。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南下后，剩下的部队除了地方部队外，有没有留一些主力部队呢？

张麟：真正的主力部队，可以说就三个团。这就是23旅（后被命名为“临汾旅”）的三个团，两个团为红军的老底子，一个团经过抗日战争。上党战役，邯郸战役都打过。其余都是地方部队。阎锡山就不同了，有“亲训师”，“亲训炮兵团”，就是阎亲自训练的，还有日本顾问。所以在1948年9月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见了徐向前特别高兴。徐向前说，毛泽东一般不大笑，这次见了他很高兴，对徐向前说，快说说，你们是怎么用6万人把10万人消灭的。徐向前说，我们是按照你的思想嘛。毛泽东说：“不是靠我的思想，是你们打得好！”徐向前的一生，打过不少胜仗，二战，抗战，解放战争都有很多得意之笔。

### 毛泽东对徐向前是保不是批

访问人：有种观点认为，建国后徐向前不太受重用。您是怎么看的？

张麟：建国后徐向前由于身体原因，可以说“没太被重用”。解放初他被任命为总参谋长，但因身体原因未能上任，由聂荣臻代理。我是1955年和徐帅认识的，根据我的了解，他确实有病。后来分工让他管民兵工作，“文革”前不是政治局委员，在军队中只是军委副主席，各位元帅都是。他也没有政府职务。“文革”期间任副总理，八届十一中全会才当上政治局委员。相反一开军委扩大会议，徐帅和有的老师总是检讨执行张国焘路线错误，陈毅检讨红四军“七大”问题，朱老总也是检讨。

访问人：这样的问题是从1958年开始的，大概与毛泽东后来强调阶级斗争为纲，强调路线斗争有关。

张麟：是的。在这点上，应该说毛泽东是有过失的。当时授给徐向前元

帅军衔中央和毛泽东还是很公平的。论战功，论一个方面军的代表，徐向前作为元帅是当之无愧的。

访问人：“文革”期间毛泽东安排徐向前任全军“文革”组长，您是怎么看的？

张麟：照现在来看是不应该的。实际上徐帅长期生病，而且不了解情况，艰难胜任。要他当全军“文革”组长，毛泽东没有找他当面谈，只是叫杨成武转达一个话，说是江青提议，毛主席决定的。这么大的事情，使徐向前很突然，沉默了半天，才说请转告主席，我实在于不了，身体不好，而且对于部也不熟。因为“文革”的中心是干部。后来说主席已经定了，也就没有办法了。他这位老师党性强，服从组织决定，是一贯的。作为军中元帅，更应以服从命令为天职，他只好接受。实际上他这个全军“文革”组长上任后3个月就开始挨批，不到半年就给打倒了。据他的秘书讲，造反派每天围着院子喊口号，晚上都不能睡觉，他长期不抽烟了，开始把烟切成三截，四部电话架着，想方设法应付这种场面。“文革”中他三次被抄家，差点妻离子散。后来幸亏总理出面打了招呼，徐帅才躲进了西山，不然也很危险。

访问人：您认为“文革”中毛泽东对徐向前是保还是批呢？

张麟：应该说自始至终从总理到毛泽东都是保的。有人说“文革”让徐向前当组长是为了打倒他，我想毛泽东的本意不一定是这样。只要毛泽东说一句话就行了，还用费这么大的事。当徐向前被“造反派”围攻的时候，如果毛泽东再说一句话，那可能对徐向前更不利。所以毛泽东对徐向前还是保的。1972年八大军区司令对调时，毛泽东在中南海接见他们，老师们都去了。当时毛泽东对每个人都有评价，在他和徐向前握手时特别说：好人！好人！

访问人：“好人”，虽然仅仅两个字，但这恐怕是毛泽东在林彪事件之后，对他身边的每一位战友反反复复地考虑，针对徐向前的一生作出的结论。那么请问徐向前对毛泽东是怎么看的？

张麟：从他的嘴里没讲过一句对党对毛泽东不满的话，也从没有流露过。即使在对毛泽东有很多说法的那几年，他也从来没讲过。相反他一再讲，中国革命如果没有毛泽东，没有毛泽东思想就不能胜利。他的许多军事论文、谈话，都多方面阐述毛泽东的军事思想的正确和伟大。他的长篇回忆录《历史的回顾》从个人经历的成功与失败都是以毛泽东思想为武器来总结的。可以说，他是毛泽东最好、最忠诚的战友之一。他每讲到历史问题，涉及中央、毛泽东时，非常谨慎，也总是严格检讨自己，比如：尽管西路军失败的主要责任不是他，但一讲到这个问题，总说我有错误，作为高级指挥员打了败仗，开除党籍也没有话说。不像有的人一讲到西路军就恼火怨别人，这充分体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高风亮节。

（在我们访问张麟同志时，《徐向前传》编写组成员马长志同志坐陪，并提供了很好的意见，在此表示感谢！访者）

1993年5月30日于解放军原政治学院

## 诱范硕——毛泽东和叶剑英 范硕

范硕，1927年生，吉林通辽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军职研究员，《叶剑英传》编写组组长，主要从事哲学研究、人物传记、军队政治工作。著有《叶剑英在1976》、《叶剑英传略》、《叶剑英诗词选集（注释本）》、《叶帅诗词探胜》等。来到一座将军楼面前，迎接我们的却是一位中等身材，谈吐文雅的书生。主人热情、开朗、好客，侃侃而谈。

访问人：您认识叶帅比较久，负责搞他的传记也十多年了，您在撰写叶传的过程中，一定会涉及毛泽东。在您看来，毛泽东和叶剑英的交往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况呢？

范硕：你们提出的这个问题很有意义，对我的学习和研究是个促进。我和传记组的同志写叶帅传记，自然要涉及毛泽东和叶剑英的关系，这是不可避免的。我对这方面的材料，虽然接触不少，但比较零散，只能谈一点印象，抛砖引玉，我们共同探讨吧！

## 访范硕——毛泽东和叶剑英叶剑英非常敬佩爱戴毛泽东

总的感觉，叶帅对毛泽东感情比较深厚。在我看来，他们之间不是一般的友谊，既是革命领袖和领袖之间、领导和被领导之间的关系，也有战友之间、私人之间的情谊。他们的交情，可以说是“君子”之交，革命家之交。易经上说，“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毛泽东和叶帅这两位老一辈革命家是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相互应求的，他们的深厚友谊是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形成并日益加深的。还有一点，两位老人家都是诗人，具有诗人气质，又有一层诗友关系。这是一种特殊的关系，特殊的感情。最近我到韶山参加纪念毛泽东 100 周年诞辰学术讨论会，看到韶山的石壁上刻着叶帅的一首诗，那是他 1963 年 3 月 26 日去韶山时作的。这首七言绝句是：“六亿同胞呼万岁，五洲志士称导师。欲溯河源到星宿，韶山风物耐人思。”这首诗虽然留有当年时代的色彩和痕迹，但我认为作者在诗中对毛泽东的爱戴是发自内心的，深刻地表达了他对人民领袖的由衷的敬爱之情。

当然谈到革命领袖之间的关系、毛泽东和叶剑英之间的关系，不能只限于感情。感情是友谊的基础。但这种感情经过升华，达到理性的高度，才更为可贵。他们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交往中，彼此间，经过长期的观察和理解，使感性的认识达到理性认识，因而使革命友谊建立在更加牢固的基础之上。从叶剑英这一边来看，就我所知，他对毛泽东的为人和才智是十分敬佩的，非常爱戴这位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我想从以下几个方面谈谈：

第一，关于毛泽东领导地位的形成和维护。在我们党的第一代领导核心的团结和巩固方面，叶帅是坚贞不渝并有很大功绩的。这在中央苏区和红军长征中表现得尤为突出。

第二，叶帅一生都坚决贯彻毛泽东的意图和指示，凡毛泽东交待的任务，他都积极完成，不打折扣，为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四化建设作出了杰出贡献。这从各个历史时期都可以看出来。

第三，叶帅对毛泽东思想比较注意研究，特别是对毛泽东军事思想的研究，有独到之处。他善于学习和运用毛泽东军事思想，创造性地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回答和解决中国革命战争与军队建设、国防建设中的实际问题，尤其在现代条件下，人民军队、人民战争、军事训练、军事科研等方面形成比较全面系统的理论体系，从而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为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宝库增加了新的内容。此外，叶剑英对毛泽东的教育思想、文艺思想、外交思想等也有所研究和创见。

第四，对毛泽东本人和毛泽东思想的坚定信仰。70 年代末 80 年代初，社会上曾掀起一段“非毛化”浪潮，从我们和叶帅接触所了解的情况看，在对待毛泽东问题上，他态度非常鲜明，从来没有动摇过对毛泽东的信仰。1982 年 4 月 16 日，他 85 岁诞辰，我们传记组的同志去给他祝寿，并写了诗词作为祝文，念给他听，祝他老人家健康长寿。他听了很激动也很高兴，讲了很长一段话，基本意思是：我很惭愧，没做多少事，我是打杂的。如果不跟毛主席，我很平庸，在南洋做做生意呀！在家里教教书呀！所以说历史是偶然的。一想到毛主席一生，我就伤心。说到这里，他流了泪。他自吟《八十书怀》的诗句：“导师创业垂千古，济辈跟随愧望尘。”然后说，这是我对毛主席的评价。有人批评毛主席，不能说他一无是处，还是我常讲的，如果没有毛主席，就没有中国现在的状况，中国现在还在黑暗中徘徊。我们中央开

会，还要上法租界、英租界呢！他回顾党和军队的历史，说不能因为毛主席晚年犯了些错误，就否定他。毛主席是很伟大的。不论过去和现在，我们都仰仗毛主席！他说得很动情，最后唏嘘呜咽，说不下去了。

访问人：他常常这样讲毛泽东吗？

范硕：叶帅给我的印象，只要谈到毛泽东、周恩来，多数时间他都要流泪，他对毛泽东的感情非常深。

### 叶帅是在实践中认识毛泽东的伟大的

访问人：叶剑英对毛泽东的感情是一种自然的流露，这种感情是从什么时候产生的呢？

范硕：叶帅仰慕毛泽东好久了，说到感情的交流，至少要从1931年说起。那一年叶剑英从上海来到中央苏区，正好赶上第二次反“围剿”。当时就如何退敌问题，毛泽东和项英等人之间产生了争论。毛泽东主张诱敌深入，项英等人主张大撤退、大转移，退出中央苏区，到云贵川去。叶剑英因为刚从苏联回到国内，又是从上海才来到苏区，对情况不很了解，所以他几乎没有发言。开始时态度不明朗。结果呢？第二次反“围剿”按毛泽东的意见办了，并且胜利了。第三次反“围剿”也是如此。这时叶剑英的思想产生了飞跃。以前对毛泽东他是只闻其名，未见其人，现在他感到毛泽东料事如神，是我党我军最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和战略家，并且深孚众望，很得人心。因此他下决心拜毛泽东为师。他找到毛泽东说，我刚从苏联回来，不了解情况，现在认识到你的意见是正确的。毛泽东很欣赏叶剑英这种谨慎谦虚的态度，说：你刚到苏区，不了解情况，项英又是中央局代理书记，这不是你的问题，可以理解。

访问人：看来从这个时候起叶剑英就跟定了毛泽东，他较早地认识到了毛泽东的超人之处。据说，宁都会议毛泽东受了批评，叶剑英因为跟毛泽东较紧，也受了牵连，是这样吗？

范硕：我们在访问中，有些老同志这样跟我们讲过，但我们经查历史材料，认为根据不足，但也不能完全排除这一因素。因为他的军委总参谋长一职，确实被撤了，从前方被召回了后方。但全面他讲，叶帅有个特点，服从上级领导的观念、组织纪律性观念比较强。所以，当时他和朱德、周恩来的关系都很好，和项英也不错，就是和李德搞得不好。第四次反“围剿”后李德把他的参谋长职务撤了，从福建前线调他到军委任四局局长。叶帅自己讲，在前线他指挥下的一个师战斗失利，李德以此为借口撤了他的职。

访问人：宁都会议前毛泽东和叶剑英在一起行动，两人接触较多。会后毛泽东处在被动挨批的地位，叶剑英和毛泽东接触多吗？这时的叶剑英对毛泽东是怎么看的？

范硕：接触不很多。据叶帅自己讲，那段时间有人反对毛主席，但他始终认为毛主席还是了不起。尤其李德来了之后，叶帅认为李德的这一套不行，很留恋毛泽东的指挥。长征开始，叶剑英作过一首诗：“越过千山与万水，问君西行何日还……”比较能说明他当时的心境，对李德很是失望，对苏区、对毛泽东的领导非常留恋。所以遵义会议上毛泽东回到了领导岗位，他知道后非常高兴，坚决拥护，连夜到下面传达遵义会议精神。

### 他们之间有着患难之交

访问人：叶剑英同毛泽东的关系之所以不同寻常，可以说他们之间是患难之交，这个问题您是怎样看的？

范硕：我想是可以这样说的。1935年遵义会议后，中央和军委机关在遵义附近进进出出兜圈子。一天路过一个小山谷，突然遭到敌军的袭击，那时毛、朱、周都在伏袭圈里，敌军喊着活捉“朱毛”，就冲下山来，情况非常危急。在这千钧一发时刻，叶剑英带领通讯排从后面赶来，很快占领对面山头，从上面往下打，赶跑了敌人。事后人们说，这次没有叶“参座”来，我们的命就没了。

还有一次，1935年3月在打鼓新场附近的一个地方开军委会，讨论成立指挥小组问题。这次会议三军团的领导人杨尚昆、彭德怀、叶剑英（任三军团参谋长）、刘少奇等都参加了。会议期间蒋介石的飞机突然来了，当时他什么都顾不得了，眼疾手快，大喊“主席跟我来！”拉着毛主席就跑，跑到一个山沟，和毛泽东藏在草丛中，直到敌机离去，才安全走出。这一次虽然算不上是救毛泽东，但通过这件小事也可以看出，他很看重和爱护毛泽东，觉得中国革命是少不了他的。不然他就不会那样护卫着毛泽东跑了。

访问人：1935年9月9日的事应该算一件大事了。

范硕：你们指的是9月9日张国焘发密电给陈昌浩的事吧？

访问人：是的。

范硕：那封密电主要内容是要右路军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企图分裂和危害中央。是叶剑英设法将这个电报及时送给毛泽东，才避免了红军内部可能发生的冲突。

访问人：能谈一谈当时的具体情形吗？

范硕：关于这件事我们访问过许多当事人，包括一些中央领导同志。他们有许多回忆和著述，叶帅本人也有回忆。在已出版的《叶剑英传略》和我在1986年10月5日叶帅逝世前发表在《人民日报》的《壮丽史诗的一个篇章》中都有过记述，即将出版的50余万字的《叶剑英传》中将有更多详细的披露，这里不多说了。总之，叶帅几次回忆都一再肯定有这封电报。他说，我设法把电报飞快送给毛主席。毛主席看了电报很紧张，立刻从口袋里拿出一个很短的铅笔和一张卷烟纸，迅速地把电报记下来，然后还对我说，你赶紧回去，不要让他们发现你到这儿来过。于是我赶忙跑回来，若无其事地把电报交给陈昌浩，还好没有出漏子。叶帅回忆，他不但把电报送给毛泽东，回到驻地以后，还考虑怎样把军委纵队带走。他说，当时我一直没有想好，忽然我想起了张国焘南下的电报，决定在这个电报上作文章。我先和总指挥徐向前讲，说总政委来电报要南下，我们应该积极准备，首先是粮食准备，先发个通知给各部队，让他们自己找地方打粮，限10天内把粮食准备好。徐向前说，好。得到徐帅的同意后，我写了个通知，准备发给各伙食单位，通知上说，今天晚上2点出发，自己找地方打粮。通知写好后，又给陈昌浩看，他认为很对，应先准备粮食。接着我就找各直属队负责人开会，叫大家按规定时间行动，并严格保密，就这样夜里2点钟把直属队带出来了。

访问人：这几年关于有无密电问题有些争论，请问到底有没有密电？

范硕：9月9日这一天有好几封电报。关于叶帅拿到的这一封，当时的作战科副科长，后任沈阳军区空军副司令吕黎平、译电员陈茂生可以作证，这份电报是他们两人译出的。电报内容虽然不一定有“武力解决”字样，但提出要右路军南下，有“彻底解决”，“彻底开展党内斗争”这类字样，这是毛主席说的。彻底开展党内斗争和武力解决实质上是一个意思。现在这个电报查不到了，想想也是自然的。陈昌浩南下后，这个电报肯定到了张国焘

手里，到了张国焘那里自然也就保存不下来了。再说，战争时期电报散失的也不止这一份，这是人所共知的。

访问人：请问，9月9日张国焘那封密电，毛泽东是怎样看的呢？

范硕：毛泽东曾多次谈到它，并充分肯定的。毛泽东谈到这件事较早的时间是1935年9月，据杨成武回忆，毛泽东在哈达铺曾向陕甘支队的干部说过，这次一、四方面军分家，在关键时刻是叶剑英送了一份电报给我，他立了一大功。

1937年3月30日在延安会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谈到长征左右路军时，说张国焘一到毛儿盖就反了，他就在那里大开督军会议，用枪杆子来审查党中央路线……。叶剑英将那份秘密命令偷来给我们看，我们便不得不单独北上了。因为电报上说：“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当时如果稍有不慎，那么就会打起来的。这是毛泽东的原话，是有案可查的，原件就存在中央档案馆。这可以说是张国焘制造的“密电”事件的可靠证据。毛主席不仅讲了叶帅“偷”电报的经过，红一方面军单独北上的理由，还讲了那封电报的主要内容：“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当时，张国焘出席了那次会议，并没有提出异议。直到毛泽东去世以前，也没有人向毛泽东公开提出不同看法。

1967年夏，毛泽东视察大江南北，会见杨成武时，还摸着自己的脑袋，很风趣他说，叶剑英在关键时刻立了大功，如果没有他，我们就没有这个了。他救了党，救了红军，救了我们这些人。这件事杨成武和我们谈过多次。

1971年8月28日，事隔36年，毛泽东仍然记得这件事，他在湖南和高级干部谈话时说，张国焘搞分裂，发电报给陈昌浩，要坚决南下，否则就要彻底解决。当时叶剑英当参谋长，他把这个电报给了我，没有给陈昌浩，我们才走了的。不然我们就当了俘虏啦！叶剑英在这个关键时刻是有功劳的。所以，你们应当尊重他。那时我们的路线是正确的。军队如果不到西北，怎么能到华北地区、华东地区、东北地区呢？怎么能在抗日战争时期搞那么多根据地呢？到了陕北张国焘又跑了。他是很怕胡宗南的，后来又跑到胡宗南那里去。我说张国焘如果不跑，要给他当政治局委员，你们信不信？

访问人：看来9月9日的事情叶剑英给毛泽东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以致一生都不能忘记。毛泽东评价叶剑英：“诸葛一生唯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是否由此发出的感慨呢？

范硕：应该说与这个事情有很大关系。这两句话，毛主席讲过多次，许多中央领导同志都亲自听说过，也讲过，像周恩来、薄一波等都听过，他们自己也讲过。陈毅元帅于1964年12月18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还把这两句话写在叶剑英开会使用的笔记本上：“剑英道兄正之：诸葛一生唯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陈毅题赠。”这个笔记本和陈毅的题赠手迹至今还珍藏着。徐向前元帅在叶剑英80寿辰之际，也曾写过一首相赠，以示祝贺。诗的开头两句也是用的这个典故：“吕端当愧公一筹，军师评编早有定。”当然，毛主席讲的这两句古语，不仅仅指密电事件。因为叶剑英的一生的确做了很多漂亮的事情。

比如巧设“空城计”，也就是打败第三次反共高潮，智退国民党军队进攻，就是一件。1943年夏，国民党借共产国际解散之机，妄图发动第三次反共高潮，调动50万大军进攻陕甘宁边区。这时八路军主力大多在抗日前线，延安只有三、四万留守部队。大兵压境情况之下，叶剑英提了一个建议，

一方面加紧军事防卫，部署部队准备反击；一方面用我们侦察到的敌军动态，公开揭露国民党。毛泽东、朱德很感兴趣，表示可以一试。他找到当时负责情报工作的戴镜之同志，问能不能把我们掌握的敌人情况公布一下，会不会给我们今后的工作带来困难等等。戴镜之说，问题不大。这样我们通过各种形式和途径公布了胡宗南调兵围攻陕甘宁边区的情况，毛泽东亲自给《解放日报》写了社论《质问国民党》，警告蒋介石必须立即撤退进犯边区的军队，纠正一切错误。社会各界闻此情况，一下子热闹起来，纷纷发表通电、声明，责问国民党为什么不打日本打自己的同胞，弄得蒋介石狼狈不堪，最后胡宗南出来讲话，表示这是一场误会。

当然，打退第三次反共高潮也还有其他诸多因素，但叶剑英摆出的“空城计”确也立了一大功劳。

访问人：“舌战群儒”是否也是叶剑英的闪光之处？

范硕：这件事非常精采。1940年3月，蒋介石在重庆召开全国参谋长会议，策划在会议上围攻我第十八集团军（八路军）。叶剑英带病出席。当时的会场紧张极了，谁先发言，谁后发言，讲些什么内容都是蒋介石事先安排好的。会议一开始，蒋介石就把共产党、第十八集团军训斥一顿，说冬季攻势打得不好，没有完成任务，是第十八集团军造成的；第十八集团军“游而不击”，制造摩擦，袭击友军，包庇叛军，破坏抗战等等一大串罪名，并且声言，一定要彻查此事，以整肃军纪军令。蒋介石讲完后，各军参谋长一齐响应，纷纷向我军发难。我军参谋长只有叶剑英一个人坐在那里，应该说是很孤立的。可以说是“单刀赴会”。会议开到第三天叶剑英发言，他不卑不亢、不慌不忙地逐条回答和反驳。关于发生在河北、山西、陕西等地的摩擦问题，他当场拿出这些省国民党军官制造摩擦的一道道命令和证据念给大家听，使在座军官无不为之惊愕。后来军委会参谋次长刘斐按铃说，一人讲半小时，警告到时间了，不让他再讲话。叶剑英把脸朝向蒋介石，说，我还没有讲完！蒋无奈只好让他再讲下去，结果叶剑英一口气讲了一个半小时。弄得蒋介石很狼狈，他本想围攻第十八集团军，动员反共，没想到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会后叶剑英将会议的情况连同他的发言稿，一同报给党中央。毛泽东看后很高兴，在上面批了话：此报告得到了大多数的同情。并请延安的中央领导同志传阅。董必武称赞叶剑英这次讲话是“舌战群儒”。后来毛泽东又提到这件事，他在中共七大上讲，叶剑英在长征中获取张国焘的密电立了一功，挽救了中央，避免了损失。在重庆与国民党斗争舌战群儒又立了一功，有这两件事是完全可以信赖的。

访问人：当时有人说，国民党也有这样一个参谋长就好了。

范硕：听有人说过这样的评语。蒋介石很欣赏他。传闻较多的是叶剑英被称为中共外交三骑士之一。另两位是周恩来和董必武。据说蒋介石说过共产党有两个人抓到不要杀，一个是周恩来，一个是叶剑英。叶帅自己说，他那时如果不跟共产党走，跟蒋介石干，他在国民党的地位不会低于某某。因为1926年打下南昌后，蒋介石就让他当师长，他没有干，后来又委任他当二师代理师长等，他是看中叶帅的才干和在广东的威望，想拉他去解决两广（广东、广西）问题。“四·一二”事变后，叶帅发表声明反蒋，彻底决裂，从此走上了与蒋对立的道路。

他们之间难免有时也有些思想矛盾，但毛泽东对叶剑英是信任的

访问人：毛泽东对叶剑英很欣赏，请问他们之间产生过矛盾吗？

范硕：总的说毛泽东对叶剑英比较放心。叶帅自己讲，他没有山头，也没有野心。他说自己是在毛主席领导下“打杂”的，让干什么就于什么。当然这样说，不能否定矛盾和差异的存在。毛泽东和叶帅之间的关系，在一些问题的认识和处理上，也产生过一些差异和矛盾，这是正常现象。

叶帅也有不顺的时候，也曾几起几落。有时起用他来收拾残局，他竟能不计前嫌，服从大局，泰然处之。他很欣赏广东潮洲韩愈祠的一副对联：“凭栏望，韩夫子祠，如此江山，争让昔贤留姓氏；把酒祭，马将军墓，奈何天地，竟将残局付英雄。”叶帅可以说是善于“收拾残局”的一位英雄人物。“文革”期间不少人被打倒了，他是被半打倒，军委副主席始终没有撤。说到矛盾，可以举个例子。1954年10月以前，叶剑英曾任中共中央中南局代理第一书记，中南军区代理司令员，10月回北京后任训练总监部代部长，这可以说是又一次起落。这是为什么呢？据我了解，其中有两个因素，一是说他右倾，搞和平土改，一是说他有地方主义。广东有个别领导人把这些事告到毛泽东那里，毛泽东比较重视，曾委派薄一波到广东等地调查，薄老调查回来向毛主席作了汇报，他说，这些事情叶剑英心里很委屈。他去广东后，对南下干部和当地干部的使用是公平的，不存在厚此薄彼的问题，说他带头搞地方主义缺乏根据。后来毛泽东虽然批评广东的“地方主义”，但也强调说剑英同志在华南工作是有成绩的，不能说他是搞“地方主义”的头头。这是薄老亲自和我讲的。这一次尽管毛泽东讲了叶帅的好话，但当时下面存些人通不过，叶帅还是挨了批评，违心地作了检讨，并因此调回北京。关于这件事，所谓“地方主义”错误，1979年广东省委进行了复查平反，并请示中央得到了批复。叶帅逝世后，薄老于1989年8月10日写怀念文章，登在《人民日报》上，明确指出当时批评广东一些同志的“地方主义”错误，存在着简单化、扩大化的倾向。还有所谓“和平土改”，是叶剑英根据广东华侨多，工商业发达，农村许多土地占有者，是工商业者兼地主，华侨兼地主的情况，提出不能“一刀切”，要具体分析，区别对待，从实际出发制定了保护华侨和工商业者利益的方针政策。现在看这是很正确的。后来这个所谓“错误”也平了反。所以，当时叶帅因这些事情挨批评，心里委屈，身体又不好，不太痛快。1954年他在青岛疗养，写了一首诗，最后两句是“忽忆刘亭长，苍凉唱大风。”这两句是什么意思呢？我们整理出版叶帅诗集时曾向他请教，他说，他是批评毛主席的。他引用汉高祖刘邦，即刘亭长唱“大风歌”的典故，建议毛主席要继续保持革命战争年代的联系群众、团结同志的好作风，加强军队和国防现代化建设，巩固无产阶级新生政权。

访问人：关于这首诗有人持异议，认为它是对毛泽东《浪淘沙·北戴河》的感应。

范硕：对此我不敢苟同。毛泽东这首词写于1954年，但发表在1957年。叶帅写“青岛”诗时还没有看到，怎样来“感应”？从两首诗词的内容和意境上看，也感应不起来。当然，诗无定诂，可以商榷。但对这首诗的后两句，叶帅确是那样解释的。诗者心声，这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叶帅当时的心境。我不大懂诗，不敢以诗人自居，随便抄袭人家的东西，牵强附会，妄加评论。我们更不必回避领袖之间的矛盾，“和稀泥”。我认为，叶帅对毛泽东并不是盲目崇拜，有矛盾有意见是很自然的。尽管如此，我认为叶帅这首诗还是与人为善的，并无恶意，其用心在警策和规劝。叶帅同中国有成就的大诗人一样，是一位心地善良、怀抱大海的诗人，他始终是敬仰、爱戴毛主席的。

尽管他们之间有时有这样那样的矛盾，但他总是从大局出发，站在毛泽东一边。为此，有时受委屈，违心地作自我检讨，偶尔借诗词发发牢骚，而他对毛泽东的一片赤诚始终是没有变的，从后来的情况也证明了这一点。

访问人：当时毛泽东虽然对叶剑英有些误解，但 1955 年授衔元帅时，叶帅并没有因此而受影响。对这件事您是怎么看的？

范硕：当时授予元帅军衔是有比较有标准的，论资历、论贡献给叶剑英评为元帅，党中央和毛泽东是公正的，叶帅本人也是当之无愧的。据我看毛泽东对叶剑英有长期的全面的了解，一直还是很信任的。即使在“文革”期间也是如此。有些军内外的“造反派”揪斗叶剑英，在最危急的时刻，毛泽东总是站出来保护叶剑英，说他为党为人民立了大功，这一点前面说过了。“二月逆流”平反也是如此。林彪、陈伯达的阴谋败露以后，毛泽东对叶剑英更加信赖，更加依重了。这是有目共睹的，1970 年庐山会议以后，开展“批陈整风”运动，许多重要工作，如揭露陈伯达的反革命面目，毛泽东和周恩来就交给叶剑英去办。叶帅不辞辛苦，奔赴福建陈伯达的家乡惠安县陈安大盾，深入农村作调查，以后又到厦门、广东、广西等地亲自找人谈话，提审在押人员、查阅敌伪档案材料，终于查清了陈伯达的反动历史，揭露了这个“红色理论家”的真面目。

1971 年“九·一三”事件后，毛泽东首先想到的是叶剑英，由叶帅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叶剑英接受任务后，给毛泽东写了一个报告，在报告的末尾他吐露自己的心声说：令我主持军委日常工作，我十分感戴主席的信任，但十分害怕工作做不好，误了大事。他表示自己要努力学习，努力工作，希望毛主席、周总理及各位政治局委员能经常对军委工作作出指示，提出意见，以便使工作少出差错。他请求毛主席有时间请赐一见，得到指示以利工作。毛泽东看到这个报告后，马上接见了她。

访问人：接见他时毛泽东讲了些什么？

范硕：主要谈了林彪搞了十几年，军队问题不少，如何整理军队，肃清林的流毒，加强军队建设等问题。

访问人：从叶剑英给毛泽东的报告里，给人一种感觉，好像有点战战兢兢的味道，连见到毛泽东，也是“赐见”。您认为这正常吗？

范硕：晚年毛泽东一方面受江青等人的干扰，做不到想见谁就见谁，一方面也确实严重脱离群众，所以老同志想见面也是很难的。叶帅在信中写“请赐见”，反映了当时这种大背景。同时，也可以看出叶帅谦虚谨慎的作风。这里想重提一下，江青等人干扰毛泽东，破坏毛泽东、叶剑英关系的事。叶剑英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后，江青一伙把军队看成他们篡党夺权的障碍，总是想办法打击叶剑英。1974 年 1 月 24 日、25 日，江青、王洪文在军队系统，党中央和国务院系统先后召开两次“批林批孔”万人动员大会，接着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江青又打着“批林批孔”的旗号，借某些领导干部子弟当兵问题，点名批评叶剑英。对于此事的回击，叶剑英采取了巧妙的方式。1 月 30 日，他直接写信给毛泽东，进行自我批评。2 月 15 日，毛泽东在叶帅的信上做了批示：“剑英同志，此事关系甚大，从支部到北京牵涉几百万人，开后门来的有好人，从前门来的也有坏人。现在形而上学猖獗，片面性。批林批孔，又夹着走后门，有可能冲淡批林批孔。小谢、迟群讲话有缺点，不宜向下发。我的意见如此。”毛主席批示后，把批林批孔大会的录音收回了，制止了江青等在全国播放“一二五”大会录音的阴谋活动。张春桥因此发难，

说叶剑英利用打报告，写检讨来告状是一大发明。从这件事我们可以看出，当时一方面江青一伙的干扰很大，一方面表明毛泽东对叶剑英还是很信任的。

中国古诗有云：“人间重晚晴”“交情老更亲”。毛主席与叶帅的感情和友谊确实按照这个规律发展着。有一件事的传说是真实的。毛主席弥留之际，叶帅和其他政治局委员列队到他病榻前，与他诀别。毛主席看到叶帅突然睁大眼睛，想说什么。叶帅当时泪眼模糊，没有查觉。待他走出后，毛主席又忽然意识清醒，以手相招。护士见此情景，马上跑到休息室找到叶帅说：“首长，主席招呼您呢！”叶帅返身回去，只见毛主席睁开双眼，嘴唇微微翕动，只是说不出来，叶帅握着他的手，又急又悲，陷入沉思。他后来告诉我们说，主席一定还要交代什么事情，为什么特意招呼我呢？叶帅想了很多，心情很沉重。这件传奇式的病榻诀别佳话，不是可从另一方面说明，两位老一辈革命家的相依之重，相知之深吗？我想，这确实是一种特殊的深情厚谊。

### 他们都是诗人且互相欣赏

访问人：毛泽东和叶剑英的关系确实比较好，我们觉得与他们都是诗人，诗人的心容易沟通也有关系。

范硕：可以这样认为。当然他们的关系亲密，不仅仅是因为是诗人，有其他许多因素。前面说过了。但，从他们在诗歌方面，尤其从古典诗词的交流、欣赏、爱好来看，这两位政治家兼诗人确有共同之处，彼此间的呼吸是相通的，“心有灵犀一点通”嘛！首先来讲，叶剑英对毛泽东的诗很推崇、很热爱，延安时期，他对毛泽东的诗口吟笔记，背诵如流，建国后1957年《诗刊》第一次公开发表毛泽东18首诗词，叶帅读后极为兴奋，如获至宝。他不仅自己反复背诵，而且给孩子讲，给身边的工作人员讲诗词里的典故。叶帅不仅爱毛诗，而且写诗来讴歌毛主席。除了前面提到的韶山一首外，1958年他随毛主席、周总理在十三陵水库劳动，还写过“万众欢呼毛主席，普通劳动者出堤旁”的诗句。1965年9月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20周年之际，重读毛泽东《论持久战》，以此为题写了一首七律，歌颂毛泽东的丰功伟绩：“百万倭奴压海隅，神州沉陆使人愁。内行内战资强虏，敌后敌前费运筹。唱罢凯歌来灞上，集中全力破石头。一篇持久重新读，眼底吴钩看不休。”叶帅在自己的诗词创作中也借鉴毛泽东的诗词，从中汲取营养。毛泽东对叶剑英的诗呢？也很关注，很喜欢，时常吟诵的。1964年岁终，他的儿子、儿媳毛岸青和邵华去祝贺他71岁寿辰，他当场就手书叶剑英的《远望》相赠，嘱咐他们向叶伯伯学习，好好于革命。这个手书是不简单的。据后来毛岸青夫妇对叶剑英说，父亲对伯伯是很尊敬的，对伯伯的诗也是十分喜爱的。不仅把诗中句句都入脑海，而且连什么时候，刊登在哪家报纸上都记得。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还将原诗题目《望远》改为《远望》，并加“在大连，棒捶岛”几个字。可见毛泽东对这首叶诗的写作背景和内容之熟悉了。毛主席如此看重叶诗，证明叶帅的诗词确有水平了，所以陈毅写信要毛泽东改诗，毛泽东回信说，我不懂律诗，剑英善七律，董老善五律，要向他们请教。1975年5月3日，中央政治局开会，毛泽东从外地刚回北京，谈到“长沙水”“武昌鱼”和孙权搬家南京的典故，突然想起辛弃疾《南乡子·登京口北固亭有怀》那首词，问叶帅你还记得那首词吗？叶帅当场念道：“何处望神州？满眼风光北固楼。千古兴亡多少事，悠悠、不尽长江滚滚流。年少万兜鍪，坐断江南战未休。天下英雄谁敌手？曹刘，生子当如孙仲谋。”毛泽东很满意，

当着大家的面说，此人有文化。然后改读辛词道：“天下英雄谁敌手，曹刘，当今惜无孙仲谋。”他指着叶剑英，继续说：“他看不起吴法宪。黄吴李邱不是曹刘，刘是刘震，曹是曹里怀，就是吴法宪不行。”这里，毛主席不仅赞赏叶帅的诗才，而且更重要的是表扬他与林彪、“四人帮”斗争的坚定性。毛泽东到了垂暮之年，有一次与当其侍讲古典文学的北大教师芦荻谈话中还谈到，叶帅的诗酣醇劲爽，形象亲切，律对精严。可见毛泽东对叶帅的诗词一直很推崇的。

访问人：回顾毛泽东和叶剑英的关系，的确不一般，他们既是志同道合的革命战友，又是诗友，叶剑英对毛泽东心悦诚服，始终尊其为导师、领袖，毛泽东对叶剑英也是很信任，很尊重，彼此建立了深厚的友谊。您给我们谈了很多，谢谢！

范硕：你们太客气了。得谢谢你们给我这个题目，逼着我研究和思考。毛泽东和叶剑英的关系，可以说是一门很高深的“关系学”，我谈到的只是“沧海的一粟”，只供参考。

## 后记

《说不尽的毛泽东——百位名人学者访谈录》一书经过两年的努力，终于全部脱稿。

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毛泽东研究获得了很大进展，但有一个问题，理论性较强，一般读者感觉艰深。为此，我们搞了这么一本书，试图以访谈的形式，用轻松通俗的语言去反映本来就不应该晦涩的关于毛泽东的种种话题。这是有关研究成果的一次小结，但我们想贴近更多的读者。只有如此，学者才能与百姓交流，让百姓认同。

在我们采访的一百位名人学者中，有的和毛泽东有过直接的交往；有的对毛泽东有着深入的研究；有的既有交流，又有研究。我们针对不同的情况分别提出不同的选题，本着毛泽东倡导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在讨论中尽情地抒情展臆，发表自己的见解。我们感觉，他们的看法和意见基本是前沿性的，反映了较高水平。

大凡名人，都很忙，但他们还是愉快地接受了采访。陆定一老人本来已经搁笔，还是破例接待了我们。贺龙的夫人薛明同志摔了腰，是在床上接受我们采访的，她趴在那里为我们签名，校正整理稿，令人感动。这样的事很多。可以说，没有他们的合作，便没有这本书。

此书在成稿的过程中，得到了刘洪妹、曹雪琴、王淑珍、李泊、李秀珍、曹志为等人的诸多帮助。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组的同志为我们审阅了书稿。辽宁人民出版社李英健为此书的出版付出了不少心血。在此，我们一并表示衷心的感谢！

我们自知能力有限，还有许多该访的名人学者没有全部访上，遗珠之憾和其他疏漏之处肯定难以避免。恳请读者和专家对本书给予批评指正。

谨以此书献给毛泽东诞辰一百周年。

张素华 边彦军 吴晓梅

1993年12月26日于北京前毛家湾

